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十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8—194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0)

ISBN 978—7—5098—0128—4

I. 共…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8—1943 ②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8—1943 IV. K26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535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0)

书 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8—1943)

编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0mm×203mm 1/32

字 数:810千字

印 张:33.25

印 数:1—1200册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128—4

定 价:258.00元 (共四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82517687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霍海丹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3)》。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12年2月
于京北宝盛里

编者说明

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20卷。本卷汇集了除本丛书第18、19卷所收档案外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兴起,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支援,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张国焘叛变行径的斗争,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共产国际与中共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等六个专题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散见于有关中文图书报刊之中,包括以前已由外文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①。

本卷所收的文件主要是1938年至1943年之间的文献和档案。为了说明问题,有的文献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作了延伸。它们包括:一、共产国际发表的有关声明和宣言;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电报;三、共产国际领导人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日记;四、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五、苏联领导人和外交官员及驻华顾问关于援助中国抗战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来往电报和有关报告;六、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及其领导人的电报和报

^① 译者稿酬按有关规定支付,请与本卷编者联系。

告；七、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指示精神所制定和发布的指示。

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刘宋斌同志负责选编。

目 录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

——摘自 1938 年 9 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

——摘自 1938 年 9 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7

八路军(1938 年 4 月 14 日)…………… H. 利亚霍夫 9

中国人民喜爱的报纸

(《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1938 年 5 月 5 日)…………… Я. 马克西莫夫 15

五台山的游击队员

——来自中国的消息(1938 年 5 月 30 日)…………… B. 罗戈夫 17

延安——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

(1938 年 8 月 2 日)…………… 塔斯社 20

在中国游击队员中间

(1938 年 8 月 7 日)…………… 23

中国的持久战口号意味着什么

(1938 年 9 月 5 日)…………… 陈 林 28

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

(1938 年 11 月 22 日)…………… M. 季霍米罗夫 33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37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3 月 4 日)…………… 郑 林 43

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关于给予中国满洲游击队运动 援助的命令

- (1939年4月15日) 47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49

二、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支援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蒋廷黻电

- (1937年8月20日) 57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鲍格莫洛夫电

- (1937年8月21日,急电) 58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鲍格莫洛夫电

- (1937年8月22日,急电) 60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 (1937年8月27日,特急电报) 61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 (1937年8月28日,特急电报) 63

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击落击毁敌机总计一览表

- (1937年8月—1945年7月) 65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军方五次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

- (1937年9月9日—10月4日) 67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

蒋介石电(摘要)

- (1937年9月20日) 88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石电

- (1937年10月3日) 89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石电

(1937年10月27日)	90
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关于援华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37年11月11日)	91
蒋介石关于请求苏联派部队援助中国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7年11月26日)	93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致蒋介石密函稿	
(1937年12月21日)	95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电	
(1938年1月3日)	98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8年1月22日)	99
在中国现在的首都	
(1938年1月25日) 塔斯社驻中国记者 B. 罗戈夫	100
中国的军事行动(1938年2月5日)	H. 利亚霍夫 104
日本对华战争需要花多少钱	
(1938年2月7日)	Л. 佩罗夫 109
山东北部的游击队	
——中国来信	
(1938年2月13日)	B. 罗戈夫 114
日本军队和中国的战争	
(1938年2月13日)	И. 西尔科夫 117
徐州保卫战的准备	
——与李宗仁将军的谈话	
(1938年2月14日)	123
中国军队的英雄	
——中国来信	
(1938年2月18日)	B. 罗戈夫 126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转呈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建议电	

- (1938年2月25日) 129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轰炸蚌埠安庆、台北及鲁南峰县等地
 之敌的“战斗要报”
 (1938年2月—10月) 131
 河北省的游击队(1938年3月10日) B. 罗戈夫 175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8年3月15日) 178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呈蒋介石
 (1938年3月29日) 179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驳斥日本政府抗议苏联飞机助华
 (1938年4月4日) 181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8年4月7日) 183
 立法院院长孙科致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密函
 (1938年4月16日) 184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电
 (1938年4月17日) 185
 中国的军队(1938年4月25日) 上校 И. И. 波波夫 186
 蒋介石关于尽快提供武器援助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8年5月5日) 191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介石电
 (1938年5月10日) 杨杰转 194
 中国战争的第二阶段
 (1938年5月10日) H. 利亚霍夫 195
 陇海铁路线上的战斗
 ——在中国的军事活动评述
 (1938年5月18日) H. 利亚霍夫 199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8年5月11日)	202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并转立法院长孙科电	
(1938年5月28日)	203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	
(1938年5月29日)	204
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密电	
(1938年5月31日)..... 杨杰转	205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	
(1938年6月2日)	206
在中国的前线	
——军事行动评述	
(1938年6月5日)	H. 利亚霍夫 207
中国的飞行员	
——汉口来信	
(1938年6月6日)	210
中国人民的战士	
——外国报刊述评	
(1938年6月19日)	214
占领徐州之后	
——中国军事战局评述	
(1938年7月1日)	H. 利亚霍夫 218
一位中国飞行员的回忆录	
(1938年7月10日)..... 少校 林 新	222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摘要)	
(1938年7月11日)	227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	
(1938年7月25日)	228
蒋介石致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转航空委员会技术厅长黄光锐电	

- (1938年7月25日) 229
-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8年8月2日) 230
-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致蒋介石转呈
黄光锐来电
(1938年8月12日) 231
-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
实施五千万美元信用借款条约
(1938年8月11日) 232
-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奉命参照苏联顾问班果夫之作战意见
改进前线军事致何应钦等代电
(1938年8月13日) 236
- 军委会抄送苏联顾问保葛达诺夫视察南浔铁路前线驻军建议
致何应钦代电
(1938年8月16日) 237
-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
(1938年8月17日) 239
- 蒋介石致伏罗希洛夫元帅并转斯大林电
(1938年8月17日) 240
-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
(1938年8月22日) 241
-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致蒋介石鉴呈
(1938年8月25日) 242
- 白崇禧转报炮兵监刘翰东与苏联顾问毕诺乌索夫视察
长江南岸一带情形致何应钦呈文
(1938年9月2日) 244
- 为汉口而战
(1938年9月19日) H. 利亚霍夫 246

为汉口而战

(1938年10月12日) H. 利亚霍夫 250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损失

(1938年10月16日) M. 季霍米罗夫 253

苏联顾问郭夫东视察武汉卫戍区阵地情形报告及建议

(1938年10月) 257

美国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

(1938年11月2日) И. 佩岁夫 260

中国人民必胜

(1938年11月7日) B. 罗戈夫 265

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评述

(1938年11月13日) H. 利亚霍夫 268

日本的侵略和英国在中国的利益

(1938年11月24日) E. 茹科夫 272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1938年11月29日) A. 别杰罗夫 277

中国各条战线的局势

(1938年12月4日) 282

苏联总顾问 A. И. 切列潘诺夫对第十五军团所拟

“武汉城市防御战斗指导计划”的意见

(1938年) 286

中国战局评述

(1939年1月18日) H. 利亚霍夫 287

中国的新军队

(1939年1月19日) 290

新中国在成长

(1939年2月6日) M. 季霍米罗夫 292

日本军阀在中国的阴谋

(1939年2月18日)	295
苏联炮兵顾问谢罗夫关于第三战区炮兵部队种种缺点报告摘要	
(1939年2月)	299
苏联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帮助中国分析敌情并拟呈对付方案	
(1939年2月11日)	302
中国战局述评	
(1939年4月3日)	H. 利亚霍夫 319
行政院会议颁发苏联空军顾问特贺尔勋章决议案	
(1939年4月25日)	322
在中国前线的一个村子里(中国来信)	
(1939年4月26日)	B. 罗果夫 323
在华中前线(记者短评)	
(1939年4月28日)	B. 罗果夫 326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	
(1939年5月14日)	329
立法院长孙科致行政院长孔祥熙电	
(1939年5月15日)	330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	
(1939年5月16日)	331
中国人民的女英雄	
(1939年5月17日)	冀玲 332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	
(1939年5月19日)	336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	
(1939年5月24日)	337
中国战局述评	
(1939年5月25日)	H. 利亚霍夫 338
中国战局述评	

(1939年6月11日)	H. 利亚霍夫 341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 关于实施壹万万伍仟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 (1939年6月13日)	344
日本侵华两周年 (1939年6月20日)	B. 罗果夫 349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 (1939年6月26日)	352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 (1939年7月1日)	353
中国战局述评 (1939年7月12日)	H. 利亚霍夫 354
蒋介石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电(杨杰转) (1939年7月30日)	357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 (1939年8月9日)	358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 (1939年8月9日)	359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9年8月20日)	360
蒋介石感谢苏联援助致斯大林的信 (1939年8月26日)	361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谈话记录 (1939年9月10日下午3时于克里姆林宫)	362
1939年中日战争述评 (1939年12月29日)	M. 马利亚尔 365
中国军队在广东的巨大胜利 (1940年1月6日)	370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伏罗希洛夫元帅晤谈记录 (1940年1月8日下午2时)	374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40年1月9日)	376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蒋介石电 (1940年1月20日)	377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电 (1940年1月31日)	379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轰炸南宁、汉口、运城、岳阳等地 之敌的“战斗要报” (1940年1月—5月)	380
军委会为苏联总顾问福尔根报告第三战区作战不力 飭检讨纠正代电 (1940年2月22日)	381
中国的军事行动 (1940年3月1日)	382
中国战局述评 (1940年3月16日)	384
苏联顾问阔扎柯夫关于改革三战区炮兵指挥部组织 及炮兵的报告 (1940年3月26日)	386
苏联炮兵顾问阔扎柯夫的报告(译件) (1940年3月26日)	387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4月3日)	390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4月12日)	394

空军第三路司令部战斗要报 (1940年4月12日于成都西胜街本部)	397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4月27日)	399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5月2日于成都)	405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5月2日)	406
空军战斗要报 (1941年5月21日于成都空军总指挥部)	408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蒋介石签呈 (1940年4月28日)	411
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 (1940年5月4日)	A. 别杰罗夫 415
军令部为修改苏联顾问福尔根对宜昌失陷检讨意见 致蒋介石签呈 (1940年7月25日)	420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谈话 记录(节录) (1941年1月16日)	425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动用苏联贷款向苏购军火 武器的账略 (1941年3月4日)	428
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呈蒋介石报告 (1941年3月28日)	439
军委委员长侍从室转报向苏联订购之汽油数千吨已运抵 惠远、哈密致孔祥熙代电 (1941年9月9日)	442

苏联代军事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关于“中国各战区防御工事概况报告书”	
(1942年8月)	443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致外交部交际科笺函	
(1943年5月24日)	445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查对中苏第三次信用借款项下援华物资的签呈	
(1944年10月2日)	449
汉口苏联空军烈士墓	451
在华使命(节录)	[苏]崔可夫 453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张国焘叛变行径的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8年4月18日)	549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1938年4月19日)	550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张国焘问题的声明	
(1938年9月)	5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	
(1938年9月)	557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国际指示报告	
(1938年9月)	王稼祥 561
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	毛泽东 565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 (1938年10月1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	洛 甫 642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致各国共产党电 (1938年11月5日)……	688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致日本共产党电 (1938年11月5日)……	690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1938年11月6日通过)……	692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 国共两党同志书 (1938年11月6日)……	694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 (1938年11月6日)……	698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699
五、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反投降反磨擦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 (1940年2月)……	703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电报 (1941年1月4日)……	711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712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732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反磨擦斗争中争取友军工作给 新四军的指示 (1940年11月4日)……	736
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 致周恩来电 (1940年11月6日)……	739

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1940年11月6日)	740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1941年1月13日)	741
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指示 (1940年12月26日)	743
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 (1940年12月31日)	745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谈话 记录(节录) (1941年1月16日)	747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1941年1月18日)	750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1941年1月18日)	753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 紧急工作的指示 (1941年1月20日)	757
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 (1941年1月24日)	760
毛泽东等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1941年1月28日)	762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 (1941年1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764
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 (1941年2月7日毛泽东致周恩来)	768
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指示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	770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1941年2月15日)	773
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 (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 彭德怀、左权等)	774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1941年5月9日)	776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1941年5月25日)	778
在华使命(节录)	崔可夫 780
六、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	
新苏临时通商协定 (1931年10月1日)	799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致外交部驻新特派员陈继善 (1933年3月21日)	803
外交部长罗文干致迪化宣慰使黄慕松电 (1933年6月29日)	804
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抄送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及附件致 行政院呈文 (1933年9月14日)	805
国民政府外交部签注新苏协定意见呈行政院文 (1933年11月4日)	806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电 (1934年7月16日)	810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4年8月15日)	811
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话记录	

(1934年8月29日上午11时30分)	813
关于苏联对新疆贷款密约之签订	
(1935年5月16日)	815
毛泽民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致洛甫、泽东同志的信	
(1938年4月18日)	817
任命状	
(1938年4月)	821
盛世才委任周彬为逆产委员会委员长的手谕	
(1938年5月31日)	822
周彬、张宏与关于筹办官商合办银行给盛世才的报告	
(1938年7月)	823
财政厅呈报新疆省区财政局暂行条例	825
全省各机关请领经、临费办法及手续	827
新疆商业银行招收商股启事	829
周彬呈报成立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经过	830
盛世才委任周彬为新疆二期三年计划设计委员会副委员长 兼财政组组长	832
关于新疆的社会环境讲话提要	
(1939年1月19日)	邓发 833
周彬关于稳定金价的报告	835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新疆省政府关于收换法币的指示	
(1939年5月)	837
财政厅呈请简化机关经费批发手续	838
呈请重新修订监察章程并将经常审计移归财政厅的报告	839
财政厅关于任用财税人员手续的通令	840
新疆财政厅关于禁烟禁赌的通令	841
关于盛世才的情况及新疆工作问题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节录)	

(1939年6月16日)·····	毛泽民	843
关于颁发商业银行理监事聘书的批复·····		846
李溶关于周彬病愈回省仍代财政厅长的手谕·····		847
徐杰准备引退的请示·····		848
财政厅关于制定廿九年年度计划的通令·····		849
财政厅呈请重新修改取缔隐匿契税办法·····		850
周彬关于郝冰清等兼代办理金矿处主任的呈文·····		853
新疆省政府奖励新疆日报社编辑长李啸平等的训令 (1940年6月25日)·····		854
租借条约(外交部译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与新疆省政府签订 (1940年11月26日)·····		856
财政厅关于查禁募捐的通令·····		861
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关于粘贴印花税票的通令·····		863
督办公署为实施民国三十年度收支总预算标准案的通令·····		864
新疆省建设公债宣传大纲·····		868
毛泽民在民国三十年新疆财委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录)·····		872
盛世才致蒋介石书 (1942年7月7日)·····		874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纪录 (重庆,1942年7月9日地点——曾家岩官邸)·····		879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 (1942年7月13日)·····		883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纪录 (1942年7月16日)·····		886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电(摘要) (1942年7月23日)·····		890
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与中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		

谈话备忘录	
(1942年9月28日)	891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代电	
(1942年9月28日)	893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电	
(1942年10月6日)	895
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致美驻华大使高思备忘录	
(1942年10月7日)	896
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彭吉元致外交部电	
(1942年10月18日)	898
外交部致蒋介石代电	
(1942年10月21日)	900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致盛世才电	
(1942年12月16日)	902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903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代电	
(1943年1月5日)	905
盛世才致蒋介石电	
(1943年1月7日)	907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函	
(1943年1月21日)	910
外交部致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署电	
(1943年2月22日)	912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报告	
(1943年4月17日)	913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函	
(1943年4月23日)	916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与盛世才谈话记录	

(1943年5月3日)	917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致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备忘录	
(1943年5月6日)	924
蒋介石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函	
(1943年5月7日)	925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部、次长代电	
(1943年6月11日)	926
盛世才致蒋介石代电	
(1943年6月11日)	928
蒋介石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电	
(1943年6月23日〈24日收〉)	929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部	
(1943年6月24日)	931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部、次长电	
(1943年6月24日)	932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电	
(1943年9月6日)	933
新疆督署秘书处报苏联驻新第八团撤退情形	
(1943年7月3日)	934
美国驻华临时代办艾切森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	
(1943年7月7日)	935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致蒋介石代电(摘要)	
(1943年8月14日)	936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致蒋介石报告	
(1943年8月2日)	937
美驻华临时代办艾切森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	
(1943年7月31日)	940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电(摘要)	

(1943年9月10日)	941
盛世才第二次致蒋介石书	
(1946年11月24日)	942
盛世才关于苏联与新疆省政府签订“租借条约”的叙述	
(1950年3月4日)	944
徐智《哈密见闻》(摘录)	
苏军驻哈密的片断回忆	945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统战工作	高登榜 948
中共党人在新疆财经战线上(节录)	方志纯 974
抗日战争初期在新疆日报社	汪小川 979
回忆抗战时期中共党员主编《新疆日报》	赵新亚 984
为了建设抗战的大后方	
——忆新疆之行	萨空了 994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	周东郊口述 1001
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摘录)	周东郊遗稿 1026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 敌后抗战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

——摘自 1938 年 9 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宣读了下述的宣言：

(一)中国共产党及时的预见到：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会限制于仅仅侵占东北四省，而是并吞全中国。为了团结一切民族力量以保卫祖国起见，中共从自己方面尽了一切可能去结束十年来的内战，以取得对于国民党的友好的合作。这一努力，对于国民党也发生了影响，在西安事变中尤其是如此。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而打破了日本走卒所准备的卑污的谋害蒋介石以挑拨中国新的内战之行为。从此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就开始接近，以后就进到了合作。

(二)日本法西斯军阀，于一九三七年秋开始侵夺中国北部及东南部的广大的领土，他们希望得到迅速的、容易的胜利，希望逼得国民政府屈膝投降，希望以华制华。可是他们的打算是惨酷的失败了。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因此，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迅即遭受中华民族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给了日本以巨大的损失，使他们对于中国的进攻，转成一种对于他们甚为繁重的持久的战争。这一战争，日益要求日本使用更大的军事力量。战争越是继续，日本的困难愈是增加，日本侵略的完全失败的日子，便越是迫近。

(三)但是在最近的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须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反对残暴日本帝国主义的自卫战争,是对于我们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巨大的锻炼。只有民族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进行这一伟大的斗争,才能保证中国民族的胜利。可是最近数月来的经验已经指明正是这种自卫战争,是有伟大的力量,来团结中国民族。在战争的烈火中,旧的数千百年的分裂国家的屏障是被破坏着,团结我们四万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统一民族的伟大过程是在完成着。这就是中国人民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

(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立起来了。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这些正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收获,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亲密的战斗的团结的基础。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是胜利的保卫中国的决定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中国的一切抗日党派。这一统一战线的参加者,必须真正亲密地联合起来。国民政府的正确政策,必须被实行。彼此间必须有完全的相互的信任,共同工作与共同负责。

(五)中国劳动群众的组织性的缺乏,妨碍着并延缓着动员一切人民力量来进行抗日斗争的事业。为着克服这一弱点,必须由国民党及共产党加紧努力,去吸收劳动群众到各种现有的及新的组织中来。这样来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强的下层群众基础。首先应当把工人组织于职工会中,把现有的职工会转变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组织,使之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特别重要与可靠的堡垒。在日军占领区域,应当以适当形式,建立职工运动的许多不大的据点。

(六)在中国人民占最大多数的农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来积极参加保护祖国的斗争,要胜利的进行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为着增加收成,提高农民对于积极参加民族解

放战争与各种保卫国家工作的兴趣，必须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与法律地位，同样必须注意农民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在日军占领区域，农民应被组织到游击队中，以进行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

(七)同时还有一个任务，是要在保卫祖国的各种工作中，在后方，在前线，在生产中，去发展青年的积极性，不仅帮助青年学生，而且帮助青年工农组织到那些参加伟大救国事业的各种团体去。首先，共产党赞助国民党所建立的全国青年团，帮助它发展成为中国青年的真正统一组织，使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下工作，并使他包括青年一代的最广大的群众。

还须要有广大的工作，吸收千百万的中国妇女来有组织的参加保卫祖国的事业，以争取中国人民的最后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中国妇女自由的光明的将来。

(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害怕的，再没有比中国民族的团结更厉害的了。他们不仅在前线上进攻，而且在中国后方进行经常的破坏工作。日本侦探与走卒，挑拨中国各政党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间的关系。特别阴险恶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洛茨基派走狗，他们尽力散播与引起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彼此间互不信任的空气与新的仇视。

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人以及中国的一切爱国人士，应当警惕的注视日本法西斯帝及其中国走卒的下流阴谋，这些阴谋，是要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以帮助日本军队，在前线上的进攻，必须做到把狡猾敌人的这些秘密的恶毒的走狗，必须迅速的加以揭露，坚决的加以消灭。

.....

中国共产党深信，从一切方面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保证我们民族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完全胜利。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

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

——摘自 1938 年 9 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中国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引起了国际无产阶级及一切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同情。一切进步的人类都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起来反对野蛮的暴力，不仅是为保卫自己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假使日本法西斯蒂军阀，竟然征服了中华民族，那么它将在亚洲，在太平洋上，在欧洲，在世界其他各地，大大加重与发展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而中国之胜利，却正是对于一切法西斯蒂侵略者的掠夺计划之严重打击。所以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与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责任去用全力援助中国民族的斗争，与继续加强对西班牙人民的援助同时并进。这种国际的援助，还没有被充分的组织起来。它的规模远不能适应现有的群众对于中华民族的广大同情。必须到处把这种同情引导到积极的行动，并且把事情组织成这样，使得第一，从政治上、道义上以及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第二，增加日本军阀在中国进行侵略行动的一切困难与阻挠。

为着这一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仅向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们宣告，号召他们首先执行下述的任务：

(一)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在国际的报章上以及

在一切宣传运动中,应当比已往更强有力地反映出一方面日寇侵略者在中国的残暴兽行,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英勇。

(二)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蒂对于中国的强盗进攻的广泛抗议运动。召集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等等,并且还把群众的愤怒,引向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内被收买的亲日报纸。

(三)组织并扩大对日本侵略者的群众制裁(抵制日货运动,工人拒卸日本货,拒制运往日本的军用材料及其他各种资材至日本等)。

(四)加强募捐帮助中国,派遣医药救护队来华。

(五)帮助日本劳动群众在一切困难中加紧开展反法西斯蒂反战争的工作。

(六)在中国政府同意之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

如果国际工人阶级与一切国家民主力量实际的援助中国,毫无疑问的,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的英勇,将使它能打倒野蛮的日本军阀,获得完全胜利,而建立自由的独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它将成为全世界上和平民主与进步的最重要柱石之一。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八路军

(1938年4月14日)

H. 利亚霍夫

由过去的中国红军组建的八路军，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八路军是华北日军的眼中钉。

得到将军们的允诺，去中国作轻松的军事旅游的日本士兵们，他们的情绪在中国人民的英勇反击下，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请看下面这本落到八路军手中的日本士兵日记。日记的开头部分记录了日本出征前的情况，后一部分记录了日军在华北的一些情况。

“八月二日。我早就盼望着自己有所作为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到了华北。”

“八月三日。我来到第五师团司令部，被分配去侍候板垣将军。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指挥三万来华士兵的司令部。如果司令部哪怕有一个军官遇到危险，那么整个师团的工作就可能遭到破坏。因为，没有组织士兵就不能作战。想到这里，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八月十九日。我们来到师团驻地。既然我们是在敌人的国土上，那我们就有权用武力去占有一切。所以我还没有吃早饭就去征收‘强制性捐献’。结果弄到十二只母鸡，还有大葱和土豆。士兵的生活真是好极了！”

“八月二十七日。早上八时，整个师团向南口进发。我们的部队继续向前推进。”

“九月九日。部队到达化稍营，我同三位好友去征收‘强制性

捐献’，很快就弄到八只母鸡和一些蔬菜。今天是我的生日，很有口福，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和朋友又出去弄了一些大豆和红薯。我们强迫五个中国人扛着这些东西跟着我们走。昨天我们吃了母鸡，今天又喝了大豆汤。”

“九月十二日。下午两点我们乘大卡车出发，晚上七点半到达蔚县。在我们大炮的轰击下，敌人晚上退到大同。唉！你们中国军队迟早是要完蛋的。为什么你们要撤退呢？我无法理解，这样的军队实质上还是不是军队？”

“九月二十三日。中午，师团司令部从蔚县出发，我们乘汽车于下午五时到达灵丘，师团长又从这里乘车于晚上九时到达太白村，视察了处于前沿阵地的二十一步兵旅团。这里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子弹在头上飞啸。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我们回到灵丘。在返回途中我们连续行车二十个小时，连一分钟也没有休息。”^①

※ ※ ※

日本士兵的日记到此为止。第二天，日军司令部在平型关战役中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袭击并被八路军占领。这本日记便是战利品之一。这次战役后撤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

八路军以平型关战役的辉煌胜利开始了自己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的战斗活动。平型关战役发生在1937年9月24—25日，即在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不久发生的。从那时起，八路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战斗活动，他们既在前线作战，也在敌后作战，往往是在敌人难以预料的时候打击日本军队，向日本军队发起进攻。

八路军虽然没有足够的装备，但是装备精良的敌人在机动灵活的八路军面前仍然显得无能为力。这支英勇军队的绝大多数战士都是用旧式枪枝装备起来的，这些枪枝多数是中国红军长征时

^① 这篇日记在美国《亚洲调查》月刊4月号上全文发表。

使用过的。刻在这些旧枪枝上面的标记早已磨光,可是它仍然掌握在能人手中,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而战。

每颗子弹在八路军战士手中都要准确计算。因此,八路军规定了严格的射击纪律。八路军中涌现出很多优秀射手。在战斗中,射击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只许射击明显的敌人;

只许射击清楚的目标;

只有在有把握射中目标时方能射击。

八路军武器的不足部分,是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来补充的。八路军已成立了“供给部”,它的任务是夺取日本载有武器、弹药、粮食的辎重车队。这个“供给部”正在卓有成效地完成自己的供给任务。

八路军司令部的战略战术方针是,在技术装备极差的条件下,广泛采用敌后游击战,以便同前线阵地战紧密配合。这个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早已众所周知,并多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朱德总司令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以下看法:

“在战争中绝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战术方法。必须考虑到敌人的兵力、地形特点、时间和其他因素,然后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战斗。当然,只是游击战还不能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它只能给敌人造成某些失败,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敌人前进。为了争取彻底的胜利,游击队应当在同前线的正规部队保持紧密联系中进行战斗。

“当大规模的游击队对敌人采取纵深迂回战术并同他们展开激烈的速决战时,游击队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果经常对敌人实行迂回和包围,那么敌人就将随时处在我们的打击下,随时为自己部队的两翼和后方担心,而这种情形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①

^① 参见《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编者注

技术装备的不足,使得八路军把敌后游击活动与前线正规军的战斗协调起来。这两种斗争方式的相互关系,在每一时期随具体情况而定。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八路军整个部队都转向游击活动;有时他们又集中到一个主要方向,象正规军那样进行战斗。

八路军认为进攻是战斗的基础。在敌后的活动中,他们广泛地采用伏击战和突然袭击的战术。为使日本的技术装备失去效力,八路军常常很隐蔽地靠近敌人,短兵相接,然后发起进攻,这种方式使敌人无法发挥技术装备的威力,无法进行有组织的射击。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经常使日本人遭到失败。

八路军部队善于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们常常把敌人,引入山区地带,那里因缺乏便利的交通,从而使敌人的技术装备无法使用。八路军是由非常熟悉地形的山区居民来补充的。战士们很勇敢,并且有长途急行军的能力。部队虽然仅有一些简单的装备,但他们也能化劣势为优势,大炮不够反而增强了部队的机动灵活性。

八路军战士的士气非常高昂。部队的干部在无数次的战斗中和多年的行军中受到军事锻炼。部队常在战斗间隙期间进行军事训练,战斗之后,如果情况允许,他们便分析战斗进程,总结战斗经验,同时吸取教训。

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部队是无数支游击队的组织者,这些游击队是由一些居民组成的,他们在某些地区,已经建立起抗日地方政府。京汉(北平至汉口)铁路和同太(大同至太原)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是处在八路军部队和游击队的控制之下。

敌占区的工人群众正在大规模地参加游击队。例如,1937年10月,阳泉地区(山西省东部)的矿工,在日本人附近建立了游击队,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炸毁铁路,一直活动在敌人的后方。当这支矿工游击队了解到附近有八路军活动时,他们便与八路军联合,一起进行战斗,保卫太原。

八路军的政治机关经常印刷传单并在日本士兵中散发。下面就是一张传单的内容：

“同志们！弟兄们！

“你们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抛弃自己远在日本的家园，离开自己痛哭流涕的父母和妻室儿女呢？

“你们离开他们是为了参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想一想占领满洲的情景吧！是谁在那块土地上流血？是你和你的兄弟！你们为此又得到了什么呢？你们的双亲又得到了什么呢？除了日益加剧的贫穷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停止侵略中国人民的战争吧！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投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将象欢迎自己的兄弟一样欢迎你们。”

八路军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人们普遍的爱戴。部队在交战地区的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部队每经过一个城市或一个乡村，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八路军常常阐述中国人民的任务，以及部队为此而奋斗的解放战争的目的。

群众经常给部队以各方面的支持。由于缺乏运输工具，给部队运送伤员增加了很多困难。在这方面，前线的居民给了八路军巨大的帮助。农民用担架把伤员运到很远的后方医院，并在途中无微不至地护理伤员。每一个村子都事先为伤员准备好御寒的房间和食物。当地的医生给伤员包扎，减轻他们的痛苦。在八路军作战的地方，群众总是留在原地，以便帮助部队。当地农民还给部队作向导，并献上他们的粮食，有的农民还参加部队，自豪地穿上简朴的军装。八路军战士常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后方。尽管我们在敌后，但是每一块领土都是我们的基地。”

八路军中建立有宣传鼓动机构，它既在战士中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举行各种会议，进行演出等等。部队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军民的紧密联系。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道：

“我们相信并知道群众会帮助我们。取得胜利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中国人民群众对部队的支援。我们八路军的经验证明，如果群众在我们方面，那么胜利就在我们方面。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联盟，帮助我们战胜了日本的坦克、大炮、飞机……”

“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够，我们应当取得更大的成就，直到赢得彻底的胜利，把最后一个日本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八路军，但是我们希望，人民不要仅仅赞扬八路军的胜利和工作，而且应当作好接替我们的准备。”

无论在冬季严寒的日子里，还是在雨天、白天和夜间，八路军部队都在村镇和山间小路活动。他们寻找敌人，与敌人战斗，并战胜敌人。当战士们忍饥挨饿，或者冻得双脚流黄水时，他们仍然坚持唱歌。他们唱的那些中国红军歌曲和新编的歌曲，号召人们去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这些歌曲鼓舞着战士，给他们以新的力量。

八路军的斗争及其丰功伟绩，鼓舞着全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人民喜爱的报纸

（《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1938年5月5日）

Я. 马克西莫夫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了。《新华日报》的印数不少于五万份。许多中国报纸，甚至最有影响、历史最悠久的报纸都在称赞这份报纸。正如路透社报道说：现在连中国最边远的地区。都可以看到这张报纸。中国共产党为了在全国各省居民中普及自己的报纸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人们争相传阅这份报纸。因此，《新华日报》的读者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五万人。

《新华日报》从自己问世的第一天起，就高举着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的奴役，为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的战斗旗帜。

报纸每天都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代言人——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和汉奸的卑鄙阴谋。报纸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热情鼓动者和宣传者。

共产党的印刷品的合法化和《新华日报》的出现，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签订协议的直接结果。国内的一切进步分子和中国所有的忠实爱国者，都一致要求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这是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所必需的。《新华日报》始终不渝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而中国的托洛茨基奸

细,却按照日本主子的旨意,处心积虑地要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机关报的威信。

但是,他们的卑鄙阴谋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前不久,因失败而恼羞成怒的托洛茨基匪帮,组织了一次直接捣毁《新华日报》编辑部的破坏活动。但是他们又失败了。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新华日报》照样出版,并且以新的激情号召中国人民进行反对一切外国强盗的斗争,同时阐明了扫除一切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是保证这场斗争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现在,每一个诚实的中国公民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情镇压托洛茨基匪帮和奸细,无情镇压一切破坏中国国防的卖国贼,这是最受中国人民群众欢迎的口号之一。

《新华日报》是中国人民喜爱的报纸。全中国的进步分子和中国所有的爱国者,都非常尊重这张报纸,十分注意倾听它的声音。

《新华日报》如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出版物一样,在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的事业中,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新华日报》的文章和它的前线通讯,热烈号召伟大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要坚信一定会取得胜利。报纸把中国战士动员起来了,并鼓励后方的农民、妇女、青年支援前线。《新华日报》还坚持不懈地宣传这样的口号:中国人民要为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而斗争。

除《新华日报》外,共产党在汉口还有《群众》杂志,而在特区首府延安,还出版了《解放》杂志。

(徐正明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五台山的游击队员

——来自中国的消息

(1938年5月30日)

B. 罗戈夫

日本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是在超过日本本身领土三倍的土地上进行的。用现代化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已经深入到中国的铁路沿线一带。但是，在被占领省分中占领者的政权只适用于有日本驻军的城市。现在华北战线已延伸到黄河。但是，从北京、天津到日军的前沿阵地，被“占领”的领土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

在河北、山西、察哈尔三省的交界处，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游击队国家”。游击队控制着四十三个县，其中只有十个县城被日本人占领。

第一个游击区位于津浦路和平汉路之间。游击队控制着十七个县，人口一千余万。人民群众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在这里作战的仍然是从山西来的八路军部队。他们到处建立起游击队，并且领导着人民武装。中国中央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仍继续存在。

第二个游击区位于平汉路以西，有二十六个县，以五台县城（山西省）和阜平（河北省）为中心，人口超过一百二十万。这些山区对日本军队来说都是无法攻破的堡垒。像五台山、太行山这些山区，日本人的坦克和飞机，是开不进去的，而没有这些东西日本

军队对游击队也就无所施其伎了。

在这个广大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县的行政机关仍然和以前一样,只是在那些官吏逃跑了或者当了汉奸的县,才有所变动。有好几个游击队在组织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几乎每一个县城和乡村都办了墙报。这里,每两周出版一次《战争之友》报和《解放战争》报。过去,这些报纸由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现在由游击队司令部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占领区正常的邮电联系遭到破坏,无法进行通邮工作,而在五台山地区,邮电工作照样进行,只是缺乏邮票。现在,“晋察冀”边区建立起来的临时邮局已在发行临时邮票。

从1月10日至15日,五台县城举行了县、游击组织和军队的代表会议。共有一百四十九名代表参加。会上,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抗日临时政府,参加政府的有:山西省政府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共产党的代表,山西军队和八路军的代表。

太原沦陷之后,在日本军队的后方,仍然留下一部分八路军的部队和阎锡山的部队。为了防止日本人的入侵。居民开始自发地成立自卫队。在五台县著名的寺庙中心,甚至有由僧侣组织起来的队伍。而在忻州,伊斯兰教徒也组织了抗日队伍。居民也在进行军事训练。在五台山和阜平的寺庙中,设有军事学校,培养游击队的指挥员和领导人。有好几十万主要用旧式中国武器武装起来的人已参加了乡村自卫队。

这一地区的居民深感武器不足。军队、游击队和自卫队中只有一个供给来源——依靠敌人。为了武装新建立起来的队伍,他们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军事行动——“猎取武器”:向日本运输车和辎重车进攻。许多地区还建立“乡村兵工厂”,修理步枪,生产手榴弹和大刀。在一系列反击日本军队的出色战斗中,游击队得到了不少的武器,缴获了几门大炮和几辆坦克,但遗憾的是不得不把这些武器破坏掉,因为既没有炮弹也没有燃料。

除了武器不足，离开故乡并处于敌人包围中的英勇的爱国者们，还遇到其他方面的许多困难。战前，这一地区大部分播种面积是种棉花。现在，没有地方种棉花了。抗日临时政府要求居民播种谷物。许多地区都把播种用的种籽配给农民，主要是配给从其他地区来的难民。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政府不得不实行减税。这就大大地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在县的代表会议上已决定发行“民族解放”公债。

最困难的事情是组织对伤员的护理。没有医生又缺乏药品。当时，“救护问题”是用“地方财政”来解决的。农民对伤员、士兵和游击队员表现出十分感人的关怀，他们实行按村分配伤员的制度。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建立了好几所小医院。

去年12月，日本人用八个纵队对五台山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围剿。斗争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结果日本人遭到失败。拥有大炮和飞机的近两个日军师团，在全民防卫面前无能为力。八路军部队给日本纵队以多次毁灭性打击之后，转为反攻。结果，八路军部队穿过平汉铁路，进入河北省境内。现在他们在那里帮助游击队，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抗日本奴役者的斗争。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延安——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

(1938年8月2日)

塔斯社

《泰晤士报》记者结束了中国特区中心之行，并从延安发回了三篇长文，详细报导了特区的情况。

“在八路军活动的所有县城(其中包括日军后方)，人民都被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八路军的宣传员在每个村镇都建立了工会、商会、农会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在当地进行各项工作，选举县政府和区政府(河北、山东和山西东部)代表。

“这些组织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收割季节，它们帮助农民进行田间劳动，讲解先进的农业管理方法；建立农业合作社。它们非常重视国民教育。除普通学校外，还开办了夜校和家庭班。仅延安，家庭班就有五百多个。

“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婆婆压迫儿媳的现象已经结束，婆母掌权的传统也改变了。在延安，有三分之二的妇女参加各种组织。在整个特区，有五分之三的妇女参加各种团体。妇女还建立了自己的自卫队并同男人们一样进行军事训练。有各种专门的妇女小组为军队服务：她们给战士洗被子，补衣服；照顾伤病员；帮助军属。还有代替男人进行田间工作的各种妇女专业队。很多妇女都在工厂和作坊里工作。

“孩子们建立了少先队和‘青年先锋队’”。

记者继续写道：“陕西的延安是中国青年向往的地方。现在，中国青年正从全国各省奔赴延安，菲律宾、爪哇、美国的一些青年

也来到延安。现在有五万名中国青年正排着轮次等候到延安去学习。

“要去这个城市是相当困难的。从西安到延安,大概是世界上最难走的路。沿途,我遇见一群群步行前往陕西的青年。在四天中我碰到了二百人。他们全都背着装有衣服、被褥和书籍的背包。在西安(陕西省省会),有人告诉我:每周有七百人到这里,然后步行去延安。到西安来的青年,可从当局领到三角钱的伙食费。在这些求知者中间,可以碰到成年人和一些未满十八岁的年轻孩子。

“是什么吸引他们去陕西呢?许多人来自满洲和其他沦陷区,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父母被枪杀,房屋被毁坏。他们是为了向敌人复仇而来学习的。他们全都抱着一个愿望:‘为国雪耻’。

“陕西各大学的生活条件相当差,例如陕北大学——培养政治组织者的学校就是如此。学生们生活在自己挖的小窑洞里。无论是宿舍或教室都没有桌椅板凳。学生们全都在大街上、林边草地上吃饭,坐在自己从树林里弄来的圆木或木墩上听课。他们自己去河边洗衣服。他们按十人编组。组长维持纪律,主持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等等。该校女学员占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强。她们的穿戴和男人一样,在同样条件下生活。训练班每期三个月,学习四门课程:社会学、游击战术、中国问题和军事科学。延安的教科书是用改良胶质板胶印器印刷的。这里的设备较差,但拥有足够的书籍和杂志。学生在学校里有很多时间用于自学。

“已有七千名大学生从这所大学的学习班毕业。青年毕业后,有很多工作要做。大部分人返回家乡,去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等等。还有很多学生被派到日本人后方的农村去,为的是在敌占区人民中开展工作。最优秀的学生留在延安,继续在‘抗日大学’深造。

“某些外国人瞧不起这些大学,这是不对的。我听过一次关于‘战略撤退’的讲课,应该说,课备得好极了,讲课中还运用了大量

例子进行充分论证。我注意到,学生们几乎把讲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学生们的顽强精神,非常令人惊讶。他们竟然能在炽烈的阳光下连坐三小时,聆听讲课人作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报告。学生们向讲课人提出的问题表明,他们对国际形势是很了解的。

“‘抗日大学’也在培养八路军的指挥员。抗大百分之八十的毕业生被派往前线。这所学校的纪律比较严格,该校大部分时间用于军事科目学习。学校开设的课程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中国经济、哲学、中国建设问题和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给学生讲授的军事知识是多方面的。学生们要学习进攻和作战的技术、游击战以及工兵作业等。大家都非常重视野外实战演习。其中许多人大学毕业后还要在军事学院继续深造,而大部分将被派往前线。”

记者接着指出,延安正在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北平、上海沦陷以后,进步知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移居延安。这里还开办了一所艺术学院。

记者又写道,“凡和我交谈的工人和农民都对八路军战士给以高度的评价。这里的人们总是说:‘我们的八路军,我们的政府。’”

农村也办起了图书馆、阅览室,建立了免费医疗点。人们常在教堂里组织集会和演出。但是对举行宗教仪式没有任何限制。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在中国游击队员中间

(1938年8月7日)

美国新闻记者霍尔多尔·亨松在华北日军后方作战的游击队中间度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亚洲》双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叙述了自己的印象。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录。

他站在北平车站上的一群农民当中。这个高高的、瘦弱的中国人，满头蓬松的乱发，一双黯然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我向即将动身的朋友说，游击队是未来中国的保证。我们谈论着一篇有关日军后方铁路线遭到突然袭击的报导。但是，看来谁也没有得到关于游击队组织的任何具体资料。

火车开动时，最初使我感到可疑的那个中国人走到我身旁，并自我介绍他是教授。他问我，为什么你对中国游击队员感兴趣。我向他解释说，美国报纸希望得到这方面的报导……

他一连五个小时给我讲述了一些情况，那是任何一个美国记者在没有经过有关方面审查前都不能发表的。他谈到，在离北平五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原文如此——编者注）。这个国家的政府，有一支五十万人的自卫军和一支几乎每夜都在袭击铁路的机动部队。在三个月中，这支部队已经消灭了十六支日本驻防军。这个国家有兵工厂、广播电台、电话局、医院和剧院，还出版报纸。这一切都是在四个月内，在没有资金，没有

任何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我决定到那里去。我们和“王教授”一块向南走。我们从北平乘火车往南走了一百五十英里后,就改骑自行车,通过了狭窄的“不属任何人管辖”的地段(有3—15英里宽),这是中国人留给日本人的。尽管日本人和日本驻军只住在有铁路线的城市中,但我们仍处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

王教授指着一片树林说,这就是您感兴趣的一个边境村庄。

我看见四个外貌使我失望的武装哨兵,其中两个穿着不完整的军装,另两个像是地方军阀属下的普通中国士兵。他们开始懒洋洋地询问我们。当王教授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后,他们立即微笑起来。

我想,如果这就是游击队员,那我们就算是白来了。

但情况逐渐有所变化。儿童团唱着打倒“日本强盗”的歌。十二名年轻小伙子在军官的带领下学习机枪射击。各村的农民都在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在路上操练列队,在田野里训练。整个地区,处处都是游击队员。

在一个被城墙围住的城市里,驻扎着一个游击队骑兵团。他们配了几匹马给我们,并派出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小分队护送我们到五十英里以外的县城去。

我给游击队员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一堆战利品拍了几张照。

当我们到达首府时,两万名身穿军装的游击队员热烈高呼欢迎我们。我们从长长的排成四路纵队的战士列队前通过。和蔼可亲的年轻人看着我。全体游击队员的袖子都佩着“人民自卫军”的袖章。

游击队司令部设立在邮局大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墙上挂着各种地图,图上用大头针标着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兵力的准确分布。我们走进房间时,一位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揉皱了的军大衣的人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刚刚得到的消息,正在挪动地图上的大头

针。我被介绍给他。这就是冀中游击队总司令吕正操同志。

这位中国指挥员给了我这个见惯趾高气扬的日本将军的人以非常安详和自信的印象。吕正操现年三十五岁，出生在满洲一个穷苦农民的家庭。小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张作霖的部队，随后考进东北军事学院。在五年的时间里，直到日本侵略满洲时，他一直在军队里从事政治工作，后来成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的领袖（1931—1935年）。他的游击战知识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

吕正操司令部的政治顾问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他是一个狂热的勇士，很有口才。1931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学校开除，此后，他在满洲游击队中担任了五军政委。

几个军官领我走进郊外村庄的游击队营房，那是一片校舍，在室内地板上铺着席子，游击队员们晚上就并排睡在席子上。一个房间住六十四人。游击队员们每天出动两次。他们吃的东西与军官一样，都是玉米和蔬菜。唯一的美味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干鱼。我与一个队员进行了交谈。他今年十九岁，生长在附近的农村里，念过四年小学。他的全部财产只有牙刷、碗和一只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手表。当我表示想看看他的手表时，一些游击队员把我团团围住，都向我出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自来水笔和手表。

军官们向我解释说，这些东西是我们允许游击队员们私人保存的。其他一切物品他们都上缴司令部。

这里有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人的兵工厂，它生产弹药、手榴弹、刺刀、剑和迫击炮。机器是用废旧织布机上卸下来的柴油机马达带动的。这是零星分布在本地区的十二个兵工厂中最大的一个。我还看过一个军服厂，有五十二名缝纫工，六十台缝纫机，每天生产一千一百件军大衣。棉衣也同样在本地区生产。

我到过与十个游击队的战地指挥所保持着联系的广播电台。我还到过电话站，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它管理着长达两千英

里的电话线。我去过停有五十三辆货车和三辆属于司令部的小汽车的停车场,其中很多汽车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我参观了一个有三名医生和二十名护士的医疗所。这里的印刷厂印刷一份半月刊杂志和一张发行量为二千五百份的日报。全区共出版十七种日报。

三个军官正在研究铺在战地指挥所入口处前面地上的一张地图,其中两个是营长,一个是政委。虽说他们的平均年龄才二十岁,但他们已经消灭了六百多个日本人,并在自己的家乡(锦州)领导了九次进攻。

我请政委讲讲他们是怎样组织进攻的。

政委说,一般我们是利用夜间在铁路周围作战。我们团所有的战士都生在锦州,长在锦州,他们对锦州城墙上的每一块砖头都很熟悉。这种与地方的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成功的原因。

政委讲述了如何使游击队事先了解城里日军人数及驻防情况的侦察方法。这是对日军进行突然袭击的保证。

政委又说,我们的行动是很隐蔽的,因而损失不大。我们经常攻击日军哨所,冲进沉睡的市区,把那些还在做梦的日本人通通消灭掉。这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我们必须消灭他们。然后,我们的侦察兵就告诉我们日军的军火和粮食储藏的地方。我们立即将这些战利品运回我们的司令部。最后,我们袭击为日本新政府效劳的汉奸,把他们抓起来,并将其全部财产运回我们的基地。第二天早晨,我们便公审汉奸。

我询问了有关游击队员的损失情况。

政委说,我们力求自己的损失大大地低于日军的损失,不超过十与一之比。在一个铁路小站上,当消灭了三十名日本兵时,我们自己的伤亡人数不到三人。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只在我们认为有把握获胜的时候才发动进攻。但我们有时也会错误地估计

形势。二月份在博野附近的战斗中,我方损失十七人,总共才消灭六十个日本人。首长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日本人采取的报复手段就是把边区的村庄烧光。

刘清照对我说,这种政策只能导致日本人的灭亡。每当日本人烧毁一些村庄时,农民们便奔向我们。我们给他们土地、粮食,并将他们培养成游击队员。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成为最勇敢的战士。

在二万二千人的农民群众集会上,我看见他们手握古老的武器:火枪,旧式手枪、剑、长矛。他们都是人民自卫队队员。这是民兵队,其任务是保卫本地区免遭日军进犯。群众反对日军的呼喊声,大概在距这儿最近的约有十英里远的日本军营中也能听见。老年人高兴地微笑着重复呼喊口号,而青年人则极其热情地高呼“打倒日本强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政府万岁!”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的持久战口号意味着什么

(1938年9月5日)

陈 林

持久战这个口号已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主要口号。一切爱国者、抗日政党和军队都在宣传这个口号。

为什么中国对日本侵略者不采取速决战而实行持久战的战略呢？

日本是一个用现代军事技术武装起来、拥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准备侵略战争。但同时，日本在扩张其领土的道路上也遇到不少困难：日本军队的实力是有限的；它的财源枯竭；其重工业也不能满足因战争而日益增长的需要。日本的内部矛盾及其与其他列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正因为如此，日本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征服中国，以便把中国的人力、物力用来准备世界战争。这是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企图在中国采取速决战的原因。持久战对日本是不利的，也是危险的。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它的军队缺乏现代军事技术装备。长期以来，中国由于多年的内战而四分五裂。因此，中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把日本强盗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中国在技术落后，缺乏重炮、坦克和空军的条件下，不能过早地与敌人决战。因为这种决战注定会给中国带来不可避免的失败和人员的巨大损失。

中国司令部现在应当尽量避免与敌人的优势兵力过早决战。

中国军队英勇地保卫着重要的战略据点，同时避免用过多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去保卫个别的城市和地区。

尽管中国在军事方面远远落后于敌人，但是它在许多方面都比敌人强。中国在领土和人口数量方面都比日本多得多，中国的自然资源远远超过日本。日本的人口总数为七千万人，而中国却有四亿五千万人左右。日本领土面积为六十八万平方公里，而中国的领土面积为九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正是这些条件促使中国采取持久战的战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谈话时说：“必须考虑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异。日本在军事方面是强大的。但它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国。缺少足以吞并中国的兵力。它发动侵略战争，这必将引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之间，日本和各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军事和经济落后的弱国，但中国是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这个国家进行的是进步的战争，所以它得到整个民主世界的支持。”

由于敌人被卷入了一场持久的战争，中国将消耗敌人的人力和物力。中国可以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积蓄和加强自己的力量，抗击侵略者，夺取最后的胜利。持久战是中国武装抗日唯一正确的战略。

日本侵略者妄想以十五个师团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占领中国的荒谬计划，已遭到彻底破产。日本被迫卷入了长期的、持久的战争。

应该估计到，尽管日本军队在技术方面占优势，但其兵力有限；而中国军队虽然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但军队的人数众多。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抗击敌人，能得到全体同胞奋不顾身的帮助。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军队就有可能选择时机对日军实行各个击破，并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兵力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抗击敌人，包围和消灭敌人。

中国的防御战是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正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正规部队,而且还取决于在抗日斗争中直接参战的武装人民。这里战场是如此辽阔,交通如此不便,地形如此复杂(到处都是高山大河)——所有这一切,在开展军事行动方面都赋予游击战争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广大的敌占区,游击队的活动同正规部队的活动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日本兵力的不足,妨碍它在日军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人民掌握了大量武器,这就有利于人民大众建立强大的武装队伍,建立广阔的斗争基地,建立半正规军队。在同敌人的顽强斗争中,还培养和锻炼出很多坚强而富有战斗力的游击队,例如在满洲和晋察冀边区活动的游击队。此外中国人民还在敌后建立了独特的战线。因此,日本侵略者不仅不能利用它所侵占领土的资源,而且还被迫在自己后方投入大量兵力去同游击队作战。

游击队的活动不仅在战术上而且在战略上也与正规部队的活动相配合。它使许多地区的日军进退维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才在晋南陷入困境。

中国由于本身的弱点和仓促应战,在战争初期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侵略者暂时占领了中国的沿海一带和一些最重要的铁路线及大城市。但是,失去这些领土和大的中心城市并不决定战争的最后结局,在持久战的过程中必将改变力量的对比。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将逐渐壮大,而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将一天天削弱。

一小撮法西斯军阀和大资产阶级所实行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这种政策是得不到日本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战争越是拖下去,日本的军事开支就越大,日本政府就要变本加厉地增税。持久战必将给日本带来经济上的崩溃和财政上的破产。日本人民的生活条件在日益恶化,国内的反战情绪也在日益增长。

相反，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经受住了日本军阀的暴力，为了争取自己民族的生存，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牺牲，中国人民将坚决斗争到底，直到战胜侵略者，取得彻底的胜利。中国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抗日力量正在不断增长。

中国士兵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全世界感到惊讶。中国军队在武装抗日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斗素质，完善自己的战略战术，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在建立军事工业的条件下，中国定能提升自己部队的军事技术。西班牙人民英勇斗争的经验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日本舰队对中国沿海一带的封锁，外国商品进口的减少，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正确的财政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政府能够保证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家收入的增长。

日本的侵略给美、英、法在远东的利益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这就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孤立。日本的盟国——德国和意大利正忙于进行冒险而自顾不暇，不可能给日本以巨大的物质援助。

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它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抗越坚决，它从国外得到的支援就越多。

整个形势表明，中国在持久战中拥有许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利条件。只要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一贯地、坚定地采取武装抗日的政策，那末，中国的武装力量一定会得到加强和增长。

随着日本侵略者力量的衰竭和削弱，它的困难将会增大。应当估计到，在战争的下一个阶段，前线的局势将具有相持的性质，即日本军队无力向中国内地推进。中国将利用这一时期建立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新的强大军队，将建立能以必要的装备——重炮、坦克、飞机来加强部队的强大的军事工业。同时中国还将在敌

后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更大地削弱和消耗日本的力量。中国通过这些办法积蓄力量,就可以从前线的相持状态转入大规模的反攻,把日本侵略者彻底驱逐出去。

日本侵略者非常害怕中国把各种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战争。因此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极力破坏中周内部的团结。日本间谍从来就没有打瞌睡。在中国,有众所周知的失败主义者,他们对胜利没有信心,对武装反抗感到悲观,一遇困难就发生动摇。这些人对中国人民是最危险的。卑鄙的托洛茨基分子按照日本谍报机关的指使,也力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号召书中着重指出,在进行武装反抗的现阶段,最困难的因素不是军队和装备的不足,不是财政上的困难,也不是日本强盗继续向中国内地的进攻,而是日本侵略者除了武装侵略外,还企图使“中国人打中国人”,而特务、叛徒、托洛茨基分子也在破坏我国各民族力量的团结,特别是当我国各民族力量的团结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时候,其危害性更是不容忽视。

巩固和加强中国各民族力量的团结,清除国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民族叛徒,排斥和孤立亲日分子,克服失败主义情绪——所有这些,便是保证各民族力量增长的条件。通过上述办法,中国就能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去夺取彻底的胜利。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

(1938年11月22日)

M. 季霍米罗夫

去年11月，上海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将军宣称，他是上海的“绝对主宰”。但是，说了这个大话之后不到一个月，松井石根的傀儡“市长”苏锡文就感到很难领导浦东地区（上海附近），并宣布他的机关无事可干。这位失业“市长”的惊惶失措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只能作出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戴着“市长”的乌纱帽自取灭亡，要么抛弃“锦绣前程”销声匿迹地生活下去。当时中国的游击队的确使傀儡政府坐卧不安了。

日本统治华北一年之后，似乎“应该有一个安定的局面了”。但是实际情况却使侵略者大为扫兴。在日本人的后方，游击运动具有了争取民族独立的真正人民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志愿地去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搏斗。在晋察冀边区，一支拥有几十万战士的中国武装游击队正在同日军作战。在这些英勇的战斗中，游击队每天消灭几百名日军，颠覆日本的军用列车，收复了一个又一个城市。

在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形地带，由上海地区游击队小组组成的新四军，现在独立领导着一支庞大的中国游击队的活动。注视着游击运动的《纽约时报》报道：“巨大的中国武装力量正在日本人称为‘占领区’的地方作战。在多数情况下，日本人能控制的地方实际上只是铁路、河流和运河两旁，约四英里宽的一个狭长地带。”

不难看出,由于广东部队总司令余汉谋将军的叛卖而导致的广州失守,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战略上的重大损失。然而,就是在攻占武汉之后,日本人也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日本人在武汉的伤亡达三十万人。日本侵略者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指向武汉之后,认为这将是最后的一次打击,正如日本《时事周刊》所说的那样,这次打击将导致“中国的灭亡”。

但是,侵略者迎来的不是中国的投降,而是中国人民更大的民族爱国热潮和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决心。侵略者在进攻华南时曾指望得到精神上的效果,但并没有实现。

现在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听到,由于“事件”的长期拖延下去而引起的日本政治家们的种种怨言。日本《时事周刊》写道:“为了维持占领武汉以后继续拖延下去的军事行动,军事预算将要求追加军费拨款。”1939—1940年日本的预算将为四十五亿日元,其中新的军事支出需要十八亿日元。这些巨额的战争支出,并没有使日本实现其在中国战场的“胜利”。

某些资产阶级军事观察家也承认中国的游击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绝不能认为这些观察家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实际上日本军阀已经看到,在自己的后方,在游击队运动有着无穷无尽的后备力量的条件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征服将导致什么结果。

日本人力图以残暴的恐怖手段来镇压游击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今年10月日本司令部把两千日本兵和六架飞机调到新四军和游击队活动的浦东区。讨伐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并放火烧毁抗日运动同情者的两千幢房屋。为了反击日军的兽行,游击队立即袭击了日本人的机场。在杭州地区同游击队的战斗中,日军被打死打伤五百人,还有二十二辆坦克和几辆装甲车被击毁,浦东的傀儡政府动员了四百名中国人去同游击队作战,被动员的人在击毙日本军官以后,纷纷参加了游击队。现在,江苏省有二十个县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八路军所组织的晋察冀边区人民的抗日运动。这个地区目前已经成为不断地打击日本后方的重要军事经济基地。边区政府保卫着一千多万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几个月以前,军事学院有四百五十名指挥人员毕业,目前还有七百名学员继续在军事学院学习。边区还出版了印数为一万份的《抗日报》。在日本占领时关闭的学校现已开学。居民中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文化教育活动。

边区的军事实力日益增强。近两个月来,仅在五台山区(山西省东北部),中国军队和游击队一起曾向日本人发起一百多次进攻。在这些战斗中,侵略者被打死八千人,受伤一万人。

中国游击运动的奠基者,善于把正规部队的军事行动和游击运动结合起来的八路军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它是正确的。前不久,一支两千人的日本部队也未能经受住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日本人被迫退却,结果八路军和游击队解放了阜平。这件事充分显示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坚强团结。11月15日,中国飞行员用降落伞把新的军用物资投给了在江西北部活动的游击队。这也体现了一种高度的英雄主义。

广州和汉口失守以后,日本军阀指望中国军队的士气一蹶不振。但是,中国司令部却迅速地改组了防线,从而使日本人处于不利的地位。正如《每日快报》所说:“日本人将被迫在最坏的条件下作战”。日本人将第一次在既没有水路又没有铁路交通的情况下行动。由于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在实现领土完整这个首要原则之前,决不轻言和平。”这样,日本对“停战”所抱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中国政府所依靠的是人民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决心,因此它完全能够得到游击队这一久经考验的后备力量的支援,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军队。众所周知,游击队在八路军的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八路军在一年半的作战中共消灭日军三万四千人,俘虏

一千零九十四人,缴获步枪、轻机枪和重机枪六千九百五十四支,野战炮九十七门,击毁敌机二十四架、坦克十辆,还缴获一百九十辆汽车,击毁九百辆卡车。

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这一重要因素,丝毫没有降低中国正规军的作用。

不能不同意著名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对中国游击运动的评价。前不久这家报纸写道:“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汹涌澎湃的海洋,而日本占领区在这个海洋中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小岛。”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1938 年

1938 年 2 月 17 日

我和曼努伊尔斯基被叫去见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1) 西班牙共产党人必须退出政府。他们有两个次要职位。

他们如果退出政府，佛朗哥阵营会进一步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善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处境。

退出不应该是示威性的，不要被看做是对政府不满，而是为了使政府更容易执行任务。

理由是因为工团主义者不参加政府，共产党人认为参加是不适宜的。

(2) 支持政府，但是不参加政府——这必须是我们在当前阶段的立场。在法国也是这样。

(3) 中国。

两个方案：

(1) 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

(2) 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联合会不要加入共产国际。

援助中国共产党 50 万美元。

.....

1938 年 8 月 28 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与各国党代表举行会议。

路易斯报告。

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国际运动(食品及其他)。

任命运动推行委员会(主席多列士,书记路易斯)。

1938年9月7日

安德烈耶夫—贝洛夫。

贝洛夫——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康德拉坚科——临时代理第二副部长。

贝洛夫——地下党和第一组。

康德拉坚科——合法党。

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库西宁。

季米特洛夫缺席期间：

(1)照管干部部和中国问题——莫斯克文。

(2)编辑出版部——曼努伊尔斯基。

(还有——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荷兰)

三人小组召集人——曼努伊尔斯基。

1938年9月11日

修改关于中国青年问题的决议(沃尔弗)。

……

1938年9月22日

致莫斯克文的电报：“邓发来电说有几位得到许可来莫斯科治疗和学习的同志在兰州等待出发已经五个月了。请指示派飞机去兰州接这些同志。”

致莫斯克文、库西宁的电报：“推荐契尔文科夫关于九月起义的文章在本期刊登,托多罗夫的文章留待下期。”

致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库西宁的电报：“我在这里很难判断,但是我觉得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运动拒绝投降,军队坚决抵抗德国的侵略进攻,这一事实将对法国和英国大有作用,将会在这些国家展开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压力下,英

法的出卖计划将会破产。无论如何没有比不战而降更坏的事了。”

1938年9月28日

莫斯科文的来电：“布劳德同志通知，正在准备向西班牙运送食品。多列士从巴黎派来的同志说，法国大多数居民都有反希特勒情绪，被动员的人出发时高唱共产国际歌曲。法共中央已经制定并正在执行关于替代中央和地方被动员入伍同志的具体计划。加香和多列士在就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和援助西班牙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的可能性方面，曾向德勃鲁克作过试探，结果是否定的。1938年10月6日多列士将召集我们组的书记讨论总的形势。布劳德也将到会。马努伊尔斯基将告诉你详细情况。”

致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的电报：“很需要在国际报刊上有代表波兰工人阶级反对波兰法西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挑衅性的恶毒政策的某种发言。在当前形势下，这种发言也可以对共产党人、对波兰的工农运动起到政治风向标的作用。”

致莫斯科文、库西宁的电报：“野坂交了报告没有？对日本采取了什么措施？是否有必要由日本共产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共同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声明？广泛发表这种声明会有助于国际运动，会对日本国内的群众产生一定的影响。”

1938年9月29日

莫斯科文的来电：“根据政府关于撤出国际纵队人士的决定已经按照西共中央和马尔蒂的要求制定了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方面的工作：后撤的组织和技术准备、后撤的顺序等。考虑到愿意留在国内、接受国籍和在个别情况下根据自愿原则留下某些专家的可能性。计划授予每位战士争取西班牙独立奖章，在个别情况下经特别推荐授予自由勋章。马尔蒂负责后撤的领导。最后的决定和变更将另行通知。”

致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的电报：“你们是否得到斯大林或政治局的同志们关于我们在目前形势下的工作的某些建议、指示、意见？我希望你们把我们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报告给斯大林。”

1938年9月30日

莫斯克文的来电：“野坂的报告近日将给你送去。日共和中共代表的共同声明等中共代表休假回来即开始准备。现在冈野除了管国内的事情外还将翻译联共(布)党史。关于他以后的工作，等你到达后我们再决定。”

致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库西宁的电报：“希望将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变为一个法、英、美、捷、德、奥、波、意、罗、南、比、荷、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尽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的严格保密的会议。会议的政治决议会后要广泛公布。除了讨论和决定以下实际问题(当然特殊问题在专门委员会上讨论)外，会议要作出我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论据充分的估价，并代表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向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劳动人民发出呼吁书，确定工人阶级的立场，并同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帮凶进行斗争，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中国以及世界和平，如果法西斯发动战争，则争取使用一切力量和手段最后消灭法西斯主义，铲除其根源，并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内无情镇压法西斯帮凶和同伙。我想，代表会议在表示支持迅速召开国际工人会议的同时，应该确定一个有威信的代表团同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政党和组织商谈关于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和组织协同行动以及参加国际工人会议的准备问题。

与此同时必须动员在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侨民，他们的组织和报刊转到反对法西斯战争煽动者、反对英法统治集团的出卖政策，特别是反对他们本国政府的法西斯侵略政策的方面来。”

1938年10月18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的电报：“在为了保证捷克斯洛伐

克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而采取一切可能手段的同时，仍然需要在认真研究世界形势后及时采取措施保存和进一步使用特别受到威胁的领导干部，甚至在适当时机不惜把它们中的某些人转移到国外。要把哥特瓦尔德作为人质交到反动派手中是完全要不得的。我们必须让有些人做国际工作，比如让阿佩尔特负责我们的出版工作。请你们具体研究并就此与哥特瓦尔德和捷共中央联系。”

致莫斯科文的电报：“我等待着关于与布劳德同志讨论后作出的决定的消息。”

莫斯科文的来电：

(1)你最好电告关于正在起草的号召书^①内容的具体指示，这将加快号召书的完成。

(2)根据收到的消息，某些企业家集团和军界的个别人士已经(或正在)以类似‘国会纵火’的方式向法共挑衅。对此党的领导已经获悉。

(3)案件清单将不得不在前秘书不参加的情况下开列，关于她的问题昨天已经有了适当的解决。

1938年10月19日

邓发(通过耿丁^②)1938年10月14日的来电：“飞行员训练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够独立飞行了。训练班将于11月5日结束。17名技师也在学习中取得了成绩。但是督办^③只有已经超过飞行期限并对高级飞行有危险的y-2型和P-5型飞机。请拨给我们三架供高速飞行、轰炸和歼击训练的飞机。”

1938年10月20日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庆祝俄国十月革命21周年的号召书。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远东地区联络员。

③ 指新疆的盛世才。

莫斯克文的来电：“有些国际纵队队员表示愿意去中国。艾尔科里和马尔蒂同志自己很犹豫，问我们对此的意见。”

致莫斯克文的电报：

(1)我认为只能作为例外同意某些特别合适的国际纵队队员去中国。你们最好就此问题与伏罗希洛夫同志商量一下。

(2)请与耿丁谈一下关于邓发 577 号电报的问题。最好能满足他对调拨教练机的请求。

(3)关于耿丁邮件的问题，很明显是出了误会。你应该先把它们打开看看，把内容告知曼努伊尔斯基，以便你们能立刻处理必要的问题，然后再给我转来。

(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4日)

郑 林

1937年7月,日本军阀挑起了芦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帝国主义便公开地发动了反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性战争。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人民和中央政府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为了把中国的解放战争引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反对“不抵抗主义”和“亡国论”。由中国红军所建立的八路军和后来成立的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这两支人民革命军队,作出了英勇的榜样,加强了人们对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

八路军在平型关的首次大战,以革命军队的辉煌胜利而宣告结束。平型关大战,粉碎了日军最精锐的第五师团,全歼日军一个旅团。平型关大捷,对于发展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具有历史的意义。它说明,八路军虽然是一支弱小的武装力量,但是它完全能够摧毁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平型关大捷,是对现有“恐日病”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说明,采取运动战的战术是完全可以粉碎已经武装到牙齿的日本精锐部队的。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还促使中国其它部队改变其军事战略战术,它说明,必须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结合起来进行。1938年4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便是直接运用八路军军事经验的硕果。

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竭尽全力武装中国人民和开

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提出了“变日军后方为第二战场”的口号。这个问题，战争初期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引起国民政府和中国其它军队的重视。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努力，才在敌后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在晋察冀边区，现已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强大的武装力量。游击队的英勇斗争，已经引起了国民政府、国民党和整个中国军队的注意。

游击队目前正活跃于日军后方，它的战士已达百万人左右。日本军阀现在所能控制的仅仅是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和铁路线上的重要据点。“沦陷区”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仍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手里。游击战阻止了日本军阀掠夺他们所占领的中国土地上的丰富资源。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革命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不仅在战士们中间，而且还在广大居民中间开展强大的政治工作。为了对战士进行政治工作，中国政府已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同志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付部长。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国民参政会中，共有七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坚决反对左倾“速胜论”和右倾“亡国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只有经过长期的战争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还指出，中国今后的斗争必将经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战略退却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早在去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就已经指出：“我们正处在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转变时期”。中国较之日本帝国主义有更多的优势，这些优势是：中国领土辽阔，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然资源，它有众多的人口，有全世界进步力量对它的同情。在进一步联合、动员各方面力量的条件下，中国可以从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并取得彻底胜利。

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这一估价，获得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拥

护。这对失败主义情绪，对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和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其它叛徒暗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也遭到过不少障碍。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经在华北提出过一个带挑拨性的口号。他们恶毒地叫嚷：“我们只打八路军，不打山西军”。显然这是在破坏中国军队的团结。托洛茨基派的叛徒们也从未放松过他们暗中进行的破坏活动。这些卖国贼散布对共产党的流言蜚语，诋毁共产党，其目的是破坏国共两党日益巩固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即国共合作之目的，不仅是为了反对日本的侵略，而且还要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

卑鄙龌龊的托洛茨基派强盗们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按照日本军阀的旨意，企图以“左”的词句来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需要聚集各民族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却说：“应当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所以说，他们是企图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托洛茨基分子还在暗中进行挑拨离间活动，企图在中国人民面前败坏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威望。他们在江西和福建收罗强盗队伍，称之为“红军”，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挑起武装冲突。在广西省，当中国军队开赴前线后，托洛茨基匪帮妄图组织反对广西政府的武装政变，其目的是削弱华南抗日后方。在作战地区，他们按照日本军阀规定的任务，建立了广泛的间谍网。

托洛茨基匪帮还妄图谋杀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组织反革命的武装暴动。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大支部之一。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大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她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杂志有十五种。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发行量超过五万份，

共产党的《解放》杂志的发行量超过四万份。除此以外,还出版有《群众》周刊和八路军政治部主办的《前线》周刊(发行量超过一万份)。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党现在正处在一个空前团结和空前统一的时期。”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关于给予 中国满洲游击队运动援助的命令

(1939年4月15日)

为了充分利用中国满洲的游击队运动和使它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允许第一、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游击队领导请求的情况下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方面的援助以及领导他们的工作,所援物资应是外国生产的或没有生产厂家标志的。

请从扣留的游击队员里派一些经过审查的人回满洲进行侦察活动并向游击队运动提供帮助。

只允许军事委员会插手有关游击队的工作。

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局长、滨海边疆局局长和赤塔局局长全力协助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其中包括审查和挑选从满洲方面过来的和被拘留的游击队员,把他们交给军事委员会以做侦察工作并把他们派回满洲。

上述军区各边防军首长要协助军事委员会把军事委员会组建的小组自由派回满洲,同时接收进入苏联合国界的游击队小组和部分通信员。

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局长格维希阿尼应把现正滞留于滨海边疆区曼佐夫卡车站的350名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审查的中国游击队员交给第一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局长尼基绍夫应把被扣留的中国游击队领导人赵尚志和戴宏彬交给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以

作上述目的之用。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苏联元帅 伏罗希洛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贝利亚^①

(录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① 该命令以第7770号密电于1939年4月16日发送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局长、滨海边疆局局长和赤塔局局长以及上述三个军区的边防军司令。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1940年

1940年1月2日

修改德国决议和匈牙利决议。

1940年1月3日

同弗雷特林(瑞典共产党)谈瑞典国内形势和党的活动。

1940年1月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

弗雷特林作报告谈瑞典情况。科佩茨基通报瑞典情况。

1940年1月7日

致函斯大林同志,谈德共的策略。

1940年1月11日

同格廖和匈牙利的同志们谈匈牙利和拉科西问题。

1940年1月12日

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夫妇来我家(沃尔科^①、列娜^②和孩子们在家)。

1940年1月1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① 沃尔科,季米特洛夫的姐夫。

② 列娜,季米特洛夫的姐姐。

1940年1月1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继续作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

1940年1月21日

中国委员会会议。

什切尔巴科夫夜晚在大剧院作报告。

在政治局办公室内。

气氛友好。

在场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安德烈耶夫、贝利亚、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什基里亚托夫、什切尔巴科夫、马林科夫、布琼尼、季米特洛夫。

莫洛托夫(就德共策略问题文件发言)：“对，我注意到了。你们决心把德国方面发动的战争称为帝国主义战争。应该对德国党的策略交换意见。”

斯大林：“把世界革命说成是统一的行动——这是蠢话。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内进行。红军的行动也是世界革命事业。”

斯大林：“为使芬兰进行反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人们在如何做准备，这一点现已十分清楚。每个村庄都已为此目的而有所变化。建成了可容几千架飞机的机库，而芬兰只有几百架飞机。芬兰的舒茨科洛夫分子有15万人，这些是芬兰的白军。我们消灭了6万人，应该把剩下的人也消灭掉，那时事情就会告终。应该只留下小孩和老人。我们不想要芬兰的国土，不过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斯大林(祝酒)：“为红军战士干杯！红军过去未受过足够的训练、穿得很糟，我们现在已在给他们提供衣服鞋袜。红军正在为自己的名誉(在一定程度上已败坏的名誉)和光荣而战斗！”

(库利克来了，他通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斯大林：“您陷入了慌乱。我会把切尔帕诺夫所著关于心理学基础的书给您送去。希腊祭司们是聪明人。在他们听到令人忧虑的消息时，就去浴室，沐浴之后再对事件作出评价和决定。人通过自己的器官获得各种各样的印象和感觉——也获得各种各样的粪便。存在着抑制中枢(库利克身上的这一中枢很脆弱!)应该摒弃全部垃圾，在基本的事实基础上，而不是在瞬间的情绪和可怕的、子虚乌有的东西影响之下作出决定。”

斯大林：“马雅可夫斯基是最优秀的无产阶级诗人(我曾收到捷米扬和其他人反对这一看法的几封信)。”

斯大林询问了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还问了南斯拉夫人茨维特科维奇是何许人物。

关于土耳其问题斯大林说：“受损失的不会是我们，而是土耳其人。我们甚至为能够摆脱同土耳其的某些友好联系而感到满意。”

1940年1月24日

中国委员会会议。

1940年1月25日

中国委员会会议。

1940年1月27日

中国分委员会会议。

1940年1月2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编辑部问题、宣传问题。

向斯大林同志发信汇报中国问题。

1940年1月31日

中国分委员会会议(讨论干部问题)。

1940年2月1日

向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发信汇报中国问题。

1940年2月3日

中国分委员会会议(讨论干部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日本、印度、印度支那的联系。

同沃克申和斯泰拉谈话(南斯拉夫境内联络点问题)。

1940年2月22日

印度问题会议。

(迪亚斯、周恩来、任弼时、古利亚耶夫、莫尔德维诺夫、科兹洛夫等。)

科拉罗夫谈保加利亚问题。

1940年2月23日

向斯大林同志发了关于给中国共产党援助(35万美元)的信件。

1940年2月24日

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夫妇来我家。

1940年2月25日

继续召开印度问题会议。

和斯大林同志通话,斯称不能接见我去谈中国问题,因为他很忙。没有阅读送去材料。他说:“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

1940年2月26日

和中国同志开会研究联络问题。

同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谈关于中国青年问题的决议。

.....

1940年11月22日

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铁木辛哥处。

阐明了中国的战况以及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关系。

参谋部长梅列茨科夫和情报局长戈利科夫少将出席。

同从中国抵此的电影导演和作曲家谈制作有关中国的纪录片

问题。

布萨洛夫通知，拉科西化验时发现四个加号的潜血，正采取治疗措施。

1940年11月23日

起草了给毛泽东的复电。把草稿交给了斯大林。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二、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战争 正面战场的支援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蒋廷黻电

(1937年8月20日)

莫斯科，蒋大使勋鉴：沈德燮处长想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一百架，先聘俄飞行员二、三十人，即请其驾驶飞机到甘肃后，再飞回新疆驾机回甘，如此不过十余次即可运完也。其联络路决取道新疆，并请供署派若干武官在新疆购备多量汽油存储以便飞行、盛世才已复电赞成此事。中正。皓亥。机京。

(《战时外交》(二)^①，第465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电

(1937年8月21日^①急电)

现答复 18、19 日二电。

1. 请告知中国政府,经再次讨论后,我政府已决定同意中国的要求,并同意中国政府收到货物后延迟一年开始偿还向他提供的贷款,以便在后五年内每年偿还同样数额的借款。贷款总期限为接货后六年。

2. 签约币别应使用美元或英镑。

3. 对 8 月 17 日电文作出更改,请通知中国,我们只能向它提供 150—200 架飞机,不能再多。

4. 告诉他们,我们正据蒋介石的愿望讨论尽快通过甘肃向中国运送飞机的问题,如果通过肯定的决议,我们则希望中国方面同意我们的要求,立即向我们提供几百吨锡和锑,因为我们急需这些金属。

5. 事先告诉他们,作为我们提供的武器等价物,我们想得到相当贷款总额 3/4 的金属(锡、钨、锑、铍)和 1/4 的茶及其他中国货物,货物种类和数量应另签协定。最好立即得到中国政府能向我们提供的每种金属数量的资料。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提供相当于总贷款额 3/4 的金属,那么我们也愿意收受美元或英镑的外币以补齐欠缺的部分。

^① 全权代表团收电日期为 8 月 23 日。

互相提供的货物明细表,交货日期和送货方式的确定等等,以及条约的拟定与签定均应在莫斯科进行。

6. 事先发报告知王叔铭一行拟到达的日期,以便我们如期向哈密派出一架我国飞机。

(据档案刊印)

斯托莫尼亚科夫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电

(1937年8月22日急电)

现补充8月21日电报,再通知以下的内容:中国驻巴黎使馆为杨虎城和两名随从人员申请外交签证,说明杨将军是中国陆军部的代表,赴苏执行特殊使命。

由此可见,还在您同中国人达成协议之前,他们就已经从欧洲各地向我们派人接收将来才能买到的武器了。未经我们同意即派人,此事本身就是不能容许的。但最重要的乃在于从各地抽人组团派遣接收者前来的过程中会增加过早暴露的危险性。

同时,关于我们可能向中国运送武器的问题,看来一些大国也在讨论中,因为今天法国代办已来问询,苏联对于下一步向日本和中国出售武器的问题持何种态度。他说明,法国驻其他国家的代表也领受了相同的任务。

在您同蒋介石或他的亲信谈判时请坚决提出,泄露我们的谈判可能引出因受日本及其友国其中可能也包括英国的影响,说不定会出现类似对付西班牙的情况,即提出停止向日本和中国出售及运送武器的问题,要求他们对此事的进行严守秘密。

斯托莫尼亚科夫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7年8月27日,特急电报)

今天我同陈立夫就军事供货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1. 贷款总额——一亿中国元。

2. 用英镑结算。

3. 贷款应在货到后六年还清,但第一年中国政府不还债,债务分五年还清。

4. 供货细目内我们答允给予 200 架飞机和 200 辆坦克。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的明细表将同杨杰在莫斯科商定。

5. 我声明,我们坚持得到相当贷款额 3/4 的金属和相当于 1/4 的茶叶及其他日用品。中国政府答允近日内将自己的想法和每种金属它能提供的数量告知我们。

6. 详细条约在莫斯科签署。

7. 委员会主任杨杰及其副手我们已认识的张冲今晨飞往西安。代表团其他成员已经前往西安。中国政府要求派飞机赴乌鲁木齐接他们前来。整个代表团由 18 人组成。为避免拖宕,我已发给他们入境签证。代表团拟在 29 或 30 日抵乌鲁木齐。我认为代表团的人员是十分满意的。

关于从巴黎来的杨虎城将军,陈立夫不知详情。确实打算把从柏林来的沈氏纳人代表团之中,但是因为杨杰本人将来莫斯科,在他抵达之前不要给其他人签证,他是中国政府唯一的全权代表。

8. 近几日内陈立夫将回答我,他们何时能给我们多少吨锡和

梯(按您8月22日电报中所说)。不管怎样,我认为在公布条约之后,最好运50架飞机和我国飞行员教练(记在供货帐目之下)到甘肃去。这会使中国士气大振。

9. 陈立夫说,他对中国驻巴黎使馆人员不谨慎的行动感到愤怒,因为他本人懂得,事情的成败与保守秘密极有关系。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7年8月28日特急电报)

昨天我同蒋介石就国际政治的共同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他特别关心我国对其他大国在中日战争长期延续的情况下可能采取什么立场。当时只有他的夫人在场。这次会晤的主要意图,看来是他想向我们说明他对中日冲突的立场。他请我转达苏联政府,不管能否得到外国援助,即使抗战失败,他也要抗战到底。谈话中他几次说明,中日未曾进行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

1. 据他所知,我们不久前从美国得到了100架可当轰炸机用的高速飞机。他问,我们能否让给他一部分,用以顶替马上按定货提供的飞机。

2. 他能否指望,如果不是现在,那么稍晚些时候,苏联政府将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

同时,蒋介石要求尽快解决立即派遣部分我国飞机和飞行教员前往甘肃的问题。

昨天我还同白崇禧谈过话,他被任命为野战司令部主任。白崇禧阐述了他对中日冲突和国际局势的看法。他的观点是:1. 抗战到底,只有长期顽强抗战中国才能保持独立。对日无协商可言。2. 中国唯一可行的对外政策取向是那个法苏联盟。

白崇禧自己说,据他看,中国没有任何资料能说明可期望苏联干预中日战争。不过他希望在中日长期持久的战争后,苏联将起

到类似美国在上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所起的作用。白崇禧说,蒋介石已下决心抗战到底,没有别的路可走。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所有亲日派都将被撤离领导岗位。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 击落击毁敌机总计一览表

(1937年8月—1945年7月)

敌机在我境内损失总计一览表								
原因 年月	被我盟 空军击 落者	被我盟 空军炸 毁者	被我地 上高射 器击落者	被我陆 军袭击 毁损者	被我炮 兵击 毁者	敌机自 行迫 降者	被我击 落而行 踪不明 或受重 伤迫落 敌阵地者	总计
二十六年 八月至十 二月	91	43	40	54	10			238
二十七年	130	136	43	53	1	19	27	409
二十八年	33	71	31	14		21	7	177
二十九年	16	14	19	18	8	29	3	107
三十年	5		14	46	19	30	4	118
三十一年	118	38	3	8		20	6	213
三十二年	149	53	7			17	175	391
三十三年	254	169	5	2		23		453
三十四年 一月至七 月	12	1				29		42
合计	808	545	162	195	38	178	222	2148

附记

一、本表之数字均有可靠之证件为据。

二、敌机之损失如于本表制成后续有查明证实者于次月调制时改正之。

三、一月份迫降敌机中有三架系伪飞行员架来投诚者。

四、二十六年十二月即有盟国俄机参战，故在十二月以前敌机损失均属我军击落者。

五、本表根据参谋处第二科敌机在我境内损失总计一览表调制。

[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

[原编者注]此件选自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所拟之空军作战总计表中。

原件无年月日，文中年月是编者后加的。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军方五次商谈 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

(1937年9月9日—10月4日)

1. 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一次会议记录整理稿

1937年9月9日
第一次会议记录

地址：俄京西郊休养所“绿林”。

时间：二十六年九月九日廿一时十分至廿三时。

出席：中国：团长杨杰、副团长张冲。

苏联：炮兵委员拔也夫、空军委员拉宁。

列席：中国：团员 王叔铭。

苏联：处长 瓦西列也夫。^①

记求：团员 胡世杰。

拔也夫：今日杨将军会晤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元帅时，业将驾临敝国所拟商榷事项大致确定，元帅兹派余等前来询问贵方拟购兵器之品种、数量及其式样，请详述之。

杨团长：关于敝政府所拟购之兵器，已拟就书面目录，请张副团长诵述之。

张副团长：(诵述原件)关于此事，余在南京时曾与贵国驻华大

^① Васильев。

使鲍格莫洛夫氏商谈，彼曾允让售二百架飞机，但此数似嫌过少，余等以为最好能让售三百五十架，即重轰炸机一百架、轻轰炸机一百架、驱逐机一百五十架，以充实敝国最近之战斗力。

王团员：除飞机外，余等并拟聘请贵国教官、技师，计重轰炸教官十五员、轻轰炸教官十员、驱逐教官八员、飞行教官七员、技术人员三十员。

杨团长：关于飞机上之兵器、器械，如：机关枪及无线电等，请贵国装配完全。此外，飞机之零件及汽油、滑油等，亦请贵国供给。又：关于战车，余等拟购置八十二辆，共编成一营，其编制约如次：

营由四连编成，每连配备小炮战车九辆、机枪战车五辆、烟幕散放战车三辆，计十七辆。此种编制是否切合适用，因吾人对于战车部队尚少经验，并请贵方有以纠正。

张副团长：余等尚拟购重炮一百三十八门、载重汽车六辆、机踏车十八辆。

杨团长：重炮最好为十五公分左右之榴弹炮，其牵引须完全机械化。关于高射炮、探照灯及指挥仪等，俟参观后再决定数量。此外余等并拟购备防战车炮，未知其口径如何？

拉宁：敝国军队通常所用之防战车炮，其口径为四十五公厘，火力甚强，高射炮之口径有七十六公厘者。

张副团长：余等请购之飞机，务请悉数允拨，至于重炮等，则可依协定余款之多寡，而定其数量。

杨团长：上述各项，除飞机、战车及汽油外，均得于参观各式兵器后，依协定数目之余款再行确定。此外，对于战车及重炮之教练，请贵国派遣教官，前往协助，人数可依各兵器之数量酌定之。再：修理技术人员，亦请由此间派往，其人数亦请按机械数量代为筹定。

张副团长：中苏购货协定第六款规定以铍、钨等金属品及茶、植物油等货值作交换抵偿，唯蒋委员长有以敝国现值战时，交通诸

多不便，拟请减低金属品而增加茶叶及植物油之意旨，敬烦考虑。

拔也夫：贵方所提各项意见，当即转呈伏罗希洛夫元帅。惟须加声明者，为此次协定，纯为中苏两国亲善友好邦交之结果，敝国既非贩卖军火国家，亦无后备军火可随时出售，故贵国所提若干兵器式样中，若为敝国所未备者，当以他种兵器代替之。此外，敝国无后备军火之可售，而贵国现复需要孔急，故拟由敝国军队现行装备之兵器中抽出若干，转行让与贵国。此项兵器，日内当可开始参观。

杨团长：深谢贵国厚谊。关于参观各种兵器日程，即请规定示之为感。

张副团长：今日访问伏罗希洛夫元帅时，彼曾称可自即日起参观各种兵器并准余等团员开始练习兵器操别[作]及飞机驾驶等，此事当为贵委员之所深知。

杨团长：现因敝国战事紧急，需要飞机甚殷，故飞机须先设法运往敝国，其他兵器之运搬，可于研究路线及方法后，再行决定。

拉宁：飞机用何方法并由何路线运往贵国？

杨团长：飞机拟由阿拉马德(阿拉木图)经迪化、哈密、安西、肃州至兰州，贵国所派之教官，即在兰州教练，盖兰州飞机场已有相当完善之设备，且亦安全。由此路线输送重轰炸机，续航力甚大，当可不生问题。惟驱逐机续航力较弱，输送较为困难，今日访问伏罗西洛夫元帅时，彼曾谓由上乌金斯克经库伦至太原路线较为短缩，若此线畅通，则驱逐机之输送问题当可迎刃而解。至其他兵器，如：重炮、战车等之输送，则较困难，最好能由海道运至香港，然后由香港经广州送至中国内地。

拉宁：关于运输问题，殊值吾人研究，惟苏联仅能运至边境为止。

拔也夫：由黑海“奥底塞”至香港之海道，未知须航行若干日。

张副团长：约二十五天。此路线较为妥便，惟恐意大利将从中

阻碍耳。

王团员：现吾人仅随带飞行员八人，若以此人数输送购备之大量飞机，殊多困难，拟请贵国代为输送至兰州。查由阿拉马德至兰州，中途皆设有飞机场，飞行不至发生困难。

拉宁：余等对贵国将购置各式飞机之数量，虽尚未能作最后之确定，但若假定重轰炸机为五十架，驱逐机为一百架，则其另件及其他附属品之总重量约达三千吨，此三千吨重量之运输，殊为困难。

张委员：余等对此重量，将购备载重汽车，以为运输之用。

拉宁：一部分可用载重汽车由公路输送，其他部分，或可用轮船由海[路]输送。

拔也夫：今晚杨将军及诸位之意见，当即转呈伏罗希洛夫元帅。关于参观计划，日内亦当规定奉告。

2. 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二次会议记录

1937年9月14日

第二次会议记录

会谈地址：

时间：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四十分至十一时十五分钟

主席：杨次长。

出席：张委员冲、王主任叔铭及全体团员。

记录：胡世杰。

议事日程：检讨九月十三日试验各式兵器之结果。

主席：昨日参观并试验各式兵器后，各位当已有相当认识，今天谈话会即系为检讨昨日试验各式兵器之结果，并决定吾人是否购备。今日下午国防人民委员会即将派遣代表来此商定，故各位

应尽量将昨日试验兵器之观感及对此项兵器之态度，提供出来，俾作吾人之参考。

委员长曾来电，内谕国内需要飞机甚急，何日能起运，并询数目若干等情。于此，吾人对购备之飞机及其他兵器，应设法从早购定起运，此乃今次会谈之目的也。

夏全铎：昨日试验之高射炮，其机构尚完备。惟重量过高，于吾国公路桥梁，似有不合。此种高射炮之总重为十吨，与吾国现备之高射炮重量相等。但苏联高射炮系集中装置于一车上者，故其重量集中，通过吾国公路桥梁，恐有问题。吾国现备之高射炮，因牵车（重六吨）与炮（重三吨半）系分离者，故重心分散，桥梁易于驮载。然昨日试验之高射炮，可用于都市防空，盖都市道路及桥梁较优故也。至于此种高射炮之优点，计有二：（一）炮身灵便，转动迅速，射击方便。（二）该炮之发射机构系用交流电者，故发射时不至发生障碍。

主席：汝应决定此种高射炮是否适用？应否购买？

夏全铎：此炮可以购买，惟仅能之于都市防空。

张委员：若可以购买，则其数量若干？

夏全铎：何部长曾说购三十六尊。

主席：此种高射炮并非仅能用之于都市防空者，其主要用途乃在掩护部队行军、掩护战车前进，故该炮装置于特制载重汽车上，俾便加大运动性能。

张委员：吾国公路桥梁之载重若干吨？

主席：主要之公路桥梁，其载重量约五、六吨。

余人翰：据最近实验，吾国主要公路之桥梁，约可载重十吨。

夏徐敏：昨日试验之高射炮，按其性能判之，自可应用，惟其重量集中，吾国桥梁多未能抗载，故应加以考虑。昨日，在试验时，苏方代表曾说，尚有用牵车携带者，未知可否将此种高射炮设法参观。

主席：各位皆系专家，对昨日试观之高射炮，应决定是否需要？是否可用？

王叔铭：吾人对军事学识及经验均甚浅薄，各式兵器是否购买问题，请杨次长决定之。

主席：昨日试验之高射炮，命中率甚大，昨曾问之，彼方说此炮之运用及其效能，多以指挥者技术之精练程度为转移者，据称此炮之命中公算为四分之一，由此可知其优点矣。惟吾人为适应吾国之特殊道路条件计，对别种高射炮(即用牵车牵引者)应设法参观，然后再决定购买何种为宜。

张委员：今天吾人与苏联国防委员会代表晤谈时，可做如下措辞：昨日试验之高射炮暂时保留，履带装置之高射炮，请求再予参观试验。

主席：关于高射炮事，就如此决定，俟参观他种高射炮后，再做最后决定，现在吾人可检讨防战车炮问题。

余人翰：昨日试验之高射[防战车]炮，品质及性能均甚优好，于吾国环境亦甚适用，故拟请购买。此炮较德国制者为优，德制之口径为三七公厘，此炮口径为四五公厘，惟初速则较德制为低耳。

主席：此种防战车炮，系同类炮中之精良者，初速虽较低，但炮之优劣，并非以初速之大小为准。且初速过大者，易使炮膛受损，故初速较小者，不一定为其弱点。

张委员：此种防战车炮，其品质、性能既甚精良，则应购备若干？

主席：此炮用途甚广，不惟可用作攻击敌战车及装甲车之用，且亦可破坏敌机关枪及轻式工程等等。至应购备之数目，余以为须以吾国军队为转移，若每旅配备二尊，则共须购备二百尊，每尊配炮弹一千四百发(穿甲弹一千发，爆炸榴弹四百发)。各位对此数目有无异议？若无异议，即如此决定。现在检讨战车问题。

余人翰：昨日吾人参观之战车系属于中型者，此战车似系仿英

国所制者，该战车总重九吨半，武器为炮一、机枪二（一为高射者，一为平射者），时速为三十公里至三十五公里，与吾人所定之中型战车标准，皆相适合，拟请购备。

主席：此项战车，彼方已答应出售八十二辆，吾人先购此数，将来若有余款，再为设法购买。

〔以下为未加整理之记录稿。〕

余人翰：此八十二辆为基本作战用者，然其附属车辆共计须二百余辆。

杨：基本作战者为最重要，其附属车辆最好少买，至弹药车、工程车、指挥车等，则必须购买耳。战车炮之炮弹数一千四百，机枪弹数〔此处缺漏〕，配件照本身百分之三十。

战车之总数为八十二辆，指挥车、工修车及弹药车，如钱不够，则〔此处缺漏〕。

教官：射击三位，技师七位。

飞机：

王叔铭：昨日吾人所参观者，并非重轰，而是中型，此重型轰机较吾人所规定者较低，惟较轻者则优。此项飞机之速率，较吾人所预定者为高。此项中型轰炸机，吾人可购。

双叶驱机，其中有四架机枪、炸弹四枚（每枚十公斤——十五公斤），此其优点。惟其续航力太短。吾人亦可买之。

单叶驱机（红色者），此机上升至五千公尺高空，仅须四分钟，速度则较高（五百公里），惟其续航力太短（仅一小时半），此机吾人必须加以注意者，为增设补充油箱。

以上三式飞机均可采购。

为完成委员长之使命，吾人必须购买重轰机五十架。

此项飞机，须飞机师驾驶，吾国机师有限，而此项飞机如运回中国，恐有问题，须加速训练。

弹药：航空会规定为七九口径，此地所有者为七六·二，故子

弹须此地购买,若每架飞机每次任务为一千发,则总数为25000000发,其中须包涵若干燃烧弹、泄光弹。

关于发动机之寿命,如未经硬伤而损坏时,则须由苏方负赔偿责任。

炸弹须多买。

杨:炸弹总吨数,定造一万吨,其中重量及种类,则由王叔铭规定。其运输方法,则最好为由海道。

王叔铭:关于汽油问题,最好即时开始起运。此外,练习问题,须即开始练习,因其机构全系俄国制者,инструктор即指定。

汽油:每架驱机每次用二百公斤,则一百五十架,须有油量三万公斤。其汽油运输方法,最好须决定。

杨:汽油总量及子弹总量,须即规定后再来讨论。

王叔铭:子弹、汽油、炸弹,此地须运至哈密,然后由航空会设法。

3. 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三次会议记录整理稿

1937年9月14日,第三次会议记录

会议地址:

会议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晚十八时五十分至廿一时。

出席者:中国:参谋次长杨杰、中委张冲。

苏联:炮兵委员拔也夫、空军委员拉宁。

列席者:主任王叔铭。

记录:参谋胡世杰。

议事日程:

拉宁:余自接收王主任叔铭所提之案件后,发生若干问题,拟在此次会议中逐一提出,谋求解答。

第一个问题：自苏联国境经迪化至兰州各地之飞机场，其宽广如何？为便利飞机升降计，其宽广最好能在一平方公里（一千公尺宽广）左右。

杨次长：自苏境经迪化至兰州各地之飞机场，其面积均在一平方公里以上。

拉宁：若各地飞机场之面积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飞行自无问题。余尚有第二个问题：贵国飞机场所备汽油之品质若何？若系八十七号汽油，则此问题自可解决。不然，吾人即将遭遇极大困难。盖据专家声称：仅自阿拉马德至兰州，空中运输六吨重汽油，则担任运输此油之飞机，其所消耗之汽油，已约二十八吨〔二点八吨？一本书编者注〕。

王叔铭：我国飞机场所备之汽油，均为八十七号，此节可无顾虑。

杨次长：此次飞机由苏境起运，可否以塔城为起点，盖由塔城至迪化之距离较为短缩也。

拔也夫：由阿拉马德起飞，最为方便，该处飞机场面积较大，设备亦较为完备。

拉宁：贵方之意，由阿拉马德至迪化途中所需之汽油苏方供给，但不知滑油问题如何解决。若此项滑油亦须苏方供给，则不知所需者为植物滑油（蓖麻油等）抑矿质滑油，现苏联之矿质滑油种类中有“康司唐铁”（константи）牌，品质较高，且与世界最精之滑油相等。此外关于飞机附件问题，余对王主任叔铭提案中所述者，似有疑问。彼谓购备附件百分之十，但此百分数比未知系指何者而言，若系指与所购飞机数之比例，则所开各附件百分数之总和，却为百分之百，即飞机数与附件数相等。余欲求解释者，即此项附件之百分数，是否系对所购飞机之总值而言。

王叔铭：滑油亦须由苏方供给，请备用“康司唐铁”牌矿质滑油。余在提案所述之附件百分数，并非对飞机总值，而系按机数而

言者。

拉宁：然则附件之总值将与飞机之总值相等，盖贵提案中所述各项附件百分数之总和却为百分之百。

张委员：飞机附件之百分数系按照所购飞机之总值而言。

拉宁：王主任叔铭之提案中，关于预备发动机，螺旋桨及跑轮等，未曾提及，不知是否需要此项附件？

杨次长：发动机暂不需要，螺旋桨及跑轮须有后备附件，惟其价值亦包括于附件总值(飞机总值百分三十)以内。

拉宁：贵方是否需要弹药？现苏方所备飞机炸弹，计分十公斤、十五公斤、五十公斤、一百公斤及二百五十公斤等五种重量，И-15式飞机最好用十公斤爆炸榴弹。

王叔铭：昨日试验之轰炸机，载弹量为六百公斤，不知可否载五百公斤一个之炸弹？未知贵国采用此种重量之炸弹否？

拉宁：关于此式轰炸机是否可载五百公斤一个炸弹，余尚不知，就余所知者，此式轰炸机可载二百五十公斤炸弹若干枚。二百五十公斤之炸弹，威力已甚强大，实验时曾炸沉铁甲巡洋舰。

杨次长：余等拟购备飞机炸弹共六千吨，计分：十公斤及五十公斤者一千万、一百公斤者二千万、二百五十公斤者一千万、五百公斤者一千万。

王叔铭：机关枪子弹，共拟购备五千万发，计分：穿甲弹百分之三十、燃烧弹百分之二十、爆炸弹百分之二十、泄光弹百分之十、普通弹百分之二十。

拉宁：机关枪子弹，总数过大，且其中穿甲弹所占之百分数亦过多，故须请示伏罗希洛夫元帅后，再行决定。

王叔铭：若子弹数量过大，则可酌量减低为二千五百万发。惟须迅速解决，俾免拖延时日。

拉宁：贵方曾申请飞机起运日期，现规定如次：重轰机自明日起(十五日)至本月二十五日十日内起运一大队，计机三十一架。

此后每隔十日起运一大队。此外，教练机八架及 И-16 式驱逐机（即试验时之红色机）九十三架，在十月一日前起运完毕。其他飞机六十二架于十月二十五日前起运完毕。

杨次长：关于飞机起运日期，就照此决定。现在可讨论汽油与滑油问题。

拔也夫：汽油与滑油可托新疆省政府经新苏贸易公司〔俄文公司名称略〕购买，当无若何问题。

杨次长：汽油及滑油之运输，可否经伊犁河输新？此种运输方法，既可省费，复较便利，不知该河可通航否？

拔也夫：此河有一段可以通航，但其全程则不得而知。

拉宁：四五公厘防战车炮不知需要否？

杨次长：请先述价值若何？

拉宁：每门计价七千美金。

杨次长：每炮附炮弹若干？

拉宁：余尚不知，俟后再行奉告。此式防战车炮，贵方拟购若干门？

杨次长：余等拟购二百尊。

拔也夫：此式防战车炮与战车上装置之炮完全相同，不知将购备炮弹若干？

杨次长：关于此项炮弹之数量，请贵方专家代为计算后，再行决定。

拔也夫：战车未知购买若干辆。

杨次长：余等拟购八十二辆，外加指挥车、弹药车及修理车等。

拔也夫：修理车当可附加。

杨次长：战车附件亦为总值百分之十。

拔也夫：当照办。

杨次长：昨日余等所见之高射炮，机构与性能均甚佳，惟炮身与牵引车不可分离，全重量十吨完全集中于一点，于中国道路、桥

梁诸多未合,未知贵国另有牵引式之高射炮否?有则愿请一观。

拉宁:昨日参观之高射炮,系装置于载重汽车上者,故其重量集中。惟炮之重量,约二吨半左右。若此式不合,可用牵引式之高射炮。日后当请参观。

杨次长:照空灯及听音机请予参观,并请让售。

拔也夫:照空灯及听音机均有,当请将军参观。

杨次长:战车及防战车炮可否施行实弹射击,籍观功效?

拉宁:当将此意报告伏罗希洛夫元帅,再行决定。

杨次长:飞机师及战车之教练人员人数贵方有否决定?

拔也夫:因贵方所购各式兵器之数量尚未确定,故教练人员人数亦难规定。

杨次长:现在余等随员中航空官佐共有九员,可在此练习飞行?

拉宁:当照办。惟须派至其他都市之航空学校学习。

王叔铭:我方现拟练习航空者,计分:练习轰炸者六员,练习驱逐者二员,练习技术机械者一员。

拉宁:练习时间若干?

杨次长:练习时间为一星期,学习之对象为我方已购之飞机式样。此外,战车与高射炮亦请予练习机会。

拉宁:当照办。

杨次长:余等来贵国时,蒋委员长曾命购超重轰炸机,作为空袭日本内地之用,若此项超重轰炸机未能购成,则余等此次来苏任务即不能全部完成,务请贵方允拨。至于机数,并不求多,有五十架即够。若协定款项不够,则可减少其他兵器之购置,并可给付若干现金。

拔也夫:当将此意转呈伏罗希洛夫元帅。

杨次长:关于飞机起运日期,余等将即晚电呈蒋委员长。

拉宁:飞机起运日期可以转呈蒋委员长,吾人已派定民用航空

机于日内飞行迪化，视察机场，同时，CB式轰炸机一架亦将随往试航。

杨次长：关于教练人员之人数，现规定如下：

飞行教官：每十架一员。飞机修理技师：每队（九架至十五架）一组（每组若干人，由贵方决定之）。战车教官：由贵方决定之。高射炮教官：一员。

王叔铭：在И-15式驱逐机上可否另装一副油箱，俾增强其续航力。

拉宁：当咨询专家后再告。

张委员：关于中苏购货协定中所规定之偿价货物，请减低金属品，增加植物品数量。

拔也夫：此非吾军人商谈范围，但关于购货协定之细节副张，是否将在莫斯科签订？

张委员：可以在此签订。

拔也夫：吾人之工作商榷，已将终结，关于条约之签订，苏方当派专员负责。

张委员：关于此次所购各式兵器之条约，余等准备签订。

拔也夫：今天所谈商之各节及贵方关于购备超重轰炸机之声请，俟伏罗希洛夫元帅回莫斯科后，即为转陈。

4. 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四次会议记录整理稿

1937年9月17日，第四次会议记录

会议地址：

会议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廿时十五分至廿一时二十五分。

出席者：中国：参谋次长杨杰 中委张冲。

苏联：炮兵委员拔也夫、空军委员拉宁。

列席者：洛阳航校主任王叔铭。

记录：参谋胡世杰。

议事日程：

拔也夫：贵方于上次会议席上，曾坚请购备超重轰炸机，此事虽经余等转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元帅，然现尚无若何结果，俟确定后，当即奉告。关于飞机炸弹数量及种类，由拉宁君报告。

拉宁：(一)飞机炸弹及其种类，苏俄已允诺如次：

总重量：一千九百吨。内：八公斤者：三万七千五百个，共二百吨。十公斤者：一万个，共一百吨。二十公斤者：一万五千个，共三百吨。五十公斤者：六千个，共三百吨。一百公斤者：九千个，共九百吨。二百五十公斤者：六百个，共一百五十吨。五百公斤者：一百个，共五十吨。

(二)飞机机关枪子弹共一千五百万发。内：普通子弹一千万发，穿甲弹、泄光弹、燃烧弹五百万发。

(三)上述炸弹及子弹数量过少，自不足敷用。我方拟派制弹工程师五员，协助贵国制造此项弹药。

拔也夫：弹药重量极大，运输诸多不便，若制造上予以技术协助，则困难自能克服。闻贵国制弹设备尚称完备，此后自能在当地制造。

关于飞机附件，已规定为飞机总值百分之十，然苏联专家以为预备发动机仍属必要，其数约为机数百分之十，即二十三个。

杨次长：关于炸弹及机枪子弹数量及其种类，即照贵方原数确定。预备发动机，自属必要，贵方专家之意甚善。

拉宁：起运事宜之准备比较顺利，C—5 式轻轰炸机已有九架起运，约经八、九日后即可达阿拉马德，但装配工作尚须约十天。至于驱逐机之装配，仅需三、四天足矣。现装配技术人员已抵达阿

拉马德。又：侦察机场之两侦察机，即将经迪化赴兰州，盛督办^①方面交涉，业由苏方办妥，贺主席^②方面即烦电请协助，俾侦察机在由西安至兰州途中不发生困难。

张委员：已有电报请贺主席协助，绝无问题。

拉宁：请即电贺主席，并告以侦察机即可达兰州。该机为JI—5式，机上领空为最富有经验之人员，将来可作导飞者。此外，关于各货起运日期，伏罗希洛夫元帅已有命令，着令加速。然据专家称，余方准备之起运日期乃最迅速者，再行提早，恐于技术上不能办到。

拔也夫：由苏境起飞之重轰炸机，据苏联专家意见，须全副武装，并随带弹药。

关于飞机各附件起运之总吨量，共为七百五十吨，此外尚须加上预备发动机之重量。此项货物最好能用卡车输送，未知贵方意见如何？

杨次长：预备发动机可经新省输送，其余则可由海道运输。

拉宁：若用卡车经新省输送，则此七百五十吨重量需二百五十辆卡车方能循环运输完毕，但不知新省共有若干卡车？

杨次长：新省大约无此数，我方当设法筹足之。

拉宁：最好电约盛督办及贺主席，派新省卡车至阿拉马德，甘省卡车至新、甘边境接运。

杨次长：前次会议上规定之飞机起运日期，是否能按期实行？

拉宁：已规定之起运日期不至有何变更，但难于再行加速。

杨次长：蒋委员长曾电询关于飞机及其他兵器之教练人员人数，请从速规定，俾敌国可作招待等各种准备。

拉宁：关于教练及技术人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允诺如次：

① 指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

② 指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

(一)属于飞机者:(A)C—5 重轰炸机飞行教官九员,技师六员,仪器教官二员,无线电教官一员。(B)И—15 驱逐机飞行教官六员,技师六员,仪器及其他三员。(C)И—16 驱逐机飞行教官九员,技师九员,其他二员。(D)修理技术人员(每种飞机十员),共三十员。(E)制弹技师五员。(F)总工程师一员。共计八十九员。

杨次长:飞机教官及技术人员之数量即依贵方酌定者确定之。

今有请者,即务请设法将驱逐机之一部约五十架至六十架提早起飞到兰州,以应敌国急需。

拉宁:驱逐机原规定于十月二十五日前运送完毕,现当设法加速,但其可能与否,殊难确定。

拔也夫:由莫斯科起运之飞机虽可增加数量并提早日期,但在阿拉马德尚须装配,新省之汽油亦须运去,同时驱逐机不能单独飞行,凡此种种,均为妨碍加速起运之事实,请注意及之。

张委员:第一批轰炸机三十一架可单独飞行,第二批轰炸机三十一架,请随带驱逐机前去。

拉宁:第二批轰炸机三十一架将分三次起飞,每次当随带驱逐机十五架,三次共计四十五架。

杨次长:顷奉蒋委员长电,关于海运经法国属地运华事,已商请法国政府,不久后当将折冲结果奉告。

拔也夫:关于海运船只,当由苏俄设法筹备。至战车数量已允诺八十二辆,附件为战车总值百分之十,外加修理车五辆(二轻三重),每战车附炮弹一千五百发,共计炮弹十二万三千发。机关枪子弹每架四万五千发,共计三百六十九万发。

拉宁:战车教练及技术人员允诺如次:(一)教官十二员(射击与战术六员,驾驶六员)。

(二)修理技师五员。

拔也夫:关于高射炮,伏罗希洛夫元帅允诺五连,每连四门,共计二十门,附加照空灯、听音机及其他仪器全副,每炮附炮弹二千

发,共计四万发。教官、射击及技术人员共十二人。

防战车炮(四十五公厘口径)共允诺五十门,每门附炮弹一千五百发(穿甲弹及破片榴弹各半),共七万五千发,此项炮弹,伏罗希洛夫元帅希望贵国自己能大量制造。防战车炮之教练人员规定为三员。此外,关于翻译人员问题。请从速准备。

张委员:关于翻译人员,敝国已有准备,人数约二十人,若贵国有相当人员,请派委。

拔也夫:敝国亦有若干人可派去。关于战车、防战车炮及弹药等海运货物,在十日均可集中。目前问题全视贵国与法方交涉转运海口之结果如何为转移。

拉宁:贵国飞行员练习问题已解决,练习地址,即在前次试验飞机之机场,C-5、И-15及И-16各式飞机,该场均有准备,练习自可顺利进行。教官亦已派定,住宿等事亦已令准备。战车科两员,可在此地某学校练习,住宿则仍在现地,高射炮科两员,须至莫斯科约一百三十公里某地练习,时期由贵方决定,练习自十九日或二十日开始。

拔也夫:关于签订条约事,我认为无此必要,所有敝国已允诺各件,凡口头约定者均当实现。以后贵国收到之件,可开具种类数量,并规定价目。

杨次长:贵国所派之教官、技术人员是否将派一总负责者前往。

拉宁:敝所派之人员,概由苏联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雷平将军指挥。

杨次长:敝国飞行员是否可随乘起运飞机回国?

拔也夫:当加考虑。

杨次长:由迪化至兰州各地机场,敝国当已派员前去照料。

拔也夫:当转陈。

杨次长:关于超重轰炸机,蒋委员长极希望购备。我方拟轰炸

日本内地工业,务请再为转发呈伏罗希洛夫元帅为荷。

拔也夫:关于此问题已呈报伏罗希洛夫元帅,结果如何,不日当奉告。

杨次长:余等深知伏罗希洛夫元帅系学问渊博之大军学家,对于我国之抗日战斗及所以欲购买超重轰炸机之用意,当能深切谅解也。贵方所派之教官及技术工程人员,系敝政府聘请者,自当由敝政府给酬。惟其标准如何,请酌定示之。

拔也夫:关于此项问题,余等尚未计及。

5. 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第五次会议记录整理稿

1937年10月4日

会议地址:莫斯科绿林村。

会议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四日下午七时至八时

出席者:我方:杨次长杰、张委员冲。

苏方:拔也诺[拔也夫,下同。]、拉宁。

记录:胡世杰。

议事日程:续前。

拔也诺:此次会议席上余首先欲提出者为汽车输送队之行程问题,该输送队之行程长度约三千公里,故须随带修理车及大量汽油,方不致在中途发生停滞障碍。照原定计划,本规定由阿拉木图起程,每隔若干距离设站,车辆人员得在站加油、修理、休息。此法虽甚完善,但费时太久,约须一百四十七天方可抵达兰州。现为迅速计,决定增加输送车辆,共增为七百辆,由阿拉木图直接驶往兰州。因此,输送队之组织得相应改变(除修理车外,更得加带餐车及医药车),人员自亦须增多,约为一千五百人左右。现苏方已请盛督办派轻汽车二辆、卡车一辆,由迪化前进探路。请贵方转饬各地当局从速修理道路。

拉宁：请贵方速电请甘省贺主席，飭令各地当局协力修整道路。

杨次长：关于道路问题，已电贺主席，飭令沿途各地当局修整矣。

张委员：关于汽车收买问题，由新省我方代表与苏新贸易公司补订商约。

拉宁：关于三百五十辆卡车之收买问题，伏洛希罗夫元帅尚未最后决定。

拉宁：关于轰炸机起飞尚无问题。装配完成后，即可离苏飞华。而驱逐机在航线各站设备及油量未准备妥善之前，起飞殊成问题。

张委员：现在新省已贮汽油十吨。

拉宁：十吨为数太少。由阿城至兰州单就飞机用汽油一项已需四百吨之谱。

张委员：飞机迟飞原因纯由苏方迟疑所致。

拔也诺：飞机之所以迟飞，乃由中途各机场汽油及设备未臻完妥所致。

拉宁：据苏方侦察机飞新、甘侦察所得结果，谓前途各机场均尚未准备妥当，苏方对起飞事关心极切，且亦计较每分钟之宝贵时间，绝无任何延迟情形。事实上，二百余架战斗飞机作三千余公里之长途飞行，诚辟世界航空史之新纪录。然而，当中途各机场未准备妥善之前，此种大批战斗机长途飞行之举，乃属冒险行动，同时，即使冒险前飞，至中途机场时，亦将因燃料缺乏而停进，故苏方希望于最短期内能将各机场扩充至一公里见方，并贮相当数量汽油，俾飞机得以迅速起飞。

杨次长：关于航线各机场之汽油量，据上月廿六日前情况，大致如下：

A. 安西 八七号汽油 五〇〇〇加仑。

B. 凉州 七四号汽油 五〇〇〇加仑。

C. 甘州 七四号汽油 五〇〇〇加仑。

D. 肃州 七四号汽油 五〇〇〇加仑。

八〇号汽油 一五〇〇加仑。〇号汽油 一五〇〇加仑。

滑机油 一〇〇〇加仑。

除上述各机场已贮之汽油量外,上月廿六日后,又在继续输送。至现今各机场之汽油实数,尚不得而知,俟确查后尚[当]即奉告。

拔也诺:上述汽油苏方侦察机于侦察报告中并未提及。

拉宁:据余意见,飞机迟飞原因绝不在苏方,亦不在贵方,而在乎航线中各机场未能及时准备完妥所致。

拔也诺:关于海运轮船问题,约于三、四天后方能解决,以后当奉告。

拉宁:关于机关枪问题,现已在原则上解决。伏洛希罗夫元帅允让售一千挺,内“马克逊多格来夫”式(МАКСИМ—ТОКАРЕВА)五百挺,“祺克德来夫”(ДИКТЕРЕВА)五百挺,每挺附弹一万发。

杨次长:贵国机关枪口径与我国所用者不同,故子弹数量拟请增多。

拔也诺:我国每挺机枪所备子弹数目,亦约一万发,惟贵国机枪口径既稍不同,子弹数量,以后当(不)再行商榷。

杨次长:今接王叔铭由阿城来电,称该地机场长官不准彼入内检视。请多设法。

拔也诺:当即去电,令允王先生入内检视。

杨次长:我方在阿城飞机师何日可起飞返国?

拉宁:当可乘运输机返国。

拔也诺:关于让售教练机五十架事不能解决。现可让售者为Y—TNO1式教练机五架。

杨次长：关于教练机事，暂且如此解决。

拉宁：关于购货账单，现尚未最后结算，二天后当承上。以前所订各货价值，约为一万万元，以后所订购之机关枪一千挺及教练机五架，当已超过协定数目以上。

杨次长：货价问题俟账目总结后，再行酌商。

拉宁：汽车运输之货物，总重为二千四百吨，需车七百辆，而此大批车辆每次所运货物，仅约千吨左右（道路不好，汽车不能尽量运载），故最迅便之运输法莫过于海运。然海运在今日之情况下，危险极大，据闻贵方在法国订购之飞机，亦不敢贸然由安南输送之。

杨次长：法国已同意各货经法属安南输送。此外蒋委员长于本年七月间已派专员驻安南，负责办理过境军火运输事宜。

张委员：飞机起飞之日程，请确实规定之。

拔也诺：苏方决不延迟时间，此点贵方应为谅解，盖许多事项（如志愿兵等）贵方虽未提及，而苏联则自动提出商榷，此尤可证明苏方绝无延迟之意向。若航线所经各机场之设备及油量准备妥善，则飞机即可陆续起飞。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录自《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 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石电(摘要)

(1937年9月20日)

(1)号电奉悉,当即向苏洽商驱逐机应我急需,马日运十六架,其余偕轰炸机陆续运兰。

(2)巨型四发动机超重轰炸机一再交涉,已允拨六架,航力十六小时,可搭载四十武装兵,加聘高级教官、技师六员。

(3)海运物品由苏备轮运往海防,法方如何答复?乞示。莫斯科蒋大使。蒋委员长批示:复。莫斯科。蒋大使密转杨、张二君:号、戌电悉。法国尚无确切答复,待其复到即电告。中正。

(《战时外交》(二)^①,第468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 张冲致蒋介石电

(1937年10月3日)

……(一)孔部长复电租轮包运不能办,仍着俄方派轮运海防,现俄已允与法接洽换法国旗,即起运。因坦克车载运约十六吨,公路桥梁须先加强。(二)俄试航机由兰回称,各机场除兰州及甘州旧场仍须扩大外,其余均尚可用,惟甘省汽油及机油合用者甚少,希速备妥。新甘各站无修理设备及技师,路远机易损,为确实计,已派五机运技师带件先出发,因此各机尚停留阿城,职已催其尽可能速飞外,并电贺盛及在阿王叔铭就近督促。(三)飞机附件由俄方派车三百五十辆,连油与车夫负责运至哈密一部,冬日可抵阿城,全部运费,汽车夫薪以及将来购车各事希派专员或令交部到新专员与新苏贸易公司另商订一合同,因此项费用已在万万元之外。又哈密至凉州之路有数处不易行车,恳速派大批工人分段修理。(四)俄国特种飞行人员志愿参战一事,现伏氏决定派遣二百五十人,编成二大队,分别来华用白俄入籍之资格参战,飞行教官及技师不在此数,其待遇请与美德等外籍军官相同。对于食宿行统由我方负责,并叮咛希望务求丰美。(五)俄军部为研究日军战术与装备拟派便衣军官人员到战地观察,以为对日作战之准备,请予方便。(六)购买机枪万架已提出,待答复……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 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石电

(1937年10月27日)

……(一)志愿飞行员及技师现苏方减为二百三十三员,现已起程,又教官等亦已离莫来华。(二)由阿飞兰之机计轰炸机十五架、驱逐机二十架,今晨若气候许可,超重轰炸机六架亦将由阿起飞。双翼机在赶制中,约一个月可全部完工。(三)汽车已出发五百辆,现抵迪化附近,数日内将续发二百五十辆。(四)收买汽车千辆事,苏方允向伏元帅请示后答复,惟现已增拨一百辆,连前三百辆,共四百辆。(五)无线电通讯车,军用电话机,被复线交换机等,已向苏方交涉。(六)海运各物遵渝装两船,已电顾大使,约该船于十一月五日驶抵敖得萨装运。(七)苏方请预支华币五十万元,除已汇迪三十万元外,请再汇二十万元,交盛督办转古赤少校。(八)生锡一节已将南产北运困难情形向苏方婉述,惟彼称,苏联军需工业需锡甚殷,于将来对华续济军火关系尤切,拟恳设法采集,由轮运往南俄,可否?乞示。……二十六、十、二十八发。

此电连同本月灰电一并由阿城刘庚领兄妥寄来莫,原电系张委员起草,经次长杨修正译发后,张委员亲自取去,现再[将]抄件寄来。

二十六、十一月二十四[日]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 关于援华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37年11月11日)

斯大林同志:你们应该记住,只要中国没有军事工业,它就会一直动荡不定。谁想独立,谁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外国人出卖不好的武器,他们还可以完全拒绝出卖武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官提供给你们,这要比向外国人购买武器更便宜。

杨杰^①:这是对的。我们请求你们给予援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是要援助你们的。

杨杰:我们全国都寄希望于你们的援助。

斯大林同志:你们的航空事业怎么样?你们制造飞机吗?

杨杰:我们不能制造发动机,其余的我们都能制造。

斯大林同志:我们给你们发动机,要多少给多少。我们自己用木料造飞机,你们也可以制造……开创自己的飞机制造业吧,我们将给你们提供教官……如果中国想站立起来,就应该发展自己的空军和炮兵。

杨杰:请求援助我们。

斯大林同志:要记住,仅仅指望外援是不可靠的。需要发展自

^① 杨杰(1889—1949),又名漱石,字耿光,云南大理人。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的总参议,随军参加北伐。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长、军事委员会常委、陆军大学校长等职。1938年5月至1940年出任驻苏大使。1949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途经香港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己的工业。英国人指望中国同日本打仗,然而,英国既害怕日本胜利也害怕中国胜利。它希望中国和日本都被削弱。中国人无疑能够战胜日本人。……假如我是中国人,我将号召我的人民不止抵抗3个月而是抵抗3年。在这3年内我们都将支援你们。你们将有自己的飞行员,自己的大炮,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能战胜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石油生产。如果你们想成为独立的国家,你们就应该有飞机、大炮和石油。当你们打垮日本人后,将需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我以为,中国不应忽视任何援助,可以而且也应当向美国和德国购买飞机和机枪。盟友有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也要和不可靠的盟友,比方说英国打交道。仅仅从苏联获得援助是不对的。中国也需要从不坚定的盟友那里得到援助……

杨杰:伟大领袖斯大林所说的一切,我将转达给蒋介石,而且,如果我们濒临灭亡,我们将寄希望于苏联。

斯大林同志:不,这样伟大的国家是不会死亡的。

……

(录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蒋介石关于请求苏联派部队援助中国 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7年11月26日)

莫斯科，杨杰元帅并转
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先生

请您，伏罗希洛夫元帅，将这份电报转呈斯大林先生。

读了杨杰元帅的书面报告和听了张群^①的口头汇报后，我很高兴，并深深地感谢您对中国命运的真诚同情和全力关怀。

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是东亚和平的基石。两国人民不仅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相互依存，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日本。

我屡次得到您的援助。在中国的这一困难时期，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再次斗胆向您提出下列衷心的请求。

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出于国际义务，中国正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现在，中国军队在最大限度地做出最后努力的同时，在进行着撤退，但仍保卫着南京。

我希望友好的苏联将给予中国重大的援助。如果此时此刻为挽救东亚的危险局势您决定派出您的部队，那么这一决定将加强

^① 张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调任外交部长，应付对日事宜，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重庆行营主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中苏之间永远合作的精神。上述一切完全有赖于您,也只有您能解决。

艰难时刻书此,惟望拨冗作复。

蒋中正(蒋介石)

中华民国 26 年 11 月 26 日

于南京

(录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1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 致蒋介石密函稿

(1937年12月21日)

委座钧鉴：兹将最近在苏工作情形摘要胪陈于下：

(一)钧座○电囑向苏方商洽二十个师兵器之供给事，职连日与伏罗希洛夫元帅面商，结果如下：

甲、二十个师之兵器，除步枪由我自备外，苏方供给每师十一公分五重炮四门，共计八十门，每门附炮弹一千发，共计八万发；每师七六公厘野炮八门，共计一百六十门，每门附炮弹一千发，共计十六万发；每师三七公厘防战车炮四门，共计八十门，每门附炮弹一千五百发，共计十二万发；每师重机关枪十五挺，共计三百挺；每师轻机关枪三十挺，共计六百挺，共附枪弹一千万发；双翼驱逐机六十二架，并附武器及弹药全副。飞机及轻武器弹药之一部，已下令即日开始陆运，余仍租轮由海道运华，但伏帅以在海防卸货较为安全，请饬向法方交涉准予通过安南。此项货品需载重十六吨货车约一千辆，请早为筹定，以便接运。

上项每师配备之兵器，与职提陈伏帅面商之原案，相差极大（尤以机关枪数相差为多），伏帅以现代师之编制，以富于灵动性及精于运用火力为主，不必过于扩大编制为词，职再四说明敌方装备之优良，请保留请示后再为决定。

乙、上项各武器代价，仍如上次所定。苏方本请我付予全部现金或一部分现金，职再三申述中国在激烈抗战期中，现金筹集既难，消耗复巨，苏联不惟为中国之诚挚友邦，且系我民族抗战之积极声

援者,当能理解中国所处之困难环境而仗义相助也,苏方对此深为谅解,但请我尽量供给锡、铅、钨、锑、镍、铜等金属原料,不足之数,以茶、生丝、棉花、羊毛、牛羊皮等补充之。请指定专员,负责办理。

愚见:如能经常供给苏联以上述各项原料,则此后向彼续商接济军火,当较易办到。盖苏联军需工业对上项金属原料甚感缺乏,若能补充其所缺,自可供我所需矣。

丙、双翼机六十二架,已到哈密装配,现又允让六十二架,可编为四大队,已派定人员组织(苏方已派定空军志愿参战员一大队,约百五十人来华),惟到华技师仅三十人,当再增派。又:伏帅对新编二十师之专门人员甚关心,彼曾询问:此二十师是否需要专门人员(如炮兵教练等)。若然,则所需者为何种人员?其数量若干?请示知,以便转告。

丁、订购二百万加仑汽油一节,苏方称:事属商业范围,与军部职掌有别,请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商务员直接商洽等语。请飭主管机关向苏联商务机关商洽办理,但须提出汽油种类、详数。

(二)前苏方因应我之需要,尽量供给军需各品,彼曾要求对于轻重机关枪一千架、弹一万发、载重汽车陆运费及防毒面具二十万个、通讯材料等以现金购买,至今未闻我方之答复,殊以为虑。究应如何答复,乞示,以便转商。

(三)前次报告苏方代为设计在华创办一飞机制造厂,发动机由苏供给,月出飞机五十架至一、二百架。刻苏方一面调查中国飞机制造之状况,是否能利用,一面设计,拟在长沙或衡阳设厂,据称半年后可以出品。

(四)炮厂亦为苏方承许在中国旧兵工厂内添设机器,制造各中、小口径之炮,直至能出十五生的重炮为止。如钧座认为可办,苏方当派专家到中国设计制造。

(五)汽油为抗战中不可须臾缺之品,愚见:苏联在新疆已有调查,如钧座以为可以开采,由华自办,利用苏方专家及机器,在短期

内亦可采出，以供军用。

(六)由阿拉木图至凤翔间已有公路，如能撤去不用之铁道于凤翔公路向兰州铺设，似于军运有利，在长期抗战中，如欲另辟一欧、亚间之直通交通线，则与苏方商洽合资敷设此段铁道，亦为要图，未悉当否。

(七)总合与苏联当局讨论参战问题，目前苏联不能参战之理由：

1. 中日战争，世界皆认日为侵略者，同情于中国，若苏联加入，则变为日俄战争，英美更为观望。

2. 苏联原欲造成一反法西斯蒂之战线，奈英、美、法皆存观望。彼认为此战线不能造成以前，彼无保障，深恐应付东西两方之战事，危险殊大，尤以英国为可虑。

3. 英不愿华与日及俄胜利，尤其希望日俄战争，日胜或助俄，若俄胜，彼或助日，故苏对于英，颇深疑惧。

4. 职曾提出意见，苏联认为对日作战既有种种顾虑，可否另用一有效方法刺戟日本或联合有利害相同之国家出面干涉，以利中国之抗战。伏帅称：于苏联国会开会时提出讨论(一个月后，苏联国会可以开会)。

总之，欲使苏联参战，职见：必须造成使苏联不能不参战之环境。其制造之法：第一、想法使英、美为其后援或使有西欧安全之保障。第二、中苏关系益密，日方感觉不利，对苏联挑衅，则苏联不能忍受，彼必起而与之周旋矣。谨呈。恭谨

崇绥

职 杨 杰 谨 肃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莫斯科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4—45页)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参谋 次长杨杰电

(1938年1月3日)

特急。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转杨次长耿光兄：音密。各方订购之飞机，均已陆续到华，新机练习必需时日，兹为立即应战计，请向苏方洽商，加派驱逐、轰炸飞行人员各一大队，如何？盼复。中正。

(《战时外交》(二)^①，第472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 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8年1月22日)

武昌。委员长蒋：密。马酉电奉悉。本午与伏帅面洽增加廿师武器及手枪，据称报告政府再决定，惟于第一次海运之两轮颇为焦虑，闻第一艘卸货后，又重装驶港，第二艘尚无确息，若此批货物不能确实接收，则第二次雇妥之两轮亦不能装货及开行，盖在港敌探密布，稍一不慎，机泄生变，危险殊大，应请我方对于海运须特别组织机关办理，以防万一，并能使卸货与接收情形告知苏方，最好编订一种电码以飞机分送与职及驻越、港之负责人，俾得互通消息，因第一、第二批货物价值二亿以上，关系军事前途甚大，非有妥慎之方法办理不可，望职将此意见电呈等语。查伏帅顾虑各节，实有采用之必要，再第二批雇定之两艘，即将到达，若苏方坚持在第一批之两轮无确息以前不肯装载时，不惟船金损失，且有贻误戎机之虞，职焦灼万分，伏乞指示方略办理为祷。职杨杰。养西。印。

蒋委员长批示：密码准编订分发，并速拟办法呈阅后再定。

(《战时外交》(二)^①，第476—477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在中国现在的首都

(1938年1月25日)

塔斯社驻中国记者 B. 罗戈夫

重庆是中国西南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它已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现在大部分中央机关都设在这里。这座群山环绕,远离前线的重庆城,那些对中国的和平城市和村庄进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是难以接近的。

重庆坐落在多山的、陡峭的长江边上,嘉陵江在这里与长江汇合,并把重庆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有各自的城墙。从江边到城里要登石梯三百多级。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异常热闹。

自从首都迁来以后,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万三千人(原文如此——编者注)。在一条街道上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时代。许多使用“原始”生产工具的手工业作坊和高达七层的银行大楼并存。在这座城市,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滑竿、挑水人排成的长队和一些僧侣。在看过上海、南京和汉口之后,这里的一切就显得十分古老了。然而,这里有横挂在大街上的巨幅标语,当你读到那些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口号时,你就会忘记这座城市的古老和陈旧,而看到了它的今天。

在“民族救亡协会”的墙报附近,聚集着一大堆人。突然,嘈杂的人流停了下来,滑竿、黄包车、小汽车、挑水的人也都停了下来,这时开过来一支军队,每隔二十列就有一个机枪小分队。

在司令部的图书馆里,一位个子不高,身穿中山服的官员——总部四川办事处的负责人,在事先约好的时间接见了。他在回

答我的问题时谈到了四川支援前线的情况，以及战争对本省生活的影响。

首先，除了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把正规军派往前线外，四川省还将调出十五万新的志愿战士。他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军事训练，如果战争还要打下去，那么仅四川一个省就可以提供六百万士兵而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目前除山东战线外，各条战线都有整师的川军参加战斗。

在国防公债方面，四川购买的数量约合一千七百万美元。对军队的捐献有一百多万。大部分捐献是黄金和白银。

四川是个富饶的省份。在三年前制订的发展中国西南的规划中，四川是个重点。战争加速了这个规划的实现。例如，四川省最迫切的交通问题现已大力加以改善。通往长沙（湖南省会）和通往贵阳（贵州省会）的新公路，虽然是临近战争爆发时修建的，但到现在这两条公路才真正开始使用。

全长一千三百公里的重庆——长沙公路于去年六月开始全线通车。这条公路在技术方面堪称先进的、现代化的建设。四川正在加紧完成几座永久性的桥梁，以代替过去所建立的临时性桥梁。目前四川正在修建省内的第一条铁路，即全长为五百五十公里的成渝铁路。由于必需的外国设备进口太慢，影响了这条铁路的建设。此外，长江和嘉陵江的交通运输也有了显著的改善。日本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后，中国人在长江上游集中了大量的帆船来维持汉口和四川之间的货运。

人们对开发四川山区的资源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些资源包括煤、盐、铁、铜，甚至还有石油。四川的煤炭资源从发现以来仍然原封未动。总部四川办事处的负责人说，现在我们准备满足长江航运和部分汉口企业对煤炭的需求。在战争的头几个月，煤的开采量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七。永宁县（译音）煤矿也开始出煤，日产八百吨。首批煤炭已从四川运往汉口。盐的开采勿需耗费巨资

即可进行,并能大量增产,可以充分满足国家的需要。经过试验性的钻探查明,四川拥有适用于工业的石油储藏。省内有两个地区即四川东北部和重庆东部都发现了石油。有了油田就可以完全实现开采本国石油的计划。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民族解放战争推动了四川经济的全面发展。棉花和谷物的播种面积在春播期间将大大增加。政府已派专人到边远的畜牧区,其中包括西康省(四川以西)去收购毛皮以满足军队的需要。中国政府为了坚持长期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正竭力把四川变成一个经济基地。

在重庆郊外陡峭的嘉陵江边,有一个竹树环绕的地方,年轻的重庆大学就设在这里。重大建校的时间不过七年,有三个系,七百名学生。这里一个外国教授也没有。学校在二月前就放寒假了,但学生没有离校。他们全都参加军训,有一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射击和护理伤员。每天清晨训练便开始了,大礼堂和所有的教室都挤满了学生。学校里笼罩着一片不寻常的热烈气氛。

重庆大学的旁边就是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从上海和靠近前线的地方迁来重庆的大学一共有七所。在假期里学生们从早到晚整天进行军训,准备开往前线。

在返回市区的时候,我们的汽车沿着成渝公路行驶。在途中我们超过了一支新兵队伍。这些新兵都是来自农村的小伙子。他们中间很多人光着脚,头上包着代替帽子的布帕,象军人般地向城里行进。走在第一列的是刚从农村招募新兵回来的政治指导员。这些未来的战士紧紧地跟在指导员后面,他们一边行军一边热烈地交谈着。

江边停着一支刚刚开到的帆船队。人们正在把汽车、车床和摩托从船上卸下来。最近一个月,通过水路运来重庆的机器有一万五千多吨。有些大型企业已迁到这里。许多轻工业也按照计划从上海迁渝。其实,在计划制定之前许多工厂早已迁来,上个星

期,还有从南京用帆船运到的电影制片厂设备。

重庆的郊区正在清理建筑工地,准备修建一些房子来安顿迁川工厂。市内也在加紧建设。嘉陵江左岸一座大型水泥厂已经投产。重庆的发电量月底将从三百万瓩增加到一千二百万瓩。一台新型的涡轮发电机已开始发电。

中国的临时首都将首先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成为一个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基地。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的军事行动

(1938年2月5日)

H. 利亚霍夫

日本侵华战争第二年年初(1月)战局的特点是,中国军队的行动开始有了转变,其积极性日益增长。

中国政府和军队最高司令部总结半年战争中的经验,吸取以往战役中所犯错误的教训,改组军队的管理,撤换了一批指挥官,取得了制定统一作战方案的成就。基于这一切,中国军队便有可能在很多方面从消极防御转入积极进攻。

企图以占领南京来迫使中国投降和毁灭中国军队的日本帝国主义失算了。占领南京,未能使日本人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中国军队为保存自己的战斗力撤退了,同时中国政府声明,决心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由此而受到挫折的日本军阀,决心开展新的攻势,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去年12月下半月起,日军进攻的首要目标是上海战线的杭州和华北战线的济南。

12月27日,日本军队占领杭州,仅隔两天,中国军队便在广德、杭州全线进行反击。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决回击,1月5日收复杭州。被中国方面增强的反攻搅得日夜不安的日军司令部,对受到威胁的方面增补了自己的军队,并停止从南京向山东的进攻。日军司令部只有把新调来的精神充沛的兵力集结在杭州附近之后,才能重新占领这个城市。

日本人企图打退中国军队在上海战线其他地区的进攻,但成

效甚微。中国军队沿长江南岸进行反攻，1月初逼近芜湖。日军司令部企图在占领芜湖的中国军队后方登陆，但没有成功。中国军队在空军掩护下阻止了敌人的这一企图。同时，中国军队在南京以西，将日本人驱出庐州，把他们赶到梁园以东地区。

中国军队在上海战线转入反攻，以及他们在杭州、广德、芜湖和庐州等地的积极行动，迫使日军司令部停止沿津浦铁路和大运河从南京方面向北面的进攻。从而阻止了日本军队在上海战线上进一步发动的进攻战。

12月27日，日本在北方战线开始向济南发起进攻。在此之前的两个月时间内，日本军队已驻扎在济南市对面的黄河岸边。守卫济南地区的山东部队由韩复榘将军指挥。长期以来，他都在与日军进行关于将自己部队和平地撤出山东的谈判，同时还将这种背叛行为伪装成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忠诚。显然，在日军进攻济南之前，背叛的代价就已经确定。中国军队预先撤出济南而使日军有可能在渡过黄河以后，就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地占领这一地区，因为通过黄河调运来的日本军队有可能不受到从这个地区预先撤退的中国军队的反抗就占领济南。

日本军队占领济南之后，沿津浦铁路朝南和朝东向青岛方向移动。

但是，日军在山东境内的军事行动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还击。1月12日以前，在山东北部进攻的日本军队撤退到肥县——邹县——济宁一线。1月13日夜里，中国军队强渡大运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从日军手里夺回济宁，并继续加强攻势，于1月16日抵达兖州西郊。同一时间，沿津浦铁路一线活动的中国军队，经过三天的战斗收复了邹县，并于1月16日从南面向兖州逼近。中国军队向津浦铁路以东推进，于1月13日占领肥县，并从这一据点向北推进了十五公里。

中国军队的反攻，开始于投入新的兵力加强山西战线和逮捕

枪决叛徒韩复榘,以及恢复被韩复榘所瓦解的各部队的战斗力。1月13至16日的反攻,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打击是果断而迅速的。中国军队在三天的战斗中向前推进了三十六公里。

由于前线的失利,日军司令部对军队重新进行部署。1月16日,日军司令部阻止了中国军队的前进。日本人在集中兵力转入进攻的同时,于1月16日至23日期间,再次占领济宁,并向滕县以南推进,而在兖州以南方向又夺回邹县。

1月23日,中国军队重新发起反攻,阻止了日军的军事行动。1月26日,中国军队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向美宁(音译)方向(兖州以东九十公里)的袭击。1月29日,中国军队收复美宁,并继续进攻曲阜,同时以进攻侧翼和后方来威胁济宁地区的日军。

1月底,日军被迫在中国军队反攻的所有地区转入防御。

在北方战线的其他方面,游击队的活动牵制着日军的一切行动。对活动在日军后方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的围剿遭到失败。日本人在同八路军的战斗中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武器。日本占领区后方的所有县份,实际上是掌握在游击队手里。并由抗日自治政权管理。

同时,随着中国地面部队反攻力量的扩大,中国空军的作战行动也活跃起来。中国飞机成功地袭击了南京、芜湖、广德地区的日军机场,轰炸长江上的日本军舰,粉碎了日本陆战队登陆的企图。由于中国军队的频繁活动,日军的行动在1月份的下半月无论在北方战线还是上海战线,都没有取得丝毫的进展。

在1月份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不仅在保卫战中表现出顽强的意志,而且还表现出他具有克敌制胜的能力。中国军队进行反攻时越来越勇敢地采取机动战术,他们迂回行动,出没于敌人的交通要道,袭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中国政府在军队中采取制裁叛徒和撤免不称职的指挥官的措施,从而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中国政府改组和整顿原来属

于韩复榘管辖的部队，目前该部队正有效地开展攻势。中国司令部还首次建立了前线协同作战关系。中国军队目前在上海战线方面的积极进攻，使日军对山东以南的进攻陷于瘫痪。

中国军队的反攻，更加表明日军的虚弱。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是在实行殖民地侵略过程中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其主要军事任务是在和弱小敌人斗争中侵占别人的领土。因此，为了在短期内占领大片土地，日本军队总是力图迅速向前推进。这就决定了日军的作战方式是控制占领区的交通要道——能迅速展开军事行动的铁路，以及能管辖占领区的行政中心。

日本军队把德国军队要求在战场上包围和歼灭敌人的原则搬入自己的条例中。而在日本人的实践中，这一套战术则表现为向敌人的侧翼进攻，以威胁其后方，然后把敌人挤出他们的占领区。日本军队在进攻战中惯用的手法是：回避正面攻击，威胁敌人两翼，迫使对方撤离，而当对方开始撤离时，再进行袭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日本军队在对付消极的敌人时，这种方式是成功的。

在反对中国军队的战役中，日军的这种作战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缺点。在现今的战斗中，和日本对抗的不是中国地方军阀的雇佣军，而是准备抗战到底的全中国人民。因此，即使在退却时，中国军队不仅没有失去战斗力，相反却为改编和重新武装自己的军队，为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去，以及为增补新的干部而赢得了时间。

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侵占别国的领土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不断深入，这就拉长了它的战线和后方的交通运输线。目前，日本军队在中国境内战线的总长度达两千公里。日本军队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地区无力以足够的兵力来建立一条完整的战线。这样，日军战线上就有了缺口，而这些缺口在中国军队转入积极作战时，就成为日军作战部队的薄弱环节。

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日本军队在各城市主要交通要道附近均设有一小块驻防区。日军没有能力保卫其后方，这一点被中国

游击队所利用,他们不断采取勇敢的进攻,使敌人的后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中国军队还只是刚刚采取进攻行动,日本军队就在很多方面被迫转入防御,挖壕据守,设置铁丝网等等。在东京的军阀中,某些青年将军,侵略政策的理论家,被人们称为日本的“拿破仑”。在东京那些颇有名气的日本特务和战争挑衅者如土肥原和板垣之流以及不太出名而又热衷于战争的石原等,就被认为是这样的“拿破仑”。石原与板垣一起制定侵略满洲的计划,并在关东军司令部任职时主持这一计划的实施。近几年在参谋本部作战工作处的石原,就是当前侵华战争计划的主谋者之一。

日本军国主义者象拿破仑一样令人可笑。但他们不妨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某些教训,并仔细地分析一下拿破仑在侵略西班牙和俄国的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拿破仑声誉的没落开始于他急速地侵入俄国的腹地之后,在那里,伟大的俄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日本“拿破仑”在进攻四亿五千万酷爱自由的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中,也必然自取灭亡。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日本对华战争需要花多少钱

(1938年2月7日)

И. 佩罗夫

1931年日本占领了满洲。占领满洲,只不过是这场旨在使全中国隶属日本帝国主义的新战争的序幕。1931年事件和1937年事件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按照日本军阀的计划,占领满洲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利益,其次是获得进一步进攻大陆的战略基地。

日本占领满洲后,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公开掠夺。日本军阀在其所占领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军事战略村、飞机场和公路等等。大片土地落入日本将军和资本家手中。日本侵略者还把满洲的中国农民从当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掌握了满洲的整个国家机器及其收入的一切来源,掌握了省银行和海关的财产、铁路以及诸如沈阳兵工厂之类的大企业。但是要实现日本的计划,比在东京拟定这个计划要困难得多。

满洲的冒险行为并没有带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指望得到的那些经济利益。日本政府占领满洲之后,每年都得花费大量资金,用于同日益增长的游击运动作斗争的部队所必需的薪俸,用于为新的军事冒险行动准备战略基地。这些年,日本预算中有一个专项——“满洲事件支出”。这项主要用于反对游击运动和修筑军事工事的支出为:1931年五千四百万日元,1932年二亿八千八百万日元,1933年一亿九千七百万日元,1934年一亿五千八百万日元,1935年一亿八千一百万日元,1936年二亿日元。因此,日本政府

占领满洲后五年时间,仅直接的军事开支就达十亿零八百万日元。

对于这个问题,还应当作一点补充说明,迫于军阀的压力,在满洲还投入了约十亿日元用于南满铁路以及与之有关的附属公司。如果考虑到同时用于军队的薪俸和装备,以及为了扩充空军和海军而花费的大量资金,那么满洲的冒险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就太昂贵了。

因此,与占领满洲有关的支出,只占日本军事总支出的一部分。日本的预算可以作为军事支出增长的指标,尽管远不是全部指标。还在同中国作战的新阶段开始之前,日本1937—1938年度的预算批准总额为二十八亿七千二百万日元,即几乎超出1931—1932年度预算的一倍。众所周知,军事支出花费了日本预算中最大的一部分。对此还应当加以补充的是,陆军省、海军省的支出比整个预算增长快得多。比如,如果说从1931—1932年度到1937—1938年度全部预算增长了一倍,那么在这个期间陆军省和海军省的支出则增长了两倍。现仅就陆军省和海军省所规定的军事支出的增长,用下列数字加以说明:1931—1932年度军事支出(按预算)为四亿五千五百万日元,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一,1932—1933年度为六亿八千六百万日元,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1933—1934年度为八亿七千三百万日元,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1934—1935年度为九亿四千二百万日元,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1935—1936年度为十亿零三千三百万日元,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七,1936—1937年度为十亿零六千万日元,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六,1937—1938年度为十四亿一千一百万日元,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九,补充拨款(这点下面还要讲到)为四十亿一千三百万日元。

应当注意到,军事支出不只是根据陆军省和海军省的预算来开支。日本经济学家利裕真稔太郎在《改造》(1937年1月)中写道:预算中所谓民用部分的一半都是伪装的军事支出。例如,用于

军队医院、征兵站的薪水支出，建设和修整军队营房和演习场的支出，都是根据内务省的预算来开支的。商业省和工业省的预算中，包括与军事研究院、夏季实验站、实验室的薪俸有关的支出，燃料（汽油、石油等等）的集储的支出。此外，支付国家公债利益的大量金额也应当包括到与备战有关的支出中去。

但是，1937—1938 年度的预算拨款显然是不够的。日本军阀再次失算。他们认为能够迅速占领华北，并且粉碎中国人民的反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失算，日本国会第七十一次非常会议批准了总额为五亿三千七百万日元（超出国会第七十次会议所批准预算规定数之外一十四亿一千一百万日元）的补充预算。

事件的发展表明，中国人民决心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战争变成了持久战，要求愈来愈多的物资消耗。日本政府被迫再次召集国会非常会议即第七十二次非常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数额为二十亿六千五百万日元的新的补充预算。这样一来，日本 1937—1938 年度的军事支出（按预算）为四十亿一千三百万日元。换句话说，军事支出已经超过用于占领满洲五年期间的支出的三倍。不仅如此，仅 1937—1938 年度一年的军事支出，几乎等于日本侵华战争新阶段以前的五年期间的军事支出。

日本军阀预见到这些拨款是不够的。据《兵主》报报导，日本军阀已要求在编制 1938—1939 年度新预算的时候，应把对华战争的有关补充拨款定为四十亿日元，还不包括总预算所规定的拨款。日本的军事冒险行为，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已严重地表现出来。如果说 1931—1932 年度军事支出占日本国民收入百分之四点五，那末 1936 年度军事支出已占百分之八点一。1937 年因侵华战争的军事支出几乎消耗了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下列图表说明了国民收入和军事支出变化的情况：

	国民收入 (百万日元)	军事支出 (百万日元)	军事支出占国民 收入的百分比
1931年	10043	455	4.5
1932年	10229	686	6.7
1933年	11469	873	7.6
1934年	12029	942	7.8
1935年	12482	1033	8.3
1936年	13109	1060	8.1
1937年	13736	4013	30.0

十分明显。这种对国民收入大量的非生产消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孕育着严重的后果。为了比较起见,指出英国由于新的军备计划而急剧增长的军事支出未超过国民收入百分之十。这一实例是有意义的。还应当指出,日本比英国穷若干倍。日本国民收入等于英国国民收入百分之十七,等于美国国民收入百分之七。依靠内部资源拨款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导致日本经济和内部政治局势的恶化。

为了从居民身上勒索必需的大量资金,日本政府扩大了公债发行和增加税收。日本政府实际上停止了对与战争无关的商业性生产公司发放有价证券。这种措施的目的在于利用现有的闲散资金,以便向国家证券投资。换句话说,公债的实行靠的是缩小非军事工业部门的基本投资。

日本政府借助于财政监督法,还力图利用保险公司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基金。这就引起了与此有利害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强烈不满。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用半强制性的方式,通过信用社、农业社以及其他组织来分配国家债券。然而,公债的实现仍然很困难。

扩大国家公债的发行必然导致税收的增加,因为税收是抵补支付公债的基本来源之一。仅全国的税收一项,不包括省级税收,

已从 1931—1932 年度的七亿三千五百万日元增加到 1937—1938 年度的十三亿五千万日元。总的来说,从下列资料可以看出有关税收的增长情况:1931—1932 年度的税收为七亿三千五百万日元,1932—1933 年度为六亿九千五百万日元,1933—1934 年度为七亿四千八百万日元,1934—1935 年度为八亿四千三百万日元,1935—1936 年度为八亿九千九百万日元,1936—1937 年度为九亿二千三百万日元,1937—1938 年度为十二亿五千万日元(所有这些数字均取自预算资料)。

税收使日本劳动居民破产。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起着占优势的作用。这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现状中。特别敏锐地反映了出来。

1937—1938 年的预算中,税收比去年增加了三亿日元。由于日中战争,又增加了总数为一亿日元的新税。资本家立即采取措施,提高商品价格,把税收转嫁给劳动人民。根据 1938—1939 年度的预算,准备进一步增加税收。

日本由于占领满洲和在中国进行战争而带来的巨额开支,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冒险行为不仅旨在反对中国人民,而且也反对日本人民。工人受到惊人的剥削,农民的贫困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

严酷的警察镇压制度和对工人组织的残酷迫害。证明日本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

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说明,在中国的战争具有持久性和长期性,它将给日本带来严重的后果。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山东北部的游击队

——中国来信

(1938年2月13日)

B. 罗戈夫

山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的抗日游击运动是自发产生的。

十月中旬,中国军队撤退到黄河对岸。以北平大学生薛清梧(译音)为首的来临自卫队转入了游击状态。从北平和天津逃出的大学生,当地农民和一些掉队的士兵纷纷加入这支自卫队。于是游击队开始在山东北部其他各县自发产生。

日本人占领这个地区以后,从10月到11月这段时间,游击运动遍及十五个县。那里的游击队员人数达三万七千多人。

日本军阀把自己的驻防军(每队二百至三百人)分布在南皮、海兴、盐山、乐陵、庆云、阳信、无棣及其他县城,并以沧州为主要基地。日军部队在县城以外的活动只限于白天。一到晚上,他们匆忙回到有城墙围起的县城,回到自己的营房。尽管整个山东北部都是日本人的占领区,但有许多乡村,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去过。

十月底,中央政府任命的游击队司令秦英才(译音)来到山东北部地区。他很快就把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这时,薛清梧的部队和其他游击队联合起来并建立了总司令部。五十岁的秦英才找到了自己的忠实助手——二十二岁的薛清梧。

小规模游击队几乎村村都有。由于没有高山和森林,山东北部地区不可能建立大规模的游击队。最大的游击队只有二百

人。进行大规模战役时，通常是各村的几支游击队联合起来进行。

五千名装备很好的战斗队的战士，是山东北部二万七千名游击队员中的骨干。其他的游击队员则分成小组，对村民进行军事训练，或从事军需供应和揭露叛徒工作。这里还建立了战斗后备队。全体村民常常帮助游击队。游击队的主要困难就是所在地区十分贫困。加之，贫瘠的山东北部地区严重地遭到日本占领军的残酷蹂躏。但村民们仍然尽可能地以各种物资甚至用金钱来支援游击队。同样地，游击队也常常利用一些小规模武装冲突和武装袭击的间隙时间帮助村民种地。

11月12日游击队袭击博台的故事已在全中国交相传颂。当时黄河岸边的博台县城里驻扎着三百名日本驻军。日本人打听到游击队准备袭击博台城。于是在袭击前几天就把城门紧闭，并且用一袋袋的土包堵住城门口。第四道城门是入城的唯一进口。但这里早已加强了警戒岗哨。游击队员要进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们使用了当地人大概在中世纪无休止的封建诸侯战争中曾经使用过的那种巧妙计策。

一支由四十人组成的游击队，用结婚仪式的形式向城里走去。在本来是坐新娘的花轿里放了一挺机关枪。伴随着锣鼓、乐队和纸花，“婚礼队伍”来到县城大门。一个日本哨兵走到轿子前面，想看看“新娘”，但他立即被一枪击毙。

博台县城的主要街道有一公里半长。日军队伍均驻扎在街道两旁。当“婚礼队伍”沿街前进时，突然响起了警报。接着便开始了激烈的巷战。当场打死日军约五十人。游击队牺牲了六人。他们的指挥员齐毛方也牺牲了。事后游击队离开县城。第二天，日军也撤离了县城，至今博古县城仍没有日本驻军。

游击队进行的最大的一次袭击，是12月4日对盐山的袭击。当时盐山城里驻有日本军和满洲军队共五百多人。半夜两点，游击队突然袭击南门。日伪士兵多人被击毙。每条街道和每幢房屋

后面都在进行战斗。战斗持续了一夜,游击队员走遍全城。他们从南门进来,从北门出去。缴获的战利品有机枪两挺,步枪二十多支,子弹若干箱。第二天清晨,他们又分散到各村去。这次袭击之后,盐山的日本驻军人员增加了一倍多。现在,那里的日本驻军已达一千五百人。

日本军队向黄河以南移动以后,山东北部的游击队经常深入到日军后方。游击运动的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七个县:盐山、庆云、阳信、乐陵、无棣、山海、德平,实际上都已掌握在抗日游击队员手中。每个星期都收到从山东北部发来的有关游击队袭击日本驻军和弹药粮食运输队的消息。有一支游击小分队还渡过黄河追击日本军队,并在靠近日军后方的黄河与胶济铁路之间同日军进行战斗。

根据最新消息,山东北部地区已有近百支游击队在活动。他们穿过日军战线同中国的正规军保持联系。总之,游击队正瓦解着日本后方,牵制着日军的行动。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日本军队和中国的战争

(1938年2月13日)

И. 西尔科夫

在日本作战省 1934 年底出版的纲领性小册子中写道：“战争——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它既对个人又对整个国家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刺激因素。”

最近十年的日本侵略史非常明显地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好战野心。1931 年，日本占领了面积相当于英国和德国领土的满洲。1933 年，日本又占领了面积等于奥地利领土的热河省。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扩大其对华北广大地区的统治，并且力图固守河北省。同时，日本深入到内蒙古，准备全面占领察哈尔省、绥远省。最后，日本还企图在目前的战争中，确立对全中国的统治。

日本军阀是从准备战略基地以便进一步占领中国领土的观点出发，来研究目前反对中国的战争的。关于这一点，在田中将军著名的备忘录中明确地写道：“为了深入到中国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利用满洲和蒙古。当我们拥有全中国资源之后，就将转向征服印度、小亚细亚，甚至欧洲。在我们同苏联和美国的战争中，应当使这些国家承担整个战争的悲惨后果。”

为了准备“大战”，日本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

日本近年来实行的军事工业的改造和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为日本武装力量的军事技术现代化准备了基础。这些年日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用机关枪和大炮供应军队，从数量上成倍

地增加空军力量。同时,开始向部队供应过去少有的摩托—机械化工具。

但是,日本军阀并不局限于此。从1936年起,他们就已着手实行预定期约为六年的扩大武装力量的新纲领。这一加强军队的新纲领大体上规定要进一步增加大陆上的日本军队,增加空军的数量并用新的技术装备重新武装空军,扩大装甲坦克部队,扩大工程技术、化学、辎重部队,最后,还要建立若干新的师团和加强步兵的火器。

日本军队在重新武装自己部队的问题上,利用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德国的技术援助和咨询。

对步兵和其他军种进行改造,就需要修改战术和修改军队的战斗教练制度使之现代化。1936年12月东京公布了步兵新章程。这个章程总结了日本军队在满洲和中国的作战经验。这个章程旨在对付用强大的炮火、坦克和空军装备起来的敌人。

从日本在中国的作战经验中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日本军队行功的特点首先是顽强的、广泛的运动,把六部分兵力集中在决定性方面,而为了要做到这一点,甚至不惜削弱次要方面的力量。如果把占领南京的战役除外,那么日本军队总是回避从战线的正面去攻占中国阵地,而比较喜欢采取迂回行动。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御地带,通常是以炮队压倒中国的火力点开始。然后,坦克采取行动,步兵紧接而上。炮兵被用来压制退却的中国军队的火力。必须指出,日本军队在战争过程中,在夜间行动或急行军中,表现出它是训练有素的。摩托机械化部队和骑兵,在战斗中每天可以行军四十公里,步兵每天可行军三十公里。

最可怕的情况是,日本军队经常遭到中国军队强有力的刺刀冲锋。人们都知道,日本军队经受不住中国人的白刃战而退却和溃不成军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1月12日夜,中国军队强渡大运河之后,与日本人在景州展开了残酷的刺刀战。日本军队没有

经受住这次冲击而被打死两千人。

必须指出，日本军队在目前反对中国的战争中，还没有提出过关于日本军队战斗力的完整概念。众所周知，中国军队在火器的质量和数量方面以及在斗争技术方法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军队。下列资料可以表明最好的中国师团和日本正规师团的火器装备比较：

	中 国 师 团	日 本 师 团
步枪	4300	17000
轻机枪	72	436
重机枪	24	148
掷弹筒	20—30	436
反坦克炮	——	24
师拥有的大炮	12	24

我们引用的是属于南京部队装备较好的中国师团的材料。至于中国地方军队和省属军队中的师团，其装备比起南京部队来就差远了。

我们还没有谈到那些拥有装甲部队、工程装备和大量空军的侵华日军。中国方面除了少量的空军外，这些斗争工具几乎没有。但中国人仍然给日本人以强有力的抵抗，在各地打击日本“皇军”。

由于日本司令部寄希望于中国军队的劣势装备和组织上的不完善，因而在前线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在强敌面前，这些失误使日本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为了说明这一点，只需指出日本在其占领区的孤立状态，它的军队不能离开铁路线，它的后方是无保障的，缺乏武装保卫等等就足够了。

日本整个陆军从中国战争开始均由下列兵团组成：

步兵：十七个步兵师团和若干防卫旅团。

骑兵：十七个骑兵团，四个战略性骑兵团。

从1937年8月9日至10月1日,日本进行了四次征兵。由于这些征兵,约有五十万人参军。同时,开始补充汽车、船舶、马匹、牲口。政府共颁布了十二种调整外贸、工业和运输工作的法令。总之,实行了全国总动员,尽管“动员”这一术语目前尚未正式使用。

为了派军队到前线去,军队开始整编新部队。首先扩充了步兵的次要部队。本年初,又重新组编了二十六个步兵师团、两个骑兵旅团、两个炮兵旅团、两个摩托机械化旅团、两个坦克团和几个空军团。

炮队:十七个轻野战炮团(营),四个山地炮队独立团,十个重野战炮团,十一个重炮团和七个高射炮团。

装甲部队:编入步兵师团和骑兵旅团的有二十一个装甲队,两个独立的摩托机械化旅团和两个独立坦克团。

空军:十八个空军团,其中三个歼击机团,三个侦察机团,八个混合机团和四个轰炸机团。

日本军队在同中国作战前的总数为三十八万人。日本地面武装力量分布如下:日本——十六万二千人,满洲——十六万人,朝鲜——四万人,华北——一万八千人。

下列表格说明日本军队从1930年到1937年增长情况:

年 代	数 量	武器									
		机关枪		营使 用火 炮	反坦 克炮	师团使用的 75厘 米火炮	501毫 米榴 弹炮	重 炮	高 射 炮	坦 克	飞 机
		轻 机 枪	重 机 枪								
1930	23万	3650	1800	500	—	450	—	192	48	120	600
1933	32万	4000	1850	500	—	500	—	192	72	300	790
1936	38万	5250	2234	524	498	816	176	212	288	1000	1500

外国报刊所提供的今天日本军队的数量是极不一致的。但是应当把在英国、法国和中国报纸报导的基础上所编造的下列数字看成是最接近实际的：

1938年2月1日日本军队的状况

人员组成	1200000人
大炮	4500门
坦克	1800辆
飞机	2000架

日本军队按其社会成分，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农民补充的。军队的军官组成，主要来自职业军人、大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

这个军队的政治道德状况，在现今战争中已经明显露出了裂痕。日本军队在占领区掠夺、强奸妇女，血腥镇压中国居民，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道德水平。军队的首领默许这样狂欢纵乐，并认为这种“行动自由”可以补偿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负。

外国报刊所公布的许多事实都证实，反战情绪已渗透到日本军队中去了。在上海附近，曾发生过整个分队拒绝上前线的事件。拒绝者被就地枪决，以便使其他人“不敢再这么做”。由于不可信任而从前线召回来的部队增加。在南京和上海附近，都发生过士兵从前线集体临阵脱逃和拒绝继续进攻的事件。在日本国内，逃避征兵、自残肢体和装病的情况经常发生。在九州岛，发生过后备部队的骚动，这种骚动以残酷镇压参加者而结束。在军队中，自杀的人数不断增加，纵饮无度、吸毒泛滥。

日本士兵群众的政治道德情况，随着军事行动的拖延而越来越坏。

在日本军队失败的影响下，东京的人们开始看清了目前侵华战争的危险性。关于这一点，已被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岩井岐翁太郎的下述声明所证实：

“在中国当前事件的危险战争转移到上海的时刻，我国人民清

楚地懂得了什么是现代战争……我们的国家从参加上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只是好处,而没有感觉到现代战争的特点。只是当前的中国事件,才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并且使我们感觉到这就是现代战争。”

毫无疑问,军事行动在中国继续拖下去,将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严重的困难。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徐州保卫战的准备

——与李宗仁将军的谈话

(1938年2月14日)

[塔斯社徐州2月13日电]日本军队正向徐州集中。显然，日军司令部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占领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交叉点上的这个战略据点。中国军队随时准备给侵略军以坚决打击。

津浦铁路战线的总指挥李宗仁将军在与塔斯社记者谈话时宣称：

“目前，全国都注视着徐州保卫战。日本人威胁要从四面包围徐州，同时空袭徐州。日军从东面进攻徐州的可能性很少。因为对此他们需要大量的军队。但是，日军企图在这里登陆并采取某些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人将力图沿陇海铁路采取迂回运动，尽快从西面切断徐州。但这是相当困难的，会给日军带来巨大损失。迂回深入到我们的后方，对日军来说，是一件危险的事，而对我们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日军后方的主人。”

当谈到前线的总局势时，将军说：

“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而斗争，这是前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一致决心给敌人以坚决的反击，并争取获得最后胜利。”

“全体军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这是决定保卫徐州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日军又从其他战线调到津浦铁路战线，他们想方设法尽可能迅速地联结北方战线和南方战线。因此，我们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击日军这次行动，不让他们得逞。我相信，日

本人最终是要失败的。”

当谈到日军最近在津浦铁路南段进行的战役时,将军指出,尽管日军在数量上和军事技术上都占优势,然而日本人得到的却很少。将军说:

“蚌埠(凤阳北部)之所以失守,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保卫策略。在建立沿黄河的新战线之后,现在我们改变了策略。我们常常采取灵活的战术,以代替中国军队所遵循的战役保卫战。

“蚌埠失守以后,我们的防线更加坚不可摧。我们不仅阻止了日军的进攻,而且还阻止他们转向铁路以西。这就更使日军的行动难以施展。考虑到敌人军事技术上的优势,我们将在我们感到最恰当的地方给敌人以打击。众所周知,日本人在进攻时通常以炮火掩护全部阵地,摧毁一切防御工事,只有在这以后才派出步兵。在白刃战和夜战中,通常获胜的是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士兵只是在万不得已,即在大炮的猛烈射击和空袭的情况下才退却。然而,就连这些退却,也使敌人付出了很大代价。

“现在,南方地区正进行着顽强的战斗。日军的进攻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他们在白天夺走一个村庄,那么我们在夜间一定夺回来。”

“蚌埠失守已经八天。在这之后,日本人一天几次企图横渡黄河。我们的军队击退了他们。甚至日本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渡过黄河的时候,又被我们的士兵把他们消灭在北岸的白刃战中。

“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战斗在铁路两侧。假如日本人继续沿铁路疾速冲去,那么我们将不会花很大力气就可以切断他们同后方及其根据地的联系。日军新部队向徐州的推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些铁路地段和全部桥梁已被毁坏。”

结束时,李宗仁说,“津浦铁路的北部地段一直是平静的,但这种平静是暂时的。日本人将一个师团调往前线阵地,而将另

外两个师团调往这一地区。我们应该预料到,最近将会有一场会战。”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军队的英雄

——中国来信

(1938年2月18日)

B. 罗戈夫

关于中国士兵的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人们将把它编成歌曲和诗歌来颂扬。现在有许多普通士兵和指挥员的名字已在各个战场上传颂。在战斗中日益强大的中国军队有许多出身下层居民的英雄,有时他们并没有被发现,他们的英雄行为是大量的,也是平凡而普通的。有时某个指挥员或士兵的大无畏精神,也会使那些已经习惯于把英雄主义作为一种必然而不可分割的行为的人们感到吃惊。在当前的战争中,英雄行为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是全民战争,是因为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而奋起参加的神圣的战争,所以把最勇敢的忠于祖国的人们派往前线。毫无疑问,中国军队的英雄行为,说明几个月来他们坚定地同装备精良,拥有大量坦克、飞机和大炮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战斗。中国士兵往往是手持手榴弹冲向日本坦克。他们经常用刺刀刺杀敌人阵地巢穴里的机枪手。

一天晚上,在良乡车站附近,四川部队的一个营被包围了,只有消灭日本机枪手才能冲出包围。这时,一个自愿者手持手榴弹扑向敌人的机关枪,他最后同整个日本机枪队同归于尽。这个营得救了。在离蒙阴不远的临沂城里驻有一支中国军队的小部队。后来日军的一个大部队向这座县城发起进攻。显然,坚守是不可

能的。于是，他们迅速在主要道路上埋下地雷，当日军通过时，地雷爆炸，日军部队惊慌失措。这时，中国战士和碰上什么就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群众从城里跑出来，向日本人猛扑过去，结果日本部队被全部歼灭。

游击队还冲进被日本人占领的蒙阴城。尽管日本人占优势，游击队员们在短期内几乎歼灭了整个日本部队。两百个日军士兵，活着的只有二十四人。

在向平铺村附近的战役中，中国军队表现出忘我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三百人的日军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乘着汽艇渡河。中国部队的一个营在赵指挥员领导下，不顾猛烈的炮火，向日军进行反击。在日军的炮击下，整个营全部牺牲。代替他们的另一个营在宋文平的指挥下继续进行反击。该营的勇士们好几次逼近村子，但在炮火的压力下，只好退回。这个营尽管伤亡很大，但仍然冲过敌人的火力网。白刃战开始了。这时，日军的大炮沉寂下来。在决定性的刺刀拼搏之后，这个营的士兵击败了日军部队，剩下的四十名日军士兵只好隐藏在河对岸。

第二天，日本人决心夺回村子。日军的几个炮兵连开始向村子一带炮击，同时日军坦克巧妙地埋伏在河边，阻止中国增援部队通过。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村子。宋文平指挥的中国营，从四面八方突击，以强大的火力完成了在村子一带的阻击任务。这个营在十个小时中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日本人的损失越来越惨重。但是中国这个营的力量也同样逐渐减弱。增援部队又无法接近。经过数小时战斗已拖得精疲力竭的中国士兵，走出战壕，发起冲锋。日军大炮再次沉寂，空中的轰炸也停止了。村子里展开了白刃战。日本曾三次挡回这个营的冲锋，因而准备庆祝胜利。就在这时候，中国的一支部队冲进村子进行增援。最后，日本人被彻底打退。

在目前的战争中，日本人的残暴性还表现在它不俘虏中国士

兵,而是把所有被俘虏的中国人都杀掉,就连伤员也不能幸免。上星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中国士兵在夜里遇上一支聚集在机枪战壕里的日本小队,日本人解除了这个中国士兵的武装,并且放了他。这是偶然的事。这个战士回到自己的部队,但谁都不相信从日本人那里可以活着回来。大家都怀疑这个士兵当了日本人的特务。于是这名士兵带上两枚手榴弹,再次到日本人那里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为了证明自己忠于祖国,这次他背回炸毁的机枪残骸和两个被炸死的日本人的钢盔。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转呈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建议电

(1938年2月25日)

杰有下开建议，为增进俄方援助功效及改善接洽手续，请兄密转介公、庸公，采纳施行：（一）向俄订购军火，最好分批办理，决定种类及数量，一单提出，结果必佳，若零星要求，交涉既不便，且无大效。（二）向俄交涉军火或运输，及与军事相关事项，务先决定交涉中心，若在华与俄武官商洽，则不必再令杰办理，以免重复或不接头，以上问题由杰或在华之俄武官经手为便，不必向俄使商洽，因彼之路线。不属军事范围，且易泄露而迂缓。（三）俄方谅解我财力不充及矿产不丰，自不能要求我用现金、大量矿产交换军火，倘在可能范围内，常常运载若干矿产品，如铜、锡、锑、钨、铝等，及生丝、牛羊皮、棉花、茶等，亦可运来，如此，俄方认我十分诚意，当甚感动，则应我之供给更多。（四）俄已将机关枪、大炮等先后运华，子弹附件虽多，惟在战时消耗必巨，应速请俄派技师并运简单机器迅到华制造弹药，俾接济便利，不致中绝。（五）汽油，新疆有矿，若提出借款，请俄技师用其机器开采，半年后，汽油必又源源不断应用，在抗战中此为急务，请毅然决然排除万难，积极办理。（六）在肃州地方，请拨一、二个师，向俄订购兵器，组一飞机化兵团，并请俄教官训练，半年后即可供反攻之用，倘蒙采纳，能派柏天民、丁炳权、蒋伏生数人，先往兰州、肃州筹备较妥。（七）甘新铁道，系长期抗战中唯一接济路线，不畏封锁，且可刺激日俄间之嫉视，使俄得一变相参战途径，虽建筑需时两年，然此铁道成功时，即

我转攻大胜之日。(八)朱武官世明在未来俄前,俄军事当局认为于中俄间不但无贡献,且有妨碍,曾两次向杰声明,现朱到俄两月,非特俄方不理,且常生麻烦,祈撤回免伤情感。(九)杰在俄工作较烦,常派员点收,常派员押运,随员两人早不敷用,曾借用他处人员,但恐事机不密,请准调陆大教官两人来此帮忙等语。上述如何进行,并请迳复耿兄查照,科即日离俄经波、捷、奥、瑞赴法,下月鱼日可到法京,来电由巴黎使馆转。科,有(廿五日)。

(《战时外交》(二)^①,第478—479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轰炸蚌埠安庆、 台北及鲁南峰县等地之敌的“战斗要报”

(1938年2月—10月)

空军战斗要报,2月17日

第一南昌方面(略)

第二汉口方面

八、本(十七)日八时五十五分以CB轰炸机八架轰炸安阳敌机场,至黄河上空时,遇敌驱逐机六架,分两分队,自前面左右两方,向我机横截。我机两个四机小队,向右梯次前进。敌机在我后方,交互飞过,追赶不及。至新乡附近,遇敌驱逐机三架,掩护敌轰炸机四架,迎面飞来。我第二小队之右翼机,与敌轰炸机互射。敌轰炸机左翼一机,忽自我机后下方,向西下降于道清铁路南侧,结果未详。

十一时许,到达安阳,见各机场均无敌机,遂自四千公尺高度,降至二千公尺,见漳河南侧车站,停有部队,车站北,停火车一列。漳河北,有火车一列,自北向南驶,遂分头轰炸之。归途在驻马店加油后,十四日安返汉口。

九、八时五十五分之同时,以CB机四架。轰炸蚌埠之敌,以两机轰炸临淮关东侧之敌,及停留之汽车。以两机轰炸临淮关西南约数公里公路上之敌汽车队。同时,遇敌驱逐机两架向我攻击。至十一时三十五分,我机两架受轻伤,飞回,伤一人。

十五时零五分,据报:一架迫落六安,其余一架,后闻落寿县保佑寺,正派员处理中。

十、十时、汉口闻敌机侵袭，结果未至。

第三长沙方面[略]

第四广东方面[略]

二月二十七日我方空军飞机损耗表

隶属	驾驶员	机名	号码	机数		地点	原因	报告者	备考
	俄员	SB	3—1555	待查	可修 1	全毁	寿县东 保佐寺	迫降	本部 调查
	俄员	SB	B—1558		1		六安	迫降	同
第四 大队			E15		1		汉口	着地 不慎 失事	同
小计					3				
总计					3				

二月份空军军官受伤统计表 十八日

隶属	姓名	级职	受伤 日期	地点	原因	伤 势	现在地址	备考
俄员队	索罗基	驾驶员	十七	蚌埠	被敌击		六安 (或寿县)	
	府洛洛夫	轰炸员	同	同	同		同	
	齐受林	射手	同	同	同		同	
	罗瓦尼少夫	驾驶员	同	同	同		寿县保佐寺 (或六安)	
	福民尼	轰炸员	同	同	同			
	史留可夫	射手	同	同	同			
合计	六员							
附记								

空军战斗要报 2月19日

本(十九)日十三时三十分。我CB轰炸机六架，共携一百公

斤炸弹三十枚，二百五十公斤炸弹二枚，由国籍飞行员及俄员驾驶，自南昌出发，十四时到达安庆贵池间之石矾头附近。炸毁敌兵舰一艘，我机安全飞回南昌。

空军战斗要报(民国)27年2月21日

河南方面：

一、我新轰炸机八架，于九时，自汉口出发。十三时，在洛阳加油后，轰炸汾阳附近水头镇、大麦镇之线以东之敌。于十六时三十分，回抵西安。因外员语言不通，电话不便，致轰炸结果不明。拟俟明(二十二)日回汉口查明详报。

宜昌方面：

二、敌机九架，于十一时四十分，袭宜昌机场，投弹三十枚于场内，该场除旧跑道外，余在数日间不能用。

三、我新轰炸机十五架。由南昌出发，携带炸弹 5356 公斤(计共 100 公斤者 14 枚、50 公斤者 30 枚、20 公斤者 46 枚、8 公斤者 192 枚)，轰炸敌杭州机场，弹均落场内。

四、笕桥机场有敌机约八架，内有甚大者三架，并有翼黄色者一架正在滚行中。

五、我机投弹后，其中一架因油量不足降南城机场时两轮陷入土中，旋桨两页稍损毁，俟明(二十二)晨待修妥即可飞返南昌，余均安回南昌。(详情续报)

衡阳方面：

六、敌机八架，于午间袭衡阳，炸伤兵医院，死伤兵甚多，又职业学校亦被炸。

七、衡阳机场跑道被投弹，大者一枚，小者三十枚。尚无碍。装修之飞机中损坏四架如下：1. 可塞机一架，油箱炸漏，尚可修复。2. 马丁机一架，左翼稍损。3. 柏伦格机一架，稍损。4. 柏机一架，因弹片炸破油箱。以致焚毁。

八、我霍克驱逐机三架起飞应战。敌机高度约一万三千尺，我

机高度一万一千尺。我机向南追击至茶陵。战斗结果如下：1. 航校组长陈有维驾驶之霍克机汽缸被击伤。2. 敌机一架左边发动机，被我机射击伤。冒黑烟，并漏汽油。3. 我该霍克机大口径炮弹，因时间久，多锈，致发射时无效果，并每次格斗时，反易被敌机所乘。（详情续报）。

吉安方面：

九、吉安机场被炸后，我第二十七队新接收格机，在该场降落。其中许机一架，冲出场外，机翻，人无恙。柏机两架，在场内互撞，人无恙。（详情续报）。

十、我空军飞机损耗及现数如附表〔飞机现数表略〕

二月二十七日我方空军飞机损耗表

隶属	驾驶员	机名	号码	机数		地点	原因	报告者	备考
				可修	全毁				
	俄国	E15	97P— 5857	1		南昌 总站	着地不 慎失事	南昌 电报	人无 恙
第七 大队		可机	1209	1		衡阳	被敌 炸损	衡阳 电话	
		柏机		1	1	同	被敌机 炸毁	同	该二机系 新装就者
		马丁		1		同	被敌 炸损	同	该机系 新装者
第二 十七 队	孟广 信	许机	2703	1		吉安场	着地不 慎冲出 场外 翻身	南昌 电话	人无 恙
同	待查	柏机		2			同	着地后 互撞	同
小计				7	1				
总计				8架					

空军战斗要报 二月二十四日

二月二十三日战斗要报如下：

一、我 CB、新轰炸机，八时由汉口起飞。八架于十二时五分，二架于十二时二十五分，先后到达台北。该处敌机场停敌机甚多，被炸命中，棚厂亦被炸起火。事前似全无防空准备，既无高射炮射击，亦无飞机起飞驱逐。

我该十机于任务完毕后，回经丽水加油，除二架陷入泥中浆坏，俟明(二十四)日可飞回汉口外，均于十七时三十分安返汉口。

二、我 CB、新轰炸机十一架，内五架由我国飞行员驾驶，于八时三十分，由南昌出发，距台北约尚有二十分钟航程之处遇云，仍折回经丽水加油后，均返南昌。

(附飞机损耗及现数表共三纸)。[飞机现数表及新机现况表略]

二月二十三日我方空军飞机损耗表

隶属	驾驶员	机名	号码	机数		地点	原因	报告者	备考
	俄员	SB	$\frac{4}{44}$ B—1605	可修 1	全 毁	丽水	着落 失事	南昌 电话	人无 恙
	俄员	SB	$\frac{13}{44}$ B—1509	1		同	同	同	同
小计				2					
总计				2架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南昌方面：

一、十二时十五分，敌万头式轰炸机三十六架，驱逐机二十架，袭南昌，轰炸机九架一队，各架成密集队形，颇整齐，火力亦盛，惟投弹不多。

二、新机场被投弹九十枚,内有燃烧弹数枚,老营房被炸毁,我停机场之CB轰炸机一架被炸毁。

三、我机被击落E15驱逐机五架,E16驱逐机二架,内受损致不能修者四架,我飞行人员被击伤一员,死三员,生死不明二员,死者中有一跳伞不开致死者。

四、敌机被击落确实觅得者二架,此外,约六架下落待查。

二月二十五日我方空军战斗成果表

得力战斗人员	队别	击落敌机架数						击落地点	通知者	备考	
		待查	俄队员	侦察	驱逐	轻炸	重炸				水机
				1					南昌	南昌总站电话	详情待查
同上	同上			1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					同上	同上	同上
小计		8架									
总计		8架									

二月二十五日我方空军战斗成果表

隶数	驾驶员	机名	号码	机数			地点	原因	报告者	备考
				待查	可修	全毁				
	俄员	E15	P—5807			1	南昌附近	被击堕	南昌总站电话	
	同上	同	P—5812			1	同上	同上	同	人亡
	同上	同	P—5813			1	同上	同上	同	同上
	同上	同	P—5850			1	同上	同上	同	人伤
	同上	同	P—5858			1	同上	同上	同	
	俄员	E16	P—5339			1	南昌附近	被击损	南昌总站电话	人无恙
	同	同	P—5365			1	同上	被击坠	同	人跳伞未开亡
		SB	B—1532			1	南昌总站	被炸焚	同	
小计						3	5			
总计							8架			

二月空军军官死伤统计表 二十五日

隶属	姓名	级职	死伤日期	地点	原因	伤势	现在地址	备考
	俄员		25	南昌	抗战	重伤	南昌医院	
	同		同	同	同			人亡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合计								4员
附件								

[原编者注]以上各件选自国民党政府空军前敌总指挥报送军令部之空军“战斗要报”中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四月三日

四月一日战斗要报

汉口方面

本(一)日午前十一时二十分,我 SB 轰炸机三架,其带(50)公斤炸弹十二枚,(8)公斤炸弹七十二枚。由外员驾驶,飞赴鲁南峰县,轰炸敌军。于午后二时,到达峰县上空,发现县城之东关与南关内多处起火,城中人数甚多,并有密集部队,见我机至,秩序大乱,我当即投下大小炸弹八十四枚,均命中爆发,死伤敌军甚众,我机盘旋多时。来见敌机迎击,乃以任务完毕,成队安然飞回汉口。

[原编者注]此件选自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报送军令部之“空军战斗要报”中。

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十日

本(十)日,我志愿队驾 SB 机五架,各带百公斤弹四枚,八公斤弹二十枚,于十三时,由汉口出发,抵黄梅,改航东北,向至巢湖,复折向东南,以示侵袭芜湖企图,抵获港江面上空,忽回航西向,至铜陵对岸凤凰镇附近,发现江面兵舰,大小七艘,遂从四千公尺高度,关闭油门,减低声响,出其不意,于三千米许,一齐投弹爆发,随即爬升云上,俄复降至六百米侦察:敌舰一艘着火,渐沉;另一舰上之敌,纷纷跳水。敌舰高射炮乃于此时开始射击,我机上任务完成,整队沿江西向,见大通有敌舰六艘,贵池有三艘,均无弹轰炸,殊为可惜。于十六时十五分,安返汉口。谨闻。

附略图一纸[略]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本(十九)日,我 SB 机八架(分两队),由志愿队驾驶,于十五时二十分,自汉口机场出发,抵达安庆上空,发现江面敌舰五十余艘,即连续投弹。我第一、二两分队,各命中两敌舰起火,另一舰附

近中弹受伤。我机以任务完成，回头西向。其时有敌驱逐机十二架追来攻击，我机未受损。至十七时四十分，安返汉口机场。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要报

安徽方面：

二十日八时，我 SB 机九架，自南昌轰炸芜湖敌机场，至黄山山脉，遇大雾，折回南昌。十六时三十分，志愿队 SB 轻轰炸机四架由南昌出发，到达东流附近江面上空时，见有敌舰二十余艘，其停泊距离间隔较昨（十九）日为疏散，投弹命中二艘起火，并其中一艘沉没。敌舰高射炮向我机射击，敌驱逐机亦向我攻击，惟我机均无损害，而于十八时五十分安返南昌。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安庆方面：

（一）本（二十一）日，十六时三十分，据报东流方面，天气良好，派志愿队 CB 轻轰炸机九架，由南昌出发，惟我机到达东流附近时，天气转恶，致未完成任务，乃投弹于鄱阳湖中。于十七时四十五分，安返南昌。

（二）本（二十一）日，六时三十五分，志愿队 CB 轰炸机五架，由汉口出发，飞抵彭泽附近上空，与敌轰炸机及驱逐机各二架遭遇，当即对敌攻击，其驱逐机一架，被我击落，余机旋即逃避。斯时云幕甚低，我机前进受阻，致未完成任务，乃投弹于湖口江中。于十八时四十分安返汉口。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皖赣方面：

（一）二十二日，五时三十分，二十五队队长汤卜生，率霍克 III 式机三架，由南昌易出发，轰炸马当敌舰，中途遇雾，云低，罗盘不准而迷向。八时四十五分，油尽，迫降。

1. 汤队长机先降贵溪附近，人机均安，惟张队员耀南机降时，滚行速而撞伤汤队长机，张队员机亦轻伤。

2. 杨队员德仁机迫降弋阳附近,人机均安。

(二)二十二日,七时三十分,志愿队 CB 机二架,由南昌出发,轰炸敌舰,以天气不佳,于九时三十分折回。旋又由该队 CB 机一架出发,试测天气,因天气仍不佳,遂未施行任务。

空军战斗机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要报

皖赣方面:

二十三日十二时,志愿队 CB 三架,由南昌出发,轰炸东流附近敌舰,每机带一〇〇公斤炸弹六个。到东流之北时,发现敌舰三艘,当即投弹,有二架投中,见敌舰上发出黑烟,其时敌舰射击火力甚强。我机于十三时三十分,安返南昌。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要报

南昌方面:

(一)二十四日,十五时十分,志愿队 CB 机二架,由南昌出发,到达东流附近,发现敌舰多艘,当集中投弹,予以猛烈轰击,眼见二艘起火,余舰四散奔逃。我机任务完成,于十六时三十分,安返南昌。

(二)二十四日,十五时三十分,志愿队 CB 机三架,由南昌出发,到达香口附近,见敌舰十五艘,小汽船四五十只,并有敌人正在登陆。我机立予轰击,投下巨量炸弹,因有敌驱逐机五架,向我攻击,未及仔细观察弹着点而返,于十七时十五分,安抵南昌。

(三)二十四日十七时十分,志愿队 CB 机四架,由南昌出发,到达东流附近,发现敌舰船仍众,乃再施轰炸,投弹后,眼见浓烟笼罩两敌舰,结果未明,当 CB 机出发时,得知敌驱逐机十五架,自获港西南飞行,有截击我机之势,我乃派 E15 及 E16 驱逐机各六架出发,掩护轰炸,到达东流附近,见敌驱逐机整队西来,因我 CB 机已投弹完毕,任务完成,乃掩护归来,未向敌机攻击。敌机见我有备,亦不敢穷追。

(四)本日由南昌出发之各 CB 机,每机均携一〇〇公斤炸弹

六枚。

汉口方面：

(五)二十四日，九时十五分，志愿队 CB 机三架，由汉口出发，到达东流时，见敌舰靡集，乃以三千公尺高度，向敌舰投弹，炸中大舰一艘起火。其时有敌九五式驱逐机数架，向我追来。我机转舵西飞，于十时五十五分，安返汉口。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汉口方面：

(一)二十五日，六时三十分，志愿队 CB 三架，由汉口出发，于七时五十五分到达安庆上空，时安庆机场并无敌机，江面泊敌舰大小舰二十余艘，及汽船三四十艘，乃集中投下炸弹，命中舰群，计炸伤敌大舰三艘。其时敌九五式驱逐机六架，及水上驱逐机一架，向我机攻击，因我机速度甚快，敌无法追及，于九时二十分，安返南昌。

南昌方面：

(二)二十五日，六时五十分，志愿队 CB 机十架，由南昌出发，经祁门而赴芜湖，到达目的地时，见敌机场停机五架，乃投下炸弹于场中，命中停机线上。其时东北方，有敌机追来。我机急转舵西航，其机种机数，未能明悉。芜湖方面，泊有各种颜色之敌兵舰三十至四十艘，内有一艘，向我机开炮射击。我机毫无损伤，于九时五十分，安返南昌。

(三)二十五日，十五时，志愿队 CB 机七架，由南昌出发，内一架，中途故障，折回。十五时二十分，志愿队 E16 式驱逐机七架，由南昌出发，掩护 CB 机。全体轰炸驱逐机会合后，于十五时四十分到达东流江面上空，发现江中泊敌舰甚多，乃对准其密集处，投下巨量炸弹，结果如下：

1. 第一小队 CB 三架，投弹命中二艘，见有向下沉没之势，旋即发现敌驱逐机二十一架，分三队向我机进袭。我机乃开足油门

避之，而于十七时分安返南昌。落地后检查，得知二架油箱被击漏，一架尾部之安定面被击微损，惟均可于一二日后修妥。

2. 第二小队 CB 机三架，发现敌舰五艘，内四艘相靠而泊，其余一艘，泊处较远，当即投弹于四舰之间，旋见黑烟冲天而起，敌舰全被烟火包围，似有多艘被命中者，我机旋安返南昌。

3. E16 驱逐机七架，亦分为数小队，当发现敌驱逐机九架，向我第一小队 CB 机进攻后，立即趋前救护，该敌驱逐机见有我驱逐机掩护，乃向东逃去。我驱逐机见 CB 机均已完成任务，向西南飞返，故未与敌机缠斗，仍掩护我轰炸机安返南昌。

(四)二十五日，十五时四十五分，志愿队 CB 机三架，由南昌出发，到达安庆机场上空时，发现敌驱逐机十五架，停于一线上，当即瞄准投弹，旋见黑烟上腾，多数均命中敌停机线上，旋发现空中有敌驱逐机三架警戒，“由此推断，其停机场之该十五机，想系飞返加油者，”并向我机攻击，我机三架，乃均加足油门飞避，经安庆附近江面上空时，见有敌大舰一艘，正燃烧中。后经东流方面上空，亦见敌舰一艘，在燃烧中。此当系我本(二十五)日先行出发各机之轰炸成果也。我机于十七时五十分，安返南昌。

空军战斗要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要报

南昌方面：

(一)本(二十六)日，五时，二十五队霍克Ⅲ式机三架，各带五〇〇磅炸弹一枚，由南昌出发，轰炸香口敌舰，于六时到达香口东北之天生洲，于该洲之东西两面，发现敌舰二十余艘，其中大型二艘，余为小型者，并有汽艇甚多。此时，我机高度九千英尺，俯冲至二千尺投弹，二弹齐中大型舰，火烟甚大，一落舰旁。斯时敌之防空火网甚密，惟炮弹炸点较低，约在千尺左右，由曾培复驾驶之霍Ⅲ式机 P—5193 风档被击中，人微伤，尚勉力飞行，致未能跟随领队机，偏航至新喻，迫降机损，人轻伤，其余两架，则安全飞返南昌。

(二)(二十六)日，五时二十分，志愿队 CB 机六架各带一〇〇

公斤弹六枚，由南昌出发，轰炸东流敌舰，在东流上游附近一带，见大型舰二、小型舰九，小汽艇甚多，乃投弹于各舰之间，成果未详。我 E16 驱逐机八架，于十七时二十五分出发，在香口一带掩护。八机中，俄员驾驶者三，第四大队驾驶者五，由俄员领队。据报：未见敌机，仅见香口江面之敌舰，火烟甚大。各机于七时返南昌。

(三)本(二十六)日，七时，志愿队 CB 机三架，各带一〇〇公斤弹六枚，由南昌出发，轰炸安庆机场，见敌机四架，停车场，场内弹坑甚多。我机此时高度，为四千公尺，当即投弹，均命中场中，据判断：该场数日内，当不能使用。斯时，敌方高射炮射击猛烈，惟炮弹炸点均在我机后方。我机任务完毕，于十时半，安全飞抵汉口。惟 CB—B1573 号机，于着陆时，两腿复行缩入。因而失事，计左腿螺旋桨及腹部包皮均遭俱伤，人员安全，该机尚可修理。

(四)本(二十六)日，九时三十九分，南昌第一路张司令，接繁昌报告：敌机三十七架，由东向西飞，高度约二千五百公尺。十时，据殷家汇报告：因天气渐阴、云低，仅闻机声甚多，由东北向西北飞行。同时，据繁昌报告：又发现敌重轰炸机九架，由东北向西南飞行。十时十四分，据大通报告：九架重轰炸机，由西北向西南飞行。此后，前述两批敌机，于到殷家汇后，即未据报告。

十时二十五分，张司令官判断：恐被敌奇袭，即派单翼驱逐机六架起飞，分两组：一在南昌之东，一在南昌之北巡逻，在场之 CB 机及霍Ⅲ机，全数飞避。吉安奉命之六驱逐机，于十时三十分起飞，十时四十五分，CB 及霍Ⅲ均起机。

一时五十分，场北上空，忽发现敌与我三机战斗，而留场之 E15、E16 驱逐各机，乃全体起飞，计志愿队驾 E16 式十架，E15 式十八架，第四大队驾 E16 式五架。斯时，天雨，云低。至十一时，雨愈大，战斗经过不明。至十一时三十分，雨停。第一批之敌机，已被我击落两架，一坠南昌附近扬子洲，一坠青洲沙滩，为俄员古班克所击落。十一时四十分，我第一批之六机降落加油。第二批

起飞之大部飞机,仍在空中警戒。十二时,敌重轰炸机三架,忽由东方云中穿出,并有敌驱逐机六架掩护。此时高云约一千五百公尺,我在空中之驱逐机,即向敌机攻击,发生猛烈混战,在云雾中滚滚乱翻,旋出旋入,呈空战中空前之混战奇观。斯时,敌轰炸机乘隙窜入场之上空投燃烧弹十二枚于第二三棚厂附近,我待修之CB B—1506、B—1534、B—1568 三架翼部,被弹片轻伤数小洞,待修之霍Ⅲ式P—5268 一架支柱,亦微伤少许,场边之50加仑装铁桶汽油一桶被焚,并未延及他物,损失轻微。第二次战斗结果:击落敌机三架均为驱逐机,此时敌机经我痛击,队形零乱,利用低云,落荒逃遁,惟尚见我四驱逐机正包围一重轰炸机射击,黑烟四出,高度逐渐降低,向东飘落,我机乃安返。

总计:共击落敌机六架。据报,尚有坠于水中者。我E15机P—5904由俄员史托维驾驶,壮烈牺牲于南昌东北之北高嵩。俄员古班克所驾之E16P—5379,则因机被击坏,跳伞安全降落,机则全毁,坠于场之南端。

六月二十六日我方空军飞机损耗表

隶数	驾驶员	机名	号码	机名			地点	原因	报告者	备考
				待查	可修	全毁				
志愿队	俄员	S. B.	5P—1573		1		武汉总站	着地不慎损坏	总站电话	人无恙
同	同	E16	92P—5904			1	南昌东北高嵩	被敌击坠		人亡
同	同	E16	89P—5379			1	南昌场南	同		人跳伞无恙
第二十五队	曾培复	霍机Ⅲ	P—5379		1		新喻	被击损迫降		人微伤
小计					2	2				4架
总计										4架

六月二十六日我方空军军官死亡表

隶属	姓名	级职	死亡时间	地点	原因	死亡情况	备考
志愿队	史托维		二十六	南昌东北北南嵩	被击落	人亡	
合计		一员					
附计							

六月二十六日我方空军战斗成果表

得力战斗人员	队别	击落敌机架数						击落地点	通知者	备考
		侦察	驱逐	轻炸	重炸	水机	待查			
俄员	志愿队		五				重炸一	南昌附近阳子洲一架		
								青洲沙滩一架,余待查	南昌王参谋长	
小计			五				一			架
总计		六架								

[原编者注]以上各件选自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报送军令部之“空军战斗要报”中。

九月份我方空军轰炸成果统计表

日期	隶属	领队	机名	架数	炸弹			目标			爆炸概况	报告者	备考
					重量(公斤)	个数	信管	地点	种类	数量			
7	志愿队	习美 脑光	SB	6	2280	78	延期	九江上游 龙坪镇 附近	敌舰	甚多	三大型舰受 伤冒烟小型 损坏数目未 能判明	张廷孟	
27	志愿队第 一大队	俄员	SB	7	3220	182	碰炸	罗山西北 罗山西罗 山东竹杆 铺后	炮兵阵 地密集 部队分 进纵队		全数爆发命 中炸毁敌炮 兵阵地死伤 敌军甚多		
27	第二十四 队第二十 六队	苏显仁	E16	9				同			机枪扫射		该两队 系掩护 任务

九月份我方空军战斗成果报告表

日期	隶属	得力战斗员	级职	击落敌机		击落地点	证实者	备考
17/9	志愿队			驱逐	2	待查	第一路司令部	
28	官校	姚杰	少尉教官	重炸	1	宜良县之 狗街	周至柔 2820 参 丁龙电云俭电	
28	官校	周庭芳 苑金函	上尉教官中 尉教官	重炸	1	昆明路南	周至柔 2820 参 丁龙电云俭电	
28	官校	杨绍廉 黎宗肇	中尉教官见 习官	重炸	1	昆明路南	周至柔 2820 参 丁龙电云俭电	
总计				5架				
附记								

十月份我方空军轰炸成果报告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2	志愿队	罗山	敌阵地	数处起火损失不明	C. B.	8		238	第一路司令部	
2	第26、24队	罗山	敌阵地及公路上之马车	扫射后死伤不少	E16	12			第一路司令部	
3	志愿队第一大队	阳新	敌桥梁及炮兵阵地	因云雾甚低误认目标未达目的	C. B.	8		222	第一路司令部	
5	同	罗山	敌炮兵阵地	浓烟四起成果甚佳	C. B.	9		252	第一路司令部	
5	第26、24队	同	同	低空扫射	E16	10			第一路司令部	
6	第一大队志愿队	同	同	因云低成果不明	C. B.	7		178	第一路司令部	

续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6	第十三队	箸溪瑞昌间	敌后方部队	因云低未投弹仅散发传单	北美 48	1	180 公斤	10	该队报告	
10	第十三队	武穴田家镇	敌舰	因夜间云低成果不明	同	1	180 公斤	10	该队报告	
10	第十三队	田家镇	敌舰	轰炸五枚成果不明并散发宣传品	同	1	180 公斤	10	该队报告	
11	第十三队	瑞昌	敌阵地	云低未能判明目标仅散发传单	同	1	180 公斤	10	该队报告	
12	第十三队	万家岭张牯山	同	投弹时敌我炮战甚烈因天黑成果不明	同	1	360 公斤	20	该队报告	
附记										

十月份空军军官死亡统计表

隶属	姓名	级职	死亡日期	地点	原因	死亡情形	備考
士校	郝鸿藻	上尉本级教官	三日	成都	失事殒命	飞行失事机损人亡	
官校	薛润生	八期生	三日	昆明	失事殒命	在三千尺高度作小转弯螺旋下坠	
第二队	刘光正	轰炸员	六日	衡山	阵亡	工作回航迫降机损人亡	
志愿队	尔拉夫猛 诺	大队长	九日	衡阳	阵亡	敌机夜袭起机迎击被敌击坠	
第三十队	周竹君	上尉本级队长	十二	钟祥	阵亡	由汉飞襄被敌邀击阵亡	
士校	陈民	中尉本级教官	十二	成都	失事殒命	在二千尺高度练习小转弯失迷下坠	
第二十七队	卜镇海	少尉本级队员	十七	西古城	失事殒命	在二千五百尺练日格斗头速成尾螺旋坠地	
第二十二队	陈家灼	少尉本级队员	十八	兰州附近	失事殒命	练习失事伤重殒命	
士校	刘为植	学生	十九	成都	地面殒命	误触螺旋旋臂头殒命	
合计					阵亡3员失事殒命5员地面殒命1员共9员		
附记							

[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近代史研究所抄件]

桂南会战空军战斗统计表
1939年11月—1940年1月

月日	队号	机种	机数	携带弹药量		任务	结果	行动		备考
				子弹	炸弹			时间	起止	
十二月二十一日	费金	CB	九	俄 7,62—36000	100kg—36 100kg—18	轰炸钦湾 州敌舰	炸弹于广 州湾西及深 海面山中	自七时六分	桂林起 飞	速途油尽 三架迫降五 牛头羹五 架降郴县 机场,一架 迫降郴县
同上		E15格	—〇、 三	俄 7,62—2400 美 12,7—2500 比 7,9—6000		往昆仑带敌 驱逐敌 轰炸机	对敌阵地 俯冲扫射 二次	自十二时 五十分, 自十四时 二十八分 至十六时 三十分	桂林 自柳州起 至柳州起 落	
十二月二十二日		E15格	三九	比 7,79—6000 俄 7,62—21600 美 12,7—2750		昆仑掩护 上空我陆 军攻击	地面部队 未扫射	自七时二 十五分至 九时四十 五分	柳州起 落	误伤 我军

续表

月日	队号	机种	机数	携带弹药量		任务	结果	行动		备考
				子弹	炸弹			时间	起止	
同上	三六、四六	E15格	一、一〇	俄 7,62—2400 美 127—500 俄 7,62—4800		在柳州迎击敌炮轰炸机十八架	击落敌机一架 敌机二名毙命 数名在逃	十一时三十分至十三时三十分返航	柳州战斗至来宾来	
同上	四六	E15格	九	美 12,7—2250 俄 7,62—21600 美 12,7—2500		敌九架在柳州上空警戒	未遭遇	自十六时至十八时三十分	柳州起落	十八时五十九分敌在林投弹
同上	六六	CB	三	俄 7,62—12000	50kg 燃—12 1000kg 爆—6	南宁敌据点亭子圩仓库	分别在南宁及亭子圩投弹	七时三十分至十四时五分	秧塘起落	迷途追降封川
二十五日	费金	CB	三	俄 7,62—12000	10kg—49 50kg 燃—12	轰炸九塘敌阵地	转往南宁投弹甚烈	自六时四十分至八时五分	秧塘起落	地面未铺符号恐误炸友军

续表

月日	队号	机种	机数	携带弹药量		任务	结果	行动		备考
				子弹	炸弹			时间	起止	
同上	费金三大	CB格	三一	比7.9—2000 俄7.62—12000	10kg 杀—48 50kg 燃—10	轰炸九塘敌阵地掩护井指示目标	助陆军占领据点四处	自十二时五十分至三十六分自十四时四十分	秧塘柳州起落	
同上	四六、五六、十八	E15、H75	一〇、一〇、五	美12.7—1000 比79—9000 美12.7—2500 美12.7—2500 俄7.12—24000		迎击	敌机一架受伤害我机损伤六架	自十六时十分至十八时	芷江起飞	
二十七日	费金、三六	CB格	三三	比7.9—6000 美7.12—12000	10kg 杀—48 50kg 燃—6	轰炸九塘、敌阵地掩护	未投弹飞回击我机均毁	自九时至十一时五十分自九时三十分	秧塘起落柳州起飞	遇敌机驱逐机九架水机六架

续表

月日	队号	机种	机数	携带弹药量		任务	结果	行动		备考
				子弹	炸弹			时间	起止	
同上	十八	H75	五	美 12.7—1000 比 7.9—9000	409 爆—12	轰炸亭子圩屯集地区	三处冒烟 并枪扫射 我伤一架 毁一架	自十三时 五十分		遇敌驱逐架 机数 战斗
二十 五 八日	四六、 五六、 十八	E15— H75	八、七、 一	俄 7.62—19200 俄 7.62—10800		迎击	我一机追 降微损	自六时三 十五分	秧塘起 落一机 降柳州	
二十 九日	十八、 四六	H75 E15	二 三	美 12.7—750 俄 7.62—7200 美 12.7—400 比 7.9—3600		侦察绥 涪山圩 敌情迎 击	见敌机受 伤冒烟	自九时三 十五分至 十三时四 十分约十 时起飞	秧塘 起落	
三十 日	志愿 四六	E15 E16 E15	一六、 九、 一七	美 12.7—7250 俄 7.62—47200 俄 7.62—40400 俄 7.62—2600 俄 20—690		迎击	击落敌机 三架我机 毁伤十二	约十三时	柳州 起落	敌驱逐机 十八架

续表

月日	队号	机种	机数	携带弹药量		任务	结果	行动		备考
				子弹	炸弹			时间	起止	
三十一日	费金	CB	三	俄 7.62—12000 美 1.27—4250	100kg 爆—18	轰炸南 宁敌机 场	命中爆 均发毁 敌机八 架	自八时 三十六分 至十三时	秧塘 起落	
一月一日	五六	E15	六	美 12.7—1500 俄 7.62—14400		迎击	击落敌神 风号侦察 一架	自十时三 十分	零陵 起落	
同上	志愿	E15 E16	二三	俄 7.62—10000 俄 20—640 俄 7.62—5600 美 12.7—250		迎击敌 侦察机 一架	未遭遇	自十二时 五十四分 至十三时 二十九分	秧塘 起落	
同上	四六	E15	六	美 12.7—1500 俄 7.62—1400		同上	未击落	自十三时十 分至十四 时十分		
二日	志愿	E15 E16	二三	俄 7.62—5000 俄 7.62—4800 美 12.7—500		同上	攻击一次	八时顷	秧塘 起落	

续表

月日	队号	机种	机数	携带弹药量		任务	结果	行动		备考
				子弹	炸弹			时间	起止	
同上	费金	C. B.	三	俄 7.62—1200 俄 20—384	10kg 杀— 72 50kg 燃— 65	轰炸九塘敌阵地	至柳州因雾折回	十二时四十二分	同上	
三日	志愿	E16	三	俄 7.62—6000 俄 20—384		迎击敌侦察一架	稍接触被敌遁去	十二时四十三分	同上	
四日	费金	C. B.	四	俄 7.62—10000	10kg 爆—24	轰炸南宁敌机场	误投贵县附近	九时二十五分	同上	
同上	志愿、十八	E15 E16 H75	一二七	美 12.7—200 比 7.9—1800 俄 7.62—18000 俄 20—640 美 12.7—1250 俄 7.62—37000		迎击机九架	未遭遇	十时半左右至十一时四十六分	同上	
五日	志愿	E16	五	俄 7.62—10000		迎击敌侦察一架	同上	八时四十五分	同上	

续表

月日	队号	机种	机数	携带弹药量		任务	结果	行动		备考
				子弹	炸弹			时间	起止	
六日	志愿	E16	六	俄 7.2—1400 俄 20—640		敌 侦察机 一架	未 遭遇	十三时二 十一分	秧塘 起落	
七日	志愿 十九	C.B.	五四	俄 7.62—10000 俄 7.62—20000	50kg 爆—72	南 敌 阵地	见 炸后 南宁 冲天	四 十二分至 五 十六分 十七分	秧塘 起 落 一架 零陵 降落	
八日	费金	C.B.	六	俄 7.62—24000	50kg 爆— 12 100kg 爆— 24	土 炸 塘 敌 地 标 副 南 宁	于 南 宁 市 区 北 郊 投	五 十二分至 四 十五分 十八分	秧塘 起 落	未 有 三 机 能 回 弹
九日	志愿	E15 E16	一 三、 七	俄 7.62—18000 俄 20—640 美 1.27—1250 俄 7.62—37600		迎 击 敌 机	遇 敌 一 架 机 击 一 次	十 四 时 四 分 起 飞 十 二 分 降 落 又 三 十 分 起 飞 至 十 七 分	同 上	十 二 时 降 落 十 五 分 加 油

续表

月日	队号	机种	机数	携带弹药量		任务	结果	行动		备考
				子弹	炸弹			时间	起止	
十日	费金、 十九	C. B.	六三	俄 7.62—12000 俄 7.62—2400	50kg 爆—18 100kg 爆—36	轰炸南 宁敌机 场	炸毁敌机 三架	九时四 十分	秧塘 起飞	十九队撞 毁二架黄 金迷途迫 降辰溪沿 河
同上	志愿	E15 E16	一四、 一七	俄 7.62—20000 俄 20—512 美 12.7—1000 俄 7.62—41600		迎击敌 驱逐机 二十七 架	战斗后我 伤人员二 架	十一时五 十分	秧塘 起落	
十一日	志愿	E15 E16	二二二	俄 7.62—1000 美 12.7—10000 俄 7.62—36800		迎击敌 侦察机 一架	攻击一次	九时十三 分	同上	
同上	志愿	E16	一	俄 7.2—4000 俄 20—128		同上	未遭遇	十时四十 五分	同上	

第二表 飛行統計表
 桂南會戰我空軍部隊飛行統計表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月

月 日	隊 號	機 種	機 數	行 動		備 考
				時 間	起 止	
十二、八	第十八大隊	75 式霍克	六	十五時四十六分 到達	由昆明至貴陽	落地時損壞一架
十二、十三	第五大隊第 二十六隊	E16	五	午 前	由成都起飛	飛至龍泉驛，因遭風 雨不能通過，復返成 都。惟第二十六隊二 機通過龍泉驛後，沿 嘉陵江飛至重慶。
同上	第二十七隊	E15	五	午 前		
同上	第二十九隊	E15	三	午 前		
十二、十六	第五大隊	E15	九	十二時到達	由成都至重慶	
同上	第五大隊	E16	三	十二時到達	由成都至重慶	
同上	第十九大隊	CB	九	十一時零五分起飛	由双流至梁山	

续表

月 日	队 号	机种	机数	行 动		备 考
				时 间	起 止	
同上	志愿费金队	CB	九	十二时四十五分起飞,十五时十一分到达	由温江至梁山	
十二、十八	第十九大队	CB	九	十时二十五分起飞	由梁山起飞	敌机袭梁,起飞后,四架落遂宁,一架飞降重庆,四架仍落梁山。
同上	志愿费金队	CB	九	十时二十五分起飞	由梁山至遂宁继续回成都	警报起飞
十二、十九	第十九队	CB	四	十三时五十分起飞,十六时四十五分到达	由梁山至衡阳	
同上	志愿费金队	CB	九	十六时三十分到达	由成都至梁山	
同上	志愿卓泊大队	CB	七		由成都至遂宁	

续表

月 日	队 号	机 种	机 数	行 动		备 考
				时 间	起 止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十八		由重庆起飞至 黔阳迫降湘江	迫降湘江者十三架， 其余三架迫降洞口， 二架落黔阳附近，榆 林沙滩上，一架落零 陵附近
同上	志愿队	E16			由重庆起飞降 落白市驛	
十二、二十	第四大队	E15	八四	九时三十五分到八 架，十时零五分到 四架	由湘江到芷江	系十九日迫降湘江六 十三架，一架仍在洪 江，一架在芷江落地 损坏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十一	十三时零四分起飞	由芷江至桂林	
同上	第十八队	75 式 霍克	五	五十四时五十五分 起飞	由贵阳至桂林	因天气不佳于十五时 十八分折回贵阳
十二、二十	第十九大队	CB	三	十三时起飞十三时 五十分到达	由衡阳至桂林	

续表

月 日	队 号	机种	机数	行 动		备 考
				时 间	起 止	
同上	志愿费金队	CB	九	十三时四十分起飞	由梁山至桂林	
同上	志愿卓泊 夫队	CB	九	十三时五十分到达	由遂宁至重庆	一架至白市驿,一架 至广阳坝,其余七架 中途折回
十二、二十二	DB 重 轰 炸队	DB	一	十四时四十五分起 飞,由兰州至成都		
同上	志愿队	E15	七	十时零五十分起飞	由兰州至遂宁	
同上	同上	E15	二	十时零五十分起飞由 兰州至汉中		
同上	第五大队	E15	五	十四时二十五分 到达	由成都至重庆	
同上	第十九大队	CB	二	十二时五十分到达	由遂宁至白 市驿	
十二、二十三	第四大队	E15	十一		由柳州至零陵	

续表

月 日	队 号	机 种	机 数	行 动		备 考
				时 间	起 止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七	十四时四十九分 到达	由重庆至芷江	
同上	第五大队	E15	十四	十四时四十九分 到达	由重庆至芷江	
同上	志愿队	E15	十二		由重庆至芷江	中途折回
同上	志愿队	E15	三五	十五时二十分到 达,十五时三十分 到达	由遂宁至重庆	系于二十二日由兰州 至遂宁者
十二、二十四	志愿队	E15	十七	十四时二十分起飞	由重庆起飞	中途折回
十二、二十五	第十八队	75式霍克	五	九时四十五分起 飞,十时四十分 到达	由贵阳至芷江	
十二、二十六	第十八队	75式霍克	三	十四时五十三分 起飞	由芷江到桂林	

续表

月 日	队 号	机 种	机 数	行 动		备 考
				时 间	起 止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十八	十五日零六分起飞	由芷江到桂林	
同上	第五大队	E15	十一	十五时零六分起飞	由芷江到桂林	
十二、二十七	第十八大队	75式霍克	二	十四时十六分起飞	由芷江到桂林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八	十五时十分起飞	由桂林至零陵	
同上	志愿卓泊夫队	CB	七	十五时二十分到达	由遂宁至白市驿	
同上	志愿队	E15	十八	十五时三十五分到达	由重庆至芷江	
十二、二十八	志愿队	E16	十一	十四时三十分起飞,十六时十八分到达	由重庆至芷江	原起飞十三架,中途折返两架
十二、二十九	第四大队	E15	八	十六时十分起飞	由桂林至柳州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九		由零陵至柳州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二	十五时十五分起飞	由桂林至柳州	

续表

月 日	队 号	机 种	机 数	行 动		备 考
				时 间	起 止	
同上	志愿队	E15	十八	十五时十五分起飞,十六时四十分到达	由芷江至桂林	
同上	志愿队	E16	十	十五时二十五分起飞,十六时四十分到达	由芷江至桂林	
十二、三十日	志愿队	E15	十七	六时三十分起飞,九时二十分到达	由桂林至柳州	起飞时间根据桂林站,呈报到达时间,根据柳州站呈报
同上	志愿队	E16	九	六时二十五分起飞,七时四十分到达	由桂林至柳州	
十二、三十一	第四大队	E15	十一	十四时四十分到达	由桂林至芷江	
同上	第五大队	E15	十	十三时二十五分起飞	由桂林至零陵	
同上	志愿队	E15、E16	十六、九	七时二十分起飞,七时五十分到达	由柳州至桂林	

续表

月 日	队 号	机 种	机 数	行 动		备 考
				时 间	起 止	
廿九、一、一	第四大队	E15	五	七时三十五分起飞	由柳州至桂林	
一、二	志愿卓泊夫队	CB	八	十四时三十五分起飞	由白市驿至桂林	
同上	第十九队	CB	五	十四时三十五分起飞,十七时七分到达	由白市驿至芷江	
同上	第五大队	E15	九	十四时三十分到达	由零陵至芷江	
一、三	志愿卓泊夫队	CB	一		由宝庆至桂林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六	十二时三十分起飞,十三时三十五分到达	由桂林至芷江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十	十四时四十四分起飞	由芷江到重庆	系于上月三十一日由桂林至芷江者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六	十二时十五分到达	由芷江至贵阳	
同上	第四大队	E15	六	十三时四十五分起飞	由贵阳至昆明	

续表

月 日	队 号	机 种	机 数	行 动		备 考
				时 间	起 止	
同上	官校	E15	五		由昆明至蒙自	
一、六	第五大队	E15	九	十三时五十七分起飞	由芷江至零陵	
同上	第八大队	DB92	一		由成都至昆明	中途折返
一、七	第十八大队	75式霍克	五	十二时十八分起飞	由桂林至芷江	
同上	第八大队	75式霍克	五	十五时三十分	由芷江至昆明	
一、十一	第八大队	DB92	一		由成都至昆明，由昆明返成都	
一、十二	第十九大队	G. B	三	十四时三十分起飞，十六时二十分到达	由芷江至重庆	
同上	第五大队	E15	十	十四时由零陵至芷江，十四时四十分由芷飞渝，十六时二十分到重庆	由零陵至重庆	
同上	志愿队	E15 E16	十六、九	由桂林经零陵加油至重庆		

第三表 战斗成果统计表(略)
 第四表 桂南会战空军轰炸成果统计表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一月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十二、二十一日	费金大队	钦州湾海面	敌舰	炸弹于广州湾西营附近海面及深山内	CB	9	100kg—36枚 50kg—18枚	4500公斤	第二路司令部报告	
二十一日	第四大队	昆仑关	敌阵	俯冲对敌地面部队连续攻击三次	E15	10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三大队	同上	同上	同上	格机	3			同上	
二十二日	第六大队第十队第九队	南宁	城	炸弹命中市区北部公路交叉附近及对江亭子圩(敌军实处集地)等处	SB	3		900公斤	同上	

续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二十五日	费金队	南宁市	东南角	当即起火	CB	3		1080公斤	同上	
同上	费金队	八塘 九塘	村落敌 据点	炸中八塘， 敌军纷逃， 陆军乘机突 击克复数堡	同上	3		1140公斤	西南行 营电告	三格架指 由第一航指 大队机领示 目标
二十七日	第十八中队	南宁亭 子圩	敌阵	命中亭子圩 敌军屯集 地，并俯冲 扫射敌车辆	霍克 75式	5		60公斤	空军第二 路司令部	
二十九日	第十八大队	侦察绥 绿至南宁	敌情	1. 亭子圩 一带无动静 2. 邕绥公 路一带沿途 无动静 3. 南宁亭 子圩间搭有 浮桥	霍克 75式	2		同上		

续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三十日	费金队	南宁	敌机场	炸弹命中炸毁敌机八架	CB	3		1800 公斤	同上	
一月四日	费金队	同上	同上	炸弹命中炸毁敌机四架	同上	4		2400 公斤	同上	
七日	费金队	同上	敌阵地	轰炸成绩良好,曾目睹南宁火焰冲天	同上	5		200 公斤	同上	
同上	第六大队第十队九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4		1600 公斤	同上	
八日	费金队	同上	市区	炸弹于南宁市区北部	同上	6		3600 公斤	第二路司令部报告	
十日	志愿队	同上	敌机场	炸毁敌机三架	同上	6		3600 公斤	参谋总长室元月十六日函,据白主任真电	

附记:

第五表 敌机在我境内损伤统计表(略)
第六表 空军作战人员负伤统计表

桂南会战空军作战人员负伤统计表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至十九年一月							
隶属	姓名	级职	负伤日期	地点原因	伤势	现在地点	备考
第二十七队	王殿弼	中尉本级副队长	十二月二十五日	芷江阵伤	空战着落右上下眼皮裂伤		
同上	张鸿藻	少尉本级飞行员	同上	同上	空战降落右上下眼睑裂伤		
第八队	陈业新	中尉本级副队长	同上	思陵同上	空战被击背腰及手各中一弹面部火伤		
第三大队	陈端铤	上尉本级副大队长	同上	同上	空战被击面手腕各部二期火伤		
第十八队	冯俊忠	少尉本级飞行员	同上	芷江阵伤	因螺旋桨变距在追击敌机时失速跳伞受伤		
第四大队	郑少愚	上尉本级副大队长	三十日	柳州阵伤	空战被击伤足趾		

续表

桂南会战空军作战人员负伤统计表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至十九年一月							
隶属	姓名	级职	负伤日期	地点原因	伤势	现在地点	备考
志愿队	业尔硕夫	同上	同上	同上	空战被击伤头部		
同上	沙也金	同上	同上	同上	空战被击伤腿部		
第十九队	李衍谔	少尉本级飞行员	一月十日	中渡阵伤	出发南宁中途两机相撞受伤		
第十九队	高鸿宾	少尉本级轰炸员	一月十日	中渡阵伤	同上		
志愿队	日本切果士八	同上	同上	柳州阵伤	空战上唇受伤		
第十九队	谷焕民	少尉本级通讯员	同上	中渡阵伤	出发南宁受伤		
合计	十二员						
附记							

第七表

桂南会战空军作战人员阵亡统计表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一月						
隶属	姓名	级职	阵亡日期	地点	阵亡原因	备考
第三十二队	韦一青	中尉上级队长	十二月二十五日	思陇	空战被击阵亡	
志愿队	李辛克		三十日	柳州	同上	
第二十一队	李侃	少尉本级飞行员	一月四日	蒙目	空战着落撞树重伤不治殒命	
第十九队	黄兴安	少尉本级轰炸员	十日	中渡	出发南宁两机相撞损命	
同上	姬晓集	射击士	同上	同上	同上	
志愿队	金爵洛哥	队员	同上	沿河	出发南宁回迫降殒命	航迷途
合计	六员					
附记						

第八表 飞机损耗统计表(略)

第九表 油料消耗统计表其一其二(均略)

第十表 弹药消耗统计表(略)

第十一表 损机修理统计表(略)

(以下均略)

(摘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河北省的游击队

(1938年3月10日)

B. 罗戈夫

活动在日本后方的很多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中,大概最有声望的是活动在北平地区和河北北部的游击队。

北平以东、以南和战争开始的一些地区(昌平、怀来、阜平),自发产生了若干个主要由农民和退却部队中掉队的士兵组成的游击小分队。9月底,这几支游击小分队的代表在西山相会,决定联合起来。10月19日,他们组成了人民抗日游击军。

河北省北部的抗日游击运动目前分布在五个地区:察哈尔边区、北平地区、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之间的北平以南地区、天津地区和河北东部地区。

在察哈尔边区活动的是一支有两千人的骑兵游击队和若干个步兵游击小分队。最近,这些游击队与热河省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该区游击队的根据地是怀来县,从这里,游击队可以袭击平绥铁路。

在北平地区,最初有几支游击队,后来其中一部分随着中国军队撤退了,另一部分留了下来。前不久出现的几支游击队,目前在河南北部的太行山区活动。全省最优秀的游击队是赵东(译音)游击队。该队有两千多人,活动在北平市郊。这支游击队的队长从前是奉天省(现在的辽宁省)游击队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游击队里,安排了政治工作并举办宣传员培训班,由北平的大学生任训练班的教师。

阜平县实际上在去年7月7日就开始了战争,现在游击队已控制该县三分之一地区。从良乡到宝坻沿铁路往东的六个县,实际上没有被日本人控制。日本人甚至无力在这些县设立自己的行政机关,因为要“保卫”新的行政机关免遭游击队的袭击就需要有自己的警备队。留在当地的仍然是原来的中国行政机关,它仍旧征收赋税,在各机关的上空飘扬着中国的国旗。赵东游击队的队员不仅遍及乡村,而且也分布在北平。日本人非常清楚,游击队在北平市场上,在西直门、宣武门附近购买他们所必需的物品。但是,日本人无法抓住他们。居民不仅把游击队员隐藏起来,而且还把物品廉价地出售给他们。日本人总要有一个连或一个营才敢到城外去。对侵略者的憎恨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日本军官或士兵晚上都害怕在街上和城里露面。

这个地区游击队的状况,在《园明新闻周刊》的记者与河北北部抗日游击军司令员的谈话中描述得非常详细:

“北平附近的游击队创建时只有五个人。后来,当我们对沙河和清华园站(离北平八公里的东北郊)的日本人进行第一次袭击时,曾有很多朋友和同志帮助我们。在对日军的袭击中,我们把自己武装起来了。现在,我们已发展到一万多人。除了筹备粮食、交通运输和筹集资金的人员以外,全部都被武装起来。在开始袭击平绥铁路清华园车站之前,我们破坏了道路;当满载武器的列车颠覆之后,我们切断了一切电线。这时,从相反方向开来另外一列火车,接着开始了残酷的战斗。这次战斗,共打死一百名日本人,受伤的就更多了。我们还赶在日本增援部队从北平乘车来到之前,缴获了许多步枪和弹药……”

“在我们游击军里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其次是铁路工人。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过去的士兵也还有许多大学生。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些能够向居民阐述我们的任务和战争性质的人。”

另一个游击区在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的广大四角形地

区。南边直到石家庄。抗日游击运动遍及日本占领军后方的十三个县。其中心是：永定河边的固安县，即二十九军退却时唯一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地方；白洋淀湖以东的任丘县；霸县（白洋淀湖以北）和献县（津浦铁路附近）。冒险离开铁路线往内地撤退的日本部队常常遭到游击队和居民最坚决的抵抗。前不久，由日本第五师团第四十二旅团的一百一十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在他们从宝坻向高扬转移的时候，被游击队全部消灭。

在天津地区，有几支小型的、自发产生的游击队在活动，其中三支游击队享有最高的威望：第一支是由七百名“保安队”自卫战士组成的游击队；第二支是由天津铁路员工组成的游击队，其人数与上一支相等；第三支是良王庄的一支小型（一百五十多人）的农民游击队。

最初，游击队几乎没有武器，而现在，几乎所有的游击队都被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夺来的。为此，需要向某些哨所发起几十次进攻，袭击日本的岗哨、运载武器的载重汽车和仓库。从游击队发动的大规模战役中，我们已注意到塘沽日本仓库的大火灾和铁路货运站上油库的火灾。游击队经常切断电报线和电话线，有时还切断天津与北平之间的铁路交通。尽管日本人对铁路交通进行了强有力的保卫，但是游击队颠覆火车的事还是经常发生。

河北以东的游击队组织得比较差。但这里也有几支大型的游击队在活动。

河北北部的游击队归人民抗日游击军联合司令部领导。游击军司令部已同中国军队总司令部建立起联系。现在，政府和军队已开始向英勇的河北游击队提供物质援助。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8年3月15日)

武昌。委员长蒋：密。二月支、元、铕、有、寝、宥，三月冬、江、支、卦电奉悉。兹将连日与伏帅及其代表商酌之结果详呈：(一)截止本月寒日运华之军火，计开账单为甲、乙、丙三份，甲为壹亿零六万元，乙为廿师兵器二千七百六十五万元，丙为各兵器附件、汽油及运输费三千二百六十万元，除甲单有壹亿借款合同抵消外，余均要现金支付，请将付款办法决定，再商量飞机及增加兵器等问题。(二)中国在某时期内希望苏方供给军火之种类、数量、请详为见告，苏方只要于本身备战无害外，愿极力帮助。一面亦应谈判付款方式及双方指定代表负责商订合同，正式成立文件，以便履行。(三)苏方意见，丙单之款须悉付现金，乙单则付一部现金，余以矿产品、物产品及信用借款。至增加兵器及今后之需要，则俟新合同成立后再办。查新合同实有商订之必要，并祈于谈判时提出借款额为五亿，订购军火期限为二年，飞机及新兵器之补充为三月一次。(四)现有轰炸机摩托六十个，驱逐机摩托六十个，但要求付现款，若可，即起运。(五)第二批军火已由海、陆分运完毕，对于今后之军火订购及中苏间之提携办法，职甚欲归国面报一次，可否？乞示。职杨杰叩。删。

(《战时外交》(二)^①，第481—482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呈蒋介石

(1938年3月29日)

谨将在苏工作近况及应请示各项恭呈于下：(一)第二届在苏所办二十师军火及双翼驱逐机六十架，已于二月中先后分由水、陆悉数起运回国，至增加二十师武器及续订轻轰炸机与手枪等，苏方尚未正式决定，其未成功之原因已先后电呈，谅邀睿鉴。日前伏帅将我去年以来截至目前为止所订军火及各军火之账目总结为甲、乙、丙三单，交职核对，令职加以证明，并祈转报钧座请示付款方法，以便报告其政府。兹将甲、乙、丙三单译就，报告贲呈。

(二)伏帅声明如下：

甲单付款办法以借款壹亿元相抵(超过之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一元作为记账)。乙单为廿师武器，其付款方法望付一部分现金，余以矿产品(锑、钨、锡、铜、镍)及物产品(茶、生丝、棉花、羊毛、牛羊皮)交换，不足之数亦续订借款合同。

丙单为运华军火之打包费、装配费、载卸费、陆路运输费、汽车费、汽车夫费等，当时声明非付现金不可，因起运甚急，曾请政府垫款办理，务望我方详察事实，速予归垫，以清手续。

(三)职对于甲、乙、丙账单，逐一与我验收员之收据核对，尚无不实之处，即于日前加以证明答复伏帅，现伏帅已将报告书调制完毕，专候钧座之复示到来，即呈报其政府。

据伏帅称，第一届之军火，有政府批准之壹亿元借款为根据。第二届(廿师武器及垫款之一部)之军火，完全系应中国之急需，乃权通办理，亦望订立合同，有文件后，一切接济始有根据，否则彼之责任繁重，亦难向其政府进言矣。故职于删电具申意见，请与苏联另订一新

借款合同，默察将来之需要，不妨提出五亿之数，曾蒙采纳，务恳仍照壹亿元借款办法，在华与彼代表切商。苏联为中国真实同志，谅能允允，一俟新合同成立，则廿师武器之付款方法，亦可收容其中，即将来之接济计划，庶有着落，而伏帅亦可根据合同予我种种之便利矣。

(四)职于三月十日曾向伏帅提出十二个问题：

1. 增加廿师武器及手枪。
2. 先运轻轰炸机六十五架。
3. 飞机修理厂七所之器具及派遣技师。
4. 各种炮弹及飞机炸弹制造之样板及技师。
5. 空军留学生问题(分初级与空军大学)。
6. 在迪化开设空军学校，教材、教师均由苏联供给。
7. 飞机摩托之补充。
8. 汽车拨足千辆。
9. 在肃州组织机械化兵团约三师之武器。
10. 开采新疆汽油。
11. 再订千吨汽油。
12. 炮兵及唐克等教官之派遣。

伏帅对于上项问题已接受考虑，并称报告政府请示后答复。惟称对于乙丙两账单，先求钧座予以圆满答复，再及十二问题，并谓苏联之军火资源亦感缺乏之品，常以现金向各国购买，中国当谅其困难，亦须给以若干现金，庶接济中国方不致有遏蹶之虞。以上各项祈示方针，俾便遵循。谨呈委座蒋。职杨杰谨呈。

附：甲、乙、丙三种帐单[删]

(《战时外交》(二)^①，第483—491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驳斥 日本政府抗议苏联飞机助华

(1938年4月4日)

(塔斯社莫斯科五日电)日本大使重光,昨日往访李维诺夫,声称近在华作战日军击落飞机一架,该机据悉为苏联飞机,机师以降落伞降落,为日方俘虏,据承认,前曾服务于苏联军队。重光称:“细考苏联体制,此事发生殊觉遗憾,苏联政府应负重大责任”。李维诺夫当答复如下:“苏联政府对出售军火以及飞机至中国问题之见解,完全依照一般公认之国际法标准,此点已经苏联驻日大使斯拉伏茨基与广田外相谈话时加以说明,因是,此项问题,已不必再行论及,盖军火之供给中国,一如若干国家以军火供给日本。关于在华逮捕苏联机师之供认,我人尚毫无所闻,提苏联政府于此事对日不负任何义务及受任何国际条约之束缚,因苏联未派军队及任何独立部队前往中国参加作战,凡与此种事实相背之各种供认,均不能承认,而仅足以提示充分恶劣方面,有系统活动、制作各种虚伪报告,使日苏关系趋于恶化。至于引证苏联国家特殊结构,实不甚恰当,此项结构,引证者显然尚不明了。然结构系国内事件,苏联政府对其他国家不负任何特别义务。”

李氏继谓:“日政府当亦深悉各国现有一相当数目之外国志愿兵服务于中国军队中,就目前所知,日政府亦未见对有国民在中国军队中服务之外国有所声明,显然的,是认为此举无法律根据,同时另有一公开事实,即某某数国曾有大批军事人员服务于中国军队,直至最近,日政府并未认为系敌对行为,甚至亦不阻止中国与

此等国家建立最密切条约关系,因此日政府究以何项根据,向苏联政府发出此种声明,殊难思议,此项声明,不仅表现非友谊态度,且亦自认扣留邮件邮机、轮船乘客、不偿还欠款等为武断非法的行为。日政府声明,似少理解。据日当局以前担保,谓日不拟对华作战,迨战争发生,日本又再三声明,系‘偶然事件’,两独立国间既未入战争状态,故苏联不负任何责任。”

日使继又谈及其他要求事,李维诺夫遂告以彼又手数日前命令苏联驻日大使拉伏茨斯基,向日政府提出解决若干具体事件总办法,其中包括苏联关于邮机、渔船、商船的被扣留、不履行中东路欠款之要求。日本方面所提者,系关于苏联当局扣留日本渔船及其船员,日本人民被拘禁,萨哈连日本居留地之请求等事。

(《新华日报》1938年4月6日第3版)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致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8年4月7日)

蒋介石同我会见时打听莫斯科来的消息。我说,很明显,从杨杰将军与中国大使馆的报告,他会了解基本的东西;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随后,蒋介石宣称:“中国坚决实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政策,但目前有很大困难。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在此时期内,中国需要经常的援助”。鉴于此,蒋介石提请苏联政府给予经常的物资援助,而为了选定这一援助的具体形式并缔结条约,请苏联政府派代表赴汉口。我答应向苏联政府转达此意,同时要蒋介石注意,迄今为止,中国方面没有起运任何苏联预定发送的货物。蒋介石声称,他近日已发出指示,开始装运,并筹备以后的物资起运。同时由双方代表确定今后发运货物的方式。

关于保证西北道路的畅通问题,蒋介石强调,完全相信将军们的忠贞不渝,其中,他指出,发生过这样的事,关于马步芳军队的供给问题没有同马步芳达成某种协议,但这已设法解决,即国民政府负担了马步芳军队的全部供给。

卢干兹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立法院院长孙科致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密函

(1938年4月16日)

耿光大使吾见勋鉴：关于购机事项，经连日与兄商讨，金觉有从速催交及续购之必要，以应前方急需。兹请再向苏方商定驱逐机 E—15 式八十架，E—16 式八十架，轻轰炸机 R—10 式八十架，同时对于去年经订待交之轻轰炸机 SB 式四十架，一并催请起运。所有新旧所订之机，均希从速分批起运，于本年七月前全数交竣。又：前方希望苏方志愿军参加作战至为急切，从前招待不周之种种错误，我方自应切实纠正，敬请吾兄即向苏方详为解释。至待遇条件，可据前年十一月周主任至柔致兄马电所开各条酌商请派。其各地招待处之管理，如苏方同意，可由其派员负责办理。所有购机及聘请志愿军事项，敬请吾兄从速进行商洽，至勿公谊。专此。即颂

勋祺

孙科(亲签)四月十六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军令部 次长杨杰电

(1938年4月17日)

杨次长耿光兄：密。关于今后订购俄货及还货办法，因事关财政经济，由子文兄先后商洽俄使电彼政府请示，兹将内容告知，盼就近协助进行。（一）拟新购飞机及其他军械与飞机厂、炮厂设备。其价值合五万万华币，连前交货值壹万万六千余万元，共为六万万六千余万元。（二）新订货品交货期为两年。（三）华方每年还货价值五千万，连本带息分期还清。（四）华方供给苏方所需要之矿产、茶、丝、桐油、棉花等。（五）关于详细办法及签订合同，由双方派代表会同办理。附带声明：华方已拨二千万收买矿砂等运俄，第一批矿砂已装英船 TALBTO，于本月十五号由香港运出矣。重轰炸机需要急迫，已请提前让予六十五架，亦请交涉即日飞来。盼复。中正。印。

（《战时外交》（二）^①，第491—492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中国的军队

(1938年4月25日)

上校 И. И. 波波夫

近年来的经验向全世界人民表明,只有当人民能够依靠自身的反抗力量和意志去抗击侵略者时,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和生存。这一点,中国人民已经意识到了。

中国军队在1936年还不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几乎全国所有的边远省份,都拥有自己的部队,不受中央管辖。军队的编制很不统一。一个步兵师往往由三个、四个或五个团,有时甚至由六个团组成的。军队的武器也不统一。在同一个团里,更不用说在一个大兵团里,便可以找到不同型号和规格的步枪、机关枪、大炮。部队的技术装备也远不是现代化的。中国在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基础的时候,不得不在国外市场上购买那些世界上其他国家早已不再使用的作战技术设备。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也是很差的。没有制订出关于物资和粮食供给标准的细则。军队指挥人员在军事战略观点上也不一致。他们的战斗准备也是各搞一套。更有甚者,在军官中文盲占有很大的比重。

总之,在两年以前,中国没有一支统一的、组织严密的、训练有素的和装备完善的现代化部队。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中央政府在1936年着手彻底改组军队之后,认为有必要采取下列措施的原因。

- (1) 建立一个坚强的、统一的司令部;
- (2) 在国内实行普遍的军事义务制;

- (3)供给军队以同一类型的新式武器；
- (4)提高军队的战斗本领；
- (5)按统一的编制管理部队；
- (6)按现代化要求提高指挥员的文化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修公路网，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础，大力改善国内的联络工作。

众所周知，中国某些最反动的集团是反对这个军事改革计划的。地方军队的司令都看到这个计划的实现就是自己的独立地位的丧失。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那末一个能够真正指挥全部武装力量的、坚强的、统一的司令部就会建立起来，其结果他们的“世袭领地”上的军队将仅仅是中国统一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们本人将不得不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

中国加强国防力量的计划，引起了日本军阀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的恐慌。日本军阀一想到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马上气得要命。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手法：挑拨离间、实行收买、暗中破坏以及搞恐怖活动等等，目的是要破坏中国加强国防力量的计划。

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可耻奸细——托洛茨基匪帮以及日本情报机关的狗腿子，都竭力帮助日本军阀破坏中国军队的改组计划。

在中国人民真正着手实现这个计划之前，必须克服很多困难。但即使这样，在目前这场战争开始之前，中央政府仍然为加强国防做了很多事情。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经常提醒自己的人民：中国的解放和独立，只有通过联合中国的一切民主力量才能实现。

中国中央政府在预先得到全国一切民主组织的支持之后，便立即着手完成自己改组军队的计划。

1936年,除过去的红军之外,全中国的军队被编成了一百七十个步兵师,总数为二百五十万人。中国政府以最坚决的措施,开始把全国的武装部队纳入统一的指挥。当然也有很多不服从指挥的情况发生。但是,在这以前,政府已拥有相当强大的所谓“南京”部队,其核心为十八个步兵师,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不亚于欧洲军队。中国政府利用这一部队,完全能够对付地方军阀的抵抗。

随后中国政府又统一了军队的编制。大约缩减了百分之三十的步兵师。通过把武器从一个部队调拨到另一个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军队物质供给的统一化。同时还从国外买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并开始整顿国内的军事生产。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军队有了大量的技术装备。其中机关枪,装甲车、野战炮、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这就为建立空军和摩托化部队奠定了基础。

总之,到1937年上半年前,中国已拥有一支较1936年组织得更完善、纪律更严明和装备更精良的军队。

在目前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只限于防御。它经常退却,并遭到多次惨重失败。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摧毁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对于最初阶段的失败,中国人民并没有惊慌失措。相反地,中国人民对侵略者更加充满仇恨。他们同仇敌忾的意志逐渐统一起来。由于中国拥有大量人力资源,所以它组织并调遣一批又一批的新师团开赴前线,因此,尽管中国军队遭到多次失败,但它却能日益增强,而且能够组成现在这样一支不少于一百个步兵师和七个骑兵师的军队。

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严峻的考验。同时这些考验又唤醒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团结在政府和所有民主组织的周围,决心同侵略者斗争到底。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是最近中国军队的行动充满空前的积极性和英雄主义的原因。现在,中国军队不仅进行着防御,而且转入进攻。他们的进攻行动,在山东和山西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中国皇帝军队的士气和作战技术都很差，而现在的中国士兵作战无比英勇。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罗琼芳率领的那个兵团，在保卫南口通道时，抵挡了日本两个师团几天的进攻，并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中国人民无情地镇压祖国的叛徒，日益加强自己对侵略者的抵抗。《德意志汇报》前不久报道说：日本军队伤亡人数和被俘及患重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五十万人。总之，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军队平均每天要损失二千一百人左右。

最近，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有了显著提高。过去中国一个较好的步兵师只有七十二挺轻机枪、二十四挺重机枪、三十个掷弹筒和十二门大炮，现在一个师的武器装备已经大大增加了。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在自己后来的进攻中，为了冲破中国的防线就不得不大量使用火力很强的武器，因此，据外国观察家的报导，这次战争同 1914—1918 年的阵地战颇有类似之处。

在战争初期，日本飞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它们极其残酷地轰炸中国的和平城市，炸死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但是现在的中国军队已拥有足够的高射炮和空军。

中国抗日情绪的不断增长，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巩固。世界进步人士十分关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奴役者的斗争。与日本不同，由于中国拥有巩固的财政基础，所以它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了包括飞机在内的各种作战技术装备。《满洲每日新闻》还在 1937 年 8 月 12 日就报导过：美国大约向中国出售了总数为六十点三万美元的武器和飞机。几个月之后，《中国每日先驱报》报导：为了购买美国的武器，中国已支付了二百八十九万美元。

两年以前中国在广州地区修建了一座飞机厂。据《柏林日报》报导，广东省已有四座飞机装配工厂。所有这一切，使中国能组织一支强大的空军，后来使日本空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根据《民族报》的资料，日本军队从 1937 年 8 月 15 日到 1938 年 5 月 1 日这

段期间,至少损失了五百一十三架飞机。现在中国空军已不再处于被动地位,它已经能够主动出击了,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打退日机的进攻。1938年2月18日,在轰炸汉口的时候,曾发生过一场空战。在空战中,三十八架日本飞机被中国飞机击落十七架,而中国仅仅损失四架飞机。^①日本飞机在袭击郑州时,在同中国飞机作战中损失五架飞机,而中国的飞行员们却安全地返回自己的机场。

数百万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同侵略者进行斗争。在日军的后方出现了很多中国游击队。他们日以继夜地进攻日本的交通线。日本司令部不得不拿出至少十个步兵师来对付游击队。日本“侦察队”极端疯狂地焚烧城镇和乡村,枪杀和平居民。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相反,他们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更大的愤怒。中国的游击队愈来愈多,他们决心把凶恶的敌人从自己祖国赶出去。

中国游击队使日军感到疲于奔命,惊惶失措。《每日先驱报》记者埃德加·斯诺2月15日报导说:仅山西的游击队就缴获了日军五十挺重机枪、三十四门野战炮、一千多部载重汽车、二十六架飞机,消灭了一万五千名日本士兵。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新军队日益增长的力量,必将取得胜利。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① 参见1938年2月2日《民族报》。(原文如此,未注明月份——本书编者注)

蒋介石关于尽快提供武器援助 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8年5月5日)

绝密

莫斯科，副总参谋长杨杰转

斯大林先生和伏罗希洛夫元帅

由于你们多次给予了全力支援，中国在对日作战中才能坚持到现在。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

对于贵国的互助精神和支持弱小的行动，不仅我个人感激不尽，所有的官兵和人民大众也都无限钦佩和感谢。

现在中国缺少许多武器，特别需要飞机。我本人曾和贵国大使谈及此问题，同时电告杨杰，让他开始关于从贵国获得大宗武器和飞机贷款的谈判。我要求他申明我们愿意缔结正式的贸易信贷协议。我想，对此你们已经知晓。

中国上述的愿望和请求与贵国的精神一致。如果从通常的贸易方法和正常的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上述请求不可能满足，因为既然我们不能提供现金，也就不能得到商品。中国对此当然十分理解。对于过去以贷款的形式得到的武器，我们尚未最终付清，也不曾补偿大量运货的开支。对于此种情形，我甚感不安。

然而中国深信，苏联拥护和平和正义。中国和苏联在东亚政治局势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认为，中苏之间的关系超出了一般友好关系的范围。中国和苏联是患难与共的朋友，我深信您亦忧我们所忧。故斗胆向您提出上述超出常规的请求。

我很抱歉没能及时付清以前你们预先贷给我们的款项。请您相信中国没有可以送出国的现成黄金。如果略有可能,那我不等您提醒早就全部付清了。贵国热诚相助,中国为保全国与国之间信任着想,岂能稍有耽搁。和平时期不难筹款,而现在战争正激烈进行。前方决定战争胜利的手段是武器和战士,后方在战争进程中要依赖资金周转的稳定。中国特别缺少现成的黄金,如果马上转汇如此巨大的数额,则难以保持中国的国际货币结算汇率,中国的整个经济将会受到打击。那时尽管军队充满决心,却无法战胜敌人。因此,我们当然希望贵国援助武器并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的极端困难。我们为保持国家的经济实力而采取的措施更是一言难尽。

在收到要求加快偿还垫付的商品及其运输的 3200 万预支款的电报之前,我本人曾对德拉特温武官说,中国虽然实在不能立刻还清,但需要编制详细的结算,并准备在可能时全数偿还。

现在我愿向您宣布,中国决定并已调拨 3200 万中国元,作为补偿款项以便紧急购买这一数额的商品。这不至于影响中国的国际结算汇率,也能维持经济的正常状态并顺利地继续进行战争。

贵国定会理解中国采取这一措施的难处并予以同意。

真诚请求你们尽快同意签订以贷款形式提供武器和飞机的协议,并开始成批装运,这将提高我们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特别需要的是飞机,现在中国只剩下约 10 架轻型轰炸机。由此可知对飞机的迫切需要。请求首先以贷款的形式提供轰炸机和发动机,对此我们已经达成一致,并且要赶快运到中国。

对于余下的所有武器也请尽快缔结协议并付诸实现。为使对日作战不致半途失败,为使贵国慷慨给予中国的援助不致因拖延时日而失去意义,这样做是必要的。全中国的军队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贵国在极其艰难的时刻给予的援助。

我深信您出于原则上的考虑将会满足我的请求。请将您的答复亲自交给杨杰并由他发电报转我。

祝您成功并祝健康!

蒋中正(蒋介石)

1938年5月5日于武昌

电文无误,元帅(杨杰)

1938年5月8日

附录

伏罗希洛夫给斯大林的送件便函^①

斯大林同志:

今天杨杰曾来我处,带来他收到的蒋介石给你和我的电报。现附上电报。杨杰口头复述了蒋介石的电报并补充道:前线深感轰炸机不足,请求尽快提供65架这种飞机。此外,他还要求快些对蒋介石关于5亿新贷款条件的电报做出回答。杨杰谈了以下几点:1)贷款将用中国货币支付;2)规定只用于向我们购买武器;3)偿还条件为每年偿还5000万美元,另加付全部债款总额的%^②。接着他告知,蒋介石和政府未征询他的意愿就任命他为大使,他请求在这新的、尚不习惯的职务上和其他方面给予帮助。

1938年5月9日

(录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① 便函附在蒋介石电报的后面,写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公文用纸上。

② 原文如此。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介石电

(1938年5月10日)

杨杰转

杨杰上将请转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元帅勋鉴：吾人完全理解中国金融财政之困难情况，并亦已顾虑及之。因之，吾人对武器之偿价，并不要求中国付给现金及外币。然吾人愿得中国之商品，如：茶、羊毛、生皮、锡、锑等等，吾人深知此类商品，中国能供给苏联，而对中国之国民经济与国防无若何妨害。因此，希望中国供给此类商品。

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抗侵略者的英武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

阁下所要求之飞机，当即运送。关于给予中国以新信用贷款问题，将付苏联最高机关讨论，吾人希望能底于成。

请接受吾人热烈敬礼，恭祝康健，并庆在中国解放斗争战线上之迭获胜利。

史太林 伏罗希洛夫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7页)

中国战争的第二阶段

(1938年5月10日)

H. 利亚霍夫

最近四个月，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主要军事行动是占领徐州——陇海铁路上的重要战略据点，从而把华北战线和上海战线联结起来。这一军事行动，对日本来说，发展是很不利的。

为了把主力部队集中在这一方向上，日本人在其他三千公里战线上停止了积极的进攻行动。为了进攻徐州，最近几个月日军不断地从其他战线调到山东。这里集中了日本的航空部队、炮兵部队和摩托机械化部队。尽管如此，但从元月开始，日本军队在山东仍然屡战屡败。

日本人向徐州发起的第一次总攻已经在一月停止了。这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人第一次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守。日本人于三月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血战之后，其结果是四月份日军在台儿庄附近被彻底粉碎。由于日本军队丧失了进攻能力，同时又无法同后方取得联系，因而被迫在峰县——临城地区转入防守，等待援军的到来。

日军在台儿庄附近的失败，大大削弱了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并且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丧失了进攻能力。日本报刊对日军在山东省的失败保持沉默。日本军队所遭到的惨重失败，迫使日本军队陆相杉山急急忙忙赶到前线必须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以便挽回日本军队由于受挫而丧失的威信。日军又重新开始把人力和技术装备大量运往山东。其任务是使日本军队摆脱被包围的局面，并

企图再次进攻徐州。

在四月上半月,日本人把新部队调到山东。结果,在山东集中了好几个装备得有大炮和坦克的师团。在山东沿海,还集结了几艘拥有飞机的航空母舰。

4月19日,两支日本部队再次发起进攻。日军主力部队的打击方向是峰州——邳州一线。其目的是击退中国军队右翼的进攻,同被包围在峰县地区的日本军队联结起来。日本人另一支部队则进攻台儿庄。为了削弱中国在徐州地区的防卫力量,并且在徐州牵制住一部分中国军队,日本人同时在津浦路南线发动了配合性的军事行动。

这次进攻是从日本主力部队袭击峰州附近的中国阵地开始的。日军以大量的重炮和轰炸机配合这次进攻。峰州附近的战斗持续了两昼夜。只是在日军用重炮炸毁了城墙,减少了步兵攻城困难之后,峰州城才被日本人占领。

占领峰州城使日本人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力量去打击峰县附近的中国军队,迫使他们退到南部地区,从而使这部分日军与被包围的日军联结起来。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速度非常缓慢。占领峰州城之后,战争停了几天。到4月24日,日本人又重新聚集力量,继续发起进攻。

日本人集中主力,以攻占领台儿庄和邳州。在这里展开了激战。4月25日,在对中国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之后,日本一个师团在坦克的配合下发起了对邳州北部中国阵地的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日本人的进攻毫无所获。中国军队击退了日军所有的进攻。日本人向台儿庄的推进同样也停止了,台儿庄仍然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

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的积极抵抗便再次阻止了日本人的进攻。而且,报刊在最近的报道中已经指出,整个局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中国司令部集中一切力量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反攻。最近几

天大量中国军队袭击了天津日军的左翼，从而促进了从邳州方向发起的进攻。

由于日本人同时在很多条战线上作战，因而它越来越感到人力不足。为了保证目前在山东发起的进攻，日本人不得不把部队从遥远的战线调来，并在两周之内集结到他们正在展开进攻的地区。

最近，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削弱了。

不顾日本警察最严格的检查，日本报刊还是登载了一些有关军队真实情况的消息。日本有一家杂志曾刊登了一篇长篇特写，标题为“幸存的士兵”，作者是记者石川龙三，他亲自到过前线。

这篇特写主要是描写日本士兵的情绪。正如作者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当前士兵的思想是希望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争，回到家乡。石川在特写中描写了日本一个师团在去年10月从华北前线转移到上海附近去的情景。这个师团沿着铁路线走，他们经过北平、沈阳到大连，随后又从大连乘船到上海，士兵根本不知道要把他们运到何处去。

“在沈阳休息了一小时后，部队又带着行李登上另一列火车，这不是货车而是向南开去的客车。‘回家了！’

“这一声音在一瞬间传遍整个车厢。万岁！回家了！高兴的心情无法抑制。部队在列车上过了一夜。清晨到达大连。晚上，士兵们漫步在大连街头，他们喝得熏熏大醉，然后唱起歌来，并给自己在日本的亲人购买礼品。

“第二天清晨，部队乘上小船，进行登陆演习。士兵们才开始预感到他们将被运到一个新的战场。

“第三天，部队登上轮船。没有统一鸣笛，三艘轮船便一艘接一艘地从大连开走。士兵们打开舷窗，默默地目送着越来越远的海岸，并且把不再需要的礼品扔入海中，然后一个一个都倒在铁制吊床上。”

不可挽回的失败,决定着士兵们的情绪。这就是这篇特写的主要内容。

“士兵们等待着即将开始的南京之战。在那里,他们或许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或许占领南京后战争就会结束。那时他们就可以返回家乡了。在行军中,部队带着阵亡的士兵的骨灰盒。上岸后因为无法把这些骨灰盒送到后方,只好一路带着。随着进攻的开展,骨灰盒也越来越多,而战士却愈来愈少。活着的人,感到明天自己也会成为死人。死人和这些活着的候补死人正在向南京进军。”

石川龙三的特写,鲜明地反映了日本士兵反战情绪的增长。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陇海铁路线上的战斗

——在中国的军事活动评述

(1938年5月18日)

H. 利亚霍夫

延续着的中国战争，给日本造成了许多新的经济困难，引起了日本国内广大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迫使日本政府竭尽全力指望获得“速胜”。为此，日本统治集团指望占领陇海铁路，夺取徐州，把在华北战线和上海战线作战的日本军队联结起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所以，最近四个月来日军司令部集中了一切力量去夺取徐州。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日本人在这里已遭到一系列的失败。

日军于5月8—10日再次发起的进攻，是日军司令部最近几个月来在陇海铁路线上采取的许多解救方案之一。在此之前，日本在徐州方面的战役，主要是沿津浦铁路实行南北夹击。这些战役未能取得成效。集中在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打退了侵略者的多次进攻，击败了日本人，这场战斗是4月在台儿庄附近进行的。日本人确认在铁路沿线一带进攻毫无成效之后，决定把主要的军事行动转到铁路以西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中国防御工事和部队都是不够的。

日本人的新计划是实行南北夹击进攻陇海铁路上的归德（即商丘——编者），使集中在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有遭受包围的危险，从而迫使他们撤走。同时，还打算从南面——运河以东海州方面采取辅助性的军事行动。

战役于5月10日开始。在此以前,日本人在郟城——邳县地区(铁路线以东)停止了进攻行动,并且把这一带作战的大部分部队调往济宁地区(铁路以西)。从河北省(北平——汉口方向)来的日军也集结到这里。这样一来,济宁便成了集中大量日军从北进攻古邳的中心。

在此之前,日本司令部为了在津浦线南部的怀远——凤阳地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团群,特从上海战线调来了部队。这个军团群的任务是从南向归德方面进攻。在这里集结有步兵部队和摩托——机械化部队。

5月12日,战斗在鱼台地区打响。从这里发起进攻的日本军队是由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所组成。但是,中国人从西面的打击,阻止了日本主力纵队的进攻。鱼台地区的激战一直持续到现在。日本人企图向南推进,结果未能得逞。日本人为了牵制中国军队,把企图进攻沛县的部队调过运河。同时日军还加强了对曹州的进攻。但是,尽管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日军在靠陇海铁路以北的军事行动仍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日本南线部队的进攻开展得比较顺利。在这里,5月10日日本人占领了蒙城。可是就在第二天即5月11日,他们就被中国人赶出来了,只是在再次发起进攻之后,才第二次占领了这个据点。5月14日,由骑兵和装甲兵所组成的日本部队占领了永城。随后,日本人企图进一步向砀山推进。但是,被中国军队赶到南边。5月15—16日,有一个日本侦察班冲到砀山附近的陇海铁路线。

日本人企图从南面沿铁路线向宿州车站推进,但被中国人打退了。日本人在宿州车站以及从西面发动的多次进攻均未获逞。

在运河以东,日本人的骑兵向北挺进,直奔海州(黄海沿岸的港口)。

在此期间,日本的航空兵也在积极地活动。徐州、邳县、开封以及陇海铁路线上的其他城市,每天都遭到轰炸。

日本报刊得意忘形地狂叫“前线获得了重大胜利”。但是，报刊关于胜利消息的报导未免为时过早。日军冲到陇海线的仅仅是一支很小的先头部队，而其主力正面临着同中国人的一场恶战。

日本战略家们从战争爆发以来不止一次地用“围剿和歼灭”来吓唬中国军队。但是，这些做法至今未能奏效。中国人民的军队没有被粉碎，相反，中国军队在这一期间训练了自己的后备部队，使它能够进行长期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国司令部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来粉碎日本人发动的新战役。中国军队在归德地区集中了强大的后备部队，它有可能既打击南面，又打击北面的日本人。在凤阳地区，在淮河沿岸，以及在蒙城附近，中国人正卓有成效地进行着战斗。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厦门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为了转移中国军队对徐州地区的注意，日本人于5月10日派遣陆战队在中国南方港口厦门登陆。最近日军占领了厦门，但是他们并没有继续进攻。绝不能把日军在厦门的军事行动看成不外是一次佯攻。日本陆战队在厦门的登陆和日本舰队沿中国南部海岸进行的演习，其任务是阻击华南的中国军队，干扰他们为加强北方战线而进行的调动。但中国南方各省都有足够的部队，既能保卫沿海海岸，又能充实各个战线。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8年5月11日)

武昌。委员长蒋：密。一、连日与伏帅晤谈，据称苏方决助我到底，惟顾虑其国防之庞大与工业力之不足，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办理，至军火接济，基于道义立场，毫无商业气味，以物易物，彼此均利，望职转达愚见，购货运苏抵偿非常重要，若我履行信约，一切希望仍易实现。二、苏方极赞成大使之更换，惟以职轻才，恐负使命，然幸得进言可以改善中苏间隔膜之机。职去岁到莫，伏帅设馆招待，囑勿与使馆来往，其不信任我使馆，致形诸言语，故使馆一切工作无法进行，且足妨碍邦交，余代办铭到后，颇有改善，但苏外交部向直言冀我刷新。次如朱武官世明，伏帅代表于事前两次表示拒绝，曾报告在案，现朱驻苏半载，不但徒耗国帑，无一工作可做，且在招人厌恶，以上情形，职若知而不言，恐负知遇，故不避嫌怨，据实直陈，若蒙准飭军令、外交两部查其与苏方感情较恶者，调回数人，一新耳目而利邦交，则幸甚矣。职杨杰。真。

(《战时外交》(二)^①，第494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 并转立法院长孙科电

(1938年5月28日)

莫斯科。杨大使并转孙院长：电悉。先续借一万六千万元之数，以后再借之意甚感，请即照此数商借，并请哲兄暂在莫协助耿兄，订约办妥后再离莫，希望速即订定。至于拟购各货当再另详电，所允各项物产已运出者，约有一千万元以上，其余当陆续催运，勿念。中正。俭已。机号。

(《战时外交》(二)^①，第495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

(1938年5月29日)

汉口。蒋委员长钧鉴：俭电奉悉。(一)日前会商关于续借手续，史先生问是否在汉或在莫办理。科答可在莫办理，我方签约可由耿兄负责，史、伏均表赞同。(二)科问续借一万六千万元并以后可分期再借之意，可否报告委座？史先生答请详报委座，如同意，当可进行之。拟请委座即来电史、伏、莫三先生，谓据科报告等语，表示接受此项办法，来电仍由耿兄译送，当可促成。(三)德既召回顾问，我方似应乘时改聘苏、法两国军事顾问，以为补救。法年来对专用德人及多购德械，颇感不快，今若改用法顾问或可同时商订法械。惟购械事最好由耿兄于此间事妥后，赴法一行，密与法军部接洽，因法方不愿经外交方面接洽购械事，科日间返法于此亦有所进行。(四)闻苏方军事以国防军备三分二对德、波，以三分一对日在远东军力，年内将增至七十万人。苏方观察战事，不论在远东或欧洲爆发，势必同时有事，惟在苏本身立场，不愿自苏发动甘为戎首耳。(五)此次借款似宜多用于飞机及重兵器，因此项器械在他国均不易订购，飞机在英、法均感生产不足，须向美、加订购，美若供应英、法，对我自不暇并顾。飞机厂仍请速办，史先生对此特别注意，迭为提出，意似不满我方延后，再三敦促。孙科。艳。

(《战时外交》(二)^①，第495—496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密电

(1938年5月31日)

杨杰转

莫斯科。杨大使转史太林先生、伏罗希洛夫元帅均鉴：接诵尊电，承谅解中国实际困难，同情中国抗战，并允尽一切可能协助，实深感激。又接孙院长来电称：对于第二次接济一万万六千万元数额之贷款，承蒙慨允，并允以后继续接济，尤为感慰。贵国于中国抗战难苦之中，一再仗义相助，此种盛情厚意，中国人民将深铭不忘，两国民族深厚固结之感情，必永垂于中苏屏藩之革命历史。最近，敌国内阁改组，其对华侵略必益趋急进。各种武器——尤其飞机之补充，需要迫切，刻不容缓，务请将第二次接济之一万万六千万元贷款契约先行订定，此间已令杨大使全权签订。至于应购飞机、军械之种类、数目，当另开单详报。华货供给，前因所需交通种种关系，运输迟缓，甚觉疚心。现在余决亲自严饬办理，兹后必源源输送，照余所允者办到，以副贵国之望，最后对于贵国屡次援助之稀有的高谊，愿代表中国军民重申恳挚之谢意。敬祝康健。蒋中正。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于武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7页)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

(1938年6月2日)

莫斯科。杨大使：苏俄可否派一得力总顾问如嘉伦者来华协助，请与史、伏二先生密商速复。中正。冬己。

(《战时外交》(二)^①，第341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在中国的前线

——军事行动评述

(1938年6月5日)

H. 利亚霍夫

日本司令部5月10日至11日发起的战役,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从西边包围的途径占领徐州(陇海铁路上),而且还在于包围和消灭徐州地区的中国部队。但是,从战役一开始,日本人已经明白,包围是不会成功的。虽然大约有10个日本师团进攻徐州,但他们的战线太长,而且还不得不以一定数量的兵力去突破中国军队的坚强防御。

最初,南北两面的日本纵队向着他们预定汇合的砀山(徐州以西)进攻。但是,中国人在虞城附近经过几次战斗之后阻止了南面日本纵队的进攻。当日军司令部觉察到包围计划已经失败,就停止了迂回深入的行动,从虞城地区进攻的已不是砀山,而是经过萧县直接进攻徐州。同时,北面纵队也停止在丰县地区向陇海铁路移动,放弃了大规模的包围,而调动一部分兵力直接从北面向徐州移动。

5月19日夜,中国军队撤离徐州。第二天,日本人进入徐州。这次撤退中国司令部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例如,陇海铁路的全部机动车辆都撤到西部,并开始有计划地把自己的部队从徐州地区撤往西面和西南面。

日本人未能包围中国军队。日本战略家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

的力量,没有弄清楚战区范围的大小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日本人占领徐州几天以后,绝大多数的中国军队已撤出徐州地区,目前他们正与中国其他部队一起在前线对日作战。留守徐州以南和以东的部分中国军队,首先是继续坚守这个地区,顽强地控制徐州以南的铁路地段,不给日本人以机会去利用整个津浦铁路线和恢复从天津直达浦口的铁路交通。

为了占领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地段,日本人开始向开封方向进攻,并把五位原^①将军率领的第十四步兵师团运过了黄河。这个师团向曹州推进,并向位于开封以东的兰考发起进攻。但是,第十四步兵师团遭到了失败。驻扎在归德和归德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袭击了第十四师团的侧翼,并于5月25日出现在它的后方,切断了它与黄河渡口的联系。中国空军轰炸和破坏了所有的渡口。在兰封地区(考城的西北面),歼灭了日本一个纵队。第十四师团的一部分兵力,急忙架设浮桥,开始撤退。然而,这些浮桥也同样被中国空军炸毁。该师团的局势十分危急。5月27日,中国军队夺取了兰封,并包围了第十四师团。

为了增援第十四师团,日军司令部马上调集兵力沿陇海线向归德推进,并向南进攻宿州。他们的任务是,深入到围困第十四师团的中国军队的后方,从而迫使中国军队“松开老虎钳”。5月30日,日本人占领了归德,几天后又向西稍有推进。但是第十四师团的处境并没有好转。现在,日本人正把驻守在山西的军队调来支援第十四师团。

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日军司令部打算向汉口方向进一步展开攻势,其目的是占领这个城市。显然,日本人为着这一目的,将竭力向郑州(陇海铁路与京汉铁路交叉点上的城市)靠拢,以便从郑州沿铁路线向汉口进攻。为了同一目的,日本人还在长江芜湖地

① 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师团长。——编译者注

区集中了火力很强的内河舰队。可以预料,日军司令部打算沿南北两路,即沿长江和京汉线进攻汉口。

日军包围徐州附近中国军队的企图已经彻底失败。占领徐州并没有使日本人向胜利跨进一步。毫无疑问,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侵略军下一步的行动。

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决心,已日益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的武装力量越战越强,游击斗争日益发展。在山西省,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把许多游击队团结在自己周围,而日本人则节节败退,不得不集中在大城市周围,一些被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又回到中国人手中。在上海战线,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战果显著。

在抗战年代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中国空军取得了卓越的战绩。中国空军卓有成效地击退了日本飞机对中国大城市的野蛮轰炸。4月底,日本飞机在汉口上空的空战中遭到惨重失败。5月31日,五十四架日本飞机与中国空军相遇,中国空军击退了日本飞机对汉口的袭击。在空战中,十二架日本战斗机和三架轰炸机被击毁,其余的飞机掉头逃走。

前不久有几架中国飞机飞到日本领土上空。这对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说是一次考验。敌人的飞机第一次在日本上空出现。中国飞机在经受住长距离飞行之后,还在日本上空盘旋,并向日本城市扔下号召停止反对中国人民争取自己独立的战争的传单。

中国空军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袭击,而且还组织了对敌人的反击。在后来陇海铁路的各次战斗中,其中也包括日本第十四师团被包围地区的战斗,中国飞机使敌人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的飞行员

——汉口来信

(1938年6月6日)

[塔斯社6月4日汉口消息]4月29日在汉口击毁日本八架轰炸机和十三架战斗机的激烈空战之后,日本在南京的空军部队实质上被粉碎了。随后日本空军又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准备再一次向汉口进攻。

5月31日,十八架轰炸机在三十九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向汉口飞去。在离城十公里处,它们遭到中国空军的拦截。立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空战。中国飞行员在这次空战中再次表现出崇高的战斗品质。中国的战斗机没有让日本的轰炸机进入目的地。这次空战有十二架日本的战斗机被击毁。中国空军的另一个机组,在离汉口二百公里处击毁日本三架轰炸机。中国空军损失两架飞机。一名飞行员跳伞得救,另一名飞行员正象后面所说的因伤重死亡。

汉口上空的空战,是中国空军的一次辉煌的胜利,也是中国空军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几名参加过这次空战的中国飞行员。他们的大队长谈了日本飞行员的下列情况:

4月29日日本空军部队在汉口附近被粉碎之后,日本人愈来愈丧失作战的信心。5月31日,日本战斗机在前,轰炸机在后,当空战开始的时候,轰炸机在距目的地三十公里的地方,立即掉头逃跑,接着几架战斗机也慌忙逃窜。领头的几架飞机包括他们队长的飞机在内是头一批溜掉的。战斗开始之后三、四分钟,日本飞机

的编队就被打乱了。在我们进行了第一次攻击之后，部分日本战斗机就退出了战斗。我们准备再打一仗，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日本人吃了大亏，再也不敢冒险前来了。

大队长向我介绍了几位飞行员——空战的英雄们。其中有位飞行员撞毁了一架日本飞机，击毙了它的飞行员，并平安返回。这是一名非常熟悉自己飞机性能和无畏的飞行员，又是优秀的伞兵。我请他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战斗的情况。

下面就是这位飞行员讲述的战斗情况：

我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有组织地起飞并迅速上升。很快我们就发现了敌人，于是战斗开始了。在战斗之初，情况对敌机比较有利：敌机的位置比我们稍高，又在我们的侧面和后面。但是在交战中它们的队形乱了，而我们在进行战斗时保持队形。日本人很快就乱了套，许多飞机还没有参战就逃跑了。日本人就这样付出了代价。我还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就看见一架飞机起火。这时第二架日本飞机绕到我的后面，我立即把飞机同它拉平，然后咬住它，用机枪点射，但是距离较远，无法追上。后来我便去帮助其他同志。

我停止追赶日本人，把飞机拉起，去帮助其他同志。日本飞行员发现了我就开始逃跑。我紧紧地咬住它，瞄准它，但是没有射中。我又装上子弹再射，也没有击中。这时，日本人开始绕到我的后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脱离自己的机队，去紧紧追赶它。毫无疑问，这个日本飞行员感到吃惊，为什么我不射击呢？我稍稍落后于它，但仍然紧追不舍。我们就是这样进行空战的。我在座舱里看见了日本飞行员的面庞。我用拳头吓唬他。就在这时，我猜到这个日本飞行员害怕我捉住他。我指着武汉向他示意：回来！他拐了个弯，我没有放过他，因为我的飞机比他的飞机飞得快。后来他开始低飞，力图躲开我，想溜走，而后再加快速度往上飞。

抓住日本人的想法并没有从我脑子里消失。我再次从左翼、

从后面紧紧逼近他。日本人再次低飞，我紧迫不放，打算击毙他，我从后面向他射击，也没有命中。我第二次绕到敌人后面，用螺旋桨去碰击敌机机翼，结果碰坏了他的护翼，于是日机马上就坠毁了。后来我的飞机也晃动起来，我原想跳伞，后发现我这架飞机虽然支持不住了，但仍能保持中速飞行，于是我下决心保住它，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平安着陆。在机上我发现敌人的第二批飞机。我立即坐上另一架飞机，再次起飞。可是，敌人的机群转眼就不见了。于是我又平安地返回机场。

第二个谈话对象是从燃烧着的飞机上跳伞的。他讲了以下的情况：

参加战斗应当同心协力。日本人想追赶跳伞得救的飞行员。当我跳伞时，日本人用机枪向我扫射。如果没有我的两位同事放弃战斗保护我，把敌人赶走，那我就会在空中被打死。在日本飞机上，飞行员是没有降落伞的。

5月31日的空战，日本飞行员从精神上表现出一种动摇性。日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敢去撞中国飞机。日本战争宣传机构所鼓吹的日本“武士”只不过是参谋本部的御用文人所杜撰出来的东西。在日本报刊中，有一个下流作家曾叙述过日本人在南昌上空的空战中是如何碰撞敌人的飞机，并且只剩一个翅膀也飞回来了。实际上，日本飞行员在空战中一遇到反击就逃跑。队长虽然有跳伞装置，但通常并不参加战斗。按照日本黩武主义者的观点，一般飞行员应该是“武士”，所以他们没有跳伞装备。

日本黩武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地方顽强表现“武士”精神呢？那就是对毫无防卫设施的和平城市和村庄的狂轰滥炸。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一些和平城市没有任何防空设施，尽管很早以前就提醒要搞好空防。日本的“武士”精神以令人厌恶的兽性和残暴性笼罩着这些城市。日本空军肆无忌惮地轰炸旅馆、大学、中小学校、医院，它们用机枪扫射满载难民的列车和老百姓居住的城市街道。

日本人对和平居民的大屠杀，正是嗜血的军阀们为了提高“武士们”的士气而采取的措施。

在结束谈话快分别时，一群中国飞行员对我说：

我们决不让日本飞机飞进武汉。

2月18日、4月29日以及5月31日的空战，都证实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中国空军正在不断地成长。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人民的战士

——外国报刊述评

(1938年6月19日)

捍卫自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使之免遭日本侵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以自己光荣的军队而驰名于全世界。敌人已学会敬重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但同时又害怕它。资产阶级报刊已不再傲慢地和轻蔑地谈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队了。在许多资产阶级的权威报刊上,都可以找到对中国军队战斗素质的评价。在最近发表的这一类文章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英国《曼彻斯特报》来自汉口的通讯报导和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的文章。《新苏黎世报》的这位记者长期生活在中国军队中。他写道:

“最近的战斗证明,中国军队已达到连他的敌人也感到吃惊的水平。当然,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懒洋洋地舒适地坐在俱乐部的安乐椅上,以某种轻蔑的口吻来谈论中国士兵。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同中国军队接触较多的人,必定会承认,任何时候、任何军队,未必能象中国军队那样,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能参加战斗。在目前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今天的这支军队还仅仅奠定了一个基础。

“中央政府拥有的军队是相当少的。大部分军队都隶属于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的各省省长。这些补贴应当向中央政府保证在需要的情况下支持这些军队。但是,这些经费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用于重新武装地方军和发给地方军薪俸,而是被省长们毫不客气地放进了自己的腰包,这和几个月前审讯韩复榘案件所暴露的问题是一样的。地方军常常几个月得不到薪水,他们的后

勤供应搞得很差，所以他们经常是靠敲诈勒索老百姓过日子。

“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转到蒋介石手中。各省的军事首长都要服从他。但是，旧制度下的军官们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明白他们仅仅是最高军事委员会新建立的国防总体系中的一环。还在1937年12月，山东省长就曾拒绝服从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并且拒绝向最高司令部的特派员提供视察黄河沿岸工事的机会，因为这样做可能暴露出他们大量盗用公款的行为。为了使旧学校出来的军官懂得军队不应该是个人利益的工具，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韩复榘不战而退把偌大一个山东省拱手献给敌人。在他被判处死刑之后，在旧军官中立即形成了一股新的风气”。

记者继续写道：

“训练有素的中央政府军在上海一仗打得比有些人预料的还好。他们是在与那些装备精良、拥有当时中国军队几乎没有的空军的敌人作战。尽管如此，在三个月的过程中这些军队仍然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在强大敌人面前被迫退却，因为他们的力量已消耗殆尽”。

中国军队及其领导，从这些艰苦的战斗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教训。军队不仅没有被打败、被摧毁，相反，他们正是在这些战斗中得到巩固和积蓄了自己的力量。

记者继续写道：

“人民军队是从一些拼凑成的雇佣兵中成长起来的。现在，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每个家庭的长子因承担主要农活可以免服兵役。从今年开始，由新应征入伍者组成了若干新的师团。首先对应征入伍者进行良好的培训，然后才把他们派往前线。这支新军还受到很好的政治训练。在汉口市郊的军营里，首先向年青的应征入伍者阐明了正在进行的抗日斗争的意义。经过三个月的新兵培训开往前线的士兵，与从前那些不学无术的雇佣兵是很不相同的。

“中国现在充满了过去所不敢想象的奋发图存的激情。所有

的居民都沉浸在这种气氛中。战争造成了统一的意志,这种统一超出了中国政治活动家们的良好愿望和期望。今天的中国军队已经不是由从前那种受地方长官支配的雇佣兵所组成,而是由献身于保卫祖国反对自己共同敌人的爱国主义战士所组成”。

《新苏黎世报》记者如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样,高度评价了中国士兵的精神、战斗力和对祖国的忠诚。他写道:

“无论在世界何地,未必有需求如此不高的军队。中国军队的战士,在华中地区的酷热或严寒中,在漫天风沙和倾盆大雨中,坐着装牲口的敞篷车,走过长距离的路程。他们吃的是粗劣的口粮。但是,战士们还是唱着歌、弹着琴,精神饱满地奔赴前线。当伤员们来到医院时,他们首先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到自己的部队?”

“战士们总是自豪地讲述自己的战斗观感。我和中国士兵一起上前线并听过他们的谈话。他们谈论战斗,谈论英雄的功绩,谈论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家庭。他们向我提出了许多困难的并且常常是极不愉快的问题,这些问题证明了再也不能把现今的士兵和从前不学无术的、直接从大街上拉来参军的苦力相比。我在野战医院见到了几个这样的士兵。他们既没有挫伤锐气,也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焦急地等待着重返前线并聚精会神地谈着战友们的来信。”

《曼彻斯特卫报》驻汉口的记者也十分崇敬地报导中国的军队。在他的文章中,最有意义的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的考察。记者写道:

“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不管八路军的政治方针如何,它具有第一流的战斗力。我听过既非中国人也非共产党人的军事专家们谈论这个军队的领导者朱德将军,他兼有汉尼拔、拿破仑、格兰特^①和罗伯特·李^②的优秀品质。

① 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北军统帅,1869—1877年曾担任美国总统。——编译者注

② 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军统帅。——编译者注

“八路军是一支独立的战斗单位。八路军和其他人民军的关系，有点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远征军和福煦元帅的关系。八路军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纪律和自己的传统。八路军的官，不称长官，而称首长。军官和士兵们吃一样的伙食。任何一个普通战士都有可能被提升为军官。八路军纪律严明，它是建立在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外国观察家们最赞赏八路军具有坚定的自觉性和高尚的道德水平。

“我的朋友告诉我，八路军是在这个战争中唯一的抓过俘虏的军队。这个军队的一些战士学会了几句日本话，在作战期间，他们常向敌军士兵喊话，使这些士兵放下武器，并且加入到中国战友行列中来。

“八路军的将军们所得薪水每月约六块中国元，普通战士每月一块中国元。在其他军队里，将军的薪水为四百美元，下级军官为七至八美元。根据政府同八路军司令部的协议，政府应当支付给八路军这个差数。八路军用这笔钱来购买了医疗用品。”

记者强调指出，八路军和中央政府以及统帅部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满意的。他写道：

“几天以前，蒋介石告诉我，他和八路军的指挥官朱德将军的关系极好，他认为朱德是一位最有才干的指挥官。”

记者注意到，双方都非常认真地执行关于统一战线的协议。中国人民的力量就在于中国人民的统一，这个统一是中国军队日益增长的威力的保证。

（聂荣聪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占领徐州之后

——中国军事战局评述

(1938年7月1日)

H. 利亚霍夫

今年五月,当日本军队进攻徐州的时候,日本的沙文主义报刊兴高采烈地描绘了徐州战役的“宏伟”场面和对中国军队的“不利”后果。因此,有人认为,应当让那些带领日本军队攻打徐州的日本战略家们,与古往今来在军事史上善于打歼灭战和包围战的汉尼拔、拿破仑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同享盛名。

日本人占领徐州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日本关于“取得了伟大战绩”的报告言过其实,它与历史上的包围战相比是很逊色的。总而言之,徐州战役的“胜利”,无非是得到了一块土地。中国军队既没有被包围,也没有被粉碎。中国司令部有计划地把自己的部队撤出徐州地区,并在几天之后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战役:反击从北面向开封进攻的日本第十四师团。结果,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日本第十四师团面临被包围和被消灭的现实危险。后来,日本人加速了从东面向归德方面的运动,并沿陇海铁路继续向西推进,这样才挽救了陷入困境的日本第十四师团。

七月中旬的郑州战役再次证明中国军队完全保持着自己的战斗力。日本人一心要占领郑州,目的是要推进到平汉铁路。在日本先头部队向郑州发起进攻之后,中国军队粉碎了这次进攻,守住了郑州,随后还把日本进攻部队的主力抛在后面,乘胜向东挺进。

日本的国内形势,在经济和军事两头吃紧的情况下,已经愈来愈复杂化了。这就大大地促进使日本军阀要求速战速决;以便结束战争。现在,日本统治集团由于战争的持续而引起的内部斗争,已通过内阁的改组而暂时得到缓和;前线部队由于有了新的增援也得到加强。很明显,像荒木、板垣这样一些侵略成性的军阀代表人物进入内阁,意味着日本想在中国进行一场决战。战役的预定目标是,集中庞大的兵力,并通过速战速决使前线的局势发生根本的转变。

根据这一计划,日本军队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已夺取徐州,但是这并没有给日本人带来预期的结果。此后,日本司令部便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役,其目的是夺取汉口。考虑到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和日军所进行的部署,可以预料到日本人有可能从两个方向进攻汉口:一个方向是沿平汉铁路从北部进攻;另一个方向是沿长江从东部进攻。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极有可能实现,因为它可以把正面的进攻与舰队的打击结合起来。日本人力图进入郑州地区,目的是要占领一个出发阵地,以便沿平汉路展开进攻;而日军舰艇之集中于长江与日本陆战之攻占安庆,则表明了安庆是日军从东面进攻的出发阵地。

在河南省,向平汉路进攻的日军由于多方面的情况而遇到困难。首先,进攻部队遭到驻郑州地区和沙河一带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其次,由于雨季到来使得河南平原的道路难以通行。由于黄河的堤坝遭到破坏,溢出的河水形成百川奔流,黄河沿岸泛滥成灾,这就造成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此外,日本人所控制的陇海铁路地段也遭到很大的破坏。这个期间他们无法运送部队和供给物资。所有这一切,便捆住了河南的日本军队,使他们无法使用技术装备——坦克和大炮。在这种条件下,从北面向汉口的进攻未必马上能够展开,而这一条进攻路线,大概也不是日军攻占汉口的主要进攻路线。

因此,日本人认为沿长江展开主要的攻势是较为有利的。首先,长江可以使日本大型军舰直航武汉,可以成为日本人集结部队和供给军队物资最方便的、距离最短的交通线。其次,可以使用长江上军舰的大炮支援陆上部队的进攻。海军舰队的支援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过去日本人正是采取这个方法保证了陆上部队夺取上海,并大大地加速了日军对南京的占领。

日本人最近暂时停止在平汉路方向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把主要的进攻力量调到长江的安庆地区,这就证明了那样一种推测,即正是这个方向逐渐成为日本人夺取汉口的主攻方向。最近期间,日本人并没有放弃在长江两岸配备陆战队的企图,他们把越来越多的舰队集结在长江上,并且还把前线北部地区的部队调到这里。

但是,日本进攻汉口的计划,甚至在实现这个计划的准备阶段就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回击。汉口北部的地形使中国军队有可能建立坚固的防御工事。它的北面有群山掩护。这些山脉从西向东、向东南,沿着河南省和湖北省交界的地方延伸。目前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正集中在这条山脉地带;而在河南的平原地区,很明显,只是配备了强大的后备力量,其任务是阻击日本人的进攻。因此,日本人沿平汉铁路从北进攻汉口必定会受阻于中国在山区地带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

日本人逆江而上的运动,同样也是不轻松的。在江上的许多地方都预先设置了障碍物。日本舰队要排除它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和耗费很多时间。此外,中国军队在长江沿岸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再者,沿着长江进攻对日本人不利还在于长江两岸均被中国军队占领,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力量不得不挤进这个狭窄的地带。用登陆部队来扩张这个地带是非常困难的。日本人在长江上大量调集军舰和频繁运输部队就为中国空军的袭击造成有利的目标。中国飞机在安庆地区已对日本舰艇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轰炸。

其结果,许多舰艇被击沉和烧毁。

中国司令部加强了汉口的直接防御。所有能够被日本人用来进攻汉口的道路都被阻塞。

很明显,日本人要准备一次新的战役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他们面临着结束改编那些经过几次战役后弄得疲惫不堪的部队的工作;他们需要援兵以保障自己战线的后方,在那里中国的游击队和正规部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活动。

中国军队准备迎接日军发动的新进攻。中国军队用新编的和配备得很好的师团加强了前线部队。这些师团正从全国各省来到汉口。中国后方的状况保证中国军队能继续进行顽强的战斗。徐州的沦陷并没有瓦解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的意志。中国政府发言人所作的中国决心继续战斗下去的声明,反映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

在目前这场由日本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残酷战争中,尽管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取得最终胜利的优势和保证却在中国这一边。中国人民从精神和物质上都准备、并将继续准备打持久战,而与此相反,情况迫使日本侵略者在期望速胜中走上了绝望的、冒险的战争道路,而胜利正不断地从他们手中溜走。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一位中国飞行员的回忆录

(1938年7月10日)

少校 林 新

1. 两次战斗

我们驻扎在南昌附近的飞机场。我们集中一切力量来保证中央防役战斗的胜利。我们祖国处在战火中，日本侵略者烧毁了許多城市，飞行员们投入了战斗。这时，情报机关向我们报告说，日本在杭州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航空基地。情报机关告诉我们，这个基地集中了一个重型双发动机飞行队。杭州还有一些战斗机。我们的司令部批准了袭击杭州的计划。这次战役订于3月13日进行。

在这次战役中，我担任长机驾驶员。起飞前，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任务。飞机分为两个分队。由九架轰炸机所组成的第一分队，必须飞到杭州的中心机场，并轰炸这个机场。由八架飞机所组成的第二分队，必须完成对杭州东北火车站的袭击。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车站上集中了载有弹药和日本部队的军用列车。

我们在准确的指定时间起飞。轰炸机一架接着一架地升上天空。所有的飞机都在机场上空集合并组成楔形队列，每个队都是独立的，它们都朝着杭州方向飞去。

在两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飞越了很多城市和乡村。几个月来，这些城市和乡村的人民竭尽全力关怀国防和祖国的安危，保卫祖

国使她免遭日本武装干涉者的侵略。我从远处看到了前线，一座小城镇正在燃烧。我们决定向右转。日本哨所可能发现了我们，它将向上级报告中国机群正飞向它们的后方。我们继续在三千五百公尺的高空中飞行。天气没有好转，薄雾仍然笼罩着地平线，但我们很快就看见了杭州湾和在薄雾中显现出来的城市。

第一分队开始执行事前拟定的计划，向机场飞去。飞行员们从远处看见了飞机库、飞机和仓库。这就是日本的航空基地。第二分队向着火车站方向飞去。高射炮开火了。这一点我们很快意识到了。因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时而这里，时而那里，都闪烁着炮火射击的火光。日本人的所有高射炮都向我们开火。只见一发发炮弹在我们附近的上空爆炸。但是没有一颗炮弹命中目标。显然，日本人的高射炮队这一天将无可奈何地宣布，对中国飞机射击是不成功的，连一架也没有击落。

日本飞机场大概已采取了一些较为有效的措施：我们看见飞机滑向起飞线，日本人派出了一个驱逐机队来对付我们。

这时，在日本飞机场地上停着三十多架重型飞机、歼击机和轰炸机。我们从高空看见了整个航空基地。中国飞行员已在日本飞机场的上空了！

我那架飞机的领航员扔下了一个一百公斤重的炸弹。其他飞机的领航员紧跟着行动。转瞬之间，日本飞机场就变成了浓烟滚滚的火海。我们不顾高射炮的射击，继续轰炸。第一分队向飞机场、飞机库、飞机和仓库投掷了五十四个一百公斤重的炸弹和一百六十四个杀伤弹及燃烧弹之后，开始向右方航行。任务已出色地完成，可以向基地返航了。领航员们报告说，我们的炸弹投掷得十分准确！

我们需要转弯向海上飞去，以便开始返航。在我们飞机的油箱里，还有很多汽油。这一点，我们不必耽心。在我们转向海上的时候，显然是停留在备用机场上的九架日本轰炸机起飞了，它们开

始向我们进攻。但是,我们的机枪手在这里表现出了自己的技能、技巧和勇敢。他们以准确而密集的炮火横扫日本轰炸机列队。两架日本轰炸机被击毁,象石头一样往大地坠落。它们的毁灭是早已注定了的。其余的七架日本轰炸机立即向城市方向逃窜,一会儿我们就看不见它们了,但是,它们很快又出现了,其目标是进攻我们的第二轰炸机分队。我们决定飞向杭州的东北火车站,与第二分队汇合。

这时,我们分队一架飞机发生故障。这架轰炸机开始掉队。它离开队列并给我发出信号,要我不要去管它而继续打击日本强盗。但是,在中国飞行队里,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置自己的同志于不顾的习惯!无论怎样危急,我们都永远互相帮助。我们派出一个轰炸机小分队,减慢速度,围着那架掉队飞机飞行,把它带到了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个小分队又返回来参加战斗。

我们的第二分队轰炸了火车站。当我们的飞行员飞到铁路线时,看见飞机场上已经燃起大火,这表明第一分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火车站上,飞行员们看见了两列挂有机车的列车。列车开往前线的一切准备均已就绪。第三列火车是从上海开出的,快到站了。于是分队队长一声令下:

——注意——轰炸!

长机机长立刻向军用列车扔下一枚炸弹,接着我们所有的飞机都开始轰炸车站。这时,日本驱逐机群向我们飞来,它们正是当我们飞临日本飞机场上空时逃离我们的那些日本驱逐机。日本驱逐机的枪口对准我们的轰炸机,并开始向我们射击。这时,我们分队长采取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把所有的飞机都转过来迎战日本驱逐机。他决定尽快缩短飞机之间的距离,以短促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闪电般的进攻来袭击还未来得及进行战斗行动的日本驱逐机。日本飞行员一时还不知道我们的意图,当日本人醒悟过

来时，我们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两个分队很快飞回基地——南昌机场，顺利着陆。飞行员们互相祝贺胜利，据领航员的报告，我们的投弹命中率很高，这次袭击的效果是出色的。我们到达基地一刻钟以后，那架发生故障的飞机也返回机场。飞行员用一个马达飞回机场并安全着陆，他微笑着走出了机舱。

返回基地后，我们便去吃饭、休息。这一夜，我们睡得很好，因为大家都累了。第二天早上，情报机关报导说，我们对杭州机场的袭击大约炸毁了二十架各种型号的日本飞机以及飞机库和仓库。在杭州车站，我们彻底摧毁了两列载有弹药和部队的军用列车。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大元帅的祝贺。他祝愿我们在争取祖国解放的斗争中获得进一步的胜利。

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客人”就光临了。的确，决不能说这些客人的到来是出乎意料的。日本空军决定进行报复，袭击我们的机场。他们一共有九架轰炸机、十八架战斗机。

当日本飞机接近南昌机场时，我们的飞机场已作好了准备。哨所早已从前沿阵地发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向我们飞来了。我们准确地知道，日本飞机在某一分钟是在什么地方，能准确无误计算几分钟之后应该在南昌市区等待着它们。

这时战斗警报响了，我们的飞机全部起飞，向着预定地区飞去。剩下的只是一些被用来保卫机场和城市的战斗机。

这时，南昌上空出现了日本重型轰炸机。我们的战斗机开始迎击敌人。这时日本战斗机赶到了，并投入战斗。接着在日本战斗机和我国战斗机之间展开了一场空战。必须指出，在空战中，谁的意志和决心更坚强，谁对胜利更充满信心，那末，谁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和日本飞机在南昌上空进行的这场空战表明中国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三架日本战斗机在城市上空被我

们击中,燃烧起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居民在这一瞬间热烈鼓掌,因为我们履行了我们伟大人民的意志。

整个空战进行了二十分钟。每个日本飞行员都是单独地离开战斗的。他们相互间的照顾很少,人人听天由命。他们迅速地离开了我们。至于谈到和战斗机一起飞来的九架日本轰炸机,他们遭到了我们战斗机的袭击。日本飞行员还没有飞到机场就开始投掷炸弹,也不看下面的目标,结果所有的炸弹都扔到郊外的墓地。第二天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被毁坏的墓穴和残缺不全的墓碑。

轰炸死人——这就是“伟大的”武士道精神的光荣!

战斗结束后,我们的飞行员在机场附近地区发现六架被击毁的日本战斗机。一天以后我们又获悉在离南昌五十公里的湖泊又发现两架日本战斗机。看来这两个飞行员在战斗中负伤后想飞回自己的基地,但是没有成功……

晚上,我们聚集在自己的机场上统计这两次战斗的战果:一次战斗在杭州上空,另一次战斗在南昌上空。两次战斗我们都胜利了。尽管我们进行的是远距离的、困难的飞行,但我们没有一点损失。

在南昌市,我们的战斗机没有放过日本人,老百姓因此而感谢我们。有一个老人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了,他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能上天的人,就能战胜上帝。”我们的飞行员已经上天了,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所能取得胜利。……这是劳动人民能做到的。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

(摘要)

(1938年7月11日)

蒸电奉悉,第一、第二两次借款条约草案,苏方审查已毕,伏帅称专候我方认可答复到后即可签字生效。现各货已开始准备,在此准备期内,职暂离此,无碍于事,拟请准赴法进行。

蒋委员长批示:复。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杨大使:真电悉。须待签字后运货日期确定时,再行赴法为要。中正。元。

(《战时外交》(二)^①,第499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

(1938年7月25日)

莫斯科。杨大使：前致史先生、伏元帅之电，有否转达？务希速催。有否订约？为何如此迟延？请详复。中正。

(《战时外交》(二)^①，第500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致中国驻苏大使杨杰 转航空委员会技术厅长黄光锐电

(1938年7月25日)

杨大使转黄光锐兄：与苏俄合办飞机厂最要，飞机马达亦能限期自制，务于此特别注重。中正。

(《战时外交》(二)^①，第500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8年8月2日)

武昌。委员长蒋：卅、艳电奉悉。(一)签订信用借款条约，双方代表照例应各交换该国政府给与之全权证书，职因未奉到信任状，只好向苏方声请通权办法，即在华由我方将第一次借款(本年三月一日)、第二次借款(本年七月一日)之两份全权证书，送交驻华苏联大使馆，请其转报苏联政府，职即可在莫签字，顷已得苏方同意，祈迅请国民政府准予办理，俾得早日竣事。(二)日苏关系紧极，苏方内定方针为：现虽不拟攻入敌方境地，惟对日军之任何攻击部队以武力歼灭之，对日方争执之边境高地，认为毫无根据，故无组织边界委员会从事勘查之必要。(三)职与苏联大使会晤二次，彼于一、二日内起程来华，详情由彼面陈。(四)伏帅代表请速汇兰州苏负责人古德金上校法币廿万元，备苏运输人员之用，汇后祈示。职杨杰叩。冬。

蒋委员长批示：第一、速由陈主任与孔院长面商，速即办妥；第四、请孔院长速办。并复。中正。

(《战时外交》(二)^①，第500—501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 致蒋介石转呈黄光锐来电

(1938年8月12日)

顷接黄光锐真电称：“借约今日签字，订货单早经交付俄方，此次订货价约一万万二千万，计轻轰炸机一百二十架、重轰炸机十架、驱逐舰二百二十架、教练机一百架、驱逐舰材料二百架、备份发动机一百二十架、制造厂机器设备美金一百万、航校设备五十万、零件二百五十万、小高射炮一百门，闻俄方明日开会审查，日内可签复，现又请耿公催俄方速办。”等语。谨呈委员长蒋。职钱大钧呈。

(《战时外交》(二)^①,第501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 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 五千万美元信用借款条约

(1938年8月11日)

缘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允予中华民国政府以向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购买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之信用借款，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特签订本条约，俾便订明上述信用借款之实施方法与条件，双方政府并为此派定全权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陆军上将杨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国家保安中将耿精·赛苗·格利哥来维茨。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借予中华民国政府五千万美元，按照公历壹仟玖佰叁拾柒年拾月叁拾壹日行市，每元美金合现金 0.892455 格兰姆，以便中华民国政府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购买苏联制造之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

第二条 第一条内所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借予中华民国政府之信用借款，自壹仟玖佰叁拾柒年拾月叁拾壹日起算，利息为年利三厘，自壹仟玖佰叁拾捌年拾月叁拾壹日起，五年内偿还，每年偿付同额数目，即每年偿付一千万美元，并同时付清已借用之信用借款之利息。

第三条 为实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借予中华民国政府之信用借款起见，双方政府特派定全权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全权代表陆军上将杨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全权代

表国家保安中将耿精·赛苗·格利哥来维茨。

全权代表依据本条约各条款，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借予中华民国政府之信用借款内，订购各种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有互相订立特种合同之全权。

第四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供给中华民国政府之各种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之品名单，以及定货各部分之交付期限，由双方政府全权代表互相酌商，成立各次定货之特种合同规定之。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之价格以及输送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边境所需之各项用费，由双方协议规定之。

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之价格，双方依据世界市场上出售之相当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并具有同一品质者之价格而规定之。

第五条 本条约第二条内规定之信用借款与利息，中华民国政府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需之物产品与原料品偿还之。

中华民国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交付商品之种类与数量，应与本条约附录第一品名单相符，并于年初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之指示，于每年偿还款额内规定之。中华民国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供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①之物产品及各种原料品，中华民国政府可于全年期内实施之。惟为偿还本年度债务而供给之全部物产品与各种原料品，须于拾月壹日以前结束。

中华民国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供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物产品与原料品之价格，双方依据世界市场上出售之相当物产品与原料品并具有同一技术品质之价格，而规定之。

第六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交付之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均以美金作价，并按照每批产品交付之日之美金合现金之

^① 原件漏抄，俄文本有此意，现补上。

折合市价。

中华民国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偿付之物产品与各种原料品,亦以美金作价,并按照每批物产品与原料品运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土之日美金合现金之折合市价。

第七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供给之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交付中华民国政府或中华民国政府为此而特设之全权机关,其交付地点以苏联黑海港埠或其他相当之边境地点为止。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为迎合中华民国政府所表示之愿望计,特表示同意供给之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边境运输到中华民国之领土内。

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边境向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交付之地点起,至中国境内之目的地止,其需之各种用费,概归中华民国政府。

第八条 中华民国政府输送之物产品与原料品在苏联边境交付。中华民国政府负有全责将上述物产品与原料品运达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边境,此项物品输送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运费,由中华民国政府于信用借款偿还额内拨付之。运费之价额,由双方依据本运输线现行之中等运价决定之。

为偿付信用借款而交付之物产品与各种原料品,于到达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土之日起,十五日期内,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为此特设之全权机关,或为此而赋予全权之人民委员会,应将偿还信用借款之物产品与各种原料品之验收,通知中华民国政府或为此特设之全权机关。

第九条 本条约第三条内所称之全权代表于执行本条约之过程中,互相发生可能之争执时,由双方政府代表组成之审议委员会按照本条约解决之。

第十条 本条约于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信用借款之债务与利息未完全偿清及与其有关之各种义务未

执行以前,双方均受本条约之约束。

第十一条 本条约以俄文与汉文缮制。

两原本同效。在莫斯科制成两份:壹份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执存,壹份由中华民国执存,双方全权代表特签字为证。

附录

第一品名单

一、茶叶

二、皮革

三、羊毛

四、锑

五、锡

六、锌

七、镍

八、钨

九、丝

十一、桐油

十二、药材

十三、紫铜

(《近代史资料》总 89 号)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奉命参照苏联 顾问班果夫之作战意见改进前线 军事致何应钦等代电

(1938年8月13日)

何总长、徐部长勋鉴：据报俄顾问班果夫自前方归来后，对于前方作战意见如下：（一）战地情报，截至现在止，仍是毫无组织，影响抗战前途非浅，今后急应慎择干练军官，编练战地情报搜索队若干队，出发最前线，担任判断敌情责任，同时并须携带通信用具（如无线电台及军用鸽等），俾能随时报告司令部，作为决战之最好资料。（二）下级军官，如营连排长等军事学识根底太差，应由高级军官随时随地监督指导，尤其对于空袭时，应令特别沉着处置防卫及隐蔽等勤务。（三）南方甚缺乏防空武器，如高射炮及高射机枪等，前方敌机飞行高度仅三四百公尺，可用普通机枪仰射之，即有效力，因机枪过少，致敌机能低飞肆虐，反之，后方如长沙等市空袭时，各处用机枪乱射，因敌机飞行太高，致毫不发生效力，应将后方机枪，多移至前方应用，使敌机不敢低飞，减少威胁，至为重要。（四）炮兵指挥官应特别机警，如敌机在炮兵阵地上空盘旋，即系侦查，应速将阵地移动，再在原地设置伪装，以欺瞒敌人，否则必遭敌机轰炸，此种情形，在前方各地，曾屡见不鲜，应特别注意改正等语等情。希即参考改进可也。中正。元七侍参鄂。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军委会抄送苏联顾问保葛达诺夫^①视察 南浔铁路前线驻军建议致何应钦代电

(1938年8月16日)

何总长勋鉴：兹抄发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部苏联顾问保葛达诺夫视察江南战线之观感一件，其第六项，应速电沿江、沿湖各师长改正，余希与徐部长切实研究，通令各总司令、各军师长切实改正为要。中正。铤四侍参鄂。附件。

中华民国廿七年八月十六日发

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部苏籍一般军事顾问保葛达诺夫上校，于七月十二日奉命赴南昌第一兵团司令部各高级将校会晤。二十一日自南昌出发，先赴七十四军五十四师及五十八师防地，继赴六十六军一五九师防地一部，详细视察。八月初因病，七日返武昌就医。兹将该顾问此次视察结果，对我军缺点及应改善之建议，分呈于下：

(一)各阵地构筑，应自挖土起，即应设法伪装，不应阵地构筑完竣后，再加伪装。盖挖土时，土色或黄或褐，与周围草地，显然可分，敌人可利用飞机照相，即知为将来阵地，由此亦可判断将来作战计划。

(二)轻重机关枪，及小口径炮阵地，射角太小，不能发挥其整个威力。

(三)轻重机关枪阵地配备位置，务使其火力应与左右两方均成为交点。我军现筑各阵地，其火力交点，只在一方(此点已由顾

① Богданв。

问建议改正)。

(四)轻重机关枪阵地,有时死角太大。

(五)轻重机关枪座,多不适合机关枪手之运用。

(六)沿湖岸之阵地,应在离岸五十公尺地点构筑,不应直筑于沿岸。

(七)炮兵与步兵,须有协同动作。各指挥官尤当特别清楚彼此情况。

(八)师旅团营防区分界处之防御,应确实规定,以免贻误。

(九)各下级指挥官,均无地图,道路不熟,影响行军匪浅。

(十)各军谍报通讯不健全,应速设法整理。

(十一)各军多无武装情报侦察搜索队。

(十二)与友军谍报通讯,应有确实联络。

(十三)各小部队作战时,在短距离内,应利用旗语,以代传令。

(十四)各地无线电台之呼号及电波,应时常变换(此点与其他通信顾问意见一致)。

(十五)各军师旅团等番号及驻在地点,应改用暗号,以防传令时敌人间谍在电话上窃听。

(十六)各部队如临时奉命在某地构筑工事,设该地将不由该部防守时,每多敷衍从事,有误军机,应严令切实注意。

(十七)与友军防守一地时,指挥官应彼此密切联络。

(十八)各军司令部内之参谋及高级将校,应常赴前方,视察地形,及实地指导。

谨按:保葛达诺夫上校,现年四十二岁。幼年曾参加欧战,充机关枪手。壮年参加国内战争,作战经验丰富。革命成功后,复入该国陆军大学深造,学科亦颇有根基,与中共无关系。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

(1938年8月17日)

莫斯科。杨大使：各种货品务于九月中旬运到香港，以资决战，以大战时期必在九月中旬也。此战关系最后之胜负，请以此意转告伏帅，务请设法协助我能如期运到也。各种飞机应用甚急，更望速运为要，如何？盼复。中正。

(《战时外交》(二)^①，第502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致伏罗希洛夫元帅并转斯大林电

(1938年8月17日)

莫斯科。杨大使：密。即速译转伏元帅并转史达林先生大鉴：前电计达台览。卢大使到汉已与详谈，对于贵国援助我国之种种厚意，实不胜感谢。现第二期借款之约，业承签订，我方所希望供给之物品，亟盼迅即起运来华，预料敌人在九月内必倾全力进攻武汉，九月中之决战，将为中国抗战与东亚安危一最重要关键，故亟盼贵国所允接济之武器，务于九月中旬如数运到，以供此一重要决战之应用，各种飞机待用尤急。余必督励全国军民予暴敌以出其意外打击，而不负贵国之热心援助也。兹再代表中国全体军民向执事表最诚挚之谢意。敬祝健康。蒋中正。筱。

(《战时外交》(二)^①，第503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

(1938年8月22日)

委员长蒋：○密。与苏商洽之飞机厂，年出四百至千架之数。厂址以暂设迪化为有利：一、材料供给，旬日内确实可到。二、开办迅速，短期内可出品。三、由出品地运至供给地较近。四、苏境内有华工数千，刻正移新疆及中亚一带，可利用。若昆明：一、距材料供给地过远，开办较慢，即以后之补给，亦不可靠。二、海运有危险性，每次之供给，非有两月以上之准备不可，且不经济。在抗战中，自以出品迅速而经济、运输确实安全为主。谨申管见，伏乞钧裁。职杨杰叩。廿二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8页)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钱大钧致蒋介石鉴呈

(1938年8月25日)

本月二十三日下午十一时俄大使约职前往谈话，至下午一时始别。兹将谈话大要，摘呈如次：

一、空军轰炸长江敌舰之经过及损失。

二、纪加列夫关于使用空军之意见争执经过，嘱职详告，职当以实情告之。

三、职谓据莫斯科电告，俄方已允日内起运驱逐机百架来华，照所开货单，以后尚有大批续运，拟请催运，并拟请仍派志愿军来华，我方拟接收半数。俄大使谓飞机非已制就存库者，尚须赶造，此点须请原谅，不可催促过急。至华方飞行员何以尚如此不足？抗战一年来之训练如何？职谓因器材不足及学校迁移，重新设备，故训练迟缓。俄大使谓学校使用何种飞机？是否请法教官？职谓系用北美教练机，聘有美籍教官。俄大使谓，闻有法机及法员如何？职谓此系战斗机聘有法员，并将实情告之。

四、俄大使谓以后尚有其他各国飞机补充乎？

职谓以前订购者，大致已到齐，以后并未订购任何飞机，在空军立场言，现苏俄能订购大批飞机，则为求机种及性能之纯一，不欲再订购别种飞机。俄大使谓在抗战期间，应求实力之补充，如其他各国可以借款购械，应尽力进行，现在有无此种可能？职谓此系外交事情，我不详悉。俄大使谓借款购械，可增实力，此最紧要，杨杰大使虽非外交人才，但彼能着眼于此，努力进行，即其成功。其

他各国大使，只知研究国际间之形势，欲求同情援助，毫无实益，不能增加实力，此事非由领袖加以强制，使其在借款购械上努力，并可列为考成，或能有效。然实力援助，有关于国策之确定，如有动摇，即不能成功。职谓我委员长抗战到底之策略，任何人不能动摇，任何人均信仰到底，外间谣言系敌方捏造，不足听也。俄大使谓委员长态度坚决，任何人均信任，惟政府中如有一领袖有异样主张，彼可领导一部分人，有一部分力量，即足影响大局，并足影响于实力援助之外交也。

五、后提兰州招待及警戒事宜。谨呈委员长蒋。职钱大钧呈。八月廿五日。

（《战时外交》（二）^①，第 504—505 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白崇禧转报炮兵监刘翰东与苏联顾问 毕诺乌索夫视察长江南岸一带 情形致何应钦呈文

(1938年9月2日)

据本部炮兵监刘翰东呈称：

“窃查自抗倭军兴以来，各炮兵部队所负任务綦重，对于教育，时虞废弛，为督促炮兵，虽在战时战地，亦应切实实施机会，及实地教育计，乃于八月十八日，奉命偕同俄顾问毕诺乌索夫，沿长江南岸一带视察，三十日返部。谨将视察所得情形，详陈于下：

一、视察区域

马头镇、田家镇、半壁山、石灰窑、黄石港、鄂城、葛店。

二、视察部队

炮十团一、二营，炮八团二、三营，炮七团一营，炮十一团一、二营，炮十六团三营，炮兵第六营，田家镇要塞，黄鄂区要塞，炮校侦察队。

三、教育要点

1. 远隔观测诸法则。
2. 对兵舰射击要领及法则。
3. 阵地遮蔽及伪装。

4. 步炮协同。
5. 武器、车马之节用、爱护及保管之要领。
6. 俄式炮及附属观测器材之教授。
7. 考察其工作勤惰，及确实与否，并在实地予以详切之指示。
8. 射击图之调制及情报记录。

四、意见

1. 由武昌至阳新公路，有钢轨障碍物数处，致碍炮兵运动及汽车输送。因距敌较远，目下宜飭主管机关，暂行除去，至必要时，再行设备。

2. 炮校侦测队，现时沿江实地测量。关于消耗品之补给，及士兵给养等，宜按战时待遇，以资鼓励，而免向隅。

以上各点，均系实地视察所得情形。至部队成绩，另表附呈。”等情。据此，查所呈各节属实，理合备文转呈鉴核示遵。

谨呈

参谋总长何。

附部队成绩核表一纸。

军训部部长白崇禧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日

沿江南岸炮兵部队视察成绩考核表(略)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一日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为汉口而战

(1938年9月19日)

H. 利亚霍夫

日本司令部占领徐州之后,展开了一场新的战役,其目的是占领汉口。

汉口(武汉)地区实际上包括三个城市:汉口、武昌、汉阳。汉口是行政和工商业中心,位于长江北岸。武昌位于汉口的对面,长江的南岸,是湖北省的行政中心。汉阳是冶金和军事工业的中心,与汉口毗连。

长江以北的地形对组织防御是最为有利的。在汉口以北两百公里的地方就进入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的山区。群山护卫着从北面和东北面通向汉口的要道。长江盆地位于较南地区,地势比较平坦,湖泊和水渠纵横交错。

中国司令部很早就预见到日本企图占领汉口,并在汉口周围筑起防卫工事。在三个城市所在的丘陵地区,已建立了一条带形防御阵地。它们相当坚固,是日本军队进攻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无论在长江北岸和南岸,都修建了这样的阵地。此外,中国司令部还利用位于汉口北面和东北面的山脉来巩固防线。这里也修建了防御阵地,并且封锁了作为汉口屏障的所有山地的通道。

长江对进攻者极为有利。这条河流在正常条件下有几公里宽;现在正是暴雨和洪水期间,江水大大漫出岸边。

就防御而言,长江以南地带比长江以北山区困难。尽管长江以南的地形也具有山区特征,但是,那里的鄱阳湖和许多河渠却大

大地有利于日本海军的进攻。

中国人缺少军舰，因而不得不在陆地上展开军事行动。同时，他们还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来进行防御。

日本司令部把长江作为进攻汉口的主要路线。日本的进攻方法是陆海军的紧密配合和相互支持。

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日军的第一步行动都是由海军来实现的。先是一批装有大炮的军舰靠近长江岸边的中国阵地，并且用自己的火力削弱中国阵地。紧接着就是使用运输舰上的登陆队在指定地区登陆。最先登陆的通常是由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小部队。如果这支小部队能够在滩头阵地上固守，那么日军就会用陆军部队包括步兵和炮兵来加强防守。然后这些部队便逐步扩大战果，并在军舰的支援下把中国军队从长江沿岸赶走。

日本司令部暂时停止了对其他各条战线的进攻，然后在长江盆地集中了二十万军队和将近一百艘军舰。为了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日方还把在中国的大部分空军调到这一带作战。

尽管长江给日本军队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但他们的进攻仍然非常缓慢。

日本的进攻之所以缓慢，是因为中国的防御很坚固。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每一次登陆都给予了致命的回击；许多登陆部队被中国战士消灭，或者葬身江底。中国空军也不断出动袭击日舰，使日本海军遭惨重失败。中国空军焚毁、击沉了敌人的许多军舰，阻止了敌人的运输活动。中国军队多次转守为攻，阻挠了日本人的行动，经常把进攻者甩在后边。

在日本进攻汉口的道路上，第一个障碍是大通附近的河岸防御和河道障碍。日本军舰于6月初到达大通并用炮火摧毁了这个城市。6月15日前夕，日本人抵达长江沿岸的重要据点、安徽省的主要城市安庆。日军以大约一个步兵旅团的兵力在这里登陆。另一支登陆部队则在安庆南面登陆。日军登陆部队通过联合行动

占领了安庆。

马垭是中国防御工事中的又一个重点,它长期起着牵制日本人的作用。日本空军从6月20日起对马垭进行了猛烈的轰炸。6月22日,日本军舰冲向马垭并向中国防御工事开火。中国防御部队粉碎了日本人登陆的企图。6月26日,日本部队乘快艇沿着当地河道冲进马垭以东地区,并由此向中国阵地进攻。但是,中国军队打退了日本部队的袭击。只是在7月2日日本大批陆战队登陆之后,马垭才被攻陷。

7月,日本沿长江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九江市。日本军舰在突破了长江上的几道障碍之后,进入与长江相连的鄱阳湖。这就使得日本人能够在九江附近中国防线的右翼登上湖岸。7月28日,日本人的登陆部队在舰队的配合下占领了九江。

在九江通往汉口的道路上,日军陷入了不能使用机械化装备的山地。日本军队距离汉口越近,他们所遇到的来自中国防御部队的阻力就越大。

整个8月一个月,日本人的进展不大。同时,中国司令部还及时地估计到日本人有可能在南昌南面发起进攻,并把新部队集中到这一地区。尽管侵略者大规模地使用毒气和化学武器,但仍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

中国军队不仅坚定地保卫着自己的国土,而且在8月份还进行了反击,使日本人遭到几次重大失败。中国军队通过战斗,夺回了长江北岸的宿松。

很明显,日本人极力要把中国军队从长江盆地吸引出去,同时日本人最近已开始从六安方面向长江以北进攻。在这里,日本人集中了三个配有现代化装备的步兵师团,从六安方面向平汉铁路方向进攻。在日本占领汉口的作战计划中,这个行动带有配合的性质。

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是扩大了一些,但不可避免地会给他们带

来越来越多的困难。日本人越是深入中国腹地,中国居民对他们的憎恨就越深,中国游击队在敌后的活动就开展得越广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中国进行着一场必将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为汉口而战

(1938年10月12日)

H. 利亚霍夫

电报传来长江前线的中国军队在德安附近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中国军队成功地包围和全歼了日本一零一师团和一零六师团的两个旅团。

日本在德安的失败,再一次把国际舆论界的注意力吸引到日本进攻汉口的进程上来。

众所周知,长江前线的决战已经进行了四个月。当日本司令部在沿着长江通往汉口的要道上遇到严重障碍之后,就把主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地区。在这个地区,日本人发动了六安向信阳(京汉铁路南段)的进攻。日本人进攻的另一个方向是长江以南地区(西坑和武宁)。

很明显,日本司令部企图再次包围保卫汉口的中国部队。它力图切断这个中心城市北面和南面的铁路。进攻路线的轮廓表明,日本将军们仍然打算实现自己的“钳形攻势”,其目的是使汉口附近的中国军队遭到“巨大的失败”,并以此赢得战争的胜利。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人在信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信阳的平原地带使日本人在战斗中得以集中和使用大量的坦克和摩托化装备。在这一地带活动的三个日本师团依靠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突破了中国防线并向西推进。

日军朝这个方向进攻的目标是潢川和商城。9月19日前夕,日本占领了这两个据点。此后,日军继续沿公路向西推进,9月22

日，日军占领了罗山。最近几天，日本先遣部队可能抵达信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将切断铁路。

日本人占领信阳之后，大概将转向南方，其目的是沿着铁路向汉口推进。但日本人在这里也将碰到很多困难。首先，信阳以南的地形变化很大。平原延伸到这里便接上大别山山区。日本军队在这里将受阻于中国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是早就在山区里准备好用来封锁汉口以西的所有通道的。在这种条件下，侵略者必须动用大量的技术工具。然而，山区地形对于大规模使用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是很不利的。毫无疑问，这一切必将大大阻碍日本人从北面向汉口的进攻。

在长江谷地，大约有五个日本师团在发动进攻。最近几周，日军为了占领九江以西的沿江防御阵地，正在和中国军队展开一场激战。9月18日，日本人占领了长江北岸的防御据点武穴。9月25日占领了长江南岸要塞富池，9月28日又占领了长江北岸的田家镇。这些战役使日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还有五十多架日本飞机不断地在战场上空活动。

在这次战役中，日本人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有一个师团就有两个团长被击毙。在很多部队中，营连级指挥员的伤亡人数是惊人的。在德安附近的战斗中，日军阵亡人数超过了两千人。

日军在汉口附近的损失迫使它把大量的新兵从日本调往中国。最近三个月来，日本司令部不得不再扩充几个新的师团，并把他们调往大陆。目前，日本在不断地征集预备兵，并通过短期培训将他们派往前线。日本国内各地都在征集预备兵，其人数已达几万人。

因作战部队的粮食供应经常中断，加之战斗情况日益复杂，在日本军队中已出现流行病。这样，日本人除了伤亡之外，还不得不从前沿阵地撤退大量的病员。

中国空军使进攻的日本纵队遭到惨重失败。9月底，中国飞

机对罗山方面日军的轰击,给日本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并推迟了他们进攻。

尽管日本军队拥有全新的技术装备和采取陆、海、空军的配合行动,但是,汉口保卫者的英勇行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大大降低了日本军队的前进速度。最近两个月来,日本进攻的平均速度一昼夜不超过一公里。

中国军队在通往汉口要冲的英勇斗争中,博得了它应该得到的声誉。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损失

(1938年10月16日)

M. 季霍米罗夫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什么前途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有两个事实给发生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作了新的说明。侵华战争进行了一年,到今年七月七日止,日本共伤亡三十五万人。最近四个月,日军在进攻武汉期间,仅在这条战线上,日本人被打死、打伤、患病和被俘的人数已达四十万人。中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将军强调指出,日军之所以遭到惨重损失,是由于最近期间从日本调来的增援部队的作战能力大大下降所造成的。

日本军阀对中国真正的抵抗力量从来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他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日本军队准备用三个月时间结束战争,所以他们不择手段地进行欺骗。最近日本人夸口说:八月底以前他们将占领汉口,后来又把这个期限推迟到十月中旬。现在这个期限已经到了,但是汉口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日本人在德安地区发动的进攻也很不顺利。从10月9日深夜到次日,日本人在德安地区损失了两万人。德安给侵略者带来了极大的失望,这和三月底台儿庄战役后的情况很相似,在那里中国军队击溃了日军两个师团。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日本每天的军事支出达一千万日元,现

在每天的支出不少于两千万日元。这不能不反映在日本的财政状况上。日本不输入战略原料就不能进行长期战争,因而军事战略原料的进口,耗尽了国家的黄金储备。

正如《纽约时报》所报导,在1938年头七个月中,日本运往美国的黄金值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万美元。而最近一个半月,输出黄金的价值已高达五千一百五十二点八万美元。这充分说明,日本在战争过程中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根据《纽约时报》的资料,1938年日本棉花的进口减少百分之六十,同年六月日本钢铁购买量下降三分之二,而废铁的输入较之1937年下降百分之四十。据《纽约时报》报道:

“日本只能依靠输出大量的黄金来缓和自己的经济危机。原定输出的一亿美元黄金将很快耗尽,其中有四千万美元已经在八月份输往美国。当这一亿美元的黄金耗尽时,日本银行的保险柜里就只有值一亿五千万美元的黄金了,其中的五千五百万美元还需留在国内,作为进行内部清偿的最低保证金。这样,日本就只有九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了。即使战争的规模不扩大,这些钱也够用一年。”

现在可以说,这些推测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因为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并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加剧侵略者的经济和财政灾难。

日本的军事预算去年为二十八亿日元,今年已增长到四十八亿日元。因此,日本金融界的一位著名人士在发表于《政友会通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对日本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这丝毫不足为奇。这位金融家写道:

“明年,在加重劳动人民无力承受的负担以后,财政预算还要增加。如果战争还要长期继续下去,那末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原料储备将不断地耗费。但从国外购买战略原料需要黄金,而日本的黄金是很少的。”

中国在准备战争的第三阶段时,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增长。中国人民对胜利的信心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知道,甚至简单地计算一下作战的后备力量,也没有理由对胜利表示怀疑。

日本的国内形势越来越紧张。和平时期积累的原料储备大部分已经用于制造武器。苛捐杂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从这种严重的经济状况中已经看不到出路。日本居民由于战争已经疲惫不堪。日益上涨的物价和重税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法西斯宣传品号召群众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购买国家发行的公债。《日本广告报》报道说,卫生大臣拟定了关于限制三十二种最主要商品需求的措施。这些措施将导致八十万失业,尽管失业者的人数目前已达到一百三十万。

“战时紧急状态”的规定不仅对工人,而且对农民、小商人、小业主和手工业者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有四百九十家小企业倒闭。由于原料不足,有五百一十三家中小企业停产。

“紧急状态”还加重了受到饥饿威胁的、疲惫不堪的城市居民的重担。

就连日本首都的警察也对中国“事件”表示“不满”。在东京的大街上,常常可以看见穿着木屐的警察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不满情绪。因为政府缺乏皮革和橡胶,除了满足部队的需要外,几乎停止了皮鞋和胶鞋的生产。

日本的侵华战争,甚至在军队里也越来越不受欢迎。

香港出版的英国报纸《华南早报》报道了被派往台湾的七千名日本兵的暴动。由于突然发生的疟疾、痢疾、霍乱以及其他疾病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使日军情绪低落,且有日趋严重之势。

自战争爆发以来,日本陆军和七百多架海军飞机被击毁,飞行员伤亡达一千零六十四人。日本海军也遭到巨大损失。有三十多艘军舰被击沉,其中包括一艘排水量为七千一百吨,可运载四十架

飞机的航空母舰。中国空军还击毁和击沉日本运输舰多艘,其中包括一艘排水量为一万五千八百二十吨的大型运输舰。

这就是日本军阀在中国贸然进行军事冒险的一些严重后果。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苏联顾问郭夫东视察武汉 卫戍区阵地情形报告及建议

(1938年10月)

报告十月二日于武昌

武汉卫戍区工事地带，经派俄籍顾问郭夫东等前往视察完毕。兹据呈送武汉卫戍区阵地视察情形报告及建议书一份，尚有见地；惟间有未能适合目前实际情况。除关于各部队应须注意及改正事项，拟飭照办外，理合检同原报告及建议，呈请鉴核。谨呈

委员长蒋。

职罗卓英

武汉卫戍区阵地视察情形报告及建议

[报告略]

(五)建议

1. 指挥组织之意见：

(1)武汉卫戍区，分为两大部分，北部自阳逻至大军山一带，南部自金口至葛店一带，自大军山至纸坊一带阵地，既由第三集团军担任防务，南北两岸运运(输)补充，极感不便，且指挥不灵，并无若定之成算，应飭改善。

(2)武汉卫戍区，南北两岸之阵地防军内，应各设炮兵指挥官工兵指挥官、通信指挥官、医官、化学部队指挥官以及防空指挥官等，以专责成。

(3)江北岸阵地，每段应派专员，负其职务而便指挥。

2. 江北阵地工事设备之意见：

(1)江北各阵地，每段阵地之前缘，应即确实划分，并应统筹全

部之计划。

(2)每段阵地之各长官,对于所设之工作,限于二十日至三十日间预定完成之计划。

(3)每段阵地之长官,对于工事设备之器材,应详审其数量(例如洋灰、铁筋、铁轨、木材、钉铁丝、地雷及其他爆炸物)。

(4)各阵地中所有机枪之掩体及指挥所之上面,应覆以盖,而散兵坑前面、宜设胸墙。

(5)永久工事内,应即派机枪手以资练习作战、射击,并随时应有作战之准备,应将其中积水淘出,加以伪装,清除视界及射界中之障碍物,更应装设机枪架铁门及射孔铁门等项,俾资利用。

(6)阵地纵深应有 5—6 公里,并应构筑斜交阵地。

(7)装设之步兵障碍物,与散兵壕之距离,应大于 50 公尺。

(8)每段阵地外,应设备各种障碍物。

(9)应在主要防线前方,设置地雷及其他之爆炸物。

(10)凡湖沼及江岸,预料敌人必经之点应设备水雷,以及其他水中障碍物。

(11)应备工事、设备、机枪阵地、炮兵阵地与障碍物之详图。

(12)沿战线之地带,积极建筑永久工事,并须注意火力交叉点,以便组成火网。

(13)多建筑道路,以利军运。

(14)沿湖沼及江岸之阵地,宜多设轮渡码头。

(15)凡轮渡码头,宜备 2—3 汽船及 20—30 木船。

(16)各段阵地中,应选择炮兵阵地,并须积极设备之。

(17)江南及江北地带之阵地,宜各派遣工兵一团,并须与以相当数量之器材。

3. 江北阵地防御之意见:

(1)阳逻东方之最前线,应向团风方面移进,以便与对岸葛店之阵地取军事上之联络。

(2) 团风新州及其以北地带应有准备。

(3) 仓子埠一带之前进阵地,应划归第五战区,同时沿沈家干河岸一带亦应布防。

(4) 第五战区之部队,应与黄陂孝感等地,以及宋埠黄安间,连成一巩固之阵线。

(5) 第五战区之部队,如转移阵地时,应将其附近之道路桥梁及其他建筑物,全部捣毁之,犹不能稍留。

(6) 每段阵地前方,10—15 公里内,设掩护阵地,并以少数部队守之,于转移阵地时以便作破坏工作。

(7) 在襄河南岸构筑阵地,以便凭河固守。

(8) 将湖沼沿岸之阵地,向其岸边移近,或在其岸边选数个有利之据点,此外各湖沼岸上之据点,亦应有军事上之联络。

(9) 各湖沼之北岸,须配置相当之炮兵,以便在双重炮火之下,掩护湖沼及其沿岸。

4. 军备上之意见:

(1) 须发给各部队简单之防毒面具。

(2) 营部以上之指挥所,应设防毒掩蔽部,因之宜备通风机及过滤器。

(3) 每团中应备高射机枪 10—20 挺。

(4) 宜备必须之器材(洋灰、铁筋、木材、铁丝等)。

上述各项意见,希予采纳,以期完成保卫大武汉之计划,而各处之缺点,应饬改正之。

顾问 郭夫东

翻译 陈士廉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美国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

(1938年11月2日)

Л. 佩岁夫

“日本分明力图把中国征服,并从这里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撵出去。”——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美国国务院外交部几天前公布了1938年10月8日给日本政府的照会,这个照会是由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递交给日本外相的。

照会说,“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政策是与机会均等原则相对立的,换句话说是与‘门户开放’的政策相对立的。日本政府在回答这一看法时,同样根据另外一些理由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向美国坚决保证:一定恪守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但是,美国政府不得不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有关当局违反了日本政府的上述保证,仍在不断地破坏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美国向日本递交的照会,暴露了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并在日本占领满洲之后显得特别尖锐。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在远东有着重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美国以最沉重的打击。

1899年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是要求给美国资本享有同等机会并发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与中国通商。由于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资本难以打入,因此特制订了这样一项政策。

日本在满洲的地位特别优越。日本限制了“非来源于日”的资

本进入满洲。日本在贷款给中国修铁路和办企业的同时，规定中国只能和日本打交道。例如，日本向修筑吉林——长春铁路和新民——沈阳铁路提供贷款，其先决条件是中国在继续修筑铁路或铁路支线时，必须向南满铁路公司要求财政援助。这样，通过贷款的方式，日本就获得了对中国许多铁路的拨款和监督的垄断权。

在筹建南满铁路时曾规定，只有日本人和中国人或者他们的政府才能成为公司股东。但后来南满铁路公司却变成了日本独占的财产。

日本给中国“汉冶萍”冶金公司贷款的先决条件是，公司管理委员会必须让日本人担任财政顾问和技术顾问，以及公司只能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日本人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终于完全控制了这家公司。日本采用讹诈、暴力压制、收买和欺骗等方法，在修筑满洲的一系列铁路中获得了“特殊的权利”。

显然，日本人所干的这一切限制了美国在各种有利的场合进行投资的机会。

日本占领了领土面积几乎超过整个日本及其殖民地两倍的满洲（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这就直接触动了美国的利益，打破了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所形成的暂时平衡状态，并把太平洋变成了战争中心。

满洲政权（即关东军司令部）对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实行监督。在这种“监督”制度下，日本几乎垄断了满洲所有的工业部门，包括铁、钢、石油、煤、金、化学制品等等。日本还在所有工业部门建立了日本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日满”公司。尽管日本不止一次地郑重宣布遵守满洲的“门户开放”原则，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是对石油进行了国家垄断，这就大大触犯了美国资本的利益，并引起美国政府方面的正式抗议。

许多外国公司，例如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英荷亚细亚石油公司，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机器制造公司等等，均中断了自己

在满洲的业务活动。

1937年10月,日本把关于监督外汇业务的法令搬到满洲。这个法令规定,凡每月金额超过一千元的外贸和对外信贷活动,一律实行许可证制度。一切与国外的外汇交易均受到监督,但与日本的交易除外。

这个法令使日本有可能几乎完全挤掉美国和其他国家与满洲的贸易。美国杂志《远东评论》写道:根据目前这个法令,“除日本以外,满洲与所有国家的贸易都将瘫痪”,法令“将利用与日本友好的强国特别是德国的有利方面。”

新的外汇法使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遭到沉重的打击。它使日本人处于比美国人有利得多的地位。如果说最近美国和满洲的贸易显得有些活跃,那也只是某些暂时的、特殊的原因所致,即由于在中国的战争日本需要输入美国的军事战略原料。

从1937年12月起,日本“放弃”了自己在满洲的治外法权。此后,又把对满洲日本公民的警察管辖权和对南满铁路地段的政治监督都交给了“满洲国政府”。当然,日本人放弃治外法权纯属走过场,这样做根本不会改变日本人在满洲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日本官僚把持着整个政府机关。众所周知,满洲“政府”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傀儡。现在,日本人不再需要更多的“权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制裁。但是,其他国家侨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日本军阀通过“放弃”治外法权造成一种形势,即一切外国侨民都归“满洲国”法庭审判,也就是归日本法庭审判。

日本帝国主义者1937年7月开始的侵华战争,进一步把美国资本从中国排挤出去。当日本占领华北和华中一些城市后,马上就在那些地方的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建立了自己的垄断权。在美国的照会中,引用了一系列事实来说明日本完全拒绝美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些事实包括日本在华北和华中组织垄断的电话——电报公司,成立垄断长江三角洲全部水路运输的日本航

运公司等等。

日本军阀的代表人物，公开地坚持要把“白色人种”从中国排挤出去。前不久，日本内务大臣在1938年1月4日和日本《改造》杂志记者的谈话中宣称：“远东白色人种的利益在日本代表团面前应当自行让位。中国、满洲国和日本应当建立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联盟……我坚信，黄色人种将获得上帝预先准备授予它的一切，白色人种的霸权即将结束。”

1938年1月26日，同盟社发表了大名鼎鼎的荒木将军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将来我们会遇到比日中战争和日俄战争更大的困难，但是通过这些困难，我们将在东方然后在全世界扩大帝国的权力和制度。”我们没有丝毫的必要就这位将军的荒谬议论进行辩论，但是，这些议论给我们提供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对待“机会均等”政策的充分认识。

1935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达两亿美元。美国全部商业投资的百分之六十五集中在上海。日本对上海的占领，导致了美国企业家的破产。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专横及其所采取的恐怖行动，造成了美国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急剧下降。

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和在中国航运中的损失也不小。

在战争期间，从1937年起，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百分之三十，进口减少百分之六十五。航运收入与商业一起急剧下降。

日本占领华北和华中的许多大城市之后，许多与美国利益直接相关的最重要的商业中心瘫痪了。“日本既将天津和上海占领，就抓得了外国与中国这一广阔市场通商的钥匙。这就是说，当日本还掌握着上海和天津的时候，它随时都能把英美从其投有巨额资本的中国中部驱逐出去。”^①

日本的侵略触及到美国利益的还不仅仅是给美国的商业和投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版，第442页。

资带来了物质损失。1938年1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回答参议院质询美国在中国投资数额时说,“美国在远东、欧洲和美洲大陆的利益,既不能用居住在各国的美国公民的数量来衡量,也不能用投资和贸易的数量来衡量。美国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各国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至于谈到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半数的远东的形势,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美国的这种利益,比美国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更重要,甚至比立即保卫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的富裕生活更重要。”

最近,日本在华南开始武装进攻并占领了广州。日本极力要中断中国和英美之间的一切贸易往来。因此,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的美国政府向日本发出照会,不是没有原因的。美国要求日本政府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

日本政府在回答美国照会时大概重申了自己“尊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和权利。但是,在实践上日本政府将继续顽固地执行排斥美国资本的政策。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太平洋竞争者之间,侵略国和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人民必胜

(1938年11月7日)

B. 罗戈夫

中国人民在反对残暴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战争中，迎来了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在广州失守、武汉撤退之后，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战斗意志并没有丝毫减弱。苏联的榜样鼓舞着中国人民。

人们都这么说：“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如果苏联能够反对若干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捍卫自己的独立，那末我们一定能赶走日本侵略者！”

在前线和后方，有数以百计的指挥员经常向我询问有关斯大林同志、苏联、红军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问题。

人们把勇敢的中国游击队战士称为“夏伯阳”。中国现在有几百支游击队。每支游击队里都有中国自己的“夏伯阳”。

在湖南省一个小手工业作坊，我看见人们以十分爱戴的心情用丝线编织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

我在日本占领的芜湖曾问过一个船夫：关于苏联你知道些什么？这个船夫在回答时热情地叙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事情。我不大听得懂他的话，但我觉得他在努力转述一位大学生曾经给他朗读过的故事。这就是高尔基的《母亲》。

在遥远的成都市，上个月上演了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二十一年来，到过成都的苏联公民不到十人。这部影片给观众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他们第一次真正了解了十月革命。观众孙

友在评语中写道：“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和解放人民，应该学习列宁同志的斗争毅力。”

另一位观众刘炳写道：“列宁教导我们，革命的胜利完全取决于群众的力量和团结。毫无疑问，把全体人民联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在广州地区，那里没有铁路，人们用一种小型马运送飞机用的汽油。在那里我听到驼运队的赶马人在唱：“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在南京、武汉、广州、长沙、成都和重庆，在战争期间都开办了俄语学校。中国青年希望了解普希金、高尔基、列宁、斯大林的语言。

郭沫若是最著名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又是歌德和高尔基著作的译者。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中国新文化的历史很短，总共才二十年。但是在这些年代里它走过了其他国家要经历三百年才能走完的历程。在这个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文化起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两个五年计划的光辉成就鼓舞着我们，而苏联的文学和艺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我们应当遵循的光辉榜样。中国的话剧、电影、漫画、木刻、音乐，特别是现代短篇小说，都处于俄罗斯文化影响之下。正如在解放战争过程中要加快实现中国的民族改造纲领一样，也要加快改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

苏联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他们在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中的光辉灯塔。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他的世界观受到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他在谈到关于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党时说过：

“俄国革命者是以特别坚强的意志和远见卓识为特征的。”

孙中山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于“党组织的完善”。这位英勇的中国革命者断言：

“应该把俄国的方法作为榜样。必须仿效俄国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学会取得胜利。”

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国家苏联的论述，反映出中国人民对苏联的热爱。

孙中山在论及苏联时指出：“它重视的只是人道、正义和真正的道德。”

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极大兴趣，从以下事实可以证明：在战争期间，中国中央出版社共出版三百四十六种书籍，其中关于苏联的就有四十一一种，其中包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谢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以及许多高尔基著作的译本。目前正在准备出版苏联历史简明教程和联共（布）党史教科书。

现在，正处在决定伟大中国人民命运的时刻。在卫国战争中，中国这个近百年来被帝国主义瓜分和压迫的国家正在联合起来，积蓄力量，为的是把日本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英勇的中国人民必将胜利。现在它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评述

(1938年11月13日)

H. 利亚霍夫

今年10月,日本军阀千方百计地加强了在中国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的范围,除华中以外,还包括华南在内。

很早以前,日本侵略者就对华南怀有野心。还在去年8月,日本海军司令部宣布对中国整个沿海地区进行封锁,其中也包括华南地区。日本侵略者早就想占领广州地区,其目的是使中国失去华南的这一重要港口,切断中国同外国的交通线。

但是,广州与英国殖民地香港直接相连,而英国所关心的对华贸易又是通过广州实现的,这一切抑制了日本战略家的“狂热”。

在9—10月,即英国和法国政府在慕尼黑向德国法西斯投降之后,日本侵略者认为,对西欧资产阶级民主强国用不着再拘束了。于是日本军阀便在华南开始了军事行动。

为了进行这一军事行动,日本人在台湾集中了几个师团。10月11日,这些部队由运输舰运到华南沿海一带,并于10月12日深夜在广州以东的平海登陆,接着就开始向北和西北方向移动。这时驻防广东沿海的中国军队由于前些时候抽调主力北上支援武汉保卫战,因此对来犯的日军无力给予有效的回击。

日本军队用几个纵队发起进攻。当日本人到达广九铁路并切断这条铁路之后,他们开始向广州挺进。10月21日傍晚,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抵达广州,第二天广州就被日军占领。中国当局在离开广州之前,疏散了全部贵重物资,并将无法运走的东西全部

炸毁。

日本司令部在占领广州的同时，还加强了华中汉口附近的军事行动。日军对汉口地区的进攻是从两个主要方向进行的：从北面即沿平汉铁路和从东面即沿长江两岸进攻汉口。

从北面进攻汉口的四个日本师团于10月中旬通过了大别山。由于紧张的战斗和大量的损失，日本军队于10月20日前才进入了汉口以北的平原地带。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使用技术装备的机会，因此，他们开始以比较快的速度向预定目标推进。

沿着长江进攻汉口的日本纵队，是在日本舰队的紧密配合下向前推进的。三个日本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在这里发起了进攻。日本部队通过陆战队在长江两岸的登陆和从干涸地带发起的进攻，突破了中国的防御阵地，并向武昌逼进。

10月26—27日，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终于被日军攻陷。这场持续了五个月的大战役，迫使日军集中和使用了大量兵力，付出了几十万伤亡的巨大代价。至此算是结束了。

日本军队占领汉口之后，目前正继续向西进攻，他们既向汉口北部地区进攻，又沿长江西上。同时，他们还企图沿粤汉铁路向南移动，占领广州的日本部队也同样沿着这条铁路向北移动。

广州和汉口的失守，丝毫没有加速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所召开的中国国民参政会，完全支持争取把国家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持久战政策。会议坚决声明：“关于和平的任何建议，都是对敌人的直接让步。”这个声明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人民拒绝了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代表的“调停”建议，战胜了自己内部投降主义的干扰，他们决心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全部驱除出去为止。汉口失守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发表的声明，完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决心。

广州和汉口失守以后，中国仍然具有继续进行反抗日本侵略

者的斗争的各种有利条件。中国西部和西南各省,是一个能够供养全国和全军的基地。战争期间从战区疏散到这里来的工业企业,现已正常工作,并生产出了产品。战前,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很不发达。现在,由于抗战推动了建设,这些省已经修筑了与全国各大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相连的公路,甚至铁路。

中国内地各省丰富的农业资源可以保持国家足够的外贸水平。日本侵略者指望占领广州后将使中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但是,除广一九铁路以外,中国还有许多渠道可以与国外发生经济联系,进行外贸。

广州、汉口失守以后,中国军队完全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日本司令部希望攻克广州和汉口后能削弱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但这并没有成为事实。中国军队安然无恙地撤退后,经过彻底整顿,现在准备在新的地区投入战斗。

如果日本军队打算继续向中国西部深入,那末,他们必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目前汉口以西长江的水位已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陆军继续西进就不能象进攻汉口时那样得到海军的大力支援。这样,日本后方的工作将更加困难,因为输送弹药和粮食到前线的道路减少了。在中国游击队广泛开展活动的条件下,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十分紧张,这是限制日本人的进攻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活跃在敌后的无数游击队,迫使日军从前线抽调大量兵力去对付他们,因而日军的攻势受到了牵制。尽管日本人对游击队进行频繁的围剿,但游击队仍继续卓有成效地进行着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例如,山西省的八路军部队和与八路军有密切关系的游击队,曾给予日本围剿部队以坚决的反击,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对付山西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日本司令部在山西集中了八个师团,其中有两个师团是前不久才从日本调来的。日本将军们打算“一

下子就彻底”消灭山西的八路军和游击队。他们对五台山地区——八路军的主要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进攻进行三个月,但其后果对日本人极为不利。八路军将继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日本的侵略和英国在中国的利益

(1938年11月24日)

E. 茹科夫

在中国辽阔的领土上，流血的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一战争正在北方的黄河两岸进行，并沿着整个长江——从上海到汉口继续发展。在南方，斗争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这里，广州的熊熊烈焰反映在珠江的水面上。

这场侵略战争给日本人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中国人民没有被征服、被击败，他们将以更旺盛的精力抵抗侵略者，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去。

目前，在中国拥有众所周知的巨大利益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家，究竟采取什么立场呢？

这些国家在侵略者面前采取的卑鄙立场，表明了他们的太平洋行动方针的性质。的确，很难相信资产阶级大亨们真正同情中国人民。但是，问题不在于中国人民，而在于英国、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切身利益”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两个最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英国和美国，无视日本的横行霸道，他们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畏缩不前，只是在最近才勉为其难地在某些局部问题上提出了口头抗议。

英国和美国可以容忍日本把它们在满洲的工商业挤掉，也可以容忍失去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据点——天津和上海。英国在上海的数以万计的投资也被日本掠夺了。但是很明显，英国政府

遵照基督教“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就应该把右脸伸过去”的教义，又急急忙忙地把他们所控制的上海关税收入交给了日本人。

所谓的“民主”国家，竟心甘情愿地容忍自己的臣民其中包括外交代表遭受侮辱；容忍自己的轮船被击沉，飞机被扫射；容忍日本军阀在中国的各种胡作非为。

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外国的航运业务已完全停止。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对中国的铁路运输大量投资，总数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但现在中国铁路的真正主人却是日本人。

日本占领广州，使英国在华南和华中贸易的门户——香港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在广九铁路的仓库里，英国商品陆续被劫走，英国商人全都被赶出了他们居住多年的地方。人们公开地把英国人当作战败国的人民看待。日本首相近卫在答复张伯伦请求日本不要忘记吸收英国资本去奴役中国时说，这将取决于英国是否准备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的霸权。因此，必须对日本侵略者作出应有的评价：它不仅完全沿袭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蛮横无理的讹诈策略，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它的柏林老师。

日本人企图把武汉的陷落描述成侵华战争发展的“转折点”。早在武汉沦陷以前，当时的日本外相宇垣就和英国驻东京大使克莱琪开始了政治谈判。这些谈判参加者的目的，是在“合作”的幌子下达成相互瓜分中国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宇垣企图使日本从英国那里获得大量贷款，并在英国承认日本在华北的霸权和建立英日在华中的“联合”统治的“基础上”，停止在中国的战争。宇垣还客气地把华南“转让”给英国。

这个计划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英国保守党人都感到非常满意。谈判后来遇到了障碍，那仅仅是因为确立英日在华中“平等合作”的原则在实践上非常困难。宇垣和日本政府把这种合作解释为在日本军事和政治的控制下，允许英国资本还在上海地区和长江流域活动。从英国自己方面来说，它得到了在上海发展的某些保证，

从而可以充分弥补自己在华北的巨大损失。

但是,宇垣的计划未能满足日本军阀已经膨胀起来的胃口。由于英帝国主义在慕尼黑的投降立场,使东京认为宇垣在同英国人进行交易时廉价地出卖了一些东西。宇垣曾声称日本不想把华南据为己有,并把这一地盘划归了英国。日本军阀认为这个声明是危险的新“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这使得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以宇垣的被迫下台和最危险的军阀集团获得胜利而告终。

接着,日本法西斯的陆海军将领便向华南发起进攻,并把大不列颠的要塞香港从中国国土上完全孤立起来。这就形成了“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的新的对比关系,而日本首相近卫则力图使这种新的对比关系在同英国进行的谈判中合法化。

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以继续南进,并侵入对英国人来说更加敏感的,直接危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地区相威胁,以此作为迫使英国在这些谈判中就范的补充“手段”。

现在日本的常备武装力量就在英属印度、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旁边,并对它们构成直接的威胁。日本间谍在各地的破坏活动和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蛊惑宣传,动摇了“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对其亚洲大陆东南角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为了重新瓜分世界,用铁和血在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在这里暂时还带有秘而不宣的性质。但是一大群日本特务分子、破坏分子和战争贩子蜂拥而至,他们距大英帝国的明珠——印度已经近在咫尺了。

难道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先生们就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甚至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不,不是这样。英国和美国的报刊早已十分详细地多次报道过英美法在远东的统治正面临着威胁。人们还不断听到这些列强的军事当局和殖民当局积极讨论有关太平洋防务问题的消息。为了避免重蹈香港不战而败(原文如

此——编者)的覆辙,新加坡和达尔文港的防卫能力已得到加强。为了保卫澳大利亚,英国正在加强空军的力量。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军事措施,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些措施表明,各个列强为了瓜分世界,正在疯狂地准备一场血腥的战争。

但是,这些军事措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恐惧畏缩和作茧自缚的“慕尼黑”精神完全报销,变得毫无价值。而远东的“慕尼黑”精神也对各大国的政策起着支配作用。现在英国的外交政策有一种倾向,即与日本强盗进行勾结,甚至不惜满足它的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美国反动的投降主义分子也力主美国应当完全置身于远东纠纷之外,以便避免未来的一切军事冲突。罗斯福政府所采取的抑制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措施,也遭到美国资产阶级反动集团的暗中破坏。

尽管日本政府对列强因外国人在华权利遭到侵犯而提出的口头和书面抗议作了侮辱性的答复,但英国政府仍继续在炮制有利于侵略者的、带欺骗性的中日纠纷“调解”方案。很明显,这些方案实质上反映出,英国人恰恰是在侵略者精疲力竭的时候,硬要中国解除武装。

正如日本报纸《读卖新闻》所报道,今年11月21日,英国驻东京大使克莱琪解释说,英国的调解草案甚至有这样的内容:英国人保证采取措施制止中国方面的各种抗日形式(甚至包括抵制日货运动)。

中国人民要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在不断增长。这一点引起了中国的英国“朋友”的掩盖不住的惊慌失措。过去,在中国战争的最初阶段,英国人是颇为满意地注视着开始衰竭的日本经济,而现在,当侵略者想要摧毁中国人民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注定要破产的时候,英国人便公开地流露出对侵略者的某种同情。

对这一现象《苏联共产党(布)党史简明教程》已经作了全部的解释：“所谓‘民主’国家当然不赞同法西斯国家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且害怕法西斯国家势力加强，但他们却更害怕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抵制这一切‘危险’运动的一种‘消毒良剂’。”^①

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动员它在中国的公开的和秘密的代理人，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对手和竞争者的胆怯、动摇和直接帮助，幻想重复慕尼黑“和平”协议的模式，以便从侵华战争的泥潭中“体面地”爬出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在外国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调停下，把自己的奴役“条件”强加给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前景。因此，日本的将军们和外交官们，立刻就从好几个方面为这件事进行准备。

日本特务正在急急忙忙地拼凑一个所谓的“中国联邦政府”，这个政府是由一些出卖灵魂的旧官僚和警察组成的。中国后方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汉奸也竭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制造分裂，妄图把向侵略者投降的谈判变成现实。

日本法西斯的海军和陆军将领仍然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属地的大门口炫耀武力，同时按“慕尼黑”的方式进行讹诈，强迫这些国家对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作出更大的宽容和让步。

慕尼黑的“辉煌成就”并没有使日本军阀高枕无忧。他们想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将不可避免地要被现实所粉碎，首先是被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所粉碎。为了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彻底的胜利，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① 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第443页。——编者注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1938年11月29日)

A. 别杰罗夫

日本军阀1931年入侵满洲之后不久,便在那里建立了“本地的”军队。采取这一措施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日本人总想表明,他们在满洲是支持“自治运动”的。同时,这里还有直接的军事目的:利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的游击队。这些本地军队熟悉当地情况,适合在最危险的战斗中为日本军队打头阵。

有两个情况使这个计划不难实现:第一,当时的满洲当局推行“不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这一政策把人民引入歧途,并使中国真正的爱国者失去了组织抵抗的牢固基础。第二,中国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封建割据以及被军阀所腐蚀的雇佣军。军阀们为了捞到更多的“油水”和增加军饷而倒戈,把队伍从一个营垒拉到另一个营垒这是常有的事,在中国无休止的内战史上可以举出很多这类例子。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在满洲不采取强制和恐怖手段,也不能建立“地方”军队,因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践踏中国领土,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经产生并加强了民族情感。

日本司令部在满洲建立的中国部队,完全受日本督察员的控制。从形式上看,这些部队都由中国军官带领,但实际的领导权却牢牢地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日本在占领了内蒙古的一大片土地之后,也按同样的方式建立了“蒙古军”。日本人在建立独立的满洲军和蒙古军的同时,还

建立了有日本军队渗入的“混合”兵团。

日本军阀直到最近还要求这些军队在满洲、热河、察哈尔境内镇压解放运动和执行警察职责。日本司令部力图以极其残酷的棍棒纪律把中国士兵和蒙古士兵变成象日本士兵那样的人,使他们奴隶般地服从和盲目执行日本军阀的意志。

当然,满洲部队的中国军官和普通士兵不可能得到日本军阀方面的丝毫信任。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这些军队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每一次同中国游击队或正规军发生严重冲突,总是“遭到失败”。满洲部队和蒙古部队经常发生抗日起义事件。这时,起义者便会投入民族解放运动。

日本军阀从目前这场战争爆发之日起,就企图有计划地利用满洲军和蒙古军充当炮灰。

但是,早在1937年7月,在这些军队中间就爆发了多次起义。在日本人占领的通州,汉奸殷汝根的保安队举行起义。起义者消灭了这个城市的日本驻军。日本人立即投入大量兵力加以镇压,并派飞机轰炸通州。最后起义被扼杀在血泊中。

从这年一月起,所有外国和中国的报刊均报道说,满洲军和蒙古军拒绝参加反对自己人民的战争的次数更加频繁。还有消息说,这些军队往往整队整队地转到中国国民革命军和游击队方面去。这表明八路军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以及后来中国军队总部政治部展开了广泛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

5月以前,满蒙军队有组织地转向中国国民革命军方面的情况相当普遍。例如,仅在5月上半月,在归化地区(绥远)就有一千名士兵携带武器投奔中国方面;那里还有一个团长率领三百名战士和一个旅长率领四百名战士到中国部队驻地投诚。在内蒙古有二百名蒙古人跑过前线。有一位团长打死了十名日本军官和侦察队长,率领一千人的骑兵团加入了中国军队。

5月18日,日本建立的“和平军”的总指挥在枪杀了日本军官

及其走狗之后，转到国民政府方面。他在发表谈话时声称：“我指挥的两千名士兵和我本人正等待着蒋介石发布进攻日本人的命令。”

6月底，在北平地区，日本讨伐队和拒绝执行进攻游击队命令的“冀东和平军”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7月，驻扎在山西省西南部运城的满洲军举行起义。当中国军队开始进攻这座城市时，起义士兵烧毁了飞机场上的几架日本飞机，并击毙了飞行员，最后中国军队占领了该城。

8月，在河北省东部爆发了有七千名满洲士兵参加的大规模起义。在绥远，蒙古军第十师也多次爆发起义。

在9月，又有许多满洲军和蒙古军投奔中国军队。这些军队的起义发生在保定地区，那里有五百名士兵参加了游击队。在洛阳也多次发生起义，有一次三百名起义者消灭了一支三百五十人的日本部队，缴获机枪二十四挺、步枪四百多支、大炮两门，事后起义者便加入了游击队。

尽管日本人在占领区建立了严酷的检查机关，但是众所周知，由被迫拉来的中国人组成的所谓“保安军”，其中有几个师已经垮了。第一师的八千名士兵在击毙日本军官和汉奸李凤河（译音——编者）之后，立即加入了华北的中国军队。第三师全体人员携带武器在归德（陇海铁路）地区向中国政府投诚。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1月中旬张家口地区发生的事件。在这里有一万蒙古人，日本人把他们编成几支部队，他们拒绝执行日本司令部的命令。他们通过自己的指挥官同在北方作战的中国骑兵部队建立了联系，这支骑兵部队是由著名的马占山将军指挥的。

所有这些，仅仅是满洲军和蒙古军，以及沦陷区的伪军中无数次抗日起义的一小部分。日本军阀强迫中国人参加伪军，企图把这些汉奸队伍作为自己军队的后备队。但是根据以上的事实，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司令部在这方面的全部如意算盘已

经落空了。中国人和蒙古人手中的日本武器最后必然用来反对日本侵略者。

日本军事集团在建立由日本司令部控制的“中国军队”的同时,还竭力在沦陷区建立“傀儡政府”。但是侵略者立即在中国人民不可摧毁的爱国主义面前碰了壁。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愿意从奴役者手中把“政权”接过来的人,并许诺偿付给这些汉奸优厚的酬金。去年12月,日本人在北平炮制了一个“临时政府”,随后又在南京炮制了一个“维新政府”,最后又炮制了内蒙古“政府”。今年9月和10月,他们在北平和东京为建立“中国政府”进行了密谋策划。但到目前为止,还只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仅仅是用来掩盖他们在中国的强盗行径的一种需要。侵略者只是在旧中国最卑鄙最腐化的集团中寻找傀儡“执政者”。汉奸王克敏被任命为“北平和南京政府联合委员”主席。这个人北平最大的银行家兼地主,他非常担心自己在沦陷区的财产遭受损失,为了苟且偷生他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在日本雇佣的“执政者”中,可以看见象济南的马良(译者——编者)那样的老朽无能之辈,象上海“市长”傅筱庵那样无耻匪徒,还有象齐燮元那样的东京情报机关所豢养的走狗。

投降主义者用关于统一的甜言蜜语来伪装自己,他们企图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挑起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人民仇视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如同仇视“傀儡政府”中的汉奸一样。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紧密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继续得到巩固。

中国人民以日益高涨的顽强精神进行着正义的解放战争,与此同时,日军进攻的力量开始下降。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民族自觉性在中国人民中间不断增长,而这种民族自觉性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还是第一次显示出来。

在中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口号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这个口号具有深远的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

近百年来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正义战争。战争是血腥的、残酷的，新中国将在战火中诞生。新中国正在苦难中成长起来，中国人民是能够勇敢地展望未来的。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各条战线的局势

(1938年12月4日)

[塔斯社重庆12月3日电]日本军队开始在华中和华北重新部署,已经历时一周。日本人为了在山西、陕西和中国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正在把自己的军队集中起来。

武汉被攻下后两周,日本人从武昌出发沿公路、粤汉铁路和长江向南的进攻,以及从汉口出发直指襄阳的进攻,都暂时停止了。

中国军队以小规模的顽强反攻,粉碎了日军企图在长江以北的滁州——信阳公路沿线和从武昌南行的公路沿线保留小部分驻军的计划。由于中国军队的反攻,日本人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人民在武汉东北收复了六安、罗山等一系列失地。日军对武汉西北的进攻也在京山附近受阻。随后,中国军队进行反攻占领了应城。目前,战斗在信阳四郊进行。

在长江以南,中国军队阻止了日本对长沙的进攻,并收复崇阳、通山、咸宁等据点。日本人在海军炮艇的支援下继续固守岳阳。在华中战线,日本人撤走了分布在各个城市的驻军,然后把他们集中到长江边上一个狭小地带和铁路沿线的据点上。近来,日本人作战的特点是转攻为守并在各个据点建立防御系统。长江以北战区的中国军队(由李宗仁将军指挥)和长江以南战区的中国军队(由陈诚将军指挥)正在对日军进行坚决的反击,并把许多县城的日本驻军驱逐出去。在这里,中国前线的主要弱点仍然是未能把靠近前线地带的群众很好地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它的直接后果是,动员群众的工作到武汉失守以前,都一直掌握在兰衣社手

里,这些人不仅没有广泛地组织群众,而且竭力散播张皇失措的情绪(长沙大火)。但是,日本人从长江展开的攻势已被击退。日军也没有能够越过大别山(武汉以北)和湖南北部的山区。只要日本军队一走出它的根据地(根据地的日军是在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下行动的),马上就会与中国军队遭遇,受到重大损失,只好转为防御。

10月初,日本司令部在中国南方开始的战役其目的是摧毁武汉的防卫。大约有十万士兵被调到这里。广州的失守,首先是因为中国军队没有展开作战,而一部分中国军队又被调往华中前线。其次是日本的间谍活动和个别中国指挥官的叛国投敌,以及广为传播的日军不会开到“大不列颠在远东的重要据点”香港附近的幻想,这一切对广州的失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广州的迅速失守,还在于没有充分运用事前准备好的防御工事。

尽管军事上失利了,但是广东居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广东群众运动的发展却显示了自己的作用。农民自卫队从政府那里得到武器后,立即积极地帮助中国军队;广九铁路沿线涌现出了大批的游击队。日本对广州北部的进攻也暂时停止,因为日本部队只要接近广东省九个大山口中的任何一个山口,立刻就会遭到阻击。日本人向广州西部推进也被阻挡在广三(三水)铁路西头。广三铁路的终点站三水多次被中日双方轮流占领。

中国军队利用地形上的优势牵制住了日本人的行动,在武装居民的支持下中国军队经过多次顽强的反攻开始迫使日本人往广州退却,并切断了沿东江的公路线上的日本人与平海根据地的联系。中国人在这里已收复了龙门、从化、惠州、博罗等地。中国军队在铁路线上已到达离广州十二公里的晓林(译音——编者)车站。战斗有时甚至在广州城郊的大街上进行。日本司令部遭到重大损失后,开始把大批增援部队调往广州。

近来,日本司令部把自己部队的行动集中在东江沿岸,目的是

保证和平海的联系。惠州和博罗已被日军重新占领。日本人沿公路开始向从化、花县再次发起进攻。但是,日本从其他战线调来的新的增援部队,远不能满足这场从南面发起而连接华中战场的大规模进攻。根据外国观察家的看法,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日本人必须拥有不下于十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司令部要在这里实现其计划是困难的,何况在蒋介石视察了前线,以及中国司令部进行人事调整之后,中国的南方战线已经得到很大的加强。现在,日本人仍继续把大部分兵力向南方集结。

为了摧毁武汉的防卫,日本人不仅在南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还准备在北方发动进攻,妄图袭击西安和兰州,以便切断西北各省同新疆的联系。但是,日本人只能在自己的后方和交通线有可靠保障时,才能发动这场进攻。因此,日本人便调遣十个配有炮兵、坦克、空军和化学武器的纵队(总共五万人)进攻五台山游击根据地。同时,又把铁路沿线的六个多师团调到这里。

但是,日军这次对山西游击队和八路军的进攻并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战果。用坦克、飞机和毒气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要摧毁实际上存在着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无能为力的。最初,八路军和游击队从很多县城(阜平和五台等县城)撤出并转入山区。但为时不久,日军各纵队即纷纷败退。日本人在五台山地区遭受重大损失后,现已缩小进攻规模,一些日本纵队已退回铁路线。侵占五台山区各县的日本人再次被驱逐出去,只有五台市还有五百至七百名日本驻军。尽管日本人这次遭到失败,但是他们仍继续准备向陕西省发动进攻。这次进攻的矛头是指向已经实现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陕甘宁特区。

据现有的资料和日本空军最近的活动表明,这次进攻大概将从三个方向发展:从绥远西部的五原、临河到宁夏;从山西南部的风陵渡、永济到西安;从黄河北岸沿铁路线到洛阳。为了支援这一攻势,日本人还有一个作战计划:从武汉向西北推进,经襄阳、南阳

直指西安。

现在很难说,日本计划中的哪一个方案能够实现。但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日本人无论向哪个方向进攻,都会遇到在战斗中日益壮大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军队只要离开能向它提供大量优越条件和供海军活动的大海和长江,它的困难和失败就会成倍地增加。日本人还将在广东北部山区和大别山区(武汉以北)以及陕西和宁夏等省遇到更大的困难。在十八个月的战争中,已经疲惫不堪的日本军队的困难还将不断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就和中国军队的巩固,以及日军后方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必将为英勇抗击侵略者,保卫自己国土的中国军队的总反攻创造先决条件。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苏联总顾问 A. И. 切列潘诺夫 对第十五军团所拟“武汉城市 防御战斗指导计划”的意见

(1938 年)

武汉城市防御战斗指导计划(略)

总顾问意见：

1. 不应以泛滥为根据，应以工事及守兵为主，若防守困难，同时水位甚好时，可用泛滥。

2. 对于武汉人民之处置，应尽量疏散，因战时须同时顾及军民食粮甚为困难，且疏散后可利用住房构筑工事。

攻者因街道不熟，进攻困难，而防者亦可利用已破坏之房子材料，在坚固房子内增强之。

3. 攻者大部队来时，则相机撤退，小则歼灭之，此与防御列宁城，略相似彼时办法。

A 将城划分数防区，每区有数条防线，各区互相支援。

B 每街设防御工事，用水泥及沙包构筑之。

C 当时利用住民协同防守，甚为得力。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战局评述

(1939年1月18日)

H. 利亚霍夫

日本司令部把今年整个夏天的时间都花在占领汉口的战役上。经过四个月的激战之后，汉口沦陷了。在这次战役中，被打死打伤和因疾病、身体虚弱死去的日军达几十万人之多。与此同时，日军还占领了中国南方的广州。但是，无论是占领汉口，还是占领广州，都没有使日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日本军阀必将再次亲眼见到其黄粱美梦的破灭。

很明显，日本司令部决心纠正它过去在一些战役中，特别是在南京战役中的某些失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这一举动使中国军队顺利地退到第二道防线，得到喘息、休整和着手实施积极进攻的机会)。这一次，当他们占领广州、汉口之后，便不停地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但12月下旬，日军的攻势被迫停止。因为这时从汉口撤出的中国军队攻克了一些新的防线，并对日军的进攻给予了坚决的抵抗。

日本司令部企图使华南陷于瘫痪，为此，他们除了在广州以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之外，还于12月派遣小型陆战队在广州以西华南沿海一带的几个据点登陆。陆战队受到在沿海一带来回游弋的日本军舰炮火的掩护。可是，日军遇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未能深入到华南沿海的腹地。

日军对广州以北的进攻，在三水地区(三水)和从化地区展开了几次激战。中国军队在获得增援之后，先是对来犯之敌进行顽

强的防御战,然后,便转入反攻,打退了日军,占领了从化。为了扩大战果,中国军队不断地向广州推进。日本人也在广州地区集结自己的部队,并在这里赶修防御工事。1月,中国军队在广(州)九(龙)铁路沿线一带发起总攻,并于1月10日占领石龙车站。目前,广州地区蓬勃发展的游击运动有力地阻碍着日军的行动,使它困死在这里,动弹不得。

仅仅为了保住汉口和广州,并且稍微扩大这些城市周围的地盘,华中和华南的日本作战部队就已经够紧张的了。疲惫不堪的日本军队已经无力实现日本司令部打败中国军队的意图。日军必须休息,必须补充兵源和装备。而中国军队在撤退到新防线的同时又又在准备新的积极战斗,并且在前线个别地区发动的进攻中取得了胜利。

在华北,日军对八路军和游击队所进行的“讨伐”也毫无成绩。日本人在11月和12月曾组织了一次向五台山地区——山西游击运动中心的进攻,但他们在这里的十次战斗均损失惨重,最后一无所获地撤回原防。现在八路军建立的地方抗日政权已经完全控制了平绥、平汉和大同——太原铁路之间的广大四角形地区。中国地方政权和游击队,仍然控制着河北省境内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一直延伸到黄河的绝大部分地区。日军在天津地区设有大型后方基地,天津地区的局势日益威胁着日本人,因为游击队直接在天津周围活动。八路军在河北东部地区已控制了十二个县。

在同中国游击队的战斗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它毫无战斗力。游击队员们对日军及其后方机关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他们简直成了不可捉摸的人。看来这是目前迫使日军必须大力巩固其后方的原因之一。

为了打击山西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日军司令部于12月底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日军这一次是试图在山西西南部进行几次大规模战役,其目的是为了通向作为山西省和陕西省交界的黄河。中

国特区和八路军的根据地均在陕西省。显然,日军的计划是渡过黄河,进攻特区和西安(陕西省省会)。为此目的,日军已从其它战区调了几个师团到华北。1月初,几个日本纵队已开抵山西省黄河沿岸的大宁、吉县、乡宁和河津县的居民点,并为控制这些居民点而进行了多次战斗。目前,一支日军纵队已占领了吉县,并渡过黄河抵达西岸。

不过日军的胜利是暂时的。1月7日至8日中国司令部开始反攻,从陕西调来的几个中国师已渡过黄河,他们不仅打击黄河岸边的日军,而且还对日军进行了坚决果断的追击。中国司令部的这一进攻完全出乎日军司令部的意料之外。日军被迫放弃吉县、大宁、乡宁之后,几天之内就全线后撤三十多公里。日军在退却时其人员和军用物资受到惨重损失。日军伤亡人数达七八千人。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大量军用物资。

中国军队同日军在山西西南地区的战斗还未结束。看来,日本司令部有可能从其它战线,特别是华中战线(因华中地区最近无重大战役)调来援兵,然后再卷土重来,发起进攻。但是,中国军队近期获得的胜利无疑已经证明,虽然日军在华北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优势兵力,但它要指望在华北取得胜利仍然是困难的。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的新军队

(1939年1月19日)

[塔斯社重庆1月18日电]在中国大后方的一些最偏远地区正在组建一支新型的中国军队。塔斯社记者用了三个月时间在这些地区进行参观访问,行程达三千五百公里,目前,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和西康省有一百万人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各省都在加紧对居民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后备部队,建立抗日新军。

一年前,军事训练是在特种兵营中进行,参加者仅限于少数大学生自愿兵,而现在,已经有几百万人接受了军事训练,成年居民在村庄和城镇接受军训,青年人在学校进行军训。

在普遍义务兵役法基础上,从事先在地方上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当中招募新兵,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过去整个中国军队均由雇佣职业兵组成。

现在每个大型居民点都有自己的军事训练计划,都备有教学战壕和射击场。在柳州(广西省),我们看见那儿在训练战士使用防毒面具。在贵定(贵州省),我们看见那儿在训练农民挖战壕。在崇庆(四川西部地区),我们所到之处已经进行了夜间战术训练。就是在偏远的西康省的康定,那儿的中学生每人也都有一支步枪。

在日本飞机不能到达的那些小县城,我们见到的军事学校、政治训练班和陆军大学分校等有几个。在四川西部,我们还参观了一所军事技术学校,该校大部分学员都受过高等教育。

尽管日本军阀破坏了一些中国大学,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摧毁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昨天的大学生,今天成了飞行员、坦克

手和军械士。在航空机械学校的一个班，我们会晤了来自中国各省的青年。一位沈阳小伙子，系炮兵学校学员，他以一种带有幻想的口吻对我们说：“要是能找到我们满洲长白山的游击队那该多好啊！”

设在康定的军政大学分校还有一些西藏学员和傈僳族青年。有一批中国青年是在广州沦陷以后，步行到四川来参加军事学校的学习的。

中国军队在不断地改善它的技术装备。不仅步兵，而且飞行员、炮兵、坦克兵等等都在为将来的反攻作准备。迄今为止，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山西、甘肃已有一千万人参加军事训练。

领导新战士军训工作的是军事委员会付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他在同塔斯社记者谈话时指出：

“我们对大批新兵的训练工作正在很多地方进行。我与中国士兵有多年的接触，很了解他们，可以说新兵完全不同于我军过去的士兵。他们将振兴国民革命军，进一步提高它的战斗力和士气。对于这一点，只需把新兵同过去的雇佣兵加以比较就足以使人确信不疑。绝大多数新兵都是二十二——二十三岁的青年，而雇佣兵的年龄却大得多。新兵是按统一的兵役法应召入伍，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自愿并提前入伍的。新兵大都是一些有较高民族意识的健壮农民，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有文化，而过去的士兵有文化的极少。对士兵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兵都懂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都知道捍卫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是自己的职责。他们决不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新中国在成长

(1939年2月6日)

M. 季霍米罗夫

中国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面前,中国军队的退却阶段已经由于广州和汉口的陷落而宣告结束。日本人想在武汉战线上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意图,已经完全遭到失败。中国军队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力量。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现在中国已拥有近二百四十个师(每师一万人),中国军队的人数与战争初期相比增加了一半。中国士兵的战斗力的提高。如果说在战争开始时中日双方损失的比例是三个中国兵对一个日本兵,那么,到战争第一阶段末期则是一比一。而在第二阶段,据蒋介石说:“就中国军队的战斗素质而言,一个中国士兵相当于三个精神堕落的日本士兵”。

辽阔漫长的战线(四千英里)使日本人很难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战场上的战略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当日军一陷入山区,它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机械化部队便丧失了协调一致地行动的能力。目前中国军队正在着手准备决定性的进攻,同时,日本人已被迫把自己分散的部队集中到据点和交通线。

准备决定性的反攻,这就需要迅速发展中国西部和西南各省的经济基础。现在,四川省正在加速修筑公路。据《华北新闻日报》1月报道,中国西南地区的铁路建设计划现已开始实施。第一条铁路线干将通到缅甸边界。该线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具有非常重

大的意义，它使中国能够从国外运进军需品。

过去通常认为中国工业仅局限在沿海地区。而现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已转移到西部各省。日本人破坏了沿海一带的大量企业。但是，一些重要工厂的设备却早已被中国政府疏散到了内地。

发展中的工业拥有丰富的原料储存。四川地区煤炭的蕴藏量达一亿吨。1939年煤的开采量将突破二百万吨，而不是1938年的一百万吨。重庆西面的威远、自流井是蕴藏量丰富的产油区。

綦江县已着手开采铁矿。铁矿的日开采量近期将达到四百吨。四川西部地区已着手开采铜矿，这里还有金矿。全国共有三百多家企业迁到四川，其中绝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工。从天津迁来的一座大型化工厂已开始生产。与四川相邻的贵州省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基地。贵州的畜牧业很发达。全省约有两百万头牛。目前贵州已着手开发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铜、铁、汞、煤。已有二十个县采到黄金。目前全省大约有十万名工人在修筑公路，以后还将把这些公路改建成铁路。一条连接重庆和昆明的公路正在加紧施工。

西康是前不久才建立的一个新省，它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西康拥有极其丰富的水力资源。目前西康省内雅安至康定的公路正在加紧施工。大约有十万名工人在修筑这条公路。泸定至云南的公路的筹建工作业已展开。这条公路将横贯盛产铁、煤、锌、银矿的西昌、会理地区。这里将是中国西部未来的重工业中心。

以上这一切，便是新中国为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和自由，准备进行持久战的物质基础。

中国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章伯钧教授说：“即使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也坚信我们能取得彻底胜利。现在已经开始的第二阶段，是一个准备在全线发起反攻的阶段。即将开始的总攻，是在大范围内进行的新型战争，那时，将没有阵地战，也没有战线，战斗将扩

展到全国。军队之间将通过无线电联系,我们将在不给日本人以任何喘息机会的情况下将他们驱逐出去”。

在十九个月的战斗中,虽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二十八个省中的九个省,但是,在他们所占领的那些省的七百九十六个县中,实际上他们只控制着五十九个县,其余四百八十九个县仍在中央政府手中。

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彻底战胜外国侵略者而斗争。刚刚结束的国民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总结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前,军民之间的团结日益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日益巩固。

就连资产阶级报纸《益报》也承认,国共两党的合作已产生了巨大威力。该报11月写道:“中国之所以能够同侵略者进行十六个月的战争,这主要归功于两大不同的政党之间的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是中华民族抗日的首要条件”。英勇的中国人民在奋起保卫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广大居民阶层参加国民党的队伍,并对国民党的政策不断施加影响。国民党内反动的右派分子要坚持其投降叛变政策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中国爱国志士的新的后备军补充到国民党内,他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斗争中不断地扩大了进步因素。现在,日本的走狗,中国人民的叛徒,反动思想家汪精卫的叛逃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把汪精卫驱逐出国民党,这件事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充分说明,国民党日益稳固地走上了脱离反动势力的道路,进入了解放斗争的新阶段。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日本军阀在中国的阴谋

(1939年2月18日)

[塔斯社重庆2月16日电]日本掠夺性对华战争的战略在明显地遭到破产。最近几个月各条战线上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皇军”现处在一条空前漫长的战线上,并且陷入了同中国正规部队和“占领区”游击队的频繁冲突中。日本人利用汉奸汪精卫来诱降的新尝试也遭到了失败。

日本阵营中要求结束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在日本司令部中间正流传着结束战争的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由一些“温和的”军阀和垄断康采恩提出来的,它同西园寺、近卫和池田密切相关。他们提出,在“占领区”设防固守,并开始掠夺性的开发。第二种方案是由执政的法西斯大军阀(荒木、板垣等)提出来的,认为只有把中国同外国相联系的铁路、公路占领之后才能结束战争。

最后是第三种方案,主张把国民政府现有的各主要根据地(甘肃的兰州、广西的桂林、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等等)占领之后方能“结束”战争。这个方案是由一个所谓“青年军官团”提出来的,该团的领导人是秩父亲王。

从日本军队的重新部署及其在各个战线的情况来看,认为日本军阀将实施第二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是有根据的。

最近一个月,除了2月10日有一支海军陆战队和原田指挥的一个朝鲜旅在二十二艘炮艇及一艘旗舰的掩护下在海南岛登陆外,其它各条战线均无重大变化。这次冒险行动是日本人在谨慎地估计了国际后果的情况下采取的,它对华南战局未必会产生重

大影响。

广州、武汉沦陷后,中国军队有效地阻止了日军从广州向北部和西部的推进,同时还粉碎了日军对长沙(湖南省)的进攻。

日本司令部正在结束其军队的重新部署,目的有二:一是准备在山西和陕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二是准备在山东、河北、山西的“占领区”进行反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的“第二次战争”。

日军在华南的进攻近三周来都集中在西江附近的梧州,它是通向广西的重要战略通道。但这里的道路就象日军进攻广州以北地区的道路那样,全是一些适合防御的山地。因此,日军完全有可能在海军的掩护下,采取迂迴运动的形式通过北海(北部湾)进攻南宁(广西南部)。

最近,中国军队在华北山西前线粉碎了日军几次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日军在山西和陕西大规模进攻的开始,则为时尚早。因为这几次进攻仅仅是日军对中国防线薄弱地带的一种试探。日军大规模进攻陕西的目的,是为了破坏陕甘宁边区,占领西安(陕西省)、兰州(甘肃省),阴谋切断中国与新疆的联系。最近,日本人已经把从汉口地区调来的第七师团的主力,不声不响地拨给了驻在山西南部的三个日本师团(第二十师团、第一一八师团、第一〇九师团)和第四混合旅团。第二十七师团已从北平调到石家庄(河北省);第十四师团已从开封地区调到道口(河南省北部地区)。

日本人进攻山西、陕西的准备工作已进行了三个多月。日本工兵部队正着手把大同至蒲城的窄轨铁路北段部分(山西省境内)改成标准轨道。还准备改造正太铁路(河北省至山西省)时路基。目前日军正在这个地区修理铁路桥和建造飞机场。进行化学战的设备在源源不断地运到太原。

日本人准备在山西和陕西发起一次进攻,与此有着直接联系的是,对中国部队和游击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目前,这些

游击队在八路军的领导下正在河北、山东、山西地区同日军作战。日本人已急急忙忙地把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调来专门对付游击队。关于日军在“占领区”进行“第二次战争”的消息报道甚少，但是就从这些仅有的报道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在战斗中已经遭到惨重的损失。

日军在山西的重新部署和最近日本空军的轰炸路线表明，日军这次的进攻很有可能是在以下三个可以强渡黄河的地点展开：一是风陵渡地区（在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的交界处）；二是黄河上游的河津地区；三是绥德地区。日军已调了四个炮兵营到这些地区（其中两个营到风陵渡地区）。与此同时，日本人还有一个把汉口的第三师团、第十六师团调到华北前线支援进攻西安（陕西省）的计划。因此，可以有根据地设想，对山西和陕西的大规模进攻，这是日军近期在华的主要军事行动。

长江以南的华中战线近期没有重大军事行动。日本人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华中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南昌（江西省）北部现驻有两个日本师团，均由后备兵组成。武昌南部（湖北省）广汉铁路沿线一带也驻有两个日本师团。最近，日本第十师团已从该地区全部撤离，被调去集中对付河北省的游击队。日军被牵制在漫长的华中战线上，他们常常遭到中国正规部队的打击和游击队的袭击。中国军队已将日军挤压到长江边。日本人的整个意图是离开长江继续向前推进，越过湖南北部山区地带和大别山（汉口东北）。但是，日军的上述行动经常遭到中国军队阻击而未能得逞。军事评论家认为，随着春天的来临，日军将开始在山西发起进攻。他们还断言，中国已经完全作好了进行坚决抵抗的准备。

日本士兵已被遥遥无期的、频繁战争拖得筋疲力竭。就连残暴的日本监察官也无法扑灭日本军队中出现的反战情绪。

现在，日军的反战起义已经代替了日本官兵中过去经常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日军临阵脱逃并投奔中国方面的事件日益增

多。日本士兵扔掉子弹,或把子弹送给游击队的现象在华北已司空见惯。在山西省,只要你花上八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支日本步枪。

中国人民结束战争的计划是十分清楚的和明确的;那就是要取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胜利。蒋介石最近发表的声明,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决议,都表示要坚决抛弃那些把自己出卖给日寇和汉奸的各种阴谋计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加强,提高了中国正规部队的战斗力,扩大了游击战争。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正不断地得到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可靠武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苏联炮兵顾问谢罗夫^①关于第三战区 炮兵部队种种缺点报告摘要

(1939年2月)

军令部代电 2月23日

铨叙厅公鉴：奉交下炮兵顾问谢罗夫报告第三战区冬季攻击时，各炮兵指挥人员对于情况判断大多错误，且动作寡断部署欠洽，种种缺点及其不力情形，揭述甚详，(另附抄件)并奉委座亲批开：娄指挥官应处罚，炮十五团赵团长、炮十四团彭团长、炮二团李团长，与该团二三两营长均应严处，但该顾问热心任事指导周详，应予明令奖勉等因；奉此，以事关奖惩，相应检抄该顾问报告内有关事项随电送达，请查照办理，仍盼见复为荷。军令部掣申一元(渝)(附摘抄炮兵顾问谢罗夫报告一份)。

抄第三战区冬季攻势炮兵顾问谢罗夫报告摘要：

一、对前方情况不了解，不经常侦察敌情，因之情况判断错误，致生惧敌之心。

二、于会战准备期间，第三战区炮兵指挥官娄绍铠之动作即不甚坚决，拟保留大部炮兵为预备队，并拟置阵地于距敌较远之地区内，以备减少损失。

三、由于情况判断错误，动作寡断及受各师长意见之限制，以为炮兵只为掩护本师作战等为出发点，第三战区炮兵指挥官，对炮兵区分之意见颇不适合于攻击之任务，然经详细研究之后，始有正

^① Серов。

确之决心。

四、炮兵指挥官、炮十四团团、二团团，未能充分利用所有之武器，炮二团四连未赴预定之阵地，十四团之高射机枪未能使用，四十二团之高射炮未能及时向敌射击，及敌机飞去始开始射击，然已晚矣。

五、炮兵指挥官对部队指挥不健全。

甲、五十一团赵团长，于会战期间滞留屯溪后方未来指挥。

乙、十四团彭团长未赴预定之观测所，而滞留于指挥官之指挥所内。

丙、高射炮从未向敌射击。

丁、二团四连未赴预定阵地，致会战第一日未能参战。

六、缺乏攻击精神，炮兵位置以距前线较远始觉安心，此种情形在会战前及会战中，可于各炮兵军官之行动中察觉之。

七、部队训练方面有下列各缺点：

甲、多数军官对于战术及射击无充分之训练(以炮二、十八、五一团为尤甚)，炮二、五一团对器材管理亦不明了。

乙、对工兵作业知识不甚丰富，(如对观测所及阵地之构筑)不注意进入路，轻视观测所及阵地内之伪装，虽于战斗时间亦然。

丙、于观测所内无敌情搜索之记载，且对敌情亦不加侦察及搜索。负射击责任之军官对弹药之消耗无统计。

丁、工作惟求迅速，而不详加分析(如会战准备时之侦察)。

戊、军官夜间不识方向(十二月五日，炮十四团军官因于黄昏赴观测所，二时四十分后始得寻到)。

己、器材保管不佳，多有生锈者亦不擦洗，且有损坏之处(炮二团二、三营为尤甚)。

庚、马匹不佳，无力且脏。

八、步兵军官未能随时将前线情况通知炮兵。

九、若干步兵军官以为炮兵之任务应将敌人全数消灭，方谓达

成其任务,且有炮兵准备射击已完成,而步兵不仅不开始攻击,而反要求炮兵继续射击,以便将敌人全数消灭而后已。

十、因此将来对炮兵之训练,应按下列各项实施之。

(一)对军官战术及射击之训练,应有系统。

(二)对器材之研究应加注意。

(三)在研究协同动作时,步炮应会同实地练习之,对于观测所阵地进入路之构筑,应特别训练。

(四)在不影响作战之下,炮兵应轮流训练之。

(五)器材马匹,应保持良好状态,否则将影响于炮兵之战斗力。

(六)弹药系由兵站总监部补给,于战斗急紧时弹药不敷应用,此颇有碍于炮兵作战,因此应采取下列手段:

(1)总监部内,应设一弹药补给处,直辖于炮兵指挥官。

(2)补给处,应委任军官炮工数人(现在总监部管理弹药者,对口径及种类尚不清晰)。

(3)补给处之位置,不得远于30—40公里,以便于补给。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帮助中国 分析敌情并拟呈对付方案

(1939年2月11日)

极机密

(一)敌情之判断(至本年1月28日止)

一、敌人自攻略武汉,军事告一结束后,多已疲惫不堪(其中各师有损失达百分之五十者,如一〇六师团、第九师团),故于华中及其他战场上,均未能作积极之行动。

二、当敌军越出武汉之西北及南面、西面地带,如永修、通城、岳州、岳口、皂市、应城、安陆、应山、随县等地后,敌军之进展益缓,而在个别战线上,则陷于完全停滞之境(如进攻南昌及长沙之线)。

各战线之略现沉寂,其原因盖因敌人先欲以兵力肃清其占领区,籍以巩固其后方,同时利用此项时机而补充兵力,及从新部署,以准备将来之战斗。

三、就过去战斗这经验,可知敌军指挥部,每于一大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后两三个月内,即从事调整与部署,而于此时期内,决不采取大规模之军事行动。

目前敌军在各外线战场上已转入于积极防守,而经过其广播电台及散发传单,与派遣奸细,加强宣传,以期煽惑我军心及摇撼我军之后方。

近来敌空军之活跃,对我后方根据地及中心城市滥施轰炸,与敌军指挥部之军事计划无直接关系,仍以削弱我人民之抗战意志为主要目的,但与准备大进攻之全盘计划或亦有关,亦非不可

能者。

四、就敌军调动之性质及其活动，与敌军指挥部之计划观之，敌军最注意者，乃在晋省内编成强有力之大军，加强关东军，加强在华南之活动，当亦在意料之中。

五、为保证将来军事行动之顺利计，敌方将加紧清剿其后方之我方游击队，并期于初春完成此项清剿工作，现敌军部队受命从事此项清剿者，已达六师团之众。

六、将来大规模行动之主要区域，料当在西北方面，包括晋、陕、宁夏三省。

至华南方面，敌人亦可能增调新部队，如此则华南方面将展开激战，敌人之目的在威胁衡阳、桂林，以载断其与中央之联络（交通）。

随敌方大举进攻之军事行动，主要的在北战场与华南之展开，华中战场之意义将居于次要，料无大规模之战斗，但敌军如在北战场失利，则中战场上亦有发生激战之可能，有如进攻武汉时之合肥、六安线，然此则不可不预计之者。

七、一月二十五日前敌军部队之活动：

在华北：

1. 为保证进击山西及攻占西安起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及今年一月初旬，敌军曾进犯大宁、吉县、乡宁，其目的在占有黄河之东岸，以便利他日军事之行动。

敌军进攻西安之主要方向，预料将取道：

A 风陵渡——潼关——西安。

B 河津——蒲城——三原。

C 离石——军渡——绥德——洛川——西安。

至经由包头深入宁夏，当此寒冬之际，恐少可能，此线当属于次要之列矣。

于进犯西安时，或将由博爱、新乡、济源一带进攻洛阳。于进

攻西安之军事行动过程中,就吾人推测,敌将于渡河之后,采取更积极之方法,以肃清晋境之我方游击队。

2. 在北战场参加作战之敌军部队为:14D、20D、108D、109D、26D、25D、23D、114D 及 110D 各师,又 3、4 及 5 混成旅团,与个别之骑兵团。据尚待证实之消息,天津方面到有敌廿七师团部队,继由此运往石家庄。各师作战区域详另表。

共计:十个步兵师团,三个混成旅团,一个骑兵团,另有两师团番号不明,系去年十二月及今年一月初调至华北者。又据尚待查考之消息,在新绛(侯马之西北)区发现第七师团部队。

敌人进攻西安之兵力,将为五个步兵师团。另配备三个至四个重炮团,及其他特种兵团。

在华中:

1. 华中各战线之近况,其特点为:

A 敌人先锋部队之活跃,意在逼令我军陷于不断紧张情况之中。

B 继续加紧肃清其占领区内之游击队,及巩固军事重要据点,以及重新部署兵力。其向宜昌方面之积极推进,显欲围困我军,及转移我方对西北方面之注意力。

2. 在华中战场上,敌方之作战部队计有:3D、10D、13D、16D、6D、116D、9D、22D、101D、15D、近卫师团 119D 之一部(此为吾人之推测),尚有沪杭路沿线之一师团未查明番号者,至台湾旅团,则尚在调遣之中。早已在调动中之一〇六师团之主力,据俘虏口供,现驻于瑞昌、阳新之间。

共计华中作战之敌军为十四个半师团。

在华南:

1. 华南战场上之近况,与在华中者相似,惟近正忙于调遣新部队,增厚力量(就吾人推测,一师团将由台湾调粤)。

2. 在华南作战之敌军,计为:5D、18D 两个师团,104D 师团之

一部,台湾预备役旅团,海军陆战队两团,再就吾人推测,112D 师团之一个旅,第二师团部队及十一师团之个别部队,或亦在华南。

共计:四个步兵师团,台湾旅及海军陆战队两团。

在满洲:

第一师团——驻哈尔滨一带。

第四师团——驻佳木斯。

第七师团——驻齐齐哈尔(以上消息待考证)。

第八师团驻黑河、逊河、奇克一带。据尚待证实之消息,谓在广州方面曾发现该师团之个别部队。第十二师团驻虎林、林口、牡丹江、延吉。又据尚待查考之消息,第廿一师团驻奉天(沈阳一带),第廿四师团驻长春。

共计:七个师团。

在朝鲜:

第十九师团驻鲜北。

第一二〇师团驻鲜南。

在台湾:

在台湾者为第一一一师团(据尚待证实之消息,该师团之部队调往华南)。

在日本:

近卫预备役师团 17D、102D、107D 三个师,一〇三、一〇五及一一二叁个师团,或各有一旅团留驻本国。

共计:六个步兵师团。

结论(推断):

一、至一九三八年底,敌军共有四十六个师团,其中有平时之现役师团十七个,新编现役师团四个(13D、15D、17D 及 18D),预备役师团十七个,由满洲守备队及华北之卫戍军改编而成者七个师团(21D、22D、23D、24D、25D、26D、27D 等师团),及台湾军约一师团。

二、至今年一月廿五日止,四十六个师团之驻防区如次:

在中国者——31个师团

在满洲者——6—7个师团

在朝鲜者——2个师团

在台湾者——1个师团

在日本者——约6个师团

三、当对华战事最紧之时期(一九三八年之八月至十一月),第一线之兵力为十七个师团,约为在华全部兵力之百分之五十五,其余兵力大半被迫与我方游击队作战,尚有一部兵力则在调动或休息中。

四、敌军在华作战部队,共编为六军:

在华北:华北敌军总司令为杉山元,司令部驻北平。

第一军总司令为梅津美治郎,司令部驻太原,直辖:108、109、20、14、26、23及25各步兵师团,另有三四个混成旅团。

第二军总司令姓名未详,司令部驻济南,直辖110、114两个师团,第五混成旅团,一个骑兵团。

在华中:华中敌军总司令为山田乙三中将(前第十二师团长),司令部驻南京。

第三军总司令为东久迩宫(现已返国),司令部料驻汉口,直辖3、10、13及16等师团。

第十一军总司令为冈村宁次,司令部料驻九江或武汉一带,直辖6、116、9、101、106、27等师团及台湾旅(第二十七师团及台湾旅团,已由该军之作战调往别处)。

15D、22D、近卫师团及119D师团(此为吾人之推测),谅另行编成一军,惟番号不详。

在华南:第五军总司令为安藤利吉中将(为前第六师团长),司令部驻广州,直辖5、18两师团、台湾预备役旅团、104师团之一部、112师团之一旅团,第二师团之一部及第十一师团之个别部

队，就吾人之推测，亦属该军之指挥。

五、敌每一师管区能征调至三师之多，而各师管区现已征调入征者，均已达两师，此外尚各有剩余之数额未即征调者，就此两点观之，则日本尚可从已受军训之员额中，编成十七个至二十个师团。

六、根据所获敌第二十二师团文件可以推定，敌之第廿一至第廿七各师团，原由满洲守备队改编而成者，皆各有三个步兵团，炮、工、辎各一团。另附情报（侦察）及交通队。

七、在华作战之敌军个别旅团，如：3、4、5等旅团，就吾人之推测，皆分属于102、103、105三个师团，其所属之其余旅团则驻日本。此项消息尚待查实。

八、敌13、15、17及18各师团次第成立之事实，虽已确定，但征调之程序，与编制之详情，及其组织，尚须进一步予以调查。就现有材料判断之，在上述各师团之下，尚无按照平时现役师团之规模成立预备役部队之可能。

情报工作最近期内之任务：

1. 注视敌方在山西、绥远境内编成大军之情形，对于津浦、平汉两路之敌方军运，尤应特别注意。

确定敌军指挥部军事进攻之计划：

A 攻西安及远犯西南。

B 攻宁夏——兰州。

2. 注视敌军沿长江流域及华南之调动部署情形。

3. 确定敌人是否将编组新部队及其作用，及注视由日本国至大陆之新部队调遣情形。

4. 对各战场上之伪军编制与使用，须有精确之调查。

5. 进一步调查预备役部队编成之方法，以及各战区部队随时补充兵力、马匹、物料之情形。

6. 调查敌人有无派遣新部队（旅团、师团）来华，以及代其在

华之作战部队之情形。

7. 对敌海军、空军及敌军之技术化情形,应设法探获必要材料而加以精细之研究。

附注:本稿系苏联顾问拟撰。

(二)敌情判断与应付之方案(蔡尔柏诺夫拟呈)

敌人目前企图,就管见之所及,似不外下列二种:

有一企图:转采攻势,以达下列之目的:

甲、截断我方对外交通线。

乙、占领我方抗战根据地如四川、广西等。

敌方可以三十一个步兵师团之兵力,分配中国各地,以对抗我方二百三十一个步兵师,二十九个独立旅,十一个骑兵师、十二个骑兵旅(内每括四川之十四个步兵师)。

敌方:

士兵	620000
步枪	229152
轻机关枪	9300
重机关枪	3100
坦克防御炮	1240
其他各种炮	1612
临时配属炮	324

坦克 248 至 300

我方:

		按军政部供给之数字
士兵	2074326	2530024
步枪	612000	407076
轻机关枪	37260	22607
重机关枪	8745	5145
坦克防御炮	924	372
其他各种炮	无	903 加迫击炮 2447

临时配属炮	无
坦克	207

注：我军士兵人数系根据二十七(年)十二月军政部统计而得。武器数按各师平均标准计算：每师步枪 2500 支，轻机关枪 150 挺，重机关枪 35 挺，坦克防御炮 4 门。敌军数字系按其编制计算。

空军：

	[敌方]	[我方]
重轰炸机	189	无
轻轰炸机	374	30
侦察机	201	无
驱逐机	350	150

敌人目前除空军外，似无增调军队来华之可能。

目前之西北战场，事实上极端重要，设敌人于此巩固其后方，肃清游击队，进而攻击四川之北部(西安、汉中、重庆)，同时向长江上游进攻(或先沿长江进攻)，然后占领西安以切断我方与苏联之交通线，深入四川之成都、重庆。如幸成功，则设法引诱马家将领脱离中央。

目前敌人若向西安、重庆方面进攻，其兵力可增至八九个步兵师团，以对抗我方四个战区之七十五个步兵师、二十五个独立旅、十一个骑兵师、九个骑兵旅。

敌方：		我方：
士兵	160000 至 180000	791168
步枪	29136 至 66528	229500
轻机关枪	2400 至 2700	13650
重机关枪	800 至 900	3250
坦克防御炮	320 至 360	300
其他各种炮	536 至 588	168
轰炸机	206 至	3

驱逐机	150	40
坦克	62	65

西安战事,敌约拟分作两步:先于冬季强渡黄河,进而袭取西安,且乘我方游击队于冬季不易活动之季,加以肃清,巩固其后方,然后始采取大规模之攻势,以期达其目的。

沿长江之战事,亦可分作两步:冬季先求取得宜昌,切断我南北之联络,在该处建立空军根据地,俾以其驱逐机随护轰炸机,轰炸四川各人口集中之区。敌人取得宜昌后,在春前或停止进攻,或仍沿长江继续前进,再改由襄水北进;同时进攻西安,以期威胁我第一、五两战区之部队。求达此项目的,敌在长江方面之兵力,可增至七个师团,以对抗我方三十五个步兵师之兵力。

敌方:		我方:
士兵	140000	292000
步枪	51744	82500
轻机关枪	2100	5250
重机关枪	700	1225
坦克防御炮	280	152
其他各种炮	414	26
坦克	124	无
轰炸机	295	27
驱逐机	160	99

西北战场为我方将来反攻最利之地带,此处敌人后方,我有庞大之游击队,此处敌方海军无活动之余地,此处握有黄河东北两岸之出路,且由此可直达敌人主要之交通线。

西南战场

敌人主要进攻之方面,为广州、梧州、桂林之线,其次北海、南宁之线。因距离之长,丛山之险,天然可资屏障,惟敌方以五至六个师团之众,对吾方二十二个步兵师,一个独立旅,当感兵力之不

足,计:

敌方:		我方:
士兵	100000 至 120000	194471
步枪	36960 至 44352	55000
轻机关枪	1500 至 1800	3300
重机关枪	500 至 600	770
坦克防御炮	200 至 240	88
其他各种炮	308 至 360	12
坦克	62	150
轰炸机	263	无
驱逐机	90	11

敌如在此方面进攻,自受相当之限制:盖仅能进攻龙州、南宁、桂林之公路线,并于南宁建立空军根据地,以便轰炸昆明及封锁南方之海口。

为求保持现有之阵地,以取得主动之地位起见,我军应就现有之兵力,重为必要之配置,俾敌方大举进攻时,免遭受极大困难,并保持优越之地形,以备将来之反攻。

因上述种种,故必须有下列之设施:

1. 在西南战场,保持原有之阵容,作积极之防御,牵制敌人,使敌人不得由西南战场抽调部队,其办法如下:

甲、第四战区部队应取攻势,其任务为牵制敌人,使其增调生力军,并占领广州附近地带,使敌人不仅供给士兵,即供给全城居民沿珠江之粮食运输发生困难,同时我方须另为配置兵力,以巩固南宁之防务。

现如限令夺取广州,在势似非得计,且需多数兵力,盖敌利用海军之力防守广州也。

乙、第三战区部队之任务不变;扰乱敌人在长江之运输,保持南京、杭州之紧张状态,以牵制在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形地带之

敌军。

丙、第九战区之任务：阻止敌军占领湘赣、浙赣等铁路，如遇敌军溯江进攻，或进取西安时，即令击破南昌方面之敌军，并进取九江，使敌不得由该区之前线抽调部队，以增强其进攻之部队。

西北战场

将第五战区由西北战场划为独立之华中战区，直隶大本营，以掩护四川之东方为己任，长江防务责令华中战区担任，江防之守备地带，尤应归其直接统率。

加强并巩固华中战区之右翼(宜昌附近一带)，故须将第五十三军划归华中战区指挥，从速充实第二十六军之兵器，田攸县调第二师开安陆(钟祥)，统归华中战区指挥。

巩固西北战场，可由其他各战区拨调部队，并由本会驻长江以南之预备队，拨往长江以北及西北一带。

由第九战区抽出汤恩伯总司令之第十三军(在通城以南五十公里一带)，第五十三军(岳州南五十公里)划为本会之预备队，并由本会之预备队调第八十五军开南阳，伺敌进攻西安时，即由其出击敌人盘踞黄河北岸之侧面及后方，或径趋洛阳、潼关、西安或反攻信阳，重新部署约需一个半月之谱。由第九战区调出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之后，敌我两方之兵力如下：

敌方：		我方：
四个步兵师团		第九战区六十步兵师
士兵	80000	476491
步枪	29568	150000
轻机关枪	1200	9000
重机关枪	400	2100
战车防御炮	160	240
其他各种炮	200	124

轰炸机	295	无
驱逐机	160	无

[蒋介石于此处亲批：“此三个军应即抽调至南阳集中，为第一与第五战区之策应部队，如八十五军已在湘西剿匪，则该军暂缓调动亦可。中正。”]

第九战区有此兵力，自能完成其任务。

第三十、第四十及第四十五军，由南阳一带调邠县、盖屋，作为固定之预备队，准备防御阵地工事及作反攻之准备，并将第九四军由秭归、万县一带调往商县、南商一带，作为固定之预备队。第九四军原驻地点，调第七五军填防，归华中战区统率。

同时为充实西北战区，准备反攻之基础（固定预备队），以便反攻，必须有下列之设施：（一）由四川调川军六至七个步兵师开汉中、长武一带，健全其指挥干部，期于六至七个月之间养成完全之战斗能力。

一切部署须于三月底完成，如是则西安、重庆方面敌我两方之兵力为：敌人八至九个步兵师团，我方为八十四个步兵师、二十五个独立旅、十一骑兵师、九个骑兵旅——应由南调往北方之川军五至六个步兵师及炮兵不计在内——。

敌方：

士兵	160000 至 180000
步枪	59136 至 66528
轻机关枪	2400 至 2700
重机关枪	800 至 900
坦克防御炮	320 至 350
其他各种炮	536 至 588
坦克	62
轰炸机	206
驱逐机	150

我方：

士兵	835549	注：上列我军数字
步枪	248500	系按四个战区计算
轻机关枪	14910	——即一、二、十、八战区
重机关枪	3530	——第八军及游击部队未计在内
坦克防御	炮 336	
其他各种	炮 221	
坦克	65	
轰炸机	3	
驱逐机	40	

长江及襄河方面：

敌方：

我方：

七个步兵师团		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
士兵	140000	316375
步枪	51744	102750
轻机关枪	2100	6165
重机关枪	700	1440
坦克防御炮	280	164
其他各种炮	412	26

调大庾、龙南、翁源一带整理之第四、第六六、第六四军，留归本会指挥。其余大多数之炮兵及坦克，应作为充实西北战场之用（详细计划，另行呈报）。

航空方面，应准备飞行场，俾集中力量与陆军联合作战，首先于西北战场发展其威力，欲求保护陆军避免敌人空袭，须于前线较近之外，择定地点，开辟飞机升降场，以备驱逐机之用。至目前则以训练空军与陆军联合作战为第一要务。

关于工程方面

应在龙州、南宁、梧州之线；广州以北及东北山区；南昌、长沙

以北及以南山区；沙市、宜昌、襄阳、南阳以东山区；黄河南岸——尤其潼关——及西岸；商南、商县、西安、邠县之线设防御线，建筑半永久式工事，防御坦克及步兵之障碍物，及防空防炮掩蔽部等，其纵深通常六至八公里，互距十五至二十公里之谱。

第二企图：敌或设法巩固其现有阵地，并从事肃清其后方之游击队，消灭第三战区部队。为防止此项企图计，我军应（1）调拨若干正规部队，开赴敌人后方，充实游击势力。（2）在占领区域敌方兵力单薄之处，采取攻势。故我方兵力之配备，得按下列数种方式：

作战计划要点：

1. 如敌军大规模进攻，我军应于各道防线步步阻止及扰敌其主力，分散其主力，并于预定之防御阵地，集中多数预备队以攻敌人之侧面及其后方，并追击已经散乱之敌军。

我军应于次要方面时作小规模之出击，以牵制其兵力，并令游击队减弱其兵力，使不得不留驻一部分部队维持后方。

敌军在未进达南宁、梧州、桂林、宜昌、西安等阵地前，应设法消耗其兵力，一如在武汉会战之先例，并以事先准备之预备部队转取大规模之反攻，故应于有利方面及阵地，预为布置预备队（固定之预备队），并加以训练，此项预备队系由防御战过程中，由次要方面抽调之师及由前线调回整训之各师所组成。

以前各次战事之缺点，即前线残破各师由前线抽下后，须经数月始得补充，兹为不再蹈前辙，希望调整兵员之补充方法，即前线抽调残破之师时，就预备队中派出部队填防，准该师于前线之后方整理，俾经过十日至十五日调整后，复可加入作战。军政部应于本年内征集补充兵，各军应均有第三批补充队伍，并事先开往相当之地点，以便部队残破时能立即补充。

2. 设敌人决定坚守其现有阵地，设法肃清后方时，则我方应采局部之攻势，以牵制敌人于前线，使不得抽调充分兵力与游击队

作战;并使其由后方向前线增援。

3. 准备西北反攻根据地,以备沿黄河两岸向太原包头总反攻。

希望于榆林一带编组新军,并从速由宁夏南部调拨两个步兵师赴宁夏以北,以巩固太原方面之防线。

4. 继续组织并发展大规模之游击运动,派遣敌人后方之正规部队,应为此项运动之主干,处于指导及指挥之地位。

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候

钧载。谨呈

委员长蒋

总顾问

蔡尔柏诺夫^①谨呈

二八、二、一一

附件:1. 关于炮兵方面说明书一件

2. 敌军全般态势判断要图一件(缺)

关于炮兵方面

1. 由于西北战场之重要,应在第十战区内增配火炮二十四门,此项火炮可由第九战区抽调:

甲、由炮兵第一团调 7.5 公分山炮一连,计四门。

乙、由炮兵第十一团调 10.5 公分榴弹炮二连,计八门。

丙、由炮兵第十五团调 7.62 公分野炮二连,计八门。

丁、由炮兵第十五团调 11.5 公分榴弹炮一连,计四门。

2. 为加强第四战区实力,应自第九战区炮兵第四团抽调 7.5 公分野炮三连,计十二门。

3. 为增强第九战区实力,应自第三战区抽调:

甲、由炮兵第十九团调 7.62 公分野炮一连,计四门。

^① 即切列潘诺夫(А. И. Черепанов)。

乙、由炮兵第十一团调 10.5 公分榴弹炮二连，计六门。

4. 经此番抽调之后，各战区之火炮如下：

[蒋介石于此处亲批：“此应注意，可照此建议调整。中正。”]

战 区	火炮		山炮		野炮		榴弹炮		总计	
	原有	将有	原有	将有	原有	将有	原有	将有	原有	将有
第一战区	12	12	18	18	12	12	42	42		
第二战区	12	12	—	—	—	—	12	12		
第三战区	24	24	4	—	6	—	34	24		
第四战区	—	—	8	20	4	4	12	24		
第五战区	—	—	18	18	8	8	26	26		
第九战区	13	9	61	45	71	65	145	119		
第十战区	22	26	47	55	45	57	114	138		
总计	83	83	156	156	146	146	385	385		

注：全国火炮共为 453 门，现在各校及预备队之 68 门未列入。

5. 为节省时间，保护炮兵器材及马匹起见，自第九战区抽调之火炮□□具及人员应用机械化运输，马匹则徒步，故应备载重 2.5 至 3 吨之卡车 45 至 48 辆。

6. 根据经验，分散使用火炮，在作战上无大效果，故必须：

甲、以一炮兵连单独作战，应力求避免。

乙、炮兵应按作战方针，编制为若干炮兵群及小群。以每两个或三个单独炮兵连编成炮兵群，如此则可以益有效力之炮火予敌人以更重大之损失。集中火力，可用一个炮兵营，或二个炮兵营，如用二营之火力，则人员及通讯工具均须补充。每一炮兵群应有良好之指挥，并须与步兵、战车、空军有密切之协同动作，此等炮兵群之组织，应与一般作战计划同时进行。

7. 为保证炮兵在阵地内之活跃,必须:

甲、第一炮兵辖(每一门炮)之阵地应建有良好之工事。

乙、在每三个炮兵阵地上,应有三至二门炮之 2 公分或 3.7 公分之高射炮,或高射机关枪四至三挺,以资保护。此等高射机关枪,可由第四一、第四二、第四高射炮团调用。

(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

[原编者注]上列文件,选自“第三期作战计划及各项敌情判断”档卷中。原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系油印件,原标题为“敌情之判断”。标题上有红字(一)符号。原件无作者,仅在文后附注“本稿系苏联顾问拟撰”。第二部分系钢笔写的,原标题为“敌情之判断与应付之方案”,标题上有红字(二)符号。该件作者为苏联总顾问蔡尔柏诺夫。编者根据文件内容及原标题上的(一)(二)符号,推断第一部分“敌情之判断”亦当为苏联总顾问蔡尔柏诺夫所拟。

(选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战局述评

(1939年4月3日)

H. 利亚霍夫

最近两个月,即2月和3月,日军在中国各个战线发动了新的进攻战。但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给中国军队造成日本司令部所期望达到的那种损失。

战场特点的变化,即日本人已不能广泛使用机械化装备,再加上冬季华北的严寒和华中的多雨,影响了日军军事行动的进程。此外,半年多来,日军因连续作战,已经拖得精疲力竭,它需要休息,需要补充新的人员,所以这时它已无力按照以前的速度发展了。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抵抗不断加强:日军的每一次进攻均遭到中国部队的坚决抵抗,有时甚至遭到中国部队的反击。

看来,日本侵略者是想利用今年冬天的时间来“整顿”自己的后方,即清剿游击队;重新部署军队;补充新的人员。最近几个月,日本司令部已经把反战情绪强烈的老兵和在前线时间过久的士兵撤回日本,而代之以新兵和重新征集的后备军。日本人正在把最疲惫的部队调到后方去驻防和休息。

在2月和3月间,日本人的行动可以归结为:或者是进行带政治性的佯攻,如攻占中国南海的海南岛;或者是占领一些有利于防守的阵线,如3月份在安陆和南昌(华中)的进攻。

中国政府和中国司令部已加强了自己军队的实力,作好了在新的战线上回击日本人的准备,这些新战线均属广州和汉口失陷后日军新占领的地区。同时,中国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日军阵

地的局部反击,中国军队几乎在各条战线上都进行了局部的反攻。在日军后方,中国游击队也卓有成效地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3月初,日军开始进攻汉口西部和西北部。宜昌是日军西部地区进攻的重点。为了占领宜昌,日本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由于日军远离前线一百五十公里,所以日军司令部决定首先动用空军。整个3月,宜昌连续受到日机空袭,炸死了许多无辜的和平居民。但是,尽管如此,日本人始终未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对宜昌的进攻,最后以日军的失败而告终。

日本人进攻汉口西北部的目的在于进抵汉水,因为汉水是防御中国军队反攻,掩护汉口地区的一条有利防线。日军在这方面的进攻主要集中在安陆地区。当日本人把大约两个师团的兵力调到安陆地区后便立即转入了进攻,3月10日日军占领安陆。但是,当中国军队得到增援部队后便阻止了日本人的进一步推进,同时粉碎了日军想渡过汉水抵达西岸的企图。后来,中国军队收复了安陆北部和南部日本人占领的一些据点。安陆地区的战争充分表现出中国军队的顽强精神和崇高的战斗品质。例如,3月10日,中国军队包围了一支上千人的日军部队,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八百人。由于中国军队粉碎了日本人想占领汉水西岸的企图,于是日本人在安陆地区被迫转入防御。

2月底,日军司令部朝南昌方向(九江以南)集结部队。大约集中了四个日本师团的兵力。后来为了包围南昌,日本人便从几个方向对南昌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日军一个纵队开到九江至南昌的铁路线一带,另一个纵队向西移动。此外,日本人又派遣海军陆战队在鄱阳湖东岸登陆,其任务是切断从南昌向东去的道路。

中国军队以顽强的抵抗和不断的反击迎接日本人对南昌的进攻。他们多次打退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鄱阳湖沿岸登陆,夺回了一些被日军西路纵队占领的居民点。南昌之战是一次异常残酷激烈的战役,整个战役延续了两周时间,直到3月25日,日军在机械化

部队的帮助下才从西面冲到南昌。3月27日,日军在通向南昌的一些要冲进行了激战。在大量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日本人从三个方向进攻南昌。当日本飞机炸毁了南昌所有大型建筑物之后,中国军队仍然坚守阵地,直至黄昏。后来,中国军队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撤离南昌,后卫部队则继续留在南昌同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直至深夜。

日本人进攻南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次进攻日军共损失一万五千人,损失了很多坦克和其它武器装备。

在广州战线,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手中。广州以东的增城地区仍有零星战斗发生,这些地区的日军已被迫转入防御。

日军对游击队的围剿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现在游击队仍在很多城市——北京、天津、徐州、南京的郊区进行战斗,日本作战部队在这些城市的郊区均设有重要基地。虽然日本占领军不断对游击队进行围剿,但是游击运动仍在不断地扩大。据中国陈诚将军说,目前活跃于日军后方的游击队数量已占中国正规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今年2月中旬,在中国进行的四百零四次对日作战中,游击队就进行了二百五十九次。游击队的主要战役是在山西省进行的,它们同八路军并肩作战,同日军进行了二百零三次战斗,共打死日军一万三千人,俘虏日军五百六十人。

日本侵略者的围剿是想求得占领区的“平安无事”。但结果却相反:日本军阀肆无忌惮的掠夺和对中国和平居民的残酷镇压,加深了中国居民对占领区政权的不满。于是游击队大大地发展起来,这就扩大了争取国家独立的战士们的队伍。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行政院会议颁发苏联空军顾问 特贺尔勋章决议案

(1939年4月25日)

临时讨论事项(密)(五)

军事委员会函：请颁给航空委员会俄顾问特贺尔四等云麾勋章案。

勋绩调查表

隶属	官阶	职务	姓名	西文原名	年龄	国籍	勋绩	拟给勋章	备考
航空委员会	上校	顾问	特贺尔	Г. И. Тхор		苏俄	报务努力 对于空军 建设颇多 臂助	四等云 麾勋章 一座	

决议：通过。〔民国政府行政院档案〕

〔原编者注〕此件摘自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第四一一次会议“议事日程”中。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在中国前线的一个村子里

(中国来信)

(1939年4月26日)

B. 罗果夫

在湖北、安徽、山东和河北的山区，现在居住着几百万农民，他们是因日军的进攻而背井离乡迁到这里来的。农民在山坡上耕种着新开垦的土地。山区的全部通道和公路均有武装农民和游击队守卫。在远离公路的地方，建立起一些居民点。无论何时，只要中国军队或游击队一旦肃清据点上的日军，农民就将返回自己的家园。

今天，离随县(湖北省)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厉山显得异常热闹，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成年人几乎都推着满载各种物品的独轮车，天真活泼的孩子跟在大人身边。一些妇女手中抱着婴儿。一辆辆载着家俱和其它物品的毛驴车在街上缓缓而行。一些房子的大门因时开时关而砰然作响。居民们正陆续返回自己的家园。前不久，厉山的居民被迫出走，因为日军已经逼近。日本飞机不停地在村子上空盘旋，并炸死了几百个居民，破坏了大量房屋，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当居民得知日本人很快就要进村后，便纷纷离去。青年农民离开了中国人一向敬重的祖坟和已经播种的田地，参加了游击队；老人、妇女和儿童都上了山。

现在中国军队赶走了日本人，后山的五十七户人家又从山区回来了。今天全村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

中。一辆辆满载粮食的手推独轮车发出轧轧的响声。母亲们带着孩子在路上漫步,很多孩子的头上都戴着绣有小鱼的漂亮帽子,身穿绣有小猫头像的衣服。我们问一位在路边休息的推独轮车的高个子农民:“这儿离前线不是很近吗?”他回答说:“怕什么!在日本人被赶走以前,我走过十次又回来过十次”。说完他便敏捷地把绳子往肩上一挂,小轮车又开始发出轧轧的响声。我们和农民走在一起穿过村庄。沿途偶尔发现有些房屋仍然是完整的。我们看见一座塔的灰色石基上刻着几个大字:“日本士兵兄弟们,你们为谁打仗?”“我们,中国士兵为人民而战!”

今天是厉山居民的一个真正节日。他们再三邀请我们去品尝他们的节日佳肴,我们因时间仓促未能前往;再者我们还要去参加中国军队某师的庆祝会,他们早已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在离前沿阵地五公里处的一片松林中有一个用木料搭起来的小型舞台,台前整整齐齐地坐着二百五十五名师属初级军官学校的学员。前来参加节日活动的还有一支大学生队伍和很多居民。大家情绪高昂。庆祝会一开始,全体合唱国歌。然后按惯例向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的遗像鞠躬。紧接着准备发言的师长、政治部代表、游击队代表和学生、农民代表一一登上舞台就座。他们的发言都很简短,而且很有意义。学员们渐渐向舞台靠拢。这些学员都是在战斗中表现良好的士兵。今天他们在军校学完了规定的课程,取得了指挥员的称号。学员中很多人都曾在战斗中多次负伤。

在刚刚举行过庆祝仪式的草地上,抬来了一些桌子和一大桶米饭。我利用开饭前的空隙,对新指挥员的战斗生活作了一些记录。一位广西农民黄文吉说:“从前,当日本人抵挡不住我们的反攻时,他们便使用毒气。现在,我们知道这东西并不怎么可怕,只要随时注意和避开它,最后还是可以进攻的。在威钦山的战斗中,尽管日本人施放毒气,但我们仍然几次发起反击,同日军进行肉搏战。在王家庄附近,日本人企图利用毒气作掩护来包我们,但我们

仍然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另一个指挥员说：“我们曾保卫过平型关(山西省)附近的重要阵地。当时，日本人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我们进攻。我们唯一的办法是绕到日本人后面去拖住他们。我们的确这样做了。我们把身上的枪支交给同志们，随身带了一些手榴弹，结果手榴弹帮助我们完成了任务”。

还有一个指挥员对我们说：“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高地叫蛇卡峰。日本人曾几次想占领这个高地。他们用各种武器扫射这个高地，并对高地进行轰炸。尽管如此，我们在高地上仍然坚守了半年时间”。

同我们交谈的人都是一些普通的、英勇的人。从他们身上，表现出了一种将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午饭开始了。新战士来到饭桌边，这时他们继续交谈着那些平凡的、充满真正英雄主义的战斗事迹……

演出很快就开始了。士兵们高唱歌曲。他们一边唱，一边打着简单的手势，好象是在自己指挥自己一样。歌声一停，到会的农民便热烈鼓掌，并高高举起紧握的拳头呼喊：“唱得好！唱得好！”

4月于随县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在华中前线

(记者短评)

(1939年4月28日)

B. 罗果夫

中国军队在长江以北华中战线的进攻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可是,几乎有半年时间战报没有报道过这条重要战线的任何情况。其实,在这条战线上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为了保卫辽阔的国土,中国军队在华中前线已进行了几个月的顽强战斗。

中国军队从武汉撤退后,日军在进入武汉以前已经疲惫不堪,不能继续进攻了。这样,日军就开创了缓慢进攻的新“纪录”——一昼夜最多向前推进一点五——二公里。

由于日本司令部集中大量兵力去进攻武汉,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后方。这时中国军队和游击队趁机收复了安徽、湖北东部和河南南部的许多城市。原来被日本人“占领”的安徽省现已回到中国怀抱。日军后卫部队第一一三师团和一一六师团已躲进津浦铁路沿线的据点和安庆附近的据点。日本人为了保住他们在合肥、蚌埠、花园和安庆的基地,不得不把一万六千名士兵驻扎在上述地区。在长江北岸,中国人已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六安、蒙城、宿州、肥西和舒城等城市。这些城市都是日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才占领的。安徽省政府现在金寨(六安西南)办公。安徽境内现有几个中国师、部分新四军和四万多武装游击队在活动。政府、游击队和军队之间通过前线工作建立了很好的联系。

目前,有十支游击队在敌后作战。当中国军队在前线积极进攻的时候,游击队也在敌后发动进攻。黄兰利(译音)指挥的游击队在袭击信阳;杨长庆(译音)指挥的游击队在进攻武胜关;陈松芬(译音)领导的游击队在进攻浠水。一些游击小分队也在公路沿线活动。

4月,在随县地区又出现了几支农民武装,现在它们已经联合成了一支拥有三千人的大部队,由当地两位农民王由云和王锦利领导。

2月,日军试图进攻襄阳和沙市(汉口西部和西北部)。在进攻中,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方才向前推进六十五公里,占领了汉水附近的钟祥。日军从侧翼的进攻被中国军队击退。日本人还用了八天时间来进攻随县地区的中国阵地,日军的进攻一天达两次有时甚至达六次之多。日本炮兵向该地共打炮七千余发。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未能前进一步。日军的炮击几乎使随县成为一片废墟,但中国人把日军拖在原地达半年之久。

日军司令部发动2月攻势的目的是想占领汉水附近的中国阵地,因为只要占领了这些阵地就可以缓和武汉日军受到的威胁。

我们曾经在黎明时候从中国阵地上观看对面的日军阵地。两军相距不过一百多米。那天晚上中国士兵曾向日军喊话:“你们为什么要打仗?”话音刚落,日军军官便以零星的手枪作为回答,然后遵照命令进行了机枪扫射。像这样的短兵相接,在二十个月的战斗中还是首次。这是因为,这里的日本守军已无力发动进攻了。

旅长周南苏(译音)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前线的形势。他说:日本炮兵经常在转移。我们发现,日本人常常把武器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战争头几个月,日军在这一带每天平均打炮三千发。现在每天平均只有一百多发,在大的战斗中才达到六百至七百发。他们经常遇到日本去年出产的标记为《昭和13年》的炮弹。这一地区中日双方的损失相当,即一比一;而在上海则为四

比一。现在被打死的日本军官比过去多。从前日本军官是不到前沿阵地上来的。那时战壕里基本上是一些老基干兵,而军官是根本不到战壕去的。现在前线来了不少缺乏训练的日本新兵。要是没有军官在场,这些新兵就不能打仗……

4月8日,中国军队在前线所有的据点发起进攻。在战线的左翼,中国军队仅用两周时间就切断了信阳至应山的公路,夺回了一些高地。目前,中国军队继续向郝家店和秋家店(距应山二十公里)挺进,这两个村庄都是日本人凭借毒气守住的。在战线的右翼,中国军队正从几个地点横渡汉水,并继续在钟祥至京山的公路沿线打击日军,日本人在这里大约损失了一千人。在沙洋附近,战斗仍然沿着汉水在进行。这里的日本守军已被迫转入防御,并遭到惨重损失。

我们在前线参观了两个中国团。每天早晨我们都看见战士们带着夜间缴获的战利品返回驻地。夜间袭击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加强了同居民的联系。

中国军队在前线的积极进攻和游击队在后方的积极行动,使汉口周围的日本驻军陷入困境。因此日本司令部急急忙忙把南京的第十五师团调到信阳地区,把一支新的骑兵旅团调到天门。

整个前线的局势表明,日本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在前线和后方同时作战的能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日本人不得不把前线的某些部队撤回来,不得不减少进攻战。中国人的4月战役表明中国军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4月底于沙市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

(1939年5月14日)

委座：重庆。密。昨晤史太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会商结果：(一)苏联援助中国抗日，始终一致，绝无问题。(二)三次借款美金一万五千万美金，允即照办，日内签约。(三)远东保障和平公约须视英、法、美能否参加，苏联绝无问题，英、法、美若不参加，和平仍无保障。(四)欧洲反侵略互助公约，因英、法要求苏联援助，不原对俄互助，故未成立。(五)外传苏联改变外交方针，系故意造谣，谨闻。孙科。寒。印。

(《战时外交》(二)^①，第513—514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立法院长孙科致行政院长孔祥熙电

(1939年5月15日)

孔院长勋鉴：第三次信用借款已商妥：(一)总额美金一万五千万美元。(二)动用期限自本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止。(三)借款周息三厘正。(四)自一九四一年起开始偿付已用部分利息，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起开始还本，分十年还清。(五)借款本息，以农、矿产品还之，其余条件参照前两次借款合同规定。科。删。

(《战时外交》(二)^①，第514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

(1939年5月16日)

重庆。委员长蒋：密。加表。本日下午应伏帅约会，续商供给飞机、兵器，结果圆满，正拟电报告，忽于下午九时接外交部电话，传莫洛托夫约于九时三十分在琳宫会谈，当即趋谒。承莫洛托夫恳切相告云，前夜会商苏联政府应允中国政府请速援助事，今日外交团均已哄传，实于苏联不便。苏联政府决定将此次交涉暂停，并请贵方即酌为否认，所传不确，以图息逐。科答以在莫月余，从未与外人接近，此事宣泄，甚为诧异。莫答贵国使馆中人，或不无关系。科问何时再继商？莫答未能预定，并恳切表示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策决不因此改变。科再问外人方面有来探访此事否？莫答今日法哈瓦斯通信社记者曾来外交部查访，故知外交团当亦知之云。现除在此间向外否认外，请我政府对于外人如有同样探访，亦声明否认，以期息逐，徐图补救。孙科。铤。

(《战时外交》(二)^①，第514—515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中国人民的女英雄

(1939年5月17日)

冀 玲

一支日军小部队路过一个已被洗劫一空的中国村庄。村子里有些地方偶尔还可以看见几座石头垒成的小房。村民早已离开家园上山去了,整个村子到处都是日本飞机和重炮留下的弹坑,到处都是垃圾堆和日本兵抛下的破衣烂衫。

突然,从村外小丘附近传来一阵机枪声,只见几个日兵应声倒下。

接着又传来一阵急促的口令声,一支日本骑兵队向小丘疾驰而去。此时,在骑兵队的前面又响起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同时小丘旁一挺机枪正对着日本骑兵不停地扫射,而操纵这挺机枪的却是四个年轻的中国妇女。

不一会儿机枪停止了射击。这四位年轻妇女被日本人带到陡峭的长江岸边,一个接着一个地从峭壁上被推下江去,顷刻之间四个妇女就消逝在浪花之中。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四个妇女中竟还有一个人死里逃生。

这位妇女很快躲藏起来。她是一位南京姑娘,名叫马苏(译音),曾经是南京市的游泳冠军。日本人杀害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后来她参加了游击队。

马苏脱险后来到南江城,这里驻有一支不大的中国部队。不久日军逼进南江,日军的兵力是中国军队的五倍多。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明白,如果同日军硬拼,整个南江城的中国军队将会白白牺

牲；如果退却，那就是把全城老百姓出卖给日本侵略者。

于是，指挥官召集马苏和其他军官来商讨对策，制订一个作战方案，那就是把几枚定时炸弹放在江边的排水渠的堤坝下，然后再把日本人引到那里去送死。

一小时后，一位打扮得很漂亮的中国姑娘出现在离城几英里远的一个绿树成荫的地方，这里就是开到南江的日军驻地。姑娘要求日本兵带她去见指挥官，见到指挥官后姑娘对他说，她有一个很妙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日军毫不费力地取得胜利。她说，这里有一条无人知道的小路，只要穿过这条小路再经过排水渠的堤坝，日军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占领南江。姑娘还说，她是一家陶器厂厂主的女儿，中国军队捣毁了他父亲的工厂，抢走了全部财产。

日本军官对姑娘的话信以为真，便带着部队跟着姑娘上路了。

原来这位姑娘就是马苏。沿途她一边悄悄地看着手表，一边快步往前走。

堤坝近在眼前，离定时炸弹爆炸的时间也只剩下几秒钟。

突然，马苏转过身来对着后面的日军高声喊道：“为父老兄弟们，为成千上万无辜的受害者，为亲爱的祖国，向你们这群恶魔报仇！”

堤坝下的定时炸弹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炸弹的爆炸声淹没了姑娘的呼喊声，弹片在空中飞舞，马苏壮烈地牺牲了。虽然马苏与日军同归于尽，但是她却挽救了南江城的保卫者。

在华北战场的河北和山西交界处有一个村庄，中国军队撤退后为日军第七师团所占领。师团的司令部便设在该村一间宽敞的房子里，这间房子原来是村长住的，他已经和中国军队一道撤走了。

深夜，当日本军官把所有的情报都送到日军总司令部，把所有的指示命令都向下级下达后，便打算去休息，这时，日军师团长突

然接到一个报告,说在村长住过的那间屋子里埋有一颗地雷。这个消息是一个中国青年送来的。师团长望了望这个小伙子,然后问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报告给我们?难道你不希望中国军队打败我们吗?”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大金)回答说:“我们一辈子都在挨饿。将来的日子可能比地主在的时候好些。要是这间房子被炸,周围的人都要遭殃”。

这个中国青年还提供了中国军队撤退时的人数,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这就使日本人对送来情报信以为真。此外,又正值深夜,日本人要审查这个中国青年是很困难的,时间又很紧迫,于是日本人便决定立即将司令部迁到大金家去,而把大金打发到别的地方去住。

这座房子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她就是大金的妻子,这时她正在屋里为军官们烧开水。

在吃晚饭的时候,大金拿着一个显得有些沉重的布包出现在日本军官住房的门口。他一面微笑一面含含糊糊地讲着什么,突然,他猛地用尽全身力气把手中的布包扔到一个正举着酒杯的日本中校脚边。同时他的妻子也沉着地把放在火炉边的一个瓦罐推倒在火炉里。

顿时房子里发出一阵爆炸声,平房的墙壁摆动起来,屋顶腾空而起。这次爆炸,共炸死日本军官十九名,将军一名,另外还炸死、炸伤士兵三十八名。

外国报刊曾多次报道过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情况。康克清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因父母养不活她而把她卖给了人家。因此康克清从小就在皖南的农村当女仆,她是在繁重的劳动中度过童年的。

康克清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她十六岁那年,听说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在举行暴动,于是便从主人那儿逃跑出来,把当地一些青年组织成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有三千人,他们的武器既

有菜刀也有步枪,后来他们参加了红军。

康克清一直在红军司令部中担任要职。

康克清现年 26 岁,是延安军事学校的政治教员,她曾参加过西北前线的对日作战。

光荣的中国妇女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女。她们正在给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谱写英雄的篇章。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

(1939年5月19日)

巴黎。中国大使馆转杨大使耿兄：铣电悉。一、草案全文已悉，此事应须从长讨论，或待兄回国面商再定。二、请兄速回莫斯科，顷接哲生铣电第三次借购条件本已完全商妥，而前途突然宣告停顿缓议，究为何因？此事重大，请兄速回俄探明真相，继续完成，并先将第二次借款项下未缴部分，照约催缴，待此事告一段落，请兄速回国面详一切为盼。中正手启。皓申。机。

(《战时外交》(二)^①，第515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

(1939年5月24日)

莫斯科。孙院长：兹致史大林先生一电，请译转如下：

史大林先生：前接孙院长电，甚感阁下关注之切，重诺之厚，无任钦仰。今闻莫洛托夫先生对商定各件，忽告停止，据称为外交团探悉，未便即时实行，为贵国立场故不得不尔。中所深知，并深信阁下仗义扶弱，决不因此区区关系，有所犹豫，而于中国抗御侵略之革命圣战，必能援助到底也。惟最近战争日激，武器消耗甚大，全国官兵急盼贵国之接济，如大旱之望云霓，实有迫不及待之势，务请阁下照前所允者，提早拨运，以济眉急。兹再托孙院长晋谒台端，商决一切，尚期有以报我也。蒋中正。

《战时外交》(二)^①，第516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中国战局述评

(1939年5月25日)

H. 利亚霍夫

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区实行卓有成效的反攻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次反攻于4月中旬开始,并持续到现在。

中国政府和中国司令部的代表曾多次声明,中国战争的现阶段是中国军队进行全线总反攻的一个准备阶段,总反攻的最终目的是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境内赶出去。为此,中国军队正在不断地扩大和补充兵源及武器装备。目前中国中央政府所辖各省都在组建新部队,这些部队增补了大量的志愿兵。

在准备大规模战略反攻的同时,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的现阶段还面临着一个任务,那就是全面削弱敌军,牵制敌军,使其丧失机动能力。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在各个战线对日军实行局部反攻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国军队目前进行的反攻正是从属于这一任务的,因为这些反攻是局部的,其目的是削弱侵略者的力量,夺取有利阵地,使敌军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中。

在华中,中国军队开始了对南昌西北和西南部的进攻。在南昌西北部,中国军队已逼近武陵,这里的日军遭到惨重损失。在南昌西南部,战斗在高安地区(圩州)进行,日军同样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放弃高安城。5月初,中国军队加强了攻势,直逼南昌西部,占领了南昌飞机场。一支中国小部队还冲进南昌,但后来又被迫撤出。5月中旬,中国军队再次攻克南昌并在市区进行巷战,后来中国军队退出南昌,但是,这次中国军队在撤离南昌之前烧毁了凡

座日军的易燃仓库和粮食仓库，破坏了几座日军营房。

中国军队在汉口西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也进行得非常积极和卓有成效。中国军队在这里的进攻重点是陆安地区，该地曾受到几支游击队的袭击。这次进攻的结果是切断了陆安日军同后方的联系。在汉口西部地区，中国军队已逼近天门和岳口。日军司令部已把军火库和指挥部从岳口撤走。中国军队于5月15日攻克岳口并包围天门。

日本人企图抵抗中国军队在华中的反攻，他们集中了一部分步兵和骑兵于5月中旬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军的进攻在襄阳至南阳之间展开。但是，由于在河南南部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从南阳向日军发起进攻，因此日军的进攻被迫停止，而中国军队便转入对后撤日军的追击。

4月底，中国军队还在其它主要战线——上海—南京—杭州地区顺利地展开进攻。一支中国部队渡过杭州湾占领了杭州湾北部的几个据点。另一支中国联合部队在开始进攻之后进抵湖州（上海西南部）。5月初，中国军队和游击队在太湖西部打了几个胜仗，袭击了宜兴和溧水的日本驻军。

5月5日，在长江流域活动的游击队袭击了安庆，烧毁日军军火仓库和粮食仓库数座，并破坏了日军飞机场和机库。

华北战役，特别是山西和开封战役，充分显示了中国军队进攻的坚定性。4月初，中国军队在游击队配合下向开封日军发起进攻。在袭击开封时，游击队摧毁了日本人的军事储备，和车站的设施。这次进攻随后为日军增援部队击退。过了几天，中国军队再次向开封发起进攻，经过激战，中国军队占领了开封火车站和开封西门。后来中国军队再次被日军击退。中国军队在撤出开封时占领了开封附近的阵地，并将城内日军包围起来。5月，中国军队多次击退日军旨在破坏中国军队包围的反击。

中国八路军在山西（山西西部和西南部）的进攻也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在大同至蒲州铁路线的某些地段,由于中国军队的进攻,铁路交通已经中断。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主要是敌占区“傀儡政府”的部队,这些部队是由一些被胁迫的中国人组成的。因此,日本人要想得到这些部队的“帮助”是大成问题的。仅5月份,伪军中就有三支部队在打死自己的军官后投奔中国军队和游击队。

在华南,中国军队已向广州、广州东部和北部地区发起进攻。目前,中国军队正在不断地向广州逼近。

中国司令部在评价前线的形势和中国军队的反攻时指出,中国军队的积极进攻已经打破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因此日本人原打算对南昌地区进行大规模进攻的计划宣告破产。由于中国军队在湘江战线加强反攻,从而打破了日军对长沙的进攻。由于对开封、安庆及其它日军占领的城市发动进攻,从而使日本人无法集中兵力打进攻战。

日本司令部为了补偿其陆军的损失,因而派飞机轮番轰炸中国后方。从5月30日起,日军几次轰炸重庆。由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重庆市的房屋遭到严重破坏,数千和平居民惨遭杀害。此外,日本空军还轰炸了宁波(浙江省)、长汀、漳州(福建省)、郴州(长沙南部)。日本人轰炸这些未设防的中国城市,是企图对中国人民采取恐怖手段,摧毁中国人民奋战到底的意志。但是这些企图显然都遭到失败。

鉴于日本的空袭,中国政府发表了告人民书,指出了日本空袭的实质。告人民书说:“日本人随时都在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精良的训练有素的武装部队,但是,我们却胜利地抵抗住了这支部队。日本飞机可以屠杀中国的和平居民,但是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反抗意志”。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战局述评

(1939年6月11日)

H. 利亚霍夫

5月下半月和6月初,中国湖北(华中)的汉口西北地区发生了几场激战。5月初,日本司令部的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对上述地区三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安陆、随州和桐柏。当日军的进攻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后,它被迫停止前进,接着日本司令部便从右翼采取迂回运动。参与这次迂回作战的一个骑兵旅团和两个步兵团(原在新野方向活动)现已向正前方移动,并于5月10日占领新野。事后,为了从侧面打击中国部队,日军的迂回运动转向西北方,并占领了唐河。

此时,中国司令部加强了南阳地区军队的部署,并进行反攻。5月11日,中国军队赶走了新野的日军,5月14日又攻克唐河。由于中国军队加强攻势,因而日军被迫撤出桐柏。过了几天,中国军队于5月19日又攻克枣阳。从枣阳撤出的四千名日军向西南方向退却,但是他们被太行山区的中国部队包围。

5月23日,中国军队经过一整夜的激战后赶走了随州的日军。最近几天,日本人为了夺回随州,向随州发动了几次进攻,但毫无成绩。日军对太行山区的进攻也同样毫无进展。

由于中国军队的反攻,日本人在湖北北部地区的作战计划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在该地区作战的几个日本师团,几天之内就后退了二百多公里。其中以日军第十六师团的损失最为惨重,所以该师团不久便被调到汉口进行休整。

5月底,日本人又对岳阳南部发动了一次进攻,最后仍以日军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军队在岳阳南部地区进行了连续五天的顽强战斗,粉碎了日军的全部进攻。日本人为了进入中国岳阳南部防线后方,企图派一支陆战队在洞庭湖南岸登陆。但是,中国军队打退了陆战队的登陆。这时日本人发觉对这些地区发动进攻已属徒劳无益,于是便把自己的军队撤回原防。

目前,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

据周恩来(中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说,汉口沦陷后,日本投入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来对付在日本占领区的中国军队和游击队。尽管如此,但日本人在后方的战役仍一无所获。日本司令部消灭游击运动根据地的意图,以及为此而对游击区实行的“围剿”,都将以不断的失败而告终。现在日军后方共有二十多个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保证了游击队的活动。一批生产武器弹药的大型兵工厂和手工作坊已经在根据地建立起来。它们生产步枪、手枪、手榴弹和子弹。游击队的后备军也集中在根据地进行军事训练。

虽然日军占领北平已达两年之久,但游击队仍在市郊进行活动。他们或者派出小分队,或者由个人“单枪匹马”潜入北平市区,破坏日军的厂房、仓库等等。前不久,一支中国农民游击队歼灭了通县(北平东部三十公里处)的一支日本部队。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一百人。派来增援的围剿队也被中国游击队就地打死三百多人。

这支游击队抵达热河北部之后,便同东北游击队一起进行反攻。他们还把由日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部队的一些士兵争取到自己一边。

目前,新四军、部分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正在华中的大城市——上海、南京地区的敌后打击日军。战斗在上海郊区进行。6月4日,在离上海十公里的吴淞附近,日军同游击队之间展开了一

场战斗。在杭州地区(上海西南部)游击队与日军的战斗从五月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几万名游击队员抵达杭州,并在杭州以东的海边登陆。他们以小分队的形式从这里向上海东北方向挺进。在杭州附近和沪杭铁路沿线,每晚都有战斗发生。一些游击队还直接开到上海去袭击日军的兵营和防御工事。

据中国报刊最近报道,大约有四十万游击队在南京、上海和杭州地区同日军作战。就连日本报刊也无法隐瞒游击斗争的严重性。刊登在日本报纸上的一句综合报道指出,日军在其后方的一些大城市附近同游击队进行了大量的战斗。目前,日本司令部准备在华北展开新的进攻。他们已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山西南部,打算在中条山一带发起进攻。在这一地区,激战已经开始,日本人在该地区遭到了中国部队的有力抵抗。

5月和6月初战局的过程表明,日本人已无力将其攻势进行到底,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却有了显著的提高。

(刘积高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 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壹万万 伍仟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

(1939年6月13日)

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允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信用借款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购买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特签订本条约,俾便订明上称信用借款之实施方法与条件,双方政府并为此派定全权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全权代表为阿那斯塔司一依凡诺维茨一米科杨^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为孙科。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借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信用借款总额壹万万伍千万元美金,按照公历壹仟玖佰叁拾玖年陆月拾叁日市价(每元美金合现金零点八八八六七格兰姆^②),以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境内购买苏联制造之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

第二条 第一条内所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借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信用借款,自壹仟玖佰叁拾玖年七月一日起算,利息为年息三厘,自壹玖肆贰年柒月壹日起十年内偿还,每年偿付同额数目,即每年偿付壹仟伍百万美元。

① 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Микоян。

② Грамм,重量单位,克。

信用借款之利息自壹仟玖佰叁拾玖年起付，每年付清实际使用之信用借款实数之利息。

第三条 为实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借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信用借款起见，双方政府特派定全权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阿那斯塔司—依凡诺维茨—米科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为孙科。

上述之全权代表依据本条约各条款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借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信用借款额内订购各种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有互相订立特种合同之全权。

第四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供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各种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之名称以及定货各部分之交货期限，由双方政府全权代表互相酌定，以各次定货所成立之特种合同规定之。

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之价格，以及输送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边境所需各项用费，由双方协议规定之。

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之价格，双方依据世界市场上出售之相当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并具有同一技术品质者之价格而规定之。

第五条 本条约第二条内规定之信用借款与利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需之物产品与原料偿还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交付之商品种类与数目应与本条约附录第一品名单相符，并于年初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之指定于每年偿还款额内规定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供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之物产品与各种原料品可于全年期内实施之，惟为偿还本年度债务而供给之全部物产品与各种原料品，须于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结束。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供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之物产品与原料品之价格,双方依据世界市场上出售之相当物产品与原料品并具有同一技术品质者之价格而规定之,其价格之计算以终点交货(中苏陆地边境)时为准,或以中国港埠起点交货(若以伦敦交易所价格为准,则扣除自中国港埠至伦敦之运价)时为准。

第六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交付之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均以美金作价并按照每批物品交付之日之美金同现金之折合市价为准。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偿付之物产品与原料品运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境地之日美金同现金之折合市价为准。

第七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供给之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交付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此而特设之全权机关,其交付地点以苏联黑海港埠或其他相当之边境地点为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为迎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表示之愿望起见,特表示同意将所供给之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边境运输至中华民国之领土内。

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边境交付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之地点起,运至中华民国境内之目的地止,其所需之各种用费概归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第八条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输送之物产品与原料品在苏联边境交付,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负有全责将上项物产品与原料品运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边境,并付清运费。此项物品运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之海运费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信用借款偿还额内拨付之,运价由双方依据本航线现行之中等运价决定之。

为偿还信用借款而交付之物产品与各种原料品，于到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境地之日起十五日期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为此特设之全权机关，或为此而赋予全权之人民委员会，应将偿还信用借款之物产品与各种原料品之验收，通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或为此而特设之全权机关。

第九条 本条约第三条内所称之全权代表于执行本条约之过程中，互相发生可能之争执时，由双方政府代表组成之审议委员会按照本条约解决之。

第十条 本条约于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信用借款之债务与利息未完全偿清及与其有关之各种义务未执行以前，双方均受本条约之约束。

第十一条 本条约以俄文与汉文缮制，两原本同效；在莫斯科制造两份，一份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执存，一份由中华民国执存，双方全权代表特签字为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全权代表

公历壹仟玖佰叁拾玖年

六月十三日

中华民国贰拾捌年

附录

依据苏联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三九年陆月拾叁日在莫斯科缔结之条约，中国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及其利息而交付之产品及原料品之品名单：

一、茶叶

二、皮草

三、羊毛

四、锑

五、锡

六、锌

七、镍

八、钨

九、丝

十、棉花

十一、桐油

十二、红铜

十三、药材

十四、皮毛

(《近代史资料》总 89 号)

日本侵华两周年

(1939年6月20日)

B. 罗果夫

最近一段时间,各个战线都比较平静。日本司令部在主要战线上发动的新的进攻遭到彻底失败之后,又开始在山西重新部署兵力,继续徒劳无益地对游击队进行攻击。

活跃于日军后方的八十个中国师和几十万游击队,已在敌占区建立了几个牢固的抗日根据地。除原来的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根据地之外;今年又在山西西部、河北南部、安徽和山东西北部建立了几个新的大型游击根据地。

上海—南京地区的游击运动和新四军的活动在顺利地向前发展。目前八路军部队已经深入到热河,并与东北抗日联军取得了联系。蔡廷锴将军领导的抗日游击联军正在广州附近前线活动。这样,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不得不同时投入六个师团的兵力在游击地区作战。尽管如此,游击战仍在不断扩大。

游击战之所以能在战争的第二阶段获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在日本“占领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热潮,从实践上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是因为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和在日军的后方加强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统一战线敌人的破坏活动遭到公开的揭露。日本军阀派遣秘密打入上海附近一些游击队的托洛茨基分子很快就被识破了。一些叛徒特务钻进河北游击队,他们极其猖狂地反对中国人民的团结,干了一系列挑拨离间的勾当。他们先是唆使一个游击队反对另一个游击队,然后便公开采取恐怖手段。

在反对敌人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华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了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堡垒。在河北、山西和山东的广大地区,到处都建立了坚强的游击队根据地,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游击战领导人。著名的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和共产党将领叶剑英在主持游击训练班工作,这个训练班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各个游击队培训军政人员。

目前国民政府从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游击区,如减税,对物价实行监督,国家机关大量收购农产品等等。此外,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减租减息,废除应偿付给投敌地主的债务,关心游击队和伤员的家属等等。广大群众正积极参加游击区的经济建设。他们拒绝把粮食卖给日本人并抵制日货,拒绝使用“傀儡”政府银行发行的货币。上述活动都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人民非常拥护抵制日货,他们还积极地同卖国贼和日本奸细进行斗争。

日本军阀现已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为了制造混乱和逼迫中国人民签订投降和约,他们采取了大量的恐怖手段。最近一个月,日本飞机连续轰炸一些中国城市。重庆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轰炸重庆,最明显地说明日本军阀的软弱无力。日本的炸弹没有能够中断中国临时首都的紧张生活。

和过去一样,日本人除了轰炸还利用中国人民的叛徒进行破坏活动。日本走狗汪精卫过去作贼心虚地把自己伪装起来,引诱中国人民同日本签订可耻的和约,而现在他已经公开跳出来不择手段地为日本人卖命,妄图使中国人民失败。在轰炸重庆的时候,全城逮捕了几十个日本奸细。目前,一些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又活跃起来。他们的行动比那些当场抓住的日本奸细更老练一些。他们散布大量极其有害的挑拨离间的“理论”,似乎日本的虚弱还不至于使它今天或明天就从中国撤出。毫无疑问,类似的宣传是蓄意削弱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是蓄意鼓励前线的消极情绪。

抗战两周年快到了。目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民族统

一战线力量的不断壮大和牢不可破的团结。

民族统一战线的敌人、投降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利用前线暂时的沉寂大肆活动,其目的同日本飞机的残酷轰炸一样是为了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然而他们只能是白费心机。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在不断地壮大,人民的团结日益加强,他们正在为总反攻进行各种准备。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

(1939年6月26日)

委员长蒋：梗电奉悉。○密。一、漾午偕哲公与史大林先生、伏帅、莫洛托夫院[外]长晤谈，卡加那维契、米科杨、布尔加宁、沃兹聂先司基等要员在座，史氏阐明中苏间密切合作之重要及一贯到底帮助抗战之宗旨，并有专函致钧座(交职回国面呈)，详情已由哲公电陈，祈免赘报。二、本午谒伏帅，哲公在座，据称，在第二次借款项下拨付之陆、空军武器，日前已详告孙院长转报钧座矣。现决定：甲、飞机两百架由陆运外，余均由海道运仰光。乙、航机到兰州后，须有驱逐机保护，故令其先飞到哈密待命。丙、至我希望补充之武器到达后，再定拨付。丁、本日蒙边日军以飞机六十架来袭，交战结果，击落敌机二十架，苏方损失四架，以此观测，苏联不能不积极备战。三、职俟此间各货起运手续完妥，即回国聆训，当否，祈示遵。职杨杰叩。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2页)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

(1939年7月1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卅电奉悉。(1)蔡、张二员卅晚飞抵莫，当即告知苏方，第一批货务赶于月初启运，计程七月杪可望到达仰光。(2)顷承米科杨面告，史先生对钧座提请派遣党务、政治军事顾问事，业已慨允，将先更调军事顾问，并考虑党政顾问人选，俟决定续派。(3)昨奉有电所提增订炮兵所需各兵器，米部长允予照办，分批运送。(4)敬之兄艳电悉，第一批货系苏军部审查我方计划后提经政府决定者，与我所求略有出入，因苏方供给武器，均视其国防需要而后定，须于彼国防实力无损始割让，以济我急，故向苏订货，不能视与商人订货比，我所需步、机枪除一批已订者外，故差尚巨，仍候苏方续为决定。孙科。东。印。

(《战时外交》(二)^①，第423—424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中国战局述评

(1939年7月12日)

H. 利亚霍夫

最近一个月华北和华南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军事行动。日本人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的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有效反击。

华北 为了强渡黄河,日本人在山西西部和西南部组织了几次战役。7月初,日本司令部在山西西部集中两万军队并从离石地区向西北和西部地区发动进攻。在日本强大进攻的压力下,中国军队最初几天丢掉了几个居民点,随后进行了反击,赶走了日本人。日本军队已被迫退到黄河边。

在山西西南部,日军向平陆—茅津渡方向发起进攻。最初大约有一万日军参战,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新到的补充部队。日本空军也参加了这次进攻并施放毒气。日军损失二千多人后才把中国军队赶出平陆。但仅隔四天,中国人就发动反攻收复了平陆。日本人丢下大批尸体和军需品狼狈撤退。仅仅几天的战斗日本就损失了大约一千人左右。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共缴获大炮四门和大量的步枪、机枪。

不久,日本人又以两个大型纵队的兵力再次向茅津渡方向发动进攻,企图包围中国军队阵地的侧翼。但是,已经转入防御的中国军队勇敢地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尽管日军的进攻来势凶猛,但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为了摧毁中国军队在中条山的坚固阵地,六月底,几支新的日本部队被调到山西南部。几支日军(每支约三——五千人)从四面

八方同时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一支人数为一万人的日本纵队也从东部向垣曲——皋落镇方向发起进攻。6月22日撤离垣曲的中国军队后来又转入反攻并抵达城郊。日本人在争夺垣曲的战斗中共损失两千多人。中国军队随后又肃清了皋落镇的日军。日本军队撤退时放火烧毁了这座县城。目前这一地区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华南 6月18日中国军队开始向广州地区发起进攻。中国空军部队参加了这次战斗，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机场。6月底，在粤汉铁路沿线开始进攻的中国军队先遣队抵达离广州十八公里的地方。在广州西部地区，中国军队赶走一些据点的日军，并抵达距广州三十公里处。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广州东部地区还包围了驻增城日军，并在增城展开了激烈战斗。

由于广州地区战斗的发展，日本当局不得不宣布广州戒严。中国正规部队在游击队配合下正从四面八方广州逼近。

日本人把一些后备部队调到广州地区。

6月21日，日军陆战队在华南港口汕头登陆。这次登陆是在日本军舰和飞机的支持下进行的。日本飞机对汕头进行狂轰滥炸，力图摧毁中国驻军的抵抗。最近，一支日本陆战队又在汕头登陆并进攻潮州。但因中国增援部队抵达潮州并给予来犯的日军以有力打击，因此日军的进攻未能得逞。后来日军在空军的掩护下再次进犯潮州，七月初日军占领潮州。潮州之战，日军损失了一千人左右。

7月5日中国军队冲进潮州同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7月7日中国军队再次袭击潮州。他们切断了汕头至潮州间日本人的交通线。

日军进攻汕头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沿海一带进行经济封锁和封闭沿海地区的外国工商业。

毫无疑问，日本人对汕头的进攻，同他们为了最终取消外国人

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而采取的其它措施是协调一致的。这些措施还包括对天津英租界和对温州与福州的封锁。日本海军和陆军对中国港口的封锁,就是要禁止外国轮船进入这些港口,并且采取措施把外国侨民排挤出港口区。

日本人最近发动的战役并没有给前线的形势带来任何新的变化,也未改善日军的处境。这几天中国广大群众为抗战两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标志着巨大的民族感情的高涨,这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保证。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粉碎了一小撮投降派即日本侵略者走狗所造成的阻力,他们坚定不移地要把抗战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蒋介石致苏联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电 (杨杰转)

(1939年7月30日)

[杨大使]转伏元帅：近日国际形势日急，敝国应用武器急待补充，前允接济之武器，闻至今尚未起运，如此项武器不能如期到达，则欧战起后，运输更难，而敝军补充与反攻计划皆受极大之影响，何日起运，务请详复为盼。中正。机。印。手启。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4页)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

(1939年8月9日)

委员长蒋:JOHHY 密钩座致史、休二公函,本日面呈,据伏帅称,当体谅钧旨,向史公商定于最短期内答复,对于购货运苏抵偿丙账似已同意,并决定先运轰炸、驱逐、摩托各六十具来华。职杨杰叩。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4页)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

(1939年8月9日)

重庆。委员长蒋：宥、卅两电奉悉。○密。(甲)惟致伏帅卅电及史、伏两公江电四日始奉到，除与伏帅定期面转外，昨贸易部长米科扬约商，据告运械迟滞原因：一、前拟雇熟悉商轮以便保持机密，嗣因吨量过小不敷装载，现改雇英船，本月廿日右抵阿德萨埠，已准备密商运输方法。二、运华货品向由阁下与国防部会办，故顺利迅速，此次因孙科博士坚请代办，不便拒绝，但本人系生手，诸加审慎，故迟延至今，嗣后请照旧案办理为宜。三、雇船虽为本人代办，但雇主究系中国，所有运费、奖金之规定、支付，应如何办理？四、装载以及途次各种技术事项，应与阁下商定。(乙)职比答称：此批武器，伏帅两日前即已拨定，迭奉蒋委座催询，万难再延，总以愈快起运为要。至运费及奖金，据孙科院长回告，已请贵部代垫，如须更改，反又迟滞，仍请照办。俟起运后，垫付若干，即当负责依据电请政府拨还。又：装载暨运输途中技术各项事务，请随时约商。(丙)米部长随答称：甚善。如无孙博士之新请求，一切由阁下经办，想早已将起运手续办竣矣。兹请求三点：一、代垫各费，须由阁下负责在最短期限内由中国政府汇还。二、装载、运输等项，明日即开始会商。三、雇船契约，请阁下或派代表签字。(丁)职为迅速起运计，自不便稍涉诿卸，除已完全接受外，谨将商洽经过情形详陈，伏乞准予照办，并候示遵。职杨○叩。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录自《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4—55页)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39年8月20日)

重庆。委员长蒋：寒、铣两电奉悉。密。一、与苏国防、贸易两部办妥之点谨呈于次：(甲)借款动用起息之契约，于本日签订完竣。(乙)俄货运船租金计一九二五镑，本日由苏贸易部垫出交职，当即电汇伦敦，直接交该公司，惟租船签约，苏方仍坚持用中国之贸易公司名义签字，方能保密，职已去电与郭秉文，请其在伦敦与船公司签订，恳即电飭郭遵办，以利事机。(丙)英、法、苏谈判内容，伏帅已告知一部，坚约不用文电，由职返国面阵，余再约期面告。又称苏运华之飞机计E+五 三十架、E+六 三十架、SB三 十六架、远航重轰炸机十二架，余亦陆续起飞机等语。二、阿氏提供各货，刻积极打包，并租定五千吨之商轮(Boug aroni)装载，但要求职赴波兰签一信约。查阿氏提供之货，约值百六十万镑左右，包运等费皆系一人垫出，我即无官厅担保，自应前往签字，以重信义，期在必行，已电复廿四日前往面签外，恳祈准予照办。三、职原呈明廿一日由莫起程，现因上述两项要务赶办未完，且均非他人所能代办，势不能不稍延数日，并乞俯鉴愚诚，一并核准，不胜感祷。四、苏外交部本午正式向职提出巴牛士津为驻华大使，嘱转请我政府予以同意，并称巴牛士津系骑兵学校及陆军大学校出身，有师长衔，在中国抗战期间，该员必能以其军人本色，忠实诚密，贡献于中苏两国，该员现已到渝，即苏国务院派赴中国之实行中苏商约问题临时代表等语。职杨杰叩。号。

《战时外交》(二)^①，第519—520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感谢苏联援助致斯大林的信

(1939年8月26日)

斯大林先生：

您6月19日的亲笔来信^①收到了。为崇高的友谊向您表达无限的谢意。

对于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保卫战争的、处于孤立状态的军队来说，苏联是惟一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斗争的国家，自始至终被寄予真诚而热切的期望的国家，而且是您亲自领导着全世界保卫和平事业的斗争。

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将要取得的胜利中，全中国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贵国的真诚援助和在为伸张正义的斗争中您的卓越领导。

苏中两国的伟大人民对于维护全面和平和正义负有同样责任。

我深信两国之间的合作将日益加强，侵略者最后失败的日子定会到来。

我惟一的愿望就是：与您一道，通力合作，尽快促其实现。

谨以此信作复，并祝健康！

蒋中正亲笔

8月26日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①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信。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苏联外交人民 委员莫洛托夫谈话记录

(1939年9月10日下午3时于克里姆林宫)

.....

使座：兹奉到蒋委员长密令有数问题嘱向史先生及先生请教，因深知史先生政务繁忙，未便请谒，特来与先生面洽，并请转达史太林先生。

莫长：即请贵大使告知，不必客气。

使座：基于中苏特别友好关系，蒋委员长嘱向史先生及先生请教者有二点：(一)英法因波兰事件与德国业已开战，关系世界大局极为重大，苏联对此英法波德之战事态度与方针如何。(二)近来盛传英日将妥协，倘此种谣传果然实现，与我国抗战极为不利，吾国自应讲求紧防其孚协之方法以打破之，但使英法美等国不援助日本，是中苏共同之政策，未悉采用何种方法为良？

请告知者：(一)传闻日方有向苏联提议订立不侵犯条约之事，未知真相如何。(二)中国自抗战以来，苏联帮助我国者甚大，人力、物力，大平均赖贵国，仅百分之二十则所给英美等国。现欧战争开始，英法自给尤不暇，更无余力以接济中国。在产业落后之中国，目前仅于步枪子弹自力制造，但重兵器则非在抗战期中所能办到，故以后关于武器方面，尤以重炮坦克车、飞机等为最，尚望贵国予以更大之帮助，庶我抗战始有办法。(三)欧战恐非短期间所可结束，英法封锁海岸，德国长期作战，在物力方面必不能支持，必向贵国求助，贵国想已计及，未悉能否予以

援助。

莫长：(一)我国此次对英法波德之战争不愿助德以反英法波，亦不愿助英法波以反德，此种政策，前在第四届最高院非常大会上业已声明，直至今日，亦未变更。(二)英日间之关系极为复杂，恐不易接近。中国抗日战争愈顺利，则英国在远东之利愈有保障，可以说英日愈不易接近。总之国际关系最为变化难测，在中国抗战顺利形势之下，似英日接近不易成功。(三)关于日苏不侵犯条约一节，日本迄今并未向苏联提议，所传种种完全不切事实，苟有此种种酝酿，必请贵大使转报蒋元帅。(四)苏联助华为已定政策，在可能范围内必竭力协助中国，已往如此，将来亦必如此，至加大协助一节，应视本国处境为如何而定。现德波战争已渐至吾国边境，故吾国政府亦有相当充实边防的计划，将来进展如何，当不得知。至重兵器之补充，中国对于运输一节如何，似颇感困难。(五)苏德间现有两约，此为贵大使之所知，一为不侵犯条约，一为商约，凡商约之所规定者，苏联必将履行。

使座：将先生所告知者及指教者，详转蒋委员长。

莫：中国近来抗战情形可否简单告知。

使座：中国抗战两年颇有进步，目前虽未大举反攻，但在各战争区不断的占在主动姿势，常予敌以小规模之打击，一般士气亟旺，有必胜之信念，人民深知最后之胜利在我，故颇团结在政府指导之下，工作甚为努力。此外尚有两点附告：

(一)中国争取最后胜利之准备，是在强大部队之编练，故新兵之训练亟为重要，以四川一省论，已完成三百万之兵士，其他有完成数十万者，有百余万者，故战斗员之补充，完全不成问题，所苦者仍为武器不足耳。

(二)目前中国抗战之阵容本不坚强，但在此统一基础巩固之时，若彻底的改革整理，诚恐偶相十足之摇动分子走入反革命之途，为日利用，反于抗战不利。

予现奉到蒋委员长训令,不必还国述职。

.....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939 年中日战争述评

(1939 年 12 月 29 日)

M. 马利亚尔

中日战争仍旧激烈地、顽强地在继续进行着。这场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是指在消耗敌人的持久战。

辽阔的战场和战场上几百万坚决反对日本人的中国居民，迫使日本司令部使用相当大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后方。日军后方不仅常常受到游击队的袭击，而且还受到中国正规部队的袭击。

中国军队逐步从组织上得到加强和完善，并在战斗中受到锻炼，其战斗力已提高到由防御转入进攻的阶段。中国军队给予敌人的打击迫使日军不止一次地中断了自己发动的战役，甚至陷于停顿，转入防守。

看来侵华日军司令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因此他们不可能对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日军司令部 1939 年发动的几次战役，其主要目的是巩固日军占领区，此外，还要占领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以此为基地，日军就可以沿着中国军队的交通线行动，并迫使中国军队成批地投降。日军司令部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切断中国的海路，这是中国与外界保持联系并通过它来获得武器和装备的通道。

1939 年日本人发动的主要战役有南昌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华北战役和对长沙的进攻。

南昌战役 1938 年底，日本人经过五个月的激战后占领了

汉口。

无论是对汉口的日本驻军,还是对从北面、西面和南面掩护汉口的日本军队来说,长江都是唯一的交通线。日本人当时就是沿长江向汉口进攻的,并通过长江把军需品运给部队。

长江这条交通线常常受到长江南岸中国军队和中国空军的袭击,这些飞机来自中国南昌的空军基地。中国飞机炸毁了很多在长江上航行的日本轮船。这种形势和当时长江以南的战争迫使日本人发动了所谓的南昌战役。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占领南昌——岳州——长沙地区。只要占领了上述地区日本人就可以保证它在长江上的正常航运,以便向汉口驻军和汉口的掩护部队提供军需品;还可以为日本人准备好将来沿粤汉线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基地,进而同广州驻军连接起来。

3月20日,战役(日本人1939年的第一个战役)开始后,日本人首先进攻南昌,3月29日日军占领了南昌。随后,日军从南昌向西进攻长沙,看来,岳州方面也同时出动策应。当日军抵达上富(南昌西北部一百公里处)时,遭到了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后来中国人转入坚决的反攻,并把损失惨重的日军赶回南昌。日军从岳州进攻南昌的企图也未得逞,他们的进攻从一开始就受到挫折。日军在遭到惨重损失后便在该地区转入防御。

襄阳——南阳战役 日本人在长江以南扩大战略基地的尝试(南昌战役)失败后,事隔几月又在汉口西北方向发动新的襄阳——南阳战役。正如事件的进程和日军打击的方向所表明,日本司令部是企图包围和消灭在昌周、南阳、襄阳和涧岭地区作战的一个中国兵团。

4月29日,日本机动部队(骑兵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在襄阳方向发起进攻,揭开了襄阳——南阳战役的序幕。这次进攻的目的是切断中国军队经汉水向西的退路,把中国军队包围在襄南地区。

日军左翼部队顺利地向前推进,占领了新野,并开始向襄阳和

南阳推进，其交通线延长到二百公里。

日军开封兵团和从信阳进攻南阳的日本军队由于地形不利进攻速度缓慢，因而未能保证按时完成对南阳中国军队的包围。中国军队司令部乘机在襄阳——南阳地区转入反攻。与此同时，游击队也不断袭击日军延长了的交通线，配合中国军队在前线的进攻。

中国军队坚决把转入反攻和游击队切断日军交通线，破坏了日军正常的军火和食品供应，使日本人处于受包围的境地。日军在激战中力图摆脱困境。他们在包围中拼命挣扎，企图守住靠近增援部队的阵地，但是后来在中国军队和游击队的夹击下他们开始仓皇撤退。

遭到中国军队几面追击的日军在受到惨重损失后终于逃出重围。他们于5月26日撤退到襄南战役开始前的原防地。

这样，持续一个多月的襄阳——南阳战役对日本人来说，除了付出伤亡几万人的代价之外，其它什么事也没有办成。

华北战役 1939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华北特别是在山西，日军和中国游击队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日军向游击队发动了八次进攻，但收效甚微。

华北游击队的斗争具有特殊的意义，主要原因是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华北游击队使该地区的日本正规军始终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尽管日军是以最新式的武器装备起来的。

实际上，日本人在华北只控制着铁路和公路沿线五十——一百公里范围的地区。

日本人于11月14日开始进攻长沙。这次战役的发展过程表明，日本人的意图和南昌战役相似。两次战役的区别仅在于，南昌战役中日本人以南昌方面的进攻为主，岳州方面的进攻为辅，而长沙战役中日军的行动则恰好相反。

战役初期，日军从岳州方面对长沙的进攻是顺利的，但是从南

昌方面对长沙的进攻却没有得到预期的进展。日军在此遇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但日本人不顾一切地加强从岳州方面的进攻,其先头部队距长沙城只有三十公里。

看来长沙很快就要失陷,日军的进攻已经难以抵挡。但是在这里也像襄阳——南阳战役一样,中国司令部在最危急的关头从正面和两翼向日军出击,转入反攻。从岳州出发沿粤汉线进攻的日军实际上已经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他们不得不失围而出,退回岳州原来的阵地。此次战役日军大约损失三万人。

在1939年底,日本司令部只有一个战役暂时取得成功,那就是日本陆战队在北海地区的钦州附近登陆,然后对广西发动进攻并占领南宁。

因此,在总结1939年的战局时可以看出,如果把上述战役除开,日军发动的其它战役并没有给中日战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现将中日战争各个战场总的作战形势介绍如下:

华南(a)北海——南宁地区 日军在北海地区的钦州登陆后,顺利地开始向北进攻。但是当日军抵达南宁并占领南宁后,因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它未能继续向前推进。南宁的战斗仍在进行。北海——南宁地区的日军实际上已处于中国军队的半圆形包围之中。

(b)广州地区 日本人1938年底占领广州后,在整个1939一年中,他们只是在广州和直接通往广州的重要据点上设防固守。日军曾多次企图把防区扩大到广州以北和以西地区,但都未能如愿以偿。在广州附近的重要据点,经常都有局部战斗发生。实际上日本人在广州地区已处于半包围中。他们仅仅控制着一条西江作为广州唯一的出口,同时又是把广州同南中国海连接起来的一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由一支日本舰队保卫着,中国人对它无可奈何。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广州地区对日军的全面包围尚未

实现。

(c) 汕头地区 日本人仅仅控制着汕头市。他们企图把占领区扩大到汕头北部和西部地区,但日军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军队现已从日军手中夺回潮州。

华中 日本人 1939 年发动的一系列战役惨遭失败后,在华中前线作战的日军纷纷转入防御,到 12 月中旬,这里只发生过一些小规模战斗。

最近一段时间华中的战斗又开始活跃起来。关于这次战役,正如报纸所报导,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他们在前线各处发动的进攻看来是很顺利的。

华北 华北战局仍旧没有任何特殊变化,斗争仍然带有纯粹的游击性质。中国游击队牢牢地守卫着自己的根据地,他们经常在日军的交通线上卓有成效地袭击日军。

(刘积离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军队在广东的巨大胜利

(1940年1月6日)

[塔斯社伦敦1月5日电]据路透社重庆来电称,重庆方面已得到中国军队在广东北部地区取得胜利的消息:1月1日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反攻。这次反攻使日军损失一万多人。

中国司令部发言人就这次反攻发表声明说,日军试图以三个纵队的兵力向广州北部推进,但中国军队的反击迫使日军退回原阵地。

[塔斯社上海1月5日电]据中国方面报道,日本人在广东省发动的新年攻势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众所周知,日军新年攻势的基本任务是占领翁源(中国军队在广东北部的一个基地),然后直逼韶关(翁源北部),其目的是从侧翼打击中国军队的主力。

1月1日至2日,在英德、翁源、岐岭的三角形地带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的结果是日本近卫师团一个旅团被全部歼灭。日军在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后狼狈撤退。中国军队占领了良口等几个据点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1月2日,在北江地区(在粤汉线上,广州与英德之间)中日双方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共打死日军八百人。此后,日军开始全线撤退。

[塔斯社重庆1月5日电]来自华南前线的中央社记者证实,中国军队已全歼日近卫师团的一个旅团。该旅团是刚从日本调到华南前线的。

[塔斯社1月5日电]据最新消息报道,广东北部地区的中国

军队继续向日军阵地发动进攻。在追击敌人时，中国主力部队沿粤汉线向前推进三十公里，现已到达英德南部地区。在翁源南部地区，中国小部队正在空军的帮助下清除该地区的日军。

最近，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前线攻克几个重要据点，其中包括蒲庙（南宁东部二十五公里处）和吴圩（南宁南部二十七公里处）。

中国军队的反攻

[塔斯社重庆 1 月 5 日电]12 月中旬，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攻。华中、华北前线的反攻已见成效，收复一系列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分散在湖北、湖南、江西一些城市的日本驻军遭到惨重损失。日军对中条山游击区（江西省南部）的进攻已被击退。中国军队在绥远省也取得显著的成绩。

中国国民革命军于 12 月开始的反攻，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日军已经准备就绪的对华中地区的新的规模进攻。

日军对广东省北部地区的进攻是近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国司令部认为，日军的这次进攻，其目的是为了支援已陷入绝境的广西日军的进攻。早在 12 月 17 日，日本人就宣布封锁珠江，并开始在华南集结兵力，同时削减了驻广州、三水（广州西部）、佛山（广州西南部）、深圳（与英国的香港交界^①）及其它据点的日军。日本司令部以三个日本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在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于 12 月 23 日开始向广州北部发动进攻，其最终目的是占领现由广东政府管辖的韶关。

尽管中国军队因开辟北海——南宁地区的新战场而未能完成在华南的重新部署，但中国军队仍对日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把日军放进广东北部山区，使日军遭到惨重损失。

① 原文如此。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编译者注

日军从三个方向进攻韶关。右翼：日本人撤走深圳部分驻军，从北面的增城出发北上。12月23日，日军占领龙门，12月26日占领梅坑，12月30日占领官渡，12月31日占领三华。左翼：日军沿粤汉铁路和北江向北进攻。为了配合这次进攻，日本人从佛山、三水调来部分驻军。日军中路部队从从化(广州东北部)出发向北推进。刚从日本调来的近卫师团的一个旅团立即拨给了这支部队。12月30日，左翼日军抵达英德。

新年前夕中国军队转入了全线反攻。1月1日三华日军被肃清后，向翁源靠近的日军也被击溃。1月2日梅坑的日军被肃清。靠近流溪何山区的日本近卫师团的一个旅团也被击溃。据初步报道，这两支日军的伤亡达一万人。日军在右翼的进攻也同样被粉碎，损失惨重。日军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进攻业已停止，粤汉铁路沿线的日军已退到英德以南二十公里处。

从缴获的日本文件获悉，日军曾打算以五个师团的兵力用两个月时间进攻韶关。中国军队经过九天卓有成效的反攻彻底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如果没有大量新的增援部队，日军要想在广东北部地区继续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

在北海—南宁地区，日军第二十八师团还控制着防城和钦州。从钦州至南宁的公路已被中国人切断多处。在损失惨重和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一支四百人的日军在空军的掩护下已开抵南宁，支援困守该地的第五师团。

南宁—宾阳公路上靠近山区通道昆仑关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这个通道在两周时间里曾三度易手。日军第二十一团、四十七团在这里惨败，实际上他们已完全丧失战斗力。四十四名日本军官被打死，其中包括日军第二十一团团团长三木。中国军队在这里的伤亡也很大。

据观察上述通道的中央社记者报道，中国军队在战斗中缴获日军机枪一百三十九挺，山炮八门，还有无线电台、拖拉机和汽车

等等。在六天的战斗中,日军共损失一万人。目前南宁地区的日军已转入防御。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与苏联国防人民 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晤谈记录

(1940年1月8日下午2时)

使座：予奉蒋元帅训令回国一行。余在此工作两年有余，承元帅厚爱眷顾，诸事协助，公务方面无不得到圆满的结果，私人生活有如在家一般的舒适，兹将离莫特来致谢，并有请教之处，尚乞指示为幸。

伏帅：请说。

使：予回国后，蒋委员长询及苏联今后帮助中国情形如何，应如何禀陈。

伏：本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甚为同情，极力帮助，此种政策并无变更。不过近数月来，国际情势已大转变，苏联处境较昔困难，且已应付战事，此层对于中国之帮助不无影响，但苏联必尽其力之所能及，仍一贯的援助。阁下返国述职，人民委员会莫委员长必要晤谈关于苏联今后如何帮助中国之处，彼得详告。

使：蒋元帅派贺耀组将军来此，带蒋委员长函件与阁下，已由外交部那次长转呈，并代恳约定时间会晤，想已鉴及。

伏：不日即可定期会见。

使：予离莫后，与贵元帅接洽事件，统由贺将军办理。贺将军为蒋元帅的重要干部，与予同学、同事，故知之亟深，彼对于中苏合作颇有信念，且为诚实、精密，特为介绍，尚恳贵元帅以协助本人者协助贺将军。

伏：贵元帅[按：杨杰不是元帅，似为尊称]为人诚实，负责，为

苏联真正朋友，与中苏结合及巩固中苏之友谊有莫大的贡献，本人极为钦佩，现已为极相熟极相得之朋友，办事极为方便，深不愿贵元帅去而不返，未知阁下何日可返莫京。

使：予为军人，在疆上杀敌为本人素志，但个人无自由选择工作之理，一切行动均听命于政府，来否不能预定。

伏：个人间之感情固然重要，但中苏间之事务乃国家最重大之政策，贺将军来，本人亦极愿帮助，请放心。依此看来阁下回莫之希望甚少，深为怅惘。在疆上杀敌的工作可让他们青年军人去干，你我向所办之工作非老诚深算公忠体国者不能办的，贡献于抗战的方法甚多，阁下在此间所办之工作，增加抗战的力量，致敌死命之效果，胜过在疆上杀敌不啻倍蓰，而且甚望阁下早日返莫。……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

(1940年1月9日)

重庆。桂林。委员长蒋：华密。本午苏外部拉次长约谈：(一)去夏孙博士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之迪化飞机厂，苏联应中国之希望，下令与主管，并限于六个月完成，预期每年可出驱逐机三百架，将来亦可加造轰炸机。(二)此厂所订中苏组织混合公司经管，资本各半，现苏政府已暂定出资二千五百万卢布，刻在迪积极筹备，望中国方面加紧进行等语。详情容面陈外，谨陈。职杨杰叩。佳。机渝转灰已。印。

《《战时外交》(二)^①，第520—521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蒋介石电

(1940年1月20日)

重庆。委员长蒋：密。本督日午后二时见伏帅，代谢后，向彼申请接济，此项申请书根本解决，前文约分：(甲)谢其过去之帮助。(乙)报告战况要点，在我军已得到摧灭敌军之自信力。(丙)请求继续接济要点在：1. 今年必须摧灭颓势之敌人；2. 苏联工业伟大；3. 中国工业破坏，原料缺乏，不得已而请求。最后谓苏联之援助，引起华人之感激，蒋委员长认此为中苏合作之英明，抗战完成必能结果云云，附呈请求文书四类。伏帅答：(甲)中国如此感谢苏联，我觉荣幸，但恐估价太高，然苏联上下，无不望中国胜利，亦确信能胜利。(乙)苏联人民极同情中国，也愿发展帮助，但苏联、芬兰纠纷，不得谓无影响，且汝之请求，系政府事，我无法解决。(丙)汝已见莫洛托夫，此事仍须找伊解决。(丁)军事上人的、物的接济均由政府解决，我可提出报告，如会议核定，我即遵办，请汝报告蒋委员长。(戊)感谢蒋委员对我之称赞，并祝中国胜利云云。至此，职称当更谒莫洛托夫，解释误会。伏帅故惊云，有何误会？职谓系国联事。伏帅谓此乃代表之事，当非中政府意。职遂述前呈要领，只及前三项时，伏帅插言云，中苏等于同盟，而代表只虑封锁海口而不站在苏方，乃非友谊的表示(此语莫洛托夫亦说及)，且代表惧英日联合之辩白，皆无根据。随又云此系政治，非吾辈所能问，也许此事甚小云云。职请指定人员接洽，伏帅答以前提未解决前，由彼自行接洽，比收受所交请求书，承认先交审查，职乃辞出。如上各节，是职前呈五项要

领,亦非能满苏联之意,究何所欲,无从揣度,祈交参与各位加以研究,指示机宜为祷。贺耀组叩。哥亥。

(《战时外交》(二)^①,第 367—368 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主任贺耀组电

(1940年1月31日)

莫斯科。贺主任：戌电悉。望兄注意此次赴莫之主要任务为：一、面送中函交史先生，密商中苏二国外交一致之方针，如能面洽，乃可谈及二国以及政治、经济问题及聘请顾问等事，如不能见面，则此等事以外交整个前提既难解决，则其他政经无由商洽，更不必与其外交人员商讨，系兄非政府所派之普通外交官，而为中之私人代表也，此点兄更须注意。二、请兄将我国最近需要接济之武器单纸带交伏帅面商解决，以济急需。即兄此去是继续交涉合同内苏方应交拨我武器之手续，而能有此新要求与新交涉也。此时飞机需要更急，中正托总顾问电伏帅转催，如其有诚意，当不难办到，否则我方强求亦无益。故兄不必躁急，以后凡政治、外交与经济关系，如能见史先生则可面洽一切，否则不必多商，盖普通外交非兄分内之事，并将此意属淮南托潘大使转达其外部矣。中正。世。

(《战时外交》(二)^①，第521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轰炸南宁、汉口、运城、岳阳等地之敌的“战斗要报”

(1940年1月—5月)

一月份我方空军轰炸成果报告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4	志愿队	南宁	敌机场	投弹命中炸毁敌机四架	C. B.	4	爆破弹	2400公斤	第二路司令部战斗要报	
7	志愿队	南宁	敌阵地	轰炸成绩良好。曾目睹南宁火焰冲天	C. B.	5	爆破弹	2000公斤	第二路司令部战斗要报	
7	第六大队 第十九队	南宁	敌阵地	同上	C. B.	4	同上	1600公斤	同上	
8	南愿队	南宁	市	投弹于南宁市区北部	C. B.	6	同上	3600公斤	同上	内有三机因时间延误未将弹投落原弹带回
10	志愿队	南宁	敌机场	炸毁敌机三架	C. B.	6	同上	同上	参谋总长室元月十六日函。据白主任真电报	
附记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军委会为苏联总顾问福尔根 报告第三战区作战不力饬检讨纠正代电

(1940年2月22日)

上饶顾长官：极密。据总顾问福尔根一月二十六日报告最近中国军队作战结果一份，内容关于第三战区冬季攻势作战情形，颇为详尽。对于我军缺点，阐述亦甚中肯，亟应虚心深切猛省，认作善意批评，引为借鉴。合行随电抄发原件，仰即切加检讨纠正，力图改进为要。中(正)。冯令一元琦。(渝)。附抄原件一份(缺)。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的军事行动

(1940年3月1日)

[塔斯社2月29日电]华南 广西南部南宁以北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日军在重炮和飞机的掩护下,于2月25日再次向双桥地区(在南宁至滨阳的公路上)中国阵地进犯。整个战斗延续了二十四小时,并多次进行了白刃战,最后日军退回原阵地。中国军队将利用有利地形进行反攻。

在广州东部地区,中国游击队于2月23日袭击了长宁,缴获步枪二百多支,俘虏汉奸县长一名。2月24日夜,游击队冲进广州,烧毁了几个日本飞机修理厂。2月27日,游击队潜入新会(广州南部),烧毁日军仓库数座。

汕头(广东省)北部的中国游击队于2月28日攻击澄海。

华中 中国军队于2月22日冲进信阳(河南南部)。在经过一整夜的持续战斗之后,中国军队随即撤离该城。目前战斗在信阳城郊进行。日军在这一地区已遭到重大损失。

安徽南部地区的中国炮兵于2月24日炮击长江上的四艘日本汽艇。另一天,中国人又在湖口(江西省)附近击沉日军巨轮一艘,打死日军二百多人。同一天,中国人在九江附近烧毁日本运输舰一艘。

华北 绥远省西部五原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中国军队于2月26日占领五原南部地区。日军企图把中国军队从该地赶出去,但经过长时间激战后日军被迫后撤。

河北南部地区的中国游击队在居民的帮助下破坏了一些公

路,切断日军的交通线。为了不让日本人利用城墙来巩固其占领的城市,农民们毁坏城墙。所以津(天津)浦(浦口)铁路和京(北平)汉(汉口)铁路之间地区有十三座城市的城墙和一些防御工事被破坏。河北省一些县所有成年男子(十六岁以上)都组织起来参加了自卫队。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战局述评

(1940年3月16日)

[塔斯社重庆3月15日电]最近华南战线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日本人主要是在进行防御战。中国军队的反攻打破了日军的换防计划。日本人已被迫推迟遣送一批部队进行休整,这些部队因参加今年年初的一些战役早已疲惫不堪。

例如,日本人已把一个原在江西作战现应休整的日本师团调往潮州—汕头地区(广东省)。该师团目前的任务是,支援在澄海(汕头东北部)地区作战的傀儡政府军队和保护潮州—庵埠—揭阳(汕头西北部)的交通线。日本司令部把该师团部分军队投入了战斗。但中国军队阻止了日军向汕头北部地区推进。当日军从澄海出发向西推进时,中国军队便从后面进攻日军,并于3月9日占领澄海。其余日军向南撤退。因此,日军在这一地区未能完成预订计划,反而失去澄海。

日本人在广州地区大约有三个师团兵力,但这里同样未发生大规模战斗。

广西南部地区和南宁地区的战况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只有一些零星战斗。南宁至钦州的日军交通线已被中国游击队切断。

在华中战线,中国人已赶走梅林(江西省奉新东南部)和大城(南昌至高安之间)的日军。湖南北部湘江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这一地区的交通线由于遭到中国军队的破坏,使日军的供给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随州—钟祥地区(湖北省)曾发生过一次战斗。战斗的主动权

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从3月4日到3月8日,中国军队在该地区打死打伤日军约一千人。目前日军正从两个方向向钟祥和随州撤退。中国军队已控制随州至钟祥的公路。日军在该地区共有七个师团,其中只有三个师团的编制是完整的。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拥有雄厚的兵力,它能够战胜随时都处于紧张状态的日军,使其不敢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在河南南部地区,双方曾在信阳地区进行过一次小型战斗。

在华北地区,中国军队不断袭击山西东南部的日本驻军。驻长治—潞城—壶关三角形地带的—个日本师团已转入防御。

在绥远西部地区,中国军队破坏了五原至包头的日本交通线,正集中兵力进攻五原地区的日本驻军。华北战线总的形势是:日军是靠换防御部队来增加它的人数。但是,中国军队经常性的攻击使日本人无法把自己已疲惫不堪的部队调往后方,也无法进行任何新的军事行动。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苏联顾问阔扎柯夫关于改革 三战区炮兵指挥部组织及炮兵的报告

(1940年3月26日)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致军政部代电 4月

重庆军政部部长何钧鉴：据炮兵顾问阔扎柯夫报告，略称：窃拟将本战区炮兵指挥部组织，及炮兵应改革诸点，牖陈鉴核等情。除将三五两项备留参考外，谨抄同原报告，并检原俄文稿底，随电呈请鉴核。饶。顾祝同。冬辰坤。附原报告一份，及俄文底稿一份。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炮兵顾问阔扎柯夫的报告(译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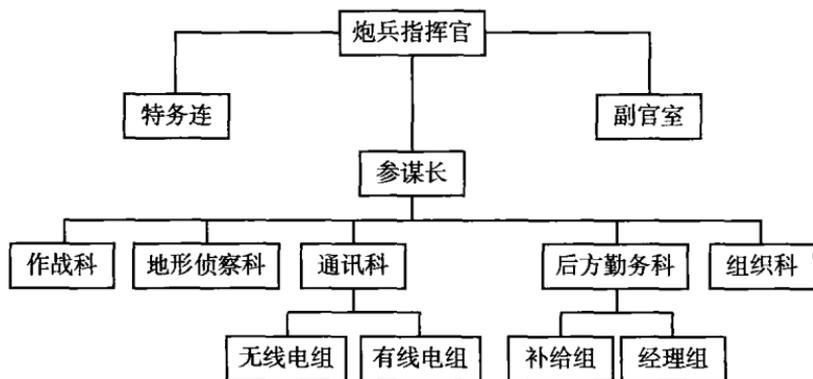
(1940年3月26日)

报告于长官顾问室

窃拟将本战区炮兵指挥部组织,及炮兵应改革诸点,报请鉴核:

查中国炮兵素质性能之进步,及其战斗力之逐渐增强,在青阳之役,已充分表现矣。为使更行提高炮兵之战斗力,及增大炮兵指挥部之机动力,指挥部应按下列所示,重新加强改组之:

1. 炮兵指挥部组织表



2. 为便利作有系统之检查,及指导战区各炮兵之战斗力,炮兵指挥部须加添下列交通工具:

甲、小汽车一、机动脚踏车一、一吨半至三吨载重汽车五、马一〇匹至一五匹。

3. 为使作战指挥统一及便利,给予炮兵部队之战斗准备(教育),将第三战区内所有之各炮兵,如要塞炮、高射炮、小口径炮、迫击炮(各师所属者)及其他各炮队,完全由炮兵指挥部统一指挥,而使其战斗素质增高。

4. 各步兵部队应增添之炮兵:

甲、师属:一个炮兵营,内计两个迫击炮连八一——八二米厘及一个战车防御连三七米厘。

乙、团属:二个连(1)迫击炮连四七——八一米厘或八二米厘四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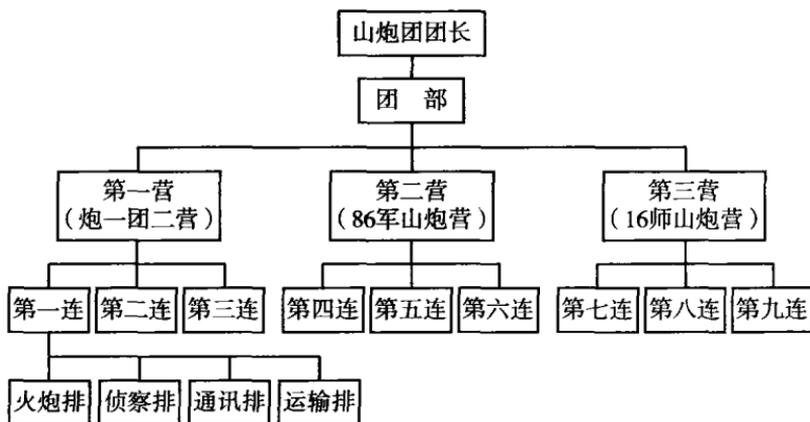
(2)战车防御炮连二〇、三七或四五米厘四门。

丙、于每步兵师设一师炮兵指挥官专司指挥师属团属之炮兵部队。

5. 将部队中之山炮,完全集中,而改编一山炮团,由战区直辖之。

(如现有之炮一团二营,八六军山炮营及一六师山炮营以此改编之。如改编后,则不但指挥统一,训练便利,而每于重要作战方面,可多数集中运用之。)

战区山炮团组织表



附记：一、第二——九连各组织与第一连同。

二、各山炮营均附有营部。

三、火炮排置炮三门。

6. 于战区内成立两炮兵补充团，以训练小口径炮、迫击炮、山炮及火炮构造等之各项炮兵人员，而作战区炮兵补充之用，训练期可酌量利用部队仓库及工厂中之各种火器。

7. 战区炮兵指挥部成立一永久性三月期之炮兵训练班，以造就炮兵下级干部。（每期一百员名）如此试行，则每年战区内可造就四百学识丰富之炮兵干部。

训练班科目预定百分数

1. 战术百分之三十。
2. 炮兵射击原理百分之三十。
3. 兵器百分之二十。
4. 其他百分之二十。

谨呈

司令长官顾

炮兵顾问阔扎柯夫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4月3日)

甲、岳阳方面：

一、本(三)日，八时三十分，空军第八大队大队长徐焕昇，率领副大队长洪养孚，第十中队长梁国璋，副队长李森芹、第十四中队长苏光华、副队长李昌雍，分驾 DB—3 机六架，每机携带 100 公斤炸弹四枚，由太平寺机场起飞，于九时零五分，各机集合完毕，离成都，向东进航。

二、八时五十分，志愿大队长克慈罗夫，率 DB—3 三机九架，由太平寺机场起飞，于九时十五分，集合完毕，离成都，向东航进，其携带炸弹数量如下：

100 公斤	12 颗
70 公斤	15 颗
50 公斤	14 颗
14 公斤	104 颗
8 公斤	44 颗

三、此次任务，以汉口敌飞机场目标。

四、第八大队出发各机，因养气使用不惯，或机械临时发生故障，中途折回四机，计：

苏光华机，到距宜昌 100 公里处，因轰炸员袁恕明忘开轰炸座舱之养气瓶，以致高空飞行时。养气不足，体力不支，乃降低高度折回，于十四时十分，带弹降落太平寺机场。

洪养孚机，到宜昌附近时，高度 5300 公尺，左发动机冒滑油，

油压不良，乃中途折回。

炸弹投落万县东南方斗山后，降落梁山机场检修，旋于十六时五十分回抵太平寺机场降落。

李森芹机，因滑油温度表损坏，飞抵坨江折回。十时三十分，返抵太平寺机场。下降前，炸弹投落新津投弹场。

李昌雍机，爬高困难，冒滑油，滑油压不够，追增长机不上，且因轰炸员晕机，致未收到大队长所发宜昌集合电讯，乃将炸弹投于潜江北即回航。于十六时五十五分，降落太平寺机场。

五、志愿大队 DB—3 机一架，因未赶上编队，中途折回，平安降落太平寺机场。

六、除因机种故障，中途先后折回之五机外，计第八大队二架，志愿大队八架，仍向主目标航进，至宜昌附近，天气恶劣，在七千公尺高度，有积云，乃折向副目标岳阳前进，以天候不佳，穿过积云之后，编队之飞机，遂告散开，计分成两队：一队七架，一队三架。

七、十二时零分，我机到达目标上空，高度 6500 公尺，第一批志愿大队飞机七架，首先投弹，弹落城之北部，及江岸码头。另一批三架于十二时零五分，相继投弹，弹落岳阳城与群山之间爆发。

八、当我机轰炸时，空中并无敌驱逐机，仅有高射炮射击，敌弹爆发，约及我机之高度。

九、十五时二十分，志愿大队飞机全部安返成都。

徐焕昇及梁国璋机，于十五时三十分，及十六时十二分，先后回降太平寺机场。

十、此次轰炸成果，事后据报如下

炸毁敌兵舰一艘，伤亡百余人。

城陵机、岳阳、南津港、甘明寺、观音阁、九花山等处，计敌兵伤亡百余人。

人车站炸毁车厢二。

车门外毙敌五、小队长一、马夫马匹各二。

洞庭路毙敌二十余,毁汽车五。

西门外海军部毙敌二十余。

五里牌毙敌五。

乙、运城方面:

一、本(三)日,九时三十分,我志愿队 C、B、机七架,由温江机场起飞,每机携带炸弹 400 公斤,于十一时十分,降落汉中加油。十二时十五分,复由汉中起飞,经西安向运城进航。

二、十三时四十七分,我机到达目标上空,高度 7000 公尺,向运城敌机场投弹,弹落旧机场之东部,另一部投落城内。

三、我机投弹时,敌高射炮猛烈袭击。我机五架,被敌弹破片击有轻微弹痕。同时,敌驱逐机九架,在同高度,向我追击,但以我机速度较优,敌机无法遍及,故未发生空战。

四、我机任务完成后,经西安、宝鸡,于十五时二十五分,降落天水机场加油。旋于十六时五十五分,由天水起飞。十八时零分,全部安降兰州机场。

五、轰炸成果,事后据报:敌损失奇重,并毁房七八十栋。

附:一、参战人员姓名表

二、我机轰炸岳阳要图(略)

三、我机轰炸运城要图(略)

四、轰炸成果表

四月份我方空军轰炸成果报告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3	第八大队	岳阳	敌司令部及仓库	1. 炸毁敌兵舰一艘，伤亡百余人。 2. 城陵矶；岳阳南津港。日明寺观音阁、九花山等处，敌兵伤亡百余人。 3. 火车站炸毁车厢二。 4. 东门外毙敌五小队队长一、马夫马匹各二。 5. 洞庭路毙敌二十余，毁汽车五。 6. 西门处海军部毙敌二十余。 7. 五里牌毙敌五名。 炸毁房屋七八十栋，敌损失极重。	D. B3	6		2400公斤	严立山 卯寒保之 电王福恒 738盐申 长电	该大队出发各机因养气使用不惯有四机中途折回。该大队有一机因未赶上编队中途折回。
3	志愿队				D. B3	9		4.722公斤		
3	志愿队	运城	敌机场		C. B	7		2.800公斤	程潜 歌午 计实电	
附记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4月12日)

岳阳方面：

一、本(十二)日，七时五十六分，空军第八大队 DB3 机五架，暨志愿大队 DB3 机十架，从太平寺机场起飞，由志愿大队长克慈洛夫总领队，于八时十一分，在空中集合完毕，进入航路，除志愿大队之 88 号机，因发动机发生故障，中途折回，弹投新津靶场，平安降落太平寺机场外，计共出发 DB3 机十四架，其携带炸弹及数量如下：

100 公斤	11 颗
70 公斤	60 颗
50 公斤	2 颗
14 公斤	104 颗
8 公斤	48 颗

二、此次任务：

主目标：汉口敌飞机场。

副目标：岳阳敌司令部，及其附近仓库。

三、我机出发后，据防空司令部情报，敌侦察机二架，在思加一带活跃，乃用无线电指挥我总领队机，令向副目标进航。

四、十一时零五分，我机全部到达岳阳上空，高度 8000 公尺，向岳阳城埠、车站、码头及江中敌舰，投弹轰炸。

五、我机投弹时，敌高射炮猛烈射击，敌弹爆发，距离我机约 100—200 公尺。

六、任务达成后，我机于十一时十分回航，过恩施后，我机高度降低至 3000 公尺，过遂宁则降低在 500 公尺高度飞行。

七、十四时三十八分，我机全部回抵成都，安全降落太平寺机场。

八、此次作战队形，保持整齐，无线电通讯正确，养气使用，亦较良好，惟第八大队，尚有少数人员，于下机后，微感头晕，或系高空尚未习惯之故。

九、本(十二)日，敌方以两机侦察天气，我则全视天气报告而出动，足证敌方不知我天气。

十、此次轰炸成果：

(1)当时据空中侦察所得：

岳阳城西沿江岸停泊之兵舰两艘，似已受伤，车站东西两侧，及轨道中弹甚多，其停留轨道上之客车多节，悉被炸毁。

(2)事后据地面报告：

炸毁敌汽艇二艘，毙伤敌十余。

车站一部，粮秣一车，及其附近仓库，均被炸毁，并伤敌兵三十余名。

塔前炸死敌兵四名，海溪桥炸死敌兵三名。

岳阳城内，敌伤亡八十余名。

附：(一)参战人员姓名表

(二)出发返航及轰炸队形图(略)

四月份我方空军轰炸成果报告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12	第八大队	岳阳	敌司令部附近仓库	1. 岳阳城西沿江岸兵舰两艘受伤 2. 炸毁敌汽艇二艘车站	DB3	5		7240 公斤		
12	志愿队	岳阳	敌司令部附近仓库	一部粮秣一车仓库被炸毁毙敌约一百五十余名	DB3	10		桂林行营电		
附记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空军第三路司令部战斗要报

(1940年4月12日于成都西胜街本部)

一、本(四)月八日十四时四十分 奉主任周电话命令,着飭空军第八大队徐大队长焕昇,即准备于明(九)日,随同志愿队,轰炸汉口敌机场。

二、九、十、十一三日,均以天气不佳,未果。本(十二)日,天气好转,决心实施。主目标:汉口机场,副目标:岳阳敌司令部,及其附近仓库。

三、本(十二)日,预定出发 DB3 机十五架,内第八大队五架,志愿队十架,由志愿队克兹洛夫总领队,起飞后,志愿队 88 号机一架,因发动机发生故障,折回太平寺机场降落,弹投新津靶场。综计出发 DB3 机十四架,其出发人员姓名,及飞机号码,载弹量,如附表一。

四、七时五十六分,第八大队,首先起飞,志愿队继之,至八时十一分,起飞完毕,八十二分,空中集中完了,进入航路,沿途天气及能见度良好,其出发队形,如附图一。

五、十时三十分,我机到达常德,以情况变化,奉令改作副目标,当即以电报令知,乃于十一时零五分,我机在副目标上空,高度八千公尺,连续投弹,弹落岳阳火车站,及江边,并江中敌舰,全数爆发,目睹车站浓烟四起,敌高射炮火射击,甚为猛烈,均爆发于我机附近。其轰炸队形,如附图二。

六、十一时十分,我机开始回航,于十四时二十分,到达太平寺上空,开始降落,至十四三十八分,全部安全降落完毕。其归还队

形,如附图三。

七、此次作战,队形保持齐整,无线电通讯正确,养气使用,亦较良,惟第八大队,尚有少数人员,手下机后,微感头晕,或系尚未习惯之敌。

右报告

部长徐

附呈表图各一份(图略)

空军第三路司令官 田曦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4月27日)

兰州方面

一、日本，十一时二十七分，接甘肃防空司令部电话：敌机一架，经长武、窑店、什字镇、泾川、平凉、隆德、静宁、界石铺、会宁等地，向西飞行，其经过地点及时间，如附图。

二、我于十二时十一分起飞，志愿队 E16 机三架，第三大队 E15 机二架，升空警戒。

三、据领队拉兹别依阔报告：十二时四十分，在兰州机场对面黄河北岸上空，发现该敌机由东北方向飞来，我 E16 机三架，与之遭遇，敌我相距八百米，敌机高度三千八百米，我机高度四千米，我机当向敌射击，敌机即急向北转弯窜去，我 E16 机跟踪追击，有八九分钟，因敌机速度过大，时速约四百至四百一十公里，未能追击。

四、于十三时十二分，又有敌机一架，经陕扶风、宝鸡、草川铺等地，西飞至天水侦察后，折回东窜。

五、我机皆安全降落兰州机场。

附：敌机行动要图（略）

空军战斗要报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

甲 虞乡方面：

一、本（二十八）日，七时二十分，志愿队 SB 机一架，由温江机场起飞，赴汉中侦察天气。

二、九时零四分，志愿大队长乌瓦洛夫，领 SB 机七架，由温江机场起飞。十时四十分，到达南郑，降落加油。由成都出发时，携

带炸弹,共计:

50 公斤炸弹 30 颗,

10 公斤杀伤弹 108 颗。

三、十一时二十分,SB 机八架,由汉中起飞,以 7000 公尺高度,向西安前进,到渭南上空,遇云,乃降低高度,到风陵渡上空时,高度 3500 公尺,旋渐升高至 5000 公尺。

四、十二时五十分,我机到达虞乡上空,高度 2000 公尺,因云,不能由高空至主目标运城,乃投弹于车站及敌仓库,立即起火,成果待查。

五、我机投弹后,于十四时四十五分,降落天水加油。十六时十三分,由天水起飞,十七时十分,安抵兰州。

六、二十九日,SB 机八架,由兰州起飞,于十五时零分,均安降温江机场。

乙 信阳方面:

一、本(二十九)日,八时零分,志愿大队 DB—3 机九架,第八大队 DB—3 机七架,共计 DB—3 机十六架,从太平寺机场起飞,由志愿大队长克兹洛夫领队,以南京为主目标,携带炸弹,其数共计:

70 公斤炸弹 15 颗,

50 公斤炸弹 60 颗,

14 公斤杀伤弹 104 颗,

8 公斤杀伤弹 48 颗。

二、八时十一分,我机起飞,整队完毕,离成都,向东进航,到达信阳后,高度 8200 公尺,东飞约十五分钟,遇云,能见度不良。领队克兹洛夫机之通讯员,两手冻伤,发报困难,乃折回信阳,投弹于车站及铁路线附近,成果待查。

三、十一时四十五分,我机开始回航,经巫山、云阳,于十五时二十八分,志愿大队 DB—3 机九架,及第八大队 DB—3 机四架,均安降太平寺机场。

四、其余未返之 DB3 机三架,计:

苏光华 83 号机,于出发过城口附近时,因油箱漏油,降落梁山机场检修,人机均安。于三十日九时三十分,起飞回成都。

刘为诚 71 号机,在确山附近,与领队失却联络后,将炸弹投落信阳敌飞机场,旋即回航,安降老河口机场。于本(三十)日七时十五分追踪至老河口上空盘旋。

钱祖伦 66 号机,因故障,降落安康机场,人机安全。已派比机送冷气接头前往,即可飞回。

四月份我方空军轰炸成果报告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28	志愿队	虞乡	车站及仓库	投弹于车站及敌仓库立即起火成果待查	SB	8	爆破弹 杀伤弹	2580 公斤		携带炸弹计 50 公斤 30 颗, 10 公斤 108 颗
29	志愿队	信阳	车站及铁路线附近敌阵地	投弹于车站及铁路附近成果待查	DB3	9	爆破弹 杀伤弹	5880 公斤		携带炸弹计 70 公斤 15 颗, 50 公斤 60 颗, 14 公斤 104 颗, 8 公斤 弹 48 颗
	第八大队	信阳			D. B3	7	爆破弹 杀伤			
附记										

(原编者注)以上各件,选自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报送军令部之“空军战斗要报”。

四月份我方空军轰炸成果统计表

日期	隶属	领队	机名	架数	炸 弹			目 标			爆炸概况	报告者	备考
					重量 公斤	个数	信管	地点	种类	数量			
3	第八大队	徐焕昇	DB3	6	2400	24		岳阳	司令部及仓库		炸毁敌兵舰一艘，伤亡百余人，城陵矶岳阳南	严立三、邓寒三电告	
	志愿队	克兹罗夫	DB3	9	4722	189		岳阳	同上		津港、日明寺、观音阁、九花山等处敌兵伤亡百余，炸毁车厢二、东门外毙敌五、长一、马夫、马匹各二。洞庭路二十余、毁汽车五、西门外毙敌二十余，五里牌毙敌五	本会长军参福沙联络王恒盐738申电	

续表

日期	隶属	领队	机名	架数	炸 弹			目 标			爆炸概况	报告者	备考
					重量 公斤	个数	信管	地点	种类	数量			
3	南愿队		CB	7	2800	24		运城	敌机场		炸毁房屋七十栋敌损失极重	程潜歌 午计实电	
	志愿队	克兹罗夫	DB3	10	7240	225		岳阳	敌司令部附近仓库		岳阳城西沿江岸兵舰两艘受伤、炸毁敌汽艇二艘、车站一部	桂林行营电告	
	第八大队		DB3	5							粮秣一车仓库被炸毁毙敌约一百五十余名		
28	志愿队	吴瓦洛夫	CB	8	2580	138		运城	敌机场		炸弹于虞乡附近车站均命中起火	志愿队	
29	志愿队	克兹罗夫	DB3	9	2400	48		信阳	车站及敌机场		炸毁敌机十一架及敌兵各二十余	陈诚严 立三辰 佳保电	

续表

日期	隶属	领队	机名	架数	炸 弹			目 标			爆炸 概况	报告者	备考
					重量 公斤	个数	信管	地点	种类	数量			
	第八 大队		DB3	7	1450	23		信阳	同上		同上		
附 记													

(原编者注)此表选自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报告军令部一九四〇年四月份空军“作战统计表”。

(选自《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5月2日于成都)

一、我志愿大队 SB 八架,于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二十分,由温江机场出发,其携带炸弹量 50kg 三十枚,10kg 百零八枚。

预定轰炸目标为运城敌机场。

二、当日十时四十分,降落南郑加油。于十一时二十分,由南郑起飞,高度为七千公尺,过西安后,因云降低至三千公尺,至潼关附近,复盘旋升高至五千公尺,终因天气关系,不能飞往运城,遂于十二时五十分,在虞乡车站附近(此地有敌仓库)投弹,均命中起火,当时有敌驱逐机三架,因不及攻击,尾追至渭南,始逸去。

三、十四时五十分,降落天水加油,旋即飞降兰州,于三十日十二时二十五分,由兰起飞,十五时安返基地。

四、参加作战人员姓名如附表

右报告

军令部长徐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空军战斗要报

(1940年5月2日)

钟祥方面：

一、本(二)日晨，DB3 一架由成都起飞，赴遂宁侦察天气。

二、九时三十分，志愿大队长乌瓦洛夫，率领 SB 机五架，由温江机场起飞，经遂宁，于十一时零分降落梁山机场加油挂弹，其携带炸弹数量如下：

50 公斤爆破弹 18 颗，

10 公斤杀伤弹 72 颗。

三、十一时三十七分，SB 机五架，由梁山机场起飞，经万县、巴东，向主目标钟祥进航。

四、十三时二十四分，我机到达钟祥敌机场上空，高度六〇〇〇公尺，场内停敌驱逐机八架，另起飞驱逐机二架，我机当向敌机场及钟祥城市北郭投弹。

五、我机投弹时，敌高射炮猛烈射击，并有敌驱逐机三架，在我 SB 机下四〇〇公尺向我攻击，我机亦猛烈还击。

六、轰炸后，因遭遇敌驱逐机攻击，未及侦察轰炸成果。

七、十五时四十五分，我 SB 机五架，返降遂宁加油，于十六时四十四分由遂宁起飞，十七时三十四分全部安降温江机场。

五月份我方空军轰炸成果报告表

日期	隶属	目标		轰炸状况	机种	机数	弹种	总弹数	证明者	备考
		地点	种类							
2	志原队	钟祥	城北区 敌机场	成果未详	CB	5	50kg— 10kg	6—36	战斗要报	
19	第八大队	随、 枣、 襄、 钟 一带	敌溃 兵及 其交 通线	投弹中 随县北 公路线 上及 随县城 边	DB3	3	50kg— 10kg 8kg	20— 14—6		
19	第一大队	同上	同上	同上	SB	8	2400kg			
28	第八大队	随到 安陆	敌兵及 公路	目标冒 烟极 盛	DB3	6	50kg 10kg 8kg	20— 28—14		

(原编者注)此表选自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报送军令部之“空军作战统计表”。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空军战斗要报

(1941年5月21日于成都空军总指挥部)

(一)本(二十一)日,八时二十分,接甘肃防空司令部情报:敌侦察机一架,窜至郭城驿西飞。八时三十分,至靖远。九时零五分,在七千公尺高度,经兰州上空掠过。九时二十分,经会宁,向东窜去。

(二)九时十七分,陕西郃阳,发现敌重轰炸机二十七架,向西飞行,其经路及到达各地时间,如附图(略)。

(三)作战部署:

(1)八时四十四分,由第四路司令部,命第二十四中队 E16 III 机两架,及西古城第二十一中队 E15 III 机两架起飞,在兰市与机场上空,搜索警戒,未与敌机遭遇。九时二十五分,用布板指示各机原场降落。

(2)十一时二十七分,命驻西古城第四大队二十一中队 E15 III 机七架(内有第五大队吴国瑞一架)。十一时三十二分,命俄员队 E15 机七架。十一时五十七分,命第四大队二十四中队 E16 III 机六架,先后在原场起飞,由俄员队队长潘阔夫,任总领队,在兰州及机场间上空,巡逻警戒。其兵力区分,如附图(略)。

(3)E16 III 机六架,由第二十四中队长柳哲生率领,为第一编队,高度六千公尺(海拔)。

(4)E15 III 机七架,由俄员队队长潘阔夫率领,为第二编队,高度六千五百公尺(海拔)。

(5)E15 III 机七架,由第二十一中队长陈盛馨率领,为第三编

队，高度七千公尺(海拔)。

(四)本(二十一)日午，兰州天气佳，有卷层云，能见度良好。兰州以东各地天候，一般均良好。

(五)十时二十分，机场发出注意情报。十一时空袭警报，十一时四十九分，紧急警报。十三时二十分，解除警报。

(六)疏散部署。

(1)十时二十分，先命第八大队 DB 八架，滚至出发线上待命。十时五十分，开始起飞。十分钟后，起飞完毕。先命向永昌以西上空疏散待命。嗣于十二时二十五分，复由无线电指挥飞嘉峪关降落。

(2)十一时十分，令第一大队第二中队长姚元恺机，第二大队大队长王世箝机，第九中队长杨仲安机，共 SB 机三架，由杨中队长仲安率领起飞，向武威以西上空疏散。

(3)十一时二十五分，令第四大队 E16 III 机一架起飞，向中川村站疏散，并命须确实伪装。

(七)战斗经过概要：

(1)我 E15 III 机七架，于十一时二十七分起飞后，则按规定高度巡逻。十二时五十八分，于六千五百公尺高度，发现敌编队群机二十七架，自西古城方向，成雁队形，进入市空。我 E15 机群自敌前方占位，同队攻击一次，敌猛烈还击，并将编队群，向右移动，冀图避我火力，二分钟后，于敌左侧下方，再度攻击一次，以孙分队长伯宪，最为勇敢，当见敌第三编队第三小队第三号机，冒出浓烟，着火尾旋下坠，坠落兰州机场南侧山谷中，机全焚毁，仅存残骸，尸体完全者四具，其他皆模糊不清，至所投炸弹，约七十余枚，全落机场东南方向，指挥洞附近山上，我方毫无损失。作战有功人员，正查明议奖，另案呈报。

(2)我 E16 机于十一时五十七分起飞后，队员于学炽，因机腿不能收上，即降西古城疏散。副队长武振华机，升至三千五百公尺

时,发动机突然停车,迫降原场,机微损。另飭查报失事原因,及责任议处,其他四机,于指定空域巡逻,因敌延不进入,四十五分钟后,乃用布板指示降落临洮叶家坪机场待命。该队于警报解除后,先后安返原场。

(3)俄员队 E15 机,因高度不够,未与敌机遭遇,未攻击。

(4)接防空司令部通知,回航敌机仅二十五架,详情正查询中。

附:(一)我空军参加作战人员姓名表。

(二)空战经过要图。(略)

(三)我方空军作战成果报告表。

(四)我空军飞机损耗表。(略)

(五)敌机袭兰航行经过要图。(略)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 组致蒋介石签呈

(1940年4月28日)

抄录四月二十八日提交苏联人民委员长莫洛托夫，请转致斯大林先生函。敬呈钧座备查。

我最尊敬的斯大林先生：我这次奉了蒋介石元帅的命令，到莫斯科来向先生道谢。因为中国将近三年的对日抗战，得到友邦苏联极大的同情和人力物力的援助的地方很多，而友邦苏联的这种援助，又完全出于苏联伟大领袖斯大林先生的人类同情心和其制裁侵略的政策之表现，所以蒋元帅要我来代表他和中国抗战军民向先生道谢并致敬。

其次，蒋元帅他要我向先生申述的，概括起来，有关于远东政治问题与请求继续援助两点。兹综合本人出发时他所面述的，和最近来电所指示的，分为下列各节转述并请求。

第一 远东政治问题

甲、中国与苏联关系密切，利害一致，而且中国抗战之成败，苏联政府与人民备极关心，故在外交政策上，无论何时，中苏两国皆有共同一致之必要。他命我来谒见先生，就是请求指示以下的问题是否可行。

乙、自欧洲战事发生后，苏联为发展和平政策对波罗的海采取之措施，中国舆论一般认为，依苏联立场甚为正当，苏芬和约成立，中国人士尤称道不置，并且希望苏联于适当时期能以积极政策适用于远东，以制裁侵略者，届时中国政府准备与苏联政府立即协议

关系远东永久和平之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的诸临时措施与永久建设，而担负一部分光荣的责任。

观于过去蒙伪划界之破裂，确信苏联始终站在正义的立场，此足以寒侵略者之胆，而坚定四万五千万抗战民众之信心，设苏联更用种种方法牵制日本在伪满兵力，则亦等于直接援助。

上述问题至为复杂，惟如一旦成为事实，则中苏间诸种关系，将发展无限，尤以经济的发展为然，但又因此问题极为复杂，至宜预先检讨，因此苏联如能先遣一经济专家至中国，则中国政府当联聘为客卿，即请彼先研究中国本身之经济，与中苏两国各期间之共同经济利益，而随时商讨，如此相信于我两大民族未来之发展，必甚有益。

丙、当本人去岁出发时，蒋元帅原就远东的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的恐惧不安与遭遇我国坚决抗战的打击，曾对日本可能采取的外交戏剧，加以种种推测，并作一种断语，就是谓日本将利用其地理的优越与蓄谋的久远，企图离间与远东关系密切之列强，而即于此时期高压中国，最后亦有号召英、美反对苏联的可能，因此列强如对远东局势获得一种共同的谅解，则狡猾的日本将无所施其计。他以上的意见，并曾于上年十二月月中旬请潘友新大使转报过。惟关于此层，蒋元帅最近的训令说，近数月来，因欧局变化甚多，太平洋中亦正起波动，与当时情形已自有别，在此期间，日本之狡计虽仍在着着进行中，然苏联运用其智力与武力对待横蛮，丝毫不为所动，而美国之反日心理，日见高昂，亦必不为其所欺。日人惶恐的情形，较之去岁，似又加甚，是盖日本所素视战争为其国策之工具，而于兹彼平日所疯狂般认为其陆海对象之两大国，日即强盛；反之，其本国之地位则日益衰落故也。蒋元帅又云，当此之时，苏美两强设能平行的对日采取监视态度，或两强间竟获得一种谅解，配合中国之坚强抗战，则太平洋问题之解决，更不必假手他人，此当为中国国民所馨香祷祝者也。

第二 请求接济问题

甲、远东侵略者——日本军阀，经中国近三年间之抗战，其国力已亏，军力已颓，虽一时侵占中国广大土地，然日本实已陷于泥淖，不能自拔，现已无力威胁任何国家，若中国能坚决抗战到底，直可使其即行崩溃，而消减远东永久祸患。然中国为达此目的，不得不希望苏联继续予中国以人力的和物质的援助。

乙、敌人经济崩溃之期已近，因此其军阀孤注一掷，摧毁我军之毒计，在所难免，此种毒计在本一九四〇年实现之成分为最多，因此中国自不得不坚强抵抗，反之，中国欲打破其毒计，又以选定要点，予以反攻为最善。故在本年间，尚拟请加强并多方的给中国以援助，俾能完成此种任务。

丙、本人前次携来请求接济兵器的方案，于进谒伏罗希洛夫元帅时，业已呈出，此案虽系中国军部就苏联曾经允许的数目立案的，但当时未将迪化工厂之设备费与材料计入，自可随时修正。目前拟请先生先就中国军队急需的批准一部分，其余部分，可候次期再行接济。兹将先期请求者开列如下：

一、驱逐机 E—16 一五〇架

二、轰炸机 DB 二〇架 SB 三〇架

三、轻机关枪一〇,〇〇〇挺 弹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发

四、步枪一〇〇,〇〇〇支 弹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发

五、山炮一三〇门 弹二六〇,〇〇〇发

六、野炮一八〇门 弹三六〇,〇〇〇发

七、高射机关枪五六〇挺 弹二,八〇〇,〇〇〇发

八、战车防御炮一六〇门 弹一六,〇〇〇发

九、伊宁航校请维持原状，并赐修理飞机，该校扩充案，俟本期学生毕业后，请赐实行。

十、迪化工厂依据协议结果，赐予核准。

十一、顾问之增遣。

更有请者,关于油类及交通通信器材与卫生材料购求,中国目前实甚需要,其中某类可予供给,及某类须付款或易货等条件,拟请飭主管部赐予详细指示,以便统筹,实所企祷。

我于陈述上列诸事后,谨请赐予指示,并因奉令返国,不日离莫斯科,特向先生致诚挚的敬礼。贺耀组谨启。四月廿八日。

(《战时外交》(二)^①,第 372—375 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

(1940年5月4日)

A. 别杰罗夫

由于中日战争的发展,有一件事特别引人注意,那就是日本人力图结束这一场“中国事件”。日本统治集团想签订一个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要求,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使中国丧失其国家独立的“和约”,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人产生这种意图的原因很清楚:1940年日本面临着新的灾难和艰苦的考验,它的经济更加困难。最近又增加一个新的因素:由于欧战的扩大,使得某些列强无法顾及它们的殖民地和被保护国。荷属印度及其丰富的资源眼看就要成为无人照顾的“孤儿”!但是,为了在太平洋和南海地区采取某种重大行动,日本必须从它挑起的中国战争中挣脱出来。日本政策的这些基本意图,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宣布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原因。

中国国民政府拒绝了近卫公爵担任首相时提出的苛刻条件。当时日本感到必须在中国建立一个与公认的国民政府相抗衡的足以代替中央政权的机构。日本人希望这个机构能够受到“尊重”,可以对合法的、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同日本签订和约。1940年1月,汪精卫因建立政府屡遭失败而向蒋介石发出“和平呼吁”,这绝不是偶然的。2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在其冗长的声明中说:中国新的“中央政府”的宗旨是同日本签订和约,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和建立“亲善友好”的日中关系。他接着说,如果重庆

方面不投降,那么日军将一直战斗到“中国人醒悟为止”。

日本首相的上述声明是针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特别是针对中国某些集团讲的,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日本人对中国的投降抱有希望。

众所周知,汪精卫在建立伪政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从1938年12月汪精卫开始搞“和平运动”,到1940年3月他正式宣布成立新的南京政府,在十六个月中间,日本人通过一系列阴谋手段强迫中国人民接受汪伪政权。然而,汪精卫“政府”是在很不妙的情况下出现的,与它的发起人的想象差距甚远。中华民族并没有屈服。中国人民决心继续为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而斗争。总之,日本人和汪精卫分子在进行他们的试验时所遇到的困难,再次证明了中国团结的力量。

但是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汪精卫是孤立的,认为中国除了一小撮旧官僚分子和令人可疑的生意人就没有人追随他。当然,他领导的这个“政府”是日本“天才”的行政官员们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弱的东西,是一个没有人民,没有军队的政府。但危险性不在于这个政府本身,主要在于中国的封建官僚阶层不愿前进,他们总是把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

因此,为了使争取独立的战争转变为人民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经济方面、国家管理方面和军队方面实行一系列摧毁封建传统的民主改革。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使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使农村的地主、土豪劣绅丧失其原有的地位和影响;严惩高利贷行为;打破千百年来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领导人的亲朋好友中分配官职的制度;通过法律严惩政府官员侵吞国家财产(这似乎早已成为官员们的一个自然职能);进一步集中国家权力,以便根除无政府状态和分散主义传统。显然,为了改善国家管理和提高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进一步实行改革。封建残余正在衰落,寄生地主的末日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使商业、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遭到一定的牺牲。其中一部分人因过去习惯了的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活动方式长期遭到破坏而开始感到苦恼。简而言之，这就是培养明的和暗的拥汪派投降主义情绪的社会基础。显然，在拥汪派当中有很多人是不敢公开活动的。那些关于“反对日本，但不要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员进行检查”的宣传，以及类似的经过伪装的汪精卫、托洛茨基口号，在大多数当权人物中间也没有引起共鸣。这种宣传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公愤。一些将军企图挑起内战也遭到政府和蒋介石的反对。

正因为如此，所以拥汪派宁愿留在民族统一战线队伍内等待时机和窥伺方向。此外，各大国，首先是美国不承认汪精卫的“中央政府”，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是，决定现时中国命运的决不是上层人物的联合，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骨干和动力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一些惊惶失措的报导看来十分可笑。这些报导试图证明，各大国事实上不得不同盘踞在南京和上海的汪精卫打交道。

国民政府拥有广阔的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日益完善的军队，而最重要的是它得到人民的支持。

据日本《东方事务》杂志统计，中国一千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二被日军占领。因此国民政府至今仍然控制着百分之七十八的领土。在四亿七千零五十万居民中（据1936年国情普查的不精确资料），有百分之五十七点五生活在自由区（没有把难民计算在内，难民人数达一千五百万人）。从中国沦陷区和自由区农产品的比例来看，自由区的大米产量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三，大麦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五，马铃薯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八，杂粮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六；一种很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桐

油(四川省的产量占百分之六十,广东、广西及其它地区也生产桐油)绝大部分也出产自由区。

还必须指出,近几年,特别是1939年中国内地各省在农业上获得了大丰收。与此同时,沦陷区因战争的破坏(特别是因灌溉系统遭到破坏)使农业蒙受巨大损失,产量很低。中国西南和西部省份还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占中国森林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矿藏(还远没有开采出来)也很丰富。

在中国自由区,铜的产量占百分之七十一.七,锰占百分之九十八.一,锡、铅、锑、镍和砷占百分之九十九.八,明矾占百分之八十六.四,黄金占百分之四十八。

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内地工业欣欣向荣。当然,生产规模还很小,仍然需要大量进口,但国内生产的不断发展对中国来说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它与日本经济学家的悲观预言相反,中国正在寻求它必需的外贸途径。由于日本对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实行封锁,的确给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根据中国海关对敌占区和自由区1939年前九个月外贸的比较,仍然可以看到,到年底后者是顺差,其收入达三千三百六十四点五万元(中国币),而同一时期敌占区(包括上海)则是逆差,亏损达四亿零五百万元(中国币)。

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军队反对强大敌人的战争已进行两年零十个月,中国军队日益壮大,逐渐锻炼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它已经能够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下一步将转入全面反攻。

国内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国民党关于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如果能实现的话)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围绕中华民国未来宪法的一些重要条文而展开的讨论表明,筹备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已经在全

国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到处都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新中国将在斗争中诞生。因为中国人民是在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革命战争的光辉典范)，所以战争对中国来说就不仅意味着破坏，而且还要在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

这场斗争是困难的，它需要付出极大的牺牲。中国人民只有坚决、彻底、勇敢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能保证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军令部为修改苏联顾问福尔根 对宜昌失陷检讨意见致蒋介石签呈

(1940年7月25日)

奉钧座交下总顾问对此次宜昌失陷原因检讨一件，令本部研究后，修正后，通报等因。奉此，除关于宜昌会战，对本会命令之下达及部队奉行程度，现正检讨，另呈钧座核示外，兹先就总顾问意见，加以修正。至对原文字句间之取舍，是否有当？伏乞鉴核示遵。如蒙裁可，拟即以本部名义，通报各战区参考。谨呈总长何，转呈委员长蒋

职徐永昌呈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总顾问原意见，及修正案各一件。

附件

兹就总顾问所陈此次宜昌失陷原因，原文修正如次：

- 一、情况判断不正确，以为敌人不能攻占宜昌。
- 二、指挥作战，缺乏坚定一贯指导。
- 三、处置迟缓，未能制敌机先，以致反被敌制。
- 四、缺乏监督及贯彻目的之严令要求，屡行变更命令。
- 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未能彻底执行军委会命令。

基于上述原因，而产生以下违背战略战术之事实：

一、第五、第九、第三战区，在作战过程中完全未能协同，致使敌从容由武汉南部调动兵力，转用于第五战区。敌之占领宜昌，乃

第九战区消极不动所致。

二、战区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及军长等，缺乏勇敢与主动精神，无有贯彻任务之毅力与决心。

三、兵力使用不集中，且犯逐次使用兵力之弊，作战时，不用主力。

四、对通讯联络，不知于事前妥为筹划，致战线微有动摇，有线通信中断。部队指挥，随之即告停止，此为此次作战最大弊病。

五、完全不明情况。所有报告，不合实际情况，往往夸大敌情及本军损失。间有一部将领，欲求掩饰其不明情况及不善指挥之过，转而藉口下级指挥官或部队不行。须知部队素质良否，厥惟其主官及司令部之良否是赖。

二十九年七月十日报告

于重庆

窃此次宜昌失陷，其原因异常明显，无须加以详细陈述。职兹就其基本原因，加以检讨如下：

一、情况判断不正确，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余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此种偏见，无形使前方各级将领，尤其军委会之心理，遭受很大影响，形成消极，及动作异常迟缓等现象。

二、对于部队作战，缺乏坚强与联络一贯的领导，尤其军委会方面为然。

三、极端迟缓，一切处置，照例耽误时机，以致凡事落在敌后，未能制敌机先，敌则处处制我机先。

四、缺乏监督及贯彻目的之严格要求，尤其军委会方面如此。军委会一切命令，往往刚刚下达到部队去，便立刻从事变更与修正。事实上，无异取消自己甫经发出之命令。

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

上述一般基本原因，产生种种违背战略战术之原因，兹择其最

主要者：

一、五、九、三战区，在作战过程中，完全没有协同。第三、九战区(尤其第九战区)之按兵不动，不但使敌从容由武汉南部抽调大批军队转用于第五战区，以增强其进攻我五战区之兵力，且直无异促成敌大胆之冒险行动，结果遂使敌占领宜昌。敌占领宜昌，乃第九战区消极不动所致。

二、战区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及军长等，缺乏勇敢与主动精神，无有贯彻任务之毅力与决心。

三、兵力使用不集中，且犯各个使用之弊。换言之，即作战时，不用主力。例如：命令一军攻击，军则只派一师，师派一团，团派一营。结果，所谓一军攻击者，实际不过一营兵力而已。

四、不善于事先筹划并组织通信联络，以至于战局过程中未能保障军队指挥之不中断，结果，每战线一部发生些微动摇，有线通信中断，部队指挥随之即告停止。

五、完全不明情况，所有报告，照例不合实际情况，往往夸大敌情及本军之损失。间有一部将领，欲求掩饰其不明情况及不善指挥之过，转而借口下级指挥官或部队不行。须知部队素质之良否，厥惟其主官及司令部之良否是赖。凡指挥得当之部队，必能勇敢善战。

默察吾人过去各战役之经过，即可看见使宜昌陷落之上述原因，重复出现于今日，所不同者，不过各战区所犯之程度间的差别而已。

由上述陈，职认为目前最高统率部之主要任务如下：

(A)在最近期间，检讨组织，并保障各部队作战过程间真正坚强而连续的指挥实施。

(B)提高军纪，及加重高级将领达成任务之责任，此点尤须自各战区司令长官始。例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及各集团军总司令与军长等，所有作战命令，应时并切实达成之。凡对作战命令，未

能切实完成者，应加以严厉之处分。

(C)确保各战区、各兵团、集团军间之协同动作(互助)。

(D)尽量提倡各级指挥官之理智的主动与独断，果敢与独立作战精神。

(E)确保正规军与敌后部队及游击队之作战协同。

(F)加强以沦陷区民众及游击队之政治工作，确保游击军之积极活动，切实达成扰敌人后方之目的，使敌人尤其傀儡政权之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无法实施。

在结论中，职认为须向钧座陈明者，即上述原因及办法，并非新的问题，此等问题。前在南岳、柳州、重庆等会议中、业经钧座阐明无余，并指出具体办法，一再下令要求各级指挥官根本改进在案。但观此次宜昌失守，显然证明钧座对于此项问题之指示，军委会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等，依然未能确实明了，以故迄未遵照实施。职认为军队作战，指挥问题，乃我军最落后的问题之一。此问题最为重要，亟须于最短期间加以彻底解决。吾人应确保对于部队之指挥的坚决性、连续性与果断性。对此问题之解决，首须自军委会始。军事委员会对大军统帅与指挥，须按时化、具体化、坚决化，连续化，成为全军之表率。我军尔后作战之胜利，全唯军队指挥问题之能否正当解决，能否根据现代大军作战指挥方式实施指挥是赖。

以上所陈当否？乞鉴核。谨呈
委员长蒋。

职福尔根

(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

(原编者注)在苏联顾问福尔根报告原件上，蒋介石批：“交军令部研究后修正后通报”。在另一部分内容相同之福尔根报告抄

件中,国民党军令部删改很多,如报告中之第“一”项中删去“尤其军委会”五字,并将“前方将级”中之“将”字改为“各”字。第“二”项全部被删去。第“三”项中之“三”改为“二”字,并删去“一切处置照例耽误时机以致”十二字,第“四”项全部被删去。第“五”项中之“五”字改为“三”字。在“上述一基本原因产生种种”十一字之后增加“违背”二字,“战略战术”四字之后增加“之”一字。另在最后一大段中,将“军委会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司令部等”十七字改为“各级指挥官”并将“对此问题之解决首须自军委会始。军事委员会”及“成为全军之表率”字句删去。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 武官崔可夫谈话记录

(节录)

(1941年1月16日)

时间——三十年一月十六日午前十一时

地点——重庆曾家岩德安里官邸

(寒暄词略)

崔武官：前次承问南京敌情，今日得到消息，敌军统帅部为实行南进计划，决定在南海各岛屿集中十七个师团，及大量空军、海军，敌人造出此种空气，恐其意不在南进，而在掩护其于贵国境内集中军队，准备向华中或华北进攻。且前日(十四日)敌机侵袭四川，其目的显系侦察贵国内地动静，而不仅在轰炸也。究竟最近敌人是否在华中、华北调动部队？此点请委员长指示，并请特别注意。

委座：余意料敌人春季必将在华中或华北蠢动。

崔武官：敌人既有此计划，事先必调动部队，运输弹药，准备其他各种军需品，贵国方面，自亦须监视敌人动静，及早准备抵抗。

又敝国此次援助贵国之军需品，已否运到内地使用？数目是否确实无误？今天愿再就手册所记面为报告：(下列军需品数目为俄大使所不知)

一、飞机，最新出品快速中型 SB 式双发动机轰炸机壹百架，最新 E16 式驱逐机七十五架，153 式驱逐机七十五架，此种飞机每

架有机枪四挺,每分钟可射击一千五百发子弹,曳光弹、燃烧弹皆备,射中敌机即可锯成两截,威力最大。以上三种飞机合共二百五十架,并附有十次作战用之装配,各种炸弹数量较少,只供三次作战之用,因贵国已能自制也。

二、大炮,七六米口径野炮二百门,装甲炮拖二百套,炮弹二十万发,高射炮共五十门,内七六米口径者二十门,附炮弹三万发,三七米口径者三十门,附炮弹七万发。

三、机关枪,轻机枪八百挺,重机枪五百挺,子弹共一千八百万发。

四、车辆油类,载重三吨之汽车三百辆,汽油机若干,现尚不能举出其确数,以上军需品,余离莫斯科时,已大半运到中途,(地名生未听清楚)余现抵重庆已半月,尚未见其运到使用,如上项飞机与高射炮能及早配备于内地,则日前敌机空袭重庆时,必不敢如此横行无忌,此点不知是否运输上有何困难?请予指示。

委座:此项军需品尚未能运到,原因有二:一、按时计量行程,尚不克如此迅速运到;二、运输之车辆与汽油甚感缺乏,除此以外,别无他因。

崔武官:余最近所得消息,贵国飞航人员尚不能驾驶上项飞机,而能驾驶一五三式驱逐机者至今尚只有四人。

委座:李白可夫^①空军顾问已航抵哈密,彼可告汝敝国空军人员之在哈密受训者,今日已可单独驾驶上项飞机飞航矣。

崔武官:李白可夫顾问在敝国原隶我部下,彼作战甚勇敢,曾参加一九二〇年敝国对波兰战役,及近年敝国对外各次战役,如波兰、芬兰等战争是。

委座:李白可夫顾问在此服务甚好,贵武官适所询各项军需品之运输,依原定时限,输送尚不觉如何迟缓,惟汽车尤其汽油至感

^① Рыбаков。

缺乏，前此虽在贵国大量订购汽油，现在亦尚未运到。

崔武官：此事敝国商务代表曾为催促，在哈密余并与欧阳司令谈及。敝国现有一种木炭汽车，不需汽油亦可运输，贵国汽油缺乏，即可以木炭汽车代替，此事余已与贵国交通部长商及矣。

委座：木炭汽车甚好，交通部已派员赴贵国考察学习，将来拟向贵国大量购进备用。

崔武官：此种汽车，他国亦有发明。

委座：敝国亦已能自造，惟因原料少，所造成者不多，且亦不及莫斯科出品之优良。

崔武官：一般司机对于木炭汽车，不乐意驾驶，因其不若汽油汽车之洁净也。

.....

（《战时外交》（二）^①，第 525—527 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动用苏联 贷款向苏购军火武器的账略

(1941年3月4日)

(甲)动用借款之数额

第一批 二十七年三月五日至六月十日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1	СБ式飞机	62	110000	6820000
2	И-16式飞机	94	40000	3760000
3	И-15式飞机	62	35000	2170000
4	УТИ-4式飞机	8	40000	320000
5	ТБ-3式飞机	6	240000	1440000
6	备用之发动机飞机及发动机之附件及零件暨特种器件			653079
7	汽车运输汽车启动装置器汽油机器等			420742
8	备用武器及飞机上战斗设备	40		6960437
9	Т-26式坦克车连用无线电设备	82	21302	1746764
10	备用发动机零件及修理厂			374076
11	牵引机及 3А, 3ИЛ 两种挂车			582387

续表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12	七六公厘一九三一年式高射炮	20	20000	400000
13	备用之 Лейнера	40	1500	60000
14	四五公厘射击坦克车炮	50	7000	350000
15	炮弹箱	100	1425	142500
16	骡马套具	182	198	36036
17	军用仪器			32800
18	炮兵用坦克车之弹药			3178810
19	上述货价二九七二六六三一元之百分之二组织费			594533
	共计			30321164

上述货价，为美金三〇，三二一，一六四元，以〇·八九二，三五四折成现金二七，〇五七，二一二格兰姆。

第二批 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日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1	玛克西姆脱卡辽夫式机关枪	500	180	90000
2	劫各且辽夫式机关枪	500	225	112500
3	机关枪子弹	10000000	(每千)25	250000
4	七六公厘野战车炮	160	6580	1052800
5	一一五公厘野战车炮	80	12000	960000
6	三七公厘射击坦克车炮	80	1330	106000

续表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7	玛克西姆式机关枪	300	600	180000
8	勃克且辽夫式机关枪	600	225	135000
9	七六公厘炮弹	160000	13	2080000
10	一一五公厘重炮弹	80000	30	2400000
11	三七公厘射击坦克车炮弹	120000	3	360000
12	步枪子弹	100000000	(每千)25	250000
13	经铁路之军火运输			202892
14	两只轮船装搬费			40167
15	一至十二货值美金七,九七六, 七〇〇元百分之二之组织费			159534
	共计			8379293

上述货值,为美金八,三七九,二九三元以〇.八八八,七四五折成现金七四四七〇五五格兰姆。

第三批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七日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1	И-15 式飞机	60	35000	2100000
2	YT-1 式飞机	5	19500	97500
3	备用飞机发动机及他种零件			3642469
4	二百四十八架飞机之航运			953724

续表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5	二百三十二架飞机整套武装设备、特种汽车运输工具与飞机及发动机附件等之铁路运输,共用货车一二九八辆			323247
6	汽车运送 И-15 式飞机特种包装费,及由铁路运输其他飞机之包装费			749676
7	И-15 式飞机一二二架与零件及十套飞机上武装设备用汽车运输之运费			1195489
8	3 _И C5 式汽车	400	1120	448000
9	四百辆汽车开送费			10416
10	一二九辆火车运送坦克车之运费			27897
11	炮兵财产由铁路运输计二四四辆火车之运费			87932
12	飞机武装设备三十套坦克车及炮类各种共装两轮之搬运费			40253
13	修理队派遣费			54547
14	一、二、三、八各项货品总值美金六、二八七、九六九元百分之二组织费			125759
	共计			9856979

上述货值,为美金九、八五六、九七九元以〇。九九一、六九三折合美金八、七八九、一六六格朗姆。

第四批 二十七年七月五日至九月二十八日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 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1	СВ式飞机	80	110000	8800000
2	备用 M—100 式发动机	60	15150	909000
3	СВ式飞机整套零件	8	25314	273000
4	ⅢKAC 式机关枪连同装备	120	742	89040
5	战斗机各项备用零件修理用具 装备材料及甲板等			758823
6	运输机各项备用零件修理用具 装备材料等			1286755
7	达阿式、派凡式及舒卡司式机 关枪在飞机上使用之子弹连同 子弹带			1140867
8	И—15 式飞机	100	35000	3500000
9	И—15 式飞机之附带装备	10	14300	143000
10	M—15 式飞机发动机	46	6200	285200
11	И—15 式飞机各项零件			158296
12	劫各且辽夫式机关枪	1500	225	337500
13	玛克西姆托卡辽夫式机关枪	500	180	90000
14	三七公厘炮连同装备零件修理 器具附件及马匹套具等	100		813400
15	三七公厘罗真别各及各留真维 尔克式炮连同备用零件修理工 具及附件	4900		200000

续表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 量	以美金计算	
			单 价	总 价
16	三七公厘炮之炮弹	490000	3	1470000
17	七六公厘炮之炮弹	160000	13	2170000
18	一一五公厘重炮弹	46861	30	1405830
19	步枪子弹	20360000	(每千)25	509000
20	ЗИС-5 式汽车	200	1175	235000
21	ЗИС-6 式汽车	100	1470	147000
22	四百辆汽车基本修理所需之零件及已用过一年,三百辆汽车修理所需零件			139071
23	各种货载经铁路之运输;计飞机及飞机上之装备各种备用零件修理工具、战斗机上之装备与材料,飞机发动机及其零件,СВ式、И-15式两种飞机之武器与空战应有整套之设备、各种炮兵用品、汽车及零件			506062
24	И-15式飞机用汽车运送之特种包装费			967742
25	一只轮船货载之搬装与运费			20140
26	И-15式飞机装备工作费,СВ式五十架飞机及 И-15式飞机一百架由空中飞送费			192931

续表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27	关于运送志愿飞行士、运输员、 装配与修理飞机之工人、飞机 上武器安装之工班顾问等而经 营航空线之费用,与运送各项 货载及军火费用			877768
28	用汽车运送一百架 И-15 式 飞机所需之运费,СВ式飞机各 项装备、各式飞机所需用之发 动机,连同整套零件或某项另 件运送、各种零件及材料修理 工具及军用飞行经营上有关财 产,运送三百辆汽车及该汽车 之零件			868180
29	志愿兵顾问等之派遣费及服装 费等等			810395
30	一至二十二各项财产共值美金 二四八六〇七八二元百分之二 之组织费			497215
	共计			29601215

上述货值为美金二九、六〇一、二一五元,以〇. 九一七九三五折合现金
二七一七二五四一格兰姆。

第五批

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一日

本批未有详单,共计美金二一,八四一,三四九元。

本批组织费若干? 因无详单,无从查悉。

上述货值,为美金二一,八四一,三四九元,以〇. 八八八六七一折合现金一九,四〇九,七七三格兰姆。

第六批

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一日

本批未有详单,共计美金一八,六二二,〇二四元。

本批组织费若干? 因无详单,无从查悉。

上述货值,为美金一八,六二二,〇二四元以〇. 八八八六七一折合现金一六,五四八,八五三格兰姆。

第七批 自二十八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一)飞机类			
1	飞机 YT-2M-11	15	39500	592500
2	上述飞机整套零件	2	22350	44700
3	飞机 И-156Ис	8	35000	280000
4	飞机 YTH-4	4	40000	160000
5	飞机 СБ	10	110000	1100000
6	上述飞机整套零件	1	15214	15214
7	飞机 P-10	8	81700	653600
8	上述飞机整套零件	1	23350	23350
9	СБ机学习用之舱位	2	5000	10000
10	И-16 飞机	8	40000	320000
11	M-103 飞机	6	15150	90900

续表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12	M-11 式发动机	5	4350	21750
13	ВИИ-2 式之金属螺旋桨	2	2100	4200
14	M-25 式金属螺旋桨	3	925	2775
15	УТ-2 式木质螺旋桨	5	150	750
16	ВИИ-16 式金属螺旋桨	3	5000	15000
17	飞机及发动机各种零件			173600
	共计			3508339
	(二)汽车类			
1	ГАЗ-АА 式载重汽车	8	1710	13680
2	ЗИС-5 式载重汽车	6	1175	7050
3	M-1 式轻便汽车	6	3060	18360
4	ГАЗ-АА 式工客大汽车	2	4465	8930
5	救护卫生车	4	4400	17600
6	СТ-3 牵引车	2	4190	8380
7	ЧТ-3 牵引车	2	6130	12260
8	汽车用始动机	2	2800	5600

续表

号码 次序	品 名	数量	以美金计算	
			单价	总价
	共计			91860
	(三)其他各种财产			
1	飞行员及技术人员服装费			3246
2	教室内各教授用财产			160438
	共计			163684
	(四)上述各项输送费			
1	铁路运输装载及搬卸费			39869
2	汽车牵引机及其他财产输送费			673
3	飞机之飞送费			2098
4	飞机教官之飞送费			27925
	共计			70565
	(一)(二)(三)各类财产总值三、七 六三、八八三元百分之二组织费			75277
	共计			3909725

上述价值美金三,九〇九,七二五元,以〇.八八八六七一折合现金三,四七四,四五九格兰姆。

以上七批工业品等总值,共计美金一二二,五三一,七四九元。

附注:查核上列七批清单之意见列下:

(一)第四批第三及第十七两项之细数与总数不符。

(二)各批所列项费用,仅有总数而无细单又无证件,似嫌

太简。

(三)第五六两批仅有总数,而无货品清单。

(四)第一、二、三、四、七各批列有百分之二之组织费,共计美金一,四五二,三一八元,第五、六两批,因无详单,所列组织费若干,无从查悉。查借款合同未有此项之规定,不知有何依据。

(五)按中苏借款合同第六条规定:货品之价值,应以美金作价,再照美金合现金之市价折成现金若干格兰姆。查七批货品之美金货值折合现金之折合率,除第五、六、七三批均为〇.八八八、六七一外,其他各批之折合率,各有不同。惟美金合现金之折合率,向为固定,似无市价,而各批之折合率,不知根据何种报告。

(六)第三、四两批美金货值折成现金,计算稍有错误,第三批货值为美金九、八五六、九七九元,若以〇.九九一六九三折合现金,应为九七七五〇九七格兰姆,第四批货值为二九、六〇一、二一五元,若以〇.九一七、九五三折合现金,应为二七、一七二、五二四格兰姆。

(七)自第七批以后,尚有动用借款若干,已电请邵大使查复,俟确定后再行续报。

(乙)三年来应还债款本息之数额(略)

(丙)三年来还款之帐略(略)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 呈蒋介石报告

(1941年3月28日)

案奉 钧座皓申川侍参第五〇〇号代电，并附抄件，敬悉。关于向苏联洽购第四批军械案(即最后之一批)，查该批订货清单，曾向苏方前后提出四次，其关于军械部分，经过如下：

次数 提出年月 提出人及提出经过

第一次二十八年六月廿六日 由委座电孙院长送交俄方。

第二次二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由俄总顾问在衡阳用无线电向伏洛希洛夫元帅提出。

第三次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 由贺特使耀组面呈伏洛希洛夫元帅。

同年三月中 贺特使于宴会中面交苏方，请以前次所列购买兵工材料之美金三千万元。改购步枪八万支及十五公分榴弹炮九十六门。

第四次二十九年八月末 由本会将贺特使所提前后两次加以修正，列成总表，交邵大使力子携赴苏联交涉，旋于九月四日得邵大使电称“何总长所交货单早经提出”云。

以上前后四次所提请求供给军械清单，其内容及数量，大致相同，惟贺特使第一次交俄方清单一份，列有兵工材料约三千万美元，后因苏方不能供给兵工材料，乃改购步枪八万支及十五公分榴弹炮九十六门，此项修正表旋由邵大使赴苏提出，兹奉钧电前因，关于苏联商务代表所称，以前订购与以后追加等语，经飭主管检查

全卷,并无其他追加等案,恐即指贺特使前后两回提出而言。又查最近运到之各项军械,其种类及数量,虽与该批订货单不同,想即系该批军械之一部分,除航委会方面由该会逐复,并一面将全卷抄送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外,谨将向苏联订购第四批军械经过情形,呈报钧鉴。谨呈军事委员会长蒋。职何应钦谨呈。三月廿八日。

附呈:一、贺特使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面呈伏罗希洛夫之洽购军械表一份。二、邵大使所提出之修正总表一张。

**附:贺耀组特使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面呈
伏罗希洛夫之洽购军械表**

表之类别	表之番号	内 容	价格概计(美元)
第一类陆 空军作战 兵器器材 及油类表	第一表	野战军用械弹数量需求表	四四,二六一,四四〇
	第二表	高射兵器弹药数量需求表	一五,二五一,〇〇〇
	第三表	战车之拖车及装甲汽车等需求表	二,二三六,一三〇
	第四表	空军武器弹药燃料等需求表	二六,六〇五,一五七
	第五表	各种铁丝数量需求表	六四〇七八
以上五表价格总计美金八千八百四十一万七千八百另五元			
第二类	共十表内容:请扩充伊宁航空学校,所需教育兵器器材油类等表,因内容琐细,故从略。		
第三类	只一表内容:请求加派顾问,与兵器供给问题无关,故从略。		
第四类	共五十三页内容:请接济兵器原料及半成品表,其总价格计美金三千万。因内容琐细,故从略。		

附：驻苏大使邵力子提出之修正总表

第四批向俄订货种类数量及价格概计总表			
项 目		总 价	附 记
一	野战军用械弹	六七,二五六,八八〇美金	见分表一
二	高射兵器	二二,二八一,〇〇〇	见分表二
三	战车用之拖车及装甲车等	三,二三六,一三〇	见分表三
四	空军用之飞机炸弹油类等	三七,五〇〇,〇〇〇	见分表四
五	总 价	一二九,二七四,〇一〇	
备 考	<p>修正表与原表不同之点如下：</p> <p>一、原表拟订购兵工材料美金三千万元，嗣接贺主任本年一月八日由俄来称，俄方对于兵工材料，不能以借款抵帐。当复电“如俄不能供给兵工材料，则原定订购兵工材料之美金三千万元，改订购十五榴弹炮(九六)门，每门配弹二千发，一三二公厘高射机枪(八八〇)挺，每挺配弹五千发，步枪八万枝。”</p> <p>二、原表一所拟订购步枪十五万枝，依照前项增订八万枝，合为二十三万枝。原表无一五重榴弹炮一项。依照前项增订一五重榴弹炮九六门，炮弹一九二,〇〇〇发。</p> <p>三、原表二所拟订购一三二公厘高射机枪四四〇挺，依照第一项增订八八〇挺，合为一三二〇挺。弹同。</p> <p>四、以上共增订约美金三〇,〇二五,四四〇元，合与所移兵工材料价款三千万元大略相符。</p>		

(《战时外交》(二)^①,第530—534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转报 向苏联订购之汽油数千吨已运抵惠远、 哈密致孔祥熙代电

(1941年9月9日)

行政院孔副院长、军政部何部长、航委会周主任勋鉴：据苏联商务代表巴固林九月五日称：(一)贵国数月前所定购之汽车汽油二千五百吨，及机油一百五十吨，于九月一日前运抵惠远(距伊宁四十五公里)者，计汽油九三七点三吨，机油九九吨，余数可于十月内交清。(二)上项油料交清后，莫斯科方面已允设法执行其他油料定单，惟在数量上，尚须考虑。(三)飞机汽油三千吨，业于七月一日前运抵哈密。(四)伊宁学校所定之器材及汽油，可于九月底全部交清。(五)关于飞机配件之定单，俟伊宁学校之定货交清后开始执行等语。希知照，中正佳。成川侍参。

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九日发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代军事总顾问古巴列维赤 关于“中国各战区防御工事概况报告书”

(1942年8月)

[总结论前删]

总结论：

(1)于分析自由中国本年内之防御情形后，觉其防御力量，较之三十年，已大见进步。

(2)惟除其一般成就外，亦不乏有若干足以影响防御力量之缺陷：

甲、迄今于某数防区内，工事仍保持线式配置（尤以七战区为甚），抑且纵深不足（如第一战区之河防，第三战区之沿海阵地，第三十四集团军、第四战区及第八战区之工事）。

乙、各据点与一般防御何系之割离，据点间缺少火力及机动之协同，形成孤立，只可单独作战。如斯自难持久抵抗（如兰溪、金华、衢州等地）。且各据点并未依防线而构筑，而系按方面筑成者，兼以相互缺少协同，故极易被敌迂回（如四战区三战区）。据点之间，空隙过大，理应构筑中间工事或阵地，以联络之。

丙、各战区皆力求工事数量之多，而忽略其技术上质的设备。

丁、对于城防，只构筑距城三——五公里之防御地带，使城市易受围困，且难免敌炮火之危害。城市本身之防御，不应与其外围防御阵地分离，应视为防御之整体。城防外围防御阵地，应移距城七——一〇公里。

戊、军队往往不知自己之防御工事，且常不能迅速占领之（例如

三十年十二月,四战区一三一师之三九一团,举行演习时,核团之两连占领阵地,曾费三小时之久,但按地形,二三十分钟即可完毕)。

己、各战区事之伪装,一律欠佳。

庚、障碍物多不能与防御火网协同,技术上欠强,抑且型式一致,过于简易,应加强前缘及纵深内之障碍设备。为加强中国之防御,职兹谨向钧座呈供以下之建议:

1. 令各部队长,对其所担防区之工事,负保管及经常完成战斗准备之责,无论进攻或换防时,工事之移交,皆须填具清册。

2. 令各战区工程处,依所定期限,核计所修之工事,督察工事之状态,不仅报告修理之必要,并报告部队使用之玩忽情形。

3. 以部队作防御演习时,只可于业已竣工之阵地行之,可举行演习,紧急集合,使部队练习迅速占领其所分配之防御工事。

4. 为加强防御力量,密切防御地带内各重点之协同,构成纵深内之机动,须在各防线及阵地间多筑中间阵地及侧防阵地。

5. 各战区工兵指挥官,应对军队所构筑之工事,负技术上之质的责任,而由工兵总指挥负工事素质之总责。

6. 应多利用爆炸物,如掷石地雷,制时地雷,触发地雷等,以加强障碍设施。

7. 责令工兵总指挥,以各项应修工事,负计划指导及技术上之全责。对于主作战方面工事之构筑,工兵总指挥,尤应躬亲监督之。

谨呈

委员长蒋。

代理总顾问

古巴列维赤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致外交部交际科笺函

(1943年5月24日)

接奉五月二十二日大函，嘱抄寄苏联军事顾问全体名衔，以供参考，自应照办。兹特抄附该名单一份，随函送请收为荷，此致
外交部交际科

附名单一份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秘书室启

五月二十四日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所属苏籍顾问及教官名册

姓名	职务	备考
古巴列维赤	军委会代总顾问	
骆道巴巴	通信兵监顾问	正签办中
日列兹内	炮兵监顾问	
骆巴新	兵工署防毒处顾问	
司威威柯巴	军医署顾问	
密哈罗夫	第九战区长官部顾问	
司柯林柯	同上	
伊万诺夫	第二战区长官部顾问	
包格丹诺夫	五战区长官部顾问	
克林秋克	八战区长官部顾问	

续表

姓 名	职 务	备 考
得米特连柯	陕滇八战区副长官部顾问	
亚阔乌略夫	同上	
斯克雷巴	西安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顾问	
塔拉先科	同上	
斯米尔诺夫	陆军大学顾问	
皮罗高夫	航委会防空总监部顾问	
安得列也夫	第九战区顾问	
司克沃尔错夫	第一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基和米罗夫	同上	
节林柯夫	第三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贝赤柯夫	同上	
别洛夫	第三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刘德金	同上	
奥维赤金	第九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郭瓦略夫	苏籍总顾问办公室技术员	
包博夫	第三十一集团军顾问	
波尔特诺夫	第七战区长官部顾问	
褚利罗夫	第一战区长官部顾问	
喀喀林	第六战区长官部顾问	
格利高里也夫	第四战区长官部顾问	
拔夫雪车夫	第三战区长官部顾问	
特拉夫尼柯夫	第九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索罗金	苏籍总顾问办公室技术员	

续表

姓 名	职 务	备 考
司米尔诺夫	同上	
奥西波夫	同上	
益万诺夫	军训部顾问	来渝途中
费尔柯	同上	同上
乌卡列维赤	正商定中	同上
蔡尔宁柯	正商定中	同上
别图霍夫	同上	同上
乌沙柯夫	苏籍总顾问办公室技术员	
柯里瓦哈	第六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别敦	苏籍总顾问办公室技术员	
褚布略柯夫	第五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考斯特略夫	同上	
卡尔布兴	第八战区副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瓦良纽克	第一战区顾问	
瓦西里也夫	第三战区顾问	
茹拉乌略夫	第四战区顾问	
多布隆诺夫	第五战区顾问	
阔罗别尼阔夫	同上	
崔木柳阔夫	第六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车尔诺怕托夫	第八战区长官部顾问室技术员	
沃罗比也夫	第九战区顾问	
米利肯	后勤部顾问	
卡别罗夫	第三十四集团军顾问室技术员	
叶林斯基	同上	

续表

姓 名	职 务	备 考
成都区		
帕尔霍棉科	上校代理空军首席顾问	
依万诺夫	中校轰炸顾问	
巴拉鲁也夫	少校驱逐顾问	来华途中
卡扎柯夫	中校机械顾问	
拉维叶子基	首席顾问秘书	
叶先柯夫	无线电员	
梅子林	同上	
伊宁教导队		
喀热夫尼柯夫	中校教导队副队长	
马克也夫	少校轰炸教官代理参谋长	
谢基略夫	上尉第一中队中队副	
格鲁季宁	上尉第二中队中队副	
马里亚年科	上尉第三中队中队副	
施克瓦尔金	医官	
卡拉别衣尼可夫	通信教官	
萨莫杜洛夫	仪表教官	
结连阔夫	战术教官	
怕夫连阔	第一中队教官	
魏列且颜阔	机械教官	
连仁	机械教官	
别俩也夫	机械教官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 查对中苏第三次信用借款项下 援华物资的签呈

(1944年10月2日)

查关于苏联政府在中苏第三次信用借款项下，于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间运交我国政府军用器材二批(货款及手绪〔续〕费合计美元五〇、六四四、〇六一·三六元)之查对，事前于本年二月签奉孔副院长批示：请钧座主持召集各接收物资机关负责人开会商讨，切实查对，以便补行签字手绪(续)。旋于三月三日在军事委员会议厅开会，钧座派项副秘书长雄霄主持，当经根据苏方货单逐项研究，分别交由接收该项物资之军政部交通司、军政部兵工署、航空委员会暨交通部等机关切实查案核对。数月以来，本会迭次催请各机关迅将查对结果送会，以便汇报，并与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往返查询多次，兹将查对结果分陈如下：

一、兵工器材部分 业由兵工署照原货单接收无讹。

二、汽车器材部分 原货单列汽车三百辆，汽车零件六套，据军政部电告：汽车三百辆已照收，但汽车零件则接收(89)箱，未识六套是否即(89)箱，经本会查询苏驻华商务代表处，苏方亦未能具体答复。

三、航空器材部分 航空委员会照原货单核对结果，大部分已验收无误，但仍有一小部分未能查核清楚，如飞机少收三架，飞机零件及飞机用油，实收数量与原货单未尽相符。

四、汽车配件部分 原货单列有汽车汽油一千零二吨,但据交通部电称:遍查案卷,并未收到此项汽油。综计我方业已查明收到之器材,其货值及全部手绪(续)费用,合共美金四八、九八二、〇五一·七八元,尚有美金一、六六二、〇〇九。五八元之器材,未能查出,此项未能查出之器材,其货值约当全部货值百分之三·二八。嗣我方询苏方之请,允在核对完竣之前,先行洽议偿债物资,刻正由本会与苏方磋商偿还此项债款办法。惟查该两批器材,早于两年前运交我国,虽经我方各机关数月来查明已收到者达百分之九六·七二,但此项债款之认偿债务书,迄未签字,苏方屡来催请签字,以完成法定手续,我方则以尚未查对清楚,答以稍待,若照目前情况推测,恐非短期间可能查对完毕。复查中苏双方交收器材,尚有双方签证之收货记录各一份,苏方亦称该两批器材,当时有我方签字之收货记录存莫斯科,我方所以迄未查对清楚,即因无此项收货记录,设有此项记录,则无须查对,即应在认偿债务书上签字矣。我方曾请苏联驻华商务代办处向莫斯科查抄一份,苏方未允,并称我方应有此项记录存卷,而我方则遍查无着,继续查对,则不知何日方可完竣。在中苏邦交亟需增进之现阶段中,此案似应迅谋解决,免盟邦以口实。拟恳钧座召集各接收物资机关高级负责人开会重加研讨,切实查对,万一我方因案卷不全,无法查对,亦应商定办法,以便早日签订认偿债务书,而结束此数年未决之悬案。是否可行,理合签请

鉴核示遵。谨呈

总长何

周象贤谨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汉口苏联空军烈士墓

……1951年，武汉市政府在汉口中山大道原“万国公墓”内埋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骨骸处修建了烈士纪念碑；1956年3月，又将烈士遗骸迁到汉口解放公园，重新修建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陵园。

这座占地约150平方米陵园的正中，竖立着高达8米的纪念碑，碑的正面刻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背面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志愿队烈士们永垂不朽”的题词。纪念碑后约15米处是烈士公墓，墓高约3米，宽4米，长约30米，墓上种有七棵柏树。墓前一排大理石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刻着碑文和十五位烈士的姓名、出生年代、牺牲时间。

碑文是：

1938年，当中国人民正遭到日本法西斯疯狂侵略的时候，苏联人民无私地派遣了自己的优秀儿女——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到了中国，援助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的正义的斗争。

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人民一道在反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创立了无数的英雄战绩。他们以武汉为基地，曾英勇地远征台北，猛烈地轰击过长江中的敌舰，并顽强地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在激烈的战斗中有许多名志愿队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重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队长拉赫曼诺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苏联空军志愿队的烈士们的鲜血和中国人民的鲜血溶结在一起了。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让这种属于工人阶级的高贵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发展和巩固着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烈士们永垂不朽!

一九五六年三月

大理石上,镌刻着苏联空军志愿队十五名烈士的姓名:瓦连金·谢尔盖耶维奇·考兹洛夫(1912年生,1938年2月15日牺牲)、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索茨基(1907年生,1938年2月15日牺牲)、乌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巴拉莫洛夫(1911年生,1938年2月15日牺牲)、莫伊塞·伊萨阿科维奇·基吉里什登(1913年生,1938年2月15日牺牲)、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师什洛夫(1908年生,1938年2月8日牺牲)、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马特维耶夫(1907年生,1938年7月16日牺牲)、伊凡·伊里奇·斯图卡洛夫(1905年生,1938年7月16日牺牲)、德米特里·费奥法诺维奇·库列申(1914年生,1938年8月21日牺牲)、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1914年生,1938年7月9日牺牲)、乌拉基米尔·格拉西莫维奇·多尔戈夫(1907年生,1938年7月16日牺牲)、列昂尼德·伊凡诺维奇·斯柯尔尼亚科夫(1909年生,1938年8月17日牺牲)、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古里耶(1909年生,1938年8月12日牺牲)、柯西扬·柯西扬诺维奇·楚里亚科夫(1907年生,1938年8月12日牺牲)、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泰列霍夫(1907年生,1938年8月12日牺牲)、伊凡·尼科诺罗维奇·古罗夫(1914年生,1938年8月3日牺牲)。

(刘济普、刘颖撰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7期)

在华使命(节录)

[苏]崔可夫

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在白俄罗斯指挥第四集团军。

1939年8月苏联政府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解导致这一事件的事实。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首的慕尼黑协定的妥协者们企图靠牺牲苏联来摆脱战争。他们认为,在西欧,希特勒只限于恫吓和佯攻,而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东方,指向苏联。慕尼黑勾结的参与者们力图推动法西斯德国同我国开战,他们首先把奥地利,然后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法西斯任其践踏,现在轮到波兰了。西方大国以为,希特勒向东方推进,将力求建立同苏联的共同边界,以便准备侵入苏联境内。

当提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的时候,苏联不只一次地提出了制止侵略者的建设性建议。红军准备前往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但是,法西斯侵略者的英法袒护者们竭尽全力阻止红军的援助。假如没有慕尼黑勾结,而英国和法国宣布动员,假如波兰开放边界让红军通过到德国边界,那么,侵略者就将受到夹攻,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根本就不会发生,或者完全是另外一种发展。德国总部不可能不从历史知道,两线作战将导致什么结果。

1939年夏,希特勒首先对波兰施加外交压力,然后转而进行直接威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危险迫在眉睫。英法“调

解人”准备向侵略作出新的让步。尽管法国和英国对波兰有条约义务,但是,没有认真对待,它们的承诺一文也不值。波兰的沦陷将严重破坏欧洲的平衡。这不仅使法国和英国的社会舆论感到不安,而且使许多有影响的实业界人士感到不安。那时,希特勒估计,慕尼黑的妥协者们这一次也将让步,他还看到,没有采取反对他的任何实际步骤。虽然1939年春天在莫斯科开始了英法苏三国谈判,但可以看出,这次谈判将归于失败。现在已经公布了所有有关这次谈判的文件,而我们那时只能猜想,英国和法国不会认真对待谈判,他们进行谈判只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舆论认为在他们进行谈判的幕后隐藏着把波兰拱手让给侵略者的计划。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开始进入波兰。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然而,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也不打算采取军事行动。从那时起就此写了不少书、回忆录、历史研究著作。我是个战士,习惯于直截了当和没有外交辞令地说实话。我们亲眼看到,和慕尼黑妥协者们的谈判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他们不打算和希特勒开战,而宣战以后就期待德国军队和红军发生武装冲突。

在这种局势下,只有苏联政府才能关心我国边界的安全。各部队接到了开赴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领土的命令,以便从法西斯占领下把我们亲如手足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拯救出来。我指挥的是应该挺进到布列斯特的第四集团军。

这次进军同作战行动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人民欢天喜地地欢迎我们。坦克和汽车全被鲜花所覆盖。牧师和天主教徒带着圣像和神幡出来迎接。红军所到之处,就把法西斯的道路封锁了。

我们就停在大约与波兰人民共和国现在的边界布格河^①东

^① 苏联与波兰的界河。——译者注

岸。虽然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我军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谁也不相信,希特勒会遵守什么条约,如果他看到,破坏条约对他有利的話。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和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知道,希特勒从上台的时候起就教育他的喽罗们野兽般憎恨苏联人,憎恨共产主义,憎恨俄罗斯的一切。也是用这种精神教育多年准备用来进行东征的军队的。我们等待任何挑衅。然而,当希特勒分子需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倒很善于做表面功。

我们的指挥员要经常到德国参谋部去确定分界线。他们受到一本正经的接待,他们的要求也得到认真考虑,符合协定规定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德国士兵对红军战士表现出最大的友善态度。当然,这种友善态度是故作姿态而已,有时甚至表演得相当拙劣。但是,德国士兵没有挑衅行为。

我们当中很少人相信他们友善姿态的真誠性。我们相信我党的英明政策,相信自己的力量,尽量表现克制,而同时加紧构筑防御那些可疑朋友的工事。我们谁也不怀疑,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和约是暂时的、不得已的事情。我们必须推迟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它准备为反对我国而同法国和英国搞任何勾结。我们要尽快沿新的国界修筑工事。

与此同时,德国指挥部把军队从东部边界调往同法国交界的地方。如果法国和英国,确切些说,这两国的统治集团要与苏联签订协约反对侵略者的話,那么,1939年9月还为时不晚。

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开始在西部进攻。德军破坏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中立。实际上这是绕过“马其诺防线”的可能方向。只有在这里德国总参谋部能够指望靠突然袭击和大规模运用坦克来开展运动战。但是,接踵而来的打击是穿过比利时进攻色当,越过阿登^①。我吃惊地读到了报纸上关于这些事件的

① 法国北部与比利时交界的一个省份。——译者注

报道。山路把德国坦克纵队置于盟国空军的袭击之下。坦克在山路上丧失了机动的能力。但德国坦克师团竟然毫无损失地通过阿登并强渡了马斯河,这个地区是大炮从“马其诺”防线阵地可以直接打击的。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几天之内,盟军的防线就被突破了。没有一个地方给德军以认真的抵抗。原来,希特勒从一开始就不但指靠军事实力,而且指靠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形势,估计到慕尼黑妥协者们的虚弱抵抗。

我们了解,法国士兵是勇敢的,我们也尊重英国士兵。在敦刻尔克战役后没过几个月,英国飞行员就显示了他们的本领,赢得了不列颠岛上的空战。不,在法国的悲剧中我们不能责怪盟军的士兵。

在德国军队进入广阔的战场以后,法国各条战线形成了灾难性的形势。各条战线被分割切断,开始出现混乱和恐慌,各大兵团失去了联络和指挥。经过六周时间,希特勒就在对法战争中获得了行动自由。大不列颠群岛被置于打击之下。德国报纸越来越加紧对英国发出威胁。我们的侦察机关从各个渠道获得情报:希特勒准备跨过英吉利海峡。现在,在战争之后,这次战役才以“海狮”战役为人所知。

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不相信希特勒会跨越英吉利海峡,因为他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船只;在没有赢得制海权和制空权以前,他不会去冒这样的险。我们没有受希特勒宣传机构和假情报机关的骗。我们认为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说法是希特勒为了准备进犯我国而散布的烟幕。情报通过波兰边界频频传来:在维斯拉河与西布格河之间以及毗邻地区正在有计划地结集德国军队。战争迫近我国土地了,而还需要做非常多的事情来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还要解决不少国际性难题。

我国远东边界也不安宁。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中国东北各省以后,就把这些省份变成进一步向中国推进的跳板,同

时也是进攻苏联的跳板。日本军队驻扎在满洲与我国边界直接毗邻的地区。1937年7月日本黠武主义者侵入华北,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掀开了新的血腥的一页。我国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援助和支持,给中国派去了志愿空军人员、军事顾问专家,送去了军事技术装备。日中战争具有持久性质。

1938—1939年,日本黠武主义者在哈桑湖地区和哈勒欣河向我们进行武装挑衅。这一方面是要试探红军的实力,另一方面向我们施加武装压力和迫使我们放弃援助战斗中的中国。我们那时明白,这还不是战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斗侦察”。但是,两线作战已成为对我国的现实威胁。

1940年秋,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紧急召见我。最初,我不认为,这次召见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国防人民委员经常召见集团军司令,以便掌握各兵种和军区战况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当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的时候,立刻明白了,将对我进行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国防人民委员向我宣布,党中央委员会和他本人都认为,必须派我到中国去。这次谈话的许多细节我都已忘记了,但主要内容是记得的。国防人民委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苏联政府不相信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是可靠的,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希特勒正在作东进的准备。苏联政府和国防人民委员部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反对我们将不是单独的。那时,1940年秋,铁木辛哥几乎完全勾画出了希特勒军事集团的组成: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

“关于这些国家是没有疑问的”,他继续说道,“我们关注土耳其可能采取的立场,对日本尤为关注。远东——这是个不容易啃的坚果,是不能一下子就咬得动的。即使不如此,我们也必须在那里保持强大的阻截部队,以防止日本可能的进攻……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由于交通线漫长将产生巨大的困难……日本是与德国进攻危险相关的主要问题……”

国防人民委员给我勾画了日中战争各个战场的军事形势。日本军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企图迅速取胜。但是,他们没有取得闪电似的胜利,他们的军队陷在中国,并且看不出哪里会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决定性转折。国防人民委员给我列举了每年在华日军人数的有趣材料。例如,1937年,在华日军有二十六个师,总计八十三万二千人。到1940年秋天,师的数目增至三十五个,而人数增加到一百一十二万。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升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增派军队并没有给日本人带来明显的效果。这一点从当时的报纸上也看得很清楚。

人民委员对我说:“可以预料,日本军国主义者可能将倾其全力要么在1941年内战胜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么用和平谈判来收缩军事行动……他们需要在希特勒出兵攻打我们的时候腾出手来,即充分作好一场大战的准备,以解决自己在东方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击退日本的侵略……我不认为,蒋介石军队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持久战最终将给中国人民,而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带来胜利……我们可以把1941年看作是这场战争中危机的一年。要么中国人民能够坚持住并且击败日本军队要完全控制局势的所有企图,要么蒋介石在遭到重大失败以后可能屈从于日本侵略者企图,强加给他的和平条约的苛刻条件……您的任务是:摸清蒋介石阵营的情况,估量蒋介石的实力并利用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权利使中国军队积极作战……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给蒋介石以军事援助。应当积极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

我不能认为对我的新任命是出之偶然。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中国问题”对我来说并不是突兀的。确实,从我去过中国之后已经过了十多年。那里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许多情况还象我曾工作的那些年代一样依然如旧。

国防人民委员还向我介绍了对我新任命的上任步骤。决定首先派我就任驻中国政府的武官,接着,待我熟悉了情况以后,再任

命我为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即中国军队总司令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在这次谈话时，我从国防人民委员那里得知，苏联政府正为中国提供巨大的武器援助。但是，这些武器不总是得到应有的使用。经常在中国人失利的战斗中这些武器被日本军人作为战利品拿去。我的任务不仅是帮助中国司令部管理军人——教会他们按照最新的战术要求使用现代武器，而且，作为武官和总军事顾问，我的任务还要遏止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军队和对共产党人控制的游击区抱有的黩武图谋。换句话说，就是阻止蒋介石打内战，使他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反击侵略者。人民委员对我说，中国红军司令部也热衷于把枪口对准蒋介石，而不考虑它可能会使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遭受什么样的危险。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

由于我了解中国军阀和蒋介石的本性，我知道，协调蒋介石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一件最复杂和最微妙的差使。

征得我同意去中国以后，铁木辛哥要我跟他走一趟。他的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我明白，党中央要对我进行严肃的谈话。但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竟会同约·维·斯大林本人见面。

我们穿过几道长长的走廊来到斯大林的会客室。他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报告了我们的到来。这是我第一次亲自见到斯大林。在这之前，我只是在观礼台上看见过他。而现在，我们却只相隔几步！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不失分秒地立即问我：

“可以认为，您同意到您熟悉的国家去吗？”

“我同意去您命令我去的任何地方！”

“不要急于这么说！还是应当考虑一下命令您所去的地方。”

斯大林转到桌旁并请我们坐下。

他继续说：应当考虑一下，要作些准备。您在二十年代去过中国……当时是一种情况，而现在是四十年代，今天又是一种情况。

那时,国民党以孙逸仙博士为首。他是一个心灵纯洁、道德高尚的人,他无限忠于本国人民的利益。那时,我们刚刚同他建立联系,尽管我们有种种困难,仍然尽一切可能无偿地援助中国革命。而今,中国的掌权者已不是那些人了,国民党也不是孙逸仙时代的国民党了,蒋介石和孙逸仙相比,无异乎小猫和老虎。现在,中国已有了新生力量——共产党……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日本资本无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封建主和农民群众都在蒋介石一边。跟共产党人走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您去过中国,应该知道,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大大不如中国农民阶级。中国的农民也世代遭受非人的压迫。中国农民受尽压迫和折磨。和工人相比,农民是懦弱的。但在人多势众时,他们能创建大业,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中国共产党也正是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远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方面打下烙印。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

斯大林讲话不慌不忙,认真思索每一句话。每个字他都讲得很清晰,每说完一句停顿一下,好象是在请我们反驳,如果我或铁木辛哥有什么疑问的话。当然,问题是有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我要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是到中国红军中去?但是,在这次谈话中用不着提问题。斯大林猜想到了许多问题并且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提问时就作了回答。他点燃烟后,继续说:

“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

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您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同日本人是不能联合的。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谈话间，斯大林几次站起来，离开桌旁，停在我和铁木辛哥旁边，继续发挥他的思想。

他说：“不要以为，法国溃败后，西方的妥协者会退出舞台。就在目前，甚至在英国人民如此困难的时刻，对侵略者持绥靖态度的人还往返于柏林和伦敦之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准备作出新的让步，只要侵略者调转枪口打苏联就行。由于希特勒在欧洲和日本对蒋介石军队轻而易举的胜利，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晕头转向起来。他们以为，如果日本人粉碎蒋介石，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便能左右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他们大错特错了。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者我国和西方大国拒绝援助他时，那他立刻就会效法汪精卫，寻找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途径。那时，他们会合力对付中国共产党，而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任务规定得清楚明确。斯大林要我不得泄露谈话的内容。或许,这是不必要的提醒。我是个军人,十九岁就当团长,懂得什么是军事机密和国家机密。斯大林对我的提醒只不过是进一步表示给予我的高度信任,也表明要完成交给我的任务并不容易。

给了我一些时间准备就任新职。为了搞清1940年年底中国的局势,我只好到各机关和各人民委员部去着实辛苦一番。特别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给我提供机会,以了解作为我国对华政策基本原则的全部文件。

我一边翻阅文件、原始资料,一边回忆在中国看到过的一切、接触过的一切。我应该承认,我对这个国家知道得很少很少。

并且,我从经验中体会到,多少世纪以来的老传统在这个国家人民生活中起着如何巨大的作用。旧制度压抑着各阶层人民。中国人民刚刚从千百年的沉睡中苏醒。

我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多么矛盾和多么复杂。执政党——国民党是一个由互相敌视同时又互相依存的各种军事政治集团拼凑起来的大杂烩。与国民党并存的是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同反动派作斗争。蒋介石被迫和中国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反对外来敌人。不用说,我关心这个联盟在抗日方面到底有多少成效这个具体问题。在艰苦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策略和战略。毫不奇怪,这可能铸成一系列错误,偶然走运的人可能钻进党内并且把党引向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当时,这些担心还没有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尽管我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满着大小派别斗争。

我一遍又一遍地考虑即将面临的工作。须知我是到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信任的人(我指的是蒋介石)那里去,是带着帮助他同进攻他的国家的侵略者作战的任务去的。看起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但我们知道,蒋介石是同他视为主要敌人的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抗日的。我是到一个经纪人,到一个在适当时机毫不犹豫

地出卖自己祖国和人民的货币兑换人那儿去。去教他爱国吗？不是。我是去帮助中国人民把外国强盗赶出他们的国土。

有人说，好一个大慈大悲的恩人！难道不是为了苏联的利益才借中国人的手打日本吗？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我都听到过这种说法。然而，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一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蒋介石的假牙

研究关于中国局势的文件和材料要占用很长时间。但是，已经催我上任了，定于1940年12月动身。我的前任，驻华武官雷巴尔科已被召回莫斯科。

坦率地说，我是带着复杂的心情到中国去的。第一，我估计，主要军事政治事变将发生在我国西部边界。自然，我希望把自己的指挥经验运用在这个主要方面。况且，我要离开家小，那时，正值我那刚出生的女儿伊林卡重病。我安慰自己，心想：即使在中国极其复杂的形势下我也能够成为有益于祖国的人，尽管重庆当时是远离主要国际中心的偏远之乡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然而，我错了……

按照礼宾程序，我动身之前应该拜会中国大使和中国武官。这是毫无目的的纯礼节性拜会，根本不指望从中国外交官那里了解中国局势。恐怕，他们自己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也知之甚少。诚然，根据中国武官的暗示可以明白，中国大使馆对国内事态的发展忧虑不安，最担心的是政治形势，首先是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和我一起去中国的有十五名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遗憾的是，他们当中谁也不甚了解中国，谁也不会汉语。从军事素养看，可以认为我们一行是训练有素的。在把我们派往中国的同时，苏

联政府给蒋介石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一百五十架战斗机、一百架快速轰炸机、将近三百门炮、五百辆吉斯—5型汽车以及相应的装备和备件。

1940年12月,我们一行乘火车由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经过五昼夜的行程我们才到达哈萨克斯坦的首府。从那里到重庆只能坐飞机。由于天气不宜飞行,我们等了好几天。在那时,这条航线被认为是一条最难以飞行的航线,而在那些地方,十二月是下雨、起雾和降雪的月份。但是,任何等待都有尽头。终于,有了好天气,我们乘坐的飞机起飞了,尾随其后的是二十架快速轰炸机,由我们的飞行员驾去归蒋介石调用。整个飞行大队跨过高山,越过我国和中国的边界,在新疆石河子的不大的一个战地机场着陆。在这里又耽搁了。大雾又封住了山隘。总算又等过去了。新的航程又遇到新的困难:我们飞机的机翼因受冻不灵活了。幸运的是,几小时之后我们在甘肃省省会兰州着陆了。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军在机场迎接我们(中国的战区类似于我国的方面军,在后方,相当于军区)。机场上有欢迎仪仗队。一切都表明,朱将军大概事先就得到了我们到来的通知,并且得到了相应的指示。从此刻起,开始了我在中国的外交生涯。

从我们到达的头一天起就开始和朱绍良将军交谈,举行一次又一次的宴会,进行礼节性拜会。朱绍良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属于黄埔军官学校中1927年4月帮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那些军官之列。蒋介石把守护连接中国和苏联的唯一陆路和空路的部队交给他指挥。这些部队是保卫新疆的屏障,并且从东边形成了对共产党特区的包围。朱绍良监视着不让我们的人和武器进入特区。

我试图从好客的朱将军处了解中国的局势怎么样,他在远离内地的这个地方对日中战争进程的看法,他打算怎样进一步抵抗侵略。而朱绍良却切望了解关于苏联西部边界形势的第一手情

况，摸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政权态度的底。一句话，两个外交官在十字路口邂逅相遇并决定显示一番各自的外交才干。

若是有谁天真地认为，中国官吏的笑脸是友好和坦率的表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人们说，外交官的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意图。朱绍良将军不是外交官，但他善于隐瞒自己的意图远远胜过最精明的欧洲外交官。无疑，他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有捞到。我颇能守口如瓶，或许有点失礼地回避单刀直入的问题。而朱将军口若悬河，笑容可掬，极尽殷勤，频频斟酒——中国的烈性白酒……

相互拜访持续着。机场值勤人员的报告天天一样：天气不宜飞行。我们苏联的飞机业已返航。根据协议，应由中国飞机将我们使团从这里载到重庆。蒋介石理应迫不及待地盼我们到达，何况我们给他带来了大批军火。但我们的飞行员却暗中告诉我们说，中国人在借天气搞鬼。耽误显然并非因为天气，但也不是这位地方将军对苏联代表团进行试探！

对这种情况不能任其下去，也不能闲坐空谈。我不得不直言不讳地对朱绍良将军说，据我所知，天气是适于飞行的。就一切情况判断，影响代表团起飞的不是天气。朱将军对我得到了有关天气的情报非常懊丧。

当时我还得到另一些消息。诚然，那时在兰州我还无法估计到这些消息的悲剧性。我们的领事获悉，蒋介石正在共产党控制的特区附近进行可疑的军事调动，对蒋介石司令部调动军队的意图尚未摸清。领事甚至表示耽心，蒋介石是不是在准备重新激化内战。但在莫斯科我没有听到任何类似的情况。我们的军事顾问从重庆发来的报告亦无这种估计。我的脑袋里不曾想过有这样的侵犯意图。我只知道，当他得知我国再次援助军事装备时，他非常高兴。前方战局对他是不利的。和特区的共产党军队打仗不但使他难以抗日，而且使其军队的物质供应完全置于极大的困境之中。苏联政府将因此而停止军事供货。

我坚持立即飞往重庆。我想对了：正是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部使我们阻留在半途中……

从重庆来了一架三座位单引擎飞机接我和我的助手戈列夫。欢送跟迎接时一样隆重。中国飞行员以极其高超的本领驾机穿过难以通行的山谷。机翼上几次结冰，而飞行员熟练地将飞机降入暖流气层，使冰融化。我们看到了从机翼上脱落的冰块。

到达重庆以后，我和戈列夫从飞机场径直前往大使馆。在这里我首次会见了我国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从那时起差不多过去了四十个春秋。潘友新在世以前的所有岁月里，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未中断过，尽管在中国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当时，潘友新年轻，精力充沛。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以后他便踏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在我到达之前他已了解了情况，熟悉了中国，掌握了这个国家各种力量的状况。他善于猜测中国当权者的意图，同许多人认识，准确地评价他们的性格、能力和爱好。

我结识了武官处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我们所有在重庆的军事人员的工作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武官处和军事总顾问之间也没有有机的业务联系。大家都直属于中央，直属于莫斯科。

我的副手罗申上校非常精明果断，通晓中国，他同中国人，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建立了可靠的关系。

翻译安德烈耶夫是个好专家。他精通汉语，英语也不错，善于和中国官员、许多部和部门的进步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同他们的关系好得可以说超出礼节。罗申和安德烈耶夫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研究中国局势方面都帮了我的大忙。工作人员别德尼亚科夫、彼罗夫也很了解情况，工作大胆，不坐等特别的指示，随时都表现出合理的主动性。

我们是在1941年元旦前夕抵达重庆的。当天晚上我出席了蒋介石为我们顾问举行的新年宴会。我体会到，蒋介石本人希望

尽快会见我，以便详细弄清楚，苏联给些什么援助，怎样才能迅速拿到这些援助。此外，他对欧洲的事态发展很感兴趣，他竭力从我这里挤尽我所知道的一切以及我国政府怎样估计局势。我对这些问题都有所准备，因此，没有特别强调我国边境的局势，谈得更多的是希特勒在西欧，尤其是与英国没有解决的难题。

和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第一次会晤和交谈是短暂的，主要是礼节性的，但毕竟对蒋介石本人的首次印象是深刻的。他是个个子不高而又瘦小的将军，穿一身没有肩章但有能区别军衔的领章的普通军装。他有一对黑眼睛，目光狡诈，还有两排十分显眼的假牙……他禀性凶狠，不惜踩着别人的尸体，用讹诈和欺骗的手段去追求既定目标。老百姓中间传说，蒋介石把“老虎牙”放在枕头底下睡觉。他经常大声说“好！”，“好！”，闻之刺耳。

正如我已说过，在我第一次正式拜会蒋介石的时候，他最关心的是欧洲的形势和苏联的军火供应。他言谈中流露这样的意思：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行善的施主，我的友谊，至少，我的中立，在希特勒军队扑向东方时，对你们是很有用的。

我坚定地对他解释说，苏联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奉行和平政策，苏联政府将竭尽全力来避免卷入任何方面的战争，苏联对德国也满怀最大的和平愿望。但是，如果希特勒突然发疯而侵入苏联领土的话，那末，他将遇到的是训练有素的军队，遭到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到过的反击。蒋介石故意装着难过地说：

“法国。谁能想到，法国和英国军队将在几个星期内被击溃……”

他对欧洲的命运满不在乎，但却感得到他对希特勒的好感。这可以从他说上述这番话的口气中听得出来。我回答他说：

“如果不绕过荷兰而从那里发动突然进攻，如果在阿登，当希特勒的坦克师团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空军给以打击的话，那末，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结束了，而且结果也会不同。”

“今天，世界上有三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蒋介石说，“这就是苏联、美国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言之，三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

我马上乘机问他中国为什么同日本打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再思考他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他的回答还引起我的思考。

“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蒋介石停了一会儿，补充说道。“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战争对中国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我反驳他说。

“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病也会死。”

我想，他可是个聪明人，这个中国佬不那么简单。是的，他当然不简单。从一个货币兑换者和小小的经纪人起家而篡夺了一个大国的权力！天才不光有善的，还有恶的。不，他不是某些神秘势力手中的傀儡，在这里，在中国他本人就是暴力，也只有用暴力才能摧垮他。不是用阴谋手段，不是用冒险的途径，不是用更迭政府的办法，而是用人民愤怒的波涛才能摧垮他。

不管怎样，到底是举行了蒋介石和苏联武官的正式会晤。

他得知我带来了些什么之后，便通过我转达他对苏联政府的谢意，并且建议我着手研究中国的形势。我当即请他下指示给我介绍前方战况。我得到了由参谋总部协助的保证。然而，任何一个中国高级将领都不急于让我熟悉情况。

给我介绍情况的是大使馆、武官处和军事总顾问的工作人员。当时马上就产生了看法上的不一致。我不想详谈分歧的细节。主要的是另一点。莫斯科认为，国民党不会激化同共产党的关系，一切不幸在于中国人在前方缺乏积极性。而在重庆这个地方，一切都显得更为复杂得多。

首先谈谈前方的战况吧。虽然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并且逐年缩小了装备上的差距,直到最近日本在各个战场仍然占上风。

军事委员会特别情报中心主任杨轩成^①将军很愿意和我交换在华日军人数的资料。应当说,中国的侦察机关工作得不坏。后来我核对有关在华日军人数的个人记录与官方材料时,几乎没有发现不同。日本侵略的加强和升级逐年的情况是:1937年在华日军为二十六个师,总人数超过八十万;1938年——三十个师,总人数九十七万六千人;1939年——三十五个师,总人数一百万人;1940年增加到一百一十二万人。如果加上倒向日本一边的中国军阀部队,那么,侵略军总人数达一百五十万人。一百五十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不能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抗日毫无作为。如果中国军队不抵抗,那么,日本就没有必要增加自己军队的人数,日军也将所向披靡,横扫整个中国,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

中国武装力量的总人数超过日军。中国军队打防御战,牵制了侵略者并捆住了侵略者的手脚。每向前推进一步或者每占一个新的地区都需要从日本列岛派来新的部队。更兼哈勒欣河战役的失败。在东北,日本被迫留驻大量关东军。

.....

对时局的分析

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尽管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终究只是我在重庆碰到的许多难题中的一个。要求我仔细分析战局,中日两国武装力量的对比,经济、财政以及其他情况。除了国内问题以外,我还要关心与中国对外政策有关的各种国际问题。上述每

^① 音译。——译者注

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有一连串的其他问题。例如,为了摸清中国军队的状况以及中国军队采取主动战斗行动的可能性,就不能忽视蒋介石同各个军阀集团的相互关系和各个军阀集团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但我经常关注的是两个问题:蒋介石对抗日问题的态度和日本在1941年的作战计划。

中国的全部军事组织统归蒋介石领导。他宣布自己是中国的最高统帅,而我们苏联顾问见到他时称他元帅,中国人则称他为委员长。对军队的指挥通过以何应钦为首的参谋总部来实施,他同时兼任国防部长。

1941年,在蒋介石指挥下的有290个步兵师和14个骑兵师,22个炮兵团,6个追击炮团以及其他各种部队。军队总人数为385万6千人。按人数,日军师几乎超过中国师一倍。而中国的某些军和师是只有番号的空架子。

1938年年底,颁布了普遍征兵法。根据这项法律,建立了省、师和团级的征兵区。根据这项法律,凡年满18岁到35岁的男子均在应召之列。

在所有战区都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仅有几个苏联记者,只有征得蒋介石本人的同意,才能放他们到那里去。我不只一次地请求蒋介石允许我国的飞机飞往特区,或运药品,或送毕业于我国军事院校的八路军指挥员、或送记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蒋介石,没有拒绝过这样的请求,但总是流露出一不满意的意。

从国外购买的或从国外的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他把由共产党管辖和领导的军队视为争权斗争的劲旅,因此在分配所得到的武器时,当然,什么也没有给他们。我作为武官自然不能干涉中国军队的武器分配。

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但缴获的武器不够用,况且共产党的军队数量在不

断增加。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为军队筹集经费和武器以及筹集行政政治机关的给养费。中共和八路军的侦察机关跟踪侦察,例如,他们侦察到国民党按照某些路线把钱和武器运到他们的军队驻地之后就由中共的特工队设法夺取这些钱和武器。许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们对此束手无策。

在根据我国顾问所拥有的材料研究中国军队时,我发现,国民党部队的配备、战斗素质及士气都非常低。大多数士兵是为混碗饭吃、混几个铜板花。

每个国民党士兵平均月饷 12 元,一天可吃到差不多一斤米饭。但是,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士兵们任何时候都享受不到足标准的物质给养,或者被偷光,或者因运输困难,粮食缺乏而减少口粮。他们全靠自己养活自己。例如,不时看到这样的场面:一群士兵在水田里捉小鱼和蛇,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他们极差的伙食。低水平的卫生条件,经常挨饿导致疾病和大量死亡,士兵有气无力,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淡然处之。例如在 102 步兵师,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患了疟疾。在给蒋介石的一份报告中供认:“部队的伙食很差,穿得也不好,军队部署经常不是出于战略需要,而是出于给养条件。士兵们忙于搬运稻米,到工厂干粗活,而不是从事军事训练”。

除了极差的物质保障外,士兵还受军官和下级指挥员的粗暴对待,经常遭体罚,伤员受虐待。士兵稍有过失,便遭棍棒毒打。吃苦耐劳、忍饥挨饿、行军的折磨、军官的粗暴态度,有时甚至是惨无人道的虐待——中国士兵这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精神只能令人吃惊。营以下的军官物质生活也得不到保障,穿得不好,四年左右不与家人见面,生活极端贫寒。

经常发生对国民党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事件。因此,以清洗“不良分子”为借口进行逮捕成了家常便饭。

国民党军队里营私舞弊盛行,侵吞公款成风。团长和师长根据花名册领取军饷,而花名册同部队和连队的实际人数相距甚远。他们甚至利用安葬发财。埋葬一个死去的或者阵亡的士兵上级要发相应的丧葬费,例如,买一口棺材要用十元左右。军官们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不立即把死者埋掉,而待有了十至十五个死人的时候集体埋葬。这样,军官领取购买十至十五口棺材的钱,而花去的只是一口棺材的费用。这口棺材的底又是活动的。把每一具尸体单独运到公墓,抽出棺材底板,尸体便掉进墓穴。空棺材又被运回去装下一个死人,只有最后一具尸体才和棺材一起安放到墓穴里去。就这样,军官们既勒索棺材钱,又顺便克扣死者的抚恤金,并且把死人继续当活人充数。

蒋介石和军阀们的关系远不是和谐的。军阀们形式上把自己的军队列入中国武装部队之列,归蒋介石统一指挥,但他们决不急于把自己的军队派往前线去和日本侵略军作战。象典型的军阀阎锡山将军这样的战区司令,只是形式上承认中央政府的管辖,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没有执行过蒋介石的任何一次命令。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官是为了阻止他倒向日本人,并且指派他从北面和东面封锁特区,正式把朱德领导的八路军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在西北,封锁特区的马步芳兄弟的军阀部队甚至不服从蒋介石,而紧紧抓住他们所控制的地区不放,靠盘剥老百姓来养肥自己。云南省省长龙云将军居然能从美国和英国为中央政府提供的资产中提取税收。

一切都说明,许多军阀的师团表面上归属中央政府,但没有任何作战价值。

中国人幸运的是,南方冬天不冷,因此不需棉衣和大造房屋。这减少了军队的开支。包括连长在内的军官也只是光脚穿便鞋。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连队在行军时,队伍的前面用轿子抬着军官,他们在行军途中可以在轿子里睡觉。走在队伍后面的是行军

医院,用担架抬着伤员。许多士兵患病疾。从我有机会参加的训练以及从士兵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来看,可以发现,军队有相当好的纪律、军风纪,并且吃苦耐劳。至于军事训练,那末,重点放在要人们机械执行荒谬的命令上。

对日本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中国军队的训练是不够的,并且缺少装备。中国军队可以打局部性的进攻战,这也要经过长期认真的训练才行。本可以顺利攻击包括师团在内的孤立无援的日本驻防部队,但交通闭塞和缺乏运输工具非常妨碍部队的机动。利用山峦起伏的有利地形,中国军队可以成功地进行积极的防御战。对积极防御来说,装备和兵力是够用的。这在后来日本军队于1941年发动攻势的时候得到了证明。

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分歧不能不影响它们军队的协同作战。大部分国民党将领和军官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急于和共产党军队配合作战。

由于我没有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保持经常性联系,我只能根据国民党的反应和在重庆的周恩来的活动来判断毛泽东的政策。但周恩来及其周围的人都守口如瓶。

蒋介石及其亲信对“反共(产国际)协定”^①坚信无疑。他们认为德国和日本进攻苏联只是个时间问题。在他们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减轻对中国的压力,这将使他们放手去对付共产党。我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对将加深。

重庆是中国的临时首都,位于多山的长江左岸,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在这里,长江谷地四周环山,通向市内的道路不多,根本就没有桥梁。最使我吃惊的是甚至市中心到处都是垃圾和老鼠。

^① 德国和日本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口号下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的条约,1937年,意大利加入这一协定,1939—1940年发展成为德意日三国公开的军事同盟。——原注

大白天在街上行走就能看到成群的老鼠从你脚下窜来窜去。猫狗对它们都无能为力。在主要大街两旁多少有些三到五层的现代楼房,而与其相邻的则是些破旧的房屋,中国人就在这样的陋室里生活、劳动和做生意。没有电车,汽车也很少,且都是来自各国的杂牌车。对大部分劳动人民来说,基本的交通工具是自己的两条腿。高官显贵乘坐汽车,但不是到处都能行驶,因为许多街道是小巷相连,即使人力车也过不去。因此,除了汽车和人力车以外,只有一种运输工具——坐轿子。

在城里和郊区都没有什么大工厂,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手工或手工机械产品。重庆的全部动力由一个功率不大的电站提供。这个电站勉强能够维持市区照明和自来水的供应。

工人及下等职员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以致在机关工作的职员下班回家后就要换上衣服,拉车或抬轿,当车夫或搬运工,侍候富人。

蒋介石道貌岸然,他下令关闭了妓院和其他娱乐场所。表面上关闭了,但却代之以许多地下妓院。

蒋介石明令对吸鸦片者处以死刑,但在街上大烟鬼随处可见,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街上到处都是伸手要钱的乞丐、麻风病人和残废人。

1940—1941年,日本飞机频繁轰炸重庆,但总宣称轰炸的是军事目标。可1941—1942年我在中国期间,中国的国防部和参谋总部一次也没有挨过炸。我不认为,日本人会把这些机关视为非军事目标。这里是另有奥妙。

日本的轰炸严重地影响到重庆市民的生活。每一次轰炸居民都遭到物质损失——房屋被炸塌,私人财产被炸毁。受害最深的是贫民和中等阶层。富有者早把自己的贵重物品转移到郊区。轰炸使人们的情绪沮丧。每当空袭的时候,几乎全体工人和职员都躲进大防空洞里去,而达官贵人则乘车逃往市郊。城里停止了一

切生机，发电站停工，自来水关闭。

轰炸之后，特别是供电设备被破坏之后，市民的艰难时日就来了，没有灯，也没有水。搬运工人这时倒有事干了。他们用扁担挑两只桶到长江里打水。长江水也变得红黄浑浊了，水上漂着动物、有时是人的尸体。无疑，这样的水不经净化和煮沸是不能食用的。应当煮沸，可用什么来煮沸呢？到那里去搞燃料？这些难题摆在每个家庭面前。

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市区，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昼夜不停地轰炸。大多数防空洞都没有通风设备，没有灯和凳子。人们数小时站着不动而没有坐下的可能。日本飞机1941年6月5日的夜袭造成了令人发指的大量死亡。这天晚上，五千多人挤进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一个隧道防空洞里。洞里既无通风设备也无照明。空袭警报持续了四个小时左右。很快人们就感到空气不足，呼吸困难。他们试图出去透透空气，但被守在洞口的值勤警察挡住了。当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出来时，警察却把门锁上，溜之大吉了。结果，洞里所有的人都窒息而死。6月5日的大惨案引起市民们极大的愤慨。蒋介石只限于发布个作弄人的命令，撤掉了负责防空的重庆市卫戍司令刘峙和重庆市市长的职，但仍然让他们担任公职。

长期的战争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当局胡作非为和无力解决现存问题引起强烈不满。

国内总的形势不能不反映到军队中来。军人家庭生活的极端困难是士兵经常思虑和谈论的主题。

1941年，在中国军队的中下层开始出现厌战情绪，对胜利失去了信心，不相信总司令部有能力把战争引向最后胜利。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基于国民党统治集团选择的消极抗战策略。整个国家也好，军队也好，物质状况都糟糕透顶。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相反，日本军队取得的重大进展动摇了中

国的军心。士气瓦解的征兆层出不穷,经常发生开小差、偷窃和倒卖子弹等类似事件。

但是,尽管产生厌战情绪,部分士兵和军官失去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尽管由于前方和后方严重的物质状况令人悲观失望,但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仍然没有破坏。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没有发生大量的倒戈、士兵反对军官、拒绝打仗等事件,甚至那些物质生活极端困难和对总司令部果断结束战争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中级军官还继续主张用坚决措施来结束战争,即转入反攻,同坚持防御战术的将军们大相径庭。

蒋介石在观望

1938年年底以来,在占领武汉和广州以后,日军除了进行小规模的动作和打退中国军队的反攻以外,实际上停止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们的一些顾问确信,日军已枯竭,没有兵力进一步向中国纵深推进。当然,中国战线牵制住了日本大量兵力。然而,这只是日本暂停进攻的原因之一。在1938—1939年间,发生了哈桑湖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这需要日本拨出不小兵力和装备。这些年,在西方,在欧洲,希特勒发动了侵略。日本停止了在中国的大规模进攻以后就着手驯化占领区,看来,是在为新的大规模战争筹备军队和筹办军事工业。

蒋介石照样不采取抗日的积极军事行动,而保存自己的实力,既为对付进步力量,又为突出于其他军阀之上。国民党上层,特别是高级将领之间从来没有一致配合过。每个人都竭力保存自己的部队,尤其是武器,舍此,他就没有分量。蒋介石对高级将领,尤其是对战区司令官的权威是不牢固的。毫无疑问,他害怕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效法汪精卫,投靠日本。

据可靠消息,早在1937年11月,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就进行过媾和秘密谈判。还有消息说,1939—1940年,希特勒通过自己

在中国的代表建议蒋介石停止军事行动,其条件是:日军退居北方,满洲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恢复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在上海、广州和厦门设立日本租界。

我想,这样的建议是得到日本同意的。履行这些条件将极大地加强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又使日本黩武主义者腾出手来,以便在任何方向发动侵略行动——在北方反对苏联,在南方进攻西方大国。

蒋介石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答复希特勒说,他同意在下列条件下开始同日本人谈判媾和:日本应该把军队撤出中国,希特勒应该保证日本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不得重新对中国开战。蒋介石由于害怕失去政府首脑的威信和重新激起大多数中国人反对自己,没能接受日本通过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日本人也不太愿意让步,认为蒋介石政权不会长久。无疑,日本人考虑到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分歧和军事分歧。可能,他们知道蒋介石正准备对八路军挑起武装冲突,准备对新四军进行背信弃义的打击。

1940年,由于英国和法国在欧洲的失败,以及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情绪显著增长了。这些大国对中国的援助本来就少得可怜,这下也几乎全部停止了。由于不愿意恶化同日本的关系,美国也暂时拒绝给中国以实际援助,并且和英国、法国一起推行只能助长侵略者气焰的“远东慕尼黑”政策。

1940年,在我抵达中国的前夕,蒋介石彷徨于十字路口。他害怕中国共产党及其日益增强的武装力量,而他从西方国家得到的援助又微不足道。投降日本意味着失去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和成为卖国贼。此外,日本已经在满洲有溥仪,在华中有汪精卫。日本已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作为狂热的反共分子,蒋介石的算盘是,在和中国共产党势力的较量中,他定能得到所有西

方大国,包括日本的支持。没有迹象表明,已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很快结束。这也使得蒋介石持等着瞧的态度。因此,在1940年,他想都不想对日本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准备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上面去了。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稳住国民党军队的战线之后,提出了“后方重于前方!”、“扫荡后方重于进攻!”、“利用占领区的资源!”等口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展开了广泛的军事行动。

我们的军事顾问徒劳地制定和提出了粉碎这一支或那一支日本军团的计划。蒋介石和他的亲信都赞同这些计划,但从不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而忙于准备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部队。

1940年,日本因为没有多余的陆军来扩大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和开始了大战准备,使用空军集中轰炸重庆,企图迫使蒋介石放弃抵抗,卖身求和。同时,日本空军完全停止了对中共军队占领的特区的袭击。

在1939—1940年,日本能否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势呢?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既然此时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工业中心、海港,而蒋介石控制的只有两条通向外界的土路——在南方,由昆明到仰光;在西北,由兰州到阿拉木图,那末,日本进一步占领中国领土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了截断这两条交通线,日本还需要投入十个师,而有数十万游击队在自己的后方。欧洲战争的扩大也把日本推上了静观的道路,把主要力量,无论是经济的,人力的,还是军事的主力都保持在高度戒备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和法国因为集中主力于欧洲以保卫自己免遭希特勒的进攻,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对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防卫。为了保住东方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政府加紧推行妥

协政策，极力靠牺牲苏联和中国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例如，英国和法国政府把存放在天津领事馆里的价值四千万美元的中国白银转让给日本。英国方面的另一个让步就是英国驻东京大使克雷奇签署了禁止通过缅甸把军事物资运往中国的协定。1940年8月，英国应日本政府的要求，从北京、上海和天津撤走了自己的战斗部队。但是，西方大国这样的让步只是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胃口。

鉴于比利时和荷兰的失败以及法国的投降，在日本国内主张向南扩张的势力活跃起来，想要把防御差的地区捞到手。日本于1940年9月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是朝这个方向侵略迈出的一大步。这些地方盛产橡胶、锌、锡、其他工业原料以及大米。在这之前，日军已占领了可以成为进一步向南扩张的良好跳板的海南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

在西方遭到失败的法国无力在东方抗拒日本的侵略政策。日本于1940年6月要求停止通过印度支那边界将军用物资运往中国，在所有道路上设立哨所以监督这一要求的实施。

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让·德古海军中将推行妥协政策，承认日本在远东的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1940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把东南亚纳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没有遭到西方国家的应有反击，于是着手在北印度支那建立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日本把这一地区的交通线用作军事目的，同时加紧从那里运走铁矿砂、煤、锡和其他原料。日本人建立了强大的警备部队，在河内地区和海南岛集中了二百架战斗机，开始把舰队集中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支那沿海地区。

1939—1940年，日本在军事上没费吹灰之力就不仅把东南亚相当一部分地区置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统治之下，而且着手在那里建立进一步向南方发动进攻的军事桥头堡和基地。

截至1941年年中，在日本本土以外的日本陆军计有56个步

兵师,其中一半以上(30个师)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战场,在东北(满洲国)有12个师,台湾——5个师,海南岛——1个师,其余的师在朝鲜(5个),印度支那(2个)和南萨哈林岛^①。日本还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工兵和坦克部队以及一支基本上尚未投入战斗的海军。1940年,日本生产了将近3千5百架飞机,建造了计约7万吨战舰。6万4千吨的主力舰“大和”号于1941年下水,舰上配有九门460毫米大炮。还不知在日本本土到底驻有或正在组建的有多少个师。总之,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

日本要把这些兵力投向何方呢?向北打苏联还是向南进攻太平洋地区,眼下还是个谜。日本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密切注视着欧洲局势,继续加紧发展日本陆军、空军和海军的进攻能力。日本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准备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朝哪个方向攻呢?这个问题对我们极端重要,当时使许多人坐卧不安。

在重庆的会晤

关于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以后情绪的某些变化情况首先是英国和美国驻重庆的外交官们透露给我们的。事实是,在这之前(1941年初)已出现了他们对待日中战争问题的态度有变化的迹象。这时,日本不仅占领了华北,而且相当深入地侵占了中国的东部地区。

在这期间,“远东慕尼黑”的政策还在继续推行。英国和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唆使日本进攻苏联的机会,并且为此进一步向日本作出让步。然而,对战争拖下来了。日本在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以后,暂时没有表现出向北挺进攻打苏联的现实意图。相反,日本巩固了在中国的阵地后,利用法国在欧洲的失败,把魔爪伸向了法属印度支那。日本向印度支那推进,在那里建立可能继续向南挺

^① 南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南部。——译者注

进的经济和军事基地。这不能不使美国惊慌。一旦英国在欧洲失败,日本只要少量兵力便可以把它在远东的殖民地拿到手。而从印度支那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和基地,伸手可及。

中国的完全失败意味着日本阵地的灾难性加强(其中包括对美国)。要知道,当时谁也不能准确地预言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占领中国以后将扑向何方:扑向西伯利亚,扑向菲律宾、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有人知道,自从三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采取了加强海军的方针,无论是水面舰队还是水下舰队都得到加强。美国把妖魔从瓶子里放出来是为了让它听话,而妖魔在腰板伸直之后却挥拳威胁它的保护人。希特勒在欧洲所干的事完全有可能在远东重演……

这些想法尽管不是马上而是逐渐地,但最终毕竟占据了西方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脑际。西方大国在继续推行“远东慕尼黑”政策的同时,开始逐步地、小心谨慎地改变自己对待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最初当然还是非常微弱的迹象,表明他们对联合中国的力量来反击日本感兴趣。这些迹象还表现在对待国共两党相互关系的态度上。

我的副手罗申经常会晤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以及军事使团的军官。根据他的报告,我知道: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赞成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队采取敌对行动。

在这里,一切都要听弦外之音。每句话,每个姿态都有自己的潜台词。而先前,英国外交官也好,美国外交官也好,都不承认他们很希望中日和解以便日本进攻苏联,希望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以后能够放手镇压共产党。以前,我们的西方同行不过只是摇摇头表示责备而已,装出一副对中国把兵力用来打内战而不用来反击侵略者深感痛心的样子。但是,这一次却不同,正如罗申多次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蒋介石行动的不满是认真的。

我是以中将身份来到重庆的。第一个对我进行礼节性拜访的

是美国代理武官巴雷特上校。我凭过去的工作经验知道,他是一个老练的情报人员,远东问题专家。他在中国呆了十多年,汉语非常好,和中国的工业界和军界建立了十分广泛的联系。对重庆政府发生的事情,交易所的行情以及中国黑市上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我得以请我的西方同行交流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这个名义下,我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指望完全开诚布公地谈那是幼稚的想法,然而,即使从明显的虚假情报中也可以得到收益,纵然弄清对方有所隐瞒也好。我也期待我的伙伴提出尖锐的问题,因为在这期间我们和美国及英国的关系很复杂。我们和德国有条约关系,而德国和英国处于交战状态,美国已向全世界表明,它同情英国。

巴雷特上校在我到任不久就来拜访我一事暗示,美国人有心事,想摸清我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从我和外交官交往的经验中我要说,同情报人员打交道比同地道的外交官打交道要容易得多。情报人员不搞小动作,在谈话中容易打破社交那一套,为了从对方口中掏出东西,他就不得不吐出点情报以作交换。

和巴雷特的首次会晤大出我之所料。这位美国佬不要花腔,他谈吐自如的风度博得了我的好感。我毫不拘束,也不怕对任何问题表态。当然,我首先关心的是他怎样看待蒋介石恶化同共产党的关系,如何评价“新四军事件”。巴雷特本可以佯装不知情避而不答,但他立即极力赞同我们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指出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的重要性,并且说,国共两党的矛盾使他个人十分不安。

“以前我们对中国各个派别之间的分歧不怎么放在心上,”——巴雷特说。“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和内讧是不可分割的。几世纪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我没有打断巴雷特的话,尽管我可以指出,中国的内讧总是有

利于欧洲殖民主义者，而谁也没有见过他们采取消除这种内讧的行动，相反却能够举出他们对内讧火上浇油的许多例子。但是，我感兴趣的是美国方面对待目前内讧的态度。

“现在，”——巴雷特继续说，“我们对这一传统性的内讧感到不快……我们对国民党政府对新四军所采取的行动表示了否定态度。这有碍于抵抗日本的进攻。”

这位上校用词还是小心谨慎的，一直不提蒋介石是挑起冲突的罪魁祸首，从不明确表示日本是侵略者。自然，问题不在于用词上，而在于他阐述的那些观点的实质内容。

“我们诚心诚意希望中国人真正抗日。我们不应忘记日本和德国以及意大利有军事义务联系^①。如果日本人在中国感到吃紧，他们就会节制自己向南方和北方扩张的野心……”

向北！我暗自说。我的谈话伙伴也不大隐瞒他希望日本将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他压根没有涉及这最后一个问题，虽然在这之前日美矛盾的尖锐化已表现得相当明显。

要提醒读者一点的是，我和美国驻华代理武官的谈话是在1941年1月底进行的。巴雷特上校并没有忘记询问我个人对苏联与德国关系的看法。

他单刀直入地问：“苏联政府不耽心德国在春天或夏天进攻东线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是在西线还没有制服英国之前吗？”

他回答说：“渡过英吉利海峡去年夏天倒是可能的。英国政府和我们的军事专家们现在认为，1941年春天德军要跨过英吉利海峡简直是不现实的。英国空军的实力增长了。英国加强了海岸线的防御工事并且准备了抵抗进攻的陆军。我国对英国的军事援助

^①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三国条约。——原注

日益增加……我们提供的军火大大改变了力量的对比……目前，我们甚至没有可能用武器援助中国……”

“是的，但美国没有参战，参战对英国的援助岂不更有效……”

“和苏联一样，”——他争辩说，“如果您问我个人，”——他继续说，“那么，我要对您说，推迟战争无论对贵方还是对我方都是非常有利的，虽然美国对德国宣战对你们更为有利，正如苏联对德国宣战对我方更为有利一样。但是，我要补充的是：我个人认为，战争将具这样的性质，即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不可避免地要直接卷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由于我们给英国以有效援助，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已大大恶化。对欧洲国际平衡的任何破坏都不能不反映到地球的其他角落……”

作为对这番表示信任的郑重谈话的回答，我鲜明地指出，苏联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但是，对苏联的任何进攻都将遭到最有力的反击。

“根据传到重庆我这里的情报，”——巴雷特继续说，“德国正开始把军队从法国以及德国西部地区往东线调动……我不认为，这只是和德国在巴尔干的利益相关……”

这些话听起来犹如警告。我可以对这席话做各种评价。他本人也不隐瞒，在美国有一些人想把苏联拖入战争。他说这一席话的用意还可能是让我把它们转告莫斯科，似乎他是以此来推动我们在对德关系中采取不慎步骤。但我倾向于更加现实地评价他的坦率。我自己也认为，我国西部边境上空正集聚着乌云。这还不算直接的警告。但我认为，我们的侦察机关在此之前已经获得德军东调的足够情报。那样的调动是不可能保住密的。

当我把同巴雷特的首次谈话汇报给潘友新时，他说，上校对我是坦率的，他大大改变了先前同我的前任谈话时的调门，这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计划感到不安的一个征兆。

苏联军事使团为苏联红军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在苏联大使馆举

行了招待会。驻重庆政府的所有大使和军事代表都认为必须接受我们的邀请。蒋介石到大使馆来也可以认为是当天的一件大事。他在红军节这一天首次光临苏联大使馆这一点是重庆政府所有出席宴会的官员都特别强调的。这也是统治阶级上层人士情绪变化的一个征兆。我和潘友新都明白，英国和美国越来越积极地对蒋介石施加影响，让他积极抗日，暂时克制同共产党的内部斗争。

我们也密切注视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手腕，因为他千方百计使我们和日本相撞并公开交战。蒋介石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顽固地争取这项任务的完成。

我有些机会观察蒋夫人宋美龄的活动。她极想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女政治家。宋美龄毫不保留地把有关中国的事态、前线战况、日本司令部的计划情报提供给苏联军事使团。在她提供的情报中假情报多于真情报，而在言谈中则挑拨性的暗示多于对苏联的真诚友好表示。她不止一次地提出，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苏联对日宣战。她的非官方身份使她便于比较自由地提出这类问题。

宋美龄不限于说说而已，有时转而采取坚决行动，企图挑动我们同日本发生冲突。例如，1941年春天，特别是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的夏天，她和与她有联系的新闻记者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报道。报纸上不乏对中国从苏联获得装备表示感谢的话。文章中甚至抱怨英国和美国，说它们的能力不比苏联差，但却不给中国军火。这些文章使我不安。我不认为，特务网密布了中国的日本司令部会对我们给中国的援助不了如指掌。但是，非官方情报是一回事，中国报纸公开报道又是一回事，况且这报道又不是出自别人之手，而是出自蒋夫人本人之口。这背后隐藏的意图是要激怒日本，表示苏联对它来说比英国和美国都更加危险。我立即感觉到了我的同行巴雷特上校插了一手。只要他能够，他就要尽量把日本的攻击矛头从自己的国家引开。

一些重庆政府的人士不大隐瞒自己的打算。例如,重庆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有一次同我谈话时就毫无羞涩地对苏联求起爱来,拼命说服我:对日开战对苏联有利。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我不得不向他提起1929年的中长铁路事件,那是中国政府“爱”苏联的有力证据。孔祥熙皱皱眉头,无词以对。商业部长和我还有一次更为挑衅性的谈话。按照和苏联签订的协定,中国应该向我国提供用来制作军大衣呢料的毛,我国商务代表请我提醒部长注意中国的义务,因为已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毛货。会晤时有商业部的工作人员在场。部长竟敢对我说:

“请帮助打日本人吧,那时,中国的商品将畅行无阻地供给苏联……你们现在是想借中国人的手打日本……”

我回答他说:“我要是中国军队的司令,我一定首先把您当作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派往前线!军队缺少您那样的勇士!”

只有权当开玩笑,一笑了之。商业部的工作人员也嘲笑自己的部长。我不怀疑,我同他结下了私怨……

潘友新多次对我说,蒋介石总是力图推动日本和苏联冲突。1941年春天,他特别积极。这完全符合那些推行“远东慕尼黑”政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但是,在3月初,蒋介石和他的西方保护者们挑起苏日关系恶化的企图遭到严重挫折。1941年春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进行谈判的消息象晴天霹雳,使重庆的当权者大吃一惊。中国官员们特别注意到,斯大林亲自到车站为松冈洋右送行,他在车站既同日本外相,又同德国大使进行了友好交谈。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把斯大林到车站送行之举解释为外交礼节中的惯例。谁的立场改变了呢?是苏联吗?绝对不是!苏联奉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既不想和日本打仗,也不想和德国打仗。相反,日本军国主义者酝酿了进攻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计划。莫斯科谈判意味着,日本正在改变自己的进攻方向,它需要日苏边境的稳定。

松冈洋右的使命问题当然不只是使重庆的政治家们感兴趣，而且也使英国和美国的代表们感兴趣。他们要同我们会晤的请柬简直要把我们给埋了。巴雷特上校更死乞白赖地要求和我见面。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回避同他谈话，我相信，他不会提出使人为难的问题，即使提出来，我也能妥善处之。我料想，象巴雷特这样一个美国情报人员对苏日谈判的反应，莫斯科是会感兴趣的。

我没有错。可以和巴雷特打交道。在会晤中，他连松冈洋右的名字都没提到。他谈话非常内行，没有用不必要的问题来难为我。当我向他提问时，他很坦率。尽管这位上校善于控制自己，但我还是发现他极其不安。巴雷特问道：

“不知美国传教士给我们的报告是否正确？他们说，苏制重炮正运往兰州。”

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在莫斯科，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和日本达成了重要协议，而我们继续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是，这一援助不可能躲过美国人的耳目。他们不止可以通过传教士了解到这一点。蒋介石本人也不会对他们隐瞒苏联武器的到达。但我没有急于作答，反问道：

“不知美国要把‘p-40’飞机运到中国是否属实？”

这个情报我是从中国人士那里获悉的。巴雷特答称，这很可能就在最近。于是，我向他证实说，有一百五十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已运抵兰州。巴雷特对此感到满意，他明白：松冈洋右访问莫斯科没有改变我国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他还重申美国政府要设法促使中国取胜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国土这一意向，他暗示，他们方面将给蒋介石施加影响，使他不要挑起和共产党军队的冲突。

英国军事代表对松冈洋右访问莫斯科一事怀疑犹甚。在和他们的会晤中，我总是感到冷冰冰的。日本的立场使他们非常不安。若干年以后，我从丘吉尔的回忆录中找到了对英国外交官行为的解释。

丘吉尔于1941年4月2日写信给日本外相。在信中他明确表示,对英国和美国开战对日本来说孕育着什么。丘吉尔写道:

“1941年,美国的钢产量将达七千五百万吨,而英国为一千二百五十万吨左右,总共将近九千万吨。难道这不是真的吗?如果德国象上次大战一样遭到失败,那末,靠日本生产的七百万吨钢来单独作战,岂不是太少了吗?”

“或许,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日本将避免一场严重的灾难,并且日本和两个海上大国的关系将得到明显改善?如果美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而日本和轴心国联合,那末,两个英语国家会不会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在联合对付日本之前来对付欧洲的轴心国呢?”^①

我想,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丘吉尔当时就看到了日本侵略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可能性以及日本进攻美国的可能性。英国外交官们的故步自封由此而来,他们的神经过敏也由此而来,因为战争推进到太平洋区域以后,便要触动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

恰好在1941年春天我得以会见法国武官伊冯上校。他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194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人并不特别重视法国在重庆的代表。伊冯在中国代表“维琪”政府^②,但一心憎恨法国的投降派,认为他们是卖国贼。这个法国的忠诚爱国者为了不丢失他为国效劳的岗位,把自己的爱国感情深深埋在心底。

我和他的信任关系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偶然机会帮了忙。那时,我已经是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了。在一次空袭中,日本飞机炸毁了总军事顾问的官邸。中国政府急忙把从前法国大使馆的房屋拨给我住。我和潘友新商量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官员有意设下了一起小小的离间计,使我们去和法国人吵架。于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文版第3卷第168页。——原注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成立的一个亲德国法西斯政府。——译者注

是，我们决定不搬迁到那里去。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伊冯上校。他赞赏我们的态度。渐渐地，伊冯对我很坦白。他不掩饰自己对“维琪”政府的态度，热心同我分享他通过英国人和美国人得到的各种情报，主要是关于印度支那的情报。他多次给我讲述有关在法国的战斗，关于德国的装备，关于坦克兵团同空军的配合作战。他的分析是相当中肯的，然而，未免为时晚矣。那时，法国军队已不复存在了。在法国，抵抗运动正在发展。

他1941年春季的有些消息迫使我考虑南方的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的局势。他告诉我关于在法属印度支那正在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已经渗透到了那里。日本占领了昔日法国殖民地的大量省份，把居民从一些地区赶走，建立军事基地、机场，向那里运去大批武器。为了对华作战，尤其是准备进攻苏联，它是不需要这样做的。伊冯通过自己的渠道从印度支那获得的情报说，在那里建立了日本舰队在南洋活动的基地。看来，法国人，特别是伊冯上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支那都有一个广泛的情报网。

他说：“现在，日本人在静观欧洲战事朝哪个方向发展。他们本可以在中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但是，他们感到，在中国抵抗在加强，于是，暂时不加强攻势。他们正在等待……”

“他们等什么？”

“他们确信，对俄战争已预先决定了。日本的攻击方向也依在俄国的战事进程而定……”

“要是希特勒遵守互不侵犯条约，不进攻苏联呢？”

“那时，在印度支那的基地对日本就有用了……日本不会袖手旁观……日本定会进攻美国……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想助德国一臂之力，因为德国在欧洲的失败对日本也孕育着严重后果……”

他的情报是极其重要的。自然，我关心他这样自信来自何处。

“我的朋友们从法国通报我说，希特勒从法国撤走了大量战斗部队并把这些部队调往波兰。”

伊冯甚至向我透露了自己的情报来源。德国军官和自己驻在法国占领区的同僚通信。有些信落到了前“国家保安局”。^①工作人员手里。根据信的内容、邮局的印章和一些名称,法国侦察人员确认,这些信发自波兰。

大规模军事调动不可能不露马脚。有人写信,有人信口开河。许多法国军官虽然转而为“维琪”政府服务,但内心里仍然是爱国者。他们憎恨占领军,监视他们的每一个行动。伊冯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的。

在那些年,被占领下的法国人想各种办法离开法国。伊冯从法国侨民那里了解到了关于占领军的一些情况。

根据一些迹象判断,莫斯科知道入侵的危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把赌注压在等待上,要看看欧洲的事态如何发展,所以不急于采取反侵略军事行动。而日本人却相反,开始狠狠打击中国军队和城市,特别是加强空袭,其目的大概是迫使蒋介石投降或者使他丧失发动进攻的能力。

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在执行还在莫斯科就给我布置的任务——准备就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的同时,我系统研究了在国民党政府的中心——重庆和在地方上即在各地区、各军队里供职的我国军事顾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任务可不简单,因为顾问是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凭我过去在华工作的经验,我知道,我们的人要和中国官员工作得合手不是那么容易的。

同在重庆的卡恰诺夫(沃尔根)师长以及其他顾问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同志同国防部以及在各地的中国将军们的关系往往处理不当。所有我国顾问都满腔热情地要帮助中国人民打

^① 国家保安局——法国侦察机关。——原注

日本。为此，他们之中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然而，他们之中一些人的弱点是不够了解中国国情，不够了解中国的传统。而根据我以前在这个国家工作的经验，我懂得，这又是多么重要！

在和中国军事领导人的相互关系中，我们的军事顾问要备加小心，要照顾他们对风俗习惯的特殊感情，考虑到他们容不得批评，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评。这就需要特殊对待。譬如说，中国将军作防御或者进攻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漏洞百出，如果不说得更糟的话。要是苏联顾问公开批评这项计划，那他就是在给自己树敌，最好的情况也是这位中国将军不再理睬他，再也不会邀请他参加制定计划和作决定。

在研究中国军事长官作出的决定或者拟就的计划时，任何时候顾问都要满口称赞，假使不说这决定是天才的或无与伦比的话，也要说是很好的。但是，可以在为了使这位中国将军的部下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计划的托辞下请求对计划作一些说明。可以担保，在对决定或计划作了这样的奉承之后，中国领导人定将允许作“一些”说明。顾问在作说明时，可以把应该塞进决定的一切内容都塞进去。这样的帮助将会被接受，而顾问的建议也能作为中国指挥官自己的决定或方案加以贯彻执行。

在这项作战决定或方案执行顺利的情况下，顾问要靠边站，应该把取得胜利或成绩的全部荣誉归功于自己的将军，而在受挫折的情况下，要找出替指挥员和部队辩护的原因，甚至要祝贺其胜利。我在1941年新年前夕第一次会晤蒋介石的时候，就是从祝贺中国军队胜利开始同他谈话的，尽管这样的胜利并不存在。而蒋介石欣赏我的姿态。

我和我的助手们不得不认真扎实地做些工作，以便把我国顾问的活动纳入同中国人正确关系的轨道。

我继续极仔细地研究中国的军事政治局势，研究这个正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研究日本的兵力和装备以及投靠日本

的中国卖国贼。情况是：在北部是以清王室的后裔溥仪皇帝为首的满洲国；在内蒙古是德王领导下的傀儡政府；在北京是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委会；在南京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政府。结果形成了在天皇领导下的由亲日傀儡们组成的类似布头帝国^①的东西。日本政府有意识地把被占领的中国领土分割开来，实行惯用的帝国主义政策——分而治之。

1939年年底日中战线趋于稳定，好象僵持不动。我认为，鉴于欧洲军事冲突的发展和美国逐步卷入这场冲突，对日本来说期待已久的机会业已到来，它可以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使亚洲免受英美政策不公正待遇的保护者”、“共荣圈”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着手实施自己的长远计划。

1939—1940年发生的事件结合侦察得来的情报使我预感到，日本暂时推迟解决中国，可能冒险利用业已形成的局势向南洋和太平洋方面进攻。大概，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帝国主义对手已在欧洲被捆住了手脚，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战略后备力量投入天平，以实现其侵略计划。

日本军国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进攻苏联的企图。然而，因为受痛苦的教训，他们要坐待苏联遭到削弱的良机。

“根据形势变化制订的帝国国政大纲”的含义就是这样。“帝国将一如既往致力于解决在中国的冲突：为了确保独立自主和自卫的基础，将继续向南推进。北方问题的解决将视情势变化而定”。^②这个大纲于1941年7月2日由在东京召开的帝国会议批准。

越是临近1941年，越可以清楚地看出，法西斯联盟向苏联开战的日子迫近了。所有大国和小国都预料到了这一点。苏联领导

^① 布头帝国：讥笑奥匈帝国的绰号。——译者注

^② 《太平洋战争史》，1958年俄文版，第3卷第379页。——原注

了解这一点并且准备给法西斯以应有的还击。日本人也了解这一点，他们指望希特勒德国的进攻会削弱苏联，从而使它放手进一步扩张。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相反，他们不希望日本在北方和中国腾出手来占领他们在太平洋区域的殖民地。为阻止日本向南扩张，这期间美国和英国一道开始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并且开始和日本进行长期谈判。这是一项交易，其目的还是把日本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而在中国，蒋介石政府则认为，日本南进或者北进都将导致减轻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这将使它有可能镇压中国共产党和加强自己的势力。

1941年2、3月间，南洋地区的形势进一步紧张。表明这一情况的迹象是以下事实：英国和美国大使馆作出从远东撤走英国和美国公民的决定；英国在马来亚群岛和新加坡沿岸布雷；印度和澳大利亚军队以及澳大利亚空军调往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府；英国（确切些说是印度）军队在马来亚和泰国（暹罗）边境集结；英国对泰国施加经济压力；美国宣布在夏威夷群岛、阿拉斯加和其他地区的海、空军事基地为禁区；美国银行停止对远东地区提供贸易信贷；罗斯福宣布，即使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也不会削弱对英国的援助。但是，主要标志是日本在南洋地区的进一步活跃，旨在加强通向英国、美国和荷兰殖民地的要冲上的阵地。例如，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被迫满足日本对泰国的领土要求。日本人在安南和泰国的活跃都表明其意向是把这些最富饶的国家变成进一步向印度尼西亚方向扩张的战略跳板。

根据我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的资料，日本在南方总共有六百架飞机，其中将近二百架在安南。日本加紧在海南岛的军事建设：修建机场、掩体、高射炮发射阵地。大亚湾变成了潜艇基地。据侦察情报，在海南岛集结了日本坦克部队。三月初，日本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海军、空军和陆军联合演习。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德国人当时向日本政府猛施压力，促其南进。有一条报道说，日本内阁于三月

份同最高司令部的代表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了德国人的要求,决定在三月份以内完成向南扩张的准备工作。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和日本驻伦敦及华盛顿的大使关于日本不打算用武力满足自己在南洋地区的欲望的声明,没有能够缓和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的准备工作同这些声明大相径庭。

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于1941年1月向重庆派出了自己的助手之一克里博士。他的使命是全面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一旦和日本开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中国,这对美国确定其远东政策和欧洲政策是很重要的。显然,克里在中国作短期逗留是不可能充分搞清全部问题的。看来,他的任务是包括亲自核查美国政府业已掌握的材料并以新的事实来补充这些材料。据我从美国人的谈话中判断,关于中国的国内情况,克里产生了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印象。克里首先注意到中国政府的严重经济和财政状况以及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大的危险,无力应付业已形成的局面,注意到国民党表现得尤其突出的独裁。但是,我那时认为,不管克里个人的印象如何,局势已经是这样(我指的是日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即美国不得不给中国以切实援助。

在重庆最为不安的是英国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远东殖民地处于日本进攻的直接威胁之下。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更使英国人不安。一些英国外交官当时认为,要是没有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援助,中国只能维持六至十二个月。英国人提出了驻华英美经济使团拟定的方案,使团的成员即是蒋介石政府的经济顾问。蒋介石于1941年2月批准了这一方案。然后,英国驻重庆大使克尔又把这一方案提交给英国政府批准。那时重庆盛传英中进行军事合作谈判的说法。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将军赴缅甸、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使命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估计,他将和远东英国武装部队司令部

建立直接接触，可能就一旦英国殖民地遭到日本进攻将协调行动达成协议。在这之前不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主任吴铁城在南洋各国长时间旅行之后抵达香港。从一切迹象看，他到香港的目的是要和当地英国司令部就协调行动一事进行谈判。

中国司令部组建了新的军团(第一军和第九军)集结在云南，准备在爆发日英战争的情况下进行防卫和在南方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据我所掌握的情报，英中接触中讨论了中国军队守护缅甸——云南公路的问题(这一使命交给了商震)。有一点对我是毫无疑问的——军事合作谈判是确有其事，尽管关于合作的形式问题悬而未决。

这样，英国和美国开始把自己的对华政策和南洋急剧恶化的局势紧密联系起来。他们面临必须武装保卫远东殖民地免受日本侵犯的任务。但他们是极不愿意走这一步的。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欧洲的局势紧张，而且也因为他们的不乐意削弱日本，日本的兵力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来进攻苏联。英国驻华大使克尔公开宣布了这一点。我很清楚，南洋地区的形势越紧张，英国和美国就越是积极地推动中国继续抗日；在南方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明显，英美对中国的援助就越实际。反之亦然：如果有可能和日本达成协议，那么英国和美国肯定将走这一步，而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

重庆的对外政策仍指望爆发日本和英美之间的战争。因此，中国政府更努力和这些国家接近。同时，它又清醒地看到苏联远东政策的重大意义。日苏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的消息在中国政界人士中引起强烈不安。很明显，由于这一缘故，那时中国人极力强调同苏联友好。这也表现在2月23日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蒋介石特地赶来出席那次招待会，这还表现在何应钦为苏联武官和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上。他凭三寸不烂之舌大谈特谈对苏联和对苏联顾问的友好感情，并宣称不久就要转入对日

反攻。

1940年冬末和1941年初春,中国国务活动家和驻重庆全体外交官的主要注意力都在欧洲事态的进程上:希特勒侵略将朝那个方向进一步发展——向西进攻英国还是向东进攻苏联?其他国家,诸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或者希腊很少引起中国当局的注意。它认为,这些国家对重大军事政策不会有特别影响。都期待苏美这些大国参战。

英美驻华代表特别关心苏联参战问题。美国人直截了当地问我:我们是否将继续以武器援助中国?在我和美国武官巴雷特谈话中,我们相互表明:我们两国都关心使中国人继续抗击侵略者,不要投降日本。在谈话中我了解到,除了财政援助以外,美国也决定给中国武器援助,美国反对挑动中国内战,认为这将会削弱中国抗日的能力。

在就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以后,我认识到,如果没有可靠的和经过核实的情报,不建立必要的接触,我将难以完成交给我的任务。我的助手、汉语讲得很漂亮的福明和安德烈耶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和中国的进步人士有很多联系。我们同他们广泛交往。他们知道苏联真诚援助中国,新闻工作者、记者、各部门的官员都来找我们了解和讨论各种国内和国际问题。这使我们能够体察民情,深入了解社会各阶层所关心的问题。我们竭力使来访者对革命事态的胜利发展抱有希望,竭力增强他们对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必胜的信心。听了我们的话他们备受鼓舞。简而言之,我们的客人总是很多,而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帮助也不小。

中国谍报机关企图把反间谍人员安插到我们这里来。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识破了他们,但我们没有疏远他们,而是当他们在场的时候小心从事,不让他们了解我们对哪些问题感兴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住处安装了窃听器,要除掉或破坏它们将是徒劳的。相反,我们尽量通过这些装置给有关部门散布假

情报。

中国反间谍机关的侦探监视着我们，其头子是戴笠。此人博得蒋介石的极大信任。我们之中，以致我们认识的中国人之中谁也不认识中国反间谍机关的这个头子。这是个深居简出的神秘人物，当然，是个反共分子，所有的中国人都怕他。谁也不敢夸口说见过他或认识他。因为我经常在蒋介石那里，或许见过他，和他打过招呼，一起陪同蒋介石参观过苏联的军事装备。坦率地说，我没有想和这个人接触，也没有打算过和他商量什么。我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

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对我进行公开跟踪，但这只是因为安排得极其巧妙而已。我不怕这种监视，因为我作为总军事顾问，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光明正大的。我和我的助手都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每周在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的主持下举行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军委会委员长是蒋介石本人，但几乎总是由何应钦代理。总顾问作为军委会副委员长是必须出席这些会议的。周恩来是军委委员。但是，我没见过他参加过一次军委会议。

随着我对中国局势越来越深入地了解，我得出结论：蒋介石及其将领对真正抗日并不感兴趣。他们知道日本在作大战准备，但不愿意以自己的积极抗日行动来妨碍日本。同时，蒋介石分子两眼紧紧盯着共产党军队并在其周围地区集中了自己最亲信的部队。这些部队驻扎在洛阳和西安地区，如前所述，由胡宗南将军指挥。蒋介石把精锐部队拨给他统辖。在胡宗南军队里没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是，关于他的情况由在重庆的中共代表通报给我们。大概，新四军教导团的被消灭教会了他们同中国参谋总部以及国民党领导层中的工作人员保持良好联系。同中共代表接触对我是有益的，帮助我弄清形势以及蒋介石执行的政策。同时，从这些会晤中我了解到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怎样不可调和的矛

盾,它们的军队在抗击共同敌人时哪些不协调的地方。统一战线濒于分裂。

周恩来、董必武和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和中国进步人士以及军界和政界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工作,预报国民党方面可能挑起的冲突和挑衅行动。叶剑英将军作为八路军参谋长,大部分时间在延安。

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官邸与国防部长、参谋总部情报部部长和作战部部长的办公室并排。为了工作,我尽量同他们搞好正常的业务关系。通过对所得情报的核实,我和我的助手们掌握了有关中国领导主要意图的充分材料,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我们的建议和方案。

在工作中我对重庆政治的奥秘了解得越多越深刻了……

蒋介石继续观望

1941年春,很少有人再怀疑苏联将被迫两线作战——在西线抗击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在东线抗击日本。但是,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出人意外地同苏联签订了为期五年的中立条约。这项条约证明,尽管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但它仍然打算推行自己的远东政策。

重庆政界对苏日中立条约的反应起初是极其神经质的。在获悉签订这一条约的头几天,重庆政府和国民党人士不知所措,惶惶不安。蒋介石召集各种人物接连开会,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4月14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接着又举行了国民参政会常委会议。4月24日在蒋介石那里举行了专门会议,等等。蒋介石本人给人的印象也是惘然若失的样子。

然而,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底是逐渐消失了。莫洛托夫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邵力子的谈话以及潘友新会见蒋介石向他阐述苏联政府的立场起了很大作用。

蒋介石政府决定不恶化同苏联的关系，把两国关系维持在现有水平上，继续争取我国对中国的物资援助。所有报纸和刊物都接到指示，不得攻击苏联，并且不得提及我们同日本签订条约一事。

这时，蒋介石开始极力鼓吹美中联防的主张，并且坚决制止自己周围的人议论美日妥协的可能。除蒋介石言论外，还有一系列其他迹象表明这两个国家比以前更加接近。例如，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琪从英国途经美国回国，想在那里会见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当时出现在重庆的美国政府代表继续研究形势。他们尤其关心增加中缅公路干线的运输能力。作为实际步骤，美国人提议用运输机从缅甸往云南空运。同时，他们还同意向中国提供五十到一百架飞机。

这时，美国对中国的物资援助有所增加。我从宋子文处得知，美国政府批准把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一批货物运往中国（其中包括铁路建筑材料，四千辆汽车，军用纺织品）。美国军事使团拟来中国。

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缅甸公路使得中国人与英国人采取一系列共同军事措施来保卫这条公路。尤其是有一项在日本人一旦进攻时把中国的第五军调往缅甸的计划。

1941年春，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两条基本原则：（1）确信在最近六个月内太平洋地区将爆发英美集团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中国预期这场战争将以日本失败而告终；（2）预计苏联和德国之间会爆发战争冲突，同时，日本虽然签署了中立条约，但必将站在德国方面反对苏联。

在重庆统治集团看来，日益迫近的太平洋战争和德国、日本对苏联发动武装进攻应该对改善中国自己的处境大有好处。因此，中国政府继续持观望态度，坐视远东和欧洲事态的发展。中国政府认为，等待时机比发动进攻并因而遭到削弱或被部分消灭要更

上算。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只限于固守阵地。这种立场直接反映在重庆所采取的军事措施上。我仍然坚信,在局势明朗以前中国政府和蒋介石决不会采取积极抗日行动。

力图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也是受复杂的国内形势所致。皖南事变以后,那些最反动的中国将领(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等)以及国民党上层的右派,主张和共产党公开决裂并取缔共产党的武装。在这些集团的压力下,如前所述,在紧靠特区的南部边界集结了胡宗南将军指挥的三十万军队。这支军队除了在适当情况下用来直接进攻特区以外,其任务还包括封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如果这些军队采取积极行动进攻重庆部队的话。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人士十分担心发生后一种情况。这样,政治危机导致了组成统一战线基础的两党的实际决裂,尽管没有正式宣布决裂。

日本于4月间就媾和问题再次试探蒋介石的立场。在重庆出现了一个叫司徒雷登的美国人,他是北平一个大学的校长,他要向蒋介石转达日本要同他建立个人接触和媾和的愿望。蒋介石拒绝商讨日本人的建议,宣称只有通过罗斯福转达这些建议才能加以讨论。

蒋介石在拒绝同日本人进行媾和谈判的同时,加紧争取美国、苏联以及英国提供更多的装备。他想把所获得的装备用来加强军队,主要是加强他自己的在后方的军队。加强军队既使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更加巩固,又使他和日本人对话更有力,如果形势迫使他进行和谈的话。

这时,日中战争各条战线的战事如何呢?

日本要在南洋方向展开扩张就必须保障它在中国战线的安全。中国战线同法属印度支那、暹罗、中国沿海岛屿一起构成日本向南推进的后方。日军司令部力图最大限度地争取蒋介石政府完全投降,或者至少要给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以一连串打击,使其长期丧失战斗力。无疑,日本人注意到自己的经验:他们在没有粉碎

中国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这并没有导致胜利。从1941年1月到同年5月，日军司令部在多条战线发动一系列战役，旨在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夺取物质财富和封锁中国领土。

于是，日本军队于3月间几乎在四百公里的整个广东海岸登陆。在抢掠了囤积在这些地方的大量粮食、食品、燃料以后，日本人便撤走了。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补充日军的给养。类似行动在其他战线也发生过。他们给粮食状况本来就相当严重的中国人造成极大的物资损失。

中国司令部的表现并不积极。中国军队的行动仍然是防御性的。

根据我们的建议，中国人于1941年4月准备转入进攻。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部队应该给在宜昌地区的日军以重点打击，在所有其他战区也要同时积极开展攻势。

然而，我不相信，中国人会这样做，尽管有蒋介石的命令。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急剧恶劣的关系、集中中央军进攻共产党的军队——所有这些都影响了进攻的准备工作。大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对进攻抱怀疑和消极态度。例如，卫立煌（第一战区）认为，他的部队开始进攻不能早于三到四个月，朱绍良（第八战区）的军队正在准备同共产党军队作战；李宗仁（第五战区）认为，他要在秋天以后才能发起进攻；顾祝同（第三战区）虽然准备进攻，但大概不是进攻日本，而是进攻新四军。

第六战区的情况略好一些——陈诚准备发起进攻。顾问们竭力协调第六战区和第五战区部队的行动以及争取第一、第九和第三战区采取积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拟议中的攻势可望取得成功。然而，和共产党的国内斗争使得许多将领不过问抗日战争问题。

1941年4、5月间，前线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日本袭击了

浙江省和福建省的沿海地区,并且在山西省南部发起攻势。

日本舰队进入中国领海以后,中国通过浙江、福建和广东省保持同外界联系和进行贸易的机会化为乌有。况且,这些省份的港口继续是走私贸易活跃的中心,主要是敌占区的走私贸易。间接材料表明,走私贸易的规模很大。在大港口囤积了大量商品:茶叶、大米、燃料等。

日本在浙江和福建省沿海登陆,完全出乎中国司令部意料。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在日军登陆已成为事实的时候,采取措施已为时太晚了。截至4月17日,日本完成了对战役的全部准备工作,日军于4月19日在从宁波到福州的浙江及福建的整个沿线同时登陆。炮舰和空军掩护登陆。日军最强的部队是在宁波东北镇海地区登陆的北路军和南路军。

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拿下了宁波、福州,然后夺取马尾要塞。中国的第七和第八十步兵师从福州向北逃跑。不久,日本人就在福建省省会扶植了一个福建傀儡政府,打算长驻福州。

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司令部急忙调兵到作战地点。5月初,第三战区的部队转入反攻,目的是控制诸暨县、宁波、福州。日本人把粮食和原料运走以后不久就放弃了海门、台州、黄岩、温州、乐清和惠安等据点。总共有七个师参加了反攻。在诸暨县和宁波方面,中国军队获得了部分战术上的胜利,重创一些日军部队。但是,中国军队的整个反攻是不成功的。5月10日反攻彻底受挫,蒋介石下令停止反攻。

经过这次战役,日本巩固了在华东沿海地区的许多重要据点,并且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物资损失,掠夺了大量原料和粮食。

日本军队于1941年5月在山西省南部发动了进攻。日军司令部没有从日本本土或满洲调兵来参加这次战役。日本军队利用中国将领的消极情绪和各个战区之间缺乏配合行动,大胆进行调动,把前线一系列地区的军队抽空或者减少。

在作战过程中才搞清楚,日军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击溃和消灭在山西南部的差不多二十万中国军队,为最后夺取仍然在中国军队控制下的陇海铁路建立跳板以及占领洛阳和彻底击溃第一战区的军队。日本人企图在中国人中制造恐慌和促使重庆政府中的投降派抬头。为顺利进行这次战役,光有在山西南部的日本军队是不够的。整个4月份都在重新部署军队。在主攻方向,日本人摆了两个集团军:东部集团军(将近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和西部集团军(将近三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旅)。这两路军队进行夹攻,然后会合并切断中国军队到达黄河渡口的道路。参加这次战役的总共有七个师即十万人和一百七十二架飞机。

战役开始前,中国在这一地区有十九个师,一个旅,三支游击队,总共有十六万人(就是说,力量的对比是1.6:1,中国占优势)。

对中国司令部来说,日军重新部署和准备发动进攻并不是秘密。大约在进攻开始前两周,中国人就得到了情报。就连蒋介石在山西战役失败后给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的特别电报中也承认这一点。然而,无论总司令部,还是战区司令部都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防范措施,尽管中国将军们完全有可能依靠第三十四集团军和第二战区的部队来加强受威胁方向。可是,这意味着削弱集中兵力进攻特区,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中国军队总司令部实际上宁肯战败也不愿削弱对付共产党的力量。

日军于5月7日开始进攻,第二天傍晚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第九军的部队在日本东路军的进攻下后退了二十五公里。敌人在进攻绛县—垣曲时一举突破第四十三军防线,在突破口投入骑兵,骑兵之后是步兵,毫不拖延地消灭残存的中国部队。日军于8日傍晚占领了垣曲,日本骑兵部队并没有在垣曲止步,而是继续向东挺进到第九军的后方。

12日以前日军完全完成了第一阶段进攻的任务,日本东西两路军队在垣曲东北的邵原镇地区会合。黄河最主要渡口都落入日

军手中。日军完全截断了位于黄河北岸的中国部队同位于黄河南岸的第一战区其余部队以及后勤基地的联系。第一战区的部队被分割成孤立无援的两部分。

中国司令部在战斗的第一阶段表现得十分狼狈和无能为力,有些命令5月9日才发出,这时,山西南部的失败实际上已成定局。我作为总军事顾问推荐的组织第一、第二和第八战区军队协调行动的计划没有被中国司令部采纳。在整个战役中,第二战区的部队无所作为,第八战区也处于这种状态。傅作义的两个师只是在5月25日即山西战役业已结束时才投入进攻。同第十八集团军(即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的配合行动不仅没有组织,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司令部根本不想组织这种配合,宁肯让八路军同日本军队孤军作战。

在山西南部的中国军团被击溃和日本军队出现在黄河边以后,洛阳和西安处于被占领的直接威胁之下。占领洛阳意味第一战区全军覆没。此外,第五战区左翼也受到直接威胁,进而(如果日本军队进攻中部的话)整个地区都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司令部根据我们的建议赶紧采取措施,加强黄河南岸的防御,特别是把汤恩伯部的第十三军调到了洛阳地区。黄河南岸总共有十六个步兵师、一个独立旅、七个炮兵连。

但是,日军的行动只限于山西南部,没有再前进。山西战役的结果是日军攫取了严重威胁洛阳——西安地区的桥头堡。

1941年5月中国军队在山西南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司令部不愿意削弱集结在西北用以进攻特区的兵力。

向北还是向南?

临近1941年夏天,在希特勒入侵前夕,我国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在遥远的重庆也必须参预解决的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在什么方向进一步展开?大家都知道,西线的

战争我们是避免不了的。那末东线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否将与自己的轴心国盟友合作打击我们的后背？抑或……

在这期间，我和潘友新大使接到莫斯科的正式指示，要我们估量整个形势并且斩钉截铁地说，据我们看，现阶段日本人将进攻什么方向。莫斯科等待我们对这个问题作明白而尽可能准确的回答，因为我们更接近于可能从东方进攻我国的策源地而且置身于远东外交的旋涡之中。

其实是两个问题变成一个问题：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和断定日本在这种情况下的立场。是否西线战争爆发伊始就在东线开辟反苏第二条战线呢？一般政治形势不排除在德国进攻的同时日本进攻我国远东。因此，我国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不无根据地认为，即使日本不与德国同时，也在德国进攻我国之后不久进攻苏联。

毫无疑问，日本是准备进攻苏联的。在占领满洲之后，日本政府和日军司令部立即着手加强满洲—朝鲜跳板。1941年在靠近苏联边境地带的设防区达十八个。在1939—1940年，关东军从九个步兵师增加到十二个步兵师，官兵将近三十五万。关东军总部计划在1941年以扩大师的编制和用新武器装备部队来进一步加强这支军队。在1940—1941年，满洲国和内蒙古傀儡政府的军队也增加了。

但是，在研究中国和远东的形势并依据我占有的材料对形势作分析时，我越来越得出如下结论：在现阶段日本最有可能的不是进攻苏联，而是在南方发动侵略，进攻英美。我的判断是在综合整个情况和具体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无须特别证明，日本没有足够的铁、煤、石油、锡以及诸如此类的原料和战略资源。没有这些东西，日本就不能认为自己是足够强大的，和已经作好了同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开战的准备。在投入大战之前，它需要选择适当时机，即敌人的主力被牵制的时机、打击防御差而原料资源又丰富的

地区,以便尔后有可能同德国和意大利一道顺利地向英美或苏联开战。

按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来说,日本当时是远东最强大的国家。这些兵力大部分还没有投入使用,正在等待时机。

当时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如果在1940年之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着紧密的军事配合的话,那末,日本尽管加入了三国同盟和轴心国反共条约,但总是独立地推行掠夺政策。日本同它的轴心国盟友之间没有过什么协调中心。

日本在等待良机和寻找最弱的牺牲品,为的是进行一次新的闪电式侵略攻势,而又不冒再陷入象在中国那样长期战争的特别风险。那时日本甚至在中国战场也行动谨慎,爱惜兵力,只找最薄弱和防御差的方向出击。

日本利用法国1940年的失败和法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地位削弱的机会,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并且没有遭到特别抵抗。日本在南方的海军和空军基地由于法国在这些地区防御的削弱而得以逐渐扩大。我所掌握的情报资料表明,早在1938年占领的广州、海南岛、海防港逐步变成了日本进一步向南推进的出发基地。在这些地方迅速地为此作必要准备。

一次偶然得来的资料尤其证实了这一点。1941年3月,一架载有一名日本海军将领的飞机飞往海防,在飞越广东上空时失事落进山里。那位海军将领连同他的东西和文件落到了中国游击队手里。我从参谋总部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很快就了解到这个情况。据全部情况判断,那位日本人携带的文件具有重大价值。

我决定直接找蒋介石要这些文件,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去找他的参谋部,反正没有他的准许也得不到应有的回答。我对蒋介石说,我作为顾问,最好能看到这些文件,以便根据日本可能的侵略制定在南方抗日的相应计划。蒋介石回答说,这些文件还没有送到他那里,还在途中,何时送到,他也不知道。这倒是真的。

一个重要情况使我十分着急。这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经过满洲去德国，根据报纸报道的消息得知，他将在莫斯科停留，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相互关系问题进行重要谈判。我把中国游击队在广东山区缴获日本文件一事报告了莫斯科。莫斯科很快回电说：设法尽快搞到文件并火速送往莫斯科。为此，从莫斯科派了一架专机到兰州。莫斯科这样急如星火是因为松冈洋右已在途中。

文件终于弄到了。我赶紧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发往兰州，从那里用专机在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前几天送到了莫斯科。我和我的助手安德烈耶夫和罗申匆匆看了第二份复制件后知道，文件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失事的海军将领带着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海防和海南岛地区筹建军事据点以作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文件附有机场、海军基地和陆军登陆地点的计划和图示。我们估计，这些文件符合实际，并为后来的事态所证实。我把从法国武官伊冯那里得来的材料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材料加以比较之后，我不怀疑，日本准备进攻东南亚。

我的结论基于列宁对太平洋问题的迫近和美日战争的估计。列宁早在二十年代就写道：“由于太平洋和占领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问题，日本和美国之间，几十年来都在进行着极其顽强的斗争，而有关太平洋及其沿岸的全部外交史、经济史、贸易史都十分肯定地指出，这种冲突日益加剧，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①我当时从许多来源得到的材料都证明了列宁的预言。我倾向于认为，在现阶段，日本不会进攻苏联，而是南下占领英美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我不讳言，我当时非常激动不安，想了许多：万一我错了怎么办？但是，我不能同意别种意见。跟许多人一样，我明白，我们一点也不能削弱我国的西部边界，也认为，如果我的结论是正确的，那末，在希特勒进攻我国的时候，就可以从远东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22页。——译者注

抽调一部分兵力到西线去抗击法西斯侵略。

当然,我不是唯一得出这样结论的人。许多年以后才广为人所知:当时在日本的里哈尔德·卓尔格也是以同样的精神报告莫斯科。

日本军国主义在1941年没有进攻苏联。对此有许多客观原因,历史已对这些原因说了有份量的话。首先,这是由于我们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党和政府善于正确估计远东形势,特别是日本准备在南方进攻美英而不得不同我们达成暂时妥协这一情况。我国领导人掌握了确凿的情报。在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时候和日本订立中立条约是我国外交的巨大胜利。因为那时日本知道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这再一次证明,暂时还不存在轴心国军事计划的协调。

在华的许多西方国家外交官,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和蒋介石一道,千方百计要把苏联拖入同日本的冲突之中。他们竭力向日本表明,尽管有中立条约,苏联还是帮助中国,并以此破坏条约。他们对我们暗示,日本一直在满洲加强军队,力图以此散布对日本的不信任。同时,他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也说明,美国和英国掌握了日本在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筹建向南洋进攻基地的准确情报。美国和英国对日本作了一些让步,然而,很清楚,这些让步只是助长了侵略。

蒋介石分子和西方外交官要恶化苏日关系的挑拨活动从1941年春天起搞得特别起劲。

1941年春,重庆盛传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那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部长张冲将军对我发誓说,根据他的情报,德国在6月或者最迟在7月就要进攻苏联。直到6月还是张冲秘密地并且只是在私下谈话中告诉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向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施加强大压力,并通过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进行活动,争取日本尽快进攻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特别是新加坡。希

特勒指望,对新加坡的打击将摧毁英国的抵抗,而这又能孤立美国,防止它参加欧洲战争。关于这一点,国民党军事情报领导人海军将领杨轩成也通告过我们。

在希特勒最亲密的同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之后,传到我和武官处来的关于希特勒准备进攻我国的情报尤其多。鲁道夫到英国的使命在重庆被认为是希特勒决定说服英国妥协,以便然后进攻苏联。这一事实结束了一切谣言。普遍认为,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只是时间问题,并且近在眼前。

因为知道我国西部边境形势紧张,我们要竭力搜集关于远东形势的真实情报,以便就对我国安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预先报告莫斯科——日本的侵略矛头将指向何方:向北还是向南?凡有关日本威胁苏联的材料,我们都毫不拖延地立即转送莫斯科。当然,最后核实和作结论的权利在中央。然而,关于日本在中国南方和海防地区筹建基地的情报越来越多地传到我这里。

在希特勒德国进攻我国前一个月左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部长张冲生了重病。他认为他有义务把中国局势,和所有中国武官驻在国的局势,包括德国的局势通报给我这个总军事顾问。正如后来事态所证实的那样,张冲甚至相当准确地讲出了德国法西斯准备进攻苏联的大概日期。他的病伴有严重的并发症,后来他就死了。

这个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即取决于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地区的形势极其矛盾。

美国和英国因为希望避免恶化同日本的关系,继续尽量通过让步寻求共同语言。暹罗(现在的泰国)和英国达成的协定尤其表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个协定,英国答应向暹罗提供石油产品。而暹罗那时已经变成了日本在南洋地区的基地。表明这一点的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美国对日政策不变的声明,以及美国国务卿

赫尔的关于美国继续向日本提供石油的声明,等等。

但是,南洋地区的形势继续尖锐化。这特别表现在日本和荷属印度当局的谈判破裂上。在香港举行的中国工商界会议上,英国驻华大使克尔说,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任务,只要蒋介石抗日,英国就援助他。暂且这只是空口白话。确实,那时英国采取了一些军事性措施,但不是要给中国以实际援助,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报刊报道了一批美国军用飞机抵达新加坡的消息,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继续加强马来亚和新加坡。换句话说,双方(以日本为一方,英美为另一方)都通过互相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达成妥协。如,在英国同意供给暹罗石油之前,日本把第十八步兵师等部队集结在香港附近并增加在香港水域的战舰。荷属印度和日本之间谈判的中断也可以看作是英国对日本施加压力,旨在使它更加让步。

想到在南洋地区有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美英在口头上声称支援中国,甚至开始和中国商谈联合军事措施。商震将军的缅甸之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中国代表和香港英军司令部进行的谈判也是为了这一目的。克尔在香港讲话时甚至说存在英、美、中军事合作,并且宣称,如果日本进攻南方,这一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据我了解,中国军队的作战部制定了由中国军队保卫缅甸的计划。然而,由于英国人的过错,没有达成协调行动的协议。英国人当时不愿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

1941年初夏,以克莱格特少将为首的美国空军使团到达中国。该使团继续克里使团的工作。如果克里是要搞清一旦爆发日美战争美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中国的话,那末,克莱格特得到的是同样的任务;只是大大缩小和专门化了。他首先要研究中国空军和机场的状况(因为美国的对华军事援助当时是以提供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地勤人员的方式进行的)和在同日本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中国的空军和机场。克莱格特及

其随行人员把相当多时间用于了解中国在成都和昆明的空军基地。空军司令毛邦初将军于6月14日飞往仰光和新加坡,而一批中国飞行员前往仰光去接收美国战斗机。

当时预料,美国将把一百架飞机连同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给中国。这些飞机准备在1941年秋天即通常在轰炸期结束时投入战斗。但是,直到1941年6月在中国还没有一架美国战斗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初步设想(据说是四千万美元)没有超出善良愿望的范围。近1941年6月底,中国从美国那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不错,美国作了一个泛泛的姿态,宣布日中战争结束后美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但当时这对中国只是空头支票,只是象征美国重视同中国友好的方针。

应当说,克尔在中国的时候就对苏联援华的规模特别感兴趣。国民党领导层中的一些官员,其中有戴笠的助手常对我说,美国人根本不反对苏联更多地援助中国,而他们自己则只限于说些热情友好的话和发表道义支持的声明。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那些日子我在中国十分难熬。我的心在国内,和保卫祖国的战友们在一起。然而,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虽然身在遥远的重庆,但希特勒德国进攻我国的消息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我们自己曾把最近几个月内可能发生这样的侵略的情报通告莫斯科。然而,战争的爆发沉重地打击了我们大家。我们继续工作的条件和环境大大复杂化了。我们在西线最初的失利,使得平时讨厌我们在中国的那些人高兴。尽管官方报刊对遭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苏联表示同情,但是,许多中国领导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

从希特勒德国进攻我国起,我们大家备感责任加重,务必要把远东局势的准确情报转告莫斯科。没有经过核实的、尤其是错误的情报资料被剔除,但要弄到我们想要的情报,况且要确保其准确

无误,谈何容易。要知道,制定进一步侵略计划的日本离我们千里之遥。同时,我们需要准确知道才行,以便预先报告中央:处于战斗准备状态的日本海军和空军的大规模突击部队以及没有投入中国的陆军将扑向何方。

东方第二战线的出现可能正值我们在西线遭受惨重损失和退却的危机时刻。现在,许多文件已公开了,大家知道,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1941 年 6 月 24 日建议日本驻柏林大使:“切勿忽视俄国问题,要在本年内狠揍对手并共同摧毁之。”

如果说在 1941 年夏季以前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加紧向日本施加压力,要它尽快投入对英战争并占领新加坡,那末,自德国进攻苏联之时起,希特勒的外交急剧变化。现在,他力争日本尽快参与对苏战争。里宾特洛甫在 1941 年 7 月 10 日发给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的密码电报中说:“我请您考虑一切措施,力争日本尽快投入对俄战争。我已和松冈洋右谈过,越快越好。我们的目标依然不变——冬季之前在横贯西伯利亚之大铁路上同日本握手。在打败俄国之后,轴心国的地位将固若金汤,打败英国或者完全夷除大不列颠群岛只是时间问题。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美国只有面对我们占领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既成事实,而这些殖民地对我们三国的意义非同小可。”

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希特勒对把自己的计划交给日本人并不特别放心。在他的一项指令中说:“不得将‘巴巴罗沙计划’^①的任何材料提供给日本人。”从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 1941 年 7 月 14 日发给里宾特洛甫的密电来看,日本的计划也对德国人严格保密。

奥特写道:“我将千方百计争取日本在最近投入对俄作战。为

^① 1940 年 12 月 18 日希特勒签署的 21 号指令(进攻苏联的一项绝密计划)的代号。计划规定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之前以快速战役击溃苏联,准备工作必须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以前结束。——译者注

说服松冈洋右本人以及外交部、军界、民族主义者和友好人士……我认为，据军事准备情况来判断，日本在最近参战已成定局。”

果然，7、8月间日本报刊大肆进行反苏叫嚣，说似乎由于我国海军司令部的过错什么帆船在日本海沉没，云云。然而，这显然是积极准备向南侵略的障眼法……

苏德战争的爆发成了对远东局势和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路线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中国人民对苏联给予巨大同情。同时，在国民党官员中，尤其是蒋介石本人存在着强调对苏联友好的背后隐藏着自私的目的和打算。蒋介石认为，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下苏日之战不可避免，苏联、英国、美国的接近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和中国在远东的军事同盟。1941年7月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和德国、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并加入反侵略国家同盟。这一外交姿态远非不带自私性质。中国统治集团试图迫使美国、英国和苏联给中国提供更多援助，并且把它们，首先是把苏联拖入同日本的武装冲突。按照中国政府的想法，苏日战争应该成为使远东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方面发生根本转变的因素。因此，中国政府当时极力争取和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对此，我们收到了蒋介石十分明确的提案，这些提案大概事先征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他们急于靠苏日关系的恶化来缓和南洋地区的局势。

我们能否相信中国政府的诚意呢？此刻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即蒋介石利用希特勒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不同日本妥协、也不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呢？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我所掌握的情报表明，在蒋介石的亲信中间，尤其是在蒋介石和白崇禧之间讨论过这种方案。但是，我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政府只是在美国和英国同德国勾结，支持它对苏作战的情况下才会走上这条路。在远东，这意味着它们同日本勾结，唆使日本进攻苏联。还有一个因素阻止蒋介石同日本勾结，即他害怕激起同情苏联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他当时没有可能发动内战。我把我得出的

结论呈报给了莫斯科。

国民党领导人的官方声明归结到一点,就是让人相信苏联不必担心中国会投降,并且在日本进攻苏联领土时,苏联完全可以指望中国武装部队的援助。这显然是蛊惑人心的宣传!在我们困难和紧张的时刻,蒋介石仍然奉行恶化苏日关系的路线,尤其是奉行挑动日苏战争的路线。这就要求我国大使随时做好准备,以便及时把蒋介石的意向报告给我国政府。责任的重担也落到武官处、总军事顾问、所有我国顾问的肩上。

在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进犯苏联以后,蒋介石的军队,本应该对日本展开积极战斗行动,以钳制日本兵力。然而,代之以积极援助苏联的是,在我国这艰难和紧张的时刻,蒋介石照旧持观望和挑拨性立场。他亲自通过我向我国政府提议,要苏联首先进攻日本并且打败它。这就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暴露了他这个政治挑唆者的真正面目。

准备宜昌战役

国民党政府坚持消极抗日策略,同时又要装出自己的军队在前线积极行动的样子。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部和各战区司令部都需要采取点军事行动以向人民交待。他们竭力向中国和国际舆论表明,归他们统率的三百个师正在积极抗日并和日本傀儡军作战。为此,中国司令部无耻地进行欺骗。各个军团和战区按时把前线的战报发往参谋总部。经过参谋总部作战部整理的这些战报按时报给军委会,有时配上符合形势的照片登在报上。军委会按时听取这些战报,但极少就此作出决定。这些战报归入各地司令官采取的档案便束之高阁。经过战区和军团的军事顾问一核实,这些战报差不多总是被推翻。其实,任何军事行动都没有采取。掌握的这些情报,我不想军委会上公开谈,心想这样于事无补,无助于顾问们执行任务。中国司令部还会进一步对我们隐瞒情

况。中国的各司令部，如常言所说，善于往别人眼里掺沙子——连蒙带骗。

中国的将军们是怎样散布关于“大战”的决议和战报，欺骗舆论的呢？见证如下。为了显示中国军队以大量兵力抗日，参谋总部向某个战区下达用一半兵力投入战役的命令，余下的兵力用作后备。战区司令官也向军团下达用一半兵力转入进攻的命令（例如，从四个师中抽出两个师投入进攻）。各军军长又下达把他拥有的师的一半投入进攻的命令。结果，参加战役的军队数量只有几个连或者几个营。显然，它们不可能发动什么重要的战役。但是，却造成了一种假象：命令在执行中。时间在走，战报在写，军委会里参谋总部的工作人员在报告前线战况，而事实上并没有打仗。

1941年春天，日本在发动山西战役的同时，集中空军袭击国民党中国的临时首都重庆。日本司令部采取这一行动，是想引起市民恐慌和挫伤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本人是这样的厚颜无耻，以致毫无愧色地在报上宣布轰炸重庆，他们知道，他们的空军不会遇到有力抵抗。例如，日本宣布对中国首都进行一百小时轰炸。中国人确实能忍耐，顶住了无数次空袭。人民的精神并没有被折服。

从1941年下半年起，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人对日本不增加在中国的兵力一事感到明显不安。同时，日本加速准备进攻东南亚的基地。大概，英美以及中国的侦察机关不会不发现日本在南方所作的积极准备。中国高级领导人，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稍感振奋和自信。他们指望日本不久就会在中国以外发动攻势，他们希望借此赢得战斗伙伴。

从1941年下半年起美国在华代表非常慷慨地允诺给蒋介石以财政和军事援助。新大使高斯和武官德纳西上校抵达重庆。在他们之后，以麦鲁德准将为首的军事使团于1941年8月底来到重庆，以研究中国局势。前不久（8月初），在中国空军内设了一个由

陈纳德少将指挥的“P-40”飞机美国飞行员小组。蒋介石政府赞成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

中国飞行员开始学习美国的空中战术。其实,美国的空中战术和苏联的空中战术没有多少区别。美国飞行员不愿意使用我们的飞行员在成都、兰州等地进行训练和使用的空军基地。他们更多着眼于长江以南的地区,驻在昆明、贵阳以及其他南部城市附近的机场。我们认为,美国人在中国南方选择机场和空军基地可能是为中国陆军和美国空军采取联合行动作准备,以对付在南方的日本基地。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们关于日本准备在南洋地区发动侵略的看法。

以麦鲁德为首的美国使团的到来,尤其是美国飞行员的到来证明,美国尽管在和日本进行谈判,但对日本的行动颇为担忧,于是决定用军事装备,特别是空军装备开始给予中国以实际援助。我从中国空军毛司令那里得悉美国教官抵达重庆的消息以及他想要得到什么样的飞机和多少架飞机。我亲自通过毛司令认识了一些美国空军教官,他们坦率地谈到他们来中国的目的。

与此同时,我们苏联顾问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中国军队开展积极军事行动。这应该首先向中国人自己表明:他们的军队加强了,陷在中国的日本人并不那么强大,他们已不能在当前局势下顺利发动大规模进攻行动。在促进蒋介石军队积极活跃起来的问题上,美国人和英国人也支持我们。此外,我们在准备防御工事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日本在1941年要突破广阔战线上的中国防线和占领新地区的所有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他们发动的个别进攻性战役也被击退了。

在1941年夏季形势下,总军事顾问处的工作人员极力加紧准备中国军队在宜昌地区(汉口以西)前线的中心地段发动进攻。宜昌战役是我国顾问人员计划的,早在1941年3、4月间就制定了,后来由作战部与参谋总部的顾问们并吸收各兵种司令参加共同完

成的。

这次战役的基本目的是粉碎驻守在宜昌——荆门——荆州三角地带的敌人集团军，占领宜昌市并且把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几个军开到直逼汉口的地带。这次战役任务交给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部队去完成，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的部队也参加。他们开到长江边上，切断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吸引敌人的后续部队使其丧失自由机动的可能性。为执行这次战役成立了强大的突击兵团——第三十三军团（第五战区）和第二十六军团（第六战区的左翼），总共达二十万人（包括后备队），大大加强了炮兵。其他战区的部队也同时采取积极军事行动。

在这一地区的日军有两个步兵师——第十三师和第三十九师。日军和卖国贼汪精卫的伪军一起盘踞着盛产稻米的华中粮仓——长江河谷地带的宜昌地区。收复这一地区是迫切需要的。许多著名的中国活动家认为此举是要解决粮食问题和加强国民党中国的财政。

我们还考虑到，蒋介石为了报答美国允诺的援助，他本人需要显示一下，他的军队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收复日本人占领的失地。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西方盟国对中国军队的这次攻势十分关切。在日本人加强满洲关东军的时候，把他们吸引住，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利的。

8月，各个战区的进攻计划都制定妥当并已下达到各军团进一步具体化。第六、第九、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对自己军队的进攻行动基本上作了正确的规划，成立了突击兵团，按照参谋总部的作战计划布置了任务。但是，第五战区把突击兵团减少了一个军，没有给各军团布置具体任务，让他们自行解决。各个军和军团之间最重要的配合行动问题，第五战区司令部竟放手不管。

此外，在准备这次战役的过程中，大大减少了总司令部给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大炮：计划给二百八十七门重炮和中型炮，但实

际上只拨给了一百四十一门(少一倍!)。这样大量压缩拨给主力兵团的战斗部队和大炮使主力兵团大大削弱了。况且,炮兵不随兵团转移,仍呆在原地,离部队很远。炮兵指挥部甚至不知道该支援谁和朝那个方向开炮。在向蒋介石报告宜昌战役准备情况,我坚决建议他还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在把宜昌战役的详细计划提交给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部之前,我决定与我的助手和翻译安德烈耶夫在参谋总部作战部的一个中国将军陪同下深入前线部队,找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谈话,他的部队在攻打宜昌的战斗中应起主要作用。我是希望让进攻计划出自陈诚将军之手,而我只是全力支持他而已。

这次旅行花了我差不多三个星期,但益处是十分明显的。在会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将军及其司令部其他官员时,商定了经我们修改而通过的作战计划。

第六战区是日中战争的主要战区之一,位于长江以南的重庆方向。战区司令官是国民党最优秀将领之一,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陈诚。该战区的防线长达六百公里左右,但从武汉以东到重庆较好的交通线并不多。最好的旱路是南方公路,我们曾沿这条路前往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恩施。第二条路是长江水路。从武汉到重庆和重庆上游一段河道可以通行轮船。从重庆往东的陆路要穿过高山、陡坡和深谷。这些陆路只需少量兵力就可防守。但是,接近宜昌的长江谷地是平原,产粮区。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有水稻、茶和豆类。

我们从重庆出发,取道往南,从綦江地区急转向东,去南川、彭水,再往下就是陈诚的司令部所在地恩施。

那时在中国的旅行由于没有加油站或休息站加油而受到限制。所有的燃料都在严格控制之中,要是燃料以某种方式落到私人手里,落到商人手中,就不可能得到它,因为价格高得不可思议。

在南川地区,我们受到第五军军长的迎接。这个军被认为是

国民党的王牌军。这个军是武汉——重庆，武汉——贵阳主要作战方向的后备军。这个军编制满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主要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的。该军士兵人人识字，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中国统治集团的政治陶冶。这个军是国民党的一根支柱，由蒋介石直接控制。

我们在山地行驶，不时看到流进深谷的小溪。在小河边，溪水旁，间或遇到几个村落。水在山区是稀罕的。因此，人们定居在山麓与河谷。在这些地方种植豆角和大豆，并且是在山坡上的梯田里。

每座房子里住着十至十五个人。每扇门窗都露出穷困，每条街都显出肮脏。然而，尽管如此，普通老百姓对我们苏联人所表现出来的殷勤好客，使我们感到惊讶。有时，我们不得不停在村落附近的路旁稍事休息，以解旅途之乏。这时，我们的车子就会立即被几十个孩子围起来。他们首先问我们是谁。起初，我们随便应酬说是外国人。可他们对此不满足，继续追根问底。当孩子们知道我们是苏联人的时候，就会把消息传遍全村，并且设法弄点东西款待我们。首先是提出熏黑了的铁制茶壶，壶里装满了茶水，有时拿出干粮和水果。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要招待我们时，回答到处都一样：因为苏联人帮助中国打敌人。对待苏联人的这种态度，当然是由国民党执政者授意的。但普通中国人懂得，也知道苏联志愿人员在和他们的死敌——卖身求荣的中国军阀和日本侵略者作战。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恩施即第六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陈诚将军接待我们。在国民党的将领中，他被认为是进步将领之一。陈诚的顾问是冈恰诺夫上校，早在和芬兰白匪打仗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位优秀指挥员。陈将军把城内最好的住宅拨给我们住，同时派了大批便衣特务，他们干得笨拙之极，乃至我们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

我和战区司令官谈得相当坦率。我知道,用劝告是不能使他积极抗日的。对当时的中国将军来说,部队和物资装备遭到损失而与此同时又没有取得战绩,这意味着失去威望和蒙受个人物资损失。应该对他保证苏联物资援助和蒋介石的支持才行。

于是,我们将陈诚保证争取蒋介石同意从胡宗南军团抽调至少一百门炮和三倍弹药来加强主攻方向,尽管我们知道,要蒋介石同意这样的调动是不容易的。我们和陈将军一起研究了眼前战役的情况。日本防御最薄弱的环节是宜昌以北地段,除通往武汉的一条出路以外,所有各方均被中国军队所包围。如果不算掩体和中国农村的泥筑房屋的话,日本人在宜昌地区没有什么坚固的工事。

据冈恰诺夫上校说,陈诚本人曾不只一次考虑过拿下宜昌。陈将军让我研究他和他的顾问一起制定的作战计划。我了解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后,立即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作战计划,我当即表示同意。我作了一点补充——不限于白天作战,要广泛采用夜战,并且增加炮兵参战,把它作为司令官手中的机动后备。我知道,从胡宗南那里要这支炮兵很困难,蒋介石也将反对这样做。但我希望,第六战区司令在我的支持下能够说服蒋介石。从胡宗南将军的军团拨出对准特区的一百门大炮会多少降低一点这个军团的战斗力和缓和一下国民党与共产党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意图。

我们乘轮船逆江而上返回重庆,自宜昌起长江两岸几乎都是山,水深流急,我们在简陋的轮船上待了三天三夜。但是,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侦察,确信直接顺长江两岸没有道路,只有乘轮船或汽艇沿长江而上才能进攻重庆。为保卫这一方向,中国构筑了几处重点防御枢纽,备有大炮,大炮安放在陡岸的山洞里,并且伪装得很好。这些炮能把河道置于直接瞄准的火力之下,而本身极少可能受到日本炮兵或空军的袭击。沿途,我们两次上岸了解这

些防地的情况。我真诚地认为,这里的防御是组织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是否出自偶然,日本飞机几次到长江上空盘旋,迫使我们的轮船停驶和靠岸,因为从飞机上很难发现停机靠岸的轮船。这些中途停靠加上逆流而上大大减缓了我们旅行的速度。经常有领航员上船来把我们慢慢领过特别危险的地方。

回到重庆以后,我向何应钦报告了这次旅行情况,指出,沿长江通往重庆的航道有日军难以攻克的可靠军队和坚固工事护守。我还强调说,陈诚将军的部队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进攻,而日军由于长时间处于消极防御状态,已经丧失了进攻勇气。他们凭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和储备是不能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在这个方向上,只需少量兵力便可抵御强大之敌。我在报告中还提到了日军驻防部队孤立分散的弱点,一支同另一支部队之间经常相距几十公里远。这些部队彼此之间根本缺乏战术甚至作战联系,是孤立无援的目标,不用特别费劲就能从四面八方将它们团团包围,各个击破。我着重指出,驻守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就是这样一支孤立无援的驻军。

我的报告被转呈蒋介石,后来听说,他很欣赏这个报告。那时我还获悉,美国和英国大使和武官也知道了我的这个报告。

日军进攻长沙失败

1941年夏末,我国的处境非常艰难。敌人攻占基辅、扑向莫斯科,逼近列宁格勒。许多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公开对我们说,日本马上就要进攻我国远东地区了。中国人把关东军似乎马上就要进攻我国的征候不断讲给我们:日军把汽车涂上了一种特别颜色,他们通常用这种颜色来伪装进攻前的汽车运输;日军正从华北经过大连调往满洲;大批技术装备,其中包括坦克正调往汉城。所有这些都朝苏联边境而来……

对这些情报应该以谨慎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蒋介石、美国人

和英国人明明看到日本是怎样在中国东南部建立进攻太平洋国家的基地的。西方国家没有采取相应防御措施,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他们却暗示我们说,红军首先打击关东军是有利的。我们对我们的“消息提供者”的幼稚感到震惊。他们预料,我们这些军事顾问会相信他们的挑拨谰言。虽然侦察资料证实满洲日军正向我国边境调动。但并没有从日本或中国本土调增援部队来加强满洲军队。同时,其他有关资料一再证实加紧准备在南方、在海南岛地区和印度支那的日本基地。我再三考虑所有的情报,以免错误估计形势……

就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我从中国军队参谋总部情报部部长杨轩成那里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重要情报。杨将军比较进步,对我们苏联人以及我本人都很好。我和安德烈耶夫经常到他的办公室谈我们在各地的旅行,交流观感。杨将军十分谨慎地向我透露:关于关东军准备进攻苏联的所有议论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日本由于陷足中国,迟误了夺取南方的战略资源。而没有这些资源,日本就不能认为自己作好了同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进行大战的准备。他没有排除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可能,但只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德国占领了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区,例如乌拉尔,也就是说,在苏联削弱到日本不需要多少兵力和物资装备就能跟苏联打仗的时候。

我们明白,日本侵犯苏联或英国和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利于蒋介石。他认为,日本在南方发动攻势首先会对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特别是经缅甸公路的联系造成不良后果。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日军肯定将竭力切断这条通路。顺便说一句,在1942年初,日本人曾使这条公路运输中断。西方大国要经过西藏和印度铺一条通往中国^①的公路很困难,需要的时间长,并且不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安全。日本进攻南方把中国同美国隔绝起来了，中国也无法获得美国的军事供货。相反，日本进攻苏联就使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变得容易多了。

我考虑到，军援物资已经开始由美国运往中国，以麦鲁德为首的军事使团及稍后飞行员的抵达重庆以及中国军队准备进攻宜昌等，将迫使日本政府三思。日本人知道，美国打算开始认真援助中国。他们害怕这一点，特别害怕美国空军的“空中堡垒”。这种情况也使得日本人加速准备在太平洋地区的大战。

日本外交官同时和美国人进行长期谈判。美国继续时而用小恩小惠，时而通过禁运一些战略原料来稳住侵略者，把侵略者的注意力从南方引开，间接推动他向北去进攻苏联。日本外交家频繁来往于华盛顿和东京之间。虽然这是秘密进行的，全世界还是知道日美之间的交易。

美国新大使高斯和武官德纳西到达重庆似乎从一个方面证实，美国已经不寄希望于远东、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的进一步政治稳定了。同时，不合常理的是，看来美国人不很相信日本将会进攻他们的殖民地。

当然，无论我，还是我的同事，都不相信和我国签订了中立条约的日本人的诚意。我国不打算进攻任何人，但是，准备击退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相信在三十年代末曾两次进攻我国远东部队、连做梦都想着我国远东沿海地区的日本人，那是极端幼稚的，如果不说得更重的话。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肯定地说，我国远东的和平完全取决于西线的战斗结果。我国的战绩和粉碎希特勒的“巴巴罗沙计划”将是对日本的最好清醒剂。尽管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想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但中国仍在继续抵抗。

德国、意大利对汪精卫亲日政府的外交承认——这是日本政府早就求之不得的——激起了全国所有进步力量的强烈不满。中国学者和文化人士发表了一系列演说，表达抗战到底的意志和决

心。1941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呼吁苏联、中国、美国 and 英国紧密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应当说,蒋介石对全国进步力量对德国和意大利外交姿态的反应是赞助的,因为他渴望尽早地把苏联和西方大国拖进对日战争中去。

……不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来到重庆。陈将军向我简要通报了一下部队准备进攻的情况。据他说,他来重庆是要亲自征得蒋介石本人对进行这次进攻战的支持。我希望,进攻宜昌的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我和我的助手——在国防部以及军区和军团里的苏联顾问们毫不懈怠地工作,帮助中国人尽可能好地制定计划和尽快打响这次战役。

在制定宜昌战役计划的时候,我预计到,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部会尽量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八路军或游击队参加这一战役。然而,不管是在参谋总部,还是在军区和军团,谁也不提此事。国民党将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佯装不知道有这样一支力量存在似的。一些将军甚至表示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国民党军队受挫的情况下会袭击他们的后方。在我和周恩来谈到即将开展的战役时,他说,根本没有把这次战役通报给中国共产党。

陈诚到达重庆不久,我和他在一次晚宴上相会,白崇禧将军也在场。作为蒋介石的亲信,白崇禧竭力要我相信,似乎最高当局已经作出了关于宜昌战役的决定。现在只耽心一条:蒋介石改变决定和打退堂鼓。凭经验我们知道,中国领导随时可以找到打退堂鼓的借口。我们的顾问从各个战区和军团发来的报告似乎证实,中国的加强部队和装备在向作战地区移动,尽管很缓慢。

我很难说,日本司令部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宜昌战役的准备工作。如果日本人知道的话,大概他们会认为,中国军队未必有能力在这一地区发动认真的积极战斗行动,其证明是,夏末,日本把最精锐的部队从汉口调往长沙去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势。

1941年8月底我们被告知,中国军队转入进攻宜昌。在头几

天，中国军队取得了一些成绩。人们对我们说，中国军队占领了宜昌周围的许多据点，夺取市区的战斗已经打响。在军委会议上，后来在重庆为欢迎麦鲁德率领的美国军事使团举行的集会上，国防部长何应钦甚至报告说，宜昌已在中国人手中。为庆祝“宜昌大捷”，在这次集会上还放了鞭炮和焰火。

但是，这是一个骗局。根据我从我国顾问那里获得的情报，中国将领们缺乏战斗到底的勇气。蒋介石不顾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把兵力投入战斗，以便彻底打败日军抵抗的决定，竟然下令停止进攻。

事实上，当时在宜昌地区没有展开任何大规模的攻势。就全部情况判断，只对一些日军据点发动了零星进攻。这不可能带来重大战果。九月中旬，我在向莫斯科的报告中很遗憾地说：“总地看，蒋介石在最近采取积极攻势的可能性甚微。”

在这件事上，我的预测倒是没有完全兑现。两周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宜昌地区转入进攻。这时，前线的形势终究迫使蒋介石只能孤注一掷。这时日本已在进攻长沙。这是日军1941年在华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又以日本人料想不到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日军进攻长沙以前一段时期的特点是前线相对平静。日军司令部利用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缺乏统一行动及其消极抗战，于1941年夏天进行了一系列大扫荡——六月扫荡山东游击区，七月扫荡在江苏省的新四军游击根据地，八月扫荡晋察冀游击区。日军司令部还吸收了汪精卫的一部分傀儡军进行扫荡。

日本于1941年下半年发动扫荡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占领区的人民军队和游击区。同时还有其政治目的：联合中国的一切反共势力，使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和解，推动他们向人民军队发动内战。如果这一目的得逞，日军司令部就能够运用其大部分远征军来加强在北方的集团军以进攻苏联和加强在南方的集团军以对

付英国和美国。尽管日军司令部拥有的兵力不足以完全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但是,由于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和正规部队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1941年夏,日本决定进攻长沙。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二次进攻长沙^①。担任主攻的是用汉口军团的兵力加强了第十一军。这时,中国司令部错误估计了驻汉口地区的日军在1941年7月、8月以及9月上半月的重新部署。中国司令部认为,日本是在抽调一部分师团到满洲去,因为,据中国人看,马上就要爆发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中国司令部还认为,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日本应该向北方或向南方扩张,几乎没有可能在中国再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因此,中国将领们对日军进攻长沙感到大出所料。

日本司令部发动长沙战役,任务如下:

(1)消灭第九战区的主力。如果达到了这一目的,日军便可长期保障汉口基地免受可能来自南边的中国军队的进攻。而且,这也使他们今后从华中战线撤回一部分兵力,用以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2)夺取长沙,进入湖南省的产稻区,威胁衡阳,进而威胁中国人的后方交通线;

(3)从长沙进一步朝南进攻,与此同时,从广州向北推进,从而威胁联结华中战线和华南战线的粤汉铁路。

日本司令部的计划归结如下:主要进攻从平江西南到株洲(长沙以南)这一总方向的左翼,从而包围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然后,拟用左翼和中部的兵团共同把中国军队压到洞庭湖并在那里歼灭之。为了钳制中国军队,不让中国司令部有机会把部分兵力调到华中战线,日军在北方的郑州地区开展攻势,在南方的广州地区发动进攻。这样,不以国民党司令部的意志为转移,日军在中国

^① 日本第一次进攻长沙是1939年9月。——原注

的所有三条主要战线——华中、华北和华南战线展开了主动的军事行动。

形势很严重。据中国人自己估计,日军在长沙战役的胜利会极为严重地影响中国下一步的抗日。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日军可以占领中国整个东南部,对三个战区马上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已经没有大量后备兵力来对付日军的进攻了。此外,他害怕他的一些将领率部投敌。把自己的最后老底——第五军和第六军投入战斗吧,蒋介石又未必敢。

这里先说一下,还在日本进攻的时候中国司令部就制定了自己的反攻计划。苏联顾问在拟定这个计划中起了巨大作用。这个计划主要是从东到西猛攻日本主力军团的侧翼。此外,第五和第六战区的军队开始进攻,成为日军进攻长沙战役遭到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和第六战区转入进攻是苏联军事顾问事先一手拟定的。正如已说过的那样,正是他们制定了所谓宜昌进攻战计划。如果没有这一计划,那么,第五和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的主动行动就要受挫,因为在拟定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克服了高级将领中一些投降分子们的阻挠,集结了炮兵,重新部署了军队并指向具体目标。

日本方面进攻长沙的有四个步兵师、两个独立旅、第三机械化团、一个炮兵旅、一个山炮团和空军,总共十万二千人左右。中国方面投入这次战役的有十个军(二十七万人左右)。日军投入作战的武器有一千六百九十挺机枪、四百一十五门大炮、八十辆坦克、四十辆装甲车、将近两百架飞机。中国投入战斗的武器有四千七百挺机枪,十九架飞机。

到1941年9月12日,日本人结束了军队集结,成立了两个突击兵团。由第三、第六、第四十步兵师和第三十三步兵师的几个团组成的主力部队兵分两路,进攻平江以西到株洲这一方向,包抄第

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另一个步兵团(第四步兵师的一部分和第十三步兵师的一个旅)沿粤汉铁路正面攻打长沙。这一兵团包括活动在洞庭湖一带的海军陆战队和一个骑兵团。

9月15日下午,日军在没有受到中国第四军和第五十八军有力抵抗的情况下,渡过了新墙河。傍晚,一万多日军士兵已渡到南岸。9月15日到19日,战斗在新墙河和汨罗江^①两河之间展开。这时,所有日军都已渡过新墙河,向新市浯口方向推进。国民党的第四、第二十和第五十八军退到汨罗江北岸。

9月19日至23日期间,双方为抢占汨罗江北岸而展开战斗。日军强渡了汨罗江并把全部师团调往南岸。

在此期间,汨罗江北岸留有三个国民党师(第四师、第二十师和第五十八师),它们活动在日军后方和日军的交通线上。但是,它们的行动是如此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决,以致没有对争夺汨罗江南岸的战斗起实际作用。

经过9月25日至27日的战斗,日军得以击溃中国军队的抵抗并逼近长沙。于是,第六师团于9月29日强渡浏阳河,占领了镇头市(离长沙东南四十公里)。第十三和第四步兵师在长沙市东北二十公里处。

9月27日,日军空投了两支伞兵部队,一支在长沙东五公里处,另一支在长沙东十公里处。同一天,改穿便服的一队日军(第十三师的士兵)潜入长沙,中国军队既消灭了伞兵,又消灭了潜入部队。

日军第三师于9月28日攻占株洲(在长沙以南的要冲)。长沙危在旦夕。日军从南包围了该市。日军在长沙以东集结主力部队准备最后总攻。

……9月下旬,我被紧急召到蒋介石那里。他单独接见了,我,

① 今汨水。——译者注

征求我的建议，如何对付日军的攻势。我答应很快拿出方案来。在和潘友新交换意见之后，我和我的助手们一起迅速拟定了反击日军进攻的计划。计划是冒风险的，然而却是坚定的。它包括三个基本点，拟由中部军团且战且退，逐渐把敌人诱入长沙东北和以东的山间狭路。这些通道两旁埋伏重兵、炮火掩护。幸运的是，那里有几个炮兵连，装备有苏制大炮，并且有我国顾问和大批炮弹贮备。拟在长沙正面，当敌军在交通线拉开、在山里失去后续部队机动之后，进入主要战斗。同时，计划从侧翼猛攻向长沙进发的敌人主力部队。长沙局势尽管危机，但决非毫无希望。日军用主力从左翼包围长沙，就不能包围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中国十个军中有三个军（第十军、第三十七军和第九十九军）处于日军逐渐缩紧的半包围圈中，其余七个军盯着日军侧翼和后方。这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必须实现这个威胁。但是，我们认为主要和决定性的行动是第五和第六战区的部队在中部战线主动进攻汉口日军兵团，这支兵团因把突击部队调往长沙而受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就会被迫停止进攻长沙，并紧急堵塞汉口以西的窟窿。情况果然如此。

当我带着这份计划去找蒋介石时，他没有准备马上全部接受这个计划。我不得不坚持说服他，证明目前别无出路。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蒋介石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并请我监督计划的实施。他对我说：

“您到参谋总部以我的名义执行这项计划好了。如遇妨碍，请直接报告我。”

这正好是我要达到的目的。此外，应我的要求，蒋介石允许根据需要运用全部空军从空中打击对长沙威胁最大的敌军部队。从同蒋介石的谈话中我明白，他为了提高在美国人面前的身价，需要一次胜利来证明他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

计划的内容通过参谋总部下达到有关各战区司令官，而我通知

在前线的苏联顾问。我严令他们仔细监督计划的准确执行,如有什么偏离,就立即报告我。鉴于计划有被泄露的可能和不能保证不被日本人知道,我请求何应钦将军不要在军委会议上讨论这一计划。

我们拟制的计划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日军集中主力急攻长沙,没有料到在其第十一军的侧翼遇到如此大胆的行动。中国人为了阻止敌人前进,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例如,日军未能及时食用从中国人那里抢来的稻谷,因为他们在撤离时运走了所有脱谷的磨子,日军被迫沿中国军队在撤退时破坏了的公路从汉口运送粮食。

我们的顾问密切监视计划的准确实施,称它为蒋介石计划,稍为偏差就立即密报给我。当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将军出于某种考虑企图改变把第十军部队东撤的计划时,我当即亲自将此事报告蒋介石,我说,第三战区司令官竟然不认真执行他的命令(事实上蒋介石从来也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蒋介石立即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顾祝同,严厉训斥了他一顿。这时,长沙逐步得到加强,路上埋设了地雷、设置了路障。

9月27日,第六战区的七十九军部队逼近长沙,七十四军的几个师向浏阳挺进,沿途同日本人交战。中国司令部打算从侧翼猛烈打击日军主力兵团。

9月28日晨,日军开始直接向长沙发起攻势。这时,他们已经感到弹药和粮食不足。中国人截获的无线电报表明,活动在长沙附近的日军司令部请求给他们空投弹药和粮食。

当日军进入长沙当面的山口并开始向市区进发和就要庆祝胜利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中国士兵按照我们的炮手事先调好距离的阵地发出的密集炮火。长沙也顽强抵抗进攻的日军。由于这次战斗,日军遭到巨大损失,仅在长沙市区中国军队后来就清点了一万多具敌军尸体。

在日军进攻长沙的同时，中国军队对驻扎在黄花市地区的日军主力兵团的后方和侧翼发起反攻。中国军队的第二十六、第七十二、第七十四军参加打击侧翼。对密集的敌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现在，中国军队已有了包围南进敌人的实际可能。

九月底，日军在第六和第五战区前线的形势十分险恶。这些战区的中国军队转入反攻直接威胁着宜昌、荆门和汉水流域的其他重要据点。战斗马上就要在汉口以西的日军全线打响，整个这条战线因为把第三、四、十三和四十师团的部队调去攻打长沙而受到削弱。

鉴于这些原因（中国军队在第五和第六战区发起攻势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日军于10月1日开始从长沙往北撤退，全速撤退。10月2日，日军的大部分炮兵已渡过汨罗江到了北岸。

同一天，撤退的日军已到达汨罗江南岸。在撤退的路上，日军丢掉辎重、避免和追击的中国军队交火。如果在侧翼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中国军队就能把整个第十一军包围在山里。10月10日至12日，参加攻打长沙战役的日军师团全部撤回到了进攻前的出发阵地。

长沙战役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军队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威望，也提高了在美国人和英国人中的威望。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没有料到会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和国民党军队配合得如此协调的行动。

长沙战役告捷以后，我们苏联顾问便退避三舍，仿佛不存在一样。蒋介石兴致勃勃地邀请所有军事使团团团长同他一起乘他的个人专机飞往长沙观看战场以及长沙附近遍地皆是的日军尸体。他盛情地邀我同行，但我以身体不适为由谢绝了。我命令我国的所有顾问不得参加这次“检阅”，为的是让蒋介石及其将领独享全部胜利荣誉。

就这样，长沙战役以日本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军司令部的任务没有完成。日军失败的基本原因是第五和第六战区的中国

部队的进攻。为了保住汉口以西的整个战线,日军被迫停止进攻长沙并慌忙向汉水调兵。

应当指出,中国司令部是违心在第五和第六战区发动主动行动的。因此,长沙一带形势刚刚好转,蒋介石就下令这些战区司令部停止进攻。结果,进攻停止了,尽管完全有可能在日军从长沙地区调来之前牢固地控制汉水和拿下宜昌。长沙战役本可以使日军在汉口附近遭到巨大失败。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基本路线是借刀杀人(蒋介石希望爆发苏日战争,英美对日宣战),这是中国司令部没有充分利用华中战线最重要地区的有利形势的原因之所在。

在这次战役中还暴露了另一点——蒋介石不愿意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来加强突击兵团。对此,美国人心领神会。至少,在攻打宜昌的战役中他们看得清楚,蒋介石害怕从封锁特区的胡宗南部队中抽调增援部队,尤其是炮兵。而日本向南方扩张的可能性使美国人对国共力量的联合颇为关心,目的是更积极地把日军钳制在中国。据我所知,美国新任大使同周恩来几次会商。可见,从1941年秋天起,美国对特区极感兴趣。正如后来事态发展表明的那样,以美国大使高斯和巴雷特上校(后者还在中国)为首的美国外交代表和军事代表,花了许多时间去影响蒋介石和毛泽东,让他们联合抗日。

美英驻华代表不再在国共两党之间煽动敌对情绪的时候到了。然而,让蒋介石和毛泽东联合军事行动谈何容易。蒋介石不愿意也不可能容忍美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直接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

1941年秋天的战斗进程完全表明,中国军队不仅能够防御,而且可以进攻,而若是国共两党协调行动,它们给敌人有效打击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其例之一是,在长沙之战期间,日军司令部在华北战线发动了攻势。1941年9月26日,由三个步兵师组成的一个日军兵团渡过黄河,发动进攻,企图控制陇海铁路及其枢纽站

和郑州、洛阳市。这样使国民党前线的第一和第五战区部队的作战运输遭到破坏,造成日军大部队开往潼关、西安,进而与第十一军相配合向重庆推进的危险。连接中国与苏联的交通线也将受到威胁。

应该说,在战役第一阶段日军取得了很大胜利。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的前线形势极为严重。蒋介石已没有后备部队。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将军和我国顾问都直接申明,要击退日军,兵力不足。

我和帕纽什金把情势危急的情况报告给莫斯科并请求力劝毛泽东打击日军的后方和侧翼,以助蒋介石一臂之力。此外,在军委会议上我建议何应钦部长命令八路军进攻日军的后方和侧翼。何应钦正确理解了 my 建议,确信这一次他的命令将得到执行。由于国共军队的联合攻势,敌人被击败,退回到出发阵地。

我还看到,中国参谋总部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决定:给八路军下达还是不下达进攻命令。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只是在何应钦相信我、才明白这一次中共军队真的会进行反攻之后,他才决定下这样的命令的。我不怀疑,只要国共军队协同作战、互相信任,不仅可以打退日军的进攻,而且可以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为彻底击败日军奠定基础。

……在上一次军委会议上宣读了参谋总部的战报:共产党军队的进攻迫使日军退回原来阵地。一些中国报纸报道说,共产党帮助了蒋介石军队。但这种情况持续没有多久。国民党不愿意让人民知道共产党军队打败日本人的消息,便停止向报纸提供有关这一战役的任何消息。与此同时,从周恩来和叶剑英那里获得的情报说,八路军使日本军队遭到严重损失。

黄河两岸战斗的结果增强了人民和军队的信心,日本是可以打败的,它并不那么强大,只要齐心合力,胜利是有保障的。我们苏联顾问以此向中国领导表明,在国共两党正确配合的情况下,它

们的军队能够抗日成功。

日军 1941 年秋天发动进攻的失败,原因不只是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增强。主要原因是日本最高司令部这时正忙于准备太平洋大战。日本的运输工具载着军事装备、燃料、弹药和部队奔向南方。同时,日本继续加强在满洲针对苏联的军队。看来,日军司令部因保存后备军来发动新的侵略行动而未能加强在华中发动攻势的兵团。

现在,当战争各方的秘密计划都已公诸与众的时候,许多事情都真相大白了。但在当时,在希特勒军队逼近莫斯科和在我国远东边境外的满洲集结了七十万关东军的时候,作出日本不准备北进而是南进的结论,那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冒险的。

在西部,我国军队和希特勒军队的战斗将是旷日持久的。苏德战场的形势无疑影响了谨慎的近卫内阁的政策。它不想冒险,而等待良机,以使用少量兵力和少流血的代价就能占领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广阔地带。但是,苏联军队的英勇自卫、“巴巴罗沙”计划的被粉碎,使日本统治集团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1941 年 11 月 7 日的红场检阅在远东产生了深刻印象。在中国听到莫斯科举行了阅兵式的消息时,许多人不相信。坦率地说,我们也没有料到,当德国军队已到了莫斯科大门口时,还在红场举行传统的阅兵式。1941 年 11 月 7 日的阅兵式作为精神因素的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这是对盼望苏联尽快灭亡的敌人及其盟友、是对我们所有敌人的不可抗拒的打击。

早在 1941 年 10 月,当战斗在莫斯科城下激烈进行的时候,慎重的近卫内阁辞职了,代之上台的是东条英机内阁。众所周知,海军集团在内阁中有很大影响。“海员们”主张日本向南方扩张,夺取英国、美国、法国在印度支那、缅甸,南洋各国和太平洋区域的领地。基地和前进据点的准备工作在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加速进行。所有这一切证实了我们的估计和结论:日本准备在南方发动

攻击。10月底,我获得了日本空军大批南调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据我们统计,1941年9月至10月,日本向南方调去了将近一千架飞机。蒋介石也知道这件事。

还应该考虑到一个情况。在1941年间,在华日军发动的进攻性战役除在游击区以外,没有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每次他们都顺利开战,起初取得一些胜利,但最终撤回出发阵地。日本人知道,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武器援助从南方沿缅甸公路流入中国,自然,这增加了中国抗战的能力。依日本总司令部的看法,只有从南方完全封锁中国,才能扼死它……

日本准备南下

日本政府没有马上决定在南方发动侵略。它密切注视着欧洲事态的发展,并根据欧洲事态的进程来准备或是攻打苏联,或是在南方进攻英美。尽管有1941年春天签订的中立条约,战争的危险仍然严重威胁着我国远东。1941年7月5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批准了名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对苏战争计划。

1941年9月以前,日本政府处在十字路口。这时,日本大本营已最后制定了进攻北方和南方的计划。本来,德国法西斯1941年夏天的顺利攻势有利于日本进犯苏联远东领土。同时,日本大本营注意到,德军的对苏闪电战正在告吹,苏联军队的抵抗正在加强。日本的如意算盘——苏军司令部将把远东的主力部队调往西线——落空了。这对他们是件不愉快的事。日本害怕陷入和苏联的长期战争中。同时,它们又害怕放过攫取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太平洋的领地的良机,因为这些国家正逐渐加强这些领地,开始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并且逐渐增兵。美国的军火工业也在增加新式武器的生产。

正如现在已经知道的那样,1941年8月9日,即在通过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之后一个月,西线的“巴巴罗沙”计划开始被

粉碎的时候，帝国大本营决定推迟进攻苏联，把注意力转向准备在南方发动侵略。9月，这一决定成为最后决定。后来，日本领导人拟同轴心国伙伴一道占领美洲大陆各国。根据这一决定，日本陆军总部和海军总部在8月中旬商定，基本方案是对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发动联合突然袭击。空军应给予最大支援。

这样，希特勒及其外交官拼命要在远东开辟对苏第二战场的努力失败了。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红军的英勇抵抗及其结果——粉碎了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闪电战计划。

从1941年夏季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准备发动大战的工作进入尾声，其特点是增加军事拨款和大力发展军火工业，扩大陆军和海军，加强对国民和武装部队成员的思想整肃。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将军组阁上台。他在内阁中任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这就加强了国内的警察恐怖，在“全民总动员”的旗号下剥夺了国民的政治权利。国内建立了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使日本免遭英美不公平待遇的保护者！”、“共荣圈将改善亚洲的形势！”等口号下广泛开展侵略宣传。在日本国内，禁止一切政党活动，成立统一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

1940年10月日军有一百六十九万四千人，1941年年底则超过二百四十万。日军的强大优势还在于海军和空军的配合行动组织得很好。此外，日本得以隐蔽地把陆军调到南方的前进基地。

当时，美国和英国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分散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阔地带。日军可以利用对方在作战计划和部队指挥上的不一致将其各个击破。

另外，美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还认为，日本不敢进攻它的领地。美国军事司令部也持这种意见，它切望赢得时间，竭力建议美国政府继续玩弄政治手腕以推迟同日本的冲突。在日军进攻美国武装部队之前不久，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海军参谋长史

塔克上将在他们发表的联合备忘录中强调指出，苏联和日本处于战争的前夜。这些战略家直到最后一刻还觉得因为有苏联作替身，美国免于战争是保险的。

英国政府的心境有些不同。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直接威胁着英国的殖民地。丘吉尔试图影响美国政府，让它对日本在南方的侵略持比较强硬的立场。1941年8月10日，丘吉尔在大西洋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建议罗斯福共同警告日本进一步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是危险的。罗斯福拒绝了。他只答应丘吉尔提请日本政府注意，如果进攻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将采取能够导致爆发美日战争的措施。英国政府被牵制在欧洲和非洲战场，难以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因此，英国竭力推动美国更坚决地抵制日本在东南亚的野心。美国看到，日军是怎样在逼近马来亚、新加坡、荷属印度和菲律宾。美国政府不反对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力图以此来增加日本对进口必须物资的依赖性。7月25日，美国政府首先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并且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英国和荷属印度也效法美国。日本对这些国家的资产也采取了相应行动。冷战开始了。美国从8月1日起禁止把除棉花和粮食以外的几乎全部物资运往日本。

按军事系统，菲律宾军队隶属于美军司令部。美国军队，主要是海军正开往这里。前已说过，继美国军事使团之后，美国飞行员和飞机也抵达中国。1941年10月美国向中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中国方面承担义务，在美国空军驻扎的地区修建必需数量的机场、仓库和道路。所有中国飞行员开始重新进行飞行训练，学习按美国方式进行空战。

但是，这些敷衍措施只是更加刺激了日本统治集团的好战情绪，成为反对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占领了“生存空间”的西方大国的宣传靶子。

蒋介石及其以国防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参谋总部在改唱美国的

调子。他们不能忽视美国那装得满满的钱袋、把租借法案^①扩大到中国、美国军事生产的膨胀以及其他因素。我们苏联代表看到美国在中国政界和军界的影响日益增长,只能表示欢迎他们帮助中国抗战。我们仅仅希望,这一帮助不被用来激化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内部冲突,而完全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

日本最高司令部决定以对西方大国的海军进行突然袭击来发动大战。日本仿效希特勒德国,大概也指望突然袭击会奏效。结果,正如后来事态发展的全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对手没有被打昏,只是被打倒而已。还有一个问题是,日本怎么能够实现这次突然袭击?英国和美国的侦察机关怎么能够放过日军从北方调往南方的长期而又复杂的行动?以东条英机将军为首的日本政府开始在国内外采取的措施不可能完全不透露到外界。

当然,日本在准备实施“南下方案”时,对自己的军事政治意图和计划特别保密。据悉,日本政府在这个时候严格限制外交通信,甚至对盟国也极少通报自己的意向。令人惊奇的是,德国和意大利是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日本的计划时,即在偷袭珍珠港之后才知道日本的计划。日军司令部为空中突击队向夏威夷群岛运动选择了复杂的航线,在舰只和飞机之间进行复杂的无线电联络,还采取了迷惑敌军的其他措施。

但,在我们看来,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在所有这些年里,美国和英国政府非常希望日本转而侵略苏联。为此,它们推行“绥靖”政策,相信自己的愿望迟早会实现。直到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政府还继续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而日本则利用这一谈判来掩饰自己的计划。美国政府和美军司令部没有能够判明日本侵略的基本打击方向和进行袭击的时间(因为美国是知道日本外交密电码的!)这一事实是推行“远东慕尼黑”政策的直接后果。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将物资租借给各盟国的办法。——译者注

1941年8月以来,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不上挑拨性侦察情报的当,更不能把我国国防人民委员部引入歧途——落到了我这个武官兼蒋介石顾问的肩上。何况具有挑拨性的不仅是谣言,而且有从各个渠道,尤其是从各个军事使团,其中包括从中国参谋总部源源不绝而来的文件。我不想在这里历数落到我们武官处的美国和英国的假情报文件。人们极力向我们灌输一个思想:日本马上就要进攻苏联远东。中国人比谁都更热衷于传送这种虚假情报,对我国在重庆和在各战区的军事顾问说,无论在满洲还是在朝鲜的日本军队都在准备进犯苏联领土。甚至在何应钦主持召开的军委会议上,作战部长——中国战局的主要报告人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重复似乎日本军队准备进攻苏联的谣言。

从1941年9月起,特别是在10月,日本从北方,从满洲和华北将大批空军调往南方。这一调动不只一次得到在各战区和军团的我国军事顾问的证实。但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仅把这一事实看作是对陈纳德将军小组的美国飞机到达中国南方——昆明和贵阳地区而采取的反措施而已。不排除美国非常希望这样来解释上述事实。然而,美国仍然感到某种不安,开始比以前更积极地给予蒋介石以军事援助。

日军司令部从海上调动陆军。尽管我们对这一情况知道得迟了一点,但这是从他们在南方港口上岸的地方了解到的。关于日本海军的情况,我们毫无所知,日本对这些情况保密甚严。

在证实了日本把一千多架飞机从北方调往南方之后,我最后确信,这已是对太平洋战争作实际准备。我相信,蒋介石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他于10月派何应钦到南方的云南省去就地研究形势。我的两名助手(负责炮兵部队和工兵工程部队)随同何应钦前往,帮助他详细研究中国南部边境的防御系统。何应钦从南方回来后,来到我那挂有测绘地图的办公室里,并且(无先例地)亲自把关于南部各战区、防御安排、特别是仰光—昆明公路的防御情况通

报给我。照何应钦说,南方各省的防御,包括对公路的防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的助手也这样说。

我想,美国和英国也掌握这个情况,但它们没有做什么实际的事情来加强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仰光—昆明干线的防御,因为它们力不从心。何应钦南方之行告诉我,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部对南方局势感到不安,担心那里将发生严重的事件。

回国参战

1941年12月初,我由重庆去成都治疗裂开了口的旧伤。

那正是莫斯科保卫战的紧张关头,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南面绕过土拉、逼近卡希拉,在北面占领了亚赫罗马、渡过了莫斯科—伏尔加运河。

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我们苏联的飞机场就在这里。陈纳德将军领导的一个空军小组打算驻在这里。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这一天,我在成都一家旅馆里得知,美国大使和武官以及飞行员一起到达这里。同他们一道来的还有几个英国军官。在餐厅会晤的时候,我们交换了对远东形势的看法。美国人和英国人异口同声对我说,他们并不特别担心在这个地区会发生什么大麻烦。在长沙战役胜利结束以及苏军在罗斯托夫地区取胜之后,又鉴于莫斯科城下的激战,他们认为,日本目前未必敢于在远东对谁发动战争,何况他们的手脚被束缚在中国。因此,我的对话者们不担心在这期间发生什么事情,决定来成都,在这里安静地休息,以排除重庆的劳累和不舒适。事实上——我对此毫不怀疑——他们来成都是要熟悉部署空军的情况。很可能,他们指望莫斯科激战会推动日本进攻我国远东。

我不能不感到吃惊的是,早就在中国和日本拥有间谍网的美英情报机关难道误入自己的结论如此之深吗?要知道,它们不会不发现日军向南调动。我还想,蒋介石和戴笠是故意不向英国人

和美国人透露他们拥有的侦察情报，以便不妨碍日本尽快动手——即使不在北方进攻苏联，也在南方进攻英美。

早在初秋我就因公派了我的助手罗申前去香港。利用我们是盟国这一点，罗申住进了英国在香港的情报机关的公馆。那里有极其秘密的和正在活动的情报网，依我们看，它对情况的预测不可能有差错。英国香港情报机关的负责官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罗申，并且同他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

罗申从香港回来以后向我报告了英国人的坚定想法：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排除日本可能采取行动。英国人向罗申通报了无疑是同美国合伙搞来的丰富的侦察情报。

我坚信自己的判断，同时也想：万一我错了怎么办？万一我发往莫斯科的关于日本就要进攻南方的情报是不对的、我受了情报来源的欺骗怎么办？

1941年12月7日至8日夜間，我到天亮时才入睡。早晨，我刚要下楼去餐厅吃早点，我的空军助手雷巴科夫上校飞步跑来报告说，美国人和英国人紧急离开成都到重庆去了。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他们不会那样急促地离开成都。下楼之后，我在饭桌上听到人们议论纷纷。我的翻译安德烈耶夫很快弄到了一些当地报纸。报纸的号外刊登的消息说，日本空军和海军不经任何警告进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珍珠港海军基地，猛烈袭击了在那里的美国海军舰只。美国海军损失十分惨重。

日军进一步袭击英国海军，也取得了胜利，他们击沉了驶抵新加坡不久的英国“威尔斯王号”主力舰和“反击号”战斗巡洋舰。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就这样开始了。

在战争的头几天，日军重创了美国和英国的海军，赢得了制海权，可以对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印度发起大规模进攻而不担心遭到对方的严重抵抗。

……不久，我接到了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我紧急回重庆工作。

这样，西方国家统治集团推行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完全失败了。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们现在陷入了同侵略者的血腥战争，曾几何时他们还在纵容侵略者去进攻别人。由于我党和我国政府的英明而有远见的政策，苏联得以避免在东方开辟第二战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胜利。

事态的发展完全不象西方大国所设计的那样。在12月遭到日本袭击之后，美国被迫被突然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尽力置身于战争之外，保存自己的实力，推行一条既能削弱法西斯德国，又能削弱苏联的路线，那么，现在它不得不重洗被事态的整个进程打乱了牌。

太平洋和东南亚战争的头几个月，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国 and 英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在此期间，日军达到了自己的最近目标：1942年5月前夕拿下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印度、缅甸、太平洋的一系列岛屿，并且逼近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大门。日本占领了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和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然而，日本赎武主义者要在这些胜利之后摧毁同盟国抵抗意志的算盘落空了。日本卷入与同盟国的长期战争，它们的军事潜力和经济潜力超过日本许多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场在盟国，尤其是美国看来，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

我于12月中旬回到重庆。国民党政界和军界人士在获悉太平洋战争爆发消息之后的那种直言不讳的高兴劲儿使我吃惊。从蒋介石本人起到他的追随者对这一时刻盼望已久了。这也不足为奇。中国单独抗日已经四年多了。现在，站到它这一边来的是美国和英国这样一些富裕而有影响的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它将同这些国家一起共同抵抗侵略者。

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现在指望获得西方盟国的大宗贷款和大批现代化武器。（众所周知，当时毛泽东也指望获得西方国家的武器援助。）同时，蒋介石和其他领导人认为，从现在起，对日战争的重担将落到其他国家的肩上，而中国将得到一些喘息机会。

西方大国的态度却另一样。它们提供贷款和武器援助是换取中国军队的积极作战，以减轻它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压力。于是，1941年12月在重庆发生了已经作为盟国的各方面的新冲突。这些冲突的基础依然如故：一方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并用所得到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准备给点什么，但以中国人民的鲜血为代价。

这些日子里，美国和英国的军事代表络绎不绝地出入中国参谋总部。美国军人简直是向中国将军苦苦哀求，而外交官则千方百计要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的真诚友谊。

记得1941年12月的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和英国大使，还有苏联大使和我们在华的苏联军事代表。英国大使卡尔发言。他在中国人面前竭力讨好，要他们相信英国爱好和平的精神和英国对中国的友善态度。他说，他的理想、他的愿望、他的主张——就是尽快和中国联合，和中国成为共同对敌的战斗盟友，这一切终于实现了，如今，英国人和中国人是战友和患难之交。

我们都知道，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其他国家一起瓜分中国，占领香港和九龙、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帮助镇压太平军，就在不久前又参与推行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

1941年12月底，蒋介石邀请美国、英国和苏联武官到他那里，提议成立协调抗日远东委员会。我们很清楚，蒋介石没有放弃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的希望。他想把反希特勒同盟国的主力拉去对付日本。我问：这个委员会由谁牵头？蒋介石说：美国人。他的回答表明，他首先依赖的是谁。1942年初史迪威将军作为蒋介石的顾问来到中国，后来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和中国在缅甸

远征军的司令^①。

那些天,在军委会上观察到,中国军事领导人真是喜出望外。但暂时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日本在各个战场上紧逼同盟国。英国人和美国人心里明白,他们的主要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希特勒。不制克希特勒德国,他们不可能把主要力量投入抗日。因此,蒋介石建立远东委员会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盟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争头几个月中的失利在某种程度上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大失所望。当蒋介石预见到日本可能占领缅甸时,他通过自己的将领,特别是空军司令毛将军对我进行试探,如果美国的军事援助通过波斯湾、伊朗,进而通过我国的中亚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运入新疆,苏联的态度如何。我作为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军事顾问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属于我的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

美国和英国政府竭力催促国民党领导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尽可能多地钳制日军,以便减轻日军进攻盟国军队的压力。美国人比谁都更关心中国军队的积极抗战。为此,他们不反对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尤其是八路军进行接触。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对积极抗日依旧不感兴趣,加之日本占领缅甸铁路导致盟国对华军事供货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使国民党军队的状况复杂化。蒋介石继续“抗战”,实际上无所作为,等待观望。美国经英国同意动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但不是消灭在华日军,而是用来保护在缅甸的英国殖民地,蒋介石军队在那里遭到了失败。

日军仍旧握有战场的主动权。这时日军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守住1941年12月初形成的战线。为了钳制国民党军队的南方兵团和促使蒋介石投降,日本司令部决定在湖北省和河南省发动一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场战役。1941年12月24日，日本司令部以第十一军的兵力发动了战争期间的第三次进攻长沙的战役。日军在这一地区的人数为十万人左右，中国军队为二十五万。在长沙城下的战斗中，日军突入市内。但是，中国军队于1942年1月5日发动了反攻，1月中旬日军被打出市区，前线的局势又恢复原状。

我越来越坚信，我已经完成了派我来华时布置给我的任务。军事顾问处和武官处对中国情况以及围绕中国发生的事件正确地报告了我国国防人民委员部。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开始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强烈关注中国战线的积极抗战。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投靠美国的意向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我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我作为总军事顾问在中国已无事可做。和史迪威将军作顾问竞争是不适当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不能介入，也就是说，不能建议蒋介石或中国军队参谋总部怎样帮助美国和英国打日本。这也没有意义，因为对待我的建议开始谨慎了。谁也没有，至少在中国军界谁也没有卸掉我的总军事顾问之职。我不愿意在中国公众面前为中国精锐部队在缅甸因执行美国和英国人的命令而遭到的失败承担责任。我想回国投入我国人民抗击希特勒进攻的战斗。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我暗示我们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已经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积极性。终于，我接到了莫斯科召我回国述职的简短电报。从电报中我明白，再不会回到中国了。

1942年2月下半月，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阿拉木图军事学校校长、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菲拉托夫上校在那里迎接我。1919年我指挥第四十三步兵红旗团，他指挥第五师十五旅四十四团。会晤虽然是短暂的，但他还是对我谈了些前线战况。

在去古比雪夫的途中，我在每一个车站都看到人们一张张紧

张而忧虑的面孔,也看到在危急时期通常有的那种严肃和认真。火车正点运行。车上的服务人员都上了年纪,因为年轻人都应征入伍了,但工作有条不紊、干净利落。在不久前还是男人工作的地方,现在换上了身穿棉坎肩、脸被风吹得又红又粗糙的妇女。

我急切地要上前线,尽快投身于同我国的主要敌人法西斯德国的战斗。不久,我被任命为驻扎在土拉和梁赞地区的第一后备军的军长。1941年7月初,我率领这支军队奔赴前线,并且立即投入最激烈的战斗——斯大林格勒战役。我为我积极参加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史诗般壮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而自豪。

1980年4月译校

(摘自《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
1980年版)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张国焘 叛变行径的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8年4月18日)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1938年4月19日)

甲 张国焘脱党的经过

(一)四月二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二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在七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林同志报告之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二)张到武汉后,未去八路军办事处,亦未找党,在党外人的秘密保护之下,开旅馆居住。当中央同志将他找到与之谈话时,他公开表示自己已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总路线与党均表示不信任,对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经中央同志多方劝导之后才勉强搬入八路军办事处。

(三)他住办事处时,曾见蒋介石先生一次,开始即向蒋介石先生说:“在外糊涂多时”,完全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回办事处时,又中途逃脱,经办事处同志多方寻找之后,才找回办事处。在办事处期间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并遍访当地要人,到处进行破坏民族抗日团结与党的团结的各种挑拨离间的活动。最后他自己决定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负责人见面,并由该负责人派武装汽车将他接去,从此即不知其所在。

(四)张到汉后,中央曾多方设法劝导,促其悔悟,要他回党工作,万一不愿回党工作,亦望他向党请假,暂时找一适当地点,或在国内,或在海外,或到国际去,以便改变其思想。但均被拒绝,而在他于四月十七日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负责人后,即以书面申明自己最后脱离的决心,于是中央乃于十八日最后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此决定。

乙 张国焘脱党的历史根源

(一)张国焘是中共党内老党员之一,也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人。他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因他历次的严重错误,曾被留国际三年余,给他学习机会,改正错误。但他在国际不但不曾改正错误,反而参加了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并联合过托派分子。后来,几次写悔过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国际方才允许他回国工作。

(二)他回国时已在反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之后(一九三一年),当时,他在工作中表示积极,以图取得中央的信任。不久,即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开始时,尚能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但在工作中又进行其小组织活动,以个人的野心为出发点,用无原则的官僚政客手段,拉拢干部,打击坚决拥护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沈泽民同志。这些事实均证明张国焘始终以两面派的手段掩盖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面目。

(三)在川陕苏区时,他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逐渐发展。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悲观失望,最后形成整个错误的退却逃跑的政治路

线。从退出川陕苏区到与中央会合,又与中央分裂,成立伪中央为止,是他的错误登峰造极的时期(关于他那时的错误,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他在那时犯了无数为一个共产党员所不应犯的错误,造成了很多不可宽恕的罪恶,违犯一切党纪军纪,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四)由于他的错误领导的无出路,军中党内大多数干部的不满意与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宽大政策,所以最后他不能不被迫取消伪中央,率领队伍北上与中央会合,表示暂时屈服。后来他又写了几次声明书,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对于中央当时所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表示怀疑与不满。西安事变时,坚决主张谋害蒋先生及发动内战的方针,同中央的和平方针相对立。在这期间,他仍然处处以两面派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

(五)张国焘的脱党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

丙 张国焘何以在统一战线成立之后与抗战紧张之时脱党呢?

(一)与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自卫战,其中必然要经过与克服无数的困难与曲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张国焘在抗战未发生之前,即对革命表示悲观,对抗日表示绝望,因此形成了他的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发生之后,他经不起这种残酷的长期的斗争,以至在日寇的横暴的进攻前面表示投降,而离开了最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求得最后解放的唯一正确路线。本党是这一路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与执行者,因此,本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出于至诚的,而不是暂时的与敷衍的。但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为彻底实现民族解放的任务以及将来共产主义的任务,本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保持是绝对必要的。但张国焘

始终不了解这一点。在国共合作尚未或〔成〕立以前，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表示怀疑与不满，在国共合作已经成立之后与正当抗战紧张之时，他又转到另一极端，走到投降国民党。

（三）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长大起来了，党的影响也扩大了。无数纯洁的革命分子要求在党的领导之下工作奋斗，并大批的加入党。但是，在另一方面，党内最少数最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这个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在其挑拨离间与各种诱惑之下，发生动摇腐化，丧失了阶级的立场以至个别的脱离党。这种个别脱离党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最近如周昆，张绍东，李龙贵等的逃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张国焘的脱党，外界对他的这种影响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对于资产阶级这种影响，我们不能有过分的夸大的估计，因为这只能够影响个别的动摇分子。党就要在清洗这些投降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的斗争中来巩固自己的团结与力量。但对于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十分警惕的。

（四）党在中央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党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八路军在抗战前线的胜利与模范的作用，更加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过去受过国焘路线影响的同志，也因中央正确的开展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都能了解到国焘路线的错误，而拥护中央路线了。因此，在两面派掩盖之下的反党的张国焘路线得不到党内任何同志的同情与拥护，他的反党的言论与活动，处处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张国焘在党内是孤立了，他在党内寻找群众的一切企图是失败了。于是他只有从党内跑出去，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他的会见陈独秀，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张国焘脱党以后的前途。

丁 党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

(一)中央对于张国焘过去的错误曾一贯的采取了教育与说服的方针,就是在他犯了成立伪中央的那样严重错误之后,中央仍本宽大精神用一切方法多方诱导,并仍分配他以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一切这些仁至义尽的方法终究挽救不了这个腐朽的机会主义(者)的没落。中央过去对于挽救一个犯错误的党员实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二)张国焘的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这使我党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使我党更能健康的与巩固的向着自己光明的前途迈进。

(三)在清洗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更应该坚持民族抗战,坚持扩大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以最后战胜日寇的总路线,加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同一切个人野心的派别的无原则的破坏纪律的行动以及同生活上的腐化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同志,巩固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

(四)在反对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应该加紧向全党同志解释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作用与意义,使他们清楚了解,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是与扩大巩固共产党不可分离的,应该加紧对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能够灵活的使用这个尖锐的武器去为民族解放的事业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

(五)中央对于坚决反对张国焘叛党行为与坚决拥护国际和中央路线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张国焘的影响与是否犯过错误,都是一致爱护的。各级党部不得因反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而无根据的牵涉到或怀疑到任何忠实同志。同时,估计到张国焘出党之后必然从党外千方百计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自己政治上与组织上的警惕性,严防张国焘的挑拨离间欺骗煽惑

与破坏。

(六)让张国焘等这类腐化的叛党分子滚出去吧。更加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加强党的团结与一致。吸收成千成万的优秀的革命分子到党内来,回答这些东西的叛党吧。

让我们全体忠实的共产党员高举马克思与列宁的旗帜为最后战胜日寇为民族的,社会的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 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张国焘 问题的声明^①

(1938年9月)

……同时党巩固自身的队伍，驱逐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徒与[与]逃兵。党在以后也将无情地对付将自己私人利益放在伟大人民利益之上的人们。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① 本篇题目为编者所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

(1938年9月)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

(二)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他背叛了共产主义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将自己出卖给中华民族的敌人。主席团深信，张国焘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国际指示报告*

(1938年9月)

王稼祥

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1]、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 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2]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3]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二) 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问题

(1) 国际认为,统一战线是建立起来了,但今天还不够广泛与坚固,这是总的估计。

(2) 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是反对外族压迫,又是在外国敌人打到中国来、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在统一战线内包括了地主等复杂成分,因此还包括了一部分亲日及反共分子,这一方面的趋势是在战争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又因经过国内战争,统一战线中还有反共、亲日分子进行破坏。

* 这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的报告大纲。

(3)对国民党的估计,一般在战争中是会进步的,但因包括各个阶层,在发展中还有一种逆流。顽固派是阻碍抗战进步的。

认为蒋介石及国民党主要部分在战争中妥协的可能是更少的。

(4)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是要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

第一,诚意拥蒋,拥护国民政府。在诚意拥护中并不因此便不反对亲日派,相反的,正是要加紧反亲日派斗争。

第二,在巩固国共合作中,要中共党员在政府与军队中起模范作用,在政治上、工作上去影响国民党,如过去恩来影响张、杨^[4]即是很好的。季米特洛夫指示要多作上层活动,使国民党党员同情于我们。

巩固国共合作不在于在国民党内及军队中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主要的在影响国民党的党员。将来国民党先进分子可能加入共产党,但今天还重在影响国民党党员。如果在国民党及国军中发展党员,坏处多,好处少。

国共两党关系主要是共同去反对主要敌人,今天任何一个党派去反日都是没有可能取胜的。中共只有在抗战中努力,才能使人民更加拥护。

第三,国际认为,中共提出拥护三民主义是正确的,要提出谁不愿统一,不实行三民主义,谁就不能真正的完成抗战的任务。

第四,中共不参加国民政府是对的,国内外有许多反对统一战线的人,我们以不参加国民政府为有利,但军事、国防部门可以参加。

(5)经常要反对日寇、汉奸利用磨擦阴谋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日寇是有许多阴谋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在各刊物中都要反对与揭露日寇阴谋,这是要国共两党共同去做的。日寇密令在四川制造反蒋倾向,在徐州制造地方军与中央军的对立,在各处挑拨国共间的磨擦,我们要反对敌人一切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三)关于国际援华运动

国际认为,援华运动一般的是做得不够。有人说国际工人阶级还有看不起殖民地的倾向,季米特洛夫指出这不是事实,主要是我们对国际宣传做得不充分、不通俗。今后,中共要将日寇的野蛮政策、残酷行为写成控告书,并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情形向世界公布。

(四)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

国际认为,中共七次大会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

七大决议要特别注意短期的、实际的东西。

七大要吸引许多新的干部。

(五)关于党内团结问题

在季米特洛夫与我谈话中有下列各点:

(1)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党在公开活动中是可能影响国民党的。

(2)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的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如制造什么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冲突等。

(3)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来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

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注释

[1]弼时在国际的报告指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此书面报告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

[2]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人。当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3]朱、毛 朱，指朱德；毛，指毛泽东。

[4]张、杨 张，指张学良；杨，指杨虎城。详见《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一文注[11]。

(选自《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
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
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

毛泽东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中全会作报告，我准备说些什么呢？我要说的分为下述几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要说的就是这些问题。

同志们，在全国炮火连天全世界战争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们的六中全会扩大会，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一 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1）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召集

我们党的中央全体会议，自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开过第

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五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员分散工作于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一块。此次则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的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必须作明确的解决,以便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2)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五年以来,我们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最大与最主要的是: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

过去国内战争形成的原因,在于一九二七年不幸破裂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形成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大家都已非常明白,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骤,进到准备并实行向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使得国内国际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变化了与变化着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变化了与变化着国际间的相互关系。因而我们的党,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了新的政治立场(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

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当时，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立场。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那时，救国团体在许多地方有了组织，其他党派亦有了抗日要求。由于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由于全国军民的拥护，由于其他集团与其他党派的协力，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步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芦[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芦[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月，即去年八月，我们党发布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八路军改编完成，开赴华北作战。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发表了公开宣布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宣言。第二日，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与之团结救国的谈话。从此以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完全建立起来了。十二月，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发表了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的宣言。此时未久，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江南作战。从此以后，抗日团结便日益进步了。

同志们，这种由两党十年战争转到两党重新合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转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

是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决议,九月八日《新华日报》)。并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同志们,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一伟大的民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同。因为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寻死路走向崩溃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着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斗争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时期进行的。这样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以中国进步并且继续进步为主要基础的三方面的结合,就保证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并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

(3)六中全会的任务

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处于抗日战争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头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担负了重大的历史

任务。

完全不错，抗日战争英勇奋斗了一年多，全国有了伟大的团结与伟大的进步，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失地很多，但同时就有了很多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战争发展下去，主要的由于中国继续进步，同时配合着日本增加困难，国际助我增强，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也是可以预断的。谁要是看不见过去的伟大成绩与未来的胜利前途，谁就要陷入悲观主义的深坑而不能自拔。然而单看到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抗日战争还有另一方面，还有它的消极方面，这就是我们面前摆着的许多困难。目前的情况告诉我们，一年多以来中国所有的奋斗，团结，进步，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还没有反攻敌人的力量。武汉现正处于敌人的威胁中，敌人还要向广州、长沙及西北等地进攻。因此全国人民都盼望共产党发表意见，新的环境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志们，我们必须发表意见，必须解决问题。对的，我们党早已发表了意见，许多根本问题也早已解决了。但新的环境要求我们发布新的意见，解决新的问题。

什么是新的问题呢？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渡过战争难关，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敌人之目的，这就是当前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在全国无数人们中议论着，焦思着。我们应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呢？无疑是应该回答的。

这个问题展开于各方面，发生了许多的问题。

例如，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十五个月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呢？战略方针是持久胜敌，还是速战胜敌呢？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敌人的？抗战有出路，还是妥协有出路呢？如果战争是长期的，又用什么方法去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呢？所有这些，是否能在十五个月经验中找到根据给以明确的回答？并是否可以依据这些过去基础而在抗

战的新阶段中起其积极作用,借以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类的问题。

又如,整个抗日战争将怎样发展变化呢?所谓新阶段,究将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阶段呢?假定武汉不守,战争趋势将怎么样呢?今后全国努力的方向,即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是什么呢?有些什么好办法足以渡过战争的难关呢?这些更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国共合作的前途与远景将会怎样呢?共产党有何根据来说长期合作呢?共产党有何办法来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呢?所谓不但合作抗战而且合作建国,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世界风云如此紧急,其趋势将怎样呢?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有何利害关系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如何呢?共产党员为着其党的政治方针而奋斗时,其工作态度应该怎样呢?共产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同他党合作,同人民联系,足使艰难的时局走向顺利呢?共产党的内部关系怎样?有些什么好方法团结全党使之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当前艰难的时局中起其大的作用呢?共产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究将怎样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党内党外迫切要求解决的,近几个月来,我们经常遇到要求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们。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现正处于同一个强的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已接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新阶段发展的过渡期间。我们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在这个时候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要解决许多的问题。

二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

(1)十五个月经验证明了什么？

让我们从十五个月的经验说起罢。

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给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证明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证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之没有根据。第三，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藉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他。

(2)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 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抗战初起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我们则在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决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解决的。“战争的结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要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所有这些都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完全证明其正确。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

我们很早就指出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

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是日本的困难;第三是国际的援助。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条件在抗战十五个月中已经怎样了?一句话回答: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但距必要的程度还很远。

拿第一个条件(战胜敌人基本的主要的条件),中国的进步来说,十五个月来确已有了一个基础,但惟有继续进步,才能最后胜敌。所谓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这些方面的进步,十五个月来是非常显著的。然而单拿这些已有的东西,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反攻必须有一个准备时期,必须经过全民族的努力,使我们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有了一个广大的与深刻的发动,才有反攻胜敌之可能。因此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他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忘记了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势力,发动起来足以使自己转败为胜,转弱为强,根本变化敌我形势,然而还待今后的努力,不是现成的事实。

拿第二条件,日本困难来说,也是这样。十五个月中,敌人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用费数十万万,军队锐气日减,财政经济日形竭蹶,国际舆论纷起谴责,这些都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的英勇抗战造成的结果。然而敌人这些已存的困难,还不足以停止他的进攻及利于我们的反攻,还须待到敌有更大困难我有更大的进步之时,才是反攻胜敌之机会。因此,速胜论在敌情方面也没有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拿第三条件,国际助我一点来说,现在也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十五个月来,我们有了国际间广大的舆论声援,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证明了我们不是孤立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与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

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在这点上，过去经验也否定了速胜论。

总起来说，不论中国方面，敌人方面，国际方面，十五个月经验，都证明速胜论主张之毫无根据，相反，显露了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决不能是速决战，而应该是持久战。持久胜敌——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方针。过去不相信这种方针的，现在事实给了明白的教训，应该再没有疑问了！

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第一个总结。

(3) 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毫无根据

抗战以前，唯武器论大张旗鼓，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亚比西尼亚。抗战以后，这种议论表面没有了，但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结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渐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渐增大。综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蒋委员长早已明白宣示：“战事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去年七月庐山谈话）“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大异其趣。故凭藉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强不拔之民族意识。”（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

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的奔腾高涨。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作最后的攻击,驱逐日本的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的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中共去年八月决定)所有这些,都被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了。悲观论或亡国论者认为敌人强不可抗,中国不堪一战,妥协才是出路等等荒谬说法,已经证明是完全错了的。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仅是一方面的事实,敌人尚有弱点存在,中国尚有优点存在。

什么是敌人的弱点呢?第一,他是比较小的国家,他的兵力、财力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消耗。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在中国的坚强抵抗面前又不得不分散与消耗,使他无法占领全中国。即在其占领地区,由于中国的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亦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原地带,其他仍然是中国的。第二,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退步的。他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举行侵略战争,并迫使他采用异常野蛮的掠夺政策。这样,就使他的战争,一方面变为同整个中华民族绝对对立的战争,迫着中国除少数当汉奸者外无论什么阶层,无论什么党派,都不能不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另一方面,变为同他本国人民大众绝对对立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悉率人财以应战争的结果,已经在他国内人民与前线士兵中间逐渐酝酿了许多的不满,战争发展下去,无疑有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争本身的趋势。这些都在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敌人自己方面而使敌人必归失败的最主要的根据。第三,正是由于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换句话说,损人利己的,就不得不把他自己同一切和他利害相反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除了两三个法西斯国家之外,一切

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都不赞成日本的侵略战争。这样,就使得日本不得不日益缩小其国际活动的范围,日益处于孤立地位。这也是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

这样,日本国度比较小,影响到他兵力、财力的不足;日本战争的退步性;日本国际地位的孤立;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成为日本战争中存在着的先天性的弱点与困难,而这些弱点与困难又正在日益发展之中。对于这些,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是瞎子,他们全没有看见,而仅仅看见了敌强我弱这一点。所以亡国论与悲观主义在敌情方面并没有根据,因而他们的妥协政策只能是亡国政策。我们是最后胜利论者,我们的观点则在敌情方面有充足的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开始证明了。

什么是我们的优点呢?第一,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不管敌人占去了我们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然而我们还有大块土地作为我们长期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根据地。即在敌占地区我们也还有许多游击战争根据地。这个特点,是和小国如捷克、比利时等根本不同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点。第二,我们今天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不但战争本身的性质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继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我们方面而使我们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在原有进步基础上进行着的伟大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推动了全中国的进步,旧的民族腐败传统是在破坏着,新的民族进步力量是在生长着,一个全民族统一团结进步发展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完成着。抗战以前的中国不同于抗战以后的中国,这是有眼

睛的人都能看到的了。而抗战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目前尚未完结)的中国又将不同于抗战尔后阶段的中国,也已经可以预断。还有,第三,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现时还保存其许多矛盾政策,也不管国际局势可能暂时地影响到各国助我的程度,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十五个月来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援助,给了我们以这种确信。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的中国,能够同时配合着世界的援助,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整个世界先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敌人要使我们陷于孤立的企图,只会是徒然的。

这样,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我们又有国际的援助,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不但已经存在,并在日益发展之中。在这里,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同样是瞎子,他们一点也看不见,而只看见我们是弱国,是劣势,是半殖民地这一点,喃喃发出其“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胡说,其中许多坏蛋就根据这种胡说暗地进行其投降妥协的阴谋。我们相反,我们要根据十五个月经验中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向全党全国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与我们战争的长处与短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指出长处与有利条件在全战争中占居着优势,号召全国努力奋斗,发挥自己的长处,增强自己的有利条件,克服自己的短处与不利条件,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最后胜利将是谁的呢?我们确定地答复:中国的。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我们的政策:坚决抗战还是动摇妥协呢?我们确定地答复: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妥协,只有坚决抗战才是出路。东四省之沦亡,奥国之灭亡,捷国之瓜分,都并非因为抗战,这是有目共见的。把丧师失地归罪于抗战的,只是完全的胡说。现在还是一样,在中国的许多优良条件下,抗战必兴,但如走妥协道路,则灭亡无可避免。因此坚决反

对妥协论,反对悲观主义,唤起全民奋战到底,乃是唯一无二的方针。

总起来说,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着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胜论者。敌小,我大;敌人战争是退步的,我们战争是进步的;敌之国际地位比较孤立,我则比较能得外援;这几个矛盾着的对比,又决定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经验的第二个总结。

(4)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 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已从十五个月抗战经验中证明了。但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方案如何?则过去国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许多人认为照老样下去就可以了,他们不注意团结全国,不注意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改进,甚至还在加重磨擦,阻碍进步。我们则从来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唯有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力求进步,依靠民众,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国国民党在其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指出:“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了:“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共去年八月决定)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

能的。也只有抗战,才能统一团结各方面。这种统一团结,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十五个月经验又向我们证明:敌人破坏阴谋之严重与内部团结巩固之不足。抗战为什么遭受很多挫折,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除了客观原因之外,统一战线力量之不足,统一战线还没有必要的扩大与巩固,是其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可知,只有更加统一团结全民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十五个月抗战,不但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同时又暴露了这种团结之不足;而且推动了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的进步,同时又暴露了这种进步之不足。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而欲达此目的,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没有各方面的更大的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全民族。第三,十五个月抗战又证明了民众援助抗战力量之伟大;同时也证明了民众力量之仅在开始发动,因而使抗战得不到民众的广大援助而遭受了许多挫折。从此得到教训,国人必须进一步的认识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问题。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

总之,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于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在于力求进步以发动全民族的生动力量,在于依靠民众以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总结。

同志们,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只要我们与全国坚持这个总方针,并作了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抗日战争正在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许多新的任务,但这个总方针是不变的,十五个月经验作了我们认识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的基础。

三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1) 认识战争与统一战线的规律性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同志们,在我们总结了过去经验之后,重要的问题,在于看一看当前形势发展的趋向。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怎样从过去基础之上向前变化发展的?这是我们现在要答复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发展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懂得抗日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认识了它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争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

我们现在先来说战争问题。

(2) 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 优劣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

历史上的战争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例如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又如意亚战争,也只有意大利进攻,亚比西尼亚失败,就告结束。中国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情形,这是由于一方面双方强弱不同,又一方面双方指导能力优劣不敌而造成的,这是第一类战争。第二类战争,以两个阶段宣告完结。例如法俄战争,拿

破仑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中国古代有名的吴魏赤壁之役,秦晋淝水之役,也是这样。虽则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但是还有第三类战争,例如外国的七年战争,八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欧洲大战(特别表现于西战场),都有三个阶段。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却,为第三阶段。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类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特点,在于有一个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

中日战争属于那一类战争呢?我以为是属于第三类战争的。这是由于双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不同的战争指导集团之特殊情形而造成的。

(3)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

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干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

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

上述三个阶段的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存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争过程的估计，现在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创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然而依据既存条件，加上正确指导与全民族广大而坚持的努力，是能够使这种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的。

(4)速胜论者与亡国论者都反对这种估计

速胜论者反对三阶段论，认为我能迅速反攻，无需乎要一个中间阶段，这是不对的。抗日战争面前存在着许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迅速反攻是不可能的。速胜论者的反对三阶段，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过低估计了敌人力量，一方面又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的原故。亡国论者也反对三阶段，认为相持与反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是一个亚比西尼亚，这是不对的。他们与速胜论者相反，过高估计了敌人力量，而过低估计了自己力量。在他们面前只有黑暗，承认敌人能够灭亡全中国，我之抵抗与努力只是徒劳，办到敌我相持亦不可能，更不说什么反攻胜敌了。因此，必须一方面反对速胜论，又一方面反对亡国论，才能坚持我们的三阶段论。而在当前情况下，反对亡国论比之反对速胜论更加重要。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

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5)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

当张高峰事件发生之时,国内一部分舆论兴高彩烈,以为日苏战争如果爆发,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无需乎要持久战了。在这种观点下,三阶段论当然不能成立,我们的估计是错误的了。这是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胜思想之一种。然而国际形势不是照着这些朋友们的主观志愿发展的,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规律。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拿这种情况来看中日战争,迅速反攻的两阶段论也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但不怕三阶段,而且正要造成三阶段。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根据。

(6)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

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这就是说,第一,我之抗战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假如敌之进攻不能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停止下来,就无所谓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二,相持阶段出现了时,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无所谓三阶段。在这里,对于速胜论者,我们肯定地说:必须经过一个准备时期,才能团结全国,克服困难,生长新的力量,同时配合着敌人的困难,国际的援助,然后实行反攻,驱敌出国,否则是不可能的。拿主要依靠自力胜敌的观点来看

问题,不可避免的要作出这个结论。对于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我们肯定地说:只有这个过渡阶段,才是全战争的枢纽。中国化为殖民地还是获得解放,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是可惜的,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减少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很多没有丧失的东西尚可作为制胜敌人的资本,唉声叹气于宝物的丧失是无益的。第一阶段中保存着的领土与各种有生力量,特别是已经获取的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进步,是最可宝贵的,这是第二阶段中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然而这仅仅是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还不能决定反攻,决定反攻的东西是第二阶段中增加上来的力量,没有伟大的新生力量之增加,反攻只是空唤的。

(7)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特点,已经出现了的,尚未出现而可以预计得到的,有概略指明之必要,对于指导战争与决定政策有重要的关系。

第一阶段有些什么特点或重要标志呢?

有如下三方面的东西。

第一,中国方面: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国军队的参战,抗战的坚决性,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取得合法地位,游击战争的创造,全国军队的进步,民众运动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方面表现进步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许多有不利事件与不良现象,例如:主要大城市、交通线与主要工商业的丧失,土地与人口的丧失,全国进步的不平衡(有些地方进步得非常之慢),政治制度之一般还仅在开始走向民主化,顽固分子与腐败现象的存在,妥协倾向的酝酿等等。

第二,敌人方面:军力财力的消耗,世界舆论的责备,军纪的败

坏,军队战斗力的相对地减弱,国内人心与前线军心不满的酝酿,张高峰战争的失败,汉奸军队的难于组成及已经组成者的无能等等。这些都是表现其困难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表现其能力的东西,那就是:进攻的坚决性,军力的顽强,占领地的扩大,政治组织力的强韧,阴谋机关的有力等等。

第三,国际方面:援华运动的增长,苏联力量的壮大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东西:欧洲大战的酝酿,英日间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各国军火原料的助敌,这些都于中国不利。

以上中国、日本、国际的许多东西,都是抗战第一阶段中十五个月来表现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分别生其影响于新的阶段之中。

(8)第二阶段

在假定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战争形势又将出现许多新的东西。虽然敌占武汉并不即等于旧阶段的完结,新阶段的开始,由现在敌人尚能继续进攻到他被迫停止进攻之时的这段时间,还是一个由旧阶段转向新阶段去的过渡期间。虽然如此,但武汉不守成为事实之后,就将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武汉不守之后,以及新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可以预计的基本情况,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又一方面则更加进步。这是新阶段中的基本特点。

更加困难将表现于下述各方面:(一)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分割了,由此将发生许多新的问题;(二)财政经济之异常困难;(三)英日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或相反,在日本坚持独占与威胁南洋的条件下,英日有进一步冲突的可能);(四)如果敌攻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暂时的部分的减弱;(五)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的影响;(六)抗日阵线中部分叛

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七)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分歧现象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而将加诸抗日战争身上的新困难事项。估计到这些困难,才便于有准备有计划地克服之。

更加进步将表现在下述各方面:(一)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在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二)国共关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三)军队改造工作的进步;(四)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坚持;(五)国家民主化的进步;(六)民众运动的更大发展;(七)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八)抗战文化教育的提高;(九)苏联援助的继续与可能增加及中苏关系的更加亲密等等。

整个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间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来到了。

第二阶段中虽然敌我在战略上是相持的,但仍有广泛的战争,主要表现于主力军在正面防御,而广大游击战争则发展于敌人的后方。那时,游击战争在许多重要战略地区将变为非常艰苦的战争,现在就应该准备对付这种艰苦。

(9)第三阶段

具体情况不能预计。但彼时必是我之反攻条件业已准备完毕,同时敌之困难程度大大增加起来,国际形势又大大于我有利。彼时战争形势,不是战略防御或战略相持,而是战略反攻了;不是战略内线,而是战略外线了。彼时国内政治上必须有大的进步,军事上必须有新式技术,否则反攻是不可能的。

(10)保卫武汉是争取时间问题不是死守问题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

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两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11)由目前过渡到相持阶段

只有停止敌之进攻,才有利于我之准备反攻。而要达此目的,还须给一个大的努力。故由目前过渡到敌人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出现整个敌我相持的阶段之时,还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须克服许多困难才能达到。因为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我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须针对着敌人这种企图继续执行战略的运动防御战,用极大努力进行坚持的战斗,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而又不为敌人所算,使敌之进攻不得不停止,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

(12)但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

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

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当然，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上说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并未变化，这只有在长期相持阶段内我用全民族的极大努力，并配合国外条件，才能使之变化。然而敌在进攻武汉的战斗中，他之强的力量已经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强的力量之进一步发挥，一方面固然给了我们以损失，然而同时就给了他自已以困难。因为敌之强的力量（同时即是其不足的与分散的力量）在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气力势将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我们承认敌之进攻还有一点余威，并最好与最恰当的是估计到他的这点余威还相当的大，因此还有充分可能他要攻占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处及其附近地区，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之进攻。然而这在总的敌人力量上将只是一点余威。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的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日苏、日美、日英、日法之间的矛盾在增长着，国内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前线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大量支出与财政竭蹶的矛盾在加深着，这些都是使得敌人大大皱眉的地方。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13) 敌力在逐渐减少我力在逐渐增加中

敌人是否增加了力量呢？就其原有的力量来说，没有什么增

加,相反,他的力量大大地减少了。敌人原有的军力与经济力,是大大消耗了。十五个月战争中,他的军力伤亡了数十万人,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与军用资材,毁灭了数百架飞机与百余艘军舰,支出了数十万万元经费,这个消耗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直到他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之时为止,他还要消耗一大批力量。在这点上,他的盟友希特勒早已大大地发起愁来了。然则敌人毫无力量的增加吗?有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及部分乡村之占领,从各国手里及中国民族资本手里夺取了市场,与从中国手里夺取了资源与生产工具,夺取了许多人力,这些是日本战争之唯一目的,他是暂时地增加了这些东西。然而问题是:这些东西能抵偿已有的战争消耗吗?不能,消耗了的全部战争“投资”是已经消耗了,他要取偿还需付以新的生产投资。问题又是:抛开日本生产投资之无能不说,假定他能的话,他能取偿其战争消耗吗?也不能。因为往后依然存在着广大战争,依然每天要消耗。只要有广大的敌后游击战争存在,例如现在华北的游击战争那样,他的取偿是很困难的。由于不断的战争,他将不但不能取偿旧的,而且还须支付新的,只要我们的抗战坚持下去,日本的这条可怜命运是大体确定了的。我们说日本在第二战略阶段即相持阶段中将逐渐化强为弱,化优为劣,这种继续消耗是决定的一方面。现在说到中国方面。中国力量究竟是减少了呢?还是增加了?我们的回答是减少了,又增加了。减少的是原有力量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军队人员武器的消耗,人口、工业、土地与资源的损失等上面,这是使得我们感到困难的重要的一方面。然而不是没有增加的,增加的是新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全国的团结,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人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的提高。主力军虽后退了,游击战争却前进了。一部分地方虽损失了,另一部分地方却进步了。问题是在:增加的程度今天还不够,今天还不够停止敌之进攻,今后更不够实行我之反攻,因此发生了必须用广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

新的力量的问题。而这种增加，即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基于今后之广大持久的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在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长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敌人困难之加重，国际助我之增强，就能使整个敌我形势发生变化，由敌优我劣之现时形势，走到敌我平衡，再走到我优敌劣，这就是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14) 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
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

于是问题在：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论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一有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

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他把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又其次是国际形势变化了,旧的世界接近死灭,新的世界已见曙光。这些道理,我在《论持久战》中已详说过了。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问,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域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问是能够的。并且现在的所谓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这是完全正确的,战争虽困难,胜利前途是存在的。

(15) 妥协危机严重存在,但能够克服

我们早就说过,一部分患着恐日病的人们时刻企图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所谓和平妥协,过去曾见之于南京失守之后,现在又在蠢蠢欲动了,这是敌人阴谋在抗日阵线内部的反映。这种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国人必须充分注意,不让亲日派得售其奸。亲日派的企图和敌人的企图是一致的,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假令得售其奸,抗战的前途就成大问题。因此,全国上下憬然觉悟于敌人阴谋与内部反间之可畏,自动自觉地努力反对这种阴谋,一刻也不容放松。这种危机是否能够克服呢?那是能够的。在国共两党及一切爱国志士团结一致并作了必要的努力之后,克服妥协危机,驱除助敌张目的妖魔鬼怪,而把抗战坚持下去,不但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亲日派究竟没有多大的势力,抗日派的势力大于亲日派。

(16) 相持阶段中游击战争的新形势

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着。什么是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呢?即第一,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则土地广大,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只要我能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正确地指导之,敌要根本限制我之发展是不可能的。但第二,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的缩小其数量,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

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在将来,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枝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的,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不可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因为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争,不论敌人如何的强,总比内战时的条件优良的多。在这里,争取与瓦解伪军以孤立日寇,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17)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说的都是抗日战争的形势问题,以下要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

抗日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时,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时。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应该适应这种情况而表现其向困难斗争并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伟力。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间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须认真的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并且应该懂得: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

(18) 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对于国民党怀疑的问题，就是能否继续抗战，能否继续进步，与能否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是互相结合不可分离的。我们的意见怎样呢？我们认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

由于敌人进攻的坚决性，敌人对于中国各个阶层的严重的打击与掠夺，全国军队对于敌人的愤怒与抗战的英勇，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国际有利形势之存在等事实，基本上决定了全中国与国民党的政治方向。第一，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政党与团体在内，是非继续抗战下去不可的，谁不继续抗战，

谁就只有一条当汉奸的出路,此外没有任何出路。第二,任何党派,只要它是继续抗战的,就非继续进步不可。诚然,国内政治的进步不迅速不普遍,因此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也正因为损失,使得今后不能不在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求进步,以便能够抗拒敌人,恢复失地。这不论是当权的国民党也罢,其他党派也罢,都非继续进步不可。第三,国内进步的重要一环,是国民党组织形式的民主化,使其本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可能有没有呢?我以为也是有的。抗日战争的大势所趋,国民党如果不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那要担负起继续抗战与战胜敌人的艰难任务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五[四]十多年的历史中,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它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最显著而最有历史意义的有两次。第一次,从同盟会组成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为了反对满清建立民国之目的,联合了一切反满的革命党派(从光复会到哥老会),在这个期间,它的党员充满了英勇斗争的事迹,再接再厉,富于朝气,因而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二次,民十三年至十六年,为了反帝反军阀之目的,对内联合了工农与共产党,对外联合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了有名的“三大政策”,因而创设了黄埔,建立了党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不但表现了国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也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今天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三次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必须也可能把它自己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这一伟大的运动已在开始,承认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合法存在,承认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系统,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宣布“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以及国民参政会的召集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都表示了把它自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之开始。现在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国民党

的这一扩大组织的运动将取何种态度？赞成还是反对？我们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赞成国民党把它自己扩大发展成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民十三国民党改组之时，我们就取了赞助政策。今天更当民族危机万分严重之际，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赞助之。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了与坚持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并在自己的组织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门，用以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存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的，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陷于危险，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也逃不脱这种危险。所以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而且十分希望与坚决赞助国民党扩大与巩固其组织，实行党内民主化，并使其本身变为革命的民族联盟，以利继续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

(19)但在国民党的前途上尚有障碍物， 须努力克服才能发展

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是存在的，其进步与发展是可能的，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的大多数是在领导和推动国民党前进。然而谁都明白，国民党中央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了一股逆流，顽固地抵抗进步之舟，相当有力地阻挠着国家民主化，阻挠着一切为抗战必需的进步事业之推行，阻挠着蒋介石先生在历次宣言、谈话、演说、命令中所说很多很好的方针方法之推行，阻挠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阻挠着国民政府救国法令之实施，阻挠着民众运动之发展，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国民党进步所以不迅速不普遍与抗战所以受到许多不利的重大原因。他们是反对国民党进步，反对国民党发展，甚至主张妥协的，如果这些分子占居优势，那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就要

受到极大挫折,所以值得严重注意。然而我们坚决相信,这种守旧势力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是没有占优势也难于占优势的,他们是逆流,但并非主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努力与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这种守旧倾向是能够克服的。共产党坚决赞助国民党的进步,而对于阻碍进步的守旧分子则希望他们弃旧图新,一同前进。我们希望这些人变一变,“君子之过如日月蚀”,改变过来就是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守旧的人在抗战过程中进步了,今后必仍有许多人会从抗战教训中发生觉悟而和大众一齐进步起来。这就是抗日战争中守旧分子的可变性。但也可能有少数人变得更坏,甘心被抗战巨涛席卷以去,这也是可变性的一面,对于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可惜的了。

(20)其他党派同样有光明前途

一切加入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发展的前途,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赞助。这不论对于第三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派,或其他任何集团,任何党派,都是一样。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都应充分注意的。

(21)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

义的。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十五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的。

首先是全民族抗日的。这个特点规定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侵入国土的异族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与发展起来的。又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由于是反对异族侵略的，所以组织成分能够如此之广大。由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所以这个统一战线具有伟大的力量；但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又难免许多相互间的磨擦，而须恰当地调整之，才能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我们统一战线的这种最基本的特点——政治目的之反对异族侵略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不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也不同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民族阵线（当时的国共合作），使得今天的统一战线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特殊内容与特殊结果，这是今天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特点与优点，虽然在其组织复杂一方面不免同时包含着缺点。

第二是长期性的。这个特点是从第一个特点产生的。由于这个统一战线是用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而又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一点，我在报告的第五部分还要说到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相同。

第三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各党派各阶层政治力量的不平衡，同时在地域分布上也表现这种不平衡。国民党是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党，共产党是第二党，其他又在其次。这一情况，产生了许多特殊的東西。

第四是有军队的。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一个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两党都有军队，使得抗日

战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的最善责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这一点和西班牙有某些相似,但和法国不同,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这也是使得两党能够长期合作的因素之一。

第五是有十五年经验的。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一九二七至三六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了两年,这个十五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最深刻地教育了国共两党、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结论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一。这种宝贵经验,世界各国都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没有的。

第六是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这是中国的特点,西洋各国与此不同,所以是一个缺点,使得统一战线缺乏现成有组织的民众基础。但同时,各党之间可以分工地去组织民众,不须挤在一块老是磨擦,因为有的是尚无组织的民众,正待组织起来以应抗战之急需。

第七是三民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比之第一次合作与两党内战两时期都不同。今天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德意等反对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与日本的矛盾,现时并不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采取赞助的立场。所有国家的先进人民都是赞助我们的,苏联更是诚挚的赞助。这种新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的长期合作有重大影响。

深刻地研究与认识上述这些特点,才能采取恰当的政治上的

政策与工作上的态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政治问题与工作问题，而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问题，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需要这种科学基础的。

(22) 统一战线的新形势

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十五个月团结抗战的教训，将促使各党认识这种发展与巩固之必要。发展方面，是扩大各党的组织与扩大民众的组织。巩固方面，是各党采取新的政策与新的工作，减少相互间的磨擦，办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抗战新阶段中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唯有统一战线各党广大发展其组织与高度巩固各党的内部关系与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力地执行新的政治任务，战胜新的困难，达到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这就是抗日战争新形势中统一战线的新形势，由于各党的共同努力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种新形势的到来是完全可能的。

四 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过去抗战的总结与当前抗战及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的估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和过去有些什么不同呢？

总的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分别说来，有如下各方面的具体任务。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应该赞助政府，并在政府领导之下，动员全民族实行起来，共产党员应成为执行这些任务的模范。

(1)高度的发扬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

估计到新的抗战形势下,必有一部分人,因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财政经济的困难,国际援助的不及时,因而发生着与增长着对于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日寇,汉奸,亲日派,必将利用这种情绪,大放其和平妥协空气,企图动摇我抗战的决心。因此,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

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

(2) 拥护蒋委员长, 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国共合作, 反对分歧与分裂, 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

新环境中, 敌人的方针, 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 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 企图推翻蒋委员长, 推翻国民政府, 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着敌人的这种方针, 全民族的第二任务, 在于号召全国, 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 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国共合作, 拥护全国团结, 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 国民政府, 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 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

为此目的, 必须调节国共两党之关系, 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调节抗战各军之关系, 调节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 提倡公平合理互助互让之精神, 减少磨擦, 减少意见分歧现象, 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之行为。号召全国严重注意敌人、汉奸、亲日派在我们内部的挑拨离间, 制造不满, 制造分歧, 鼓励磨擦之阴谋诡计。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 务使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日益亲密起来, 树立在困难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坚固重心, 用以对抗敌人与汉奸政府, 克服困难, 准备反攻。

(3) 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 保卫华中 华南与西北, 停止敌之进攻

针对着敌人现时进攻武汉并继续进攻华南与西北之企图, 全民族的第三个任务, 在于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 整理现有军队, 增编新的军队, 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 停止敌人进攻。为此目的, 中国主力军方面, 第一, 必须发展高度的运动战, 同时辅助之以必要的与可能的阵地防御, 节节抗拒敌人, 消耗敌之实力。第二, 必须在大后方建立可能的军事工厂, 并提高制造能力, 接济前线的枪械与弹药。第三, 必须在军队中认真实施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 实施政治文化娱乐等教育, 提高全军英勇奋斗持久苦战的精神。

第四,就现有物质基础改善士兵生活,在连队中组织经济委员会,由士兵管理伙食。第五,提倡自觉纪律,废止打骂制度,提倡官兵之间的亲爱团结,以改善官兵关系。第六,实行公买公卖,待人和气,不强迫征粮,不强迫拉夫,不强迫当兵,改取政治动员方式解决食粮、夫役与新兵问题,以改善军民关系。第七,在前线各军之间,前线与后方各军之间,提高友爱互助精神,作战则互相策应,工作则互相观摩,消除互相观望互相嫉忌等不良现象,以改善各军之间的关系。第八,整理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用这一切办法,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而奋斗。

(4) 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

针对着敌之目的在于还要继续向我进攻,又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困难,全民族的第四个任务,就在于广大地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许多根据地,巩固[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缩小敌之占领地,在目前,配合主力军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在将来,配合主力军为实行反攻而战。半殖民地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游击战争的广大性与长期性,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有力地配合正面主力军之作战,而停止敌之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地限制于一定地带,使之无法全部占领;便不能在敌人后方建立多数的抗日堡垒,坚持游击战争,并准备将来配合主力军之战略反攻。因此,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

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的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外，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第五，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实现官兵的平等待遇，经济公开。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第八，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另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域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

(5) 提高军事技术，创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

敌以不及我数之兵力而能节节深入者，除了我之政治原因外，我之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针对着敌之长处与我之短处，全民族的第五个任务，在于提高军事技术，增加飞机大炮战车等之数量与使用人材，为着实行反攻而准备实力。为此目的，一方面须就现有的及可能继续增加的制造能力从部分制造与修理开始，认真从事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多方设法从外国输入新式武器，用以逐渐改

善军队的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从实际看问题,在现在,实际上战斗着的是大量数量的低级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武装,相信低级武器也能胜敌,提高政治精神,改善作战方法,发展游击战争,以补新式技术之不足。不在这方面着重致力,我们就忽视了当前的实际问题,无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并就可能范围内认真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忘记了将来,无以克服前途的困难。在人力物力丰富的中国,只要政治条件改善,动员方法进步,加之外国的协助,逐渐改善技术装备,决不是不可能的。

(6) 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

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为补救此弱点,全民族的第六个任务,在于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没有这一方面的改进,要最后战胜日寇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我全民族彻底地统一团结的伟大过程之完成,也只有依靠民主制度之建立。关于这一点,须从各方面实际有所设施。第一,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已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第一步,尔后应使该会工作公开的顺利的进行,该会议决事项应全部付之实施,并依据该会已经决定的方案认真的建立各省各级地方参政会,推进民主政治。第二,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之充分实施。这种自由是在抗战建国范围之

内的,只有充分地保证了这种自由,才利于普遍发挥抗日建国的力量。这里问题是保证中央法令在各地地方之实施而不受地方之随意的限制。应该限制的只是不利于抗日建国的那种自由,即汉奸、亲日派的自由,其他都不应在限制之列。第三,从战区与敌人后方开始实行多量的民主制。例如:民选各级地方政府再由上级加以委任。战区各级政府采用民主集权的委员制,并设立各级人民代表机关。战区政府增设某些必要的工作部门;改变公文程式;清除贪污腐化无能分子,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减低薪俸,提倡艰苦生活;用以适合战区艰苦、复杂与流动的环境。战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有颁布地方单行法令之权。战区男女公民,除汉奸外,均有选举被选举权,均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武装抗日之自由。战区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公开合法地位,等等。在战区尤其在敌人后方,没有这些政治改革,要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些办法,都是为着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增加政府的实力,使之能在抗日战争中起其最大的作用。没有问题,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应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不应因行政区域在地域上之被敌分割而有任何不尊重中央领导的表现。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

(7) 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

全民族的第七个任务,在于扩大各种民众运动,并使之统一起来,全力援助战争。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一切须取给于民众,没有普遍发展的并全国统一的民众运动,要长期支持战争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须这样做。抗日战争正在遇到新的困难,唯有动员民众,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在全国,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应做到下列各项:第一,保障一切抗日民众团体与抗日民众运动的自由,确立民众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第二,物质上帮助民众团体,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第三,认真建立有

广大群众参加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自由职业者、文化人与儿童的各种救国会,并使之依照地域与职业两种原则建立联合的组织。第四,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战工作,积极援助政府与军队,尤其在战区不可或缓。

(8)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

改良民众生活问题,过去实行的太微弱了,因此不能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对于坚持长期战争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今后全民族的第八个任务,在于实行下列各项改良民众生活的政策。第一,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与残废的抗日军人。第二,救济战区灾民难民及失业工人。第三,在战区及敌后开始适当的减租减息。第四,调剂粮食及重要的日常必需品。第五,适当的增加工资,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第六,承认工人农民对雇主地主的团体契约权。第七,禁止雇主、地主、师父、工头等对工人学徒的虐待打骂。实行这些初步的生活改良办法之后,必能提高工农贫民群众拥护政府,参加战争与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不但战争需要的一切动员帮助将大大改观,而且工业农业生产的数量质量与商业的流通也会大大增加与提高起来,国家财政也就在新的农工商业基础之上而得到满意的解决。

(9)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

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丧失之后,国家财政经济必大现困难,没有新的有效的办法,便无以渡过战争的难关。然而只要实行新的政策,动员人民力量,便任何困难也能够克服。因此,全民族的第九个任务,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事项如下: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第二,有计划的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从小规模的急需的部门开

始,逐渐发展改进;吸收政府、民间与外国三方面的资力;并从政治上动员工人,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质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这些,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三,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国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在新的姿态下发展起来。在战区注意保护农具牲畜及手工作坊,保证被隔断区域的经济自给。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同时,注意发展合作事业。第五,在有出钱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第八,厉行廉洁运动,改订薪饷办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规定大体上平等的薪饷制度。第九,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第十,恢复与发展战区的邮电交通。以上所指,不过大端,必须有认真改革旧制实行新制的决心,并持之以恒,才能消除新的困难,支持长期战争,其重心在于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成为战争供给而效力。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被敌占领,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但须实行必要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改革。这里所说各项新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而提出的。

(10) 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

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11)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当前的第十一个任务,在于第一,坚决反对一部人所谓走德意路线的主张,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准备对敌投降的步骤。第二,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第三,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第四,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第五,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第六,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一切这些,不管各国助我之程度如何暂时的没有增加或甚至可能部分的减少,国联决议可能依然是一句好听的话,我们都应努力的做。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不重在眼前

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

(12) 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与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要使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下去，必须中日两大民族的军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作广大而坚持的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此目的，全民族的第十二个任务，在于：第一，向两国人民士兵大众及朝鲜、台湾民族提出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他们为此而斗争。第二，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由高级政治部准备与派出教日本话的教员到各军队中实行施教，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道理为止，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同时补助之以文字图画宣传，逐渐感化他们，要求他们同意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退出中国，推翻日本法西斯。第三，尊重与优待敌军俘虏，给以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为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而努力。第四，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第五，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第六，教育我国军民大众，一方面提高民族自尊心，又一方面则须纠正军队与人民中的一些错误思想，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敌军军官与士兵，并区别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实行了上述的方针与办法，付以广大而坚持的努力，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增加；但同时，敌人的困难与国际的援助，必须争取其配合。在敌人困难方面，除了因我之坚持长期战争给以逐渐的消耗，努力外交活动使敌陷于孤立而外，和日本兵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民族建立其共同反侵略战线

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

(13)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14)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

新的形势下,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必然较前更加猖獗,大肆其造谣、污蔑、分裂、破坏的阴谋,因此当前的第十四个任务,在于实现下列办法,厉行锄奸运动。第一,唤起前线与后方一切军民人等的警觉性,严密注视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之活动,依照政府法令,不容情的镇压之。第二,注意保护国家机密,以叛国罪惩

办泄漏机密之叛徒。第三，学校教科书中加进锄奸一课，实施提高警觉性的教育。第四，军队设置各级管理锄奸工作之部门，民众团体中人民自卫队中设置锄奸小组，国家警察加重锄奸教育，使奸徒在众目集视下无法藏身。抗战以来，吃这些奸徒们的亏真是不可计数的了。前线的将士，惊叹汉奸之多与损害作战利益之大，早已异口同声。即在后方，单是泄漏国家机密与引导敌机惨炸二事亦已中外共愤。长期抗战中如不肃清奸徒，将不能设想战争的胜利。发动广大民众之民族革命的警觉性，厉行上述锄奸办法，并使之成为广泛的运动，是争取胜利不可缺少的严重的任务。应该指出：锄奸运动应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觉的与被骗的，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分别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轻，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决不可一例看待。还须注意确实证据，勿用刑讯，严防诬陷。锄奸目的在肃清真正奸徒，只有用正确政策与正确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15) 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 巩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坚决的实行起来，而欲达此目的，非发展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的组织力量不可。现有力量，无论何党都太小，都需发展，而大大发展国共两党尤为当前的紧急任务。在这个发展的任务中，各党均应互相赞助他党的发展，而不可互相嫉忌与互相妨碍。须知只要是抗日党派，任何一党的发展，都于抗日有利。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承认与拥护这个主干而又同时发展各党，是互相联系并不互相冲突的。

在数量上,我以为国民党应发展至五百万以上,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应发展至一百万以上,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中,当着伟大抗战时代,吸引数百万优秀分子加入各抗日党派,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诚能如此,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扩大了,随之也将更巩固了,执行战胜敌人的一切任务就有了充分的保证,支持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驱除日寇与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根本目的,就不患不能达到。

五 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

现在,我们专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问题来讨论一番,向着异常关心国共两党关系的人们所已经发生了的许多疑问,作一个全般的答复,这一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顺利地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争的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

问题有如下各点: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民主共和国问题。这些,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我们都得明确的给以答复。

(1)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

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要一个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要一个长期合作,无论如何要共同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歧与分裂,方才有利于渡过战争难关,对抗敌人破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并于战后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这是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根本不同

的,那次是短期的,这次是长期的。

(2) 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

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继续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继续合作下去。这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着战争后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并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不能。战争之后,这样长期同过患难的有了进步的两个党,就造成了继续合作的基础。那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将更有利于合作,也是现在想得到的。没有疑义,战争中的合作必有其各个合作阶段的内容,战争后的合作将更有新的内容。然而战争中的合作,将决定着战争后也能够合作,这不是没有根据的预断。

(3) 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

所谓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所有阶级,从资本家到工人,所有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弱小民族,所有军队,从中央军到八路军,所有政府,从国民政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只有民族叛徒除外,一切都在内,而且是长期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内,有些人在长期战争中,当着熬不过艰苦奋斗,个人利益超过民族利益时,会要变为民族叛徒的,因此民族统一战线是要不断地把这些民族叛徒们除外的。但这些除外,依然是民族统一战线。其理由,即长期合作的主要条件,首先是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由于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严重地危害着全民族各个阶层的生存,这样就迫使上层阶级也不得不与其他阶级一道抗日。上层阶级中一部分是难免退出抗日战线的,但其他部分和其他阶级大体一样,是受压迫的,不反抗便无出路。又由于这

种野蛮性的战争是长期的,就决定了合作是长期的。这些是决定长期合作的一方面。但是还有第二方面,要合作中的各党,首先是国共两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必要的工作。什么样的政策与工作呢?应该是从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的基点出发而规定出来与实行起来的政策与工作。应该是照顾现在又照顾将来,照顾这一阶级又照顾那一阶级,照顾这一党派又照顾那一党派,照顾这一军队又照顾那一军队,照顾这一民族又照顾那一民族的政策与工作。否则政策不对,工作不行,自乱步骤,将使合作难于持久。这样,一方面,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又一方面,统一战线中的正确政策与必要工作,就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应该是长期的,而且能够是长期的。是民族战线,不是人民阵线。是包括战争中与战争后的国共合作,不是企图在战争后又分裂又内战的国共合作。

(4)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共产党员对三民主义应采取何种态度呢?直至现在还有一些人不清楚,因此有再一次解释的必要。

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开的我们党的临时性的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如下的关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纲: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同共产党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发动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又曾经因为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实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败。现在则因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与国民党中爱国分子,因而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

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的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其党纲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政纲，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纲领，则是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第十一项）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中，又着重地说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東西。只要看一看从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文献，它的政治纲领，就会明白。因此，在过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共产党员曾经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就在一九二七年两党合作不幸破裂之后，我们的一切做法，也没有违背三民主义。那时，我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的。那时，我们的一切做法，并未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范畴的私有财产制。在现在抗战的阶段与战后彻底完成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阶

段。为了彻底完成这个民主阶段的任务,一切共产党员,毫无疑问,应该依照自己的一贯的革命总方针,自己的决议与宣言,同中国国民党、全国其他党派、全国广大人民一道,诚心诚意的实行三民主义。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认为必要实行它,才能解决将来的社会问题。所谓现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这是“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

(5)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

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我们曾经批驳了一党主义,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末,各党共存,而互相结合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一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呢?要的,必要的,没有这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不利于团结抗日,更不利于长期合作。因此,各党应该认真研究,找到一种最适合于长期合作的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形式。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及各党派的历史特点,今天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有下列三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如果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员加入,我们将取何种态度呢?首先,我们是赞成这种办法的,因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一种统一组织形式,有利于抗日建国。不但共产党,任何其他抗日党派都可加入国民党,只要国民党同意,我们是决不反对的。如果这样做,那我们可以实行同十三年合作不相同的办法,即第一,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第二,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有要求加入的,劝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加入。第三,如果我们的青年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话,也是一样,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用这种办法,可以大家相安,有利无害。这是第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第二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也是赞成的。这种形式,我们很早就提议了,可惜还没有实行。

第三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但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例如许多大政方针之推行,下级磨擦问题之调整,都因没有一种固定组织,让它延缓下去,所以这种办法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第一二种办法不行,这种办法暂时也只得仍之。

总之,长期战争中的长期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

(6) 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

长期战争需要长期的统一战线,前已说过,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其工作中,在其同友党发生关系中,随时随地都要顾到这个长期性。凡于长期合作有利的,应该坚决的勇敢的做,不利的,则决不应做。

这里就发生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说互助,例如各党都要发展,都要巩固,任何一党除了发展与巩固自己之外,还应对友党的发展与巩固取赞助态度。国民党的发展与巩固,共产党员应取何种态度呢?一句话,赞助之。其理由是国民党的发展巩固利于抗日战争,利于全民族,因而也利于劳动人民与共产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国民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员应取什么态度呢?没有问题,取赞助态度。我们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广大的发展,依照蒋介石先生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言去做,该团的发展是有光明前途的。也正是为着赞助,我们对于该团现行办法中之某些事项,希望有所修正,不然,好的动机,将难得好的结果。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成为全国广大青年群众团结救国的统一组织,吸收各党各派各界的青年个人与青年团体加入进去,成为使整个青年一代集体地受到民族革命的教育训练之一大集团。因此,组织上应该民主化,政治上应该发扬团员的自动自觉精神,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态度与意见。

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员决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凡无理的事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之,才是待己待人的正道。互相规过,是朋友间的美德,也是政党间应该提倡的作风。

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我们的友党也作了让步，那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这种为了团结抗日为了长期合作的互让政策，是很好的，很对的。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或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现在我们又主张所有各统一战线中的党派，互不在对方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是必要的。现在当然和过去不同，在过去内战时期，国共两党间除了公开的战争之外，还互相使用秘密手段，进行破坏对方的活动。合作以后，当然不应有互相破坏的动机与行为了，但是互相在对方内部秘密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办法，也应该停止，使彼此安心，才能适合于长期战争中长期合作之目的。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内部作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的共同组织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你们这样做。双方约定之后，下级党员如有违背，由违背之一方的上级负责处理。

此外，双方同志接触，应采谦和，尊敬，商量态度，不采傲慢，轻视，独断态度，以改善双方之关系，这也是必要的。

一切我们所说的，共产党员应该首先实行，不管对方某些人员或尚未用同样的政策、方法、态度对待我们，但我们仍然这样做，做的久了，对方某些一时尚未明白的人员也会明白了。

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们商量解决

有关事项,不应独断。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巩固统一团结,所谓为国为民事业,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之目的,也就达不到。因此,决不能把必要的互让政策解释为消极行为。不但互助是积极的,互让也是积极的,因为必要的让步,是巩固两党合作求得更好的团结与更大的进步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7)民主共和国问题

虽然我们的党还在一九三六年的九月间,就公布了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案,虽然中央同志曾经多次的说明过这个问题,但外间对于我们的主张仍有许多不明白的。这是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问题。抗战的结果将怎么样呢?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这是存在着的问题。再一次解释这个问题,对于巩固各党各派长期合作的信心,是有利益的。

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

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要变为这样一个国家，要同谁作斗争呢？要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剥夺我们的独立，我们就要向他要独立。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当奴隶，我们就要向他要自由。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陷入饥寒交迫，我们就要向他要饭吃。怎样要法？用枪口向他要。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六 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1) 中国与世界不可分

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有意义的。

(2) 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但是和本国人民大众矛盾的，是和

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而且是帝国主义诸国之间自相矛盾的。这最后一种矛盾在历史上的最尖锐表现,就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战。那次两组帝国主义互战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国际形势。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的发展的结果,使得世界又临到新的大战面前。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在此情势下,一方面日德意组成了侵略阵线,实行大规模的侵略。另一方面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争;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东四省首先被牺牲,接着亚比西尼亚亡于意大利,西班牙则助长了叛军的气焰,中国又受到日寇新的大规模的侵略,到最近,奥国与捷克又先后牺牲于希特勒。全世界已有六万万人口进入了战争,范围普及到亚、非、欧三洲,这就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况。

(3) 现时世界战争的特点

由于一方面日德意诸法西斯国家的坚决的侵略意志,又一方面各民主国家不愿实力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使得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态表现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特点,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中国、亚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蚀。在侵略这些中间国家中,侵略者采取了三种特殊的战争形式。第一种是日本对中国,意大利对亚比西尼亚的战争,这是公开的直接的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在不宣而战的形式下进行的,开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采取这种不宣而战政策的目的在于侵略者利用各民主国家的无意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暂时避免和它们的直接冲突,便利其先夺取中间国家的

行动。第二种是意德两国侵略西班牙的方式,采取了援助叛军的办法,这是历史上老办法的重演,历史上这类办法是有过的。第三种是希特勒侵略奥捷两国的方式,这里没有战争的表面(没有打响),但有战争的实际,出动了强大兵力占领奥国全部与捷克一部,并使捷克余部归属其统制,这是不战而亡人国的最巧妙的办法。这三种战争形式的采用,都是由于一方面,侵略国本身力量还不充足,暂时未便和各大国直接作战,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争方法,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又一方面,则是各民主国家不愿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怯懦妥协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间国家。

(4) 英国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 各国实行更大规模的战争

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保守党内阁,正在逐步进行其所谓四强合作的政策,慕尼黑协定之后,欧洲政局有暂时逆转的可能。英国大部分保守党的政策,历来是以排斥苏联妥协德意为原则的,由于他们畏惧苏联的强盛,畏惧自己过早卷入战争,畏惧本国人民运动与殖民地独立运动,早已决心牺牲西班牙、奥国、捷克等国,成就其排斥苏联妥协德意的企图。过去因为保守党内部的不统一,法国人民阵线的积极政策,国内国际舆论的责备,而没有成功。现在则利用了英国及全欧人民不愿战争的心理,利用了法国佛兰亭党的右倾,在希特勒威迫之下,订立了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是英国妥协政策的结果,假如英国不改变它的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各大国间的战争虽暂时还可能不爆发,暂时限制于侵略中间国家的过程虽还在继续着,但最后势必引导各大国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里去,这是没有疑义的前途。“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

(5)全世界多数人类在逐渐动员中

在资本主义各国方面,由于经济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已走到毫无出路的地步,六万万人口的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新的更大的战争在威胁全人类。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则一切都是光明的,进步的,强盛的。在这两种相反的对比之下,全世界大多数人类逐渐地找到了如何保卫自己与解放自己的方向,正在用空前的广大性与空前的深刻性逐步地团结自己并准备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六七年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国的伟大抗日战争,西班牙的人民战争,乃至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等等,逐渐地教育了英法等国与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懂得惟有组织与斗争才是出路,惟有团结世界一切自求解放的人类为一体,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这个全世界人民觉悟,组织,斗争,与统一战线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发展着,但须经过广大而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与张伯伦的妥协政策,最后将遇到伟大的反抗,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前途,也是法西斯战争与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的结果。

(6)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

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到东方,为了企图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

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

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问题的性质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中国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能够战胜他。但由现在到达那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我们与全民族,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这个黑暗势力作战,而要战胜他,只有经过长期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共产党员处于何种地位呢?他们要怎么样做才算克尽其最善的努力呢?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的理论与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同志们!还有一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的问题。

(2)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可以的,应该的,看什么历史条件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与希

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共产党员是坚决反对所谓爱国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与德国共产党他们都是战争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越失败得彻底越好。日本共产党与德国共产党都应该这样干,也正在这样干。理由是: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的战争,是侵害世界人民也侵害其本国人民的。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全力援助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天职,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不能有一点消极性。理由是: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场,拿每一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不容有任何的消极。必须用全力援助友党友军,不容有任何坐观成败的心理。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后来又提出了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做法,这些爱国主义,一切都是正当的,应该的,必须的,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发挥,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闭着眼睛瞎说我们的做法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3)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我们这个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这种困难环境的形成,在于我们民族的广大生动力量至今还只在

开始发动之中,大多数民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化,腐败现象与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巩固之不足,这些都是形成困难环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原故,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民提高落后的重大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与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与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与友党友军发生关系中,应该坚持统一团结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态度,诚心诚意地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与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范。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民提高落后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先进分子与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

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它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长期战争与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与人民大众中之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提高落后,克服困难,为战胜敌人创造新中国而奋斗。

(4) 团结全民族与反对民族阵线中的奸细

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同时,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并且还要混进来起其破坏作用的奸细,这就是暗藏的,外表上以抗日面貌出现的,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这些奸细,并以真凭实据为基础,按照具体情况,揭发这些奸细们的罪恶,同时劝告友党友军与人民大众不要上他们的当。提高对于民族奸细们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负了重要的责任。揭发与清除奸细,是与扩大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

(5) 扩大共产党与防止奸细混入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产党必须扩大其组织,向着真诚革命,而又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与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变为伟大的带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党里。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与严防,是一刻也不应该放松的。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的发展党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又不可因为

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与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就是我们发展党的总方针。

(6) 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党的独立性

如果中国只有一个阶级，一个党派，那就再不要什么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什么呢？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联合统一，同时又容许其独立共存。否认独立性，只谈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一样。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抗日利益是总原则，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而决不应是相违背。但同时，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基本的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与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

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总要求。

(7)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来干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敌人奋斗时,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干的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共产党员应该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之必要。在局部情形看来认为可行,而在全局看来认为不可行时,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情形看来认为不可行,而在全局看来认为可行时,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这是不能成功的。随时注意组织先进分子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同盟者存在的地方,遇事应和同盟者协同去干,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共产党员领导艺术与工作精神方面不可忽视的地方。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与同盟者协同工作的,违背了这些,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8) 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同时,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才。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无数的天才家、领导者。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在这里,依靠原有干部的基础

但自满于这个基础，是必须的。因此，坚持而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应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但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团结他们，同时善意地给以帮助，对待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的态度，把他们的积极性与天才组织到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尽己自封、目无余子的态度，是不对的。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对于干部长短优劣的识别，不但看他的表现，而且看他的本质，不但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看他的全历史与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正确方法。在这里，粗心大意，任情逞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与工作，归结起来，只有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文告、著述、讲演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都属于“用干部”一类。这两件事，在中国习惯上，就是所谓“用人行政”。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列宁、斯大林的干部政策，在于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等等为标准，而不是其他。在这里，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正是相反。在张国焘，正是阿谀者奖，正直者罚，拉拢私党，别有企图，他的小组织派别活动，是有了深长历史的。然而也正是他这种以个人为中心而不以党的政治原则为中心的干部政策，走

到了他的目的之反面,一切干部都脱离了他,结果留下了张国焘寡人一名,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的落后性,反映到党内,就是自由主义、个人风头主义与派别活动等恶劣倾向的根源。估计到这种根源的存在,坚持列宁斯大林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反对不正派不公道的恶劣倾向,巩固党在正确路线上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以至全党同志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在党的培养与艰苦奋斗中创造出来的干部,是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应为全党同志所尊重所爱护,各级领导机关则负有用实际办法达到爱护目的之责任。有些什么办法呢?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不怕犯错误;但同时,又适时地与恰当地给以关于工作环境、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的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理论与方法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之在思想上在领导能力上较之过去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不是每天检查,而是适时检查,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纠正缺点,扩张成果,这是必要的,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改造他们。这就是对于有缺点的、犯错误的、有不正确思想的干部,用主要的说服方法,不得已时则用斗争方法,使他们改变过来。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在并非大的原则错误又非说而不服的情况下,不适当地轻易地给人戴上“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等大帽子的方法,不适当地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都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的疾病问题、生活问题、家庭问题等事,党的领导机关应给以热忱的亲切的同志的关心,漠然置之冷淡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疾病必须医治调养,生活求其切合工作需要,家庭问题在可能范围内也须助其解决。一切这些,在物质与环境许可的限度内给以照顾,对于激励干部的工作精神,团结全党为一体的目的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9) 党的纪律

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10) 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与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引导斗争向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具体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与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与善于提出问

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等等上面。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的。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由于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实在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化之不足。为此原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民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叫做民主生活,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联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了党内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义。

在军队中的党,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同时,军队党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的民主,应是为着巩固军队纪律与增强战斗力的,而不是削弱纪律与战斗力。在地方党,也应是有利于巩固党的纪律与增强党的战斗力,而不是相反的。

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党与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有用的与重要的武器。

(11)我们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与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思想上政治上及工作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

就是遵义会议与开除张国焘。

由于遵义会议纠正了在反五次“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与红军，使得中央与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与延安会议（反张国焘路线错误是从巴西开始而在延安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处；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反五次“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要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能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尤其是它的广大的干部与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解放出来，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三）中央苏区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军事建设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与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时党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方面，是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与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李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全般正确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之下来了。在张国焘的组织路线方面，则是完全离开了党的一切原则，破

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与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不变,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最后实行叛党,就不得不坚决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开除,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这一开除,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与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与成功,给了我们在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执行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与壮大起来了。

(12)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新的抗战形势中,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的组织与民众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长期合作,发展党,与发展民众运动。但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要注意,否则也就要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与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实际情况,决不能抽象地看问题,一般的指出与具体的应用,是有区别的。所谓“乱戴帽子”的坏习惯,也就是说的那种抽象地应用这个方法之不对。

在反倾向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实质。提高干部与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是巩固党的纪律之重要的要求。

(13)学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中央委员会与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努力罢，从我们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因此，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最实际不过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后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不过是一个西班牙的唐·吉珂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Q,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向谁研究?我们的先

生多得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全世界，他们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该向他们或多或少的学到一点东西。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须从不自满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14) 团结全党到团结全民族

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重大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条件。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现在我们党内，无论在政治路线上，战略方针上，时局估计与任务提出上，中央委员会与全党，意见都是一致的。这种政治原则的一致，是团结的基本条件。党员与党员，干部与干部，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习惯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也学会了许多正确的恰当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确政治原则下的和衷共济的空气，有了更好的相互关系。由于地区的广大，情况的复杂，工作部门的不同，不同的意见是难免的，应该的，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证着交换意见，并使之概括起来作出结论，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针。在这里，客观地与全面地看问题的态度，不杂主观成见与意气，不要片面的看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也逐渐地学会了，这又保证着党的团结。我们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无用的长物。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及它的领导人员，已经有了老练[练]的作风了。所有这些，就能保证中央以至全党的团结一致，就能在全民族中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核心与重心，推动抗战进到胜利。同志们，全党

团结起来,全民族团结起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八 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现在我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召集七次大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准备召集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此次全会扩大会应该讨论加紧这个准备工作的问题,并决定在不久时间实行召集大会。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讨论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讨论如何进一步的团结全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讨论如何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方法与计划。讨论如何动员全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更积极的参加抗战。并应讨论党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的团结自己,加强自己,巩固自己与国民党、其他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联系,以便顺利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除了这些政治的与组织的问题之外,七次大会应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将全党中最有威信的许多领导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来,加强对于全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这次大会的意义如此重大,因此,扩大的六中全会闭幕之后,诸位同志回到各地工作,便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之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我们相信,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最庄严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让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前发起抖来,滚到东洋大海里去,中华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

我的报告就此完结。

根据解放社一九四二年
四月出版的单行本刊印

注释

[1]8月15日为《决定》的起草时间，而8月25日为《决定》的通过时间。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与党的组织问题

(1938年10月1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

洛甫

第一节 绪论

(一)组织任务,服从于政治任务。政治任务靠组织任务来完成。组织工作上事务主义的来源,是由于组织任务脱离了政治。但在政治任务决定之后,组织工作有决定的作用。政治任务没有组织工作来完成,就变成空谈主义。

(二)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

(三)必须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迅速变化着的战争形势,估计到中国各地具体环境的特点,来决定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内组织工作的特点,及其在情况变化时的各种可能的转变。一切组织工作都必须从具体情况的认识出发,从实际的东西出发。

(四)对于各国与中国组织工作上的经验的考虑与检查的必要,同时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创造。应该吸收一切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但不要为过去所限制,所拘泥。在组织工作方面,我们也要在理论上,在实践中学习,要向全党同志,向群众学习。

第二节 党在组织工作上的任务及过去的成绩与弱点

(一)我党今天组织工作上的总路线是:组织最广大的人民到抗战中来,同国民党亲密的合作,坚持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党,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在抗战中能够起重大的以至决定作用的党,保障在持久战中战胜日寇,争取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彻底胜利。

党在组织工作上的这一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说党的组织工作是服从了党的政治任务的。

(二)今天组织工作上的成绩,表现在统一战线方面,国共合作方面,党的发展方面,党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等方面的成绩。这证明了党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但在上述各方面同样表现出了党在组织工作上的弱点。如统一战线,首先是国共合作,还不够广大与巩固。党的组织力量还落后于政治影响,还不够强大等。

产生这些弱点的客观的原因:

(甲)国民党进步的迟缓,对于党的限制及顽固分子的捣乱。(乙)过去对党的摧残的影响(组织不大,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的缺乏);主观的原因:(甲)我们还没有运用一切机会,进行工作。(乙)旧的组织工作方法的残余的严重存在,及新的工作经验还不够。

(三)转变中的成功与困难:

(甲)过去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根据这一政治路线而进行的组织路线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过去苏维埃运动中组织工作中最大的成绩:

(A)学会了组织坚强的铁的军队,学会了领导革命战争。(B)取得了组织政权与管理政权的经验。(C)在农村中工作的

经验。(D)培养了一批在政治军事上比较老练的干部。

(乙)目前组织工作上的大转变的任务：

从两个政权对立到国内的和平统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

从党的不合法的秘密的活动到合法的公开活动。

这种转变是我党历史上的大转变。但这个转变已经比较顺利的达到了目的。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成绩。

(丙)过去组织工作中残余的存在：

(A)同国民党对立,对国民党的深刻的仇恨,与不会同国民党合作。(B)长期同整个社会隔离的状态,仇恨一切旧东西的结果,使我们不善于同整个社会接触,特别是对社会上层人士的接触。(C)苏维埃红军中行政的、军事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存在,使我们不会运用民主的工作方法。(D)在白区白色恐怖下秘密的狭窄的工作方式的存在,使我们不善于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作。(E)长期的左的关门主义、公式主义的恶劣传统的影响。

这种残余的存在,妨碍了统一战线与党的工作的更大的开展。

(四)要求组织工作上的新的进步与发展：

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根据过去组织工作上的经验,根据已经得到的成绩(新的经验),克服客观上、主观上的困难,以求得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的新的进步与发展,是我们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也是本报告的任务。

本报告分成两部分,即关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部分和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部分。

第一部分 关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

第三节 关于统一战线的特点与工作

(一)目前统一战线的特点,政治报告中已经讲过了,我只讲一下同组织工作有关的几点。

我们目前的统一战线,无疑的,是同法国的、西班牙的统一战线不同,同中国大革命时代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同的。所以估计它的特点是很重要的。

这些特点如下:

(甲)它是在对外抗战中发展与扩大的,因此:(A)它的民族的广泛性,它包含一切抗战的人民。(B)它在抗战中的进步性(战争的地方,战争的部门,均较其他地方与部门为进步)。但(C)它内部包含着敌对阶级,敌对党派,他们间有过合作与斗争的经验。因此,(D)在抗日战争中,在进步中包含着严重的斗争。这也就是进步的迟缓与困难的原因。

(乙)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是国共两党,中心问题也是两党的问题:(A)持久战要求两党的长期合作。长期合作的根据是由于:反日的反侵略的战争,直接敌人是日寇;投降妥协即是自己灭亡,日寇消灭蒋及国民党的政策;过去分裂时期的痛苦的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坚持合作的坚定立场;双方对于长期合作的迫切要求等。(B)但过去的长期的斗争,又在两党间造成了很深的成见与鸿沟;共产党方面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方面怕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相互间存在的互相防范与警戒;特别是国民党的“联共”与“防共”政策的矛盾性。而在共产党手里,也有武装与政权。这些均是摩擦的来源。

(丙)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是不平等的。(A)共产党方面

承认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及拥蒋的合作。所谓“合法权”是在国民党的手里。它是大党。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也比它统治的地区小。而力量上的不平等,也就产生了合作形式上的不平等。形式上我们拥护它,服从它。这是国民党方面的高慢主义、阿Q主义的来源。(B)但双方还有政治上的不平等。是国民党承认抗日救国为合法,共产党(武装与政权)为合法。它的政权军队的腐化,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的存在。我们的政权与军队都是先进的。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落后,它的进步的被动性,它缺乏远见。而共产党则与它相反。过去十年国民党政治在人民中的恶影响及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好影响。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先锋作用。在政治上是国民党要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宗派主义的根源。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使不平等的合作形式,更为复杂。

(丁)统一战线(两党合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A)中央与地方的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方中央进步,地方落后,但有些地方,则地方进步,中央落后。(B)地方与地方的发展不平衡。(C)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发展的不平衡。共产党的力量,一般的发展比国民党要快,而国民党在某些地方(如敌后方)的力量则削弱了。在政治影响上,国民党与共产党同时增长了,但后者较前者为快。

(戊)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无组织的。他们向来在政治上是落后的,被压迫的。他们现在不但要求抗日,而且迫切的要求民主自由与民生的改善。抗战需要他们的觉醒、组织与力量,历史正推动着他们成为全国的主人。

(己)国民党的特点:(A)是以大资产阶级为主的各阶级联合的党,在革命历史上转变着自己阶级的关系。抗战发动后,国民党内部的阶级力量发生了变化与分化,进步与保守倾向间发生了斗争。(B)是同政权军队结合着的党,其内部有代表各方面的小派

别,主要的为C·C、复兴。(C)有长期历史,有一个主义,有它自己的独裁式的领袖,有革命与反革命的经验。(D)有它上层的骨干担负着各方面要职,但其下层的、普通的党员,一般的是充数的、挂名的、没有组织生活的。

(二)适合于这种特点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几个注意点:

(甲)善于把握总路线,克服一切障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方针。在言论行动上,总是把抗日反汉奸放在第一位,表示出要求团结统一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其他如民主民生,均应放在比较次要地位。不为一时的不满、磨擦、逆流,而丧失自己的基本方向。从大处着眼,不讨小便宜,不急于成就,不为挑拨者所利用。这要求全党同志的持久性,忍耐性,不要急性病,不要冲动,而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乙)善于承认不平等,使不平等成为平等。(A)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推动国民党的进步,发展统一战线。尊重国民党中央的抗战国策,服从他们的抗战法令,用自上而下推动、协商、联络、影响、说服、批评等方法,使国民党党、政、军走向进步。消除两党间的成见与仇恨。争取大多数的同情者,帮助进步分子的团结。总之,在政治上提高国民党一步。(B)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壮大自己。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如:“共同宣言”“共同领导”等),而要善于在现在不平等的形式下,壮大自己,运用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如八路),在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工作,去在帮助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进行工作,以组织自己的力量(党、政、军、民方面)。这要求全党同志埋头苦干,在力量上去壮大自己,使力量上的不平等也成为平等。

(丙)善于运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A)加强、提高、强化中央,使中央进步,运用中央的一切进步的东西,运用蒋的进步的言论,去推动地方与下层的进步。这里应认清全国性政权的作用。(B)求得与地方进步分子的合作,推动地方的进步,实现中央

的抗战法令,造成模范,以推动落后的地方,不但使之与中央的进步看齐,而且超过之,以推动中央。(C)善于运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不平衡,组织共产党的力量(政权、武装、民众),强化共产党的力量。善于运用局部的、部分的可能形式,不要太急于组织全同性的、全般性的东西。(D)一切都是为了统一战线在各方面的进步,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丁)善于尊重国民党,帮助国民党,使之进步,以发展统一战线。(A)用一切方法影响国民党的进步,使国民党中一切抗日分子自己团结起来。首先是到处尊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其领袖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的各种形式。同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人,发生亲密的关系。动员优秀分子到国民党中去。帮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进步与发展,对于它的经常的、诚恳的、善意的批评,认真的实际的帮助他们的工作。诚恳的、大公无私的、谦逊的态度。在坚持抗战的纲领下,团结各派国民党分子。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使之安心(首先在他的C·C、复兴、军队中)。但关于今天被迫加入的(如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群众团体、政府中)及过去已经进去的共产党员的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要在逐渐求得共产党的公开活动中,国民党的进步中,保证共产党公开后不受歧视的条件下,以求得最后的解决。发生这样问题时,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中央应求得合理解决。

(B)善于同顽固分子、动摇分子、妥协分子进行斗争。

(子)“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不怕进行必要的磨擦。”“不必要的磨擦不可有,必要的磨擦不可无”。(丑)一般采用公开合法的民主的斗争方式。自始至终站在拥护抗战国策,拥护三民主义的立场。自始至终采取宣传、请求、请愿、舆论动员的立场上。自始至终以“劝人为善”争取大多数的立场。这样可以:自己站稳立场,使大众看来是大公无私,光明正大,真能感动与争取大部分可变分子,而孤立不可救药的分子。(寅)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

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丧失自己的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注意软硬的“分寸”。只有这种斗争可以打破一切“防共”的阴谋。

(戊)善于组织无组织的群众，到抗战中来。

(A)在统一战线中组织无组织的民众。为了抗战而动员民众。经过抗战以组织民众。拥护政府军队以组织民众。在抗战中争取民主与改善民生，以组织民众。(B)组织民众以巩固与加强统一战线。没有民众，抗战没有力量，抗战不能巩固与持久。(C)培养民众的自动性与独立性，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足够的自信心与主人翁的觉悟。

(己)发挥党在抗战中的模范作用，抗战的推动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保持党的独立性，并壮大自己。但应善于隐蔽自己的力量，不要太突出。

(A)扩大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好的政治影响，争取在全民族中重要的地位，转变全国人民对共产党的视听。(B)要在别人不注意中，警戒疏忽中发展自己。(C)“实事求是”——但求实际，不求虚名。(D)不要以自己的希望，当做实际。不要把人家同我们所讲的，当做实际。真正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实际”基础上。

上述的一切办法，是适合于一定规律的，而不是违反规律的。只有照这些办法做去，才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也有益于共产党。

现在单独提出同汉奸与托派斗争的方法问题：

(三)同汉奸斗争中应注意之点：

(甲)公开反对汉奸的立场，指出当汉奸是中国人的最大耻辱。造成人民对汉奸的仇恨。主张消灭汉奸。

(乙)但应估计到各种名称不同的汉奸，如：(A)坚决的、死心塌地的大汉奸。(B)动摇的汉奸，两面摇摆的汉奸。(C)不得已的、被迫的、心上还是偏向中国的。

(丙)对各种汉奸的基本方针：(A)消灭坚决的，死心塌地的少

数大汉奸,公开宣布其罪状,没收其财产。(B)争取动摇的与被压迫的汉奸,同情抗日,帮助抗日。

(丁)争取动摇的被迫的汉奸的方法:(A)对一切汉奸,开始多采取争取其回头的办法。不没收其财产,多取说服劝导的办法,给他们以自新的道路,不要“逼上梁山”。——这样办,动摇的与被压迫的,固然可以回头,即坚决的,亦能动摇其决心。(B)坚决消灭死心塌地为日寇服务的少数大汉奸,公布其罪状,没收其财产,给其他汉奸以威吓。(C)对能够同情与帮助抗日的“汉奸”的态度:(1)同他们发生关系时要秘密,不要为日寇所知道,要掩护他,不要暴露他。(2)给他想办法以应付日寇。我们不要造成他们困难使他们被敌人消灭。要从持久出发,不要求一时之痛快。(D)但不要轻易相信汉奸的话,要根据具体的事实,去证明其是否可靠。(E)秘密保存来往信件、证据等,使之不得反悔。

(戊)在特殊情况下(如日军已到,或迫近,无法反抗,不能逃避时),当某些士绅组织维持会,以应付日军时,应与之保持联络,以得到情报等。

(己)在维持会中,应进行工作。

(庚)不要轻易把汉奸帽子放在动摇妥协分子的头上。从动摇妥协到变为汉奸还有一个过程。我们策略运用得适当,可推迟他们变为汉奸的过程,或使他们真正变为汉奸时陷于孤立。

(四)同托派斗争中应该注意之点:

(甲)解释托派在世界上的反革命作用,及其对于人类和平与革命的危害,揭发他们每一危害国家民族的事实,造成人民对于他们的仇恨。采取坚决铲除的立场。

(乙)但在具体解决问题上,应依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付办法;对不可救药的分子,严厉对付;对可以改邪归正的,应使之自新,效力国家。

(丙)同托派斗争的方法,在中国同在苏联有些不同:

(A)在苏联:(子)联共有了几十年同托洛斯基主义斗争的历史;托派反革命的道路,已为大众所周知;谁都反对托派,它已完全没有群众,它的“左”的资本已经用尽。(丑)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已完全胜利,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联共有全体劳动人民的拥护。(寅)代表反动阶级残余的托派的活动,不能不采取完全秘密的、阴谋暗杀的、暗探的、隐藏的、两面派的方法。(卯)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能与应该采取逮捕、公审、枪决的办法。这办法现在是比较简单的,但这是长期斗争的结果。

(B)在中国:(子)托派的历史及反革命的事实,并未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周知。它的“左”的资本仍未用尽。在党力量薄弱的地方,它仍可欺骗一部分极“左”分子,与落后分子。(丑)全国不为我们所统治,而且主要地区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托派依靠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力量,还能公开向我们进攻,压迫我们。对那里托派分子的连根铲除,一时还谈不到。(寅)我们是处在民族抗战,各阶级合作对外的时代,阶级关系很复杂。

(C)因此:(子)不应放弃而应加紧同他们进行公开的、思想的、民主的斗争,暴露他们一切破坏团结统一的罪恶,揭破他们民族的两面派的本质,采取各种策略,使他们完全陷于孤立。(丑)不应放弃争取被他们所欺骗的分子,到抗战中来的方法。(寅)对于托派中不可救药的分子,在国民党区域内,只有在群众拥护,政府赞助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铲除的方法。但这只是(子)(丑)二项办法正确执行的结果。(卯)在我们统治区域,则应铲除最坏的,使受他们欺骗者改过自新。但因为今天的托派就是汉奸,故公开处决托派分子时,应用托派汉奸的名义。

(丁)总之,应该使反托派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看来,是全国人民与极少数坏人的斗争,而不简单是共产党与托派之间的斗争。我们不要輕易把托派的帽子放在人家的头上。应分别托派与有些

有托派思想的分子。也不要急于把托派的帽子,放在那些隐藏的托派分子的头上,使反对他们的斗争受到障碍,应该用真凭实据去揭破他们的真相。在斗争中应表现出有忍耐心与劝人为善的风度。

(戊)但在任何时候,不要轻易相信转向后的托派分子悔过自新等的甜言蜜语,对他们仍应严密警戒,并要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去考察他们。

第四节 不同地区不同任务与党的工作

(一)不同地区。关于不同地区要求有具体的分析,但大致可分为下列数种:

(甲)敌后方。敌后方又可分为:

(A)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敌人的后方根据地;(B)抗日根据地;(C)游击区——敌我力量争夺的区域;(D)敌人未占领,但即可失去的区域;(E)敌人已占领,但仍可收复的区域。

(乙)战区。战区又可分为:

(A)直接战区——前线;(B)邻近战区——预备阵地。

(丙)我后方。我后方又可分为:

(A)估计敌人会到来的近后方;(B)估计敌人不会到来的远后方;(C)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

这些地区是互相交叉着的,而且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对于每个地区,仍需要有具体的分析。

(二)关于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时,应注意下列各点:

(甲)军事战略上的一般情况;

(乙)敌人的力量及其政策,汉奸(托派在内)的力量;

(丙)我们政府军队的力量及其政策;

(丁)各党派统一战线的形势;

(戊)民众的情况及其与党、政、军的关系。

(己)共产党力量与工作。

(庚)历史的因素。

(三)在组织工作的总方针下不同地区的不同任务(这也要求有具体的解决,不能以此成为公式):

(甲)敌后方(敌人占据的中心城市与据点除外)的任务是,大规模的公开的发动、组织、坚持、扩大游击战争,打击、消耗、困疲敌人以达到收复失地,保卫国土,创立抗日军队,抗日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准备将来全国的反攻。这里应建立模范的统一战线,建立强大的共产党,大批的教育干部。

(乙)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点线区域)的任务是,坚决的实行退却,转入秘密状态,利用公开合法,埋头苦干,在大企业中建立工人的短小精干的党的堡垒,输送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与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耐心的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将来的反攻。

(丙)战区的任务是,动员与组织当地民众参战(战地服务团,担架运输,交通慰劳,宣传队等,在敌人前进路上破坏道路,桥梁,坚壁清野,锄奸等工作),鼓励士气,帮助政府、军队进行直接的战争,争取局部胜利。依照当前情况,发动或准备必要的力量(党的与武装的),以进行游击战争。应把将要失去的城市中的大批干部、党员、青年学生,转移到乡村中去工作。可留下一小部分在内,但留的方法,留的对象,应慎重选择。

(丁)近后方——估计敌人会到来的后方的任务是,进行直接配合战区参战的动员(送新兵上前线,组织服务团上前方,献金,防空防毒,慰劳伤病兵,救济灾民难民)。号召团结统一,持久抗战,揭发与打击一切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阴谋,进行公开合法的政治动员。从城市中输送大批干部、学生、文化人到乡村中去,在必要的地区,预先建立堡垒,准备必要的力量,以准备游击战争的发动。

在适当地区,多开办训练班,输送青年学生到各种合法的训练班中去,大批教育青年学生,再大批派他们出去工作。

(戊)远后方。远后方的任务是,响应各方面一般的抗战动员,帮助政府进行征兵,推销公债运动。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经过青年学生在内地开始文化教育的救国运动,建立一些公开合法的救亡团体等。建立党的秘密的精干的堡垒,同时多进行上层活动,改变上层分子对共产党的观听,等待时机。

(己)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大批吸收全国青年来边区,给以必要的教育(——学校工作的重要),以影响全国。同中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管他承认与否,也不必急于要他承认)。

(四)不同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

(甲)由于国民党进步的被动性,因此敌人愈逼得利害的地方,进步亦较快,日寇未到的地方,则仍然非常黑暗。

(乙)被日寇所蹂躏的地方,在敌后方,在战区,反动的顽固分子特别逃避得快(向内地,向日本方面),新生的力量的产生亦快,磨擦亦较少,在我后方则相反。

(丙)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统治力量的不平衡。

(丁)共产党力最分布的不平衡。

(戊)各地方的历史条件的不同。

因此:离开战场愈近的地方,进步亦较快,工作亦较顺利,反之,离开战场愈远的地方,则愈落后,工作亦愈困难。进步的次序是:敌后方第一,战区第二,近后方第三,远后方第四。

(五)时刻记住过去革命中的两个教训:

(甲)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革命军队在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及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忽视这点,是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我党的

弱点，而重视这点，则是苏维埃革命时代我党的强点。我们应该发挥这个强点。

(乙)同国民党挤得太紧，容易造成分裂。应该有相当的分区的活动，各自发展。大革命时代，这不可能，现在则有此可能。应该利用此可能。

(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任务，不同的革命形势，及过去革命的两个教训，来决定党在今天的工作的重心。

(甲)今天工作的重心，应放在：

(A)最容易动员民众参加战争，以抵抗日寇的侵略，以建立统一战线坚固基础的地方；(B)最容易在全国人民前面能表示出自己的模范作用，“我们的位置在前线”，“牺牲奋斗”，“忠义救国”等，以推动统一战线的地方；(C)最能组织与发展自己的力量，有大发展前途，以造成统一战线的核心的地方；(D)同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较少的地方。

(乙)因此，党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然后及于近后方，远后方，以至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党的力量应依此分配，不要平分兵力(这种布置为了巩固统一战线，与国共长期合作也是必要的)。

(丙)但中心地区的中心任务，应放在进行抗日战争，创立坚强的武装力量，与创立抗日根据地。其他工作都是为了为完成这种任务造成有利条件。应反对工作中的平均主义。

(丁)应教育全党同志学习领导战争，学习革命战争的战略与战术。

第五节 关于敌后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一)敌后方的情况：

(甲)敌人的主力在进攻中，在占领区敌人力量的不够分配，敌之暴行，及其分布情况(日本的、汉奸的)；

- (乙)八路军新四军与其他抗日军队的存在与活动；
- (丙)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与抗日分子的积极活动；
- (丁)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与要求；
- (戊)地区辽阔，便于游击战与运动战。

因此，根据地的创立是可能的。

(二)敌后方根据地的重要：

(甲)持久战的战略支点——牵制敌人的进攻，不断威胁敌人，反攻中的前进支撑阵地；

(乙)民主共和国的下层建筑与雏形；

(丙)抗日军补给的后方；

(丁)组织、武装与教育广大民众的自由场所，大批干部的出产地；

(戊)巩固人民抗日的自信心。

因此，创立根据地是必要的。

(三)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条件：

(甲)各党各派首先是国共两党的巩固的统一战线，而共产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

(乙)政府军队与民众间的团结一致。

(丙)三民主义共同纲领的开始实施(是抗日的、民主的、民生的)。

(丁)一定的有利的地理、地形及敌情的条件。

没有这些条件，持久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晋冀察边区即是这种根据地一个很好的例子。

(四)但敌后方的情形也是非常复杂的，创立根据地的方法，决不能千篇一律。一般的，我们可大致分成两种类型：

(甲)在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占优势的活动区域创立根据地则比较直接、单纯、迅速。

(乙)在其他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创立根据地则比较间接、曲

折、迟缓。

(五)在我们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创立根据地时,简单的说来应注意如下几点:

(甲)在抗战中建立与改造地方武装,使之成为革命的民众的武装,统一其领导、编制与供给,设立军区、军分区、政治部等等。

(乙)在抗战中建立与改造地方政府,使之成为抗日的、民主的、廉洁的政府,统一其领导与组织。设立边区政府、行政公署、专员公署之类。

(丙)依抗战的需要发表简单的,合乎三民主义的施政纲领(抗战建国纲领),制定单行法令,并实行肃清敌探汉奸土匪,建立抗日秩序。

(丁)普遍组织人民自卫军,少先队,进行动员、放哨、警戒等工作,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基干自卫军,模范自卫军,模范少先队,游击队,并扩大正规部队。

(戊)公开组织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独立的强大的群众团体,联合成为总会或联合会,使之成为军队与政权的依靠力量,及军队与政权的进步的推动的力量。

(己)设立省县的国民参政会,使之真正成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从村长区长的民选逐渐走到县长的民选(原有总动员委员会的,不应取消,而使之成为半民意的机关,或民众的联合会)。

(庚)实行减租减息,救济,优待,改善劳资剥削关系,反贪污,节约运动等办法以改善民生。

(辛)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以加强国防,解决给养,改善民生为原则。

(壬)文化教育工作。学校,报纸,大批干部的培养与输送。

(癸)大量发展党,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一切军政民的领导,集中与统一于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区党委、省委)。

(子)这种地区,仍然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应该求得上级机关

的承认与批准,即不批准时,仍应表示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经常与中央、或司令长官发生关系,向他们报告工作。他仍然应该是统一战线的(吸收各党派的名流学者参加)。但这种地区,应该是全国的模范区,应该是新中国的雏形。

(丑)这种地区的工作方式应是大胆的,公开的,大手面的(反对秘密工作时代的被压迫阶级的小家子作风)。斗争形式,主要的是抗日的武装斗争,其他一切斗争形式,都是为了争取这一武装斗争的胜利。但决不应看轻其他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与其他斗争形式应很好结合起来。

(寅)工作发展的次序,一般是从党所领导的武装到政权,到民运。当然在武装中,政权中,民运中均要党。这样发展的次序是顺的,适合于规律的。党的力量的分配,即应以此为标准。

(六)在其他我们没有基础的地区,为创立根据地,我们的工作方针应如下:

(甲)在能同我们推诚合作的左派上层领袖统治的地区,则应诚心诚意的赞助他,经过他来进行创立根据地的工作。一切工作应求得互相信任。

(乙)在同我们合作的中派上层领袖统治的地区,则应推动他进步的方面,防止他保守的方面,发展他下层的进步力量。对他下面的顽固分子,仍应多采取解释联络的方法,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善意的中立。但公开民主的斗争方式,仍不能放弃,主要的是防卫性的。对他们的实际的援助,只在一定的条件下,而且是有限度的。但对于他们自己发展力量,我们仍应一般采取赞助立场,不能妨碍。

(丙)在顽固分子统治的区域,我们仍应坚持抗战的方针,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但必须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对他们的捣乱破坏,应公开批评与揭发,必要与可能时应给以打击,削弱其力量,使之孤立。在斗争中,我们应不断求得自己力量的发展。

(丁)在当地豪绅地主的武装(如联庄会,会门等)统治的地区,首先应采取联结的政策,互相接近。在他们内部工作时,应采取积极参加剿匪、保卫家乡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信任。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推动他们为保卫家乡而抗日。在他们抗日的行动中,组织人民自卫军,或游击队,以逐渐瓦解其组织,孤立其上层的坏分子(一部分笼络之,给以名义,最坏的消灭之)。

(戊)在土匪统治的区域,在土匪头子要求的情况下,可酌量派人进去工作,明察形势。可能时,可采取逐渐改造其统治系统的方针。不可能时,则应设法使之分化,瓦解他们的队伍。可同他们订立互不侵犯的,或共同行动的临时协定。但在我们统治区的土匪,则应使之出境,不然则用武力消灭之。

(己)当友党友军内部发生冲突时,应完全以大公无私的态度进行调解,以求得双方的好感,便利于以后的工作。

第六节 党在军队中的工作

(一)中国抗日军队的特点:

(甲)是抗日的军队,在抗日中正在改造与进步。

(乙)军队的质量,是极不一致的,有最进步的(如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最落后的。除了八路军与新四军以外,都保存着过去军阀军队的传统。

(丙)军队的系统很多,现在虽能一般的统一指挥,但仍不免是私人派系所依靠的力量。外边人不大能插足。

(丁)雇佣的军队为主,征兵制还未建立。

(二)抗日军队工作中应注意之点:

(甲)只能巩固,不能采取瓦解破坏的方针,但必须在帮助其改造中,来求得巩固。

(乙)尊重军队的指挥系统,改造军队,必须经过上级军官的同意与赞成,应从上而下。反之,则违反军纪,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

(丙)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指挥系统。自己的军队,必须求得指挥自己军队的合法权。在别人指挥系统内的我们的某些军事单位,不能同时由我们来指挥。

(三)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任务:

(甲)在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中推动友军的进步与改造。

(乙)建立与扩大在我们单一指挥下的军队。

(四)在扩大我们自己的武装方面,应注意下列各点:

(甲)主要的重心放在敌后方。

(乙)大胆利用已有的合法权,扩大自己:(A)以八路军新四军名义,组织各种支队,游击队;(B)尽力收编杂色队伍、自发武装,及各种游击队(地方党组织的尚未取得合法的在内);(C)动员新兵,收容散兵,动员各种基于自卫队、游击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

(丙)取得抗日政权下合法武装(如保安团等)及民众武装力量(如自卫队)的直接指挥权。

(丁)用各种名义组织独立支队等。将自己创造的力量,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去求合法,而交给友党人“加委”与指挥中去求得“合法”,结果一定上当,自己不能指挥,反为人家指挥来反对我们(侯如墉[鏞]、郭挺一的例子)。

(五)对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必要要求:

(甲)应该建立政治委员制,政治工作机关及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到全军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三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乙)在独立行动的军事单位内,应建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党委”),决定一切政治军事的问题。遇事应讨论,争论不决时,应服从党的负责者(前委或党委书记)。

(丙)军队中党的负责同志,应绝对服从党上级机关的命令,绝对禁止在军队中进行反对上级党的言论与行动,禁止进行一切派别的、无原则的斗争(任何争论不能解决时,应交上级解决)。应在军队中创造尊敬党的领导机关,服从党的命令的优良传统。

(丁)在作战纪律,军民关系,克[刻]苦耐劳,自我牺牲方面,应成为一切其他军队的模范,以影响其他军队。

(戊)同地方党应建立良好的关系。反对军队中的自高自大主义,与地方党的地方主义。军队党与地方党的统一领导的必要。

(己)以省委的军委书记兼部队政委,或省委书记兼政委,或政委兼书记的方法,以求得党与军队的统一领导。

(六)大胆的利用八路军新四军的合法地位,同友军发生各种关系,向他们进行各种善意的提议,贡献意见,希其采纳。尊重他们的指挥。对友方对于我们干部的要求,应采取极端审慎的态度,必要派时,以少而精为原则。派出干部工作方针,不是破坏他们,而是巩固他们,不是同官长对立,而是帮助官长,以求得亲密合作与信任。不是使官长惧怕,而是使他们安心。千万不要急性病,幼稚病。他不应该直接担负发展党的组织的责任。同时应防止腐化。

(七)党在其他军队中的工作,应:

(甲)多同官长联络,当朋友,争取他们的同情与信任。

(乙)在上层不愿意的情况下,不要在他们军队内发展党。

(丙)在中央军内一律不发展党的组织,但力求更多的同情者。

(丁)任何抗日军队内,党的组织的任务,是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戊)军队内的党,在需要秘密的条件下,以短小精干为原则。注意吸收官长中的特别党员。只有在军队主管长官不怕党的公开时,才大量发展党员。

(己)利用各种文化以及群众的团体,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争取官长兵士们的〈同〉情抗日。

(八)帮助同盟者建立新军的两种方法:

(甲)只处在从旁帮助的地位,在组织上党不在新军中起决定作用,但政治上应给以必要的保障,使领导权操在革命分子手中,

不反对自己。

(乙)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直接取得我们在新军中的决定作用。这里面的党,在同盟者不愿意时,应保守绝对秘密的原则。但必须尊重同盟者的指挥与命令。军队仍然是同盟者的。

上面两种办法的采用,应依情况来决定。但后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

(九)在敌伪军中工作的方针:采取伪军反正,瓦解敌伪军。利用敌伪军俘虏进行敌伪军工作。对反正的伪军应逐渐改造之。在中国军队政治部下应有敌伪军的工作部门,敌后方地方党应有专负责这一工作的人。

(十)敌后方区党委,省委应有军委。非战区省委,应有联络部,专门进行军队中上层的活动。

第七节 党在政府中的工作

(一)中国抗日政府的特点:

(甲)是抗日的政府,在抗战中正在改造与进步。

(乙)政府的质量是极不一致的,但除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政府外,大多数还是官僚主义的,同民众对立的机关。

(丙)政府的系统也很多。内部包含很多争权夺利的派别斗争。

(丁)政府历来受军队支配。

(戊)政府与国民党党部的结合。

(二)我们在政府中工作的总方针:

(甲)推动政府的进步与改造,使之真正成为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政府。

(乙)建立一些模范的地方政府,以推动全国政府的进步。

(三)党在目前不参加国民政府,但在与国防有关的部门,在国民党要求而且确能起某些作用时,可派人参加。

(四)党在民意机关中,如国民参政会,应积极参加,运用这种机关,以达到坚持抗战,争取民主政治与改善民生的目的,并使之转变成为真正民意的机关。

(五)在地方政府,首先在敌后方与战区,如有可能,共产党员应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进去工作,不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只有在个别党员有决定意义的政府内,则可公开该党员的名字,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六)在八路军新四军收复的以及到达的地区,应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合法的地位,大批委派进步县长,行政专员,政治主任等,张开一个很广泛的合法的行政机关的网。愈大愈好(取得合法权的重要意义)。

(七)在取得合法权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即应努力于政府工作的深入。组织行政委员会,行政会议,地方参政会,以及村区长以至县长的民选。民选的工作不能普遍的一次进行,而应以工作的开展的程度来决定。在没有工作基础的地区的委派与指定,常常比不成熟的民选更为民主。政府应即颁布各种布告法令,施行善政。

(八)在敌后方与战区的友党友军统治的地区,则应积极参加他们的总动员委员会或战地动员委员会,使之成为半政权的,半民意的机关,并经过它们以改造旧政权。

(九)在敌后方与战区,不要放松经过国民党中开明分子取得地方政权中的位置的一切机会。

(十)共产党员在地方政府中的目的:

(甲)坚持抗战,镇压汉奸,同破坏分子做斗争。(乙)组织、武装民众参战,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丙)改造政府成为抗日民主的廉洁的政府。(丁)反对贪污,减租减息,改善民生。(戊)调解内部纠纷,主张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十一)地方党对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应:

(甲)经常给他以具体的实际的可能办到的指示,反对不切实的空头指示。

(乙)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使他能坚持下去,不是给他造成更多的困难。

(丙)帮助他取得民心。

(丁)防止他官僚腐化的倾向,经常给以可能的党的教育。

(戊)保守秘密,只同个别负责同志接洽。在政府中暂时不组织党团。

(十二)党应熟知政府的一切命令、法令、各种条例,培养一批能“做官”的人才。

(十三)八路军应做出尊重地方政权的模范,同地方政府很好的合作。

(十四)政府应帮助民众团体,扶植民众团体,但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

(十五)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应尊重国民党的形式。

(十六)党内在政权问题上的不正确倾向:

(甲)不了解政权的重要性,轻视政权。

(乙)不会使用政权的合法力量,历来在野的“被压迫阶级”的情绪与工作方法。

(丙)对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过分要求与错误的领导。

第八节 党在群众中的工作

(一)目前群众运动的状况:

(甲)群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敌后方、战区是群众运动最先进的地区,我后方是最落后的地区。

(乙)国民党需要群众,发展了群众运动,建立了许多机关。但又怕群众,对群众运动实行统制政策,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丙)群众运动的发展与统一战线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着的。

(丁)群众不但要求抗日,而且要求改善自己的地位,但大多数群众还是无组织的。

(戊)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的大,及其组织力量的薄弱。

(己)群众组织以多种多样的地方性为普遍。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群众组织。

(二)我们的任务:组织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公开合法的、独立的群众团体。秘密的赤色工会,赤色农会在反动时期不需要,今天更不需要。

(三)但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故群众运动中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亦不应相同。大别之可分为两类:

(甲)在敌后方与战区;(乙)在我后方。

(四)在敌后方与战区,我们群众工作的方针,应该是:

(甲)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党,以及各种总动会,地动会等,大量的组织公开的、合法的群众团体,如工救、农救、青救等,及半武装的群众组织(如自卫队、少先队),特别是农救,自卫队,少先队,应该在乡村中起决定的作用。

(乙)这些群众团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系统,自己的工作,使参加的群众认为这个团体是他们自己的,不同政府对立,但有监督政权,推动政权的作用。

(丙)这些群众团体的工作是:(A)参战动员,(B)民主生活,(C)民生改善与文化教育的工作。

(丁)在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占优势,因而还不能组织这类团体的地方,则应采取过渡的办法,组织过渡的团体,以达到上述的任务。

(五)在国民党统治强的我后方,我们的方针应该是:

(甲)经过上层统一战线,组织下层群众。

(乙)参加到国民党合法的群众组织中去,诚恳的帮助国民党人,使他们的空团体变为真正有群众的团体,不同他们争地位与领

导权,而能真正进行群众工作。

(丙)运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可能,各种空子(如国民党统治弱的地方),自动组织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首先应注意于地方的,局部的统战团体(如战地服务团),特别带有桥梁作用的青年革命团体及各种训练班。

(丁)在国民党区已有历史的,有群众的革命团体,在被禁止时,不要慌张,仍应继续活动,并用公开合法、仁至义尽的方法,力争公开存在。但在有利条件下或万不得已时,亦可改变名称。在一定有利条件下,可同国民党的同类团体合并,而且在政治上我们应始终主张统一。

(戊)这些群众团体,都不是同政府对立,而是拥护政府抗战,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统一。即在斗争时,亦要站在此立场上。

(六)在争取民主与改善民生中应注意:

(甲)始终站在抗日救国上,而且要在实际的参战动员中去获得民主与民生的改善。

(乙)采取公开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向政府请愿,上诉等),拥护政府的抗日法令,并要求其实现。

(丙)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丁)重视协商、仲裁、调解的作用。

(戊)不要提出过高口号,以取得可能的改良为主(如文化教育,防空设备等)。

(己)不要为汉奸托派所利用。

(七)开展民运工作中的几个要点:

(甲)充分使用合法公开。

(乙)从地方的、局部的、到全国性的。

(丙)由上而下,经过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教育服务团体之类去组织下层基本群众。

(丁)经过抗日救国,参战动员,到民主民生的争取。

(戊)在局面已经打开的地方,应大胆的放手的去组织基本民众,武装他们,以充实统一战线,以推动与监督上层。

(己)群众工作中民主主义的工作作风。——以民主主义教育群众。

(A)共同商讨,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大家平等,不分彼此。

(B)在群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不要突出,不要包办命令一切。即共产党员占优势的地方,仍然要谦逊和气。

(C)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不在口头上。我们应采取无党派的形式,党派性的内容。

(八)对非党群众领袖的态度:

(甲)尊重他们的独立性与人格。(乙)经常的、亲切的、同志的教育工作。(丙)发动他们的自动性、积极性。

(九)中央与地方党应依照情况的需要,组织民运部或职工部、农民部,研究各种民运的经验,负责某种民运的工作,培养必要的民运干部(能接近群众的、能埋头苦干的)。

(十)地方党应统一关于当地民运的领导,群众团体的党团应直属地方党。上级群众团体的党团与下级党团,不能发生直接的指导关系。

关于各种民运工作,因材料搜集不够,不讲了。青年的,有陈云同志的专门报告,故只讲一点。

(十一)关于青年运动:

(甲)党取消共产青年团是正确的,在取消共产青年团后,青年工作有成绩(客观的形势与主观的努力)。党对青年运动是注意了,但还是不够的。国民党区虽没有青委,但却有青年工作。

(乙)今后要不要恢复共产青年团,经过它去领导全国青运呢?回答:不要。青年的骨干是在青年中工作的共产党员。

(丙)以后要什么?要统一的、青年的全国组织(民族解放的)。

(丁)如何达到此目的?(A)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求得

合作。(B)发展、扩大、巩固现在各地的统一战线的青年组织(比较先进的,但不是共产主义青年的)。(C)继续用各种各样的名称在各地组织青年团体。(D)实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团体内部一定的联络的通讯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目的是在统一内部。(E)加强党的青委工作,统一党对全国青运的领导。

第九节 关于少数民族中的工作

(一)少数民族的重要作用,特别在西北。日本正在挑拨汉族与蒙、回民的斗争,反对中国,破坏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对蒙、回民等少数民族没有一定的方针(抗战建国纲领上,没有一条说到)。而它过去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造成了民族间很深的仇恨。

(二)我们的方针: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

(三)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意见:

(甲)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不要乱把汉奸帽子戴在他们(如五马)头上。

(乙)多找少数民族中的开明的知识分子,给以教育,使之成为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

(丙)尊重少数民族的一切思想习惯,宗教道德,并发扬他们过去优良的传统。在各方面认真的帮助少数民族的进步。

(丁)对他们的内奸(蒙奸、回奸),我们方面(即汉族方面)应采取争取政策,真正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而动员少数民族,在自己内部造成坚决反对投降日寇奸徒的阴谋。

(戊)反对大汉族主义,改善国民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政府的关系。

(己)在有利条件下,对于公开投敌的少数民族的武装叛乱,应

以武力消灭之。

(四)建议国民政府成立回蒙民的专门工作机关,加强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注意,统一对少数民族的领导。在这类机关中我们可以参加工作。在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方政府中,应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组织少数民族部(给少数民族以自治权)。

(五)党中央应组织少数民族委员会,专门注意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研究与总结工作经验,培养与团结少数民族的干部。现在在这方面虽有点工作,但一般的还是自发的,缺乏足够的领导。

第二部分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第十节 巩固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

(一)统一战线愈扩大、发展,则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愈多、愈复杂,在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工作愈为重要。但巩固党不是为着狭窄的党的利益,或工人阶级的行会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统一战线的利益,也是为着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统一战线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性的。

(二)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的倾向。什么是党的独立性?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战略策略的坚持,不掩盖为共产主义的最后目的而奋斗的面目。对于一切其他党派的批评自由。组织上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

(三)在抗战中放弃独立性的投降倾向。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现在正在用一切方法影响共产党员(如思想上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物质上的——金钱、地位、美女等),使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一派,融化在国民党中央,成为它的尾巴。这种影响反映到党内,成为投降主义的倾向。这表现在:忽视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忽视党的巩固与发展,及自己力量的壮大。迁就友党,放弃自己立

场。某些分子的动摇、腐化、逃跑等例子。党在这方面曾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得到了很大成绩。但危险仍然存在,党必须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四)但党必须同空喊“党的独立性”,“党的原则立场”,而不会认真的、切实的进行统一战线的艰苦工作的关门主义做斗争。这种关门主义妨碍着我们为统一战线而斗争,因此也就妨碍着我党的巩固与发展。

这种关门主义在目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甲)不懂得怎样具体的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民族的特点,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解决实际中极复杂的问题,用各种迂回曲折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满足于千篇一律的公式主义与教条主义。

(乙)不懂得把各种各样程度极不相同的群众、集团与阶层,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组织他们到统一战线中来。而满足于空洞的号召与抽象的宣传,把领导先锋队、领导党组织的方法去领导群众。

(丙)不肯以艰苦的、忍耐的、持久的、不出风头的、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去同国民党诚恳的长期的合作,帮助与推动国民党的进步,消除相互间的成见与仇恨,造成相互间的信任,求得实际的利益,而满足于空谈“争取领导权”,“原则上的尖锐性”,与政治上的风头主义,处处表示出自己的不沉着,急躁,与华而不实。在自己已经取得了领导作用的地方,又表示包办、垄断与不民主。

(丁)不肯在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中进行工作,而醉心于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少数先进分子的群众团体。

(戊)不肯虚心的(低首下气的)去研究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实际经验,去向群众学习,而自高自大,自命不凡。

(己)气量狭小,盛气凌人,不通人情世故,不懂待人接物之道。

(五)只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使:

(甲)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and 党的巩固与发展,成为相互为用的因素,使两者间的一致性真能表现出来。

(乙)免除党内左右倾的摇摆,使党的路线能够正确的执行与取得胜利。

(六)但必须指出:

(甲)党内同右倾向斗争一般的比较容易。因为:(A)在主观方面,党内有长期反右倾的历史,在同志中造成了对右倾的痛恨与畏惧。(B)在客观方面,抗战中的困难与抗战形势的变化,使大资产阶级错误的理论日益破产,它的力量亦日益削弱等。

(乙)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斗争,即特别感觉到困难,因为:

(A)党内关门主义有过长期的历史,没有过坚持的彻底的揭发。反关门主义的斗争,往往为反右倾的斗争所掩盖,并常常使反左倾的同志有受到“右倾”帽子的威胁、(如利用地方形式,即被认为不要国际主义,如利用三民主义,即被认为不要共产主义,如提倡民族化即被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B)革命的空洞的口号与叫喊,本身有迷惑人的力量,压倒人的力量,使人不敢反对。(C)关门主义不要求同志们艰苦持久的实际工作,这为党内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所欢迎。(D)关门主义把什么都简单化,不要求马列主义的深刻的研究与实际经验的苦思,因此也为幼稚的党员所欢迎。(E)客观的原因:过去国共长期的对立,持久战与国民党进步的迟缓,党内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农民成分的存在。

因此,同左的关门主义也必须坚持斗争到底。这个,特别要求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有更多的努力。

(七)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使同志们能够把:“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的坚定性与实际工作中策略上的灵活性”,

“抽象的马列主义的原则与具体的实际工作经验”，“不动摇的立场与临机应变的机智”，“同群众在一起，而又能领导群众前进”，这些相反而又相成的道理联结起来，统一起来。只有这样做，才算尽了有效的反倾向斗争，真能使党的政治水平不断提高，使党不断进步。

(八)两条战线斗争中，应该纠正下列错误：

(甲)要实事求是，不要神经过敏，太多“原则性”。对某种错误不要引申、推测、发展，制造倾向。不要把个别同志一地一时的错误思想，冠以左倾右倾的帽子。在斗争中要坚持，但不要急性病，不要张惶失措。一种思想上的某种夸大与不及，在思想过程中是任何人也免不了的。只有在当许多错误的思想中贯穿了一定的思想方向，不肯随时纠正时，才成为倾向。

(乙)不断改正自己思想上的某些错误，或帮助同志们改正错误，这是党内普通的教育工作，并非什么“思想斗争”。纠正倾向，可以在很少同志的和平的谈话中讨论中解决，用不到什么“斗争”（斗争在我党内，成为公开在党内批评同志的错误，并给以“打击”之语）。公开在全党内斗争，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行，如反张国焘主义的斗争之类。

(丙)党内领导同志千万注意，不要随便给下级同志们以“倾向”的大帽子，以吓倒同志，而真能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估计同志们某些思想的来源，给以克服，使之心悦诚服。

(丁)要使同志们不怕发表自己的意见，而真能帮助他们在思想上的开展与进步，使他们真正能够灵活的懂得党的路线与策略，并学会自己去灵活运用，这是巩固与发展党的基本条件。

(戊)但这一切，决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需条件。

第十一节 干部问题

(一)什么是干部——在党的各方面工作中担负着一定的负责

任务的党员。

(二)干部的需要——各方面需要干部。党、政、军、民方面,上级、中级、下级的干部均要。干部的决定作用。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干部,即能起它的作用。干部的极端缺乏——各方面要,无法应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但在斗争中产生了并正产生着无数新的干部。要很好的解决干部问题,必须有正确的干部政策。

(三)什么是正确的干部政策呢?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六个条件:

(甲)认识与熟习自己的干部。认识干部的几个要点:

(A)要善于在各方面发现干部。(B)不要表面的认识干部(一时的“功过”),而要求比较本质的认识干部。(C)不从狭窄的观点出发(如个人的好恶,“思想简单”,“无背景”等)来认识干部。(D)不但要看到干部的弱点,而且要看到他的优点,不要夸张其一面。(E)应从发展中来认识干部,历史主义的考察干部的方法。

但如何保证熟习干部呢?(A)党的负责人与负责机关,对于干部的经常的接触与考察。(B)把管理干部的工作,放在党的立场坚定的、可靠的、大公无私的、有忍耐性的同志手里,而且保证不经常调动他们的工作。

关于旧干部与新干部的认识的重要。双方优点与弱点的指出。

(乙)必须正确的提拔干部:

提拔干部的两个条件;(A)政治立场的坚定,不是投机家,不是空头革命家(有“德”)。(B)工作的能力(有“才”)。

提拔干部是党的经常工作,不是偶然的(一时提拔,一时又打下),一时的冲动。提拔干部应该是有组织的,经过一定过程的。同时,要大批的提拔,大胆的提拔。应该慎重的处理干部的升级或降级问题。关于新旧干部的提拔问题。

(丙)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及大胆的使用干部。

“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应当利用现在所能利用的人,改正他们的弱点和缺点。”现在是我们用人的时候,多方面要人的时候。必须放手的使用干部们的每一长处,发扬他们的优点,逐渐在工作中改正他们的弱点与缺点。

怕用人,对什么人都不放心(“思想复杂”,“背景复杂”),那可以“百事无成”。我们不要“因噎废食”。在大胆用人中,碰到个别坏分子是不可避免的。

应适当的分配干部以一定的工作。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老干部的适当使用;老实的、“吊儿浪当”的、“油滑的”,“活动的”干部的适当使用。

(丁)正确的分配干部与干部的调节。干部应该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不要平均分配。每个地方要采取使干部地方化的方针。

(戊)有系统的培养干部,帮助干部,发扬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与活跃性。

仔细的指导他们,用同志的态度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的缺点错误。信任他们,要他们大胆的去工作,不要处处干涉,天天干涉,时时“斗争”,不要戴高帽子,什么都提到“原则高点”。对干部的政治生命,及处罚必须极端慎重。我们要有“敢说话敢做事”的干部,“肯负责,不怕负责”的干部。这种干部也最容易进步。

(己)保存干部与关心干部。经常注意干部的生活、身体、家庭及安全,尤其要经常注意他们在思想上的进步。

(四)我们需要干部的基本标准:

(甲)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忠实于中国工人阶级事业,而且已经在实际上证明了的。

(乙)同群众有联系的,为群众所公认与信任的领袖。

(丙)在复杂环境中,能独立决定方向,并不怕负责的人。

(丁)遵守纪律的精神,在斗争中受过布尔什维主义锻炼的。

我们不希望所有我们的干部，都合乎这样标准，然而这是我们挑选干部与培养干部的标准。

干部的模范作用的重要。对各种干部的要求不同。对高级的、中级的、下级的干部的要求不同。对干部与普通党员的要求也不同。

(五)要造成无数有威望的、有名声的干部及其重要性。党在各方面，工人、妇女、青年、文化方面都要有这样的干部。党应该挑选出这类干部，把他们提升起来，公开起来，但不要替他们吹牛，夸大他们的长处，掩盖他们的错误。这对于新提升的干部，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党应该爱护这类已有威望、有名声的干部，不要任意糟蹋。这些干部，也许在能力上不完全像我们所希望的，但他能够有威望、有名声，不是没有原因的。

(六)要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

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真正精通的马列主义者，中国革命问题可以说解决了一半。所以必须用一切方法使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在学校中学习马列主义。组织干部的学习小组——列宁主义小组之类。任何干部均应以“不知为不知”，放下自己的架子，老老实实的来学习。在中国现在有很好的学习的条件，不必一定到苏联去“留学”。

第十二节 关于宣传教育工作

(一)宣传方针：

(甲)应该利用一切具体事实，宣传抗战中民族英雄们与烈士们的伟大事业，发扬为民族、为国家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指出抗战中的困难，及其必然胜利的前途，以造成民族自信心，克服困难的顽强性，以击破民族失败主义。

应该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

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的心理。

(乙)应该不断破坏敌人、汉奸、托派,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与破坏作用,反复说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暴露敌人的凶恶残暴兽行的具体事实,暴露国内的一切黑暗面。

(丙)诚心诚意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三民主义,发展其积极方面,使之在抗战建国中有进一步的发展。拿住这个武器去同各种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思想做斗争,打击托派分子、顽固分子对于三民主义的曲解。要在实际上证明马列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是能够帮助三民主义的实现的。

(丁)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认真批判各种不正确的思想。

(戊)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宣传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优秀分子的党,它继承着中华民族革命的传统,负担着解放民族与人民的历史使命,以最后打破共产党是外国搬来的不适合于“国情”的恶意宣传。

(己)应注意于对外的宣传,争取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

(庚)在宣传的方法上应多注意于:

(A)向全中国人民说话。(B)使我们的话为大众所了解。(C)多采取谦逊的、商讨的、和平的、合于中国民族习性的形式。(D)不要太抽堡、太刻板、太偏激,而要生动、活泼、具体,带有充分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关于党校教育:

(甲)教育方针:

(A)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B)依照程度,由浅入深,由近(中国)到远(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不要贪多,不要好高骛远,多采讨论方式。

(乙)教育计划的拟定:

(A)新党员训练班——流动训练班,临时训练班(个别工作的需要)。一个星期至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功课一般可有:统一战线,党员须知,军事常识等。(B)普通党校——做过支部或区委工作的同志。一个月至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功课一般可有:统一战线,党的工作,军事训练等。

以上应由各地方党部、县委、省委、或分区委自己办理。

(C)中级党校——区委、县委工作人员。一个月至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功课一般可有:社会科学常识、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军事常识等,由省委、区党委、中央局、中央办理。(D)专门人才训练班——县政、游击、财政、公安局等干部的训练。由省委、区党委、中央局、中央办理。(E)高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由县委以上的特殊人才组织之。功课一般可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由中央直接办理。(F)马列研究院——无定期,理论干部与教员的培养。(G)统一战线的学校。

(子)普通军政学校(随营学校,教导队,训练班)。吸收普通革命青年。一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各军队、各根据地均办。功课一般可有:社会科学常识,统一战线,军事常识等。

(丑)抗日军政大学。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可分政治工作系,军事系,及较高干部的培养。在中央所在地办。

(丙)中央与各中央局宣传部的责任:供给各地教员、教材、教育计划、研究讨论大纲。

(丁)各地方党应负责供给高级党校及马列研究院以需要的学生。而中央、中央局方面则一般保证送来学生“送回原籍”。

(戊)理论干部的培养与理论人才的搜集。搜集理论人才,文化方面的名人与名教授。搜集文化程度很高,有发展前途的党员加以培养。搜集精通中国旧学的学者(老先生在内)。

第十三节 关于领导问题

(一)中央与地方党的关系。

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战争的环境,再参考过去工作的经验,中央与地方党的关系,应确定如下的原则:

(甲)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

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对于中央有不同意见时,应直接向中央提出,不得向下面宣传或传达。地方党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铁的纪律。

(乙)但中央对于地方党的指示,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的变动,而带有弹性与伸缩性,给地方党以机动的余地。中央应更多注意于全国的政治问题与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把握(掌舵),研究与总结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工作经验与教训,给地方党以帮助,对地方党的错误以及时的纠正。

(丙)中央应注意于培养地方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与勇气,使他们对党的坚定性与临机应变适当的配合起来。对地方党的错误,多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对地方党内部的问题,没有必要时,均由他们自己解决。

(丁)地方党应养成服从中央,尊重中央与信任中央的领导的优良传统。要善于在中央的统一方针下,拟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工作任务与工作计划,主动的、负责的、勇敢的在当地实现中央的

方针。不要事事依赖中央，而要自动的创造出更多的具体办法来实现中央的方针。要反对清谈主义与公式主义的倾向。

(二)在新的情况下，党的领导系统：

(甲)在全国组织几个中央局，如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等，由中央直接指导，并代表中央直接指导各地方党。

(乙)在敌后方，改变省委的组织为区党委(如冀察晋区党委、冀晋豫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等)。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可组织“点线委员会”。

(丙)中央局直接领导几个区党委或省委，在区党委，省委下为地委，中心县委，或县委，分区委，支部。支部应以编村或联保组成之。

(丁)中央应有各种地方工作委员会，研究与注意各中央局及其所属党部的工作，并经常向中央提出意见，经过中央给各中央局以经常的指示与帮助。

(戊)每一地方的一切党、政、军、民的工作的领导，均统一于当地最高党部，以提高党的威信，在各方面工作的同志中，造成党为一切工作的唯一领导者的信念，各种党团均属当地的最高党部，无自己的领导系统(如过去的铁路党团)。

(三)上级党部对下级党部的领导方法：

(甲)上级党部(中央、中央局、区党委、省委)，为了了解与反映下级党部的具体情况，以便利于给它以具体的指示，应有若干巡视员。巡视员的任务，一般的传达中央[上级]意见，考察地方党工作情况，提交中央[上级]。他们对地方党提出自己的意见时，只能作为建议，没有决定权。只有在上级党部特别委托时，才有此权力。

(乙)上级党部应定期的召集地方党负责同志来讨论各地工作。在情形允许时，应经常召集各地方党委书记或部长的联席会议，检阅工作与总结工作的经验，以推动工作的发展。下级党有责任经常把工作情况报告上级。会议不在多，而在确能解决下级党

部所发生的问题。会议相隔时间可长些,但每次开会时间也以长些使有结果为有利。

(丙)经常检阅工作执行的程度,是推动工作前进,保障任务完成的最主要的办法。这种检阅,首先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干部,考察干部,其次,就是正确认识执行机关的优点与缺点,第三,就是考验党的决定或工作计划本身的正确性与不正确性(斯大林)。

(丁)在检阅工作之后上级党部对下级党部工作的指示,要具体扼要、简单、明了,切忌长篇大论,不得要领。

(戊)领导机关的集体领导,并不妨碍一定时期内某些同志的分散行动。但在目前新党员多,干部缺乏的情况之下,领导机关的同志应更多注意于干部的教育工作(如多办各种训练班,各种会议的准备等)。

(己)党委的工作计划,应该非常简单,只定出一定时间内确能实现的具体任务。要有中心,——从中心发展到其他。要有一定的步骤。这是工作中的一种“节奏”。

(四)党章的修改的必要。中央应负责起草新党章,在“七大”上通过。

第十四节 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一)抗战以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全国发生了基本的变动。这表现在:(甲)抗日救国成为合法的了。(乙)共产党求得了基本的合法的地位。(丙)合法的范围扩大,秘密工作的范围缩小了。

(二)不同地区,不同的公开与秘密的联系。

(甲)在日寇占领区内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不但党秘密,抗日救国也是秘密的。在那里的党要紧缩,但可以组织比较广泛些的救国团体(同反动时期不同)。那里,应看到利用合法,及打入汉

奸组织中去的重要。

(乙)在陕甘宁边区不但抗日救国公开,党主要也是公开的。但某些地区,如边区周围的邻近地区,精干的秘密党的组织仍然重要。

(丙)在八路军活动的敌后方及其占优势的根据地,抗日救国的活动一律公开,八路军军政人员一律公开,党的个别负责同志与机关公开外,一般党的组织与党员仍有秘密的必要:(甲)不使党过分的突出,吓退友党、友军、友邦。(乙)准备形势不利时的退却。

(三)在大后方的公开与秘密工作。

大后方的情况:

(甲)抗日救国工作可以公开做;有一小部分中央负责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可公开活动,公开设立机关与办事处;公开或半公开的出版机关报;

(乙)但在民运中,他们的军队中,政府中,一般党员如果暴露了自己是党员时,则立刻会受到打击与限制;

(丙)国民党中有开明的,也有顽固的。

(四)在大后方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应实行下列几个规定:

(甲)共产党员仍用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或普通群众的面目参加一切公开的活动,不暴露自己是党员及党的组织。要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去进行持久的工作,多推动非党的进步分子及国民党的积极分子来带领工作,特别在党员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组织内注意不暴露自己。

(乙)争取党的某些领导者与机关的公开,在扩大党的影响上,推动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党员(如国民参政员),应大胆的进行公开的活动。

(丙)应该使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划分清楚,使公开的同志与机关同秘密的同志与机关划分清楚,同时保持正确的联系。

这必须:(A)在公开组织中已经取得一定领导地位的党员,不要同时担任党的秘密工作,而且党应想出特别办法,使之不暴露自己,如不编入支部,及同个别负责同志发生关系等。(B)做党的秘密工作的负责同志,一般的应保持他们的秘密,埋藏在普通的群众中间,不担任负责的公开工作。

(丁)绝对禁止将党内的秘密消息与决定等告诉同本消息本决定等无关的同志。禁止同志间发生不必要的关系(如通讯等)。

(戊)党的绝对秘密的指示,均用口头传达,不用油印或复写。党的文件的写法,应该准备即使失去也不要紧。任何时候不应在党的文件上刊物上发表党员的数目字,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团体等。

(五)在公开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上,应该纠正一种以为现在党不必再注意秘密工作的错误观点。教育同志们严格注意秘密工作规定。但必须教育同志们了解,现在的秘密工作同过去的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今天主要的工作方式,是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救国的活动,今天必须坚决打破过去地下党时代的那种狭窄的秘密活动方式,特别在敌后方与战区。

(六)当全党同志愈是深入到群众运动中去,愈是能够团结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愈是能够同群众打成一片(说群众话,过群众一样的生活、同群众密切联系着),则党的秘密愈是容易保持。所以在保持党的秘密方面,特别应强调这一积极的方面。

第十五节 关于发展党员

(一)有计划的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使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二)发展党的大小、快慢,应依照各种不同的地区来决定。如:

(甲)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机关应大些。

(乙)我后方应短小精干些。发展速度慢些,质要高,机关应紧缩些。过去“平均发展”及“发展一倍党员”的口号的错误。

(三)发展的巩固与巩固发展的原则:

(甲)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

(乙)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一时期的清理,整顿与巩固(消化),然后再发展。

(四)保证全党内工人、雇农、手工业者、劳动农民占优势。但许多地方党在开始时,多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不是坏倾向,而正是一般的规律。党一般的要经过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五)发展党员中的两种倾向——关门主义与拉夫主义必须纠正。

(六)从上而下的建立党,与从下而上建立党,大机关与小机关,均依情况来决定。

(七)党员的教育与党的生活,应不断在斗争中,特别在困难的情况下,考验他们,锻炼他们。

(八)关于青年党员与妇女党员。在支部中为了工作便利组织青年小组与妇女小组是可以允许的。这种小组可分别由支委青年干事或妇女干事管理。

(九)关于特别党员。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

(十)关于恢复失联络的党员与重新入党的问题,应具体的考察。

(十一)应防止敌探奸细混入党内,应经常的洗刷坏分子出党。

第十六节 提高党的警觉性

(一)提高警觉性的必要:

(甲)敌人的挑拨离间,派遣奸细的阴谋诡计(如派遣托派分子

混入党内)。

(乙)顽固分子派遣奸细混入党内。

(二)敌探奸细在党内的活动方法:

(甲)挑拨离间,(乙)两面派的手段,(丙)威迫利诱。

(三)统一战线的阴暗方面,表现在我们同志的某种程度的麻木不仁,以及个别环节的腐化与蜕化。

(四)如何提高警觉性?

(甲)经常用具体事实揭露敌人友党的阴谋诡计,以教育同志。

(乙)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丙)经常检查工作与工作的机关。(丁)经常审查干部。(戊)同各种倾向与两面派及挑拨离间的活动作斗争。

第十七节 发展党内民主与巩固铁的纪律

(一)新的情况与任务:

(甲)公开合法的扩大——这要求发展民主。

(乙)战争的紧张环境,敌人与友党的危害——这要求巩固铁的纪律。

(二)在不同地区,发展民主的程度是不相同的。

(甲)在敌后方、战区、边区、我后方等,发展民主的程度不应相同。

(乙)在秘密工作条件与战斗情况允许下,应大胆的发展党内民主。

(三)发展党内民主问题:

(甲)召集必要的经常的会议,大会,集体讨论,共同决定问题,交换意见与总结经验,报告工作等。

(乙)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选举,及定期的改选。

(丙)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下级可越级控告。

(丁)上级对下级多采用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

(四)发展党内民主的好处:

(甲)便于动员党员同志执行党的任务;(乙)便于给党员

同志以党的教育；(丙)更能巩固党的团结一致；(丁)便于于交换经验，总结经验；(戊)更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

(五)但在特殊情况下，为迅速解决问题与保证党的领导起见，党仍不放弃：

(甲)采取上级指定下级，命令下级的方法；(乙)给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以全权解决一定问题的办法；(丙)但只要情况允许，就应发展民主。

(六)培养遵守纪律的习惯——纪律的重要特别在战争中，秘密工作中。纪律的内容即是：

(甲)少数服从多数；(乙)下级服从上级；(丙)个人服从团体；(丁)全党服从中央。

即使某一同志不同意时，也得服从。但他可向上级一定机关申诉与报告。

(七)反对党内压制民主，压制自我批评的倾向。但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破坏纪律(不受调动，讨价还价，破坏党的决定，自由批评上级等)，及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第十八节 关于全党的团结

(一)团结的重要。敌人的阴谋诡计，是在破坏我党的团结。上级的团结与下级的团结，与上下级间的团结的重要。特别是中央内部团结，有决定的作用。

(二)团结的基本条件：

(甲)一致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乙)工作中的原则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反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丙)服从组织决定，服从党规党法，遵守党纪。(丁)发展党内民主，发扬自我批评。(戊)养成同志间互相尊重(尊重主要领导者的意见)、信任、友爱，共生死共患难的精神。(己)谦逊和气的的工作态度。(庚)经常同破坏党内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做斗争(如挑拨离间，

两面派的行动)。

(三)我们的党是团结的,但必须巩固此团结。因为造成不团结的客观与主观的条件,仍然存在着。这些条件如下:

(甲)目前正在抗战的困难的转变关头。(乙)地区的分割,独立自主的分割领导的不可避免。(丙)中共领导人一言一动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的广大。(丁)敌人的挑拨离间与破坏的活动。(戊)党内新党员新干部及小资产阶级出身分子的众多,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存在。(己)过去关于这方面的教育不够。

因此,巩固党内团结,仍为全党的严重任务。

(四)但是只要我们大家努力,特别是到会的同志大家努力,这些困难是容易克服的。这里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就是:

(甲)有一大批党的中心干部。(乙)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丙)中央有正确的路线与策略。(丁)全党同志均要求巩固团结。

因此,任务是严重的,但是能够完成的。

第十九节 结 论

(一)总之,中国革命要有强大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有强大的党。

(二)如何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如何使党成为强大的党,概括起来,必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甲)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

(乙)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

(丙)前进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丁)大众的民主主义的作风。

(三)如何实现这四个条件?

(甲)学习与掌握马列主义。

(乙)以马、恩、列、斯的人格与工作作风为模范。

(丙)在斗争中向群众学习。

这样,中国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 致各国共产党电

(1938年11月5日)

我们中华民族坚决进行反对日寇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十六个月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这个自卫战争的最前线,它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它是民族团结的坚决的拥护者,它的全体党员与在他们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正在与日本法西斯军阀英勇的血战着。

日本法西斯军阀侵占我国的领土,掠夺我们的财富,残害我们的同胞,焚毁我平民庐舍和文化机关,轰炸我不设防的城市,屠杀我非战斗的男女老幼,大规模的奸淫掳掠,这是世界上自有文化以来的最野蛮的兽行。

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并且也是日本工农劳苦群众的死敌,同时又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全世界人类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在法西斯战争的威胁下。日本法西斯强盗正在中国猖獗着;德、意法西斯蹂躏西班牙已两年有余;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1],瓜分了捷克;德、日、意法西斯正预备把全人类卷入战争的旋涡中去。中国人民反日寇侵略的自卫战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之独立与自由,同时也是保卫全人类的和平与正义。

抗战以来,我们已经得到广大国际人士与各国兄弟党的同情与援助,这曾给了我们全民族抗战不少的兴奋与帮助,但是,我们的斗争是长期艰苦的事业,日本帝国主义至今尚未遭受国际有力

的反对与制裁，相反地，日寇还能在列强各国中自由的购买军火、原料与资财，这无异助长了日本强盗的凶恶行动，因此我们竭诚地向我们亲爱的兄弟党呼吁：

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督促你们的政府迅速执行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切有效的制裁；要求你们的政府，停止一切军火、物质、资财的对日输出；劝告你们的同胞，不用一切日货；组织一切海员及运输工人拒绝装卸运输对日输入输出的一切货物；号召你们的同胞，尽可能的给我们物质、资财、医药及其他一切的帮助。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一致认为：中国人民在持久战中，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的条件下，在国际无产阶级及先进人类的援助下，是一定能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

此致

布尔塞维克敬礼！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

十一月五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解放》
第三卷第五十七期刊印

注 释

[1]今译奥地利。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致 日本共产党电

(1938年11月5日)

日本法西斯军阀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陆续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四省,去年更大规模地向我全国进攻。它的铁蹄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毁灭文明,违反人道,为人类历史上向所未见。不仅中国人民痛恨万分,奋起抗战,就是全世界进步的人士也莫不愤怒之至,而对我表示极大的同情。

为着进行野蛮的对华侵略战争,日本法西斯军阀加重了对于日本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数十万的日本官兵已经被牺牲在战场了,后方民众生活愈困难了,民主权利被剥夺了,广大反战反法西斯蒂的劳苦群众、著名的学者、青年学生逮捕入狱了,日本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侵华战争是违背整个日本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日本法西斯军阀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仇人。中日两国人民必须联合一致,结成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阵线,打倒这个共同的仇敌。你们曾经开展了英勇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协力奋斗去反对共同的仇敌——日本法西斯军阀,一定能够打倒这些法西斯军阀,树立东亚的真正的和平,解放中日两国人民,并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正共存共荣。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并没有相互的仇恨而只有相互的同情,应该极大的发展这种同情,为打倒共同的仇敌日本

法西斯军阀而奋斗到底。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

十一月五日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扩大的六中 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决议

(1938年11月6日通过)

(一)扩大的六中全会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召集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华民族进行长期持久的民族自卫战争,争取对日抗战最后胜利,以谋中国独立自由解放的神圣事业上,对于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团结国共长期合作的事业上,对于党的工作更加进步与发展上,均有严重的历史意义。因此,六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关于召集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

(二)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讨论和规定在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动员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团结起来,克服当前的困难,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大会要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与团结成为全民族团结的模范,它的一切工作要实事求是的解答今天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一切主要问题。

(三)扩大的六中全会向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如下的主要议事日程:

(1)团结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争取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

(2)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

(3)在新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

(4)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四)具体的加紧完成准备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之。

(五)各地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依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和各地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性分配之。代表的产出,除了某些因环境关系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区外,须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

(六)各地代表由各地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选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由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在特殊条件下,不能召集上述代表会议时,由各地中央局或军队的政治部按照实际情况酌定办法。

(七)地方党部的选举方法由各地最高党部决定。

(八)各地党部应迅即向全党党员解释七次大会的重大意义,动员全党在坚决执行六中全会决议的实际行动中,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保证大会的成功。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通过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扩大的六中 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 和国共两党同志书

(1938年11月6日)

我中华民族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十六个月了。在伟大的民族抗战中,我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全国上下一致团结起来了,各党各派携手合作了,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坚强的统一了,政府与人民、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渐渐改善了。战争的烽火锻炼着整个民族,惊醒和激怒着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使他们逐渐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正在敌人后方开展着,创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牵制、疲惫与消耗了敌人的力量。这一切,都使得日本法西斯强盗,虽然花费了十六个月的时间,消耗了数十万的兵力,数十万万的经费,终不能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坚决领导抗战的民族领袖蒋委员长致崇高之敬意!并以无限的热忱与慰问之敬意,致之于前线全体抗日将领,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全体抗日战士,全体游击队指战员,中央及各级地方机关的领导者与工作人员,以及领导民众运动的全体爱国志士之前!中国在抗战中所得的成绩是数十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将士们,民众们,致沉痛的吊唁!

在十六个月抗战中,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丧失了许多土地、

城市与铁路，全国人民遭受了很大的灾难。现在武汉失守，广州沦陷，战线已由华北、华中伸展到华南。敌人正在继续进攻，并已扬言将西安、宜昌、衡阳、北海以东地带置于其侵略目标之下。无疑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时期。在这时期中，我国的抗战，将遭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成为我民族解放斗争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

然而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决不因这些困难而对抗战到底的决心稍有动摇。蒋委员长十月三十一日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昭示全国的抗战到底的正确方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特表示全部的赞同与忠诚的拥护。在抗战的目前时期中，我们的困难固然加多，然而我们的力量是在不断的锻炼、进步与增加中。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然而全国上下一致坚持持久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固了。我们忍痛放弃了许多城市与铁路，然而作战行动因为某些点线的放弃而更加主动自由了。日寇与亲日分子利用困难正加紧其破坏我团结引诱我屈服的活动，然而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更加进步与巩固了。全国很多的英勇抗战将士已为国牺牲，然而几百万的军队是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广大的民众受到了日寇骇人听闻的蹂躏，然而民众已经奋起抗战并逐渐组织起来了。日寇占领地区增多，然而敌后的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也随着扩大与巩固了。我们的财政经济更加困难，然而慷慨捐输减薪缩食是更加普遍了。日寇在中国更加前进与深入，然而敌人因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前后受敌将更要疲于奔命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抗战虽存在着许多困难，然而我国却已有了空前的进步。从今以后，全国上下一齐努力，在已有进步基础之上获取更大的进步，就使我伟大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转弱为强，准备我之反攻，以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求得我中国之彻底解放。

全国各界同胞们！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在这转败为胜的枢纽时期，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应负担起重大的责任。我拥有五千年文化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伟大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当提高

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畏难、不怕苦、不悲观。不失望,视日寇为死敌,视汉奸为世仇,与日寇作殊死战,反对一切傀儡政权,誓死奋斗,不屈不挠,上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当游击队去!在生产中的工农提高生产热忱,拥有财产的富人应输财献金,以克服财政经济上之困难,在国外的华侨,应加紧其活动,以增加抗战的外援。在国内的各民族,应加紧团结,以求共同抗日图存。我各界同胞应赶紧组织起来,以增加抗战的力量。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长期抗战,这是战胜日寇最基本的保证。

英勇的前线将士们!你们的英勇牺牲精神,已经引起了全国全世界的赞叹。在这新的抗战形势中,应当更沉着,更英勇,舍小我,顾大局,为国捐躯,视死如归。更应锻炼我抗日军队和游击队,改进政治工作,加紧军事训练,求得军民一致,官兵一体。尤应建立新军,提高军事技术,巩固各军之间的亲密团结。全国所有武装队伍,都应在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下,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进行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与争取主动。抗战军队的巩固与扩大,是进行持久战和战胜日寇的最基本条件。

中国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们!日寇所怕的,更没有比中国人民的团结统一更利害了。当此战局转向新的阶段之际,日寇一定加紧其挑拨离间的阴谋,这就要求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更进一步的亲密团结。我党六中全会再一次的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基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六中全会再一次表明:本党对于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的拥护。并更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所奋斗的共同目标,乃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同时六中全会又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成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主张共产党员用公开的交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一切,都是为着巩固团结,避免误会与磨擦,巩固国共长期合作与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对于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抗战以来，很多的共产党员已经作了壮烈的牺牲，显示了他们应有的作用。扩大的六中全会，谨以同志的热情与无限的哀悼，致之于本党烈士之前！同时全会号召全体同志，继续发扬先烈的光辉，到战争的最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把我们的热血和能力全部贡献给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参加抗战建国事业的各项工作。以真诚恳切的态度对待友党友军，以互助互让互相学习的立场与友党友军发生亲密关系，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以共产党员应有与固有的英勇气概，热烈胸怀，坚定意志，冷静头脑，和艰苦作风去对付一切困难和一切变动，团结全党为一体，去完成我党在抗战建国事业中伟大光荣的任务。

同胞们！战士们！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与团结四万万五千万黄帝子孙的生动力量去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我们坚决相信，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之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民族自卫战争胜利万岁！

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万岁！

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

(1938年11月6日)

同志们！中共六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开了一个多月的会议，现在结束了。这次得到了大的成绩，大的进步。大会中所估计所想的问题，在大会结束时已变成了事实。此次会表示我们已掌握马列主义，以之分析具体的复杂的环境，定出正确的政策与方针。此次大会表示了党的团结与一致。此次会在党史中占重要地位，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定出了工作，将会完成光荣的任务。此次会在中华民族史上亦有重大的意义，推动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

此次会是胜利的完成的！

扩大的六中全会万岁！

英勇奋斗的中共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录自《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1939年

1939年2月14日

中国同志林彪(此地的名字是李进)——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延安军政大学校长。

他带来了中共中央六中全会(1938年11月)的材料。

中共七大预定5月召开。

全会有40人参加(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和政委)。

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军事学员等共有329000人。

每月从政府领取600000元。

需要:钱;武器;干部。

在延安(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任弼时。出席全会:周恩来、博古。

.....

1939年3月23日

书记处会议:关于库西宁为《真理报》写的庆祝共产国际20周年的文章问题。

马努伊尔斯基的攻击:“文章的政治方向不正确。”

败坏库西宁政治威信 of 奇怪尝试。

决定将庆祝共产国际20周年活动问题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准备提纲草案。

库西宁的文章不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

(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五、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 反投降反磨擦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 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

(1940年2月)

(一)听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的时期中在动员人民的力量以反对日本侵略者上做了很大的工作,坚持的 executing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最近在自己队伍底增长上得到了许多成功并成了国内的巨大的政治因素。

(二)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所拟定的对行将召开的七次大会的基本方针。

(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组织胜利的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斗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大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在他们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把这个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联结起来,并且给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在他们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走狗的共同行动中以一切方法的援助。

※ ※ ※ ※

(一)中国共产党,当决定自己在最近的时期内的任务时,首先从如下的(情况)出发:即民族解放战争正经历着一个危急的变动的时机,这时候民族统一战线分裂的危险及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的危险成了基本的直接的危险。这个危险威胁着给中国人民带来以不可胜计的苦难。在目前的条件下,中日战争的结局决定于谁更能在战争中持久。然而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方面来的投降的危险,现在比整个战争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尖锐。

投降危险的这种加强是为国际性和国内性的许多原因所规定的——特别是以几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所规定的。假如欧战前,英法曾是愿意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在某种程度上曾经帮助了中国政府,那么现在,他们日益起来主张迅速的停止在中国的战争。假如以前美国是日本的主要的军火的供给者而同时鼓励中国底抵抗为着削弱交战的双方,那么现在希望着利用欧战所造成的情况,他力图在停止中日战争上起主要的中间人的作用。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想利用中国的富源来为着欧战,以部分的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的代价来吸收日本到英法同盟方面去而促使日本和中国来反对苏联。由于这些原因,英、法、美不管他们之间的矛盾及他们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强着对中国统治当局的压力,为着迅速的停止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亦日益倾向于结束战争。他们对中国的“速战速决容易的胜利”的计策是失算了。战争对于日本一天天地成为更加困难了。战争愈延长则愈加引起国内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困难的剧烈化。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害怕在中国的完全溃败及国内矛盾的爆发,用一切力量企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中国人民的战斗力和使中国的统治当局走进投降的圈套。此外日本的统治阶级想利用欧战以便乘机取利,医治在战争时在中国受到的创伤,巩固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

最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一部分——特别是买办阶层,害怕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底日益高涨,反而想当掠夺中国的日本股份公司的经纪人,捞取欧战中自己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赢

利，而走向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

(二)在中国的统治当局中形成了三个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的拥护者主张，继续战争和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个的拥护者将希望寄托在巨大的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美国的调解上，主张准备妥协，分裂统一战线和取消八路军及边区；第三个的拥护者主张立即停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接受日本提出来的投降条件，和以武力进攻来反对八路军及边区。

现在最大的危险倒不是那些已经为中国人民所揭穿和唾弃了的公开的叛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汪精卫一类，而是那些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这些人，以口头上忠实于三民主义为掩护，而实际上想从内部来把民族解放战争的堡垒让给敌人。这些分子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阴谋反对拥护继续战争的力量。他们有系统的挑拨国民党反对共产党，造成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之间的人为的磨擦和冲突，而这时候，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却正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最亲密的合作和在反对外敌斗争中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这些分子力图取消边区，解散八路军，而这时候，八路军和边区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砥柱之一和最彻底的反对外国奴役者的保证。他们用自己的一切对共产党的污蔑企图挑起内战，分散中国人民的力量，这样来实现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华制华”的毒计。

(三)中国共产党认为：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者所实行的政策将引起的灭亡的结果预先警告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自己的职责。分裂为投降铺设道路。而投降则使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对日的投降的和平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将把中国的被占领的省份和其天然的富源，最主要的铁路，最大的港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种和平就是说：掌握了现在被占领的中国的省区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将逐渐的伸手于那些他们未能以武力夺取的中国领土。这类和平就是说中国人民将变成殖民地的奴隶，以自己的白

骨为日本向印度安南及其他国家继续前进填平道路,中国人民一定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战争的炮灰。

投降派谎言惑众,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起断言:这种和平的结果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和平和康宁。中国人民的基本大众永远不同意把自己交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作奴隶并永远不和投降相调和,不管谁是这个投降的担负者,中国人民极大部分及中国的武装力量将继续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投降派欺骗中国人民企图要中国人民相信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给了许多关于“尊重中国主权”,关于建立中日两国政权之间的“睦邻”关系的虚伪的允诺。将占领区留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中,这一事实的本身在实质上就是创立以后完全奴役中国的决定的条件。

投降派谎言欺人,当他们断言订立和平,他们就给日本的继续侵略建立了障碍并且能够影响日本主人的政策。历史上充满着胜利的暴力者如何对待投降者的例子。当投降派做完了龌龊的事业之后,日本侵略者将把他们抛到垃圾箱里去。他们只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在奴役中国人民的事业上的龌龊工具。

为着达到保证民族的独立存在及中国人民发展的和平,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投降。

(四)由于上述一切,所以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投降的危险是可以克服和消灭的。但是为着克服它,首先就应该明白的看到和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和谁是他的担负者。必须最无情的在广大群众眼前揭露一切反对中国底自由和独立的阴谋家,孤立和从抗日战线中驱逐他们。

必须掀起中国民众来反对投降,依靠于现有的真实的力量,这些力量保证中国人民抵抗的可能和保证中国底胜利。

共产党认为,不管大城市、海口和铁路线的丧失,中国还有着必要的力量来继续反日战争和争取胜利,日本侵略者没有能够消

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中国人民保存着自己的基本武力并且有用之不尽的补充军队的可能。中国至今还支配着广大的领土，可以在军事行动的战场上采取广大的机动。中国人民还远没有把他手中所有的一切物质的富源为着胜利的战争而动员起来。

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是民族解放的祖国的战争，这里除正规军外，在敌后行动着很多的游击队伍。这个困扰日本破坏交通线的游击运动和中国人民方面其他抵抗侵略者的形式结合破坏了日本占有占领区及经济上开发中国的可能。

中国的军队和游击队在自己国内进行战争，受着居民的热烈的同情和援助，而日本军队则在别人的土地上进行战争，引起中国人民对他自己的仇恨，这不能不影响到日本军队的精神（情绪），政治的状况。中国人民方面有着伟大的苏联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帮助。

其次欧战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人民斗争的条件。它吸引了英法美的基本力量离开远东。它唤起了这些国家劳动群众反对战争的运动的生长。它引导到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和宗主国工人运动的高涨。

最后，时间有利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每一个月对于日本带来了困难与纠纷的扩大经济破坏的尖锐化，军队的瓦解，反战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在正确的组织了战争时，战争的每一个月带来了中国人民的阵地底巩固，提供着可能性去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动员广大的群众，教育他们进行战争，加强和扩大游击运动准备和给予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决定的打击。

（五）为着继续抗日战争和争取战争中的胜利，中国人民必须：

第一，政府要有继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决的意志。这就要进行反对投降派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停止用来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的反共运动和阴谋，以儆效尤的处罚内战的挑拨者阎锡山旧军中的日本走狗和其他与卖国贼汪精卫有联

络而行动的人。

第二,必须继续的发展战争——祖国的战争,在这战争中全体人民以一切他们所能使用的方法来反对外国奴役者;正规军行动和最积极的游击运动相配合的战争。

第三,必须有系统的破坏日本的经济上占有沦陷区掠夺其富源运往日本的计划。前线上的军事行动应和反对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中的经济战争配合起来,在这上面在大工业中心(上海、汉口、天津等等)中国工人和劳动者的运动有特别的意义。

第四,必须组织农民群众,使他们拒绝供给日本占领者以粮食和原料,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组织抵制日货;对一切和日本行政合作及帮助日本侵略者的人进行社会的抵制。

第五,必须极端加强中国人民的武装,以最迅速的速度开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为着这个目的而动员国内的一切富源。

第六,为着发展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的人民的创造性必须采用这类的民主的办法,这些办法将保证在政权机关中人民的代表在反日纲领上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组织自由,必须保证国民大会的民主的选举,把它变为巩固中国人民的统一和动员他们力量的因素。

第七,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坚持的工作去瓦解日军,利用俘虏,散传单,广播等。

第八,必须给日本内部的反战运动底发展以一切方法的援助,必须确立中日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亲密联结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除上述一切外,中国人民必须首先依靠在自己本身的力量上,依靠国内的富源,依靠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自己的团结和战斗的决心而不要建立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调解的任何幻想。外国帝国主义只想利用中国以达其帝国主义的目的。

(六)为最迅速的和平的调整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的争论问

题，中共提议首先以抗日斗争的利益为指标，以一九三七年底商定为出发——这个商定曾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的基础，这个谅解在两年半之间保证了中国人民的统一和他们对外来强盗的胜利的抵抗。

共产党在自己方面准备做到一切必要的事以消除冲突和误会，但是他认为不能允许接受这类条件，即会引导到边区的取消或孤立和削弱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力的条件，以及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寇的斗争并因之与他的根本利益相违反的条件。

承认在继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上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之威权，亲密的和一切拥护抵抗日本侵略的人们合作。中国共产党用一切力量以求得在为民族解放共同事业的斗争中和国民党军队建立起兄弟的关系。

(七)共产党认为：作为目前条件下的行动纲领而提出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要求应该服从于一个基本的在当前时机中决定的任务——组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底任务。共产党指出：在个别的共产党员的发言有时遇到显然的过早的跑向前面去；和提出了那些只有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才能从事实实现的要求。因此共产党向全体共产党员提议避免足以妨碍团结和动员中国人民底一切力量来反对日寇及能够为民族战线的敌人利用以达其反人民的投降的目的的一切发言和提议。

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牢记着：共产党不仅是保持边区和八路军利益的组织，而是保持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利益的组织，他是保护中国工人、农民、小市民人民知识分子底利益的政党，是不将自己的行动限制于个别区域的政党，是在全中国范围内行动的政党。

共产党强调：为解决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放在党面前的任务，必须各方面的巩固党，把党变为全中国范围的党，争取在工人队伍中最深刻的影响。

为着这个目的党首先应该：

甲、求得消灭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脱离特别是在日本占领的大工业区域内。在沦陷区和非沦陷区中展开在工人中的广大的工作；坚决的加紧吸收工人加入共产党的队伍，提高在党内领导机关中无产阶级干部的比重。

乙、克服党在职工会工作中的最巨大的缺点；结束对职工运动的估计不足并在一切职工会组织中(合法的和非法的)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在后方职工会的地方，把组织职工会的倡导掌在自己手中，为着这个目的提出相当的工作人员和加强对新的职工干部的训练。

丙、用特别的力量来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自己的队伍。党面前任务的复杂性，共产党思想上锻炼的必要，他们为马列主义的思想而进行的经常的斗争，新党员数量的巨大——所有这些都要求顽强的坚持的工作，根据马、恩、列、斯的学说来进行群众底党的教育。

丁、集中更大的努力来揭破帝国主义的托派走狗底叛卖作用，和求得将他们从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运动底队伍驱逐出去。

戊、采取许多组织的和其他的办法来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全国的党的组织，培养和选拔干部，加强群众工作，加强青年和妇女中间的工作等等。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电报^①

(1941年1月4日)

毛泽东收

我们认为分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应以分裂为目标。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持统一战线的群众,尽党和我军的一切可能去避免内战开衅。请重新考虑您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并将想法和建议告知我们。

季米特洛夫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① 由于国共两党关系日呈紧张,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实际上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脱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然而,考虑到国际条件以及中国国内政情,主要是国共力量的对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表示不仅应维护统一战线,而且要进一步巩固它(见下页“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编者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1941年

1941年1月3日

皮克65岁寿辰。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贺信转交给他。

潘菲洛夫将军(情报局)来我处谈中国东北的游击队中党组织的问题。

起草给杜克洛(巴黎)的指示。

1941年1月4日

同多洛雷斯、安东、埃尔南德斯谈西班牙事务。

潘菲洛夫将军来我处谈中国东北(满洲里)事务。

1941年1月13日

“致铁木辛哥、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诸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问题应准许国防人民委员部把一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26人转移到延安。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我送交给斯大林一封私人信件：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恳求您接见我以便商谈保加利亚共产党对德军进入保加利亚应执行的路线问题。

德国部队已准备好进入保加利亚，这使保共面临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当然，在国内有着巨大影响的共产党不能对德国在保加利亚政府的同意或姑息下采取的这种行动保持沉默。但问题

在于它应按何种方式作出反应？它应持什么样的具体立场？

我认为，共产党应该坚决反对德国部队在任何借口下转移至保加利亚。应该指出，如此破坏保加利亚的中立会使保加利亚人民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卷入战争，这样有使保加利亚领土变成军事行动的舞台的危险并会把国家的独立变成赌注。同时，它应揭露鲍里斯和政府须承担的责任，他们拒绝了苏联关于签订互助公约的建议，他们是使目前状况形成的直接罪人，有鉴于此，应更有力地强调保苏之间签订互助公约的必要性。

共产党在广泛地利用塔斯社声明的同时，应揭穿政府人士关于德国部队的转移是和苏联协调过的谎言。

共产党应继续为反对在国内建立占领制度和控制国家的经济和食品资源而开展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应避免鲁莽的表现、挑衅活动和武装冲突。

致

同志式的敬礼

格·季米特洛夫”

半夜两点斯大林打来电话：

“您的来信已阅。我同意您的立场。必须进行揭露，同时应避免挑衅行动。这样的行动只会使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保加利亚。

党不应作为苏联的助手来行动，而应以自己的名义站出来。

保加利亚政府对于我们的声明保持沉默。我们将通过电台用保语播送这一声明。”

1941年1月14日

中央委员会通知，关于把26名中共党员转移到延安去的决定已作废。

莫洛托夫劝我们勿通过塔拉索夫向法国共产党作指示。

1941年1月15日

同曼努伊尔斯基一同阅读了有关1926年拉科西在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案卷材料(事由是拉科西被捕后在布达佩斯警察局所做的不能允许的供词)。

商定把这些材料交给拉科西,让他对之了解并要求他作出解释。

1941年1月16日

戈利科夫(情报局)、潘菲洛夫(情报局)。比留科夫(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军事委员会委员)来我处。开会商议了(中国)东北的事务(游击队伍和游击队组织)。

商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局和派遣党的工作者至东北。

我们同拉科西谈了他应直接负责的匈牙利事务。

给他看了国际监察委员会中他的案卷。商定由他作出解释。

国民党和在中国的我方部队之间的武装行动。令人不安的消息。重新发生内战的危险。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如下内容的密码电报: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我们新四军的万人以上部队在叶挺^①的指挥下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推进,但受到蒋介石派来的七万人部队包围,双方已血战八昼夜。

在西北已集结了30万名士兵,他们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在其周围建起了军事设施,封锁此边区几千里长的地方。

我军有被全歼的危险。与此同时,蒋介石派了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反革命气焰甚为嚣张。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实施的这种广泛进攻。”

^① 此处原文音译为叶里海·霍尼纳,可能是密码的翻译问题。

1941年1月1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委员会会议，研究编辑出版委员会、共产国际宣传部和编辑部的问题。

打电话给莫洛托夫，告之中国发来的电报。莫答应把问题向斯大林反映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因同一事由还给铁木辛哥去电。

1941年1月18日

我把私人信件发送给斯大林：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到的两份密码电报和苏联现有的情报表明，蒋介石显然认为目前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总攻的适宜时机，因此，他手下的将领们卑鄙地袭击新四军并进一步采取针对八路军和边区的侵略行动。

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

假如蒋介石不终止其总的侵略行动，则不可避免地将燃起内战。当然，这种战争只会对日本有利。

为了避免这样的内战，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这将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我认为，这一运动应按下列两种方式开展：

(1)在对中国友好的外国报刊上揭露中国反动派破坏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罪行；

(2)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各种协会、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向蒋介石发出抗议信并向他和中国人民呼吁不应允许爆发内战和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应允许日本人用‘中国人的手’来征服中国。

我们有办法以完全可靠的方式把有关组织这一运动的指示转

达给我们的朋友们。

恳请告知您有关我们是否应采取这些步骤的意见。

致

友好的问候

格·季米特洛夫”

深夜我得知此信已被转交给斯大林。

1941年1月20日

我同莫洛托夫谈了中国问题。他对我说：“为了讨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我们应获得更确切的情报。”

重庆消息(1941年1月17日)：

“……今天蒋介石要求通过张冲^①将军把他的一项请求转交给莫斯科，其内容如下：在第三区部队和新四军之间发生的事件应被看做地方性的军事事变，不应赋予其政治意义，不应对其作出广泛反响。他保证这一‘事变’绝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而且不会影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继续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将被释放。”

1941年1月21日

我同莫洛托夫谈了保加利亚问题和其他问题。莫洛托夫告之苏联政府向德国政府宣布，保加利亚和两海峡地区是在苏联的安全范围之内。

送来五局发自索非亚的密码电报，其中通报鲍里斯国王似乎想背着德国同苏联全权代表会谈。德国人下了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要穿过保加利亚。鲍里斯国王自杀未遂……

^① 张冲(1899~1980)，云南泸西人，彝族。早年加入滇军，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政府六十军副军长兼一八四师师长、新三军军长、云南部队第二路军指挥官。1946年到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同斯大林谈了中国问题。

“叶挺是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应该看看他是否为此事件^①提供了借口。在我国同样有一些好游击队员，由于不守纪律和其他原因，我们被迫枪决了他们。”

“看来，三年时间呆在同一块领土上的八路军问题比这个要复杂。”

我们商定以后几天讨论这一问题。……

大家在大剧院呆到很晚，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铁木辛哥、日丹诺夫、布琼尼、库利科夫、梅尔库洛夫（他带来索非亚的电报）和我。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是个好小伙子，但不是军人。他对梅尔库洛夫说：“您很勇敢，有劳动能力，然而无原则，软弱。您总想善待所有军区，然而，您应该有计划并严格地实施计划，而不要管哪个人会生气。”

1941年1月2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政治流亡者问题。

博格丹诺夫作报告。大范围的讨论。选举了具有威信的委员会来制定具体提案。

拉科西带来有关其在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案卷所做的书面说明。他承认1925年对警察局作供的错误，但解释说，他在一份记录上签了字，那份记录包含着其他被捕者已向警察局提供的材料，他签了字的目的是想使警察局的审讯结束，以免军火库被发现，在长期审讯的情况下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1941年1月29日

向曼努伊尔斯基进行解释：

昨天的报告会之后他十分生气。

^① 即皖南事变。

一些奇怪的论调,诸如“在联共(布)中央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我自己离开了工作。在那里,他们从我这里得不到任何东西,一切都是你在签字和寄送。我无法同你一起工作……党中央将作出决定……”等类似的无稽之谈。

显然,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当我牢牢地把工作掌握在手中时,他觉得尴尬。我必须准备面对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1941年1月31日

在联共(布)中央——日丹诺夫和安德烈耶夫处。

谈了中国问题,在这里的外国同志学校,拉科西案件,检察院同负责政治流亡者事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局势,对我们期刊的检查等问题。

1941年2月4日

伏罗希洛夫 60 岁寿辰。

《真理报》上的反应很少。无一篇出自领导同志的文章。

我给伏罗希洛夫寄了如下私人信件:

“亲爱的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

请接受我对您 60 寿辰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祝贺。

假如您可以完全了解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还有共产国际最优秀的战士们对您的热爱和真诚的、深深的敬意,您就会更为轻松地承受作为一位负责的党和国务活动家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困难和不快。

亲爱的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衷心祝您健康长寿,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幸福和全世界共产主义神圣事业的胜利而工作。

紧握您的手!

格·季米特洛夫”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

庆祝伏罗希洛夫 60 寿辰。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元帅、图列涅夫和梅列茨科夫将军、人民委员、中央委员——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马努伊尔斯基、米哈依洛夫（青年代表）和夫人们。出席人数比莫洛托夫寿辰时略少。

几乎为所有出席者都祝过酒。

对我的祝酒词：“为共产国际‘总司令’的健康干杯！”（伏罗希洛夫语）

最后，“为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团结，为什基里亚托夫、米哈依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干杯！”

我们一直呆到凌晨 4:00。

斯大林两三次举杯祝酒。

为红军和海军舰队祝酒。

“依靠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得以利用和平带来的好处（买得便宜卖得贵！）。军队和海军舰队的强大还帮助我们实行中立政策并使我国处于战争之外。”

关于年轻干部：

“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会把年轻干部压制 20~25 年，然后才准许他们到各种各样的领导岗位上去。这是法国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提拔年轻干部，有时甚至过于大胆。我们满意地、高兴地提拔他们。

年纪大的人坚持旧观念，年轻人向前进。及时地用年轻人替换年纪大的人，这是十分重要的。不如此做的国家注定要失败。”

关于加强实力：

“我们很走运。‘上帝’帮助了我们。许多成绩来得容易。存在着冲昏头脑的危险。我们不应骄傲。应刻苦工作和学习。

我们已经有 400 万人的军队做好了战备，以防万一。沙皇曾

幻想拥有 120 万的常备军。”

关于列宁：

“是列宁诞生了我们，创造了我们，他是我们的始祖。为了一切我们都对他欠着债。我们应像列宁一样工作。同列宁相比，我们大家都是‘小雏’。”

1941 年 2 月 5 日

给毛泽东发了下面电报：

“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

1941 年 2 月 6 日

把有关中国事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告之发给毛泽东的电文，请求他接见我，以便对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局势下的策略提出意见。

1941 年 2 月 7 日

把林彪(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和中共中央委员)有关中国事务尤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汇报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

1941 年 2 月 22 日

中国儿童抵达莫斯科(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子女)。

1941 年 2 月 24 日

研究了东北问题。科甘、久津、普利舍夫斯基。向他们作了相应的指示。……

拉科西开始工作，尚未得到斯大林有关拉科西问题的答复。

1941 年 2 月 25 日

情报局负责中国事务的戈利科夫称，蒋介石建议由苏联向八路军派遣顾问。

1941年2月26日

日丹诺夫通知,斯大林同意我们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拉科西问题的决议的建议。

费丁(内务人民委员部)。捷克共产党在布拉格的电台落入盖世太保手中!

1941年-2月28日

讨论了为对付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在奥地利(电台等)遭受的失败应采取的措施。(哥特瓦尔德、艾尔科里、科普莱宁格、弗恩贝尔格、西罗基。)

1941年3月1日

在维也纳签订了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公约的协定。德军进入保加利亚,5000名士兵在瓦尔纳。

1941年3月2日(星期日)

德国新闻局宣布,征得保加利亚政府同意,大批德军进入保加利亚。

1941年3月4日

苏联政府发表公报谴责保加利亚政府的政策以及它准许德军进入保加利亚。

1941年3月5日

卡加诺夫(前驻中国武官)来我处。

通报了中国的局势、蒋介石的立场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

科甘从重庆寄来由周恩来转来的材料的大邮包。

哥特瓦尔德、西罗基、苏哈列夫、赫尔方德(送西罗基去捷克斯洛伐克处理已发生的破坏事件)。

1941年3月6日

同德·扎哈洛维奇讨论了第二国际的纲领草案(把我的意见交给了他;纲领中看不到我们的目标,缺乏明确的、坚定的目的性,即把社会民主党彻底清除出工人运动,建立以共产党为代表工人

运动统一指挥部,不允许社会民主党重新抬头并实现它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末期所起过的反革命作用等)。

1941年3月8日

又收到了中国寄来的邮件。……

在大剧院举行国际妇女节庆祝会。

可以说,我第一次未被选入国际节日的荣誉主席团。这当然并非偶然。除了对外政策上的考虑之外,这应被看成是某一场幕后“小小把戏”的信号!

1941年3月9日

八年:1933年3月9日至1941年3月9日(在柏林被捕)。

对我一生来说,这个日子是最痛苦的回忆。

1941年3月10日

把(按我所提意见的精神修改后)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纲领草案寄给了日丹诺夫。

1941年3月11日

将收到的来自重庆的军事材料转交给了戈利科夫手下的人(进行整理并加以适当的利用)。

1941年3月17日

久津谈有关中国东北的消息(关于游击队领导干部)。那里极不顺利。

1941年3月18日

巴黎公社纪念日——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节日!

为此在联盟之家举行国际晚会。

1941年3月20日

日丹诺夫打电话告知他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意见:

他认为纲领不能令人满意:

(1)重点放在了历史分析(过去)上,而不是放在社会民主党的目前状况上;

(2)从国际范围内研究社会民主党而不是按照各个最重要的国家——战胜国和战败国、交战国和“中立国”等来加以区分；

(3)在研究社会民主党的破产时没有指出工人阶级在当今事件面前陷入的糟糕境地；

(4)在批评社会民主党时利用了一些已经不再用的说法(如它已放弃了社会主义口号)；

(5)没有指出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如何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口号接过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击溃工人运动；

(6)缺乏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关于他们当前立场的具体的、有力的引文和讲话。

现在的基本问题是：

工人阶级是否允许资产阶级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苏联在这里做自己的事；可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在哪里呢?)

1941年3月26日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阿尔菲罗夫上校(中国军事学习小组负责人)谈小组(六位中国同志)的工作。

久津和科兹洛夫(校长)在座。

作了下列决定：

- (1)课程延续至6月底；
- (2)7月份放假；
- (3)在8月初参加10天野营。

1941年3月27日

南斯拉夫的反德军事政变。

(国王彼得二世、首相西莫维奇将军参与。)

1941年3月28日

科甘送来中国材料。

收到南斯拉夫党中央关于其对南斯拉夫事件的立场的电报：

(1)党在组织全民反击德、意入侵南斯拉夫和英国企图把南斯拉夫拉到自己一边的战争。

(2)全民对新政府施加压力,坚决要求同维也纳公约决裂并同苏联签订互助公约。

(3)对新政府保持警惕。

1941年3月29日

晚上去莫洛托夫处(克里姆林宫)。

我们谈了南斯拉夫问题。

组织上街示威是不恰当的。英国人会利用这一点。国内反动势力亦如此。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们会遭到毁灭。当前必须积聚力量,作准备。不要声张,不要叫嚷,而应坚持自己的立场。应该按照这样的意思劝告南斯拉夫的同志们。

对于庆祝台尔曼55寿辰的运动,莫洛托夫持怀疑态度。假如在国外搞喧嚣的运动,而我们这里又什么都不做,那样不合适;然而,在这里采取任何行动从政治上很难说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并未对德国人采取敌对立场。我们应同联共(布)中央商量一下,不过,这样的运动最好不要搞得太显眼。

关于土耳其。德国人力图唆使土耳其人反对我们。他们威胁土耳其人说,假如他们反抗德国,我们就会从后方袭击他们。因此,我们发表了人所共知的声明。土耳其人现在可以不怕我国,可以更大胆地行动。当然,土耳其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南斯拉夫的事件对德国人是一记耳光。

起草了准备寄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电文:

“我们坚决劝告你们在现阶段只限于在群众中对你们所持立场加以有力的、巧妙的阐明,但是应放弃组织上街示威并竭尽全力来避免群众同当局之间的武装冲突。不要受刹那间的情绪控制。不要热衷于喧嚣的、表面上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行动,而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阐明我们的原则和口号,阐明我们共产党的政策上:使

党巩固、把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劳动者团结和组织起来，加以全面的训练；加强党在军队和青年中的影响。你们不要过于匆忙。不要受敌人的挑唆。不要去遭受打击，不要过早地把人民的先锋队投入烈火之中。同阶级敌人进行决死斗争的时刻尚未到来。应不间断地进行解释工作并使自己和群众受到全面训练，这就是党在目前的任务。请接受上述意见并加以执行。请复电告知已收到电文。

希经常向我们通报消息。”

1941年3月31日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艾尔科里、哥特瓦尔德、科拉罗夫）他们肯定了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电报的内容。

把发给南斯拉夫的电文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1941年4月1日

监察委员会（古利亚耶夫、舍因曼、卢卡诺夫）通报了青年共产国际中的违纪行为：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从其1939年度国际基金中发给西班牙同志社会主义青年统一联盟盟员专门用于购买服装的10万卢布中，大部分都被用来供给青年共产国际机构的一些领导人和全苏列宁共青团中央自身（米莎科娃、米哈依洛夫、格罗莫夫等）。

这是彻头彻尾的不道德的行为。

我作了指示：进一步做彻底审查并就此事的责任和为在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丑闻将采取的措施向监察委员会提交结论。

1941年4月2日

发电给索非亚的中央委员会，就反塞尔维亚示威提出警告：“保加利亚卷入反塞尔维亚的战争这不仅是对邻国的兄弟人民的卑鄙叛变，而且对保加利亚人民自身来说也将意味着会彻底变成德帝国主义的奴仆，他们将为别人的利益而流血并使自己的国家遭到可怕的破坏和毁灭。运动应按这样的精神发展，你们不应接

受敌人的挑唆。”

1941年4月3日

同中国的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

1941年4月4日

夜里起草好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条约。

1941年4月5日

同南斯拉夫的条约已于夜间签订。

1941年4月6日

同南斯拉夫的条约已发表,附有南斯拉夫代表团同莫洛托夫、斯大林等人的照片。

德国向南斯拉夫和希腊宣战。

1941年4月7日

就中国问题同林彪详细交谈。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批评性意见。

1941年4月9日

同日丹诺夫谈了共产国际五一节呼吁书问题。

我俩均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发表共产国际五一节呼吁书欠妥(进行详细的分析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摊自己的牌,意味着为敌人利用,从而损害我们制造借口等)。

巴尔干事件并未改变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两个交战的资本主义集团持有的总立场。我们不同意德国在巴尔干各国的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违背同德国的公约并转向英国方面。

我们中间如此考虑问题的人对苏联独立自主的作用和力量估计不足,他们觉得我们应转向这一或那一帝国主义集团,然而,这是极其错误的……

1941年4月10日

商定了对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指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群众运动,来反对利用罗马尼亚作为帝国主义奴役者们达到其目

标的基地和工具，反对把罗马尼亚人民拖进巴尔干战争，争取同伟大的邻邦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1941年4月17日

戈利科夫将军来我处，通报中国军事方面的情况。

同时通报巴尔干战线和北非战线情况。

1941年4月20日

在大剧院中。

塔吉克斯坦的闭幕演出。出席者（在政治局包厢中）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克、什切尔巴科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季米特洛夫。

演出结束后我们呆到两点。

斯大林讲了他同松冈洋右^①的谈话。

“在我国也有共产主义，有道德的共产主义。”松冈洋右对斯大林说，他在开玩笑谈“日本的共产主义”……

大家也为我的健康干了杯。当时斯大林说：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变成叫做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名称的本国的共产党。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应到本国人民中间去并把力量集中于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

^① 日本战犯，曾任驻国联代表（1932—1933），外相（1940—1941）。——译者注

界革命。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时期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

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从(共产国际)本位主义利益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不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利益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使得资产阶级更易于迫害它们,使其更易于实现把共产党同本国群众隔绝起来的计划,而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则会妨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以及作为本国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任务……

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1941年4月21日

向爱尔科利和多列士提出应讨论下列问题: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使它们变成共产党人真正本民族的政党,它们遵循共产主义纲领,但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

他俩均认为对问题的这一提法总起来说是正确的,它完全符合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

1941年4月23日

同就国际形势作报告的人座谈(65人参加)。

我阐述了下列各点:

- (1)关于苏日公约;
- (2)巴尔干局势以及地中海区域的战争前景;
- (3)同日本签订公约后的苏中关系。

总的结论:

(1)巴尔干地区的事件非但不能促使战争早日终止,反而会使它继续并加剧。世界大战将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

(2)战火越来越接近苏联国境,苏联应采取一切手段来准备抵抗任何“意外事件”;

(3)苏联对西方比较放手。

1941年4月26日

同林彪谈中国问题。

(苏日条约^①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

1941年5月12日

在党中央(日丹诺夫处)。

同德·扎哈罗维奇讨论了发表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的决议的根据。这一改组牵带着许多不明确的复杂问题。

谈了共产国际的问题。

(1)决议必须有根据,因为须在国外以及向我们的苏联共产党人认真地解释为何采取这一步骤。共产国际曾存在着,有其重要历史,然而,突然不再作为统一的国际中心存在和进行活动了。

在决议中应事先预见到一切可能会来自敌人的打击,例如说这是一种手腕或者说共产党人放弃了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我们的论据必须能促使各国共产党发展,而不是制造一种办丧事般的心情和混乱。

应该指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

^① 指1840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同时两国发表声明,苏联宣布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则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

应该发挥把健康的、正确理解的民族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的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该依靠各国中这样的民族主义。(斯大林同志曾阐明,在得到正确理解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矛盾。否定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任何共同点。这种世界主义为搜罗特务、敌人的代理人准备了温床。)

共产国际的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行列中深入人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

必须明确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终止活动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正相反,仅仅是这种团结的表现形式和方法改变了,所采取的形式和方法将更适合于国际工人运动的现阶段形势。

(2)这一步骤应完全是严肃认真和始终如一的。不应该出现只换一件外衣,而其余一切都照旧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应是解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实际上存在着国际指导中心。

(3)由谁发起此事的问题十分重要:是由领导机构自己提出倡议还是由一些共产党来提建议?看来后者较好。

(4)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

应该讨论三个问题:

如何从原则上进行论证;

由谁倡议来通过决议;

共产国际的遗产如何处置。

(5)无论如何共产主义运动通过这一步骤应该得到很大好处:

所有的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

资产阶级将失去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服从于某一外国中心，也就是说他们是“叛徒”这样一张最重要的王牌；

每个国家的共产党将增强自己的独立性并将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

将使得那些认为如加入共产党就会脱离本国人民，因而现在还没有入党的工人积极分子更容易加入共产党。

1941年6月5日

给毛泽东发了以下电报：

“我们从这里难以提出任何军事性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你们必须坚决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中国人民民族战争今后的命运、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未来均取决于此。我们觉得周恩来在他6月1日的电报中提出的有关此种具体积极行动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

（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1942年

.....

1942年6月17日

潘菲洛夫少将和从(中国)延安来的两位情报局工作人员斯克
里尼克中校和格尔马诺夫中校来我处,通报了边区的形势,我党的
政策、八路军的状况、党和军队的领导等。

总的看法是,在党和军队的工作和领导中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改变状况。

1942年6月18日

60岁生日!

简直不敢相信,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不知不觉中变老了。

好在没有任何正式庆祝活动。

但我收到很多非正式的贺信贺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莫洛托夫报告伦敦和华盛顿谈判情
况。会上发言的有白俄罗斯、乌克兰、乌拉尔、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
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的代表。

1942年6月20日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见日丹诺夫。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我们讨论了前线 and 国外的形势。尽管他在列宁格勒经历了千辛万
苦,仍精神饱满,充满乐观。他详细给我讲述了列宁格勒防卫的组
织情况和成千上万列宁格勒人的英雄事迹。这是一座英雄城市!
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1942年6月22日

卫国战争开始一周年。

为此在《真理报》上发表重要社论。

1942年6月24日

和弗尤林伯格、维登谈奥地利的情况，责成他们就英苏条约起草奥地利共产党告奥地利人民书。

贝洛夫谈干部问题。

审阅保加利亚对外广播评论员文章。

沙罗诺夫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确定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

1942年6月25日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指1942年6月16日电报)并已采取了措施。

召开党的秘密会议。

.....

1942年11月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林打电话，要求我接见驻中国大使潘友新。我定在明天。

1942年11月5日

接见我驻中国大使潘友新。

他向我详细汇报了中国的局势、蒋介石的立场以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

1942年12月9日

我要求毛泽东调查一下同我们联系使用的密码的可靠性，因为有信号表明，这套密码已被国民党人掌握。

.....

1942年12月16日

我驻中国大使潘友新来我处，通报有关中国问题提出的建议

和对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处理情况。关于蒋介石与中共关系问题,他提出了谈判协商的六条纲领:

(1)承认蒋介石对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共20万人)的最高指挥权并在自己直接指挥的条件下纳入中国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武装力量为游击部队,听从蒋介石军事指挥部的军事指挥。

(2)向八路军提供各种武器和给养。

(3)八路军的代表参加所有军事指挥部和军区,任命中共代表为军队政治部副主任。

(4)解除对边区的包围,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追剿,释放叶挺和新四军被捕官兵。

(5)制订和公布同蒋介石政府达成的中国战后民主体制联合协议。

(6)共产党在中国全境公开化并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发行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

我们商定,在这一纲领得到上级批准后,他通过外交途径,我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类似解决蒋介石和中共之间关系问题给予协助。

1942年12月17日

潘友新电称,通过同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交谈了解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目前不打算处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必须暂时把原定计划往后拖延。

1942年12月25日

同哥特瓦尔德交谈。他汇报了乌法捷克方面的工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面临的特殊问题。

我们商定由他准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报告。

1942年12月26日

(我驻蒙古共和国大使)伊凡诺夫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瓦尔冯

来我处。

我们探讨了在蒙古共和国和(中国)延安之间建立“通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制定了具体措施。

.....

(摘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关于反磨擦斗争中争取友军 工作给新四军的指示

(1940年11月4日)

叶挺、项英、胡服、云逸、陈毅、克诚、雪枫、先念：

甲、根据华北(朱怀冰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等反磨擦战斗(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及陈泰运严守中立)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

乙、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一方面在那里聚积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如果由于我们努力争取友军工作的结果,使在汤恩伯、季品仙等部向我进攻时,不仅有许多杂牌军采取中立或发生对我同情的实际举动,而且即在汤、李所部中也发生一部分人反对内战同情我军的运动,则不仅对我华中反磨擦的武装斗争,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将给予全国反共投降阴谋以严重的打击,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

丙、立即选派得力代表携毛、朱(有些对象亦可用)周、彭等名义恳切函件,加上你们自己的联络信件,向周围各友军进行交友工

作,如我们直接派代表不便的地方,可请托地方绅士名流文化人以及一切与各友军有亲友同乡同学同宗关系的人等代我们去疏通联络,向各友军详细解释苏北事件之真象及新四军八路军不能开赴老黄河以北的苦衷和理由,向他们诚恳说明大敌当前,团结御侮之必要,以及分裂内战足以招致亡国之危险,求得他们不参加反共战争,或他们为敷衍命令计而打假仗朝天放枪等。同时,对各种不同的友军,除宣传抗战团结大道理外,必须特别强调与他们有切身利益的问题,例如:对川军须特别强调八路军新四军与川军之友谊,强调蒋介石侵占四川和消灭川军之阴谋,对东北军强调八路军与东北军之传统友好关系,强调对张汉卿及东北军处境之同情,强调对某方承认伪满作为投降的第一个条件的愤激情绪,对冯治安、孙连仲等强调我们与他们团结抗战共患难同祸福的必要等等。总而言之,使地方军杂牌军为本身利害打算,懂得不上蒋的当而避免与我们作鹬蚌之争。对李品仙及其部队,亦须强调八路与五路之多年友谊,不受人挑拨,而互相敌视,致为蒋造成打击五路和八路之机会,对汤恩伯及其部下,亦须采取友好争取态度,以促使其内部分化。

丁、根据各方面经验,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一切中国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仍是思想上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对我同情的有力武器,当发生磨擦战争时望将这些口号,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扎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尤其要设法动员民众和同情分子,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队所经过之一切地带,遍贴遍写这类标语口号,当汤、李部队开近我防区周围时,发动大规模联欢运动,即在战斗行动开始后,也不要放松在火线上呼团结抗日口号及部分谈判妥协工作,同时对汉奸部队或顽军等类口号,切忌乱用,根据过去经验,乱用这类口号,反足增加反共军之反感和团结。

戊、陈毅对两李及陈太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以期各部分均能得到争取友军工作之最大成绩,过去许多部队对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之不够。

毛、朱、王

支三

根据中央档案原复写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 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 致周恩来电

(1940年11月6日)

恩来同志：

江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根据三日来电，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向各方活动，应动员多数人员出马（党的、非党的）。蒋夫人处的活动值得注意，桂林方面请告克农亦如此办。

毛泽东

鱼辰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关于 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 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1940年11月6日)

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

目前日德与亲日亲德派包围蒋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投降日寇，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应动员党内外多数人员出马作上述积极热烈的活动。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求大家注意自己的存亡问题，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只要不剿共不投降，等到因剿共投降而闹到亡党亡国之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要告诉党员与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各地情形望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鱼辰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1941年1月13日)

限即刻到。重庆蒋委员长，林主席，何总长，白副总长，冯副委员长，军令部徐部长，刘次长，政治部张部长，孔副院长，孙院长，居院长，覃副院长，戴院长，于院长，国民政府各部长，中央党部，三青团部，兴集阎长官，榆林邓总司令，陕坝傅副长官，兰州朱长官，谷主席，迪化盛督办，西安熊主任，蒋主席，胡总司令，洛阳卫长官，孙副长官，漯河汤总司令，郑州孙总司令，沈邱何军长，立煌李副长官，莫军长，区军长，张军长，信阳一带王副总司令仲廉，老河口李长官，恩施陈长官，耒阳薛长官，上饶顾长官，皖南探送上官总司令云相，王总司令赞绪，苏南冷军长欣，浙江黄主席，刘总司令建绪，福建陈主席，江西熊主席，广东余总司令，李主席，桂林李主任，黄主席，张总司令向华，贵州吴主席，昆明龙主席，重庆刘总司令，成都邓主任，潘督办，张主席，康定刘主席，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叶参谋长，中央社，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兴集八路军办事处，各报馆，各团体钧鉴：

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挺等率部遵令北移，并遵守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

德等远在华北,未悉命令移防底蕴,迄今始知聚歼计划。今不问对敌行动如何,但对我则是聚歼,何、白两总长皓电、齐电所称之仁义道德何在?所谓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者究属何人?所谓军政军令军纪者究在何处?似此滔天罪行,断不能不问责任。同时全国正准备大批逮捕,大批杀人,与袭击八路军各办事处,在西北则修筑万里长城之封锁线,在华中则派遣二十余师正规军实行大举进攻,国内局面顿改常态。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率全军将士
同叩 元

一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
《新中华报》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 坚决执行北移方针 给项英等的指示

(1940年12月26日)

项、周、袁：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

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明白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中央书记处

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 战略部署的指示

(1940年12月31日)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的运用策略。(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

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先让一步,欢迎他们抗日,待其深入,然后各个击破之)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的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世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 武官崔可夫谈话记录(节录)

(1941年1月16日)

崔武官：……

余昨天闻说，委员长所领导统率之部队，在皖南发生内部战争，此事真象如何？请示知，余拟报告敝国大元帅。

委 座：此事真象尚待调查。

崔武官：现在事既发生，情况如何？请委员长简单示知，以便于敝国大元帅问及时，提出报告，余离国赴任时，敝大元帅曾语余：“余必随时支持中国蒋委员长”现在贵国处此寇侵国危之日，全国军队应一致服从委员长之领导，精诚团结，不可有丝毫内部冲突，此乃贵国胜利之必要条件。

委 座：此理诚然，凡属一国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要求统一团结，即须作到此点，只要全体军人，人人能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则未有不统一、不团结者。

崔武官：最近之将来，贵国军队内部是否再有此类冲突事件发生？

委 座：只要大家能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即可不致再发生冲突，吾辈军人皆知任何国家军队决不能不听命令而自由活动，否则即不能认其为国家之正式军队。

崔武官：余此次来到贵国，闻说贵国军队有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之行动，使余完全不能了解，余服务军队多年，对于命

令,只知服从,对于纪律,只知遵守,而认为应无丝毫问题之事,但贵国现既发生此类事件,特请示委员长,愿闻其详,以便报告敝国政府。

委 座:此事俟调查完毕后,再派员与贵武官详述其经过。

崔武官:贵国军队究竟有无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之情事?外传已发生冲突之说,是否属实?请委员长示知。

委 座:一年以来有少数部队已发生此类情事,实属无可讳言。致外传内部发生冲突之说,余尚未得到前方确实报告。

崔武官:贵国军队倘使大家皆能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则内部冲突之事,即可消弭,委员长之意然乎?

委 座:然!

崔武官:余在城内听得许多谣言,谓此次贵国军队之参加皖南冲突者,多至七万人,双方皆有损失,甚至有军长、参谋长被俘虏者。

委 座:余昨接一函,亦如此谣传,实则绝无此事,即或不免小部队之冲突如过去苏北、鲁南、河北一样,亦决不致有如许大军行动。

崔武官:余对此谣言,亦不置信,希望委员长能早派员告余此事经过情形。

委 座:俟余获得前方报告时再派员通知贵武官。

崔武官:谢谢!尚有一事须请示委员长者,即敝国新闻记者三人在延安工作已一年半,其中一人现因病须用手术,拟与其余二人一同调回医治,另派记者三人,医生二人带行李、食物前赴延安,请允彼等搭乘渝兰线飞机及兰州至延安之汽车。

委 座:可!

崔武官:今天承委员长赐予接谈,至为感谢,敬祝委员长健康,并

祝贵国军民于委员长贤明领导之下，团结一致，获得抗战胜利！

委 座：祝贵国武官身体康健！

（《战时外交》（二）^①，第 525—529 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 年版。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1941年1月18日)

(一)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八千余人于本月四日起,开始遵照党中央向国民党让步的决定,服从蒋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动,不料国民党当局早有“聚歼”计划,我军行至泾县之茂林即为国民党军队七个师重重包围,激战七昼夜,全部覆没。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二)国民党这一表现的原因是:

第一,亲日派何应钦及西西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

第二,顽固派头子及英美派代表,由于英美集团与德意日集团间矛盾之扩大与英美拉拢中国之积极,及日本在中国的进攻行动受到了英美的牵制等原因,他们的气焰大为高涨,认为此乃向我党进攻以巩固其统治的有利时机。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

(三)皖南事变及国民党的公开处理;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前面,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暴露着他们的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它将使国民党的威信大受损

失，同时揭破其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之宣传的全部虚伪性。因此，皖南事变同时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

(四)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央特决定：

(甲)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并到处提出下列口号：

(子)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

(丑)立刻停止华中二十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

(寅)立刻停止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线，把一万元的碉堡建筑费，用到国防建设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

(卯)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

(乙)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的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丙)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丁)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

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发言人 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1941年1月18日)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三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迫。该军和平江、在豫西之后方留守人员及受伤官兵，则迭被惨杀，曾发生有名之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即该军参谋长张云逸之老妻幼子，亦被拘捕。此皆过去数年之事实，昭昭在人耳目者。近数月来，更变本加厉，苏北、皖东、鄂中各地，大举进攻，名曰剿匪，江淮一带，早已闹得乌烟瘴气。不宁惟是，去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总参谋长之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项军长，不顾事实，强调所谓军政、军令，勒令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朱彭叶项为顾全大局起见，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是以有佳电之答复。至十二月底，新四军叶军长等，业将移动部队准备就绪，正欲开动之际，不意国民党

各地言论机关,公开宣布该部北移消息,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同时即闻当局已对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袭击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语。然外表则说已令各部协助通过,决无留难云云。叶军长等以言出负责当局,料可置信,乃于本月四日毅然开动,计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共约万人。不意甫经开动,即遭袭击,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村地区,即突被五十二师唐云山、一〇八师戎纪五、七十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十师詹忠言、新七师田钟毅,第十师王劲修等七万余人,统受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分进合击,大举围攻。叶军长等一面仓促应战,且战且走;一面电告当局,质问理由。乃当局在该部被围血战七昼夜中,始终佯称已电顾祝同询问真相,并诡称已令顾氏撤围放行,实则密令各部实行其聚歼计划。至十三日,激战已八昼夜,我遵令北移遭遇袭击之新四军,果已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已达当局聚歼之目的矣!至昨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在逃,正缉获中,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等语。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之真面目,赤裸裸的表白于全国人民面前。事有凑巧,正是十七这一天,日本同盟社亦从南京发出了一个惊人电讯。该电略谓:“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移往江北,遂开始在东流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十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十四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至此,一幕消灭抗日武装摧残异己力量之大阴谋惨案之真实内容,乃益大白于天下。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新四军为抗日部

队，北移乃遵令行动，乃竟遭围击聚歼之惨变，军纪何在？国法何存，盖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实已无置辩之余地。

当江南新四军惨被袭击歼灭之际，当局复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共二十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之新四军，所谓“一网打尽”之计划，固不仅限于江南一隅而已。同时，在西北方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者，亦有军队二十余万。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大概快要下手了吧！？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之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达到下述各项目的：

（一）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

（二）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

（三）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

（四）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

（五）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

（六）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

(七)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

(八)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

(九)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前面,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大多数军民同胞深知在此艰危时局中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置。

根据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 皖南事变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 紧急工作的指示

(1941年1月20日)

国际及国内均处在重大事变中：

在国际方面：两大帝国主义营垒间的战争在今春更将激烈起来，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日益接近，世界革命正在酝酿与成熟中，处在战争之外的苏联，力量更加强大，成为左右世界局面的因素。

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局已决心与共产党分裂，皖南事变与一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便是这个分裂的开端，到完全分裂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之长短是决定于国际国内的复杂条件的。这个分裂由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开始，对于蒋介石是很不利的，在人民看来，蒋介石这种干法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一切同情到了我们方面。在这个严重局势下，我八路军新四军必须进行下列的紧急工作：

(一)精神准备：立即根据中央指示及谈话在我军干部中，党员中，战士中进行解说工作，以作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立即在广大群众中掀起反对分裂的政治运动，以提高抗日反投降的情绪。要说明这次分裂与一九二七年分裂是不相同的，分裂后我们的困难是会增加的，然而国际与国内的条件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要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无出路、动摇等等情绪。

(二)巩固我军:巩固我党领导的五十万大军是决定今后胜利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我军各部必须用一切努力来巩固部队,争取时间,休息整理,补充缺额,清减非战斗的人员,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抗日反投降的情绪。注意对付敌探及奸细的活动,加紧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筹足给养及经费,节省弹药,努力扩兵运动。同时一切主力兵团应做到摆脱地方性,使主力兵团在必要时能有转移地区的自由,不致因地方性而转移困难,或移动中大批逃亡。在机动兵团中(即准备移动的部队中)尤应注意此点。

(三)坚持原地区。一部分主力兵团的可能移动,并非放弃原地区。因此要反对“一走了事”的观念。相反的,一部分主力兵团的可能移动,要求我们对原来地区进行一个新的工作布置,要求我们对原地区的坚持尽更大的努力。新的布置与新的努力包含军区军分区的健全与巩固,地方性部队之扩大与加强,改进其与地方居民的关系,使其真正成为血肉不可分离的整体,使地方性部队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反对日寇的侵略战争。同时加强对敌伪军及伪政权的工作;对地方居民,则应注意反对日寇斗争的长期性,不应只顾眼前,凡勉强群众做的事,凡减低群众抗日情绪的事,都应尽力避免。

(四)把握党的政策。在目前严重局势下,把握党的正确政策是有极端的重要性。与国民党的分裂并不等于取消统一战线政策,要反对“痛快干一下”,“这一下子可以恢复内战时代的一套办法了”等等错误认识。相反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抗战对民族的叛变,要求我们更加强的争取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友军对我同情,反对当局分裂的政策,这样才使我们不孤立,而使亲日派投降派孤立起来。一切“左”的陷自己孤立的错误举动应当避免与纠正。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政策的指示,仍是完全有效的。

(五)团结干部。在紧急危难的情况下,我军我党干部之团结是决定胜负的因素。要加强干部的政治认识,阶级立场与党性,要

反对一切不团结的现象,要在各种高级干部会议中,报告“中央关于项袁错误决定”,具体联系到部队的实际情况,要教育干部相信党,相信党中央。一切自以为是,轻视上级与漠视中央的观念都应纠正。要高级干部了解新四军之失败便是项袁错误的结果,要老干部好好向新干部进行解释,使其了解目前局势,消灭其间可能的对蒋介石的幻想,并稳定他们在我党领导下,随便说他们动摇是不妥当的。要号召全军全党干部在中央及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奋斗,这是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根据中央档案原复写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

(1941年1月24日)

全国人民公鉴：

据一月十七日中央社发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叶军长交付审判，群情痛愤，中外震骇。窃以两年以来，国事日非，倒行逆施之事，层见迭出，然未有过于此次者。此次新四军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实行北移，乃我军遵令移防之日，即当局聚歼计划实施之时，先则诱我入围，继则挥军环击，所有五十二师唐云山、一〇八师戎纪五、七十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十师詹忠言、新七师田钟毅、第十师王劲修等部七万余人之众，自一月六日至十三日继续八昼夜之久，使我不满万人之孤军，顿遭惨痛之消灭。对敌何怯？对我何勇？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者非耶？从此以后，发号施令者之全部阴谋已暴露无余矣。宣布忠勇抗日之新四军为叛变，则所谓非叛变者作何解释？且真正叛变者果何人耶？今日之事乃真叛变抗日，叛变团结，叛变民族利益，叛变三民主义，叛变孙中山，叛变大多数。全国人民必须速起注意，监视真正叛变者。四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为团结抗战之大局，耗尽心血，为抗御敌寇，撑持最艰苦之最前线。乃枪声发于后方，暗算施于俄顷，我忠勇之新四军将士被歼灭矣，我领导全军为国奋斗之叶军长被击伤，被交付审判矣。试问此鲜红之血，果因何而洒？为谁而流耶？朝有秦桧，岳飞不得不死，今之秦桧果何人耶？然而秦桧误矣！今日何日？乃民族必然复兴，汉奸必然歼灭，日寇必然打倒，帝国主义制度必然崩溃，三民主义必然

实行，世界革命必然胜利之日也。夺去一叶挺，必有千百叶挺以继其后，覆灭一万新四军战士，必有数百万数千万忠于民族国家之新战士以继其后，而一切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之徒，虽逞志于一时，必难逃于覆没，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此类是也。然秦桧辈之全部阴谋，今始见端，我民族之大难，方兴未已，朱彭叶项于佳电中所曾申述者，今已开其端矣。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乃秦桧辈之全盘计划。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猛力反共。国人慎勿谓今固犹未降日，须知翻手为云者覆手可以为雨，行见今之日寇，将被尊为太上皇，今之秦桧，则正准备为袍笏登场之儿皇帝。而其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之阴谋计划，则为所谓各个击破，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清除投降之道路，准备贝当之前途，固已肺肝如见矣。毅等今对此辈秦桧已无丝毫之要求，盖昔日之希望今已完全绝望矣。惟毅等认为叛变抗日者仅属若干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除此以外，例如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及一切不参加投降反共之人，仍须团结一致，坚持抗日。毅等完全相信，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日战争，无论经历何等艰难困苦，必须争取最后之胜利。惟望全国同胞，努力奋斗，坚持不懈，勿使无法无天之秦桧得行其志，则国事犹有可为。迫切陈词，诸祈共鉴。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刘少奇、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纵队长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管文蔚、叶飞、谭震林、罗炳辉、周骏鸣、戴季英、李先念、彭雪枫、张爱萍

同叩 敬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等关于皖南事变后 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1941年1月28日)

(一)延安军委已公开发表新四军领导人员,发表抨击重庆谈话,并代你们发表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宣言,你们都收到否?望广为散发。

(二)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但对实行三三制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中所述各项政策均不变,对统一战线原则均不变。

(三)对皖南失散力量,张、邓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

(四)对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即应布置游击战争,在皖西之桐城舒城潜山一带,张、邓负责加强游击纵队的力量,以便不久能向大别山前进,在鄂东之浠水黄梅一带,在豫西现时敌人进攻地区(敌已占领泌阳),由先念负责布置,雪枫应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以便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苏南方面望胡、陈速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

毛、朱、王

俭申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

(1941年1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如果在一月十七日以前争取蒋介石好转还有可能性,因而这个争取政策还是正确的,在一月十七日以后,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没有了,因而对于蒋介石的争取政策也就不正确了。)

(二)这次破裂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首领蒋介石发动的,我党维护团结的长期努力,特别是在去年十一月九日经过朱彭叶项发表佳电及一月初旬我们在皖南实行撤退新四军的步骤,被蒋介石以皖南聚歼计划及一·一七反动命令完全破坏了。蒋介石以皖南聚歼新四军及一·一七反动命令的步骤,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他使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而一切人民的同情都到了我们方面。因为蒋介石所取的反革命步骤,完全是背叛民族利益,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的,并且经过他自己的一·一七命令,向全国全世界充分暴露出来了。

(三)为了保卫民族利益抵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步骤起见,我党中央已经采取了自己的第一个必要的革命步骤,即于一月二十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命令及谈话,用以对抗一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革命命令及谈话。待蒋介石又采取其他步骤时,我党再行采取其他必要步骤以对抗之。

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新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四)蒋介石的阴谋计划是对于我们及人民抗日力量采取各个击破政策。他现在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的这种阴谋。必须指出他的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再消灭共产党，再消灭其他人民抗日力量的各个击破政策。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必须指出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发动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准备投降的重大步骤，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动蒋介石执行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是西安事变以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

(五)蒋介石发动的利于日寇不利于抗日的国内破裂，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日蒋尚未公开妥协，英美不愿中国内战，苏联不愿中国分裂，我党力量的存在，人民的反对，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等)，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

(六)但所谓破裂是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全体人民之间的破裂。在全体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破裂的，国民党中一切真心抗日的人也是不愿意破裂的；因此，我们的尖锐对抗政策，只是对付发动此次破裂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对付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表们，而不是对付其他阶层。对于以

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则仍是以联合为主的政策,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动摇性,则实行善意的批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七)因此,必须使全党明了,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立场并未改变,对于实行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与抗战建国纲领必须强调。中央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指示中关于各项政策的指示,依然有效,并且在长时间中都是有效的。

(八)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他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则指名反对之。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一七反动命令及谈话,则公开的尖锐的反驳之。但对于日蒋间的矛盾,即使是很小,亦须加以利用。

(九)对于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必须对国民党国民政府提出下列十二条要求: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十)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为此目的，我党必须赞助实行总理遗嘱主张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与非国民党员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必须赞助各个代表中间阶层主张抗日民主的其他党派，必须赞助其他主张抗日与民主的任何政治组织、军事组织、文化组织与经济组织；必须极力巩固与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争取一切尚能抗日与不赞成反共的中国军队及其军官，而对于坚决反共不惜内战的反动军队则取消不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改变为适当的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极力争取日军士兵及下级官长，争取一切可能叛变的伪军，以瓦解这些军队。我们经过上述这些努力，并待国际条件发生变动时，就可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实现新的时局好转，这就是我们今后的政治方向。实现这个新的政治方向。在一切国际国内的必要条件发生变动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

(1941年2月7日毛泽东致周恩来)

恩来同志：

(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

(二)汤集团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四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亳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系是一大打击，估计莫德宏部将来亦有西撤退可能。范汉杰军已从中条山南调，如洛阳危急，他军亦非渡河不可，原定庞炳勋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军已星夜东调，第八师从正宁撤邠州，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

(三)蒋介石原知敌人一、二、三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罢，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太平了。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到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卅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

纷,而是靠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共共产党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四)在外边宣传时请将佳电中“肺腑之言”那一段(从“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蜂起之时”起至“深愿为两公一吐者”止,共百〇二个字)着重指出,使国民党及中间派想一想,目前发生在国共间、中日间的危险状况,我们实不幸而言中,他们一定要“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所以造成了“我为鹬蚌,故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的结果。

(五)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此种估计是否适当,你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

虞酉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 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指示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①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进攻,某君^②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

^① 原件无年、月,是根据内容及电报抄件时间判定的。

^② 指崔可夫。

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国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①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① 指崔可夫。

毛泽东

寒辰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1941年2月15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钧鉴：

关于政府对新四军之处置，我党中央曾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

- (一)制止挑衅；
- (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
- (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
-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 (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 (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 (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 (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 (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函达，敬希鉴察。

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根据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 军事方针的指示

(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
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等)

彭左、刘邓、贺关、聂彭、吕程、朱瑞、陈罗、陈胡^①：

(一)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

(二)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三)八路军尤应利用蒋差别对待政策(新四问题不牵涉八路)，除中下级可以声援新四外，总部应取沉默态度(此种态度一方表示留余地，一方亦是示威)，军事上则取防御姿态。

(四)新四已无合法地位，本来可以大闹，但为不使日蒋矛盾缩小，相反使之扩大，故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

(五)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准备愈快愈好，以防万一，实行愈迟愈好，以便配合国际国内的

^① 姓名全称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陈光、罗荣桓、陈毅、胡服。

最有利条件,因此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六)因此在目前只有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才是适合上述要求的。战略的军事攻势只在必要条件成熟时才是正确的。所谓必要条件,第一是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并且投降(他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第二是国际最有利时机的到来。只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我们才有主动权,否则我们将陷于政治上军事上的被动地位。这种主动权我们必须拿在自己的手中。

(七)请你们根据上述方针部署军事,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

毛、朱、王、叶

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1941年5月9日)

彭左,陈刘赖,贺关,荣臻,萧克,吕程,刘邓,任穷,朱陈罗,黎罗,粟刘,克诚,张邓,雪枫,先念,震林^①:

(一)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

① 彭左,指彭德怀、左权,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刘,指刘少奇。赖,指赖传珠(一九一〇——一九六五),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当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吕,指吕正操,一九〇五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程,指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穷,指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朱,指朱瑞,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黎,指黎玉(一九〇六——一九八六),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罗,指罗舜初(一九一二——一九八一),福建上杭人,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粟,指粟裕(一九〇七——一九八四),湖南会同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刘,指刘炎(一九〇五——一九四六),湖南桃源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委员兼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邓,指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震林,即谭震林(一九〇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二)判断经此战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苏联援华不变,近到飞机百余架,炮二百门,中苏关系亦有改善可能。汤恩伯,胡宗南^①均准备对敌。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

(三)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②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在战事发生时,应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

(四)中央已电恩来同志,对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提出(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餉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等项。

(五)我八路、新四两军望按上述方针沉着地部署一切。

毛、朱、王、叶^③

佳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录自《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 ① 汤恩伯、胡宗南,当时分别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② 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指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于,指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高,指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八军军长。
 ③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①

(1941年5月25日)

(一)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二)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三)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四)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②,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

^①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② 晋南战役,即中条山战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本侵略军以约十万人的兵力进犯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十五六万人。这些国民党军队,本来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军缺乏作战准备,在日军进犯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主动出击,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给国民党军队以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仍然全部溃败,在三周之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

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在华使命(节录)

崔可夫

皖南事变

上面所说的目的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我国驻兰州领事焦虑地注视蒋介石军队在特区周围调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在1940年秋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关系极端恶化了。如后来所知,国民党准备进攻共产党的新四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成立了以胡宗南将军为头子的特种兵团对付特区。胡宗南是蒋介石忠实而可靠的走卒。这个兵团得到优良武器和装备的保障。

在莫斯科研究中国局势的时候没有看到这样的材料。武官处以及我们驻重庆的军事顾问都不了解这些。

为了更好地弄清情况,我设法预先会见了中国共产党驻重庆蒋介石大本营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有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

周恩来和叶剑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蒋介石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按照他们的说法,共产党领导的不只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且还有活跃在日本占领区的大量游击队。但是,当我问到他们军队的活动情况时,他们只限于抱怨蒋介石,抱怨军队物质生活艰苦,特别是抱怨军队的装备差。

从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对蒋介石不信任和愤怒。对我提到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怎么样这个问题,无论周恩来还是叶剑英都未作任何明确回答。从同他们的谈话中我感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这时已产生了严重裂痕。

当然，蒋介石了解并且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因此，他企图不失时机地削弱它，消除它在全国的影响。利用自己是中国全体抗日武装力量大元帅和最高统帅的权力，蒋介石千方百计使共产党军队处于日本人的打击之下或者交给它明显力不胜任的任务，与此同时不给予任何支援。这些行动归根到底是为了先削弱，后取消共产党的武装。

这时还感到，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以毛泽东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们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认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国民党及其军队。他们之间进行着尽管是暗中的，然而却是激烈的斗争。许多人对此都很了解。

1941年初，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激化到如此地步，以致蒋介石军队采取武力进攻共产党的新四军。这支军队的一部分被击溃。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1月初，在我抵达中国之后的头几天。据悉，事变的进程如下。

在我到达中国以后不久得到情报，说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和周恩来就关于部署新四军一事进行过非常严肃的谈判。这时，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做好对共产党军队进行挑衅的军事准备。他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服从他的命令。蒋介石说，中国共产党“近年来表现不好，转移到其他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未经允许便扩大自己的军队，组织游击队，在中央政府军周围集结军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断然提出要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北岸。蒋介石威胁说，否则，在最近将进攻共产党军队并将其分别消灭。“你们将不是败于敌人，而将败于我军手下，”蒋介石对周恩来说。最后他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军队必须在他指定的地点集中，把军队人数限制在八万，并保证说，那时，国防部长何应钦将执行他向共产党提供弹药和资金的命令。与此同时，蒋介石故作姿态，表示似乎他想要避免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但此时此刻，冲突已在许多地区发生，对新四军的重点打击

已经准备就绪。

歼灭新四军教导团的命令是国防部长何应钦，而不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一旦需要，蒋介石可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借口说是他的将领们擅自采取的“预防性”行动。

从1940年春天起，李宗仁将军指挥的政府军就多次袭击新四军，把新四军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赶走。蒋介石司令部对我们的军事顾问精心隐瞒这一情况。

1940年10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对新四军在南京、上海和杭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表示不满。军委会指出，这将破坏国共均势并且和最高统帅蒋介石关于部署军队的指令背道而驰。所提要求极其奇怪，在旁观者看来是完全荒谬的。谈到日本占领下的领土。新四军赶走了日本人，把家乡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而忽然要瓜分还没有从敌人手中解放的领土。

这点很容易解释。蒋介石担心共产党军队在华中^①、在工业中心站住脚跟并获得优势。解释容易，理解却很难。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蒋介石对共产党影响增长的担忧超过了组织抗日。

为了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确切地说是蒋介石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需要时间，需要熟练的军事转移。但还是按照和军事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新四军开始转移到长江北岸。

12月份，蒋介石再次会晤周恩来，向他表示不满，说共产党军队转移的行动迟缓。谈话的调子非常生硬。蒋介石以独裁者，以局势的主宰者自居。他不是说服，更不是请求，而是要求共产党绝对执行他的所有命令。蒋介石宣称，中国的权力属于他，而他打算和任何人分享这一权力。

周恩来回答时要求蒋介石保证不利用共产党军队转移的形势来从背后捅刀。蒋介石再次要共产党的这位代表相信，他不想消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灭共产党并且主张两党紧密合作。蒋介石的指责归结如下：共产党越过了预先商定的地域，扩大自己的影响，分裂国家，扩大军队，占据对中央政府军构成威胁的地盘。蒋介石再次要求共产党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北。周恩来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问题早已决定了。1940年12月19日，重庆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签署了消灭新四军的命令。

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将军以十二个师的兵力进攻只有九千人的新四军。突然袭击使政府军的任务变得容易了。他们消灭了教导团，俘虏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和许多高级指挥员。叶挺的副手项英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后被国民党分子凶残地杀害。蒋介石发布了解散新四军的命令。

无疑，正如在重庆人们所称呼的那样，这次皖南事变，确切些说，这次背叛袭击的目的是摧毁新四军的革命精神和全面打击共产党的地位。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发生的这一冲突事件使联合抗击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化为乌有。蒋介石军队在力量上比分散的新四军占优势，利用有利时机进攻和击溃了叶挺将军的教导团。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要用事实或文件来进一步证实。最初，我们的军事顾问既没有这样的事实，也没有这样的文件。中国将军们随意欺骗他们。要十分谨慎，十分仔细地进行研究，才不致于在自己的行动上发生差错。

1941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十二条要求^①》。但是，在蒋介石于3月6日在中国国民参政会议上发表

① 这里指的是1941年1月22日毛泽东同志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就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十二条要求（见《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733页），其中包括“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等。——译者注

演说^①之前,共产党方面没有得到对《十二条要求》的答复。

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表现在政治攻势上,同时双方都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从国民党方面来说,这表现在镇压共产党及其组织:取消驻广西省的八路军办事处,迫害那里的左派组织;封闭左派出版社《新生》出版社;在第六战区逮捕青年;挑衅性地诽谤和攻击重庆《新华日报》;捣毁和封闭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和迫害重庆、西安、成都等城市的左派人士;加强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组织的警察监视。

作为回答,共产党通过散发传单,公布所发生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反动事实。在重庆近郊多次召开反对迫害《新华日报》和左派团体的抗议集会。

然而,没有组织广泛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其原因是,共产党预先从重庆撤出了左派团体的代表人物,因此在需要出面和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表示抗议的时刻,实际上没有人来做这件事。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方面起初参加谈判的是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将军。后来,他不再参加谈判了,实际上,全部谈判都是周恩来和第二流人物,并且警察味道很浓的张冲进行的。这样,蒋介石便在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宣称,无论他本人还是政府,都对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毫无所知。

国民党政府军1月份的围剿没有能够消灭新四军,只是使它遭到惨重损失。但是,由于《新四军事件》,蒋介石的损失也并不多。他的军队受挫不小。全国进步舆论看到,由于蒋介石及其将领们策划的挑衅行径,中国再次处于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政治危机的边缘。国民党有影响的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和其他许多人士

① 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大谈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容许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必须按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译者注

对蒋介石采取的行动提出公开抗议。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中的自由派人士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①。该同盟制定的纲领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政策。

该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了。但是，这必须要十分小心谨慎，免得被视为干涉盟国的内政。

我这时还不是军事顾问。而武官的任何谈话都是政府申明的立场。没有大使潘友新的批准，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如何做才能防止扩大中的冲突和使蒋介石转而抗日——对此，我们和潘友新考虑了很久。

局势并不简单。我们对蒋介石政府有条约义务，而我们内心的同情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但是，如果我们公开讲出这种同情，就会使蒋介石疏远我们。我不怀疑，蒋介石肯定知道我们同情共产党，但既然还没有在外表上表现出来，他由于渴望苏联的军事援助，也就将忍就忍了。同时，如果我们公开宣布支持共产党，那么，蒋介石在他的西方庇护者和他的国民党同僚们的压力下可能再次使我们的关系产生麻烦，而这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剩下的只有一个办法：让蒋介石知道，他进犯共产党、调转枪口对准人民，而不是侵略者，这可能影响苏联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根据情况，有必要暂缓对蒋介石作外交姿态，而通过他最亲密的助手向他施加影响。

按惯例，我首次礼节性拜会的是国防部长何应钦，他也是中国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长和剿灭新四军命令的签署者。在蒋介石周围的军阀中，何应钦以通晓军事、杰出的才干和足智多谋出类拔萃。他的政治立场是极右的：狂热的反共分子，中国一切革命变革的反对者，有利于封建官僚和大企业家的军事独裁的拥护者。同时，他又想进一步从苏联获得军事援助。他企图智胜苏联外交官，而同

^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7年，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译者注

时试探同日本侵略者勾搭的可能性。他认为,日本军队占领中国领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日本正陷人与大国的冲突,将被迫撤出中国或者投入大战之后和中国军事上层当局达成妥协。

我们一见如故,宛如老朋友。何将军笑容可掬。嘴角上挂着奸诈。我也故作友善,满面春风,装出言听计从的样子,只是偶尔提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表示认真。

何应钦一开始就对苏联政府、苏联人民、铁木辛哥元帅等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予军火援助,感谢派来了军事顾问,感谢顾问们的工作。他对苏联军事顾问极尽奉承之能事,把他们的知识、才干和他们对军事战役的帮助吹得天花乱坠,但就是对我们苏联军事顾问拟制的作战方案一个也不提。这些方案中国司令部不是没有彻底执行,就是束之高阁。

我耐着性子等他把一连串的奉承之词说完,然后问道:是否在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何应钦立即要我放心,苏联提供的任何一种武器都没有用来对付新四军。这样,我便从一个要员之口得到了证实:战斗是发生了。他的证词使我得以借题发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题目。于是,我赶紧提了第二个问题:对这些交战,我该怎样向莫斯科报告?答案显然是预先备就的:就此蒋介石已经和周恩来谈过;重庆军事委员会从十月份起就对新四军军部提出过警告。何将军在编造这席鬼话时所表现的厚颜无耻,简直令我怒火中烧。他煞有介事,满脸堆笑,说,因为新四军和新四军军长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最高统帅决定只好严惩不贷。何应钦的这一回答证实了剿灭新四军教导团的命令出自蒋介石。

的确,我很难说,何将军对皖南事变作这样的解释为的是什么。如果说他想要厕身于蒋介石之后,那这刚好又帮了蒋介石的倒忙。

“假定是这样”,我回答他说,“假定新四军军部执行命令怠慢,

由于这样那样军事上的原因没有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司令部通常采取什么作法呢？它可以免去军长的职务，把他交付法庭或者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不应该向自己的军队开战，不应该向普通军官和士兵开战，他们对指挥部的错误无论如何是没有责任的。现在，正在和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

对于这个问题，何应钦只能支吾搪塞、闪烁其词而已。他又开始向我保证，中国政府不愿重开内战，目前的事态只是暂时的困难，竭力表示对苏联友好……

第二天，我拜会了参谋副总长白崇禧将军。这位将军的权势决不限于他的军职。他是投靠了蒋介石的广西军阀集团的头子，当然，也是中国反共分子的急先锋。拜会是纯礼节性的，无论我还是白崇禧都没有什么正式的意见要陈述。谈话又以对苏联提供军火援助表示感谢开始，但不是象何应钦将军那样令人作呕地甜言蜜语。白崇禧更比较严厉、粗鲁、直率。他首先谈起新四军事件并且摊开地图，证明新四军如何罪有应得。这种姿态说明我对何应钦提的问题起了作用，所以要急于在我面前替自己辩白。可见，他们慌神了，因为他们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要寻求走出他们自己陷入的死胡同的可能才是。

这种情况丝毫不允许放松警惕。我没有看地图并且说，在中国我是个新人，还没有深入了解情况，没有研究前线兵力的部署，因此不能判断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任何一项命令的合理性，但是，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任何的武装冲突都是咄咄怪事。我告诉他，我将不得不把政府军蓄意进攻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得不坏的新四军一事详细通报给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

在和重庆政府级别不那么高的其他军职人员的会晤和谈话中，我都重复同样的内容——内战只是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这

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不抗击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而开始相互残杀。我经常发现,在这些会晤和谈话中我的所有意见都被立即报告给了高级将领,想必,也报告给了蒋介石。我对重庆政府的文职官员更加小心谨慎,没有向他们提出关于进攻新四军的问题,但是也向他们表达这样的意思,即只有人民的团结加上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制止侵略。当我在军界人士中间活动的时候,潘友新对文职部长们做了大量工作。立法院院长、孙逸仙的儿子孙科仓卒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相信,1941年一开始就对中国非常有利。由于有了苏联的武器援助,得以稳定前线,加强军队并准备发动新的战役攻势。孙科向我们保证说,中国将和侵略者战斗到彻底胜利为止。

通过我们的礼节性拜会和谈话,蒋介石了解到,他对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敌对行动并非没有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①。同时,中国国内对这些行动的抗议也在高涨。

我了解到,蒋介石的行动在军官中间也得不到支持。在采取了上述外交行动以后,剩下的只是要摸清蒋介石是否要进一步恶化同共产党的冲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蒋介石将同日本侵略者勾结还是继续抗战这样一个大问题。

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议上发表演说,答复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要求》。他措辞严厉,把共产党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②说成是敌对行动。他认为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要求(再成立一

① 苏联曾正式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发动内战。苏联报纸坚决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的新四军事件。潘友新于1941年1月25日拜会了蒋介石,向他表示,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势力。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大使提请他注意,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原注

② 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参政员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国民党必须接受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否则不出席会议。蒋介石拒绝了要求,为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共产党参政员未出席会议。——译者注

支新军,承认敌后特区,释放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发还枪支等等)是不能接受的。他说,如果接受了这些要求就等于承认卖国贼汪精卫的傀儡组织。蒋介石指责八路军有违法行为,指责它不抗日。他毫不掩饰地暗示,最近几年国民党政府集中重兵以制止八路军的的活动是迫不得已。最后,蒋介石否认共产党关于中央政府正在组织围剿中共军队的声明。他呼吁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人回心转意,在中共中央 1937 年宣言的基础上和政府合作抗日。同时他又指出,国民党政府将利用它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求得它的全部命令得到执行。

作为回答,共产党参政员写信给国民参政会议,列举了迫害中共的事实。信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主张联合,但是,在两党关系没有按照她所提出的条件得到解决之前,共产党不能参加国民参政会。这样,共产党继续坚持要国民党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国民参政会议以没有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而告终。

上述事件在全国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方面的让步可以推动这一反响。但是,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全国都没有组织公开的群众性抗议运动,以便向蒋介石显示广大阶层对国民党推行的反动政策的不满。

1941 年 3 月以前国民党政府实际上采取了两大行动来反对共产党。

在特区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心省份附近集结大量军队,制造皖南事变,破坏左派团体——所有这些使得国民党上层进一步恶化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使它更加热衷于要一举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和消除她的影响。

局势是严峻的。皖南事变至少表明,国民党政府作了各个击破共产党军队的实际准备。

然而,在和日本作战的情况下,蒋介石还不能公开破坏统一战线和公开发动反共内战。第一,这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意味着大大

恶化同苏联的关系；第二，国内整个社会政治局势不允许这样做。战争引起的、政府又无力克服而加深了的经济困难沉重地压在人民群众的肩上。因此，各阶层人民对当局都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又因地方政权的专横跋扈、贪污行贿和营私舞弊而与日俱增。还有，警察横行和政治迫害，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进部分反对政府。

在业已形成的局势下，蒋介石又害怕发动内战，因为这不仅会导致中国国际地位的恶化，而且会导致巨大的内部爆炸。

我想，这些天是重庆政府决策的关键时日。不久，我们就感到，蒋介石暂时没有去进一步加剧同共产党的斗争。

对时局的分析

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尽管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终究只是我在重庆碰到的许多难题中的一个。要求我仔细分析战局，中日两国武装力量的对比，经济、财政以及其他情况。除了国内问题以外，我还要关心与中国对外政策有关的各种国际问题。上述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有一连串的其他问题。例如，为了摸清中国军队的状况以及中国军队采取主动战斗行动的可能性，就不能忽视蒋介石同各个军阀集团的相互关系和各个军阀集团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但我经常关注的是两个问题：蒋介石对抗日问题的态度和日本在1941年的作战计划。

中国的全部军事组织统归蒋介石领导。他宣布自己是中国的最高统帅，而我们苏联顾问见到他时称他元帅，中国人则称他为委员长。对军队的指挥通过以何应钦为首的参谋总部来实施，他同时兼任国防部长。

1941年，在蒋介石指挥下的有290个步兵师和14个骑兵师，22个炮兵团，6个迫击炮团以及其他各种部队。军队总人数为385万6千人。按人数，日军师几乎超过中国师一倍。而中国的

某些军和师是只有番号的空架子。

1938年年底，颁布了普遍征兵法。根据这项法律，建立了省、师和团级的征兵区。根据这项法律，凡年满18岁到35岁的男子均在应召之列。

在所有战区都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仅有几个苏联记者，只有征得蒋介石本人的同意，才能放他们到那里去。我不只一次地请求蒋介石允许我国的飞机飞往特区，或运药品，或送毕业于我国军事院校的八路军指挥员、或送记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蒋介石没有拒绝过这样的请求，但总是流露出不满之意。

从国外购买的或从国外的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他把由共产党管辖和领导的军队视为争权斗争的劲旅，因此在分配所得到的武器时，当然，什么也没有给他们。我作为武官自然不能干涉中国军队的武器分配。

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但缴获的武器不够用，况且共产党的军队数量在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为军队筹集经费和武器以及筹集行政政治机关的给养费。中共和八路军的侦察机关跟踪侦察，例如，他们侦察到国民党按照某些路线把钱和武器运到他们的军队驻地之后就由中共的特工队设法夺取这些钱和武器。许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们对此束手无策。

在根据我国顾问所拥有的材料研究中国军队时，我发现，国民党部队的配备、战斗素质及士气都非常低。大多数士兵是为混碗饭吃、混几个铜板花。

每个国民党士兵平均月饷12元，一天可吃到差不多一斤米饭。但是，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士兵们任何时候都享受不到足标准的物质给养，或者被偷光，或者因运输困难，粮食缺乏而减少口粮。他们全凭自己养活自己。例如，不时看到这样的场面：一群

士兵在水田里捉小鱼和蛇,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他们极差的伙食。低水平的卫生条件,经常挨饿导致疾病和大量死亡,士兵有气无力,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淡然处之。例如在102步兵师,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患了疟疾。在给蒋介石的一份报告中供认:“部队的伙食很差,穿得也不好,军队部署经常不是出于战略需要,而是出于给养条件。士兵们忙于搬运稻米,到工厂干粗活,而不是从事军事训练”。

除了极差的物质保障外,士兵还受军官和下级指挥员的粗暴对待,经常遭体罚,伤员受虐待。士兵稍有过失,便遭棍棒毒打。吃苦耐劳、忍饥挨饿、行军的折磨、军官的粗暴态度,有时甚至是惨无人道的虐待——中国士兵这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精神只能令人吃惊。营以下的军官物质生活也得不到保障,穿得不好,四天左右不与家人见面,生活极端贫寒。

经常发生对国民党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事件。因此,以清洗“不良分子”为借口进行逮捕成了家常便饭。

国民党军队里营私舞弊盛行,侵吞公款成风。团长和师长根据花名册领取军饷,而花名册同部队和连队的实际人数相距甚远。他们甚至利用安葬发财。埋葬一个死去的或者阵亡的士兵上级要发相应的丧葬费,例如,买一口棺材要用十元左右。军官们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不立即把死者埋掉,而待有了十至十五个死人的时候集体埋葬。这样,军官领取购买十至十五口棺材的钱,而花去的只是一口棺材的费用。这口棺材的底又是活动的。把每一具尸体单独运到公墓,抽出棺材底板,尸体便掉进墓穴。空棺材又被运回去装下一个死人,只有最后一具尸体才和棺材一起安放到墓穴里去。就这样,军官们既勒索棺材钱,又顺便克扣死者的抚恤金,并且把死人继续当活人充数。

蒋介石和军阀们的关系远不是和谐的。军阀们形式上把自己的军队列入中国武装部队之列,归蒋介石统一指挥,但他们决不急

于把自己的军队派往前线去和日本侵略军作战。象典型的军阀阎锡山将军这样的战区司令，只是形式上承认中央政府的管辖，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没有执行过蒋介石的任何一次命令。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官是为了阻止他倒向日本人，并且指派他从北面和东面封锁特区，正式把朱德领导的八路军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在西北，封锁特区的马步芳兄弟的军阀部队甚至不服从蒋介石，而紧紧抓住他们所控制的地区不放，靠盘剥老百姓来养肥自己。云南省省长龙云将军居然能从美国和英国为中央政府提供的资产中提取税收。

一切都说明，许多军阀的师团表面上归属中央政府，没有任何作战价值。

中国人幸运的是，南方冬天不冷，因此不需棉衣和大造房屋。这减少了军队的开支。包括连长在内的军官也只是光脚穿便鞋。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连队在行军时，队伍的前面用轿子抬着军官，他们在行军途中可以在轿子里睡觉。走在队伍后面的是行军医院，用担架抬着伤员。许多士兵患痢疾。从我有机会参加的训练以及从士兵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来看，可以发现，军队有相当好的纪律、军风纪，并且吃苦耐劳。至于军事训练，那末，重点放在要人们机械执行荒谬的命令上。

对日本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中国军队的训练是不够的，并且缺少装备。中国军队可以打局部性的进攻战，这也要经过长期认真的训练才行。本可以顺利攻击包括师团在内的孤立无援的日本驻防部队，但交通闭塞和缺乏运输工具非常妨碍部队的机动。利用山峦起伏的有利地形，中国军队可以成功地进行积极的防御战。对积极防御来说，装备和兵力是够用的。这在后来日本军队于1941年发动攻势的时候得到了证明。

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分歧不能不影响它们军队的协同作战。大部分国民党将领和军官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急于和共产党

军队配合作战。

由于我没有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保持经常性联系,我只能根据国民党的反应和在重庆的周恩来的活动来判断毛泽东的政策。但周恩来及其周围的人都守口如瓶。

蒋介石及其亲信对“反共(产国际)协定”^①坚信无疑。他们认为德国和日本进攻苏联只是个时间问题。在他们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减轻对中国的压力,这将使他们放手去对付共产党。我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对将加深。

重庆是中国的临时首都,位于多山的长江左岸,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在这里,长江谷地四周环山,通向市内的道路不多,根本就没有桥梁。最使我吃惊的是甚至市中心到处都是垃圾和老鼠。大白天在街上行走就能看到成群的老鼠从你脚下窜来窜去。猫狗对它们都无能为力。在主要大街两旁多少有些三到五层的现代楼房,而与其相邻的则是些破旧的房屋,中国人就在这样的陋室里生活、劳动和做生意。没有电车,汽车也很少,且都是来自各国的杂牌车。对大部分劳动人民来说,基本的交通工具是自己的两条腿。高官显贵乘坐汽车,但不是到处都能行驶,因为许多街道是小巷相连,即使人力车也过不去。因此,除了汽车和人力车以外,只有一种运输工具——坐轿子。

在城里和郊区都没有什么大工厂,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工或手工机械产品。重庆的全部动力由一个功率不大的电站提供。这个电站勉强能够维持市区照明和自来水的供应。

工人及下等职员的平均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以致在机关工作的职员下班回家后就要换上衣服,拉车或抬轿,当车夫或搬运

① 德国和日本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口号下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的条约,1937年,意大利加入这一协定,1939—1940年发展成为德意日三国公开的军事同盟。——原注

工，侍候富人。

蒋介石道貌岸然，他下令关闭了妓院和其他娱乐场所。表面上关闭了，但却代之以许多地下妓院。

蒋介石明令对吸鸦片者处以死刑，但在街上大烟鬼随处可见，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街上到处都是伸手要钱的乞丐、麻风病人和残废人。

1940—1941年，日本飞机频繁轰炸重庆，但总宣称轰炸的是军事目标。可1941—1942年我在中国期间，中国的国防部和参谋总部一次也没有挨过炸。我不认为，日本人会把这些机关视为非军事目标。这里是另有奥妙。

日本的轰炸严重地影响到重庆市民的生活。每一次轰炸居民都遭到物质损失——房屋被炸塌，私人财产被炸毁。受害最深的是贫民和中等阶层。富有者早把自己的贵重物品转移到郊区。轰炸使人们的情绪沮丧。每当空袭的时候，几乎全体工人和职员都躲进大防空洞里去，而达官贵人则乘车逃往市郊。城里停止了一切生机，发电站停工，自来水关闭。

轰炸之后，特别是供电设备被破坏之后，市民的艰难时日就来了，没有灯，也没有水。搬运工人这时倒有事干了。他们用扁担挑两只桶到长江里打水。长江水也变得红黄浑浊了，水上漂着动物、有时是人的尸体。无疑，这样的水不经净化和煮沸是不能食用的。应当煮沸，可用什么来煮沸呢？到那里去搞燃料？这些难题摆在每个家庭面前。

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市区，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昼夜不停地轰炸。大多数防空洞都没有通风设备，没有灯和凳子。人们数小时站着不动而没有坐下的可能。日本飞机1941年6月5日的夜袭造成了令人发指的大量死亡。这天晚上，五千多人挤进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一个隧道防空洞里。洞里既无通风设备也无照明。空袭警报持续了四个小时左右。很快人们就感到空气不足，呼吸

困难。他们试图出去透透空气,但被守在洞口的值勤警察挡住了。当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出来时,警察却把门锁上,溜之大吉了。结果,洞里所有的人都窒息而死。6月5日的大惨案引起市民们极大的愤慨。蒋介石只限于发布个作弄人的命令,撤掉了负责防空的重庆市卫戍司令刘峙和重庆市市长的职,但仍然让他们担任公职。

长期的战争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当局胡作非为和无力解决现存问题引起强烈不满。

国内总的形势不能不反映到军队中来。军人家庭生活的极端困难是士兵经常思虑和谈论的主题。

1941年,在中国军队的中下层开始出现厌战情绪,对胜利失去了信心,不相信总司令部有能力把战争引向最后胜利。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基于国民党统治集团选择的消极抗战策略。整个国家也好,军队也好,物质状况都糟糕透顶。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相反,日本军队取得的重大进展动摇了中国的军心。士气瓦解的征兆层出不穷,经常发生开小差、偷窃和倒卖子弹等类似事件。

但是,尽管产生厌战情绪,部分士兵和军官失去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尽管由于前方和后方严重的物质状况令人悲观失望,但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仍然没有破坏。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没有发生大量的倒戈、士兵反对军官、拒绝打仗等事件,甚至那些物质生活极端困难和对总司令部果断结束战争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中级军官还继续主张用坚决措施来结束战争,即转入反攻,同坚持防御战术的将军们大相径庭。

(录自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
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六、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在 新疆的统战工作

新苏临时通商协定

(1931年10月1日)

迺启者：查中华民国之新疆省与苏联共和国，彼此领土接近，在历史上已有经济发展之关系；又查双方政府屡次表示愿意共同发展新、苏间商业，因此新疆省政府与苏联政府，在中华民国与苏联正式通商条约未成立以前，协定如下：

一、新疆省与苏联共和国货物出入及人民往来之边卡，依照中国及苏联现行法律，将来由依尔克斯塘（或土耳其特）、霍尔果斯、巴克图及吉木乃（迈科布且且盖）经过之。

二、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准予新疆商民不必经特别许可之手续，有权将新疆各种土货无限制运入苏联，售与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但为苏联现行法律所禁止入口之货，不在此限。

三、新疆省政府对于苏联商务机关及其国民在喀什、伊犁、塔城、阿山、迪化各区，准予自由执行交易之权，并由上述各区内派遣代理人或委员前往莎车、吐鲁番、焉耆、和阗、阿克苏与该本地商民或商号订立买卖契约及督促其履行之权。

新疆省政府为苏联买卖事业趋于轨道起见，允许苏联商务机关之职员及其国民遵守新疆现行法律或规则，对于各代理人与各商务机关所在地彼此来往之间，得有自由往返通行之权。

四、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关于苏联商务机关及其国民与新疆商民或商号订立买卖合同及契约之时，允予彼此间自由商订买卖货价、转运及契约期限各条件，并依照中国现行法律上公证之程序时，所订之买卖合同到官厅内登记。新疆省政府声明，合同登

记程序之日期,依照新疆现行惯例,不得越过五天。新疆省政府证明,新疆本管地方官厅,于双方发生争论之时,定能先行调查双方所订之合同或契约,依照中国现行法律、公平履行双方所订之契约。

五、新疆省政府允许苏联商务机关及其人民,无论现在或将来,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所完纳之关税及其税款,比之中国及商号,不能有较高或加重情事。如将来新疆依据现行法律施行营业税及其他类似营业税性质之税捐时,所有在新疆之苏联商务机关其人民,自应与中国商民及商号一律完纳。

六、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为重视新疆国民经济利益起见,所有关于发展新疆应用各种机器,如工业、电气、农业、交通等项全部购造之各机,将来依照商业合同性质,完全供给之,并以同样性质之合同,担任新疆建设上应用之相当技师,及由中国人民内选就专门人员。

苏联政府并以同样性质之合同,对于新疆国民经济上施行改良农业、垦牧各事宜,仍乞予以相当协助。

七、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为重视新疆国民经济利益起见,对于新疆商民将中国内地出产各货运入新疆,或将新疆出产各货运往中国内地,允准按附单内所列之各货,通过苏联国境。此项附单,将来由新疆省政府之特派员会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以发达新苏间商业为基础,在本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会同商订之。该项附单,得按照新疆及苏联国民经济必要之情形,每年商订改定之。

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将来对于新疆省政府转运自己必需之订购物件,并非含有买卖性质在内,请求由苏联国境通过,无论由中国内地运入新疆,或由新疆运往中国内地,或由与苏联订有商约及将来缔结商约之第三国运入新疆时,以极友好之态度,准予查照办理。

新疆省政府接准苏联政府函称:如所运通过苏联国境之货为

现在法律所禁止者，苏联政府对于新疆之请求，当然不便查照办理一节，业已查照备案。所有以上规定各节，纯为发展新苏间双方经济关系，新疆省政府认为同意发生效力。特此布达。顺颂公绥

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一日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月一日 于迪化

附件第一号

迳启者：新疆省政府为谋新、苏间商业发展起见，通令新疆税关对于新、苏间沿边出口、入口各货规定划一税则，以期双方商务共同发展，为此函达苏联政府查照，即希鉴核，赐复。

并颂

公绥

附件第二号

迳启者：为谋苏联共和国与新疆省商业方便起见，拟在迪化、喀什、伊宁、塔城设立苏联财政所，办理苏联各商务机关内彼此买卖上、财政上，或与中国商号商民之往来事宜，其中国商号商民如向该财政所有商业委托时，亦兼办之。在执行上项事务时，该财政所根据双方之情愿，得抽收相当之手续费。相应函请贵特派员查照，并希新疆省政府对于上述各节表示赞同。特此布达，顺颂

公绥

附件第三号

迳启者：苏联政府为运输货物及人民往来方便起见，希望新疆省政府核准与开放土尔尕特边卡六个月后，即行封锁依尔克斯塘卡，以便已经起运由依尔克斯塘入境尚在途中之货得以达到目的地为止。相应函请贵特派员查照，并希新疆省政府对于上述各节表示赞同。特此布达，顺颂

公绥

附件第四号

迳启者：新疆省政府认为新、苏间之电报有规定之必要，因此塔城与苇塔(巴克图)之电线必须衔接，同时新疆与苏联之无线亦须规定直接通讯办法。其实行以上各节之手续及条件，将来由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会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共同商订之。为此函请贵总领事查照，并希苏联政府对于上述各节表示赞同。专此布达。顺颂

公绥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致 外交部驻新特派员陈继善

(1933年3月21日)

……贵特派员本年三月十八日公函，关于购买苏联军事机关之军品一案，敝总领事业已敬悉。查新苏协定特别附件内规定苏联政府以亲密友谊允许接受新疆省政府之请求购买苏联军事机关所制造之各种军用品，根据此项原则，本国政府业已允许卖给新疆坦克数辆，飞机数架，且本国政府早经声明决不变更原则之规定，反对新疆省政府以商业合同之手续，于将来再行购买苏联各项军用品，此层敝总领事业于三月十八日第十七号公函照会贵特派员查照在案。至关于新疆省政府所表示意见即贵特派员三月十八日函内列举第二第三及第四各节，查此项问题关系买卖契约性质，敝总领事实无磋商之能力，但敝总领事能以声明苏联军事制造机关，可以按照新疆省政府之意思及需要迎合新疆省政府之请求。……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长罗文干致迪化 宣慰使黄慕松电

(1933年6月29日)

太原转迪化黄宣慰使慕松兄勋鉴：汪院长、蒋委员长转到胥电奉悉。查新苏临时协定本部曾间接得知，闻其有效期间系至中苏复交之日为止，但未据金前主席呈报到部，拟请将该案全卷抄送寄部以凭核办。关于统一新疆对外交涉事项，中央曾决定三项办法：（一）新疆省政府不得与任何国家订立任何约章。（二）新疆与苏俄政府接洽事项，在莫斯科统须经由大使馆商承外交部意旨办理，新疆省政府可随时派员到馆陈述意见，但不提迳向苏俄政府接洽。（三）关于特派员及驻苏俄领事事项，由外交部妥筹统一办法后，迳电查照等语。业由汪院长于十二日经莫斯科大使馆电达尊处，未审已否收到。现本部对于第三项正在妥筹办法。特复。第罗文干。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抄送新苏临时 通商协定及附件致行政院呈文

(1933年9月14日)

呈为呈报前主席金树仁被诉违法，擅与苏联订立商约一案，照缮原件，仰乞鉴核事。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八日，案奉监察院训令，内开：案据监察委员杨谱笙、郑螺生签呈称：据新疆省艾沙呈诉：前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违法，擅与苏联订立商约一案，经加审核，应请依照院规，令行新疆省政府查复，以凭核办，等语。据此，合亟抄同原件，令仰遵照。此令。等因。附抄原呈一件。奉此。查前主席金树仁，于民国二十年十月一日，与苏联订立新苏临时通商协定七条，又附件四条，业经签字实行。当订当立协定及附件之时，甚属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且未提交省务会议，故各省委亦未与闻。至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十日，始将前项协定及附件，抄发秘书处备案。是否呈咨院部？无案可稽。此外，有无关于军事订立秘件亦无从查悉。奉令前因，除呈复监察院外，理合照缮原协定及附件，备文呈报钧院鉴核实行，谨呈行政院院长汪。

计呈照缮协定及附件清折一扣。

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国民政府外交部签注 新苏协定意见呈行政院文

(1933年11月4日)

案查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系新疆省政府金前主席于民国二十年十月一日以换文方式擅自与苏联所签订。签订之前该前主席并未奉中央核准，签订之后中央亦未据呈报。新疆僻处边陲，情形隔阂，中央亦无由查悉，故本部无案可稽。嗣本部间接闻知新苏订有上述协定，终于本年六月间黄宣慰使莅新宣慰之际，电请就近调查，以明真相。□准黄宣慰使将该案全卷抄送到部，并准钧院秘书处据艾沙呈报函同前因。经飭主管司会详加审核。

兹查该项协定系以新疆省与苏联共和国为订约当事人，该省政府签订该协定并未经中央核准，授以全权，擅与邻国私缔协定，核与中央外交统一之旨不合。

复查该协定全文，文义不明，□之处颇多，尤不具备普通国际协定之形式。其有利于新省之条款，词意或属空泛，或极细微。该协定损失国权，□□边疆之处甚多。除协定全文暨附件于本月一日呈送钧院鉴核不另附录外，谨逐条签注意见，备文呈请钧院鉴核训示祇遵。谨呈行政院。

附录：对于新苏临时通商协定之意见一件

兼署外交部部长汪兆铭

对于新苏临时通商协定之意见

第一条规定出入卡伦，其间伊尔克斯塘一卡，应于开放土尔尕特边卡六个月后，即行封锁。此条文义明显，惟对于左列三点尚待调查：

一、条文中依照“中国及苏联现行法律”字样，该项适用于外人及外货过境之法律共有若干，内容如何？

二、“现行法律”字样，是否赅括各种章程、规则而言，又“现行”二字是否赅括将来颁布之法令在内，字义颇涉含混。

三、国际通例，沿边住民入邻境，在一定距离之内，可免护照签证等类之普通外人入境手续，新疆与苏联边境间现在如何办理？

第二条系规定新疆土货运入苏联，表面上于我有利，实则似是而非。查该条条文称：“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准予云云”，该“希望”字样在法律上效力如何，究在何种范围之内能使苏联受其拘束。盖准予之权显然操诸苏联之手。又该项土货虽云可无限制运入苏联，但现仅能售与苏联国营商业机关，复可为苏联现行法律所禁止，则所谓无限制者，只指数量，不及其他，又新疆商货若照该条末句之限制，能否享受他国商货运入苏联者之同样待遇，亦属疑问。查苏联对于我新疆土货闻极欢迎，恐其不肯售予。新疆土货大抵与外蒙相类，苏联对于外蒙之货，禁令南运张家口，须全数运往苏联。彼以廉价收买，而以高价转售欧美，一转移间，坐获巨利。新省事同一例。况所运土货，仅能售与国营机关，该机关抑勒价格，或故意拒绝，势所难免。在我既经运往，亏耗运费，势难再行运回，只得忍痛贱售，耗损无量。以我小资本之私商与苏联国营之机关相抗，庸岂有幸。

第三条前段规定，苏联商务机关及其人民可以前往各区贸易条文中，“各区”二字，不无含混，以致订立未久，争执即生。依我方解释，系指五城而言，而苏方则坚持为五个区域，文牍往返辩论年余，迄本年六月十五日，新省临时主席以指令方式，竟徇苏方之请，完全让步，而该指令内所载之“呈暨附件”，漏未抄送，故尚不能确定其让步之范围。中段谓可由上述各区内有遣派代理人等前往沙车、吐鲁番、焉耆、和阗、阿克苏与各本地商民或商号订立买卖契约及督促其履行之权。末段对于苏联商务机关之职员及其国民在各

地内更予以自由往返通行之保障。查此条用意,原在限制苏联在新贸易之自由,而结果适得其反。现在区域既广,商务机关及其职员代理人之额数亦无限制,复听其深入内地自由往返,其结果将使新省全省商货为所操纵。尤可虑者,则宣传赤化,及他国援例,是已又各国对苏商务机关之待遇,如英如德皆有规定,新疆之现行法规能否顾及,目前究予何种待遇,尚待调查。

第四条规定买卖契约,彼此间可自由商订并到我官厅登记,表面上于我有利,但该条仅系新省政府表示希望有否拘束之力,又如不来登记,则买卖契约是否不生效力,是则有查核该省登记规则之必要。又该条末节所载双方发生争论一节,自该协定订立以来有否先例可资考鉴,亦待调查。

第五条规定苏联在新商民完纳税捐与中国商民同样待遇,此与近时国际通例尚不违背,但本条系属片面规定,对于新省商人在苏联出售土产之待遇,付之阙如。查苏联对于外国商人非经特约规定者,均以普通私商待遇,重征暴敛,靡有底止,以故近年来中国商人在苏几已绝迹。今新苏协定中我方对于苏联商人完纳税捐,既有明文规定,则新省商民运货前赴苏联出售,势将依照苏联法律完纳税捐。诚然,则苏商在新所纳之税,将远逊于新商在苏所纳之税,其违反相互平等之原则,彰彰明甚。又该条所称之税捐是否即系中华民国之普通税则,抑新疆另有单行税则,尚待调查。

第六条规定关于新省国民经济事业之建设,不仅由苏联供给各项机器,且由苏联担任建设上任用之技师及造就中国专门人员,又由苏联协助改良农业垦牧各事宜。查苏联对于新疆之经济侵略,蓄意已久,至是以真情毕露,而犹于条文中指为出于新省政府之希望,一若表示亲睦,勉徇新省之请者,其狡猾手段实可令人惊佩。此条不啻将新疆国民经济前途拱送苏联,□使新疆为苏联化,长此以往,新疆非中国有矣。至如苏联技师技能之不及欧美技师,苏联农牧制度之不宜于新省内情,尚属问题之小焉者耳。何况九

国公约第三条末段载称：中国政府担任对于外国政府及人民之请求经济上权利及特权，无论其是否属于缔结本约各国，悉秉本条上列规定之原则办理云云。与该条相凿枘，我方实不能履行其义务。又查此条之实行，必须经过合同手续，究竟此项合同曾否订立，亟待调查。

第七条第一段规定新疆向中国之进出口货通过苏联办法，谓应以发达新苏间商业为基础，由新苏商订附单，该项附单并得按照新苏国民经济必要之情形，每年商改。此条性质与第六条相同，即谓苏联从此获得监督新疆进出口货物之权。盖新疆进出口货之通过苏联者，应以苏联利益为本位，若与苏联利益冲突，即可不列于附单或要求改订附单矣。该条第二段所载新疆省政府转运自己必需上之订购物件云云，词意隐约，果何所指，不无疑窦。协定之结尾载有新疆省政府认为同意发生效力等语。苏方之复文如何，措词尤宜查悉。

附件第一号为划一税，则其现状如何，尚待调查。附件第二号为准许苏联在迪化、喀什、伊宁、塔城设立财政所，此件之弊害与协定之第六及第七两条相同。新省僻处边陲，与中国本部汇兑困难。金融组织亦甚幼稚。该项财政所行将垄断新省之金融商务而左右其命派矣。该财政所现状如何，组织如何，亟应查悉。附件第三号为关于开放土尔尕特边卡及封锁依尔克斯塘边卡之期，自无意见。附件第四号规定新苏间之电讯交通办法，是即新苏通电交涉之根据，本部于本年八月准新省政府咨送新苏通电草案，请予查核见复待语，业经本部转陈中央电令停止进行。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 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电

(1934年7月16日)

请通知南京政府,新疆省政府请求我们与新疆做生意的经济机构,提供三百至五百万卢布长期贷款,以购买苏联商品,并提出用新疆的原料支付。“苏新贸易公司”同意缔结这种合同,并以对新疆相当优惠的条件提供上述用于购买商品的贷款。我们知道新疆督办盛世才已请求南京予以批准。“苏新贸易公司”已请求苏联政府予以批准。苏联政府从希望加强中国对新疆的权力出发,准备批准此项合同,并认为南京政府不会对此提出反对。最好您将这一通知告知蒋介石本人,并将这一通知,与我们得到的关于蒋介石对同苏联合作以加强中国对新疆的权力很关注的报告联系起来。倘蒋介石在大本营,您去那里感到不便,则请立即电告您打算如何把此项通知告诉南京政府。

斯托莫尼亚科夫

根据档案刊印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4年8月15日)

昨天同蒋介石进行了交谈，孔〔祥熙〕当时也在座。我根据您的指示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表示希望加强中国对新疆的权力。蒋介石说，他对此表示欢迎。新疆是中国唯一与苏联毗连的省份，他欢迎苏中合作。他希望在新疆的合作将为今后的密切合作奠定基础。至于“苏新贸易公司”向新疆省政府提供贷款一事，在贷款只用于经济改组之目的条件下，他并无异议，他还想了解合同细节。我回答说，我也不清楚细节，我预料盛〔世才〕本人会将细节通知中国政府的，我只想知道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当时蒋介石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贷款只用于经济改组目的并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他不反对贷款，并补充说，如果直接向中央政府提供贷款，那就更好了。他个人对建立新疆与其他省份的交通线尤感兴趣。我回答说，我将他的观点转告本国政府。

谈话之后，孔〔祥熙〕设宴款待，他在宴席上对我说，中国政府并不特别信任盛〔世才〕，他在日本受过教育，迄今仍同日本人保持着联系。孔〔祥熙〕对我说，蒋介石最近一个星期生病了，因此会见推迟了，但据报纸报道，红军已到达福建，他来得及飞往福建，指挥对红军的作战。根据梅尼^①与沈^②的谈话，正如所料，外交部对于

① A. P. Мэни, 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处一等秘书。

② 即沈觀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我们在新疆的合作持反对态度,应当考虑到,倘蒋介石同意的话,外交部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任何措施暗中进行破坏。请赶快将有关贷款详细情况^①通知上海,看来我同外交部的谈话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亲日派头目在牯岭聚会,据不同来源的情报,蒋介石在亲日派的压力下,对日本人向北方经济扩张和召回有广泛的权力的黄郛方面将作进一步让步是可能的。

我今天前往上海。

全权代表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① 6. c. 斯托莫尼亚科夫在1934年8月27日电中通知И. В. 鲍格莫洛夫说:“所说的不是指贷款,而是根据新疆政府向苏联贸易机构提供原料的合同提供用于购买商品的贷款。显然此项合同不可能同南京政府签订。我们不怀疑用于购买商品的贷款只用于经济目的。至于南京政府对贷款之使用进行监督一事。则该问题只能由南京和迪化解决,显然,该问题与我们无关。谈不到合同细节,因为迄今为止”苏联贸易公司”同新疆政府之间只进行了初步的原则性磋商。合同草案甚至还未形成。

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与苏联 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话记录

(1934年8月29日上午11时30分)

鲍：闻阁下对于新疆事，拟与余一谈。

徐：是。近闻苏新贸易公司拟与新疆省当局缔结一种契约，一方新疆将以其出产品供给公司，一方该公司将以大批款项，供给新疆省当局。本部曾电令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重提该馆前发之照会，曾声明“凡与中国地方当局签订任何协定或契约，非经中央政府同意，不能认为有效”，对于本问题，请苏联政府尤加注意，苟未经本部明白承认，请勿令苏新贸易公司与新疆任何当局签订协定，并请抄送合同内容。苏联外交部答称：关于此事曾有电致阁下，囑与本部接洽。但本部至今不知阁下未向本部道及之原因。

鲍：此事余应先说明者，即（一）合同尚未签订。（二）且尚无合同稿。此事发起者，并非贸易公司，而实系新疆省政府。余亦知中国大使馆提出之照会，但此照会系指贷款而言。现苏新贸易公司与新疆省政府所商议者，并非借款，实系一种普通商业上之买卖行为，为双方利益计，似可进行。余在离庐山前，曾谒见蒋委员长，提及此事，蒋委员长原则上表示同意，惟谓款项之用途，须由中央监督。

徐：依照本部所得之报告，贵国政府似曾训令贵大使与本部接洽。但无论如何，蒋委员长面告阁下者，似尚不止阁下适才所述之语。蒋委员长曾明白表示，此事须经中央政府核准后，始可进行。

鲍：余所闻者似无此语。但此案好在尚未签订合同，且并无合

同稿可以抄送。

徐：我方之意，不问何种合同，其性质较为重要，尤涉及经济范围者，概须经中央核准后，始可签订。

鲍：但苏联与新疆总须有商业上之关系。中国政府究取若何态度？在苏联极愿中央政府在新疆有巩固之权力，但新疆现有当局，既系中国中央政府承认之官吏，苏联方面，自可与其发生必要之往还。

徐：中国政府并非欲排除新疆与苏联间商业上之普通往还，但如性质较为重要，且有具体计划者，中央政府不能不予监督。苏联方面对于苏新通商事，如有何项建议，尽可与本部磋商。反之，如中国政府有何项计划，亦可随时与苏联外交部接洽。

鲍：此事苏联方面绝无建议，余顷已言过，发起者系新疆省政府而非苏联贸易公司。

徐：余所言者，系指新疆与苏联之一般关系，随时可由两国正式外交途径，加以讨论。余信阁下今日必将余所申述须经中央政府同意一点，电告苏联政府。

鲍：余当将本日所谈者，电告政府。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关于苏联对新疆贷款密约之签订

(1935年5月16日)

此一借款合同也如军事密约一样，始终无法取得文字上的根据。不过据后来参与订立此密约的陈德立透露，谓盛苏密约，始终无法向中央报告者，因关系新疆前途殊大，不仅建议俄人在新疆实行共产主义，而且所聘请之顾问专家有干预新疆基本政策权。后来笔者在新疆调查，据说该密约共十五条，最重要者有：

“一、苏联政府为使新疆内部安定，从事建设，由苏联政府接济新疆省政府军队武器，弹药，以及其他装备，并成立空军大队。如新疆遭受外来攻击，苏联派红军协助，其所需军火价款，由新疆省政府贷款中扣还，其他粮秣费用由新疆省政府供应。平乱红军撤退或留驻当视新省局势而定。

二、为使新疆逐渐达到政治改革，得向苏联聘请政治顾问，并履行诺言，新疆省政府实行政治改革推行共产主义制度。

三、为使新疆军队担当反帝任务，得向苏联聘请军事顾问及教官，担任训练及指挥各部队。

四、为使新疆从事各种建设，得向苏联聘请财政顾问及各专家，或技术人员担任指导，其中包括农、牧、金融、财政、医药、卫生、交通、水利等建设之低级技术人员。

五、新疆对外(包括对南京政府在内)及其他重大事件，须告知迪化苏联总领事兼全权代表，或取得其同意。

六、新疆重要官员之进退，须征求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意见，或经其考察。

七、新疆省政府一切重要政策性之设施,必须先与苏联各部门之顾问商洽,并征其同意,然后再报苏联驻迪化全权代表备查。

八、在新疆受聘之各苏联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待遇得另订优待办法实施兼签订合同,期限当视工作之需要而定。

九、新疆之各种矿产开发,得由新疆与苏联双方合办方式行之。详细合约另订之。

十、由苏联政府贷给新疆省政府五百万卢布,年息四厘,五年为限,以土产作价分期偿还,土产包括牲畜、皮毛、肠衣、油脂、棉花。粮食等为范围。……”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毛泽民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 致洛甫、泽东同志的信

(1938年4月18日)

洛甫、泽东同志：

在二十天前托刘作夫同志带上一信，谅已收到，新疆的概情，在该信中可以略知一二。

我到财政厅工作两个月有余了，虽然经过这些时间的艰苦工作，可以说，一般的情形是懂得了。短短的五年工夫，乱发纸币达三百万万两，外债合法币二千余万元，其他天怒人怨的事还不知有多少，仅仅养活至今最多的兵不过一万八千一百六十二名（其中实际的上等兵只四千三百一十名，一等兵三千八百零九名，二等兵二千二百零九名，其他将官及督署的七八百名副官、杂役等兵是指整个军事的）。至政府的行政系统，全省不到一万八千人。何况都是最高数。开始几年当然少得多，就花了这样大的借债（纸币）三百万万两，二千余万元。而五年来的各项税收等，虽然尚未有总的统计，其数当然很巨大。现在月收税款约三十万万两，以五千两合大洋一元，月收也有六十万元，由田赋所征的一半以上粮食及牛马羊只，平均月值数万元或十万元以上。具有如此巨大收入，仅供给不到四万人的机关部队，要在陕北，大有余裕。这里负欠这大批债，弄得天怒人怨。今天无法支持，一方面过去反革命捣乱；另一方面，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所造成。过去许多不合理的事情，今天财政金融如此困难，仍然继续留存着，要去整顿，独立[力]难为，实成为今天整理财政的极大困难。

但是,好的也有,那就是督办本人。虽然官僚习气还很重,可是对我们倒也十分好。我们的建议,百分之九十五是接受的,并且有相当决心来整理财政金融。另方面有好的财政顾问,也很关心,并且整个新省工作的领导人,我已与他讨论过七八次财金工作,我具体提出了整理整个意见,开始因不清,同时财政顾问还想在旧基础上来求解决,当时未得到大多数同意,后来经我详细说明:在这样千头万绪的乱麻中,想要疏清出来,即是说,想要将三百万万两省票逐渐恢复到原来价格,这是世界无先例,维持现状也绝对不可能。唯有快刀斩乱麻,新起炉灶的办法。那就是说,不再发旧银票,发新大洋票,将现有的银子铸五十万现银币,作开始时兑现之用。利用三百余万元法币,作为内省与苏联汇兑之用,来改换与稳定新大洋票。并将省银行改组,成为中国银行一样的官商合办,发行钞票权归银行,将存六七千两黄金、银子(三四十万两)以及珠宝、玉石等大批现金,与三百余万法币作资本,发行一千万新币,以六百万元收旧省票,余作半年补助财政收入之不足。半年后,就可完全求得收支平衡。财政整理重新定二十七年以大洋为本位的新预算,增加薪水,减少杂支及浪费。这一计划,首先得方林同志同意才提出,后全部同意,督办更一字不改的同意。现在仅因改大洋问题,未得作最后决定,但已开始进行这一制币工作。以目前形势看来,整理财政与改善币制,在二三月内可全部实现。并且还不至发生大困难,就可以改变过来。

但是,千头万绪的财政金融工作,尤其首先遭到本厅过去铁桶一般旧恶习以及毫无章则的影响,对整个内部已费两个月时间,经过最艰苦的说服与教育工作,至今未曾开除一个人(督办数次要我开出名单,他用调虎离山的方法调到别的机关去),我认为首先进行团结工作,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是于今后整个工作有利的。果然,百分之八十以上已被我争取过来了,牢不可破的恶习,今天大大在改变着。少数基本坏分子,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使

这些坏分子的阴谋诡计全不得逞。不过已被争取的公务员，工作能力与工作积极性尚差，现在必须从基本工作做起，至今天止，方林同志尚未另外给我一个人，这倒使我艰难极了。因此，特向中央请求：

一、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因银行、金矿、海关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很快转变，起到作用。

二、陕甘边区政府各种法令与章程，最好所有一切政府各厅新旧章程、细则，尤其是财政、银行、金库、国民经济部的新旧章则，全给我一份作参考，减少我起草各种条例的困难。因省府本身及财、建、农三厅，我都要负责去帮助整理，要这些章则，与要干部一样迫切。同时，菊如同志有一册银行簿记，请先借给我一时期，买了还他。

三、请恩来同志在武汉代为聘请数位好的会计及银行有经验的人员来。

四、我的胃病相当利[厉]害，请在西安或汉口代买三四瓶美国胃药寄来。

五、请设法寄些新书报，并希望将一些重要理论书籍及解放报的纸版寄来，此间不久就能翻印。财政厅有一所值一百万元法币的大印厂（过去准备印纸票的，现因印制改良，绝对要不了。准备作为发展新疆文化的大印刷厂）。但某些书报可否指明寄给我一份，不然，会使我对世界与全国的政治模糊。尤盼泽东同志《唯物辩证法》的后一段。《中华革命史》、《战略学》、《中国的列宁主义》三本书是否在编印？如有，无论如何，给我各一份。

最后一件事，我知道边区财政十分困难，现在再由这里拿现款，目前也难，此间存有烟土十六万两，可否设法在平津地区变卖？如果这事不妨碍政治原则，则也可帮助目前边区政府的财政。这是我个人意见，但给是不成问题的，督办不会不允许，他很关心陕

甘的困难。

敬礼!

建业^①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早

附：毛泽东同志批示

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请陈抄办一份，送洛甫。

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① 建业：是毛泽民同志所用之笔名。

任命状

(1938年4月)

任命周彬代理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任命孟一鸣代理新疆省政府教育厅厅长；任命阿不都拉代理新疆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此状。

新疆边防督办 盛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盛世才委任周彬为逆产 委员会委员长的手谕

(1938年5月31日)

为谕飭事。查逆产委员会委员长张宏与业经因案离职,所遗委员长一缺,即以该会副委员长周彬补充;遗副委员长一缺,即以臧谷峰接充。仰即分别令委并接收情形报查。此谕。

督办兼主席 手谕

五月三十一日

附:任命状

任命状

任命周彬为新疆逆产接收处理委员会委员长;任命臧谷峰为新疆逆产接收处理委员会副委员长。此状。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周彬、张宏与关于筹办官商合办 银行给盛世才的报告

(1938年7月)

呈为呈请事。窃查值此全民对日抗战时期，新疆在国防后方上实居重要地位。为完成抗战建国之使命，必须整理财政巩固金融，才能充实抗战力量。因此对本省农工商各业实有予以积极发展之必要，惟对于发展农工商之速缓，须视其经济力量之大小以为断。溯自本省四月革命后农工商各业之所以能日有进展者，均仰赖政府经济政策及本身吸收各种游资，使有力地扶助了本省农工商业。现各业欲更能迅速发展，使银行更能充分执行上述本身应有之任务，实有对银行之资本及业务予以扩充之必要。为吸收多数游资，使所有全疆四百万民众之经济力量均能投入于各建设部门计，拟将省银行改为官商合办之银行，广招商股，政府占百分之六十，商民占百分之四十，使全省人民在经济生活上更进一步与政府合作。因此不仅银行资本赖以充实，自能发展本身具有之效能，则对新新疆之建设及抗战建国之前途均有莫大补益。此项扩大改组办法之原则，如蒙核准即行从事于筹备改组及招股各项工作矣。所请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鉴核指示祇遵。谨呈

新疆边防督办盛

新疆省政府主席李

财政厅副厅长 周彬(章)

省银行行长 张宏与(章)

中华民国廿七年七月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财政厅呈报新疆省区财政局暂行条例

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呈为呈请拟具区财政局暂行条例，仰祈钧鉴审核事。窃查职厅力图整理财政，加紧建设事业，开发富源，完成财政起见，曾经呈准于八区各设立区财政局一处，以完成上项任务，业将详细情形前经呈请核准在案。兹制定区财政局暂行组织条例一份，理合缮呈。敬请钧府审核指示祇遵施行，谨呈
新疆省政府

副厅长 周 彬

库尔班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廿三日

附：新疆省、区财政局组织暂行条例

第一条 本条例遵照省政府批准在全疆八区设立财政局。

第二条 财政局按各区繁简情况，每局暂定由十人至十五人。

第三条 各区财政局受财政厅直接管辖及本区行政长官监督，处理全区财政事项。

第四条 区财政局设局长一人，由财政厅遴选委任，并呈请政府加委备案。

第五条 区财政局设秘书一人，视定员二人，应呈报财政厅加委，其记帐员统计员一人至二人，均由局长遴选委任并呈报备案。

第六条 区财政局因缮写文件得用书记一人至二人。

第七条 区财政局之职权如下：

1)关于开发全区富源事项。

2)关于整理全区田赋及契税事项。

3)关于整理与指导全区官产营业收支登记事项。

4)关于各地方税局局长能否胜任尽职,应由区财政局长考核或保荐及任免事项。

5)关于稽核本局所属,如征收机关及其他各机关预算决算及规定,簿记式样及指导会计事项。

6)关于视察全区各种税收,审核支出,解决所属各税局发生困难,但如遇有重大事项,径请财政厅核办。

7)关于指导本区各县政府设置局之财政科各项工作与收支事项。

8)关于职员任免、编纂统计并财政表册之报告事项。

第八条 本条例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呈报省府备案修正。

第九条 本条例自呈准公布之日施行。

附:省政府批复

呈咨,拟具区财政局暂行条例仰祈备查由。呈暨条例均悉。查该厅所拟区财政局暂行条例,审核大体尚属妥洽,准予备案,应立即由该厅转行遵照可也。此令。

主席 李(李溶印)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全省各机关请领经、临费^①办法及手续

窃查本厅为实事求是，节省物力，减少一切烦琐之文牍，加强正当工作之效率，关于全省机关请领经、临各费办法及应当遵守之手续，尤不能不明白规定、以资遵循而昭划一。兹规定办法数条臚列如下：

(一)凡经政府核准作正[当]、开报之费用及事前请准之临时费，无论行政军事请款，归垫时不再造咨预算分呈请予挂发，应造具计算书四份，一份存本机关，其余三份连同所取单据簿径咨财政厅，以凭分别核拨存转，但不得虚糜公帑，任意浪费，如发现所用款项有虚糜及不正当情事，虽系请准，亦不发给，俾杜滥支而重公帑。

(二)凡系采购供支各部队及其它机关粮秣，如系经常性质者，均经提前造具详细预算三份，一份存本机关，二份径呈财厅核办，如未经财厅核妥准予照办时，则不得自行挪款开支，否则，所用款项不予补发，以示限制。

(三)各机关经常费，每届月终由厅按照预算规定拨发，各该机关径赴所在区域之银行具领，毋庸文电催请。

(四)各机关领导[得]经费后不再呈报备案，如对拨发款项发生疑问，必须申请解答时，可径呈财厅，不必分呈，以省烦牍。

(五)各机关请示之事项，如系单纯性质与它无关者，可径向主管机关呈请核示，毋庸分呈或分电，以明系统。

① 经、临费：即指经费中经常费用、临时费用等。

所有以上规定数条,是否有当,除分呈外,理合具文呈请钧鉴核夺批示,如无不妥,即请通令各区、县、局,遵照施行。谨呈
新疆省政府主席李

副厅长 周 彬

库尔班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新疆商业银行招收商股启事

全疆父老兄弟姐妹们：

代表全疆民意的三全大会^①已在胜利声中闭幕了。为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起见，在大会上曾有改组省银行为官商合办之商业银行的决议，其目的在于以政府专办之银行改为全疆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公有之银行。在银行资本充实以后，不但更能加强其扶助全省农牧工商各业发展经济之效能，同时亦可使民众股东每年由银行分得许多股息和红利，化停滞之游资为生产之资本。政府认为上项决议对发展新省农牧工商各业异常重要，特于本月五日在省城成立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各区及有分银行之重要县份均设有筹备分会，办理一切筹备招股事宜，并印有商业银行章程多份，函索即寄。欢迎各族男女同胞踊跃参加，有愿入股者请径向本会或各地筹备分会接洽。此系加速建设新新疆及增多个人利益的良好机会，幸勿交臂失之。

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启

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八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① 三全大会：即 1938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1 日于迪化督办公署西楼举行的新疆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民等人起草的有关宣言和决议。详见本书“大事记”。

周彬呈报成立新疆商业银行 筹备委员会经过

呈为呈报事。窃查三全大会为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起见,曾有改组省银行为官商合办商业银行之决议,业经政府核准,令行筹备在案。为早日实现此正确之决议案起见,由邱宗濬、周彬、阿不都拉、王宝乾、李溥霖、李英奇、别克迭也夫、卢毓麟、周海东、石寅甫、张宏与等十一人发起,并聘各族领袖富商阿孜巴依、牙合甫、依宰图拉、金荣、阿宝、夏律瓦、吕勒甫、崔善祥、蔡鑫铎、韩群壁等十人为筹备委员,在迪化成立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进行一切筹备招股事宜。于本月五日在省银行开第一次会议,由张行长、周厅长分别报告改组意义及进行步骤,并当场推举周厅长为委员长,阿厅长、张行长为副委员长,并议决聘各区行政长、商会长、分银行经理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各区及有分银行之重要县份成立分会及应招股款数目之分配等重要事项。除积极进行筹备改组外,理应将组织筹备委员会经过情形,备文呈请鉴核备案施行。谨呈

新疆边防督办盛

新疆省政府主席李

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

委员长 周(章)

副委员长 张(章)

阿(章)

(新疆省银行印)借印
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十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盛世才委任周彬为新疆二期三年计划 设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财政组组长

新疆第二期三年计划设计委员会委员长李溶,副委员长周彬、孟一鸣、阿不都拉、王宝乾,财政组组长周彬,副组长张宏与。

督办兼主席 盛世才
民国二十八年

省政务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

经常出席						
姓名	族别	性别	年龄	籍贯	原 职	通讯地址
邱宗澂	汉	男			民政厅厅长	民政厅
周 彬	汉	男			财政厅厅长	财政厅
孟一鸣	汉	男			教育厅厅长	教育厅
李溥霖	汉	男			建设厅厅长	/
王宝乾	汉	男			外交办事处处长	外交办事处
刘效葵	汉	男			高等法院院长	/
李英奇	汉	男			公安管理处处长	公安管理处
彭吉元	汉	男			督署办公厅主任	/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新疆的社会环境讲话提要*

(1939年1月19日)

邓 发

I. 新疆的社会环境：

(1)民族的复杂性——各民族相互间的历史关系，有各种不同信仰和文字语言。

(2)由于上述原因及过去杨(增新)、金(树仁)之黑暗统治，造成文化的落后性。

(3)由于封建关系及宗教关系而造(成)经济的落后。

(4)政府政策是新的，可是政府内部不可(避)免有某些旧的成份，因此不能当作延安一样看待。

II. 新疆的国际关系：

(1)由于新疆界[介]乎世界两个不同社会国家制度之间，因此资本主义各国想利用新疆作反苏阵地。

(2)新疆是中国与苏联之桥梁，帝国主义为反对中国革命，所以也时刻图占新疆。

(3)日、德、英过去在新疆之阴谋——组织伪[愧]儡政府，造成在东方包围苏联。

III. 新疆与中国革命：

(1)由于新疆是和苏联靠近，因此对中国革命有重要意义，所以过去中国反革命集团曾不断想夺取新疆。

* 这是邓发于1939年1月19日撰写的讲话提要。

(2)现在新疆成为全国抗战之远后方和国际发生关系的重要门户。

(3)新疆始终保持在革命者手上,就不仅今天对争取抗战胜利有重(要)意义,而且将来对中国革命亦有重(要)意义。

(4)新疆始终保持在革命者手上,不仅对中国革命目前仍将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保卫世界和平堡垒苏联亦有重要意义。

IV. 我们在新疆工作任务:

由于国际及国内和新疆的社会环境之特殊状态,所以任务的提法就与内地不同。我们在此地主要任务是:

(1)我们在此地不发展组织,不作共产主义宣传,主要是帮助现在政府,实行政府政策和方针。

(2)巩固六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一切阴谋。

(3)在政府政策之下,促成各民族更加亲密团结。

(4)在政府政策之下,提高人民文化。

(5)现政府在改变民生、提高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少成绩,所以我们必须忠诚地拥护它。

V. 我们在此工作态度、方法:

(1)切勿暴露自己是共产党人,而只是政府的一员。

(2)对同事和蔼谦虚,不要出风头、骄傲自大。

(3)做事要小心,不要草率从事,凡事要请示上级才做。

(4)一方面要从实际工作去影响人,但又不能随便批评人。

(5)一方面不能表示特殊,但又要时刻保持党员立场、原则性、政治警惕性、独立性,不能与人同流合污,不要被外界思想、物质所包围。

(6)为避免帝国主义借口和同事之落后分子排斥,于是必须注意秘密工作。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周彬关于稳定金价的报告

为会衔呈复事。案奉钧署秘字第四二一号训令。内开，查本省金价自上半年入夏以来，逐渐跌落，物价亦形平稳，不料近数月来金价逐渐猛涨，推其原故，因兰州金价昂贵，一般奸商乘此机会不惜大价收买，冀图肥己，若不加以制止，必将影响新纸币之行使及物价之平稳。仰该厅即便遵照会同商业银行、总商会妥拟制止办法，从速呈候核夺，万勿延误为要此令等因。奉此，职等遵即会同妥拟，查近日金价并未增涨，惟月初略为抬高万余两，然不数日仍旧平复，以现在阿金每两市价五十万两而论，较之去岁每两九十十余万两已减低百分之四十五，数月以来不独金融稳定，而一切物价亦随同平稳，所以人民生活亦得到相当安定。此固由政府六大政策领导之正确及各族各界精诚团结一致努力以致此也。但查兰州金价既比本省金价高涨一倍有余，本市奸商难免不乘此时机而作投机事业，以求发财肥己之企图。在本省金融基础尚未十分稳固时期，对于此种投机事业自不得不予以制止。兹为巩固金融提高纸币安定人民生活起见，业经职等会同正在研讨中，一俟拟有具体办法，再以呈核外，拟请政府先行令飭公安管理处令甘境边卡各机关严密检查，如有携带现金出境之人，应即扣留，按照现金出境案例办理。庶现金既无法输出，则价值自然跌落，奸商亦无从捣弄矣。所拟是否有当，理合会呈敬请

钧署核夺指令祇遵施行。再此稿系财政厅主稿会同商业银行、总商会办理，合并声明。谨呈

新疆边防督办盛

本代副厅长 周

库尔班

行长 张(宏与)

会长 石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新疆省政府 关于收换法币的指示

(1939年5月)

全疆各行政长官均鉴，密并转飭所属各机关、各民众团体均照：

查政府为便利市面流通，保障各族人民利益起见，特规定省币收换法币办法，定期收回法币，业经分飭办理，并布告周知在案。兹查有少数商民人等竟听信帝国主义走狗之造谣，曲解收换法币意义，遂使少数地方市面金融发生不稳情形，此种现象对于建设前途与民众生活均有妨害，应由各该行政长官等分飭该区各地，于五月对照政府以前布置，扩大举行宣传，务使各族民众彻底了解收换法币意义，再勿听信谣言，妄自忧[扰]自召[招]损失。除电外合行电仰该行政长官遵照分别转飭办理，具报为要。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财政厅呈请简化机关经费批发手续

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呈为呈请事。案查职厅核发省城各机关各项经费,有径由各主管机关核转请领者,有由领款机关造具书单,直接向财政厅请领者,手续多不一致,徒增许多繁琐,在此抗战建国时期,工作效率自应力求迅速,兹拟定领款办法如下:

(一)经常费不再由主管机关核转,该领款机关亦不必再办文书,可每月具收据径赴财政厅领款。

(二)临时费在呈请时拟由主管机关核转,请准及领款时不再办文,应具收据赴财政厅领款,以资减少繁琐公牍,借省人力物力之浪费。所拟是否有当,理合具文呈请钧府鉴核裁夺,并祈通飭省城各机关遵行,实为公便。谨呈

新疆省政府

代理厅长 周 彬

副厅长 库尔班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呈请重新修订监察章程并将经常 审计移归财政厅的报告

窃查职会为厉行清廉政策起见，曾于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会同职厅及财政顾问，共同商讨监察审计两部工作之进行方针。经过详细讨论，根据过去经验，依照本省财政环境及应采取之监察步骤，并参酌审计学理，推由卡顾问草拟监察章程，复由职会共同研究，认为切合现实需要，本拟在本年元旦即呈请施行，惟以李委员长公出，以致未能决定。复查，此次所拟监察章程较为周详严密，极合目前工作条件，不能再事延搁。谨将监察章程全文修缮恭呈核示。再查监察章程第六条之规定，将经常审计工作移归财政厅办理，以明系统而期捷速；将就地审计工作归财监会办理，以发挥实际效能，而加强检举贪污力量。此项办法如蒙俯准，拟于七月一日将经常审计移交财政厅接办，同时财监会即行改组，以便实行就地审计工作。所为拟具监察章程及移交经常审计施行就地审计各缘由，是否有当，除分呈外，理合检同监察章程具文呈请鉴核示遵施行。再此文系由财监会主稿合并陈明。谨呈

新疆省政府

新疆省政府财政厅代理厅长 周 彬

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 李溥霖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财政厅关于任用财税人员手续的通令

为通行事。查整理财政首在得人，苟用非其人，财政税收方面不独不能收效而影响所及贻误财政前途，实非浅鲜，况在此建设方殷巩固抗战后方之时期，各财政局及地方税局负有整理财政、扩充税收之责，对于各级人选尤不可不特加慎重，俾财政日增充裕，而抗战后方亦日益巩固。近来各税局征收税款日增月加者固属不少，而因循推延者亦尚有之。究其原因皆由于用人得当与不得当有以致之。嗣后任免人员总局自科长以上、分局自主主任以上之职员，应于事前造具详细履历呈报本厅核准后再行委派，俾免滥竽而昭慎重。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局即便遵照办理为要。此令。

代理厅长 周 彬

副厅长 库尔班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廿五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新疆财政厅关于禁烟禁赌的通令

督省两署通令内开，为通令事。查抗战建国全民有责，新疆位于国防重要后方，凡我公务人员尤应扫除恶习，健全体魄，以与中华民族复兴神圣事业作勇敢艰苦的斗争。政府有鉴及此，是以对于禁毒方面早具最大决心，至禁赌方面尤不遗余力，并拟定禁烟治罪补充条例，禁毒计划及禁赌办法，先后通令切实遵照在案。查烟为多种之毒物，赌为盗贼之媒介，政府禁赌之意义至为深远，各该公务人员应如何以身作则昭示民众，俾收上行下效群策群力之功。乃近查省内外军政各机关公务员，体念时艰，恪遵命令者固不乏人，而阳奉阴违自甘坠〔堕〕落者亦复不少。似此情形不得〔仅〕阻碍工作进行之效率，且影响政府整个政策之实践。兹为完成禁赌政策，以期除毒务尽促进工作效能起见，待再重申前令，并定以下严厉办法俾各遵守：

（一）省内外军政各机关公务员及各部队官佐士兵，如有偷吸鸦片及其它类似鸦片之毒品或聚众赌博自甘趋向腐化途径者，应由各驻在公安机关明密查拿，据实检举。但各该驻在公安机关得到报告后必须偕同本管街长前往查拿，并取具确凿证据再行检举，不得任意骚扰，致滋物议妨碍治安，尤不得稍事瞻徇〔徇〕情面有违司令。

（二）各公务员如违禁令，经公安机关检举，除将本人依法讯办外，并将该管主官处以妄图失察之咎，决不宽贷。

（三）负责禁毒人员除依照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秘字第二五〇号禁毒计划通令第七项规定办理外，至关于查禁赌博负责人员，如有徇〔徇〕情妄为或故意敷衍废弛〔弛〕职务等情事，定即

依法从重严处不贷。

(四)自此令之后,各警备司令行政长应切实负责督促,各县县长、各设治局长、各公安局长、各司法机关、各地方税局、各团体切实遵照上列规定各条办理,倘有循[徇]情,因循与敷衍情事,应准互相据实检举,以凭依法议处。自此次严厉规定通令后,应各认真遵办,非得视同具文致干咎戾。除分行外,合函令即该所即便遵并转饬所属一体凛遵勿违,此令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局即便遵照,勿违为要。此令

代理厅长 周 彬

副厅长 库尔班

民国二十八年□月□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盛世才的情况及新疆工作问题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节录)

(1939年6月16日)

毛泽民

第一,同盟者在前一时期较好,是受了汉奸托匪等危害后,感觉他的部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只有苏联是他的帮助者。经过苏联同意我们帮他工作,且在工作中能有进步,有办法,当时确是相当信用我们。

第二,后来同盟者为什么大变了? 主要由如[于]他的社会出身,他的英雄思想和军阀习气封建意识,尤其是在莫斯科没有达到他的两大目的,自认为经过五六年和苏联的合作,现在他又用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工作,还不能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信任,这一定是方林同志在想捣他的鬼,想夺他的王位。他所谓也有五六年教训,就是历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托匪不断在新疆的阴谋、企图夺取他的王位,在苏联政府直接帮助下将其阴谋打破了,认为是他的本事。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以为方林同志是汉奸托匪一样,要来夺他的王位。这是同盟者改变态度最中心的地方。

第三,因为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尤其是广大前进青年的信任,如学院的学生因林基路同志调南疆,

* 此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家积钱打金章，很多学生哭，不愿他离开学院。黄颐同志离女校，全班女生嚎啕大哭。反帝会的学联会和工救会，因采取了新的工作方式，真正团结了和教育了广大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仰。如[于]是使他恐慌起来。所谓“林教务长抓青年”即在此。虽然不仅不是我们的错误，而且是我们同志艰苦工作的成绩，但同盟者是不需要我们这些成绩的，是统战工作的矛盾。

第四，我们自先没有深刻了解同盟者这些严重的基本缺点，只看到第一时期同盟者对我们的信赖，如[于]是，只是求得工作进展，解决当前的困难，老老实实的为政府工作，向着大的目标而工作，没有顾及其小节，统一战线工作中特殊环境，因而在某些工作方式上和手续上发生了缺点——如反帝会的章程、学院印歌集等，引起了同盟者的怀疑，招致了同盟者的不满。

第五，虽然同盟者因他本身的基本缺点，如狭隘多疑，因而不能容纳有工作能力的人；思想意识的非常封建和落后，但他今天在军事、财政经济均无独立的能力，在主观上，必须保全和苏联合作。在客观上，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局势，对联共和中共不好决裂，否则，与他不利，这是同盟者所深知的。并且是同盟者在今天不敢决裂的。当然，我们若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在没有更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远见的同盟者，仍听将这些坏影响发展下去，他走上更坏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质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的克服这些困难。同盟者在第二时期敢于向我们进攻和打击，是有根据的。同时，同盟者不管今天在某些方面很坏，但比国民党对我们实在好的多。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做，同时，在新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在做。

第六,请苏联政府更加加强驻迪总领馆的外交工作,从这方面采取各种方法来转寰,这是更有可能。同时,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在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我个人意见,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

(录自《寻踪毛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关于颁发商业银行理监事聘书的批复

令商业银行。

九月三日呈一件。为呈报该行理监事姓名,并请颁发各官股理监事聘书由。

呈悉所请应予照准。周彬等八员聘书,业经填交本府秘书处分别转发矣。仰即知照,此令。

督办兼主席 盛世才

民国廿八年九月

附:聘书

台端为新疆商业银行官股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监事。
此致

周彬先生(理事长)、臧谷峰先生(常务理事)、邱宗濬先生(理事)、刘效藜先生(理事)、彭吉元先生(理事)、孟一鸣先生(理事)、李溥霖先生(监事)、王宝乾先生(监事)。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李溶关于周彬病愈回省 仍代财政厅长的手谕

为谕飭事。

查代理财政厅长周彬因病请假赴友邦苏联诊治，所有财政厅长职务暂由商业银行行长张宏与兼代有案。兹据代厅长周彬病愈返回销假，应即飭回代财政厅长原职。商业银行行长张宏与经理行务，职责繁重，应准解去兼代财政厅长职务，俾便各专责成，着即日办理接交事宜，分别呈报咨行。

此谕，财政厅。

主席 李 溶
民国廿九年二月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徐杰^①准备引退的请示

书记处：

此间财经金融因受政治影响日趋恶化，将有不可收拾的趋势，我已同周、孟等商量，要周向仁兄提出具体挽救办法，如有不妥，立即表示引退，以免将来替人受过。如何？盼复。

徐 杰

1940年3月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① 徐杰：即陈潭秋之化名。

财政厅关于制定廿九年度计划的通令

为令行事。二十八年度行将终了，二十九年度不久来临，本厅为领导全疆整理财政之枢纽，为了加速完成二期三年计划伟大任务起见，所有各税局、各部门新工作函[咸]应开始计划，以期推进。拟自本年七月一日起至翌年六月底上[止]一年中新工作计划，并提出良好意见于六月前呈报来厅，以资考核，统筹办理。再旧年度已经实行各项工作，其中有无应兴、应革事项，亦应管陈意见，贡献来厅，便采纳，择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致之，准备将来工作定有一番发展，方能争取最后胜利。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局长即便遵照办理勿误为要。

此令

代理厅长 周

副厅长 庠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拟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财政厅呈请重新修改取缔隐匿契税办法

为呈请事。查各县征收契税早经通令各县局遵办在案。自施行以来，尚称顺利，但关于取缔隐匿契税办法与现实不合，有碍工作。职厅为了适合现在状况求其税率平允，克服各县局困难及加强各县局工作起见，拟将取缔隐匿契税办法重新修改，理合检同修改取缔隐匿契税办法一份，并备文呈请钧座鉴核施行。谨呈
新疆省政府兼主席盛

附呈修改取缔隐匿契税办法一份

财政厅代理厅长 周 彬

副厅长 库尔班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取缔隐匿契税修改办法

1. 凡典卖不动产业户匿报及短报契税之处罚或补税，依照本办法办理。

2. 凡典卖不动产业户，自白契约成立之日起，限半月内报纳契税，逾期未纳者，除因特殊故障不及如期报税从宽照章纳税免罚外，应照下列各项办理：

(一)逾期一月以内者，按照应完税额处以百分之二十之罚金；

(二)逾期一月以上者，按照应完税额处以百分之五十之罚金；

(三)逾期三月以上者,处以应完税额一倍之罚金;

(四)逾期六月以上者,处以应完税额二倍之罚金;

(五)逾期一年以上者,处以应完税额三倍之罚金。

3. 匿报契税其匿报多寡分下列处罚:

(一)匿报契价十分之一、二未十分之三,照短纳税额处以百分之三十之罚金;

(二)匿报契价十分之三以上未十分之四者,照短纳税额处以百分之五十之罚金;

(三)匿报契价十分之四以上未十分之五者,照短纳税额处以一倍之罚金;

(四)匿报契价十分之五以上者,照短纳税额处以二倍之罚金。

4. 凡典卖不动产未税之白契,以省票或喀票作价者,应按当时折合率折成大洋照章征收契税,填给契纸、契格。其以黄金、白银作价者,则按照现时黄金、白银价折成大洋征收契税,以昭公允。

5. 省略票合大洋折率以民国十九年为准则:

(一)省票折率:民国十九年二两六钱,二十年三两,二十一年十六两,二十二年七十两,二十三年四百两,二十四年九百五十两,二十五年一千四百五十两,二十六年二千两,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八月四千两。九月起,六千两折合大洋一元。

(二)喀票折率:十九年一两五钱,二十年二两,二十一年四两五钱,二十二年十七两,二十三年六十五两,二十四年九十五两,二十五年一百一十两,二十六年一百三十两,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八月一百六十两。九月起,以二百四十两折合大洋一元。

6. 立约在十九年以前者,其折合率应以十九年为标准。

7. 各县政府对于罚金须按月呈报本厅备案,并将税款及罚金按月解交当地总分税局取据造报。

8.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呈请修改之。
9. 本办法自省政府核准之日施行。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周彬关于郝冰清等兼代办理 金矿处主任的呈文

为呈请事。案奉

钧座建字第 1192 号指令,本厅呈请管理新金矿任暂行办事细则,应准照办等因。奉此,兹委且末地方税局局长张发政兼代且末金矿办事处主任职务,和田税局副局长王茂春兼代办理和田金矿办事处主任职务,于田税局副局长黄永清兼代办理于田金矿办事处主任职务,焉耆税局副局长郝冰清兼代办理焉耆金矿办事处主任职务。即由各该员刻即分别组织成立并拟具经费及营业费预算并工作进行具体计划,呈请核办。除咨请和田、焉耆行政长官监督执行,并分行外,理合具文呈请钧座鉴核备查施行。谨呈

新疆省政府兼主席盛

财政厅代厅长 周 彬

副厅长 库尔班

民国廿九年六月十九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新疆省政府奖励新疆日报社 编辑长李啸平等的训令

(1940年6月25日)

为令行事。案据新疆日报社呈称,呈为呈请嘉奖四一二竞赛月出力人员,以资鼓励,仰祈鉴核事。窃查职社(一)编辑部编辑长李啸平彼时正在高副社长滔因病请假期间,不但对于本身工作努力,且兼代社中一切职务不辞劳怨毫无贻误,实为建设新新疆之忠实干部。其次副编辑长张兆林辅助李编辑长赞襄工作又能努力一切依期圆满。(二)职社秘书闫奉璋检查会计庶务帐项施行新式簿记,对于营业总务两部工作亦多有贡献。(三)生产部主任邵家曙、副主任王德、伊明江三人,对于排板[版]印报印刷书籍,同时努力督饬各工人将日行所负工作昼夜加紧如期完成。在节省时间提高生产上,亦均不辞劳瘁以身作则。(四)营业部主任陈仲武,该部在新社址未完成以前,尚住城里距社遥远,每日往返步履,发报收款均无贻误,此外尚能督饬报差兼收积欠报费,完成三分之二并收外活印费,使职社收入日增。(五)总务部副主任孙克良担任俱乐部工作,筹备四一二大会及庆祝会异常热心。(六)通讯科科长赵新亚,在竞赛月除本身工作以外,更指导通讯员苦心筹划,健全通讯网,充实报纸之内容,反映工作竞赛。(七)制版科科长王苇,对于该科应行日常工作而外在该领导工友制出精美各版,不但减少错误且能省时节,毫无虚糜。(八)校对科科长李笑竹,督饬各校对员校阅报纸,刻不暇晷,能够加强对报之速度,减少报纸字迹之错讹,甚为努力。(九)电讯科科长王棣华,收发新闻俾昼作夜,不无微

劳。是录以上各部科共十二员，依照职社四一二筹委会规定应受奖品，而该员称在政府正当建设之期，理应努力工作，逊不受奖。查该员等赤诚拥护政府，确系忠实干部。在建设新新疆期间，皆为不可多得之人才，理合分析据情具文呈请钧府鉴核备案分别嘉奖，以示鼓励等情。据此，查该编辑李啸平等在四一二竞赛月内，均能不辞劳苦，努力完成工作，深堪嘉许，应准传令嘉奖，以示鼓励。除指令并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处即便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兼主席 盛世才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录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租借条约(外交部译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政府与新疆省政府签订

(1940年11月26日)

兹为协助新疆生产力之发展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依照以下条件在新疆境内组织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产地之探测、考查与开采:

第一条 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

第二条 苏联政府在新疆境内有以下各权利:

一、进行探测与考查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并得进行地质方面,地理测量方面,及其他之相当工作。

二、开掘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并将采得之生矿,用适当生产秩序炼造为精品及制成品。

三、建筑及制置矿坑、洗矿工厂、作坊、修理厂、仓库、房舍、建筑物、宿舍、事务所、医院、学校等等。

四、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以取得各种动力,并有权设置必需之水电与他种建筑。

五、建筑电站,包括水电站在内,装设电路网及变压器等等。

六、为供租借地之需要,得利用新疆现有各式之运输工具,并得兴修道路及道路必需之建筑设备,包括铁路在内,以及组织并使用各种自有之运输工具。

七、得利用各式通讯工具,并应租借地之需要,得装设电话线,

电报线，及建筑无线电台。

八、办理工程所需之装备及材料，得无阻碍的运入新疆境内，并得将机器与装备，及其一切附属品加以修理，改造，及由此一企业运往他一企业，在本条约有效期间第一个十年内，运入新疆境内之装备与材料得免征关税及他项捐税，逾此期限则为租借地运入之装备与材料，须完纳新疆现行关税，惟关税及他项捐税所抽之总额，不得超过运入装备风材料价值百分之二十。运入之装备与材料，在任何时期均得由新疆无阻碍运回苏联，并免征关税及他项捐税。

九、应租借地之需要，得采制当地建筑材料（砖、石、木料、石灰等）。石炭及木柴，并得自由购买与储备租借地所需之一切材料。

十、得在新疆自由雇用劳动力，并由苏联聘请工程师、技术人才及工人，新疆政府对于由苏联聘来之工程师、技术人才及工人得自由进入新疆，并在新疆各地自由居住，须无阻碍的发给许可。

十一、为供租借地工人职员之需要，得将食品及普通日用品，运入新疆境内，并经由自己贸易网分配之。

第三条 苏联政府有权将其由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而得之制成品，或半制品，由新疆无阻碍的运出，并免征关税及他项捐税。

第四条 为实际施行本租借条约起见，苏联政府设置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产地之托拉司，简称为“新锡”，并享有独立法人之各项权利。“新锡”之活动，将以按照苏联立法程序所批准之章程为基础。“新锡”在新疆全境内，享有无阻碍的开设分所，事务所，及代办所之权。

第五条 新疆政府在本条约有效期间，须保证“新锡”获得为举办本条约所载[各]项工作所需之土地，其中包括森林采伐，煤炭开采及获取建筑材料之区域，同时新疆政府应将居住于拨给“新锡”土地区域内之人民，一律迁出。土地区域，由新疆政府按照“新

锡”之申请拨给之，划拨土地区域时，不应迟延，并须与所提申请，完全相符。所拨土地区域之租金，依照本条约第七条规定所提之“新锡”产品偿付之。“新锡”应采拨归土地区域中所遗之房舍及各种建筑之价值偿付新疆政府，其数目与条件，由“新锡”与新疆政府议定之。

第六条 除新疆政府依据本条约第五条之规定划拨土地区域不计外，“新锡”在新疆有权将房舍、建筑物及库房购为私产或租用之，并得在满足“新锡”各企业之需要，及各该企业中工人职员给养方面之需要范围内，租用经营农业及牧畜业所需之土地。“新锡”及其工人职员，并享有在新疆河流湖沼中捕鱼之权，以供自己之需要。

第七条 自本条约签字日起，第一个五年中，“新锡”应与其在新疆采得之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中提出百分之五现品，缴纳与新疆政府，在本条约有效期间其余年份，则缴纳百分之六。提取时间，在出品后阳历每年之第一季施行之。同时，依本条第一段提给新疆政府之产品，须由新疆政府按照苏新国界交货之价格，出售予苏联政府，此项价格，应与世界上产锡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主要中心之全年(售货之上年)平均价格相符。依据新疆政府之愿望，其所售出之产品，苏联政府以商品偿付其价款，此项商品，按照新疆相当进口商品之现有价格所定之苏新国界交货之价格计算。苏联政府有权将其购自新疆政府之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无阻碍的运出新疆，并免纳关税及他项捐税。

第八条 为完纳各项捐税起见，“新锡”应向新疆政府缴付代税金，其数额等于“新锡”，运出产品价值百分之二，并应按照本条约第七条规定之价格计算。上年应缴之款，得于次年一月缴付之。除上述代税金外，“新锡”概不缴纳任何捐税。

第九条 新疆政府应协助“新锡”实现本条约所规定之目标，并不提干涉“新锡”之业务，尤其新疆政府对于“新锡”之生产，财政

以及商务各项业务,均不得加以考察,监督、检查及稽核。

“新锡”之行政技术人员,在新疆境内享有无阻碍的因公往来移动之权。凡“新锡”为本条约之目的所有之各企业、建筑、房舍、运输工具、商品,以及其他财产,一概不得征用。“新疆”之运输工具,亦不在受动员之列。“新锡”工人职员中之为苏联公民者应免除个人应担负之劳役,属于彼等之财产,亦不征用。

第十条 “新锡”有权自由处置其所有资本,使用货款,以本地或外国货币在银行活期存款,并得在新疆境内或向国外办理汇兑,或转寄款项,以及自由将现有外币换为新币,或以新币换为外币。

第十一条 “新锡”有权将其各辅助企业之产品,于供足租借地各基本企业之需要后,所余之部分在新疆出售。

第十二条 “新锡”在保卫房舍,建筑物、工厂、作坊、仓库等等,以及保证转运安全所必需之范围内,有权设立武装守卫。

第十三条 “新锡”托拉司因本省或地方政权机关破坏本条约之规定,以及因上述各政权机关之非法行为而受之损失,均须由新疆政府赔偿之。

第十四条 苏联政府同意由居住新疆境内之公民中造就熟练干部,其人数与技能种类由苏联及新疆政府代表议定之。

第十五条 本条约之期限,自签字之日起,定为五十年。本条约有效期满后,租借地各企业之建筑与设备,均须无偿移交新疆政府。租借地各企业之产品、材料、商品、食品、与供给品之储备、现款、资本,以及向第三者之要培训等等,仍旧为“新锡”之私产,并得无阻碍的由新疆输出或转运出境。新疆政府负责不将各企业之建筑与设备转让与外国人,无论此种外国人为自然人抑为法人,在任何形式之下,亦不得容许外国资本在新疆参加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之开采。

第十六条 本条约一经签字,立即生效。

第十七条 本条约签订四份:俄文两份,中文两份,所有各份,

均有同等效力。

苏联政府代表 巴库林·卡尔波夫
新疆政府代表 盛世才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订于迪化城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财政厅关于查禁募捐的通令

为通令事。案奉省督两署秘字三五二四号通令。内开，为通令事。查自新政府成立，宣布六大政策以来，帝国主义走狗、汉奸、托匪、敌探等尽力造谣，企图离间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其居心险恶，手段卑鄙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宣称政府就要走向共产赤化道路，以诱感和鼓励文化落后民族离开六大政策，是以阴谋暴动案件迭次发生。彼辈用各种各样方法进行阴谋工作，无非希图达成其破坏之目的。明言如彼辈鼓动民众向政府捐款，并故意造谣说政府用各种各样方法使民众把钱捐出，即是准备走向共产道路，这种破坏工作实企图与上述谣言互相配合，以便使人民怀疑六大政策。但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绝不愿民众负担太重。所以，迭次通令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法团，严禁有向民众捐[募]款情事，不论各[何]种捐款非经政府核准，以后不得擅自进行。近查各区仍有不遵以前迭次功令，向民众滥行捐[募]款之事发生，此种违令擅权之举，显然系受帝国主义主使进行破坏工作，毫无异议。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各军政机关首领，各司令行政长及其他机关各首领并各法团首领，倘未经政府核准，擅自捐[募]款者，着即撤差，从严惩办决不姑宽。至于提倡募捐及劝捐之人，即以受帝国主义走狗唆使，故意破坏政府政策论罪，严惩不贷。仰该司令、行政长等奉令后即将此次通令负责赶速译成各种文字，布告发交各该区县普遍张贴，特别是各乡村游牧更应普遍张贴，以期深入民间，借息谣议而杜奸谋，并由各区县公安局长认真调查该管境内，此项布告是否普遍张贴并具报。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厅即便遵照，并飭属一体知照，切切此令等

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局即便遵照,切实执行并飭属一体遵行,此令。

代理厅长 周 彬(财政厅印)

民国廿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关于 粘贴印花税票的通令

令迪化地方税局：

为令行事。案据焉耆税局呈称为呈请事。窃查焉耆市面有一般商民储存国民政府旧式印花税票额[颇]多，查与新印花式样不同，与市民智比较落后，此项印花流行市面难以辨识，当此，推行印花以广收入之际，是项印花税票，究应准予粘贴抑或收回作废，以免混淆之处，兹检同印花税票式样两种，理合具文呈请钧厅核夺示遵施行。谨呈。附呈印花两种等情。据此应由该局局长回销，以免紊乱而裕收入。除通令外，仰即知照，此令。印发该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分局即便遵照办理为要。此令。

代厅长 周 彬

民国卅年二月五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督办公署为实施民国三十年度 收支总预算标准案的通令

令军政各机关：

为通令飭遵事。查民国三十年收支总预算标准案，业经财政厅制定提交政委会一再研讨通过在案，岁入原为肆仟捌百万，岁出为伍仟捌百伍十捌万余元，收支相差一千零伍拾余万之巨。在此巨大差额之下，应由财政厅对于收入方面积极调整与设法增加收入，对支出方面各主要支出机关应按政委会会议决之付总数，减少百分之五至八，以补救前项巨大之差额外，在此新年度开始之时，如此大量收支与超支，若不建立起严格的财务纪律基础，共同负责共同执行，仍恐不免造成过去财政上之严重困难。因财务纪律与一省财政金融之良窳关系至巨，按诸以往事实，即足证明。如近一年又半时期内，许多机关不明了财务预算纪律之重要性，常有大量超支与百收百用逾越范围之现象，致使支出之财政愈感穷困，而甫经改善之金融势将动摇，因而给奸商以可乘之机，使物价无理飞涨，影响建设，妨害民生，莫此为甚。倘今后仍不顾原则，随意请款或于预算规定款目以外大量超支，则整理财政前途必滋生更大困难，甚至使三年建设计划规定重要项目之必要经费，亦无法支付。本督办兼主席为保证本年度庞大收支预算和加速完成抗战建新之任务起见，特定下列办法：

1. 各主管处署局，应按照政委会决定之总预算分配之收支总额标准数目与各种预算标准项目，除支出方面应尽可能减少百分之五至八，以弥补其差额外，务于二星期内限期编造详细预算表并

附工作计划书送交财政厅，由该厅审核后汇总预算，呈请批准公布施行。

2. 自新预算批准公布后，各级预算机关应以最大努力克服以往缺点，使其彻底改善，必须克服过去许多形同浪费之缺点，使政府每一个钱都用在有益于抗战建新之事业上，并责成财政监察机关按时检查，如有浮滥糜费及贪婪不法情弊，立即检举依法惩办。

3. 预算原则绝对不容有巨大差额，兹为保证本年度收支预算顺利执行起见，应责成财政厅对于本年收支方面作以下措施：

(甲)关于岁入部门者

(一)修改营业牌照章程，更改税本，以利营业税之增加；

(二)提高收税率从百分之三增至百分之五；

(三)按时处理一切保管官有财产及征存现品，并将已没收之各种逆产的动产与不动产，一并由财政厅依法处理；

(四)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按时征收各种租税，并限期扫数，不得拖欠与缓征。各军政机关应完租税不得借词免缴，自由动用；

(五)各营业生产机关，本年按预算规定应缴省库之纯益，应按季如数缴纳财政厅(此项款均于下季第一月内缴纳)，每届年终，应由各营业生产机关编造年终结算呈核，经批准后，由财政厅与各该机关按其实得纯益数目分别清算，少缴者饬令补交，多缴者即予退还。

(乙)关于岁出部门

(一)各主管厅处署局以及其所属机关等，于本年度内绝对不超支与请领预算外之一切临时费，但得在各系统部门之总预算中酌留百分之五以上预备费，同时，各机关在预算外之临时请款，财政厅不得任意核发，而已开支事后呈请核发之款项，尤应严予驳斥，以维财政。

(二)各机关不照预算规定之款目，擅自动支及支出，形同浪费

之款项,除由其机关长官应负监督不严之责任外,其总务庶会人员应严予议处。

(三)凡遇特殊事故之临时紧急支出,在各本机关预备费无法应付时,必须呈请政府经财委会审查呈准后,方得在预算规定总准备金项下开支。同时,动用上项总准备金,须经政府批准,并每月动用数目,财政厅应按月造表呈报备查。

(四)自本年三月一日起,所有预算规定一切支出,即采取按系统领发制,每月由该主管厅处署局按工作计划需要,根据所属机关之预算规定,填送通知由财政厅审核,确属需要,再行填发拨款通知,分别送交该主管机关及银行查照拨发。

(丙)关于造销审计方面

(一)自本年一月一日起,所有各机关预算支款之造销程序与期限,特规定于下:

(1)各下级组织将其每月支款,向所辖上级机关按月造销,其造销日期即限于下月二十号以前送出,至各主管上级机关应将所属下级机关呈之报销,限于下月三十日前汇送财厅审核。

(2)凡生产营业机关每季应造季报,其程序与前条同,但下级季报应于下季首月二十五日前,呈送上级汇造,而上级则于下季首月底送财政厅审核。

(3)生产营业机关之年终总结报告与资产负债各表,下级组织应限于年终后一个月内造送上级,上级经过审核后,于二个月期限内造送财政厅审核,以便由财政厅作年终总决算。该项总决算不得迟于下年之六月。

(二)凡预算或生产协关未将所属下级造销按前条规定日期办理者,财政厅即不支付下月之预算经费,即因特殊原因而未能造送者,必须向政府呈述其理由方准通融放款。但必须迅速赶造计算,否则在第三月扣发经费以维计政。同时应按月随计算缴、结、存。如不按月解缴结存者,应扣发下月经费。

(丁)关于财政监督与审计方面

(一)责成财政监察委员会与财政厅之审计科,对预算支款方面至少应于每半年实地考察各主要机关一次,经考察后得缮具工作纪录与意见书,送交财政委员会核办,如有重大情弊,应呈请政府核办或议处。

(二)预算领款机关与该机关之首领对于本机关之一切收支均负有严密考核与监督之责,以期彻底执行清廉政策。财监会及财政厅对于审核工作尤应严格考核,迹近浪费之报销,即严予剔除或派员检查报核。

以上各项办法,关系本省财政金融建设前途,至为重大,自通令后,由各主管机关仰体时艰,共同切实执行,并监督以下所属各级机关严格遵守,不得稍有违误,以奠定本省财务预算纪律基础,而加速完成抗战建新之伟大使命。除通令外,合行令仰该照办即便遵理。

切切此令。

兼主席督办:盛

盛批:照办

(周彬章)

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九日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新疆省建设公债宣传大纲

现在政府发行一种公债,号召各族民众来购买,以后逐年还本给奖。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向人民借债,把借得的大笔款子,用到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业上去。因这次发行公债,完全是为了新疆的建设事业,所以这公债就叫建设公债。那么:

甲、新政府为什么要发行建设公债呢?

一、为了增强新新疆建设力量,加速完成第二期三年计划。

七年以来,新新疆的建设已有极大的发展,但这些还是很不够的,要使各方面建设事业更进一步地发展,要使本省无尽藏的富源都开发起来,必须有充足的基金来供应需要,政府既不增税又不派捐,更没有以往中央协饷的补助,那末这大量的建设基金从何而来呢?所以政府除了积极整理财政,巩固金融,以增强建设外,还要发行建设公债,使人民与政府通力合作,根据有钱出钱的原则,把广大民众的资力聚集起来,用在为本省民众自己谋幸福的建设事业上,使第二期三年建设计划能迅速地完成。

二、为了巩固国防,保证抗战建新的胜利。

三、为了新新疆的新文化能迅速发展。

乙、新政府发行建设公债的方法:

一、新政府发行建设公债,向人民借到的款子,完全用于加强新新疆的各项建设事业上,不作别的用处。就是说,政府向人民借来的钱,完全是用于为全疆人民谋福利的建设事业上。

二、建设公债是以政府每年最大收入之一的田赋作担保,每年给人民还本,十年还清。

三、每年不仅抽签还本,还有优厚的奖金,凡购买公债的人,在

抽签还本时，人人有奖，并都有得到五千元特奖之机会。

四、公债票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廿五元、五十元五种，每人可按自己力量来购买。

五、为了购买方便，可以拿粮食牲畜来购买公债。

六、建设公债是为了全疆民众的利益，购买公债是大家愿意的事，所以绝对不许用强迫摊派的方法。

丙、购买建设公债有什么好处呢？

一、我们购买公债，政府把这些钱都用到新新疆的建设事业上去，这不但对我们自己有利，而且也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假若全疆四百万民众每个人起码买一张公债票，积少成多，会凑成一笔巨大的建设资金，快乐幸福的新新疆很快就能建设起来了。所谓“大家拾柴火焰高”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每个新新疆的公民，无论从哪一方面来打算，都应该踊跃地来购买公债，这是每一个新新疆人民的光荣任务，同时更是各级军政机关与地方各族的优秀干部之光荣任务。

二、我们平时辛苦挣得的钱，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花完了，回想起来有时觉得太可惜。假若节省一些零用钱来购买建设公债，虽是小小的数目，但也出了一份建设力量，而且积少成多，还本时就可得到一笔整款，对公对私都有益处。所以节省金钱来购买公债是最好的办法。

三、政府为鼓励人民购买公债，还订了每年有抽签得奖的办法。我们购买公债后，政府以最可靠的担保逐年给我们还本以外，而且给以抽签得奖的机会，真是有莫大意义了。

四、因为公债购买后能自由买卖和抵押，故比对私人放债要稳妥活动的[得]多。

丁、各族各界同胞勇[踊]跃地来购买建设公债。

一、农牧民众勇[踊]跃购买公债，使政府更有力来发展农牧业——过去政府曾经用了大批农牧经费，各地建立农牧场、兽医

院,改良生产方法等,此后更要改善农牧民众的生活、要使农民们都用机器耕种,扩大耕地面积,增加收成,要使牧民们的牛马羊繁殖的[得]又多又肥壮,一个羊剪毛二三公斤,那么我们就多多购买建设公债,使政府有更大的力量来做到发展农牧业的计划。

二、工商界民众勇[踊]跃购买公债,使政府更有力量发展工商业——政府曾对工商业贷款,便利交通运输,使商品流通迅速,邦[帮]助建立工厂,发展手工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本省工商界的人士,对于政府的建设事业之帮助,素不后人,此后政府更要巩固金融,发展交通运输,建立各种机器厂,改良生产方法,更大发展本省工商业。工商界同胞们,尤其是工商界的优秀人士们,必须起着模范作用,领导工农大众,多多帮助政府争先购买建设公债,才能使政府更有力量来发展工商业。

三、其他各界同胞,如公务员、文化教育界人士、学生们、反帝武装同志们,更应认清建设公债之伟大意义,一方面努力向民众宣传购买公债,一方面自己要勇[踊]跃购买,站在群众前头,作购买公债的模范。

发行建设公债标语

1. 为发展文化,巩固国防力量,大家要勇[踊]跃购买公债!
2. 为了增强建设新新疆的力量,大家要勇[踊]跃购买公债!
3. 为了加速完成第二期三年计划,大家要勇[踊]跃购买公债!
4. 要使新新疆的新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大家要勇[踊]跃购买公债!
5. 购买公债,就是援助前方抗战,迅速将日本强盗驱逐出中国去!
6. 每个新新疆的公民,都应该购买建设公债!
7. 购买公债,就是邦[帮]助政府,加快建设新新疆!

8. 购买公债不只是能加强建设力量,而且自己又能得到优厚奖金!

9. 购买建设公债,不但逐年还本,而且每年有得特奖五千元之机会!

10. 牧民们购买公债,使政府更有力量来发展牧畜业,改良种畜,增大繁殖,争取牧民们生活更大的改善!

11. 农民们购买公债,使政府更有力量,来发展农业,逐渐使农业机械化!

12. 公务员购买公债,不只是帮助政府建设,而且因加快建设,更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13. 工商界购买公债,使政府更有力量发展本省经济,繁荣工商业!

14. 文化教育界及学生们,应该站在群众前头,作购买公债的模范者!

15. 反帝武装同志们,更要勇[踊]跃购买公债巩固国防力量!

16. 我们应该节省一切不必要之消耗,购买公债,帮助政府加快完成建设新新疆的伟大事业!

17. 购买公债,是每个新新疆公民的光荣任务,同时更是各级军政机关及地方各族优秀干部之光荣任务!

18. 工商界更应根据有钱出钱的原则,成为购买公债的模范!

民国三十年三月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民在民国三十年新疆财委 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摘录)

培养税源,增加生产与审核不必要开支,节省一切财力,用于国防事业上,以巩固本省金融,加强财政经济基础,充实抗战建新实力。

加强经济核算,严格遵守预算纪律,加强节约运动,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用于国防和轻重工业上。

应有计划性的,而又具体地规定节约方针,一切为了建设新疆,巩固国防,就必须节约不必要的开支,用以发展工商业。

切实执行预算纪律,尽力节省,不超支,不浪费,要使每分钱的收入,必须用于经济生产事业。

应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各项经济事业之建设,生产机关扩大生产,经济机关发展业务,以便完成与超额完成二期三年计划之经济建设。

目前帝国主义大战及三年来的我国抗战,直接影响到本省金融经济,故一般公务员的生活发生困难,但较之帝国主义战争国家人民及中国内地各省的公务员,目前还是过着安静生活,勉强能维持其生活。即以四川而言,连年丰收,食粮当然不成问题,但六月间,每斗大米为十元,而现在则为三十元。在数个月过程中,增加了二倍以上,这直接影响到人民大众与公务员的生活。以[本]次增薪并非一增之后不再过问;今后应继续设法,以最大努力及各方面的配合,务使金融巩固,生产增加,物价平定,使公务员在生活方

面不致困难,以加强工作效率,而充实抗战建新力量。

要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杨、金政府在经济、文化上所造成的落后,必须要改变过去偏重于消极性的非生产建设,而着重于积极的生产建设。

要将新疆落后的农牧工商经济,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必须积极进行生产建设,广泛开展节约,反对一切浪费现象,整理与统一财政工作,使财政收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来扩大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

民国三十年

(录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盛世才致蒋介石书

(1942年7月7日)

委员长钧鉴：此次朱司令官、翁部长、毛总指挥三兄莅新，带来手示，敬聆训诲，至深感佩。复蒙格外垂及关于公私诸语与朱长官开诚详谈各节，仰见钧座对于新疆及职个人关怀之殷，无微不至。感念厚德，毕生难忘。职惟有遵照钧座训示，关于新疆一切问题与一民兄竭诚相谈，所有详情，并恳其回渝面报。钧座当可将新疆实际情形，处境之困难以及职竭诚拥护钧座与中央之赤诚，谅蒙鉴察。

(一)缘职对马克思主义夙具信仰，而苏联国家既系马克思主义执行者，并相信其坚决执行马克思主义，努力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是以职主持新疆省政伊始，即树立反帝亲苏两大政策，又复在一九三八年赴莫斯科就医时，曾加入联共党，使苏联国家竭诚援助新疆，加速建设国防后方，增强抗战建国实力。由于以上关系，是以对于中共不能不表示亲切，用以共同携手抵抗暴日，以争取抗战建国之最后胜利。十年来，职亲苏亲共之意即在此。然而此种真诚，不但未换得相等代价，反而利用职与彼等之关系，对于新疆到处施以破坏。例如历次阴谋暴动案发生，虽经破获审讯，结果均系受苏联暗中所策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尤以计划本年在四一二大会时所举行暴动为最毒辣，实亦职最感痛心者也。查此次阴谋暴动案，计划异常周详，吸收军政界干部较历次为多，所有苏联在新工作人员，领事、顾问、教官等，以及中共在新各部门工作人员，均行参加在内，组织异常庞大，届时刺杀职本人而外，所有军政各

机关忠实干部，一律刺杀，推翻现政府，成立在苏联与中共卵翼下，脱离中国版图，树立苏维埃政权。此种丧心病狂，甘愿为虎作伥之举动，尤堪痛恨。此种阴谋计划，在四一二之先，因机械化旅长盛世骥被刺身死，遂将全案破获，未及成事，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也。根据以上之各事实，职现已彻底觉悟，苏联国家确实离开马克思主义，走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尤有甚者，即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以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至中共不但与苏联采取同一步骤，而又复借新疆与其亲近之关系，从而进行破坏，发展其自己势力，意图掠取新疆，扩充为根据地。以职十年来身临其境所经过之事实考验，证明确无丝毫虚伪之处。

(二)前者职弟世骥赴渝，蒙钧座延见，并荷诚挚招待，感激莫名。回新道及钧座曾谓民生主义亦即社会主义，敬聆之余，异常感奋。查职拙著六大政策教程第二分册上，亦曾提及中国革命之第一步应实行三民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更可证明职之思想与钧座理论，适相吻合。

(三)查职过去实由学识与经验之不足，致被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的人们所愚弄欺骗，而该等又复变本加厉，使用各种方法，离间职与钧座之感情，挑拨新疆与中央之亲密关系，从事于进行破坏，以达成其侵略领土之野心。是以职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诚如钧座所谓，当此国家绝续存亡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相共之时者是也。

(四)职远在抗战开始，中共驻苏联代表王明偕同康生、邓发返回延安，路过新疆，彼时职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关系，向他们提出愿意加入中共，他们当时答复，将职的意思转达中央政治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员任弼时赴苏联，路过新疆，答复关于以上问题谓：职入党业经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康生、彭德怀、任弼时等通

过,将职加入党籍。同时,职之加入中共,他们认为异常光荣,不过以职地位关系,不能即时入党,曾经中共中央报告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批示盛督办早已经具备入党资格,新疆文化落后,恐被英帝国主义及中国国民党所知悉,于新疆有所不利,不能成立党部,应暂缓介绍入党等语。

嗣职于一九三八年九月间赴苏,面见史大林,请求入党,他们赞成先入联共,后再入中共,彼时我很希望和确信能转入中共,因为职系中国人,愿为中国革命努力。后来总没有人来给职办转党手续。彼时我有些怀疑,不料想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间,苏联派员秘密到新疆来,给我一个绝对秘密文件,系租借新疆锡矿条约。内容异常荒谬与不合理,完全带侵略性质。彼时职要求修改内容,以及缩短租借年限,苏方来员答复谓:你一个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联共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彼时阿山正在事变,职又身体有病,虽勉强在条约内盖章,迨盖章时,又让职加盖省督两关防,当时经职予以拒绝。同时该项条约,原系苏联政府派人持条约向职来租借矿产,惟其在条约上,则写新疆政府同意,苏联是项举动,职认为与事实不符,应予修改。苏方来人谓:就这样作,以后你见史大林就知道了。时职又要求开采是项锡矿,需要苏联与新疆合办,苏联来人谓:你一方面是联共党员,一方面马仲英、马虎山变乱时期,苏联在新疆流过很多的血,我们没有得着什么代价。

以后苏联又继续送来一封秘密文件,为的合办独山子油矿问题,又来令我签字,经职拒绝了。

由以上事实,证明苏联拉拢我入党,为的是签订密约,对新疆便于进行侵略,已属毫无疑问。

(五)此次苏联外次来迪,亲自向职送交苏联政府重要文件一封,其内容不但荒谬绝伦,而且包含着其他不良之恶意,例如:盛旅长被他们苏联的煌煌外交代表和军事顾问策动下的刺客刺杀了,

而他们反说盛旅长与职竞争新疆事业而致死。这种毫无道理之言论，充分的显示出来他们的无赖和卑鄙。

然而他们的无赖和卑鄙，尚不止此。在该文件内所称，“一九三四年职曾与苏联政府建议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一节，其实该项建议，乃系马匪仲英围困迪化时之不得已处置，尤其被当时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阿布列索夫胁迫之下，而不得不如此办理，因为彼时马匪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嗾使，在北疆抱着组织回教国的野心，新疆汉族人，有被马匪屠杀净尽危险，阿比特大毛拉受英帝国主义之嗾使，在南疆抱着组织东土耳其斯坦的野心，新疆整个的领土，有脱离中国的危险，新疆孤悬塞外，如向中央求援，不仅鞭长莫及，而且迫不及待，只有向苏联求友谊之援助，该阿布列索夫于此危急状况之下，曾试验职的态度，同时不公开的提出，如果求得苏联援助，需要对苏联有极诚恳极明显的表示。职在此险恶局面之下，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保持国家领土，不能不出此通权达变之措施，以维持当时之局面。

至于该文件内所谓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职曾“赞成并拥护了张学良”一节，更属一种企图恶意挑拨之言词。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职不仅电达南京张代表元夫说明“既不参加亦不同情”的态度，而且与张学良的复电也是公开的表示了“不参加不同情”的态度。往事昭然，均有电文可资证明。该文件中所以提此之用意，无非意图借此挑拨感情与恫吓职之与中央接近耳。本来西安事变，乃系中共得到第三国际的同情而策动的。据职所知，西安事变能以得到迅速平息的原因，是他们“中共和第三国际”不能不放弃他们的预定的阴毒计谋。

又在该文件内所称，一九四一年曾“建议苏联政府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一节，其实并非职之真意请求，而正是职借以测探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原因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间，曾破获了新疆维吾尔族、塔塔

尔、归化族、回族的大阴谋暴动案,该案之目的,是要把新疆脱离中国,成立维吾尔斯坦。该案之参加者,均系新疆各族中最有名望之人物,而该案之策动者,则系苏联前任驻迪化总领事欧杰阳克。该案破获后,所有刺客十数人,参加者百数十人,均经就捕,而予以平息。惟该案背景,究系托派所组织,抑或出于苏联国家之阴谋,当时尚未能明白其真相。因此职为了测验该案背景,是否苏联政府之行为,所以去了上述的信件,以观苏联政府如何答复。他们已识破了是职之试探,所以迄今未得答复。

综合以上情形,可以看出苏联政府所送达之文件,一面是恫吓,一面是挑拨,而另一方面是防止职与钧座之接近,已照然无疑矣。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 潘友新谈话纪录

(重庆,1942年7月9日)

地点——曾家岩官邸)

潘友新:今天余奉斯塔林^①之意旨,代表苏联政府,有一事必须报告委座,即苏联政府对于新疆盛督办之态度颇为怀疑,在不久以前,盛督办对于苏联驻新疆工作人员,提出完全无理由、无根据之话,作出对于他们很不友谊,令人很不满意之事,盛督办认为苏联在新工作人员完全是反对新疆的,其实这都是谣言。苏联政府就此事为向盛督办说明苏联政府对盛督办之态度起见,特由莫洛托夫、斯塔林与提摩盛科^②复盛督办一函,意在劝请盛督办不可作错误之事。苏联政府认为贵国政府对于此事必甚明了,故特将此函递呈委座,函中所述盛督办之作法,对于贵国政府固属错误,对于苏联政府亦属错误,而察其用意似非偶然,且可证明盛督办过去对于贵国政府种种作为,与今日对苏联政府之态度,似皆有敌人为其背景,其左右更不无敌人所派之间谍,今莫洛托夫、斯塔林、提摩盛科之复信已送到盛督办,谅盛阅此函后,必可获一结论,即由于此函之劝告,对于彼之工作,必有许多裨益。

委座:盛督办种种表示是否已详具此函中?

潘友新:此函内容所举各事皆描写盛督办之行为与态度。

① 即斯大林。

② С. К. Тимошенко, 苏联元帅, 西方向总司令和西南方向总司令。

委座：贵国政府对于凡关新疆之事应与敝国中央政府交涉，不可与盛督办径行谈判。对于大使今日所述之事，俟余详阅此信后再行办理。

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长莫洛托夫 致新疆边防督办盛才书(译文)

盛督办阁下：五月十日大函收到。斯达林委员长及本人均已拜读，沃罗希洛夫及提摩盛科两元帅现均在前方，已将来示暨附件转致渠等察阅矣。

来件及大示中，对我国驻迪化总领事巴古宁、军事总参事拉托夫将军，以及大示中所开列之其他我国驻新工作人员极致责难，此类责难之词，洵属闻所未闻而毫无根据者，其发生此类责难之由，殆皆基于某种挑衅性之谣诬，贵督办不加察究，致为此类谣诬所惑，此固为苏联政府所了然者也。如谣诬诚足信也，则近在新疆与莫斯科两地流行谣诬，竟谓杀盛世骥者乃督办也，并称督办之所以杀盛世骥者，以其为阁下统治新疆之竞争者也，阁下将何以自解乎？然苏联未之轻信如阁下然。至于本案之侦讯及其实际领导者——李蒲林与李应祺(译音)^①，皆并不足以取信于吾人，其在另一起诉书中，又罪及于留居沙拉苏迈地方之苏籍人民某君，经查明毫无确证。而为阁下所敦请之两位显要中国人士，亦因此而拒不签署于起诉书，此则为人所共知者也。

查巴古宁、拉托夫^②及其他苏联工作人员皆为历经考验、忠实可靠之人，向为苏联政府所信赖且仍将信赖之，渠等一本忠贞，长期致力于新疆与中苏友善之事业。今所加诸于渠等之罪状，均系毫无根据且意存污陷，苏联政府断难承认。至阁下建议由我方派

① 即李溥霖、李英奇。——本书编者

② Рагов。

员至迪化参与侦讯一节，苏联政府认为案件之侦讯，乃新省之内政，故无派员干与之必要，且认为所列诸被告既确无罪行，自不能根据此类污蔑之控诉而即置彼等于法也。

阁下之压制政策在新省继续不断进行，对新省重要人员，非撤即捕，其性质已极为广泛而危险，此类行为正当与否，亦不能令人无疑，盖此类行为殊有消灭新省大部分行政与军事干部之危险也。

就吾人推想所及，阁下左右似有仇视贵国之帝国主义奸细匿迹于其间，彼等固极欲破坏中苏关系及新省现状而变阁下为其工具。

忆昔日阁下行为，亦曾累犯严重错误，致为亲者痛而仇者快，料即受秘密奸细之影响所致，然予阁下以援手以纠正此类危险之错误者，非苏联政府乎？此为阁下所熟知也。

尚在一九三四年时，阁下曾建议苏联政府速于新疆境内实施共产主义，并以次及于甘、陕，并认为推翻蒋委员长所领导之中央政府为救中国、救新疆之唯一途径，苏联政府当即认为阁下立场为错误而有害，并向阁下声明，苏联政府断不能同意在落后之新疆予以实施共产主义之政策，且认为阁下对中国中央政府之态度绝对不正确，而谆谆劝告阁下对中央政府应矢诚拥戴，并与中央政府统一战线以与帝国主义奋斗。

其次，当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时，张学良在西安举兵作乱，蒋委员长蒙难于是地。阁下当时力主无条件的援张，且欲公开宣言，新省全力支持张学良之暴行，苏联政府即对张学良之挑衅暴行表明自己之态度，严斥张氏反对中国政府之暴乱行为，与围困中国人民领袖蒋委员长，徒为日本之侵略为虎作伥，而有损于中国人民之利益，故劝告阁下电复求援于阁下之张学良氏，不同意其所为及不能与彼结合作乱，惟经苏联政府坚持之后，阁下始放弃援张及支持其反对中国中央政府暴动之意念。

最后当一九四一年一月时，阁下向吾人建议，使新疆叛离中国

而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谓“时机已成熟,英帝国主义者及蒋委员长皆无能干与新疆事”。又谓“苏维埃之新疆将推动全中国踏上苏维埃化之道路”,苏联政府仍一本数年前之理由,有如阁下已知者,对阁下之建议坚决反对。苏联政府顷甚盼阁下能就上述各节作出必要之结论,并求得问题之正当解决,以期预防吾人关系之恶化。专此,顺祝健康。外交人民委员长莫洛托夫奉苏联政府之命手启。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

(《战时外交》(二)^①,第435—437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 致蒋介石报告

(1942年7月13日)

委员长钧鉴：关于苏联与新省问题。职于昨(十二)日约集程副总长、徐部长、张部长、贺主任及周主任至柔等详细研究，结论如附件。至盛世骥被暗杀一案，现对苏方似以不必提及为宜，当否？统乞钧核，并叩崇安。职何应钦谨呈。卅一年七月十三日。

附：收复新疆主权方略

第一，新疆现势之判断

一、苏联有吞并之阴谋，及足够之武力，但在国际形势上，如公然以武力占领新疆，暴露侵华态度，在政略及战略上均属不利。现将致盛函抄送中国之目的，在对我表示无领土野心，及过去爱护之种种事实，并挑拨离间盛世才与中央之关系，迫其铤而走险，以孤立之，并嫁以罪名，尔后将不择任何卑污手段，设法铲除之，以便扶植另一傀儡，以维护在新疆既得之权益。

二、盛世才惧苏联威胁，内怵奸伪暴动，势必依附中央，并望予以所要之支援，使苏联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发动暴力行为，以苟延残喘。

万一丧失新疆政权，殊有被奸伪取而代之之可能。

第二，方针

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目的，应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省主权。惟中央对新，过去既鲜充分准备，现又尚无确实控制之余力，故目前依政略之运用，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植]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

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

第三，实行要领

第一期 现在过渡时期

一、对苏仍本睦邻政策，并运用政略，遏止其对新采取断然之行动为主眼。

甲、此次苏方仅将致盛之函抄送我方，另无其他正式函件，故对苏方只宜予以口头答复，其答复之大意如下：

1. 对于苏联将致盛督办函抄送我方，表示谢意。
2. 上项苏方致盛督办函，盛督办亦已抄呈中央。
3. 说明苏联与我新省间演成复杂不快之现状，系由于以往苏联与我新省间直接交涉所惹起。今后关于我新省与苏联间之问题。我中央政府当随时予新省以指示及监督。并说明现中苏系同盟国家，一切外交，均应循正轨。附记：若苏方询及我中央今后对盛督办态度如何，最好避免答复，或答以正在研究中，若苏方不问此点，即不必提及。

乙、设法使英、美基督教入新疆传教，使苏联行动多所瞻顾，稍加敛迹。

二、对盛以维持并利用其地位为主眼，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多方面以善意之扶助，俾增进其对中央之信赖，使逐渐中央化。目前实施要端如下：

甲、随时派遣军政大员前往新疆，与盛保持密切之联系，使苏联对新阴谋有所顾忌，并对盛宣达中央德意，巩固其内向之信念。

乙、于征得盛之同意后，逐渐改组新疆省政府，并派遣优秀军政干部及特务人员。密入新疆工作，助盛加强组织。

丙、经济上与以所要之援助。

丁、派遣外交特派员驻迪化，以减轻苏联对盛直接之压力。

戊、其他盛所希望之扶助。

三、军事上之准备

甲、以保护油矿区名义，加强河西尤其玉门附近之兵力（约精练之一师）。

乙、增辟南疆机场，以保护机场之名义，适时派遣中央军一部（一师以下）于该地。

丙、以柴达木屯垦名义，催促骑五军尽速进驻该地，并在经费上与以所要之协助。

丁、迅速进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边防，以策应新疆。

戊、适时划南疆为一师管区，从事军备之建设。

第二期 收复主权时期

乘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我之国际地位更有利时机，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取消承认伪满、伪蒙。不得支持中共，撤退驻新之红军第八团及空军、战车等部队，及其他一切非法案件之要求。）

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肃清新省一切不稳分子，收复主权。

附 注

谨按目前局势，苏联虽未便公然以武力吞并新疆，然尚有应付事变之余力，顾盛之地位，则岌岌不能自保，我又以鞭长莫及，尤以素鲜准备，暂时不能与以直接之支援，故右述外交要求，暂时未便提出，否则彼将置之不理。至于武力进入，亦属不利，盖我之余力及增援速度，均相形见绌，难期奏功，反有促成新疆现局迅速崩溃之虞，故以俟前述有利时机，乃能断然实施，以策万全。

（《战时外交》（二）^①，第438—440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 潘友新谈话纪录

(1942年7月16日)

时间——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后五时

地点——黄山官邸

潘友新：委座官邸清凉有如另一世界！

委座：大使驻处尚适意否？

潘友新：近日炎热，晚间不能入睡。

委座：汪家花园大使故居，尚为保留，请即移居山上。

潘友新：委座隆情，至深感激，内子获此佳音，更不知其如何欣感矣。谨代向蒋夫人请安。

委座：谢谢！前获大使面交莫洛托夫等复盛督办世才一函，内容余已详悉，对于贵国政府此番好意，敝国政府深为领受而感动，关于此事，盛督办世才亦已有文件报告。我中苏两国为革命国家，更为同患难友邦，若论现时处境，情势尤属如是，今承以关系两国邦交之重要物件相告，无论公谊私交，余对贵国政府与贵大使此举，均为之特别感动。

潘友新：余前此奉呈斯塔林、莫洛托夫等复盛督办之函件，即希望委座明了敝国政府之好意，与敝国政府对盛督办之态度，今蒙明察，甚为感激！谨当将委座所示意旨，立即电呈斯塔林与莫洛托夫先生。

委座：大使电告贵国政府时，请将余对此事之意见，一并转告，即敝国新疆省当局过去既有此不合理之情形，为改正起见，今

后两国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迳行交涉，以免发生误会。尤其当此贵我两国共同反抗侵略作战之时，两国一切交涉，更应守此精神，积极敦睦盟谊。

潘友新：上次晋谒时已承委座面示此意，余并已转告敝国政府矣，今既承重行提示，谨当再度转告。

委座：此次余派翁部长文灏前赴新疆，即为与贵国洽商石山子煤矿〔独山子油矿〕订约事，以后两国间凡有关新疆省经济事项，贵我两国政府只要一秉公平之精神，开诚商讨，无不可解决之事。

潘友新：委座所示，余甚欣感！敝国政府对于贵国向抱诚恳之态度，亟盼贵国经此次抗战克服此最大危难之后，能成一更强盛进步之国家。此为敝国举国一致之祈望，谅为贵国之所深悉。翁部长此次赴新，余当电告敝国政府与之进行协商，以期圆满成功。

委座：我中苏两国既属同盟反抗侵略，即有共同一致之利害关系，故凡事皆可公平商议，无不可和洽解决者。

潘友新：委座此意，余当立即一并电达敝国政府，余亦深信贵我两国无不可公平解决之问题。

尚有一事请示委座，既余前曾与贵国外交部傅次长谈话，拟请允敝国外交飞机航渝访问，承傅次长答复，意恐其将飞延安，遂藉口于未获军事当局之允诺，拒绝余之请求，其实敝国外交飞机，决不致赴延安，亦未敢任意前往他处，因彼等携有许多文化宣传资料，现无法航寄来此，故亟盼能随机带来。

委座：此事余可为一查。

潘友新：提及飞机，尚有一事须呈明委座者，即前次敝国顾问所乘飞机一架停落兰州，一般宣传谓事先未通知贵国政府获得允许，故被扣留。余闻之，殊为愤慨，已电告负责人员加以查究。惟此机停在兰州已逾月余，拟请早日解决。

委座：此乃小事，请勿过虑，实则贵我两国间关于航空，已订

有条约,只因下面人员不守条约规定,以致发生此项误会,以后两国政府督饬办事人员严守条约规定,履行正式手续,即可避免误会。

潘友新:余绝对赞同委座此项意见,今两国间航空,既有条约规定,即应绝对遵守,否则,何贵我订此条约,余当本余大使之职权督饬敝国办事人员严守条约,如有违反,即须由其负责。今事实上既发生错误,即不能不予以纠正。如其无意违反条约,则又何不谨慎将事,履约履行,此点余当转达敝国政府,严为告戒。

委座:关于航空之事,贵我两国政府,诚不能不特别谨慎戒备,否则一有疏忽,如遇敌人雇用白俄冒充苏联飞机侵入敝国领空或城镇,岂非绝大危险之事!

潘友新:委座之所顾虑者,余绝对接受。但有一语必须奉告者,即贵国顾问事务处卜处长盼能与敝国顾问发生更密切之关系,盖敝国顾问此来,必能诚恳为贵国服务,故盼予以充分之信赖也。

以上办事:(一)敝国外交飞机访渝(此机二、三月开始来一次),(二)对敝国军事顾问勿生误会,敬盼委座指示。

委座:余可为查明办理。

关于新疆省事,余尚有一点意见请转达贵国政府。即新疆问题,完全为敝国内政问题,此次承莫格托夫以复盛督办世才之函件告余,足见贵国政府尊重我国内政统一之盛意,余甚感激。余为此事现已特派朱长官绍良前往新疆省调查,并督促盛督办世才以后对于新疆省与贵国交涉之事,必须秉承敝国中央政府之政策与法令办理,与贵国和善相处。惟莫洛托夫复函中所述盛督办左右有敌人之间谍潜伏一节,余敢确实保证盛督办决不致如此,请贵国方面释念。总之,对于新疆省经济事项与贵国之交涉,余已派翁部长前往负责办理,对于政治调查与督察事项,刻已派朱长官赴新负责主持,此意请一并转达贵国政府。

至关于石山子煤矿[独山子油矿]事,亟盼能与贵国政府及早签订条约,以便积极开采,藉供战时需要。

潘友新:尊意谨当立即电告敝国政府。今日蒙委座召见,至谢,再会。

委 座:再会!

(《战时外交》(二)^①,第 440—444 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电

(摘要)

(1942年7月23日)

(1)朱长官返迪带下钧座亲笔谕示,以及囑朱长官面达各项事宜亦已聆悉,钧座对于新省关怀提携及对职个人爱护关切之意,铭感无既,所有关于新疆一切事宜及朱长官面达其他一切事项,正与朱长官秘密交换意见商谈中,一俟商讨结束后,即由朱长官报告。

(2)蒙发新疆轻重机枪一百挺,实深感激,如何领运,亦正与朱长官研究中。

(3)关于苏外次戴康诺卓夫,此次来新所带来莫洛托夫文件二件,一系关于独山子油矿问题,一系关于苏籍人员在新策动四·一二暴动,及刺杀盛旅长世骥问题之反驳,并认为职系诬告,此案经过详情及其来文二件,前经朱长官转呈钧座矣。关于此次职与戴次长谈话及答复苏方文件,俟最近用专禀秘密报告钧座。

(《战时外交》(二)^①,第444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与中国外交部 政务次长傅秉常谈话备忘录

(1942年9月28日)

今天下午走访外交部,说明与拜访目的有关问题后,谈话转向一般寒暄,有机会询问调整新疆局势方面是否取得新进展。

傅先生答复:一切进行顺利,苏联态度比较理智,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将军合作得也很好。外交部特派员吴泽湘已抵达新疆。全省外交事务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目前已由吴特派员全部掌握。据说全省将进行改组,内政以及党务均将更严格地受国民政府监督。

当问及所谓“俄国旅”是否仍在哈密?军队问题是否遇到难题?该旅成员是“白俄”还是“赤俄”,以及是否属于地方军队?傅回答说,俄国人属于省军,已由“白”变“赤”。他继续说,和苏联政府讨论的全部问题当然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必须非常小心地对待。但是截至目前,苏方态度还比较通情达理。

我提到这样一些事实:新疆毗连苏联领土,和中国内地商业中心距离较远,苏联和新疆进行相当数量的边境贸易是很自然的事。大概俄国人把新疆看作紧邻领土,对开发新疆可能特别感兴趣。傅回答说,他认为在新疆的开发中,俄国人的利益太重了。他微笑地补充说,甚至可以将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请到新疆来(大概是为了抵销俄国势力)。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开采新疆油田问题,探询是否主要由苏联开发。傅略为迟疑后回答说,关于开采油田问题有必要和苏联政府进行一些讨论,他估计这种讨论即将开始。说完

这些话后,显然他感到这个消息最好请我绝对保密,仅限于我们两人之间,不要外传。我认为这个问题谈得已差不多,于是转到另外的话题上。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外交部代电

(1942年9月28日)

关于解决新省交还苏联边境五领馆办法，经四次会商已于本日解决，原办法四条，兹谨抄呈如下：[原办法四条，原件略。——编者]前项解决办法，如经核准，除请新省府照第一条后列办法，电知各该领馆遵照外，应请钧部电知驻苏大使馆知照。自十月一日起，各该领馆完全受该大使馆管辖。至于第三条原意，是在分期将各异党分子借词调训，到渝后再定任免，以免苏联方面将来责难或遭拒绝发给新任人员执行任务证书。应密列名单一纸，拟俟盛兼主席送到后再行密陈。据悉，各该领馆首长及所属职员多系中共或苏共党员，影响所及，自必甚巨。将来各员受训先后及其任免似应由驻苏大使馆派员密查，抑或由职就近前往密查后呈部定夺，均乞详密电示祇遵……

附：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提议解决五领馆办法

一、根据盛兼主席前上委员长蒋电，愿将外交权交还中央原则，新省府同意将苏联边境五领馆（塔什干总领事馆、阿拉木图领事馆、斜米领事馆、宰桑领事馆、安吉延领事馆）行政权交还中央，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实行，并先期电知各该馆遵照。

二、自本年十月一日起，所有各馆经费改由外部径发。十月一日以前所有收支仍由新省府负责。

三、各该馆首长及所属职员，如系隶属异党，请盛兼主席密列

名单交由吴特派员转呈外部,分期调渝受训,其他忠实首长、职员,经由外部使领馆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审定资格后予以加委。

四、前项调训人员,如苏联方面探询理由,省府与公署方面均不予加以解释。

(原新疆省档案)

(摘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外交部电

(1942年10月6日)

……盛兼主席昨日面交全省公安管理处报告一份，内容涉及苏联在新省各地诱引我各族公民入苏联国籍，两年以来情况严重，有增无已。苏联领馆对此类取得苏联国籍公民庇护备至，且进而主张类似裁判权利，显系违约举动。此案以及独山子油矿案，农具制造案，苏联坦克车借词擅入我国国境案，驻苏五领馆收回后，异党馆员处置案，与驻疏勒英总领略请恢复中英货易案，均属重要。航邮报告单程动辄近月，专电报告亦难尽详，本月十号左右，由新有便机来渝，拟请返都一行，面向钧座请示机宜，并已与盛兼主席洽妥在渝逗留一周，即仍回新……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 致美驻华大使高思备忘录

(1942年10月7日)

在委员长和蒋夫人招待威尔基(十月三日)的晚宴上,我有机会和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作了一次长谈。关于最近新疆省局势的进展,傅表示俄国对中央政府向该省扩大权力的反应尚属令人满意。他认为俄国采取目前的态度原因有二:苏联政府认识到向新疆渗透的政策是错误的。他们甚至发现二十年代支持和鼓励鲍罗廷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也犯了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代俄国渗透到新疆时,新疆省基本不存在中央或国民党政府势力。渗透的性质主要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由于新疆和内地的商业关系以及内地的投资差不多等于零,所以渗透对中国内地毫无损害而且对当地居民和经济发展都有好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政府明白,万一日本进攻西伯利亚,中国的友好非常有用,所以通过友好方式消除可能发生磨擦或误解的根源不失为上策(关于这方面最好回顾一下威尔基对最近几周斯大林不再特别关心日本进攻西伯利亚问题的评论)。

我问傅,有没有可能将新疆的良好开端带到解决现有问题和战后关系上,从而达成总的基本谅解——类似关于日本进攻西伯利亚的英俄协定。傅博士说,有一个那样的协定当然有利,他表示,他一向赞成中俄两国应该更进一步了解。不过看起来很难做到(可能他已经想到保守派和军方流行的坚固信念,他们认为陕西省中共受莫斯科支持,而莫斯科是不会取消这种支持的)。他表示

的意见和几个星期前孔博士向我表示的一样。美国有可能施加影响,促成中俄取得谅解,他同意谅解应在召开停战会议前。

傅博士接着作出了惊人之谈,他有一些感觉,认为英美联合对中国不够坦诚,在计划和目的方面必需保持完全信任。我告诉他,我感到美国的目的完全光明正大,但不能负责向英国说明。不承认英美之间背着中国存在任何谅解。

后来,谈话又转到外交部最近向大使馆提出一件抗议的问题上,抗议内容是关于美国杂志上批评中国的一些文章(主要针对埃德加·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八月八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告诉傅,美国政府不对报纸上发表的意见加以控制,这样做不合适,相信他也会赞成我的意见。我们对新闻自由评价很高:新闻有批评美国政府一切活动的自由。除有关军事战略和作战问题外,无论对国内或国外事件,都可发表意见,实行限制是不明智的。他说,遗憾的是美国报纸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几个月里过分地捧中国,使中国人忘乎所以。许多人感觉现在的批评突如其来。他说,中国需要和希望的既不是赞扬,也不是批评,而是美国对中国军队的空中支援。

(译自《美国外交文件》1942年中国卷,第245—246页)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彭吉元致外交部电

(1942年10月18日)

……奉新疆省政府通知：据报于八月十七日，有苏联坦克三辆，甲车二辆，至新车二台并继续向迪化方面行进。当经督办派署参谋长汪鸿藻向军事顾问瓦西力也夫^①询问，当答以新来之坦克二辆，系补充哈密第八团车辆缺额，其余运至哈密拆卸零件，配备其他甲车需用等语。复以苏联向新疆运送军用器材，事先未得新疆政府许可，擅将坦克、甲车开入新疆境内，其次在从前重庆来人，对于新疆哈密所驻机械化部队，曾谓：哈密不适宜于训练此种军队，应调至迪化训练。彼时答复谓：谣传马部军队，时有扰害新疆企图，是以暂缓调回。现在马部军队，业经调往他处，所遗防务，均由中央军接防，如果再增加哈密驻军武器，更恐引起误会，并且以前第八团团团长来省，曾对督办报告谓，该团编制以及各种器材，均甚完备，似乎勿须再补充。同时苏联正在抗德时期，需用以上军用器材甚急，移至后方，莫如开往苏联，更较为有力。

根据以上理由，复派汪参谋长鸿藻向军事顾问瓦西力也夫提出，并请求彼制止坦克车继续前进。该顾问答复谓：上项武器过境，因接得苏联军器配备机关通知较晚，故未事前通知，至坦克车来新，系军部命令，我无权制止等语。当以该顾问此项答复，未能认为满意，咨请省政府，转给外交特派员向苏联领事馆正式提出交涉等因。

职奉命之后，即行根据以上理由，向苏联领馆总领事巴库林提

^① A. B. Васильев 西北战线军事顾问。

出交涉，其答复各节，与瓦顾问答复汪参谋长情形大致相同。最后仅云，将新疆政府希望停止坦克车前进，允为转请苏联政府[等]候指示等语。

查苏联军用坦克、甲车，随便过境，未便任该总领事等推诿卸责，即置不问，及复向苏联领事提出如下之意见：

1. 贵总领事答复总结，已经传达新疆省政府，认为贵总领事系苏联驻新疆全权代表，谓为无法制止此次开来之坦克、甲车前进，不甚诧异。如贵总领事无权制止其前进，因该项坦克、甲车在新疆境内，新疆政府，能设法停止其前进，贵总领事对于此项直接劝告停止前进办法，以为如何？

2. 请贵总领事可将详细情形，报告苏联政府，并请将此次所来坦克、甲车如数调回，以免误会。

3. 本人以外交特权员资格，愿将此事报告中国外交部。因本人虽系新省公务员，但对外交部系直接负责者，如不事先报告，将来事件扩大，本人难负责任。

4. 新疆政府希望由贵总领事停止该项坦克、甲车前进，较为方便。

苏联总领事巴库答称：立即电请苏联政府，发布停止坦克、甲车前进命令，大约在明日（十九日）晚间，即可得苏方回电，至此事全部问题解决，须三二日后方能决定等语。

查此项坦克、甲车□如□□□日接得停止前进的回电，即可作为地方事件，在当地予以解决。

倘该项坦克、甲车仍继续前进，不能在当地解决时，再电请钧部提向苏联驻中国大使交涉……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外交部致蒋介石代电

(1942年10月21日)

(一)对苏方针应本中苏友好精神,以中苏现行条约,及中俄各界约暨我国务种涉外法令为与苏方谈判之根据。

甲、关于中苏国境部分,“以霍尔果斯为例,依照民国十三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七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允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因此依照光绪八年中俄伊犁界约第一条“以霍尔果斯东边为中国地,西边为俄国地”,足证霍尔果斯为中苏合法国境,毫无疑义。

乙、关于军事、政治、经济各部分,除独山子油矿业由中苏商订合办合同外,如迪化农具制造厂即飞机制造厂,并无中苏合办之约定,现在该厂早经成立,全由苏联人员主持,似应早日收回或与苏联合办。新、甘省内苏联所设无线电台需要已成过去,似应令其拆撤。闻新疆本有归化军,本由白党俄人组成,但其后苏即派兵混入,现在实际上已成苏联军队,如现在苏联承认其为苏军,而并未取得新省政府书面同意时,我方自可请其全部撤出;如苏联认为系我国之归化军,我方自可分部调防,化整为零,予以遣散。至新苏商务经济协定,现在已否满期,或仍继续有效,似有查明之必要,以为交涉之准备。其苏联人民在新省所受特殊待遇,苏联飞机、车辆入新境不受检查各事,亦应予以纠正。至中苏航空站似应由华人主持或由中苏两方人员合办。

(二)实施步骤:新疆为我国领土,我对苏联虽不宜操之过急,但仍须把握时机,规定计划,次第实行。其步骤:

甲、关于苏方在新取得之合法利益，如有地方协定而其失效期间尚早时，应由中央与之商订。

乙、如无协定根据而无关主权时，应分别予以调整。

丙、无论有无协定之根据，其所得利益妨碍我主权时，应分别予以调整或取缔。

丁、关于国境检查，我国应在霍尔果斯及其他新边要地派驻军队，布置防务，作为中央恢复新疆主权之一种表示。

戊、苏联飞机入新省境内，须先依照外国航空器飞行国境统一办法，及检查暂行办法办理，否则以非法越界论。其经中国核准飞航入境之苏机，应在霍尔果斯施行检查，在霍尔果斯未设机场以前，暂以伊宁为办理检查入境手续地点。

己、苏联车辆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擅自入境，其经核准入境车辆应在霍尔果斯施行检查。

庚、苏联人民未持有我国合法出入境签证者，不得擅自出入新疆省境，违者以非法越界论。（将来苏联代我自阿拉木图运输物资之车辆出入境办法，应会同有关各机关另行商定之）。

苏方在新非法行动相沿已久，兹予矫正自感不便，但在现在国际局势之下，我方进行调整与之提高，苏方似不致公然表示拒绝，惟难免有色取行违情形。我方似应选派精明干练之负责人员执行之，并先派兵入新，以为我决心处置之表示，但在实际上不可过于操切，以免影响邦交。是否有当？理合电请鉴核。

（《战时外交》（二）^①，第 445—446 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 年版。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致盛世才电

(1942年12月16日)

兹将苏联政府以下的声明转达阁下：

“督办阁下：新疆公安当局对居住新疆之苏籍公民继续施以不可容许的无礼及妄为的行动，苏联政府特请阁下对此予以注意。毫无任何缘故，对于留新苏民就加以追究和逮捕，公安局以蛮横手段迫使苏籍人民缴纳苏联公民证并退出苏籍；除宰以那洛夫，牙可弗列夫，王克思(译音)，吴国林，柏林诺夫，苏林，伊里音等非法被捕外——以上诸人迄今多半仍在羁押中——公安局又逮捕了很多的苏籍公民，如像：塔卡也夫，阿塔米尔扎也夫，古利苏木，阿则早夫，热黑木，傻若洛夫，扎格发拉里等人。傻若洛夫，扎格发拉里被捕后，公安局复将其一妻二女逮捕，将失去父母之六个幼儿弃之不顾。上述苏籍公民被捕的口实是他们拒绝执行公安局非法的要求——缴销苏联公民证，请领中国公民证。现在处在捕押的恐惧之下的，尚有很多其他的留新苏籍公民。

苏联政府不能容许新疆的公安局对苏籍公民施行这种无礼及妄为的行动，除将新疆公安局此种行为的责任完全置之新疆省政府外，要求将所有苏籍公民立予释放，并对苏联公民在新疆境内居住之安全，予以保证”。……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季米特洛夫日记

(节录)

1942年

1942年7月15日

向毛泽东通报,苏联代表(杰卡诺佐夫)正在新疆处理与盛世才的关系,为此,目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留在新疆。

1942年7月16日

(情报局)鲍尔沙科夫和基斯连科谈新疆和中国问题。

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中国人认为,造成的原因是苏联医生奥尔洛夫使用了磺胺吡啶,此地专家的结论否定了磺胺吡啶的这种作用。

……

1942年10月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林报告说,盛世才拒绝了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疆起程的要求。

1942年11月20日

发布了以下决定:

“由于一些部处领导擅自禁止自己的工作人员就本部处的工作问题或其他问题直接报告共产国际委员会总书记,现在:

(1)我宣布,每一位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工作人员都可以直接向总书记报告,如果认为必要,对工作有利的话;

(2)我提醒,部处领导没有权利对工作人员直接报告总书记进行威胁;

(3)凡是在我们机关对下属工作人员有类似态度,损害了工作利益的领导,要承担责任,包括开除公职。

这一决定要传达到每一位部处级干部,签字并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全体工作人员。”

1942年12月2日

(红军情报局)伊利乔夫及其政工副手来我处。他们带来了根据从南斯拉夫同志那里获取的情报绘制的、标有对游击队至关重要的南斯拉夫地区图。

通报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情况。也谈到了新疆的情况,决定派遣工作人员去那里。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法共和意共关于新形势下近期任务的文件。

(摘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蒋介石、外交部代电

(1943年1月5日)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已于上月三十日由苏抵此，当晚曾由盛督办于督署设宴洗尘，翌日及元月一日均在馆与苏方有关人员会商。二日潘大使即偕普总领事及其他领馆人员乘车前赴独山子油矿视察。

曾于陷、东两日电呈有案。潘大使事前通知，谓去矿指示苏方人员与我经济部所派估价人员合作等语。惟抵矿后，潘对于前项工作人员估价阅账，均表拒绝。……旋与盛督办兼主席商定由渠电话答复，借病不便出门为由，婉词拒绝。两小时后该馆又用电话请盛督办约定时间，潘大使拟偕随员前往督署面谈，当由盛督办约定明晨（六日）十一时会晤，并电约职届时参加。查苏方人员近来举动奇离，时有发现，居心何在，殊难臆断。为谨慎计，当赴督署与盛督办商定：（一）如谈话有涉及我国主权经济利益或原则问题，请潘大使径向中央洽商。（二）如所谈有关新省商务及侨务问题，应同苏领馆向职署商洽，呈部核办。（三）如谈话在解决独山子石油矿问题，应请向中央提出，但谈话为解决上项停工纠纷问题，新省府愿与苏总领馆公平处理。（四）如谈话仅为交换无关前三项问题意见，愿以个人身份行之。以上四项办法，意在防止驻在我国使节擅与地方当局进行任何外交性质谈判，致紊乱我中央集权外交之定策。但类此谈话本可据理拒绝，第以新省过去及目前情形较为特殊，不得不因地因时权宜

处理,一俟谈话完毕,当续呈报。……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盛世才致蒋介石电

(1943年1月7日)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于本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偕同驻迪化总领事普士肯顾秘书到督署与职会谈，我方在座者有吴特派员泽湘，全省公安管理处长李英奇，国民兵训练处处长盛世骥，自十一时起至下午二时止谈话历三时，谨将经过情形列陈如次：

一、潘首谓，我以朋友身份很诚恳地和督办谈谈，我感觉迩来新苏一般情况不大好，如逮捕苏联人民和独山子油矿等问题。

职答谓，我亦愿以朋友资格答复大使，新省现在一般情况及苏新关系与过去完全一样，并无变更，因中苏两国均系属盟邦，且在并肩作战，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向主亲善，苏联对于新疆以及我国均有很多援助，所以新疆对于苏联是很友好的。同时新疆与苏联已有十年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新疆极为重视，且事实上仍然继续。独山子油矿停工以及逮捕几个犯法苏联人民，不过一二特殊事件，不能与一般情况相提并论，就认为新疆对于苏联放弃了友好关系。

二、潘谓对于很多苏联人加以逮捕与二三年以前情形不同，这种情形就是不友好表示。职答谓，因为少数苏民有不法行为始予逮捕，但逮捕后经合法审讯后，认为情节较轻者均已完全释放，现在管押的只有三名，俱是中国人，并非苏联公民。我已将总领事来文移交外交署，将来由吴特派员答复。此外尚有数名潜行越界苏民被押，经审问后当送回苏方。

三、潘谓本人回到重庆即将开始与中国政府讨论独山子油矿

问题,在中苏未签订合同以前,新疆不应有不合法的行为。由现在所发现之不合理行为观察,新疆似乎不愿有此油矿似的,如逮捕苏民,怠工破坏机器等,因何迳有此类不好行为呢?实由在新疆政府领导下存在着不了解中苏现在关系而进行破坏友好工作,我说此话是有以下的根据:独山子文厂长晋省时,政府曾指示他一切改善方式,但他回厂之后,仍旧没有改善,如破坏油厂,破坏井子,窃取文书等事在文厂长回厂后发生的,由这可以证明。

职答谓,独山子油矿新省投资在四百万元以上,数目甚大,并且新疆所需汽油全赖独山子供给,同时此项油矿将来归中苏两国合办,对于中国抗战颇有关系。根据以上三点,新疆希望油矿发展与苏联有同样心理,然所以有如贵大使所说逮捕工人怠工等情事发生,纯因该厂厂长与苏方总工程师职权未经划清,工作常生磨擦所致,并非新疆政府不希望该厂发展。至于破坏油井怠工等事,前由普总领事提出,当经组织委员会前调查,结果事实与也总工程师所报不符,昨天已由李处长回复普总领事。至贵大使所提关于文厂长有破坏情事一节,前派财政厅彭厅长、建设厅李厅长会同洛副领事前往调查时,召集文厂长及也总工程师听取报告所得,并未发现文厂长有不法情事,如果有破坏情事,不仅撤职,且要惩办。再贵大使所说独山子工作人员有破坏工作情形,因该厂工作人员甚多,难免不有一二不肖之徒混迹其间,如经查出定予严加惩办,决不姑息。

总括起来,望贵大使到重庆迅速签订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合同,在正式合同未签订前,如关于该厂厂长与总工程师职权亟应划分清楚,油量如何分配等问题,均应解决,一经解决,自无磨擦可能。

四、潘大使谓,本人到伊犁时,当下机后乘汽车赴领馆途中有警察阻止,要求检查护照,经说明我是苏联大使,他仍然要看,我将护照给他看了,贵督办对此意见如何?

职答谓在贵大使未来以前，由吴特派员转据我驻苏大使来电，当即电令伊哈各航站不检查，惟因以往飞机多系直达迪化在伊犁不着陆，故当日未令伊犁各机关到场欢迎，以至贵大使在途中警察不知，要按一般情形查验护照。稍经贵大使说明，警察仍请查验，这是警察错误。我要电令伊犁查明，加重惩办，希望贵大使原谅。

潘谓你不必处罚警士，他是执行职务奉有命令的。职复答谓，贵大使来新，我已有命令不准检查的。……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函

(1943年1月21日)

……顷准新疆省政府秘字一二三七号公函内开：“顷准苏联驻迪总领馆十二月十六日第三四号公函，以新疆公安当局对居住新疆之苏籍公民，施以无礼及妄为行动，加以追究及逮捕，且用蛮横手段，迫使苏籍公民缴销苏联公民证，退出苏籍等，苏联政府不能容许，并要求将所有苏籍公民，立予释放等由过府，请查照迳行答复”等由；准此，本特派员当即调集各项有关卷宗，详加研究，除吴国林，苏林，柏林诺夫等三人，均为中华民国公民，历在本省各机关任职，填有履历均称归化籍民，有案可稽，免于置议外，查马克沁木、喀马里、牙科夫列夫暨伊里仁等四人，或因造谣生事，或因煽动工人，均依法逮捕，予以适当审讯，新疆省政府为顾及中苏睦谊计，从轻发落，业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及十二月二十四日分别取得开释去讫。至热黑木等四人，据公安管理处报称于逮捕审讯后，因情节较轻，早经释放。本特派员复查该民等均因有犯罪行为，经当局依法逮捕审讯，事实俱在，决不能称为无礼及妄为行动；至贵总领事谓“公安局以蛮横手段，迫使苏籍人民缴销苏联公民证并退出苏籍”等语，多系揣想之词，并无证据及根据。本特派员敢向贵总领事郑重声明，本国政府及人民，决无迫使苏籍人民领取中国公民证情事，对于苏联公民在新疆省境内合法居住生活，决予适当保护，良以本国政府尊重贵国住新侨民依现行协定所享有之合法权益，与我国政府希

望贵国政府尊重我国主权完整之心，初无二致也。……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外交部致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署电

(1943年2月22日)

……顷奉委座代电,以新省盛督办电问苏籍顾问所称,苏联常川驻留哈密陆军人员一百七十余人及飞机二十余架,系根据两国政府一九三八年之协定等语,是否由中央与苏联签订一案,饬切查议复等因。经本部查询结果,各关系方面均无此项协定。苏军人员驻留哈密之实情究如何?该苏籍顾问所称之协定,当地有无办法查询,又对此事件之意见如何,仰速电复为要。……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 致蒋介石报告

(1943年4月17日)

一、本年四月十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士庚^①偕同该领馆中交顾秘书前来本署会见，当因吴特派员公出，职即通知外交特派员公署代理署务王秘书心纯参加接见，并有本省财政厅厅长彭吉元及中训团新疆分团教育长盛世骥在座，该领事向职面称，奉到苏联政府命令，通知新省府事件如次：(1)所有在新疆地质考查团(新锡)工作完全停止；(2)将所有考查团人员一律撤回及一切机器运回苏联；(3)在工作人员撤回及机器运回时，希望新省府予以便利与协助等语。职答复，自当通飭本省各地方官随时予以便利并协助(以上该领事用口头通知，并无文件)。

二、本月十五日，该总领事普士庚突然通知，谓有紧急通告须立刻来署会见，遂即偕顾秘书到署，当时由中训分团教育长盛世骥担任翻译，同时有本署政训处长邱毓熊在座，该领事称现奉到苏联政府命令，通知贵督办事件数则：(1)从前苏联政府接到贵督办通告将驻哈密第八团(苏联红军)撤回一事，现在苏联政府已决定将哈密第八团撤回苏联。(2)苏联驻扎哈密飞行队亦完全调回苏联。(3)飞机制造厂(农具制造厂)亦决定取消，并于最近将所有工人及技术管理人员、物资、机器等一并由新疆运回苏联等语。除将原俄文一件及译中文一件附呈外，谨此报请钧座鉴核。附呈俄文一件、

^① 即普式庚，文件中常混用。——本书编者

译中文一件。职盛世才谨报。

附：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士庚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书(译文)

前于一九三八年一月间，苏联政府应督办阁下之请，因哈密一带不安宁以及运赴中国之贵重货物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乃决定将扩大骑兵团一团及空军一支队派往新疆哈密驻扎。当时督办阁下曾认为此乃巩固新疆局势及保证予中国以实际援助之措施。阁下曾经过苏联□□事向苏联政府发表过斯项精神的声明。

日下是既如阁下向苏联上校军事顾问瓦西力也夫所称，□□如□□驻扎，仅能构成督办阁下之重荷，苏联政府已决定将第八团由新疆撤回苏联。

有关之命令，业已授予该团团部，此亦苏联政府命余通知阁下者。

2. 苏联政府同时并已下令将一九三八年经中苏两国政府之同意，为保障由苏运华之军需品而派赴新疆驻扎哈密之空军队调回苏联。

有关之命令，业已授予苏方统率当局。

3. 督办阁下知道，于一九四〇年应中国政府之请，并为中苏双方之利益，曾开始建筑飞机制造厂，并于去年完成。

至与中国政府所进行之关于建筑及经营飞机制造厂的谈判中，曾预计该厂应由中苏双方出资建筑，而其出品则应供中国需用。

但是，与中国政府所进行的谈判，由于非关苏联政府的原因，未能缔结协定，致使该厂之一切用费完全落在苏方。因为这种关系，同时并因为新疆官方予该厂之工作制造各种可能的困碍，苏联政府认为，此后再任该厂处于此种状态之中实为不宜，因此，苏联政府已决定取消该飞机制造厂，并于最短期间，将工人、技术管理

人员以及该厂之物质、机械一律由新疆撤回苏联。有关此问题之命令,业已授予该厂之主管机关——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签字)

(《战时外交》(二)^①,第 447—448 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 致蒋介石函

(1943年4月23日)

委座钧鉴：敬函者。前梁副部长寒操由新回渝，职曾托伊带呈钧座公文及密函各一件，谅已早呈钧览矣。查此次苏方自动声明放弃在新开采锡矿及将飞机制造厂(农具制造厂)所有机器、工人等尽数运回苏联，并允将哈密第八团驻军及飞行队调回苏联各节，固然由于国际间环境演变及苏德战争等关系，并美国派柯领事来新的原故，因而出此，实亦我中央政府暨钧座神威圣德之所感有以致之。为职数年来所最疾首痛心，此一旦解除，不啻如释重负，此不仅新疆人民之幸，实亦国家民族之福。除详情由吴特派员及舍弟世骥面陈，并请示方针外，谨函寸稟，敬叩崇安。职盛世才敬稟。

(《战时外交》(二)^①，第449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 与盛世才谈话记录

(1943年5月3日)

.....

普：苏联政府叫我与督办声明以下的事：第一，近十年来苏联政府给新疆当局帮助很多，给新疆好多货物，新疆机关和人民所需要的，均系由苏联政府供给。在作战期间，苏联政府继续供给新省物资，但不知为什么新省当局对苏联贸易机关不进行工作，新疆省政府不准商家与贸易公司订合同，而且对于苏联贸易机关实行各种阻碍，使各种苏联贸易机关不能进行贸易。新疆当局不但对于他们施行种种阻碍，而且对贸易机关职员，阻碍交通。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在新疆缩小贸易范围。第二，苏联为帮助新疆发展工业，派地质考察团来实行考察工作，而且还组织两个汽油工厂，苏联方面供给汽油厂各种机器，保证施行汽油生产工作，能够出产汽油，供给新疆需要。如像堪比那汽油厂，已经开始出产汽油，但是新疆省政府予以此种阻碍，致不能出产汽油。新疆省政府不给钱领汽油，新疆当局不准苏联机关领汽油，不但封锁汽车，而且封锁工厂，实行各种阻碍，使苏联的机械和工厂不能工作。以上情形对苏联政府很为难，故苏联政府停止生产汽油，撤回机器及专家不作生产汽油了。第三，因为新疆省政府所需要各种专家顾问，苏联政府派来很多专家顾问，实行各种专门技术工作，新疆方面不只是一次说过，因为苏联派来各种专家，所以新疆发展很快。苏联派来医生大夫组织医院。而且帮助新疆不少：比方说公共汽车、水电灯公司、

轻刀(此二字音有误)工厂、印刷厂、落木(此二字音有误)厂、并且养殖牛马兽畜,苏联专家帮助新疆干部,实行各种专门工作,苏联军事专家,帮助新疆组织军队。但是虽然如此,新疆当局对于他们工作,予以最大之困难,因此苏联各种专家,都感觉没有意思,所以苏联政府要召回一切专家,连顾问也在内,至于买马的事,苏联方面尚送有各种的货。还要补充的说:(此时声音很低)农具制造厂机器要召回国,第八团军队也要召回国(说完了就把话稿交与督办)。

督:你们政府对于这些事都是决定了的,不是讨论的性质。

普:是的。

督:不过第一点:关于省营贸易,可提出彼此交涉的,其中困难,彼此商讨,定能解决的。

普:照现在的情形,是不能施行的。

督:果有困难,是可以讨论的,如果缩小贸易范围是可以的,如果因为有了困难才予以缩小,我们的省营贸易办法,是可以讨论的。

普:各种困难是在新疆方面的。

督:土产公司与你们仍然是有来往的。

普:实在是已经停止了。

督:我们土产公司常与你们贸易公司进行贸易的。

普:对于新疆方面施行的困难,苏联方面有一个意见,就是新方不要与苏方作买卖,所以才有此困难,因为有此表示,所以苏联政府也帮助新疆不做买卖。

督:我们的省营贸易办法,不是为了苏联不作买卖而订的。

普:我们的意见不动的(意指不能变更)。

督:自然你们政府自有决定,不过我得声明:我们的省营贸易办法,不是与苏联为难的,(接着说)第二点说到独山子油矿有困难,我们没有不愿出油的事实。事实上,我们所用的油,都要靠独

山子供给,我们怎会给苏联专家以困难呢?而且苏联将机器人员调回,不但苏联遭受损失,我们的损失也很大的。我们也拿出新币四百万来用的,我盼你和你们的政府商量一下,我认为把一切都运回去,彼此损失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苏联政府需要油矿的话,这个油厂是应该要的。对于新疆地方政府,也是有好处的。除了与地方政府的的关系,苏联政府曾经同意与中国中央政府合办的,如果你们又调回去,那就与合办的事实不合。你们通知我们地方政府,苏联正准备与中国谈判。所以这时候机器专家就不应该调回国,这自然是你们政府的权,我们地方政府也出有钱的。油厂是合办,所以撤回是应该向地方政府商量的。所以我们地方政府,对于你们撤回机器、专家这一点,还有考虑之必要。

普:督办所说的困难,不是由于总工程师与厂长不合作的缘故,这是有根据的。督办说是所有的困难,都是由他们两人不合作发生,这是不对的。我曾经说过,关于……(此数字系译音未听清楚)办法,是不合理的办法,督办也知道,因为封锁仓库,所以汽油厂的汽车都停止工作了,这不是他们二人不合作,这是新疆省政府的政策。这种办法,在中苏关系上是不合理的。比如有一次厂长在门口停了汽车,就有警察站在栏杆上监视考察,不但如此,有一个苏联贸易委员到伊犁去转来回到迪化时,准备回汽油厂,就有警察不让他过去,他是持有外交护照的,这表明这是新疆省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他们两人不合作。我并说,表明磨擦不是由于他们两人不合作,比方逮捕苏联专家这是新方造成的困难,不但反对苏联专家宣传,而且反对苏联的宣传,这种政策,当然是督办施行的。苏联政府为避免一切磨擦,所以决定召回专家和机器,这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至于两方面损失最多的,是苏方的损失,苏方投资在工厂,所以损失最大,新方较小,不过因为汽油工厂为磨擦的地方,虽有损失,仍然决定召回。

督:你所谓我们不想开油矿,都是不真的,现在我们政府还在

用油,这个事实,证明我们不是不愿意用油,这个磨擦现在可以由中苏合办来解决的。提到合办已经有一年,在这一年中,要是早签字,我们中央政府派来了人,当不会起磨擦的,我希望将这意思转达苏联政府,第一、所有磨擦是起于厂长与总工程师,不是地方的政策。第二、如果为避免磨擦,最好与我们中央政府早日签字合办,这些磨擦不是一概避免了吗?所以就避免磨擦,就得与中央早日签字。

普:新方需要汽油,一切是由厂长与总工程师的磨擦,是不实在的。

督:新疆省政府需要汽油,这是事实,怎样不实在呢?

普:我现不能证实新方是否需要汽油,我所说的是新方实在的情形,是有根据的。

督:你说你的根据。是我们地方政府授意,所以我才提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需要汽油,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比什么证明都大。退一步说,我们地方政府不好,你们赶快和我们中央政府签字就好了,你们同意和我们中央政府合办已经一年了,要是早日签字,问题就没有了。我们地方政府不好,中央政府就好了。

普:至于说到中央政府已有联络,待你们中央政府和苏联政府决定。但是我不知道。

督:我就是叫你把这个意思和你们的政府说:地方政府有障碍,中央政府就没有了,同时我认为,就是在没有合办以前,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开会就可以解决的。

普:这是苏联政府的决定,我不能变更。

督:关于第三点,你们政府要召回军事机械和其他一切专家,我们建议这方面可以留下一部分,是不会妨害你们的需要的,至于你们政府说,我们对专家不好,这是不对的,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他们处得很好,你们政府要将他们召回,我们是无权决定的,不过你们政府是不是可以留下一部分呢?如果愿意的话,这是可以的。

普：我来了以后，就天天考察他们的工作，天天得到根据，新疆当局对他们确有困难，而且是看不起，不但各地方政府如此，新疆省政府也是如此的，譬如那史比上校开枪，督办组织一个考察委员会来考察，实在有几次是在汽车附近听着枪声。又有一次，工程师也维诺夫与公路局局长去到南疆东化（此二字译音恐有误），到东化的时候，也就扣留了他的汽车。

督：什么时候的事？

普：三个月前的事。

督：到东化了吗？

普：从焉耆到库勒。

督：谁要扣留他？

普：局长。

督：为什么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普：因为有好几个这样的问题，我知道提出了都是没有结果的。

督：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真的话，我们是要严办的。

普：苏联专家是很多的，因为新疆不要，所以苏联政府才召回的。

督：没有的事，如果你们提出，是可以立刻解决的。也许有一二干部对他们不好，你和我讲，就可以改善的，你说苏联专家很多呀，也就可以留下我们需要的一部分的。

普：比方对于军事顾问，新疆方面还没有施行一个办法，我曾经抗议过，可是新疆省政府都说没有此事，所以他们的调查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

督：我们调查得出来，就得办的。调查没有结果，是不能承认的，调查的结果是确实，就惩办的，如像库车焉耆的官吏，都惩办的，记过罚薪，在中国算最大的处分的。

普：现在督办说没有根据，督办明白，我们不是小孩，督办是政

治家,我们都是政治家,我们要说公开的话,不要说秘密的话,秘密就不是政治家,苏联政府因为新疆省政府表示不要,所以一部分也不能留下,至于大夫们,因为病人关系可以多留二十天,其他所有的专家,从明天起都不来工作了。

督:好了,第一,你们的政府要缩小贸易范围,第二,你们的专家实在不能留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的。第二个问题。我日内有一个书面答复来请你们转达你们的政府,关于独山子油厂,在未得我的书面答复以前,是不能停止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政府希望和你们做买卖的,我们的货很缺乏,没有说苏联的货还不要的。第三个问题,是你们政府的权力,你们要召回去是没有办法的,至于医生,在二三十天以内,不一定是找得着的,在未找着以前,是应该好好的工作。最要紧的是第二个问题,在接到我的书面答复以后,你们政府应予以考虑的。

普:第一个问题已经说过了,第二个问题,苏联政府虽然决定撤回机器,召回专家,还没有计划,当然要照常工作。至于第三个问题,除大夫们新疆当局留他们一个月外,还有二个财政顾问,因为他们需要算账,也要留一短时间,此外,所有其他专家,明天都停止工作。

督:你说是你们政府的决定,当然是没有办法的。

普:还有一个问题,原则上不能详细的谈,想由□□委员与彭代主席详谈:就是哈密第八团军的牛马牲畜交还的问题,所有的牲畜数目就在伊犁交还,这对苏新两方面都有好处的。

督:牲畜数目是好多?

普:牛大概五百头,猪大概一千五百头,羊不知有好多?一共大概有二千头,马是自己用的。

督:他们可以谈一谈的。

普:原则上督办是赞成吗?

督:赞成他们谈一谈,不过猪在哈密恐怕吃的人少,留下了这

样多,看他们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在原则上是愿意帮忙的!

.....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致苏联 驻华大使潘友新备忘录

(1943年5月6日)

迪化飞机制造厂原系议定由苏联代我建筑,本年一月间宋部长与贵大使会谈时,贵大使曾表示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政府商订共同经营办法,当时宋部长曾面请贵大使提具草案,二月末余向贵大使催提此案,贵大使谓草案仍请华方提出,我方正在研究草拟该厂合作方案。

独山子油矿原系中苏双方共同投资创办,中国政府于其所提出之合办方案中,充分表现其愿在中国法律许可范围内,尽量与苏联合作之精神,对于贵大使所提对案,现亦正在根据此种精神详细研讨中。

顷接新疆省政府报告,谓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向其声明,奉苏联政府令,准备将该飞机厂及该油矿一切设备及技工撤回苏联,在中苏双方正在谈判期间,有此报告,殊深诧异,若苏联为目下作战,需要此项机器及人员,我方予同意,若无此必要时,则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将飞机厂及油矿机件价让,在共同作战期间,关于技术方面之设施及人员之雇用,我方仍愿意与苏联合作。

(《战时外交》(二)^①,第449—450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蒋介石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函

(1943年5月7日)

晋庸同志老弟勋鉴：关于对俄交涉独山子油矿与飞机制造厂二项，已令外交部向俄大使提出交涉，待其答复后再定区处。以意度之，如果国际或俄日无大变化，非万不得已，彼决不愿撤回此已装置之器材，故吾人不患其撤去之速也，再三考虑，乃提出交涉办法如另纸之备忘录，以为将来交涉之张本，至于其他各项，则静观其以后动作如何，若能早撤一日，则吾人应协助其早日撤回，不必强勉，亦不必有所顾忌，吾人所恃者，惟理与法而已，惟恐其对新锡机器不肯撤去耳，中意对新锡有关事件，总以根本撤消，不必以此区区机器而留一国家权利损失之病源耳。关于国际近情与此次交涉方针，已面嘱世骥弟转达，恕不赘述。并带奉总理与中石膏像一件以志纪念，顺颂政祺，中正手启。五月七日。（蒋纬国敬录）

（《战时外交》（二）^①，第450—451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蒋介石、外交部部、次长代电

(1943年6月11日)

……兹谨将在哈迪二处调查所得情形，分陈如次：

一、在哈密调查第八团撤退情形

(一)第八团飞机现留哈密者，计有轰炸机十架，驱逐机十二架，练习机六架，通信机一架，共二十九架，飞行员修理员共一百四十四名。据悉：前项飞机，准本月十七日全部飞返苏联。(二)第八团骑兵五百余名，马六百余匹，均已悉数撤退。(三)第八团步兵，原有二千余名，除已先后撤退者外，现尚有一千二百余名，据悉：现正俟汽车到哈后，陆续开拔。(四)第八团装备业已撤退者计有高射炮二尊，大炮四门，小钢炮十四门，坦克车十一辆，铁甲车五辆，拖拉机九辆，余如飞机炸弹、弹药、粮食、牲畜、机器零件、家具等件，共分五百六十五辆汽车装运出境，该团撤退秩序尚佳，并无骚扰情事，地方当局对于该团采购食粮用品均尽量予以协助，并已飭属严防不肖生事，免为该团有所借口。

二、在迪化调查独山子油厂及农具制造厂撤退情形

(一)守卫独山子油厂之第八团士兵二百余名，据报：除警戒该厂各部门机器设备，并经日协助拆卸装运车辆工作，自上月底迄至现在，尚无有纠纷情事，该厂文厂长及省方警察八十余名，现均奉命暂时回避，免于该团士兵发生冲突。就目下情形言，尚属良好。

(二)守卫农具制造厂之第八团士兵八十余名,除在厂外四周警备外,并无其他情形发生,据报:厂内机器尚在工作,或系正在配装其未完成部分飞机,该厂厂长最近曾向迪化县政府请求收买厂界以内自种青苗,就此一事观之,该厂撤退,为期恐在不远。

综合以上情形:苏方撤退第八团及该两厂机器人员,显无其他作用,除商请盛督办转饬所属在第八团士兵撤退沿途各县,对于该团所需用粮秣用品,准其尽量采购,务求保持和平态度,避免发生冲突,并严密防止不肖滋事并呈报委员长鉴核外,理合电鉴核为禱。职吴□□叩六月十一日。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盛世才致蒋介石代电

(1943年6月11日)

据伊犁徐行政专员电报,地质考察团在温泉、博乐各地工作人员,已于五月上旬集中伊犁,并将工作地点之机器陆续运伊,至少需半月以上始能运毕,自五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共有地质专家,考查员及眷属等五十二人出境返苏。据阿山彭行政专员电报,在富蕴县工作之地质考察团人员四十名,已出境者十余人,其余约于二十天内陆续出境,至机器等件,已悉数运到布尔津,待轮起运,矿石一百五十吨已运尽。据和田李行政专员电报,和区地质考察团人员,押大小汽车五辆,装载该团各种器材等件于六月二日由和田起程赴喀什。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蒋介石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电

(1943年6月23日〈24日收〉)

……苏联大使潘友新本月十六日来见面递节略如下：苏联政府命令本人将苏联政府关于新疆最近情形，不得已而采取之决定，详细报告阁下：关于新省当局对于苏联专家及机关活动之障碍，以及苏联政府因此而只得采取之个别办法，本人前已通知贵国外交部，但新省当局对于苏联商业机关之活动百般作梗，如禁止当地商人与苏联商业机关订定交易，实行法定价格，而对于（新苏贸易公司）商业周转资本课以重税，致使该公司之营业亏本而无法进行，并对此类商业机关在地方雇用之职员，毫无理由大批逮捕，对于商业各人员在新省之行动，故意造成困难等等。根据新疆省政府之请求，苏联政府对该省卫生地方经济发展以及道路建设等曾予以多年之帮助，然而最近苏联各专家在新省所处之环境，实令人不能忍受，苏联政府不能同意新省当局类似之行动，故不得已而采取如下之决定：（1）撤销迪化飞机厂，将新省苏联工人职员及技术人员以及苏联设备运回苏联。（2）停止独山子油矿之采油及炼油工作，召回各专家，并将自有设备运回苏联。（3）缩小苏联驻新省商业机关之活动。（4）召回在新省之其他苏联专家。新省当局对于苏联政府上项决定之实行有时采用无理及粗暴之手段，而新省当局此类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之具体例证，本人已通知贵国外交部。据迪化来信谓，新省当局之仇视行为，现在虽已减少，但目前情形仍不能认为满意。故苏联驻迪化领事仍继续采取必要之措施。本人奉命陈明上述各情形，俾便阁下关于苏联政府所采取之措施及其

促成之原因,获一正确印象等语。当时除告以苏联在新如有交涉事宜,应循外交正式途径商洽外,特转知照。……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蒋介石、外交部电

(1943年6月24日)

兹谨将最近调查苏军第八团撤退所得情形，呈报如次：一、驻哈第八团士兵现尚有四百余名未退。二、驻哈第八团飞机暨航空人员，前据报定十七日飞返苏联，现仍留哈未去。三、第八团撤退后，所留营房，苏方请以新印二百六十万元让与省府。现正由盛督办与苏驻迪普总领事商洽中。省方嫌价过高，职为迅谋解决，曾劝省方优予给价，俾可使之早日撤退。四、日前由哈撤退至独山子守卫炼油厂之八团士兵二百余名，近无增减，据报该厂苏籍总工程师表示：“最近仍须炼油，并须继续采油，恐三五月内尚难撤尽等语”，并闻最近撤回机器均属不重要部分。如果系事实，职应如何应付，祈核示。五、守卫农具制造厂之八团士兵，现增至四百余人，该团于六月十一日在哈撤退之坦克装甲车等，现均停在厂内，职当如何应付，并乞核示。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外交部部、次长电

(1943年6月24日)

……关于苏军第八团驻哈密问题,过去我中央均佯为不知,自上月钧部照会苏驻华大使馆,有“中国政府不问该团士兵来源如何”一语以后,苏方如何答复祈详示。昨日苏驻迪总领事普式庚因他事来署面洽,亦提及第八团撤退事,职故作惊异并质问此项红军何时起驻哈,实有侵犯我领土主权,苏领答复此中详情,请询盛督办即知,现八团正撤退中,希勿究既往等语。查兹事既经中央明认,且该领已与职面告一切,此后自不能再采佯为不知态度,遇有该团事件,职可否直接与苏领交涉,或在呈请委座暨钧部核示后,始予办理。……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蒋介石电

(1943年9月6日)

……顷督署参谋长电话略谓：哈密八团驻军，因我军进驻市内后，即建筑工事，沿墙掘洞，除电委座及朱长官外，请查照等语。职当请领饬该部队长严于防范去后，晚八时四十五分又准苏总领电话谓，我驻军有挑拨行为，经职询其事实，据复有部分驻军官兵欲入团部，经门卫阻止始他去，恐再有类似情事，致起误会，请职转电负责当局予以注意。职答我部队奉令进驻哈密，业经当地专员通知该团团长，彼此均系盟军，自应和平相处，所举事实俟查明后再复。旋即请督署参谋长急电哈密专员查明详复矣。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新疆督署秘书处报苏联 驻新第八团撤退情形

(1943年7月3日)

兹将外交部询问各项分条列下：

(一)第八团确已撤出新境者，计五月十六日由尼堪卡出口武装官兵四十名，汽车四十八辆。二十一日由尼堪卡出口官兵三百五十五名，乘中运车一百三十一辆，六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由尼堪卡出口官兵九十九名，甲车三辆，汽车二十九辆，以上共计官兵四百九十四名，甲车三辆，汽车一百六十三辆。

(二)留驻哈密者，据报尚照五百人请为代购给养，实有官兵叁百余名，另有飞机二十九架，航空人员一百四十四名，至该团重武器(除开拔者外)，似无留哈者，内部详情实无法侦查。

(三)停留各地者：1. 骑兵队五百余名，附野山炮十余门，汽车九辆，马七百余匹，现已开抵伊犁霍城县属索伦营附近休息(距尼堪卡六十华里)。2. 开入迪化飞机制造厂武装官兵近查约三百名，附大小坦克及甲车共十七辆，各种汽车七十三辆。3. 开入独山子炼油厂武装官兵二百余名，正协助拆卸工作。

(四)经过迪化八团官兵，并无整批返回迪化者，但因押运物品车辆，少数士兵确有往返情形。

(原新疆省档案)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美国驻华临时代办艾切森 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

(1943年7月7日)

大使馆文号 1087, 7月4日下午1时

(1) 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最近经新疆抵渝, 向大使馆职员作过一次报告, 以下为报告的主要内容:

从去年11月起, 中央政府“接管”了新疆苏联边境五个领事馆。但仅仅调换了阿拉木图和斋桑二地领事。从去年开始, 苏联陆续释放了“几千”中国人(中国驻苏大使馆无法得知确实数目), 他们过去一直被拘禁在西伯利亚。可能还有一两千人在扣押中。此外, 约还有20000人在苏联生活和工作。

(2) 迪化传来消息表明, 改变中国边境领事馆的地位是中国外交部主动做出的。

我们正向迪化询问更全面的消息。

抄至莫斯科

(译自《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 第276—277页)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致蒋介石代电

(摘要)

(1943年8月14日)

八月九日苏联大使潘友新来部洽谈该大使馆专用机飞渝事，便中提询现在新疆情形如何。国桢当答以前为协助苏安全撤退各项机器设备及人员起见，曾建议由本部派吴特派员协助苏方人员办理，尚未准答复，潘大使谓，接驻迪化总领事普什金报告，吴特员已与该总领事取得常川联系，现苏方所留下之建筑，正由当地中苏两方人员磋商，由华方收买，在此问题未解决前，使苏方规定撤退日期，甚为困难，前者吴特派员等曾与苏方负责人作一度之商讨，旋又搁置，现撤退延宕，其咎不在苏方，须早日将收买建筑问题解决，始能完全撤退。国桢复告以我方亦常接到吴特派员及各地方官之报告，此事已由双方在当地洽商，前因贵大使屡次表示，地方官对于苏方撤退工作予以障碍，故建议派吴特派员协助苏方人员办理，以免除可能之误会，而使撤退事宜得以顺利进行，未悉近来贵大使有无接到关于新疆地方官对撤退工作仍予阻碍之消息。潘大使云，近来未接到此类报告。

《《战时外交》(二)》^①，第454—455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 致蒋介石报告

(1943年8月2日)

关于苏联在迪化之飞机制造厂厂房让售我方案，经签呈意见奉钧座七月二十日侍秘字第一八五一四号代电开：“报告悉，希先往迪化察看情形再定可也。”等因，奉此遵于七月二十三日由渝转蓉飞兰，二十四日到达迪化，廿五日起赴伊宁，廿六日返迪，廿九日由迪飞嘉峪关，三十日飞西宁转兰，八月一日返渝。谨将接洽情况，分陈如下：

一、关于苏联在迪之飞机制造厂事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会同吴特派员泽湘前往离迪化省城四十一公里之头屯河畔该制造厂所在地，由该厂厂长叶师阔夫接见并参观各房屋设备等等（详见附件1）迄晚九时半返省城后，总合所得该厂现况加以研讨，于七月廿七日上午九半与盛督办世才、吴特派员泽湘会商各点如下：

1. 该厂各项机器已拆除搬回约百分之八十。
2. 所留者仅制造氧气、木工、修理汽车工具、电气机器一部（原三部已拆回其二）、电线一条（余拆除）、电力只二〇〇启罗瓦特。
3. 飞机场一，长二千五百公尺，阔为七百至一千公尺。
4. 工人工作房、宿舍、办公房屋、厂房，规模较前在垒允之中航厂为大。
5. 驻在厂内有自哈密撤退来迪之苏联第八团兵士约四百名，并有唐[坦]克车十七辆。
6. 人员已有一部分开始撤退。

以上为该厂现况。在本会立场而言，职对该厂处置，有如下之意见：

甲、恢复该厂为飞机制造厂，则现有之厂房等等是最适用。

乙、如改作修理厂或为训练机关，均觉勉强而不经济。

丙、若用为航空站，一则离城太远(四十一公里)。二则房屋不能尽量利用。

丁、如用为三团制一师之练兵场比较相宜，惟内中住宅房屋亦不能利用。

照目前该厂之状况，苏方已有搬回之事实与决心(如电线亦已大部分拆除)，总括而言，若恢复为制造厂，则机器苏方已拆回，当然不能供应，如能向美方交涉器材及原料，尚属可能。

而据吴特派员言，哈密苏军开始撤退时颇迅速，惟最近似不如从前之积极，而苏联领事曾表示，如我方收购该厂，则驻该厂军队，当然即行撤退，如我方决不收买，则所遗留设备，亦即继续拆回等语，但其真意何在，尚不能断言。

在外交及政治立场而言，该厂不问将来用途如何，不论价值如何，似以收买为宜，一则可促其撤退残留之兵，二则在此盟国抗战环境日有转变可能之时，亦以速即购买为宜。

故职等三人商讨结果，最后同意购买，至购买方式：

一、由中央购买。

二、抑由地方购买。

中央或地方购买，盛督办表示均可。如由新疆省政府购买，则省库无此大宗款项(一千八百万新币)，拟分期还款。

三、一面由盛督办通知苏联领事，转告该厂暂缓拆卸，一面呈报钧座核示。

职意拟请钧座先电盛督办积极进行交涉，购买款由地方或中央可作第二步办法。附拟致盛督办电稿一件，连同盛督办及吴特派员托面呈函各一件。当否？敬乞鉴核。谨呈总长何，核呈委员长蒋。

此外,关于接收新疆航空队问题及视察伊宁空军教导队等情形,另案详呈。

附呈(一)迪化苏联飞机制造厂概况一件、附图二件。

(二)致盛督办电稿一件。

(三)盛督办及吴特派员函各一件。职周至柔。

附:迪化苏联飞机制造厂概况

一、查该厂位于头屯河畔,系为制造飞机而设,故厂房布置就制造飞机言,尚称适宜,其他附带条件如水源、燃煤均供应方便,员工住宅建筑完善,足供全部员工应用,并有飞行场一所。长二五〇〇公尺,东宽西狭约在一〇八〇至七〇〇公尺之间。坡度为六十分之一,可以试飞驱逐机及重轰炸机。

二、该厂房屋计有钢架装配棚厂一座,面积二一六方,钢骨水泥工场大小十一幢,面积六六三·二方,砖房二十四幢,面积五二三·六九方,土坯房四八幢,一三六四·二八方,共二七六七·一七方。此外尚有未定号数之房屋及二四、四〇、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一一五、一二一、一二三、一二四、一三一、一三四等房屋,因图上未绘面积若干,未能测出。又有高约四丈底面一·八方之压水塔一座,周围铁丝网三三二一〇公尺,直径一公尺之水泥管四〇〇公尺。

三、机器设备除尚存二〇〇KW之蒸汽发电机一具,制氧机一套,车床等项各一、两部外(车床等亦在运走之列),余均拆运返苏。

四、水源系就河筑坝,用直径一公尺之水泥管通至厂门,颇称方便。

五、煤炭在离厂十八里之处可采煤炭。

(《战时外交》(二)^①,第451—454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美驻华临时代办艾切森 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

(1943年7月31日)

大使馆 939 号发文,6月16日上午10时

6月15日迪化柯乐博的报告中声称,新疆主席曾经通知他,过去省内苏联驻军大约有五分之三已到达苏联。五分之一正向新疆苏联边境移动中,其余五分之一暂时留在哈密。俄国空军飞机尚未离开,可能装载最后一批苏联军事设备后离境。盛主席还声称,全部苏联军事和经济顾问均已离开迪化,虽然其他地方还有一些人在等待交通工具,但已停止工作。

根据迪化外交部特派员方面的消息,苏联军队和顾问是苏联政府主动撤退的。特派员说,中国政府并未要求苏军撤走,事实上,听到计划撤退顾问时,并竭力劝说苏联政府让顾问继续在新疆工作。特派员还补充说,全省顾问总共112人,他们在新疆并不行使政治权力。

柯乐博报告随后发出。

抄致莫斯科

(译自《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274页)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 致蒋介石电

(摘要)

(1943年9月10日)

据哈密梁科长报称,苏驻哈八团团长,昨下午与我方徐旅长在专署会商,经就职提出七项办法交换意见,决定双方同意原办法办理,即分令所属切实遵照。又七、八两日哈市上发现有着便衣苏联人携枪行走,当由职向苏领质问,据答或为航空站或中运会员工,已允转电严予取缔,业由职请督署转电徐旅长知照。日来哈市安谧如常,上项办法实行以后,必无他虞,当可稍释钧虞。现哈密营房售价,我方已还至二百万新币,苏领正电请核示中。理合将最近情形,电请钧核。

蒋委员长批示:抄知盛督办、何总长、外交部。

(《战时外交》(二)^①,第455—456页)

^① 即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盛世才第二次致蒋介石书

(1946年11月24日)

前烦祝主席转呈戍删电，谅邀钧察。关于锡矿合同前后情形，谨再详陈如下：

(一)查前于民国卅一年七月间，职曾呈请钧座派朱长官绍良莅新，彼时职因已决心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三民主义，誓愿竭诚拥护中央，忠实钧座。乃将职主政新疆十年来之亲苏详细内情，披肝沥髓，用书面陈述于钧座之前。而苏联强迫签订锡矿合同一事，即为该报告文件中重要内容之一。

(二)在前项报告文件中，职除详尽陈述十年来亲苏之实际详情，请求钧座推恩原宥，复请朱长官飞渝面陈已往经过，并乞鉴恕，并别提出职加入共产党及被迫签订采锡矿合同二点，请朱长官面恳钧座察情见原。迨朱长官由渝回新，面交钧座亲笔手谕后，并告职谓，既已对钧座如是诚恳，则关于职之既往一切，钧座不但原宥，且均为负责，彼时职邀听之下，不禁铭感五内。

(三)锡矿合同，原系被迫不得已而签字，当时职为预留将来声明作废地步，拒绝盖用边防督办公署及省政府大印(关防)，而以职个人名义签字，迨至苏联对新疆采取积极侵略行动，职与苏方感情破裂后，当即向苏领馆声明新锡矿合同作废，并要求撤退全部探采锡矿人员，终于在职坚决要求之下，苏联乃于民国卅二年年底撤退其全部探采矿人员。

(四)由民国卅二年以迄今日，事隔四年之久，在此期中，苏方并无要求探采之事。今忽又死灰复燃，按理既已撤退，即为默认合

同作废，原无再允之理，不过为顾虑新疆特殊环境，（以职推测，苏方开矿人员已撤退四年之久，等于默认合同作废。今忽又派人来新用强硬态度开矿，或系对新疆将有其他阴谋亦未知。）请根据以下五点：（甲）该项合同系用职个人名义签订，未用督署和省府关防，（乙）已于民国卅二年由职声明合同作废，并要求撤退其探采矿人员，（丙）同年年底，苏方已完全撤退其全部探采人员，乃等于默认合同作废，（丁）事隔四年之久，该合同似应失效，（戊）该项合同原文仅系规定探采锡矿及其“并产”并未规定系探采钨砂，可否飭询矿学专家，锡矿之“并产”是否有钨砂，过细考虑，斟酌应付，或依（甲），（乙），（丙），（丁），四点理由，拒绝其探采或修改合同内容，管见如此，尚乞钧裁。复有陈者，此项合同签订，系在民国廿九年（西历一九四〇年），彼时苏联首先煽动阿山事变，然后提出此项合同，强迫签字，当时苏联正向东方扩展其侵略势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三小国即于该年并入苏联，职当时以苏方态度蛮横强硬，如拒绝，不仅阿山叛乱将有扩大之虞，即对整个新疆，亦有极大危险。职为保全国土计，迫不得已，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忍痛以个人名义签字。此中苦境，除于卅一年用打字机文件报告并请朱长官代陈外，职于卅二年飞京述职时，亦曾面陈。

附盛氏原函英文译件。（略）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盛世才关于苏联与新疆省政府 签订“租借条约”的叙述

(1950年3月4日)

一九四〇之密约签订,事实上苏联有其政治上之阴谋,苏方欲余在新独立,余为在艰苦环境中,保持我国家在西北之大块土地,设法与苏周旋。苏方以其计划未得实现,乃不断在新疆发动阴谋暴动,藉以在政治上加强对余之控制,或将余打倒。密约未签之前,红八团^①经常由哈密向迪化侦察地形,修整道路,作将从事军事行动之模样。一面在边境上以飞机经常从事侦察,而在新之苏联顾问,更展开拉拢我方军官之活动,以图造成叛变,似有必须置余于死地方始干休之势。此当时余所处之恶劣环境。旋史大林派密使来迪,迫余在苏方拟好之约本上签字,余要求交省务会议作文字上之修改,不允;余要求交外交特派员公署,亦不允。并告余:“此密约不能修改,不能使旁人知之。”苏联之真意,似不在密约之实行,而在因签订密约可以防止余与中央之接近,此余被迫签约之经过。但余系以个人名义签字,苏代表要求加盖督署及省政府关防,余则坚拒不允。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① 红八团系苏联正规军,于盛马之战后,非法驻扎新疆哈密,以便苏联对盛世才作军事上之控制,迄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四月间,始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Пушкин)通知盛世才,予以撤退。

徐智《哈密见闻》(摘录)

苏军驻哈密的片断回忆

一九三八年春苏联骑兵一个加强团开抵哈密,在哈密城东面紧靠甘新公路修建营房长期驻防。据说其任务是保护西北交通要道。当时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第二个年头,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给中国出售的飞机、汽车、汽油及其他军用品,都经过新疆运往抗日前线。苏联为了保护其运输安全,调派一个加强团进驻哈密。因哈密是甘新公路及航空路上的一个咽喉要道,同时哈密又是装配军用战斗机的航空基地。该团开抵哈密并未经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同意,而是苏联方面同新疆盛世才政府商谈确定的。所以为了避免国民党中央及国际上的质疑,对外采用新疆地方军队的番号,即归化军骑兵第八团,俄文名称是俄罗斯骑兵第八团,因新疆境内有从苏联逃亡到新疆的白俄军队,过去把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称作归化人,把收编的白俄军队称作归化军(金树仁、盛世才同马仲英作战期间收编有归化军团)。骑兵第八团是按新疆地方军队的番号编的,当时新疆地方军队的兵种主要是骑兵,以团作为驻防单位。

第八团刚开抵哈密时,在哈密城东北阿牙地方野营,由哈密县政府供应粮秣柴草及副食品。当年在哈密城东泉水地一带圈定民田及荒地三百余亩修建营房及操场(占用的民田及毁坏的庄稼由哈密县府作价偿还或给户民另划给公家的田地调换)。建筑材料除土坯由士兵自做外。一部分砖木,在当地购买,县府付款,其它由乌鲁木齐运来,一部分由苏联运来。大部分工匠都

是从乌鲁木齐招来的,一小部分是苏联来的俄罗斯人,工资由该团发给(该团在哈密地方支付的经费是由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管理处直接调拨的,县府开支的费用由县府向督办公署报销)。所以该团在一九四四年秋离开哈密,将全部营房作价省币六百万元售给新疆省政府(在边界向苏方交付牛羊偿还)。该团除骑兵外,尚有一部分步兵,一个轻坦克连,一个炮兵营等。实际上兵力及编制对外保密。根据该团领取面包(在县上面包房领取)的数量和在营房内浆洗衣服的数量估计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当时省军的一个骑团只有七百人左右)。该团到哈密时头几年的帽徽和服式完全同新疆地方军队一样(青天白日帽徽,只有领章没有肩章),后来完全取消帽徽和领章。初来时不同哈密机场、汽车站和苏新贸易公司的苏联人来往。后来可能是因为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异议和对新疆地方政府的质疑,所以就公开显露出他们是苏联红军的真实面貌,但对外行文仍然是新疆边防军俄罗斯骑兵第八团。以后他们同当地苏联空军基础地、汽车站、苏联商务处等单位来往日益密切,甚至一起举行联欢,搞庆祝活动,还派出一部分官兵在哈密苏联空军基地驻防。他们在哈密驻防期间,足迹遍及哈密区各县,绘制详尽的哈密地区兵要地图。苏联驻防期间实际上起了保护盛世才独占新疆地盘的作用。在苏德战争吃紧、苏联无力援助中国抗战,国民党中央加紧投靠美国和反共高潮的期间,蒋介石就计划往新疆调派大批军队。但由于苏军驻防哈密,蒋军就不能大量开进新疆,所以后来重庆政府要人(宋美玲、朱绍良等),迭次来新,经过与盛世才及苏联总领馆协商,决定撤离八团。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署派专人来哈密,会同当地专员、县长、八团少将团长乌申克及刚开抵哈密的国民党第十八混成旅旅长徐汝诚等,商谈八团撤离哈密及限制八团官兵和十八旅官兵进城,以免发生事端的问题。八团撤离后,国民党胡宗南所部新二军、二十

九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大量开进新疆。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并将新疆地方军队改编以后，新疆就完全成了国民党嫡系部队统治的地区。

（录自《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新疆财经 战线上的统战工作*

高登榜^①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份,我受党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同志的委派,担任延长油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矿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迅速解决苏区党中央机关的照明用油和燃料,发展生产,支援前线。1938年夏天,组织上通知我近期内工作有变动。当时就任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的王鹤寿同志找我谈话,明确了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原来,我党应新疆盛世才的要求,从延安抽调文教、财政、新闻、军事、民政等方面的干部分三批入疆,帮助盛世才建设和保卫新疆。途经新疆到苏联治病的毛泽民同志被盛世才挽留,担任财政厅副厅长,正需要一批财经方面的干部赴新协助工作。报效祖国,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对组织的决定我坚决服从。回到家里,看到即将分手的父母亲属,我心中百感交集,一言难尽,为了党的事业,只有同亲人短暂地分别了。于是,我打点行装,预计在10月份动身去新疆。

离开延安前,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找到我,谈到在新疆工作的任务及注意事项,临分手时,他告诉我,毛泽民同志的女儿刚到延安,有张照片要我带到新疆亲自交给毛泽民,并要我到城隍庙招待所里看看毛泽民的女儿,她是冒着风险从白区到延

* 题目为编者所加。

① 高登榜,1938年10月由中共中央派往新疆工作,化名为高玉成。

安来找父亲的。

从延安到新疆，路途十分遥远。出发前，组织上指定曹建培同志为路上的党支部书记，行政上由我和郑亦胜带队。为了便于联系，我穿着八路军制服，打着武装带，为大家前后张罗。先从延安到西安，到了西安，从新疆来接我们的人还未到，我们便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候。当时组织上派曹建培、陈清源化装后，先离开西安，到伍修权、谢觉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听情况。我们随后租用一辆商车前往兰州。韩光同志当时是新疆督办公署副官，他特地从新疆赶到兰州来接我们。刚进入兰州城门，我们随身携带的留声机和马列书籍就被国民党检查站扣留了。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无结果，我们便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休息换装。男同志分别穿中山装、西装，有的还穿长衫，女同志换上花旗袍。记得在换装时，有位同志不小心，衣服挂到伍修权同志的煤油灯上，把灯罩掀到地上给摔碎了。伍修权同志诙谐地说：“天哪，这可不比西安，打了这个灯罩，三天都买不回来。”我们都大笑起来。伍修权同志又说：“这里条件太差，管不起大家吃饭，请大家随韩光同志去招待所，那里条件好一些。”我们搭车来到中苏运输站招待所，在那里住了下来。第三天便乘车向迪化进发。

汽车颠簸行进在无边际的戈壁滩上，凛冽的寒风扑面吹来。目睹飞鸟不落、寸草不生的荒漠景象，思念着日渐远离开革命圣地延安和同生死共战斗的同志们，又想象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势薄力单的角落，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汽车昼夜兼程，常常是一连好几个小时不见一个人影；到了夜晚，黄羊群出没，竟然在汽车灯光的映射下，好奇地向着汽车探头探脑，有的还莽撞地一头撞在车灯上，让人不寒而栗。

从兰州到迪化这一段路程，我们乘车整整走了15天，途中在

酒泉、哈密各休整 1 天, 抵达新疆省会所在地迪化(现乌鲁木齐)时, 督办公署指定我们住在南小门外的一个两层楼的招待所里, 具体事务, 由韩光同志负责联络安排。

我们住定后, 第一件事便是填履历表。督办公署发给大家每人一张表, 说让大家 3 天内填好, 送给盛督办过目。一听这, 大家不免疑虑重重, 还未见到党代表邓发同志, 对盛世才的底细了解得不多, 这样匆匆忙忙地填上表, 是否合适? 我说, 离开延安前才在中央组织部填了表, 还是当面交给王鹤寿同志的, 怎么一到迪化, 还未见到邓发同志就急于填表呢? 陈解虚同志附和说: “不能填这个表。要填, 也得见了邓发同志后再填。”

我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韩光同志。第二天, 韩光约好时间, 请我和曹克屈、郑亦胜同志在南梁一片空地前等候。过了不久, 来了一辆小车, 在空地上掉转头, 我们赶紧上车直达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见到了邓发同志。邓发同大家热情握手, 关切地询问大家的情况, 告诉我们刚到新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关于填表的事, 邓发同志说: “表还是要填的, 不填表就不能在新疆工作。你们的简历表要送给盛世才, 他看了表后才能给你们分配工作。”回到招待所后, 按照邓发同志的意见, 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说服大家填表。我当时想, 到新疆来是为了工作的, 不能为不填表而把事情给闹翻了, 还是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 当时, 我们每个人都得给自己取个化名, 取什么好呢? 我想, 古训中常言“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我就叫“玉成”吧。于是我把想妥的化名, 说给周围的同志们听, 大家都说取得好。谁知表格送上去后, 盛督办看了我的履历表, 却对邓发说: “这高玉成是陕西延安人, 从红区来的嘛, 我怎能接受呢?” 邓同志找到我说: “盛督办一看你是陕西延安人, 就说世人都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从延安请人来, 这不行。”我说, 填哪里人好呢? 邓发同志对着挂在墙上的地图思忖片刻, 建议我填蓝田, 因蓝田离西安较近, 我便遵命填上蓝田。这一

关就算过去了。其他同志也遇上一些小麻烦。马肇嵩(马锐)和罗乃棠2人年纪较小,盛督办看了填好的表后说:“这两人年纪小了点,还是考虑考虑吧。”办法自然是有的,把岁数改一改,多填了几岁,这样便全部通过了。过了几天,招待所奉督办之命通知:明早全体先到督办公署集中。起先,我们以为是盛世才找我们谈话,到那里一看却是个考场,两个人一张桌子,讲台上放着一台留声机。政训处主任李一欧为监考人。考试开始后,监考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考卷,他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说:“各位是督办的亲朋好友,今日督办身体欠佳,不能亲自来见大家,现在出了些题目,请大家认真作答。”我看了看考题,有100多道,诸如“新疆有多少民族?”“六大政策是什么?”“新疆有多少行区?”等等。题太多,一个上午根本答不完,中午每人在教室里吃了一碗面条,下午继续考。陈谷音同志就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行不行?”他说:“我正在考虑。”我又埋头动脑筋,将知道的答上了,还有些题目答不出,只有让它们空着。说真的,这些题出的范围很广,既有中国历史,又有世界历史,还有风土人情等等,无所不包,尤其是世界历史出题太偏,实在难以作答。为此,我有点发愁,心想这些答不出来的可怎么办?但再一想,你盛世才督办若欢迎我在新疆工作,我就留下,不欢迎的话我就回延安。想到这,我心里倒坦然起来,低头又审了两遍卷子,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其他同志也相继交卷走出考场,剩下曹克屈同志独自一人待在里面答题。等了一阵,他还在那里冥思苦想,大家等急了,我便进去耳语道:“会答就答,不会答就交卷吧,晚上还有其他安排哩。”曹克屈又把卷子看了一遍,才交卷走出考场。这一天的考试就这样结束了。当天晚上,盛世才请客,我们有23人去了。当时,韩光叫我们选两位年纪大的坐到督办那一桌去。于是大家推选郭春则和我坐过去,盛督办到场时全副武装。他先讲了话,讲了六大政策,讲了新疆14个民族400万人口,要团结等等。郭春则代表我们说了几句应酬的话。接着,盛世才介绍了饭

桌前的张三李四。说这些朋友是我的同事同乡,是这个关系那个关系介绍来的。末了又把经理部的王经理传唤进来,当面吩咐道:“这23位先生,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从关内来到迪化,衣着单薄,你发给他们一些钱,带他们去贸易公司,给他们每个人买套衣服。”等等。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官僚时的情形。过了两个星期,盛世才又把我们找去。当时他在客厅里坐着,把我们一个一个叫进去过话。我进到客厅时,盛督办“嘿嘿”一笑,尔后道:“你高玉成是延安人,籍贯要改,改得好。听说你是搞财政的,很好。你就到财税部门去吧。”我的工作去向就这样定了。我退出客厅,回来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这批23人中,有9个人是到新疆做财税工作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任命也很快下来了,我就任喀什区税务局副局长之职,并得知上任前还得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就这样,我们先是被安排到省财政厅各科、室和迪化市税局各科、股实习,同时到财政厅创办的财经学校听课。我当时还当了学习班长。毛泽民同志亲自来讲课,分别讲了财政税收工作的方针、任务及重要意义,讲了开源节流。我经常把大家的学习情况和想法、要求向他反映,同时把同志们对新疆政局的看法汇报给他。听了这些,毛泽民同志总是再三思索。从他深沉的目光和一字一顿的谈吐里,我深切地感到要做好财税工作并非容易,尤其是新疆政局,盛督办的“六大政策”背后,更令人觉得困惑!

1939年2月春节前夕,停放在省政府院内车库的一辆汽车不知何故突然起火,夜深人静,火光熊熊,省政府主席李溶出来喊“救火”,我们闻讯后纷纷赶来,提水桶、端脸盆,把火扑灭了。事发后,盛世才不明不白地记了财政厅副厅长毛泽民一大过。我十分纳闷:省政府汽车着火,这怎么是财政厅副厅长的过错呢?邓发同志一针见血地说:“这是督办的权力,成心找岔子呀!”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年的5月29日,《新疆日报》把督办文中的

“辨”印成“辩”字，虽然报上做了更正，盛世才却“认真”起来，硬给报社编辑长李宗林记一大过，给副社长汪小川记过罚薪处分，其余的编辑、校对等人员也都受了处分。后来又有一些同志被重新任职，比如，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调任阿克苏区教育局局长，迪化一中校长李云扬调任喀什区教育局副局长，反帝会秘书长黄火青调任阿克苏区行政长，……人事变动频繁，谁也弄不清督办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制造这类小磨擦，只不过是盛世才施行更大阴谋活动前的一个个小动作罢了。

二

1939年春节过后，我启程到喀什赴任。翻越天山，气温骤然回升。在北疆时还是冰天雪地，寒冷异常，而南疆却如同关内江浙一带温暖，气候宜人。每到夏天，天山山麓上的冰雪逐渐融化，雪水穿山越岭，源源不断向山下奔流。行至喀什，只见街道两侧流水潺潺，当地居民正在用雪水浇灌农作物或洗涤器皿等，别有一番情趣。

喀什地处南疆，面积大，人口多，是新疆的第二古城。居住在喀什市内的居民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兄弟同胞。30年代后期，这里文化落后，经济很不发达。少数巴依富人骄奢淫逸，广大农牧民生活十分贫困；农贸市场物资匮乏，手工业制品价格也较高。当时的喀什市是区行政公署所在地，由于其文化历史悠久，位于市中心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格外令人瞩目。每当礼拜开始古钟便洪然齐鸣，悠扬悦耳，几十里外清晰可闻。

当时的喀什税务总局负责管理疏附、疏勒、伽师、英吉沙、巴楚、蒲犁、乌恰、岳普湖等分局的税务工作。总局有100多人，设有办公室、税务科、稽查处、庶务科4个部门。工作量最大的要算是每年一次的田赋、牧税征收了，任务十分繁重。收田赋时，事先都得组织好临时性的田赋征收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税务局长任副

主任,全局动员,各司其职,直至征收工作圆满完成为止。

当时的税收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关税口:凡是进口物资或出口土特产,都须按量纳税,关税高低根据物品类别确定。

2. 牧税口:每年征收一次,根据牧主所养的牛、马、羊群数量的多少按比例征收。

3. 田赋口:根据每户农家种植土地面积的多少,土地的好坏征税,缴纳田赋是以粮食上缴,每年一次。喀什市按照省财政厅有关田赋缴纳章程加以修订,征收粮食以小麦为本位,规定了全区统一税率。上等地每亩收税1斗,中等地6升,下等地3升。每年于秋后开征,年底收清。

在这些税种中,关税是喀什区税收的重要内容,占的比重相当大。当时苏联有较多的物资从喀什运进来,喀什等地也有土特产品从这里运出口,如皮毛、棉花、牛马羊等牲畜。居住在喀什的印度商民由塔什库尔干进口的一些商品和出口土产,也征关税。当时全疆关税最多的是伊犁,其次是喀什。

喀什税务局对省财政厅负责,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财政厅副厅长毛泽民同志签发的各项指示和规定。为了奖励在税收中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他还制定了一些奖励提成办法。具体的分配措施则由税务局自行掌握。

按规章制度办事,公平合理,不分亲疏,不缺斤短两,不许打骂纳税农牧民,这是对每个税务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在当时还是比较严格的。1939年3月29日,即我到职后的第二个月,毛泽民就整顿财政、提高财政系统干部素质一事发布通令,其中指出:“在此建设方殷巩固抗战后方之时期,各财政局及地方税局负有整理财政、扩充税收之责,对于各级人选尤不可不特加慎重。……嗣后任免人员……应于事前造具详细履历呈报本厅核准后再行委派。”强调了财政干部要严格挑选,不允许贪官污吏和敷衍

衍了事者充塞在各级税务部门。喀什税局为保证税收工作顺利进行，也面临着严肃财税纪律、清退贪污失职人员的任务。

刚到局里上任，我就听说税务科一位姓李的科员有贪污行为，经找周围的同事了解，得知他确有此等劣迹。原委是当时的岳普湖税务人员每月来总局交帐时，会计均不开给收据，致使明目张胆地贪污税款，有恃无恐。

除了贪污成风，财务制度混乱不堪外，局里还有顽固、落后的习惯势力和关系网在从中作祟，使我上任后要抓的全面整顿工作十分棘手。正在这时，以王宝乾为团长、卢毓麟为副团长的省检查团来喀什视察，他们得知了这些情况，便找到税局核实，待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当即作了处理。局长李英才也因犯有纵容罪，被调离原职，回迪化另行任用。通过这件事，我们加强了税收管理，有效地制止了偷税漏税和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对全体税务人员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教育，并进一步完善各项税收制度，堵塞漏洞。与此同时，我们对当时一些税务人员外出稽查常有损公肥私、白吃白拿的卑劣行为也予以取缔。情况是这样的：原来的税收规定中有一条：对于偷税漏税者，一经查出，税务稽查员便可根据其态度情节以及违法款项多少给予罚款，罚金的多少则由稽查员本人决定。据此，有些税收稽查员不能秉公办事，而是凭个人好恶和印象办事。同样类型的问题，罚款金额相差甚远。被罚的商人往往以好烟、好酒、请客送礼来腐蚀拉拢稽查员，助长了贪赃枉法之风。为了严格税罚把关，在我的建议下，局务会上重新规定了收税罚金必须由局长、副局长审定，稽查员无权决定罚金，这样便堵塞了漏洞，使省财政厅的各项政策规定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同年11月，党代表陈潭秋同志给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写了信，重申了“我们是革命的公务员，是自觉的革命战士，……要忠实于自己的职务，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我们应当把‘忠实、积极、负责’，作为全部公务员的工作作风”。接到这封信后，同志们互相

转告,学习领会,本着为人民利益负责的精神,勤勤恳恳地工作在第一线。

三

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更多的民众,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我们的倡议下,喀什行政公署举办了公务员训练班,李云扬、王谟同志利用这一讲台宣讲六大政策和马列主义理论,讲述联共党史,对区机关公务员进行教育。我自个则先后去学校、商会里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和税务政策,使人们都来关心国家和民族利益,提高民族自信心,贯彻执行政府的各项有关规定。1941年夏天,省政府批准喀什行政公署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组,该组由喀什地区各机关文化水准较高的职员29人组成,分3个小组,每星期集中一次,主要讨论研究经济方面的问题。每次会前由组长拟就研究提纲,通知各位组员,准备发言材料。喀什报社社长王谟和我也是其中成员。当时研究组的宗旨在于“提高公务人员政治水平,加深政治认识,以期彻底了解政府政策,加强工作效率”。这个研究组的成立,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财税工作的作用和积极意义是什么?对此,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所作的宣传是很薄弱的。毛泽民同志主持新疆财政工作,在北疆召开首次财务工作会议上听取了北疆各地方税局的工作汇报后,当即指出税务工作不能光靠罚款,还应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税收政策,说明税章,阐明税收意义,号召大家共同支持和执行财税制度,保证各项税收工作得以落实。

“上不亏公,下不累民”,是税务工作的基本法规。如何使老百姓也能了解这个道理,配合税务局完成每年的征税任务,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许多农牧民不了解税务工作的实质在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抱怨税务局年年收税,对税务局印象不好,也有不少

人对此反感,甚至怀有敌意。就税务局本身而言,也有不少人认为税收工作吃力不讨好,容易得罪人,是件苦差事。凡此种种,给税收工作确实带来很多困难。

为了让大家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我们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广泛宣传税收政策,在宣传中,尽量避免空洞的说教,代之以具体的事实,人情入理的分析,并且以老百姓看得见的事情做例子。比如,每年秋天收回的田赋粮储藏在粮仓里,到了来年3—4月间,青黄不接时,农牧民中不少人开始缺粮,这时候开仓平糶,接济缺粮户,平糶粮价比市场粮价要低,解决了老百姓粮食不足的难题,而回笼的货币又用于发展生产,好让老百姓受益。又比如,要在新疆发展农、牧、工、商各业,使人民富裕起来,就必须奖励开垦荒地,保护牲畜繁殖,提高工艺品生产质量,改进交通运输等等。所有这些所需费用的很大一部分,则是从税收中来的。如果把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农牧业产量才可以迅速增加,也就能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再说,生产有个好的基础,各项税收也就随之增加,这二者互相促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些都是我们向农牧民做思想工作有效用的事例。

为了提高税务局全体人员对税务制度的认识,掌握和执行好税收政策,每次局务会上,总结完工作后,局长张同智和我等几位领导,总要反复强调:大家要以身作则,知法守法。税务局有些汉、维族青年工作主动性强、遵守制度,同农牧民的关系比较融洽,下到乡村工作时成绩也比较大。但也有一些讲话不注意分寸,态度生硬,积极性差的工作人员,在秋后收田赋粮时,不按章程办事,口出不逊,打骂农牧民,或用压斗收粮的窍门,变相多收农民的粮食,表现出蛮横的衙吏作风。对此,我很担心,每到收田赋粮的时候,便到各县查看征税情况,听听老百姓的反映,遇到问题当场解决。有一次到伽师县,遇到伽师分局一位正在同农民争吵的过斗人员,动手打了那位农民。弄清原委后,我当众向那位农民赔礼道歉,并

批评了这位收税人员。那位农民见状,气也消了,还回家拿了些粮食来,补交了田赋粮。

四

1938年底,正值回收旧币、推行新元的货币兑换时期。

那时的盛世才,从1933年4月掌权,至1937年这4年中,因战乱不停,军事耗资巨大,财政上入不敷出,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不得不靠借外债和滥发钞票维持家业,因此陷入了通货膨胀不能自拔的境地。当时省财政厅的主要任务只能是发行钞票,钞票不够用就印,印了就发。一家钞票印刷厂日夜赶印,钞票如同草纸一样不值钱。吃顿饭要用一迭票子,发工资,每人一大捆钞票,谁也顾不得去点数。至于当时印制的流通情况,那就更混乱不堪了。省府使用50两一张的省票,喀什自用喀票,伊犁自用伊票,绥来等地仍在用清币青铜钱,一些商号还在发行竹筒或铁币。除此之外,市面上还流通天罡、元宝、油布贴等五花八门的地方币和卢布、卢比等外币。总之各种价值不一的钱币混杂使用,互相顶换,致使货币流通紊乱,物价极不稳定,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各族民众无不怨声载道。

毛泽民同志掌管新疆财政之后,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心采取有力措施,改革币制,统一全疆货币,促使全疆财政状况逐步好转。1938年9月,毛泽民同志借召开全疆第三次代表大会之机,以库存的黄金、白银为凭证,通知大家要以此为基础,改两为元,实行新币。新币票面分1元、3元、5元数种。兑换率为省币2000两兑换新币1元,喀票1600两兑换新币1元,并规定今后统一以元作为货币单位。

新疆各族人民早就吃够了旧币混乱的苦头,从新币开始使用之日起,无不奔走相告,将平时积攒的旧币一捆一捆地搬去新币点兑换。为了保证喀什区的兑换工作顺利进行,喀什银行、工商行政

局、税务局等单位派人协助发新币、收旧币，使市场物价很快趋于稳定。我作为税务局的代表，前去参加监督焚烧旧币，一捆捆旧币被拉到疏附县北门外河滩上当众销毁了。看到毛泽民同志制定的财政计划一项项付诸实施，并且得到各族同胞的衷心拥护，那时我心里无比喜悦。

五

旧币的改革方便了百姓，活跃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改善了社会秩序。到了1940年，认购公债的任务又下达了。认购公债，这在当时的新疆还是第一次，真可谓大胆的创举。毛泽民同志亲自拟定公布《建设公债条例》，并印发宣传大纲，号召人民和政府通力合作，加速新新疆的建设，为自己子子孙孙创造快乐幸福的生活。毛泽民同志还在《新疆日报》上发表有关发行建设公债的专文，指出按全疆400万人，每人认购1元钱计算，预计全疆可发行400万元建设公债。并强调：发行公债有利于支援抗日前线，巩固大后方，提高人民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意义十分重大。党代表陈潭秋同志也指示各地的共产党人要做好认购公债的宣传鼓动工作。任务下达之后，喀什税局很快地行动了起来。局领导分头到各县召开会议，号召公务人员带头，巴依上层人士响应，并在人民群众中做宣传说服工作。由于毛泽民同志主持财政工作以来，不尚空谈，言而有信，是重“信用”的，成绩显著，尤其是实行币制改革，深得人心，老百姓从心底里拥护。尽管认购的公债分10年还本付息，百姓仍然踊跃认购。为此，喀什区成立了推销公债建设委员会，行政长官陈方白任主任，我是委员。在陈方白带领下，我们披星戴月，在英吉沙、巴楚、莎车、麦盖提、疏勒、疏附等县奔走游说，带头的宣传队还配有电影放映组，每到一县，便召开民众大会，讲解推销公债与建设新疆的意义以及购买公债的方法。我们还深入工商和农牧民家中宣传。既重视巴依富人的大量认购，也不忽视众多平民的

认购。当然了,在具体认购时,民众对发行公债免不了也有各种误解。有的工作人员为超额完成推销任务,竟胡说没有公债票的人就不能进城。结果莎车的一些农民手持票证,要求我们换给面额小的公债票,以保证全家人手一张方便进城。听到这些反映,我们体谅了具体经办人员的动机,便耐心地向民众做解释,消除了误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喀什地区认购建设公债额居全疆首位,比起富庶的伊犁地区来,认购额多出了许多,我和陈方白看到当日《新疆日报》上公布的各区认购公债额的统计结果之后,心中欢欣不已,财政厅毛泽民副厅长为此对我们提出了表扬。

六

喀什区同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当时印巴还未分治)接壤,有较长的国境线。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入中国,进行疯狂的掠夺。英帝国主义也曾一度从政治、经济上控制南疆大部分地区。30年代后期,英国在喀什仍设有领馆,一些县里还设有代办处、教堂和学校。形形色色的英国人带着商帮出入国境线,走私情况十分严重。在大批外国商品倾销喀什市场的同时,许多违禁品如军火、鸦片、大麻、鼻烟等也源源不断地被偷运进喀什。在频繁的走私活动中,英国商人获取高额利润,成箱的黄金、宝石和稀有矿藏则被源源不断地运出国境,落入虎口。为了打击这批奸商的嚣张气焰,严格限制并严加查处各种形式的走私活动,已势在必行。

喀什税局配合边防哨卡,稽查来往商人,加强边卡防守和进出口货物的检查,做了不少工作。出塔什库尔干县城,有一条通往印度的小道,这是走私集团往返的主要通道之一,来往商人骑着马,赶着牦牛运送货物也常出入于这里。于是税局人员分成几个小组,配合边卡,在这条通道上盘查行旅商货,取缔非法活动,几乎每天都能查出几起贩毒、贩运军火、走私等案件,轻者照章罚款,重者

全部没收,或者连人带物扣押起来进行审讯。

当时查处任务较重的地段在蒲犁,那里是主要关口。蒲犁税局经常把大批被查获的违禁物品和金银钱物运来喀什,经喀什区税局查验处理。缉私工作的开展,有效地遏制了不法奸商的走私活动,稳定了市场贸易和社会秩序。

当时的喀什城内有十几家商店囤积居奇、偷漏税十分严重。为了牟取暴利,他们暗地里也参与走私活动。我税局稽查员好几次上门收税,刁钻狡猾的商店老板均以种种借口,把稽查员给瞒过了。事后,这些奸商得意忘形,欺行霸市更加严重,税局对此早有察觉,但尚没有足够的证据。于是,我同张同智局长商量对策,跟踪追寻,在老百姓的协助下,弄清了这些大奸商进出货的途径和走私的底细,并按财政厅的各项规定,带着部分稽查员,到市区商店,按图索骥,给这伙胆大妄为的奸商以严厉打击。经过几天的稽查,我们查封了一批秘密仓库,缴获了大量违禁品,对这些商店从重罚款。他们再也抖不起威风来。

七

1940年,毛泽民同志针对收缴田赋中遇到的问题,带着厅里一些人员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订颁发了有关田赋收缴补充章程。同年7月,毛泽民给各区、县税局签发了验契查田的通知,通知指出:“本年政府为满足人民要求,确定地数及整理各县田赋,故在本年田赋章程内规定有验契工作,此项工作由该局及分局从速商请各县长进行,勿畏困难与艰辛,努力完成。”

长期以来,在土地问题上纠纷很多。喀什区历年征收田赋一直是依照旧册上的地亩数目收缴田赋粮,而实际地亩数与旧册上的地亩数差距是很大的,不少巴依、富人的地亩数高出旧册上地亩数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历年收成甚丰,而交纳田赋数却很少,一些土地富有者用讹诈手段来转嫁田赋粮。因此,出现了富户少纳粮,贫户纳

重粮的不公平现象,在税收上加重了贫户的负担。验契查田,一是重新核实土地面积,凡与原有地契不相符合者,皆以核实的为准,发给新照。二是重新估定土地等级,按上、中、下三级分等。广大贫户也希望重新清丈土地,确定地权。这正如莎车县对验契查田所作的概括“清丈地亩、合理负担、明确地权,制止弊端”。

验契查田工作迅速铺开,全疆从事财经工作的中共党人,无不竭尽全力地投身了进去。我们所在的喀什区成立了验契委员会,拟定了《告民众书》和调查表格,将之印发到各县、各乡的农户手里。与此同时,我们还深入乡村搜集情况,消除农民的顾虑,发动他们自报隐地亩数,并检举巴依劣绅的不法行为,以求兴利除弊。为了使这项工作平衡顺利地展开,喀什行政公署和税局负责人也分头到各县乡,及时总结经验,有力地推动了验契工作的深入开展。

这一年夏秋之交,我到伽师县了解验契工作情况,实地参加土地丈量,开始时困难着实不少。因为农户的土地十分零散,一户农家的土地有好几块,每块之间相距很远。验契时先验地亩大小,再议地力等级,议了半天,往往争执不下,工作进展很慢。为了加快进度,我请来伽师县的正副县长,找了当地的几个老农民,一起商议,选择切实可行的快办法。经过实地试验可以看出,如果充分发挥原有土地登记册,地契、纳税票的参照作用,可使验契工作进度大大加快。据此,我及时向行政长汇报了伽师查地验契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积极的建议,经行政公署同意后推广实施,进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快了工作进度。农户们也较快地拿到了新的地契。通过那次验契查田,土地亩数明显增多,当年秋收上缴的田赋粮也明显增加,全区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八

喀什有几项大的税收,首先是田赋,其次是牧税。执行起来,收牧税远比收田赋困难得多。喀什地域广,牲畜分散,一年一度的税

收开始后，税局工作人员要到每个牧户的牲口圈里查点牲口数目，工作量很大。有的牧民往往在税收前夜，偷偷转移部分羊只和牛马，以减少纳税，各地都发生过这类事情。1940年财政厅颁发《征收牧税奖惩条例》，其中有几条规定切合实际，如像“对于储足冬草、搭盖羊圈栅保养羊只好的牧民，减免部分牧税”，“对隐匿羊只偷税漏税的要予以惩罚”等，条文极受牧民欢迎。当时区、县在征收牧税时统一规定的税率是：牲税由购买人从价征收6%，屠宰税由营业人按宰畜的重量及平均价征收6%，牧税按折中价收税，大畜马、牛、骆驼、骡、驴征收3%的税。小畜羊、山羊征收5%的税等等。而且这些税率明确下达后，全区各地均遵照执行统一的牧税。

为了做好喀什地区的收缴牧税工作，我同张同智等人合计，由区税局出面举办了收税人员培训班，选派过去参加过牧税征收、有经验的人员以及本年度将去收税的人员编组进行培训。培训期满，便委派这批人员下到牧村开展牧税征收工作。我们还拟定了征收牧税宣传大纲，并将之译成维文，由区行政公署发至各县税务局牧税组，再由它们转发给乡绅、阿訇头目等，以推动牧税工作更顺利地进行。

九

原局长李英才调职后，检查团的成员之一张同智受命留下接任局长。张局长上任不久，便请假回迪化接家眷，两个月时间，说也巧，就在我代理张局长工作期间，竟出了一桩意料不到的事情。其经过是这样的：按照历年的老规矩，喀什区每月向省财政厅送报表时，都是把各分局前一个月的报表数字加上总局本月的报表数，作为本月的税收上报省厅的。这是因为喀什地域辽阔，乌恰、塔什库尔干等地距离喀什十分遥远，当月的报表数字不能在月底报来，总局往往要在下个月才能把各分局的报表全部收齐。对这客观情况，省财政厅的一些老工作人员是了解的。这个多年形成的做法

一直沿袭下来,就在我代理局长的第一个月里,报表送到省厅,省厅科室几位参加工作不久的人员不了解喀什区的这一具体情况,见报表与税收现款差距甚大,便通知停发喀什税局的奖金。当时的奖金多于薪俸,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比较大。奖金扣除后,税局人员收入大减,人心惶惶,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件事。负责核算的一位青年工作人员个性很强,为这事成天郁郁寡欢,没过几天竟寻了短见。区公安局为这事专门派法医和公安人员来局里调查死因。谁也没想到税务上例行的出入帐之事闹出这么个乱子来。局长不在家,我肩上担子很重,还受到一些责难,心里很难过,连续给省厅税务科写了几份报告,皆如石沉大海。在我焦灼不安的时候,吴乃茵同志宽慰我:“要沉得住气。”当时,我想起了毛泽民副厅长,猜想他未必知道喀什税局历来的报表惯例和眼下出的问题。我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埋头给毛泽民同志写信,信很长,有20多页,除了反映问题外,在信的末尾还写道:若要了解详细情况,请来电通知,我将随时赴厅述职。信写好后,我请局里的一位老誊写员帮忙誊抄清,然后挂号寄往迪化。事后我才知道,毛泽民同志看到信后,立即召开厅里科室人员开会,就这件事批评了有关人员不做调查研究,工作不细致。毛泽民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责任在厅税务科,不在喀什税局,奖金应该立即补发。会后,郑亦胜同志代表财政厅来南疆视察,到喀什税局后告诉我,对我反映的问题,厅里研究过了,情况已经弄清,不用我去省厅述职了。郑还悄悄告诉我,这封信轰动了财政厅,尽管信中对厅里工作大加批评,但毛泽民同志并没有说批评得不对。郑来喀什不久,省厅的通知和奖金也发到了喀什税局,紧张空气立刻缓和了下来。我指定一人分发奖金,把大家的生活做了安顿,总算舒了口气。那两个月中,张同智局长也因为收到局里的信函而纳闷,从迪化返回喀什后,我才把详情告诉了他,并请他看了那封信的底稿。张同智恍然大悟,对我这样处理问题感到非常高兴。当天晚上,他请我去家里做客,

拿出当地老酒，把我慰劳了一番。

十

刚到喀什工作，我们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民情习俗等等还很生疏，特别是在语言交流上遇到了种种障碍。平时在机关上班，有翻译协助沟通思想，处理公务，还算方便，但一下班离开翻译，就很不自在。特别是出门买东西或串门聊天，在民族同胞中只得借用手势表达语意，困难得很，我便努力学习维吾尔语，渐渐地能说一些当地的常用语，一些比较难的话虽然说不出来，也能领会大意，进而在工作生活方面更加得到了兄弟民族同胞的信赖。在喀什工作4年中，我们广泛接触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认真贯彻六大政策，宣传抗日主张，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力做好事，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扩大了党在新疆的影响。各族民众把我们看作自己的亲人，逢年过节，总不会忘记我们内地来的几位同志，经常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以表达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记得税务局里有一位民族同事结婚，请我去当主婚人。尽管新郎比我的年纪大，觉得很别扭，但盛情难却，还是去了，并认真地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为他们主持了婚礼，祝愿新郎新娘美满幸福、白头到老。街坊亲友对此十分高兴。大家说我这个主持人能关心体贴当地民众，不摆官架子，比什么都好。有一年秋天，喀什区举办全区教育系统运动会。当时的喀什区，体育器材设备奇缺，运动场地简陋，群众性体育运动很少开展。开这样的运动会，对青年学生和农牧民却很有吸引力，它自然得到了我们的赞同。当时，李云扬是操办运动会的主持人之一。因为我负责财税，他提名要我当运动会奖品部副部长，负责运动会的筹备和分发奖品。我欣然接受了，并同大伙一起忙了好几天。运动会的第一天，司令兼行政长官蒋有芬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随后是赛马和田径项目的预赛，参赛者生龙活虎，场面热闹非凡。现在回想起当年不同民族的师生和

兄弟姐妹一道奔逐夺标、欢声笑语荡满赛场的情景,心里仍然热乎乎的。

十一

中共党人与各族民众的团结和友谊,使盛世才很不放心。他向来疑心太重,害怕和嫉恨各民族间兄弟般的友谊和联系,因此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找岔子,予以破坏。其卑劣伎俩除前面提到的对我们记大过、免职降薪外,频繁调动工作便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把我们从北疆调到南疆,从总局调到县局,从一个系统调到另一个毫无相干的系统,以此把我们原有的群众基础毁掉。更有甚者,他一旦对某个人不放心,便随便给扣上“英帝国主义走狗”或“托匪反动分子”的帽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将之逮捕入狱。并且经常使用秘密逮捕、囚禁以及暗中处决的办法来清除所谓的“异己分子”,大批进步青年、爱国人士就这样受害失踪了。

著名的民主人士杜重远 1937、1938 年两次来新疆,满腔热忱地为巩固、建设抗战大后方做贡献。受聘于新疆学院院长之后,他积极开展工作,联系各阶层人士,宣传抗日主张,在新疆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盛世才满腹狐疑,动用他操纵的特务组织在学院门口开店铺、摆烟摊,监视杜重远的往来行动,并收买一些学生每周书面报告杜重远的言行。进而捏造了所谓杜重远受汪精卫之命,在新疆联合各族反政府分子阴谋推翻政府,建立亲日政权等罪名,将杜重远逮捕、严刑拷打,残杀在屠刀下。喀什区司令兼行政长官蒋有芬,后来也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割去舌头,活活整死。

喀什税局有一位副局长是维吾尔族人,他一家妻小就住在城郊。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突然外面人声嘈杂,传来恶狠狠的敲门声。我开始以为是公安局的人来查户口,赶紧把书藏好开了门。进来的是几名凶神恶煞的便衣,一看我是汉族人,连连说弄错了,扭头就走。第二天上班,我看到那位维吾尔族

副局长的家属站在机关院子里哭泣，一问，才知道那位副局长昨天晚上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了。对此义愤填膺的我，当即写信给邓发同志，把白色恐怖日甚、人人朝不保夕的处境向他作了汇报。

不愉快的事情相继发生，不久，便谣传盛世才收到一封信，内称从延安来的中共党员中，担任蒲犁县县长的许亮同志和喀什区蒲犁边卡大队长胡鉴同志有矛盾，信中又“揭发”了“问题”。许亮和胡鉴同在蒲犁工作，并没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有意思的是，盛世才对这封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匿名信奉为至宝，指令要彻底追查。他亲自电令喀什区司令兼行政长蒋有芬负责查清这件事，并特地点名要高玉成参加调查组，蒋奉命组成4人调查组，即蒋有芬的一位副官、区公安局1人、行署一位科长，加上我，共4人。调查组由蒋的副官具体负责。当时的我处境维艰，一方面得按照盛世才的指令参加调查，一方面又得维护事实，主持公道。因此，我积极在调查组中做工作，告诫大家仗义执言。调查组开会时，我便摆出事实，反驳所谓许、胡矛盾的无稽之谈。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原来这是一个圈套。是盛世才指使嫡系部队——公安系统的某些人一手操纵精心策划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诬告延安来的同志自相不和，然后又让延安来的同志自己审问自己，按照盛世才设下的圈套往里钻，达到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末了，我们见到了所谓的主要“证人”——县公安局的一位职员，他一上场便信口雌黄地说了一通许、胡的矛盾冤结。其实这些谎言、如何进行问答，都是盛世才公安系统的爪牙事先安排，一手操纵的。我当场抓住他证词中自相矛盾的破绽，层层批驳，问他哑口无言。其余的证人，有不少是在公安局的刑罚和引诱下昧着良心出场说话的。然而，在我们陈述的大量事实面前，他们无言以对，各种诽谤无济于事，县公安局长一手导演的闹剧只得狼狈收场。调查结束时，得整理一份调查报告上报蒋有芬，一时间，各方代表对如何写这个报告又发生了争议。开始，区公安局的代表

不甘心就此了结,但调查报告须按多数人意见来写。后来,区公安局的代表理亏词穷,不得不在报告上签了字,使借刀杀人的盛世才终究一无所获。事后我暗自庆幸在对敌较量中的沉着应战,为保护了自己的同志,避免了一场不该发生的冤案而欣慰。

十二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以残害中共党人为嗜好的屠夫头子是不甘心失败的。1942年2月,盛世才又发出调令,调我去阿克苏区沙雅县税务局任局长。接到调令后,我登门辞别了合作共事4年之久的同事、朋友和各民族同胞,依依不舍地离开喀什,前往沙雅县。同喀什相比,沙雅财政经济、生产方式更为落后,百姓生活十分贫困。当时的县税务局设在一个简陋的小院里。一进门是三间并排的小屋,灰土剥落,门窗残破,几张办公桌,几个木头柜,这就是县税务局的全部财产。简单安置下来后,我顾不得休息,开始逐个找人谈话,了解该县几年来的税收情况。当时,全疆的财政税收,已从紊乱趋向正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沙雅这个只有4万人口的穷县,税收状况尚未好转,问题成堆。早在1932年,该县除关税外的各项税收,一直实行包税,所谓包税主要是由一些官吏富豪包揽税收,当包税人。包税人在税收中作弊,公开贪污,已成了普遍现象,政府靠这些税头收税,漏洞百出,长期堵塞不住,到了盛世才上台后,该县取消了包税制,改用税收提成办法,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废除包税制。并且由于实行了税收提成法,各地税收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人民生活拮据,负担沉重。

上任伊始,我先做调查研究,听完税局以往工作的汇报后,便带上两个人,走访了各个乡村,实地了解情况。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基本上走遍了该县乡村,对广大农牧民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事实告诉我,沙雅人民的生活是相当贫困的,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税收不尽合理,百姓怨言很多,对税局工作也有不少指

责。摸清情况后,我便开始考虑:哪些税该收,哪些税可以减少,哪些税可以取消,力求做到税收合情合理,上不亏公,下不累民,使百姓生活有所保障和改善,并在税务会上,提出了在执行省财政厅财税政策的同时,要照顾各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大家负担税额合理,改变过去那种不管资产多少,征收税额一样的牌照税收法,实行核实资产,按比例征税的税收法。牧税也改为按牲畜多少、大小、牧场好坏等分级征收税款。这个税法实施之后,基本符合每户农牧民的实际情况,照顾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农牧民的拥护和欢迎。

沙雅的盐碱地多达几万亩,这是该县穷困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农户春时辛勤耕种,秋时常常颗粒无收,只得听其自然,任田地长出青草来放牧牲畜。像这类田地,留之无用,弃之可惜,虽然不能种植庄稼,每年秋天却征交田赋,这样做显然很不合理。按照毛泽民同志的财税思想,这类颗粒无收的盐碱地,是应该免交田赋的。因为早在1940年,毛泽民任财政厅副厅长时就曾发布通令,提出过为改善人民生活,绝不让民众负担太重等一系列主张。面对沙雅县盐碱地比比皆是的具体情况,我提出减少额粮,免去百姓拖累的建议。经县政务会讨论通过,报告省厅,很快得到了“准予照办,以示体恤”的批示。因此,我们立即通知全县按此执行,减轻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次年立夏过后,又到了征收牧税的时节。新疆的政治风云突变,盛世才同苏联的关系开始破裂;苏联多次限期盛世才还债,并规定债务必须用实物偿还。盛世才穷途末路,根本不顾百姓死活,对用实物偿还债务一事表示同意。因此这一年的牧税征收同往年不一样,收税不收纸币,必须用牛皮、羊皮、马皮等实物代之。这不仅给税收带来新麻烦,而且对全县农牧民来说也是一个灾难。

当时正值7月份,天气十分炎热,沙雅一带日日高温,白天汗

注如水,酷热难熬。我和税务局同事顶着烈日,分别到乡下了解牧民纳税情况。一到乡下,便看到老百姓在流着眼泪宰杀牛羊,不少维吾尔族妇女失声痛哭,在嗡嗡嗡嗡的苍蝇包围中剥着羊皮。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哭诉:老天爷啊,大热天宰这么多羊,吃不完就要烂掉,这样下去老百姓怎么活啊!我又去了几个乡,看到的情况都差不多。看到那么多老百姓呼天唤地的惨状,我心急如焚,回到局里,马上通知正在各村收税的工作人员回局里来开会,研究如何改善眼下收税状况等问题。按照原来规定,每户养羊在20只以上的须缴纳羊皮若干张;此规定对于养羊在数百上千只以上的牧户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再说酷暑难消,仍按此规定征收牧税,未免不近情理,不讲人道,作为中共党员干部,我怎能看着老百姓哀啼遍野、泪水长流而无动于衷呢!面对刻不容缓、多耽误一天农牧民就要多一份损失的情势,我想牧户按养畜多少确定纳税畜皮数的规定,是一条死杠杠,没有灵活的余地,但如果采用化整为零的变通办法,则可以解决不少棘手问题。然而,即便这个变通办法在局务会上通过了,具体实施起来还会出现户头多税票不够用的问题。几经权衡之下,我还是当机立断,决定自刻自印税票。并找来了曾经刻过图章的同事,要他立即刻印数量不等的各种税票,然后报请财政厅备案。当时我心想,你盛督办视民众财产如草芥,我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财产蒙受这样大的损失,事到如今,我只能先斩后奏了,你同意最好,不同意也只能这么办了。要处分就处分我吧。票一印出,我立即让按数下发。就这样,牧民只杀了很少量的羊、马、牛就完成了畜皮税数额。欣喜若狂的牧民在赤日炎炎下高呼“胡达、胡达!(青天的意思)”他们奔走相告,感激税局帮助他们减免了沉重的牧税负担。

来沙雅后不久,我逐渐发觉局里有些风气不甚好,有的人终日无所事事,工作效率很低;有的人多吃多占,刁难百姓;更有甚者,成天盛气凌人,摆当官做老爷的架子。摸清情况后,我采取了一些

措施予以整顿,并对坏习气劣行为及时予以批评纠正。有一次,在收田赋的时候,有位农民交来5斗粮食,税收人员用斛一量,硬说不够5斗,农民叫苦不迭,告到我这里,一查问才知道,原来这位税收人员收粮不是平斛,非要斛满冒尖不可。结果,5斗谷子经他这么一量,分量就不够了。我当场批评了这位税收人员,并以此为例,重申收税纪律,禁止任何人收田赋时大斗进,小斗出;大秤入,小秤出,巧立名目,坑害百姓。这件事在局里引起震动。与此同时,我还要求每个工作人员首先要自己弄懂税收条文,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办事要讲求效率。由于措施得当,批评教育及时,在短短几个月内,税局风气逐步好转起来。秋天的田赋收上来后,我们立即组织力量对旧仓库进行了维修,原有的仓库不够用,我们又建了新仓库。为了防止偷税漏税,我们在远离县城、出产皮毛多、毗连邻县的几处过往要道上增设关卡,加强税收管理。这一年的秋天,税局还开辟、增建了新的粮食市场和宰畜场,扩大了税源,增加了税收,且大大方便了民众。

除本职工作外,我很注重了解社情,广交朋友,白天在翻译协助下处理公务,傍晚,翻译回家后,我便抽空出去串门,用自己学的维语同民族同胞交谈,效益颇多。当时,沙雅老百姓私下议论几起县公安局滥施酷刑、老百姓屈打成招的冤案,愤愤不平,我觉得这是个问题,理应为民平愤。好在我了解县公安局局长原籍东北,早年参加抗日联军,斗争失败后转赴苏联,从莫斯科回国抵迪化,被分配来这里任职的底细,便决定找他谈谈。一天晚上,我在屋子里哼唱《松花江上》这首歌,很巧,这位公安局长在屋门口听见了,不禁敲门进来,道:“老高啊,我已经听了好久了,有歌词吗?给我一张。”我给了他一份,两人便一起唱起来。他流亡多年,家破人亡,一唱这歌,眼泪直流。谈起过去的流亡生活 and 不幸遭遇,说到目前的工作,我问及县公安局伤害无辜的丑闻,便劝他对待老百姓要秉公执法,不要随便打骂,要做对得起百姓的事情。他听了都一一表

示接受,从此后,这类无端欺负百姓的风闻也就渐渐少了。

1941年,世界风云突变,德寇气焰嚣张,苏联日告危急;日、蒋、汪联合转攻我抗日根据地,大有一举扑灭革命力量之势。善于观测风向、精于投机钻营的盛世才一反常态,开始对中共在新干部进行限制、刁难和打击迫害。他先将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同志于1941年7月调任民政厅代厅长,尔后于1942年5月9日将乌什县县长林基路调到省里,使他一去便音信全无。同年6月以后,从延安来的陈九柯、陈清源等同志也一个个被调回省里“另有任用”;这一年的11月,盛世才又突然下令要我去职回省,“另有任用”。接令后,我把公务移交清,登门向各位同事辞行,打算尽早动身,经库车去迪化。16日大清早,县长、副县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邮政局长等县政府机关负责人和部分县政务委员以及街道居民、农牧场牧民等一二百人骑着马、坐着马车前来为我送行。虽说我在沙雅工作还不到一年,但同这里的各族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同事、上级的信任和支持,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我不停地同送行的人握手话别,一直到“送宾亭”才同大家依依不舍地分手,单车直向库车方向驶去。到库车时,我发现有人在暗中跟踪,联想到那么多同志到省里“另有任用”,一去下落不明,预感到情况不妙,从思想上做好了充分准备。车到迪化八户梁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个便衣模样的人在车下喊我的名字,说是奉督办的命令,在这里给我找好了住处。我下了车,在南门外一个客栈登记住下后,整个夜晚,四周围总有几个可疑的人在活动。第二天清早,我到督办公署报到,承启官出来接待,要我稍坐片刻。他转身进公署去向盛世才报告,不一会儿,就一溜小跑出来对我说:“督办身体不好,不能见客。他指示我送你去一个地方休息。”当我坐进一辆名叫“皮卡甫”的小车时,见车后已坐着一个军人,司机随手拉上了窗帘,外面的景物便全都看不见了。车驶到三角地,黑漆漆的大门一开,我才发现全副武装的士兵蓦然后出现在眼前,从延安来的林基

路、李宗林、李云扬、陈清源、胡鉴、白大方等大批同志已被软禁在这里了。后来我才知道,将中共党人全部软禁的同时,盛世才对新疆的革命青年、进步人士也大肆进行了逮捕、囚禁和屠杀。为了达到罪恶目的,盛世才竟肆意捏造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罪名,对我们大打出手。从此,我党全体在新人员身陷囹圄,开始了一场为期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狱中斗争。

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中共党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多方营救下,1946年6月,新到任的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将军宣布无条件释放,并派刘亚哲少将护送我们重返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党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和黑暗的较量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同志为新疆人民的和平和幸福,英勇捐躯,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历史是人民谱写的,为着人民的利益勇于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虽死犹生,浩气长存,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深深缅怀。那些倒行逆施,以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不管是怎样的逞凶一时,终究要被历史所唾弃。

我1946年离开新疆,到现在已经41年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兄弟团结合作,开发和建设新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此。我预祝新疆的未来如花似锦,祝愿各民族兄弟亲密合作,创造更加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写于北京,1987年

(朱守道整理)

(选自《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共党人在新疆财经战线上

(节录)

方志纯

红西路军余部四百余人,他们到新疆后改编为一个支队,下分三个大队,分别在新疆学习装甲、通讯等技术,这支部队对外称“新兵营”。从新兵营中,还抽调了苏井观等十多个同志,在新疆学习医务。

当时,我党还从延安派了袁彬等十多个同志到新疆学习航空技术,加上从新兵营中挑选的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航空队,编入盛世才的空军部队。这是我军第一支航空队。

除上述几部分同志外,当时在新疆的还有谢良等八路军伤残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共二十多人。

中共党人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认真执行“六大政策”,宣传团结抗日,发展工农业生产,改革政府机构,整顿财经纪律,加强文化教育,改善群众生活,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是极端反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中共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在“六大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作了极大的努力,为各族人民争取得到一些民主权利。毛泽民调任民政厅[代]厅长期间,为了废除压迫各族人民的“乡约农官”等封建制度,拟定了区、村普选办法和区、村公所组织规程,由农牧民自己民主选举区长和村长。原来有些市镇的街长,对居民群众进行敲诈勒索。毛泽民根据群众的要求,又拟出街长选举办法与街长办事组织规程,

由群众自己选出能为他们办事的街长。其它一些由我党同志担任行政领导的地方,如林基路在库车县、李云扬在巴楚县,都根据民主、抗日的要求,对压迫人民群众的政府机构和政治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使人民群众享受到一些从未享受过的民主权利。同时,他们惩治贪官污吏,释放无辜“犯人”,因而有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抗日支前的积极性。

新疆[当时]的财经异常混乱。盛世才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就拼命印发钞票。“银钞一把、换烟一包”,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盛世才本人和他的爪牙贪污成风,弄得新疆地方民不聊生。在毛泽民任财政厅[代]厅长时,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到财经战线工作,帮助调整了财政组织,建立了金融制度,并且整顿了财经纪律,堵塞了某些贪污漏洞,进而实行币制改革,制止滥发纸币,控制了通货膨胀。原来盛世才除正常活动开支外,每年还要将全疆收入的八分之一纳入私囊,毛泽民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有理有节的斗争,迫使盛世才放弃了这一项公开的贪污。

改变财经状况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为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发展工农业生产,作了极大的努力。新疆原有几个厂矿,都被盛世才的三亲六故把持着,生产十分落后。毛泽民支持和领导新疆各族工人,创办和扩建了独山子油矿、头屯河铁工厂等厂矿,对发展新疆的工业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林基路在库车县领导全县农牧民兴修水库、水渠和两座大桥,还取缔了“巴依”们霸占的草滩,解决了当地长期存在的部分干旱问题,为发展农牧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共产党员李云扬到巴楚县任县长后,组织大批铁匠,打了大量的坎土曼,发给贫苦农民,改变了当地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状况。

就是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之下,一年多的时间,全疆就出现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稳定、生产发展的局面。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

对新疆的文化建设事业,我党同志作出的贡献就更大了。反帝会是以实行“六大政策”为宗旨的群众性政治团体,黄火青任该会秘书长。当时,盛世才不准我党公开活动,党的工作是通过党员和群众团体来进行的。反帝会的工作非常活跃,打破了过去新疆死气沉沉的局面。它的机关刊物《反帝战线》和李宗林等主持的《新疆日报》开始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当时在新疆各族人民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疆日报社以前只有三四间平房和几张破办公桌,印刷机和铅字都陈旧不堪,报纸印出来模糊不清。自从共产党员李宗林、李何等到报社担任职务后,担负了报纸的评论、编辑、采访、校对等主要工作,改进了报纸的宣传内容,并从苏联买来了新式印刷机和铸字机,使报纸面目焕然一新。在我们同志的努力下,报纸在新疆各地建立了发行网点,《新疆日报》成了群众喜欢看的一张报纸。

新疆学院原来也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大院,自从林基路担任这个学院的教务长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在教学内容和校风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在学校开设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新课程。沈雁冰等进步教授也从内地来到迪化,到学院来讲课了,学生经常组织演出反映抗日斗争的话剧,学院到处呈现着一派蓬勃的景象,被同志们誉为“抗大第二”。

通过报纸宣传和学校教育,在新疆各族人民中传播马列主义,加深了人们对苏联革命的认识,对我党政策的理解,对国民党反动派面目的了解。尤其是青年学生,在我党的宣传和教育下,提高了觉悟,积极参加革命。其中有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工作,有不少人因此而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人投奔到延安,参加到抗日斗争的伟大行列中。

新疆的卫生事业,过去几乎是一张白纸,农牧民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在我党同志的努力下,在迪化创办了一所医药速成学校,

为新疆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并]在莎车、焉耆等地建立了医院，在库车、奇台、鄯善、温泉等地开办了诊疗所，在喀什、阿勒泰等地设立了药房，在迪化、伊犁、塔城等地医院里设立了门诊部门等等。这些医疗卫生事业设施，改善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健康状况，受到了各族人民的赞誉。

在新疆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工作中，我党同志力促进步，为民造福，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堪称楷模。

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我党同志也很注意团结盛世才政府中的中下级职员，耐心地教育他们，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记得当时财政厅有个姓裴的科长，一次出差时不幸翻车遇难。毛泽民半夜接到电话，披起衣服就出发去现场。朱旦华说：“你身体不好，还是明天去吧！”毛泽民说：“不行，人在危急的时候，总希望见到亲人，我怎么能不去呢？”当毛泽民赶到现场时，裴科长尚未断气，他握着毛泽民的手，没说几句话，就含着眼泪死去了。此事在一些旧职员中反应强烈，他们说：“一个小小的科长遇难，厅长大人半夜出动，这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毛泽民以自己的言行，不仅教育了大多数旧职员，而且感动了盛世才派来监视他的人。原来，盛世才派来为毛泽民“服务”的司机、秘书、翻译等人员，都负有“特殊任务”。后来，他们中有的人，不仅不向盛世才报告毛泽民的行动情况，反而回过回头来向毛泽民数说盛世才的罪行。

在新疆学习和工作的“新兵营”的干部和战士，虽然穿着盛世才军队的服装，但是保持着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了无产阶级战士的优良传统，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群众一看见他们，就用手比划着“八”字，问：“是不是这个？”当时，我们有规定，不能公开身份，同志们只是笑笑，不作回答。但人们说：“你们不说，我们看得出来，你们是共产党的军队。”

总之，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一个个就像是革命烈火，他们

走到哪里,就把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带到哪里;他们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生气,带来了春天。各族人民被压抑着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了,被禁锢着的思想得到了解放,群众广泛地谈论起共产党、八路军……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25期)

抗日战争初期在新疆日报社

汪小川

1938年初，我受党组织的派遣，从“新兵营”到新疆日报社任副社长。社长由外事处处长王宝乾（赵实）兼任，他是受联共派遣，于1935年从苏联来的。我到报社几个月后，党又派李宗林、李何、王谟、王宪唐、马殊等同志来报社工作。这些同志都是从延安来的。

当时，我们党在新疆的活动有其特殊性。我们和联共派来的人没有组织关系。我们去之前，新疆没有中共党组织。由于盛世才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向我党要求帮助，才陆续来了些党员。当时去新疆的中共党员大体有三部分人：一是从西路军（新兵营）派出来的干部，如我和黄火青；二是从苏联回国或去苏联路过新疆被留下的干部，如黄颐（苏牧）、沈谷南等；三是党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如李何、林基路、王谟等。报社党员较多，我们自己组织了党小组，成员有我、李宗林、李何、王宪唐、王谟等。党小组只管自己同志的生活，对外不公开活动，也不吸收新党员。

当时的《新疆日报》是盛世才的报纸。报社根本不像是个事业单位，倒像是个官衙门。生产部主任是个东北军退伍军官，权力很大。他说报纸不能印，就印不成。按规定报纸每周出六张并没有保证。星期日像其他官衙一样，报社所有工作人员放假一天，星期一无报。每期出报3000—5000张，还不一定能发出去。

我初去时，新疆日报社在城东一个小巷子里，大门正对着师范学校。至今我还记得报社拥挤混乱的情况。一进大门，有一条很

窄的铺砖通道,左边有两栋砖木结构的长方形房子,各约有50平方米,前屋是生产部和发行科,后屋是编辑部和总务科,中间用些柜子之类的家具隔着。20多个编辑、记者挤在几张桌子上工作。通道右边有一排约七八间土平房,是社长、副社长办公室、校对科、制版科和印报车间。制版科的主要任务不是为报纸制图片版,而是为银行制钞票版,请有一位苏联工程师。他占用两间小房,油漆一新,这是报社最辉煌之处。

印报设备破旧不堪。有一台对开平印机,在一般情况下用小柴油机带动,柴油机经常出故障,只好用人力摇。有一台手摇铸字机,一副古老的汉字模,字号残缺不全。还有一个小化铅炉,整天黑烟滚滚,使整个车间的空气浑浊不堪。

要把这张报纸改造成为宣传抗日的有力工具,从哪里着手呢?我们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首先团结报社的大多数同志,同他们一道工作,在他们当中建立威信。处理重大问题还要取得盛世才的赞同和支持。社长王宝乾向盛世才建议修建新房舍,采用新设备,得到了盛世才的同意。1938年5月,我用化名汪哮春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建设中的新新疆》的长篇通讯,从“新疆的政治状况”和“新疆的建设事业”两个方面介绍了“六大政策”在新疆实施所取得的成果,表明我们是支持“六大政策”的。盛世才看到这篇文章后,积极地支持报社的工作,迅速批款在西大桥边修建新房舍,购置新机器。

修建新房舍,是全社会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中共党员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编辑长李宗林,一到任就到工地上坐镇指挥,大大加快了施工的进度,只用了几个月时间,主要厂房和生活用房就基本建成。社长王宝乾通过外事关系,从苏联购进一台半自动全张印报机,可惜只有主机,没有副机和配件,发挥不了作用。1938年秋,萨空了担任报社副社长。他上任以后立即就去内地和香港购买印刷设备,物色亟需的技术人才。他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于1939年秋,从内地和香港买来一批印刷器材,还聘请来一批技术人员。从此,报社确实有了生气,报纸也很受读者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日报》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报纸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转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还刊登了内地一些进步报刊的文章,很有吸引力。

改变报纸的编辑方向,改进报纸的内容编排,使之为抗日战争大造舆论,这是当年在报社工作的全体党员的根本任务。1939年秋天,周恩来同志去苏联途经乌鲁木齐(当时称迪化)时,在南梁招待所会见了。他很关心报纸宣传工作,要我汇报报社的工作情况,明确地指示我们,要把报纸当作我们党在新疆地区的一个新闻阵地,一定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定要团结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发展进步势力,打击顽固势力,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的工作是莫大的鼓舞。我当时还见到了邓颖超同志,这是我毕生难忘的。

在新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处理同盛世才的关系上,就要有联合,有斗争。盛世才是个残暴的地方军阀,但在当时他亲苏亲共,有进步的一面。要看到他的反动本质和表示进步的两个方面,及其在特定条件下的相互消长,是要花费一些学费的。1938年夏天,盛世才在一次“反帝会”总会干部大会上居然说,他的“六大政策”即是“六大主义”,它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也不同于三民主义。对他这篇讲话,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不同的议论,多数人认为“不要理睬”,有的人认为要适当地抵制和批判。我们报纸拒绝刊登这类文章,因而而引起盛世才的很大不快。我当时给党组织写了一个意见,说明报纸拒绝甚至应该批判的理由。党组织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指示我们不给吹捧、不要理睬就是了。

1939年,茅盾、张仲实来到新疆。报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副刊《绿洲》的编辑人员欣喜若狂,要请他们为报纸写文章,参加报社

召开的座谈会。盛世才得知这个消息后,多方加以阻挠。后来,报纸的副刊《绿洲》也不能照常出版。茅盾和张仲实看到盛世才统治如此腐败、暴戾,料想在新疆也很难有所作为,很快就束装东返了。

抗战初期,在全国抗日大潮流的影响下,盛世才对我们在报纸上大量转载我党领导人和国内进步人士的讲话、文章、著作,心里纵然不快,但毕竟不好公开表示反对。1939年以后,他的态度明显变坏。对于我们接触进步青年的活动,大加限制,破坏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两次借故通报批评我,给我“记大过”处分。有一次是因为报纸上将“督辦”的“辦”字错印成“辨”字。在活字印刷的条件下,寻找这类差错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我不愿意和他讲什么道理,经过上级党组织的同意,我便于1939年底,借口“家严病重”,请长假,回到了延安。和我同时回延安的有当时的博乐县县长韩光。

改造旧报社,既要依靠党的领导,又要依靠报社工作人员的支持。当时报社共有职工80余人,其中编采人员近30人。有些年轻的编辑记者,如李泰玉、裴振杰、李鸿凯、邵家曙等,都是留苏学生,经常和我们接触,逐渐接受和拥护我们党的主张,积极努力工作。我们也有意识地同他们交朋友,团结教育他们。凡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以及不便公开发表的材料,一般都传给他们阅读,有时还组织他们开座谈会。我们还用自己的思想行动去影响他们,教育他们。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同志都住在狭窄的宿舍里,不分昼夜地工作和学习时,深受感动。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是为真正为新疆的新闻事业献身的。有些人还常常对我们说:“你们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正因为这些进步青年和我们心心相印,盛世才在公开投靠蒋介石的时候,不仅丧心病狂地迫害中共党员,也大肆逮捕和迫害这些进步青年。

抗日战争前半期,我们党的同志在新疆各地、各部门工作,都是认真负责、卓有成效的,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使

新疆一度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后来由于盛世才的叛卖,使我们党在新疆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党和新疆各族人民建立的深厚感情,是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

写于1983年6月

(摘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回忆抗战时期中共党员 主编《新疆日报》

赵新亚

“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东北义勇军抗日,失败后从苏联转到新疆。我曾在新疆日报社工作。那时的《新疆日报》的主要编辑人员都是中共党员。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50年前的往事,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一、春风吹度玉门关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同新疆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为了巩固抗战大后方,保障国际通道畅通,党从延安前后派出了两批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几位同志分配到新疆日报社。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犹如春风吹度玉门关,唤醒了沉睡的新疆大地。

当时任新疆日报社社长的是联共党员赵实(化名王宝乾)。1938年初盛世才从进疆的工农红军西路军(对外称“新兵营”)调汪小川来任副社长。其后又委任从延安来的李宗林为编辑长,李何为国际版编辑,王宪唐为制版科长,王谟为国内版编辑,马殊为文艺版编辑,陈清源为阿克苏分社社长,白大方为文艺版编辑,郭春则为校对科长,熊石琪和刘蔓萍(均系女中教员)兼任校对。国内知名的新闻工作者萨空了来疆后也担任了新疆日报社副社长。随萨空了来疆的张兆林任副编辑长,据说他当时也是共产党员。当时在新疆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人数比其他部门多,影响也大。

1939年,我从喀什调回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我曾兼任喀什分社记者,又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新人道》影评,经汪小川介绍到了新疆日报社工作。当时的副社长汪小川二十四岁,南方口音,英姿勃勃,态度和蔼,热情爽朗;编辑长李宗林约30多岁,四川口音,面孔瘦削,戴深度近视眼镜,平易近人,老练沉稳,一见就知道是个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同志。经过商谈,确定我担任外勤记者。由于这里没有大官小卒之别,也没有民族地域之分。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亲如兄弟,互相学习,所以工作很愉快。

二、培养多民族的新闻队伍

新疆长期处于封建军阀统治之下,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人才奇缺。中国共产党人为在新疆培养一支多民族的新闻队伍,于1939年至1941年在报社举办了三期新闻技术人员训练班,每期招收学员50人。由于学校毕业的学生很缺,就招收了一些失学、失业的贫苦青少年。赵实任训练班班长,李宗林任副班长,训育员前两期由王谟担任,后一期由苗广发担任。班上的政治思想教育、抗战形势、新闻学、绘画、唱歌等课程,由编辑们讲授;印刷技术课由生产部的技术员讲授。训练班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面在课堂教学,一面到现场操作。李宗林和王谟对学员的学习、生活抓得很紧。他们和学员们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学员们学习进步很快,毕业后即分配到各部门担负起专业工作。谁会想到,这些失学失业的青少年,昨天还流浪街头,今天竟成了拣字、拼版的技工;昨天还是农村、牧场受鞭笞的奴隶,今天竟会开动轰鸣的机器;有的人还担任了助理编辑、校对、摄影、制版、刻字、绘图等技术工作。训练班的148名学员,成了当时新疆新闻事业的生力军,解放后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新疆新闻、出版和印刷部门的骨干。

在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把各民族的青年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留苏学生李泰玉、邵家曙、李学、李

中凯、裴振杰和大专院校毕业生武志孝、柴晋森,以及归国华侨于江志等,他们都分别在编辑部、生产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用多民族文字出版报纸

1939年8月,新疆日报社刚从城里迁到西大桥。我来时,印刷厂的机械装备已经安装好,投入了生产。

当时,《新疆日报》有汉文版、维文版、哈文版和俄文版《通讯》。在伊犁、塔城、阿山、阿克苏、喀什、和田六个行政区设立了新疆日报社分社,根据各个行政区民族分布情况,出版二至三种文字的报纸,使各民族人民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

报社扩建的经费是在新疆财政厅代厅长周彬(毛泽民)的大力支持下批拨的,并通过外事处处长兼报社社长赵实向苏联贸易公司订购印刷机械和器材。1939年,副社长萨空了又从香港购置一批先进的印刷器材和通讯器材,聘请来一批新闻技术人员。萨空了冒着日寇的封锁、轰炸和国民党的阻挠,辗转万里,把这批物资、人员运到报社。

1939年末,编辑部继设立电讯科之后,又增设了通讯科,我调任通讯科长。通讯科在全疆各区、县建立了通讯组织,在迪化市各部门聘请了通讯员,定期召开通讯员会议,请反帝总会及文教部门的领导作形势报告,报社的领导人每次会议都参加,并且作有关新闻采访、写作的报告。通讯科还把有关新闻业务的报告汇编成册,印发给全疆各地的通讯员。为了使通讯员采访、写稿方便,通讯科还给每个通讯员颁发了“通讯员证”,印发了通讯员专用的稿纸、信封和采访记录本等。每月结算稿费时,通讯科还给通讯员代购《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杂志以及毛泽东著作、马列主义书籍。1940年1月,《新疆日报》公布了经过修改的《通讯员简章》和《通讯工作竞赛办法》,大大激发了通讯员工作的积极性。过去每

天只能收到一二十件通讯员来稿,后来增加到每天七八十件。新疆学院通讯员李政,仅半年时间就在《新疆日报》发表通讯、特写等稿件 12 篇。维、哈文版编辑部也在全疆组织了通讯网。

1940 年,报社建立了资料室。资料室设在俱乐部图书室内。开始由李学佺担任主任,有两三名资料员。报社为资料室做了资料架,卡片、图片资料柜,除了从国际书店和苏联领事馆取得一些俄文资料外,还从内地各通讯社订购资料,与内地 100 多家报馆交换报刊资料。资料室的建立为编辑们写文章提供了方便。1941 年,李学佺被盛世才逮捕,李宗林调我去担任资料室主任。我一直在资料室工作到 1946 年 1 月被派遣回东北(当时我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书记)。

1941 年 3 月 1 日,《新疆日报》在新闻技术人员和通讯、印刷器材都得到充实的情况下进行了改版,汉文版改用新 5 号字,不仅内容更丰富,版面也美观、新颖多了。像《新疆日报》那样同时用汉、维、哈、俄多种文字出版的报纸,在当时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四、《新疆日报》是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的坚强阵地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六大政策”

1936 年盛世才宣布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六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是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共党员到新疆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因而宣传“六大政策”就成了《新疆日报》的重要任务。当时的《新疆日报》名义上是省、督两署的机关报,实际上成了反帝总会的机关报。反帝总会秘书长赵实兼任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日报》地方版的稿件主要靠反帝总会组织和提供。记者外出采访往往首先采访反帝总会各部。全疆各地的通讯员大部分是反帝会员。反帝会执行“六大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和领导各族人民参加抗日和反

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等各项活动,都通过《新疆日报》进行宣传。《新疆日报》对全省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作了充分的报道。1938年10月,报纸刊登了《新疆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全面论述了“六大政策”所取得的成就。1940年5月3日,《新疆日报》刊登了反帝会发动节约运动的《节约宣传大纲》,规定节约的范围:团体为物力、金钱、人力、时间的节约,个人为衣着、饮食、居住的节约。老编辑长李宗林对节约宣传抓得很紧,亲自布置采访,并召开全市通讯员会议,请反帝总会陈培生(即刘进中)作报告,组织记者配合反帝会检查节约运动,使节约运动迅速推行到全疆,节约了大量经费,支援抗日前线。报社不仅积极宣传节约运动,而且身体力行,全社职工(包括社领导)积极参加义务劳动,美化社内环境。每天下班以后,报社全体人员都积极参加劳动。经过两个月奋战,把社内凹凸不平的地面平整成了平坦的场地,还修了花圃、水渠和石砌通道等,美化了环境,节约4000余元。

1941年4月12日,《新疆日报》为庆祝新疆“四·一二”革命八周年发表社论,号召全疆400万各族人民以更大的勇敢与努力,以更新的战斗姿态,以创造突击的精神,以更高的速度,迎接更繁重更艰巨的建设新新疆的任务。报社还编印了一本《新新疆建设漫画集》,反映在“六大政策”的指引下新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宣传抗日战争

宣传抗日是《新疆日报》宣传工作的重点。报纸以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报道全国军民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各项抗日主张。报纸发表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和文章,帮助人民认清形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九·一八”八周年,《新疆日报》连续宣传了两周,发表近10篇纪念文章。以后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新疆日报》

都出版特刊或专刊。

抗日宣传激发了全疆各族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建设抗战后方，支援前线。1937年12月，反帝总会发起了“一·二八”抗日募捐运动。从1938年开始，反帝会把抗日募捐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活动。仅在这一年全疆就募集241075元，折合大洋60余万元，用这笔款购买了10架“新疆号”战斗机，于1939年8月24日送往抗日前线。1938年10月，反帝总会决定成立全疆募集寒衣委员会，各族人民纷纷解囊捐款，涌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如迪化市一位妇女李王氏，捐献了女儿的妆奁50万两；阿克苏一位维吾尔族妇女捐献了27个元宝。对于这些事迹，《新疆日报》都进行了大力宣传。1939年2月14日，《新疆日报》刊登了反帝总会成立“抗日救国献金运动委员会”的消息，在迪化市设立献金台，发动群众为抗日救国献金。当时我在喀什，看到报纸消息后，立即在喀什开展了献金运动，在汉文会设献金台，第一天就收到群众捐献的金银首饰百余件。我自己捐献了一块新购置尚未使用的20平方米的和田地毯及一个月的工资。截至1940年5月，全疆共捐献折合大洋3226170元，先后汇往抗日前线。

反法西斯号角震天山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悍然进攻苏联。《新疆日报》立即开展了反法西斯侵略，声援苏联保卫祖国的宣传。6月26日，报纸用特大标题《反对法西斯侵苏，拥护苏联正义战》，刊登了“督办兼主席”盛世才以及各机关、法团、反帝军致苏联各领袖、红军将士和全体公民的支援电，以及《苏联红军痛击匪徒，全线德军被阻》的消息。各编辑部都写了反法西斯文章。李何除了写出一系列反法西斯文章外，还编著了一本书《最近国际政治形势及图解》。

《新疆日报》还积极宣传为苏联红军捐款、购军马。新疆各族人民的捐款，源源汇往苏联，新疆的骏马驰骋在苏联反法西斯战

场上。

宣传马列主义

《新疆日报》虽然处在复杂的环境中,但是在中共党员的主持下,宣传马列主义的立场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不仅经常在报纸上介绍马列主义的“小常识”,而且刊登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转载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当时在新疆工作的中共领导人邓发、陈潭秋,对报纸宣传工作非常重视,许多重要文章、社论、消息,都经过他们审阅或修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许多人都为报纸写稿,如毛泽民、张子意、朱旦华、林基路等,都为报纸写过文章。从内地来的知名学者、进步人士张仲实、茅盾、杜重远、赵丹、高滔、史枚等,也为报纸写过稿。

当时的《新疆日报》深受新疆人民和内地人士的欢迎。根据1942年上半年统计,仅总社汉文版就发行15640份;如果把维、哈、俄文版和六个分社报纸的发行数加起来,数字更加可观。由于各地文化促进会协助发行,《新疆日报》已发行到边远地区的农村和牧场。有些学校由于课本缺乏,还用报纸作教材。

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中共党员在当时新疆特殊的条件下,不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接收新党员,做群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他们只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群众为革命事业共同战斗。

社长赵实身兼数职,仍经常过问报社的日常工作,深入报社各部门解决实际问题,对新闻事业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是全社职工的楷模。

副社长汪小川,思想活跃,平易近人,工作严肃认真。社长不在时,他负责全社领导工作,经常深入到各版(包括民文版)编辑部、生产部指导工作,亲自参加汉文版的编稿审稿工作。1939年9

月有一次我采访全疆运动会的消息，回来太晚，汪小川为了帮助我赶写消息，连晚饭也没吃，坐在我身边，我写一页，他审一页，发一页。稿发完后，他让我去吃饭，自己却跑到印刷厂、校对室去指导工作。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感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编辑长李宗林。他是培养教育我的良师益友。后来副社长汪小川回延安了，社长赵实到南疆视察去了，李宗林实际担负全社的领导工作。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胃病，视力也不佳，为了新疆的新闻事业，不眠不休地工作。每天编辑们来上班，他就到电讯科、通讯科准备稿件，亲自逐条审稿。编辑们下班了，他又跑到拣字、拼版、校对处指导工作。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精神振奋，情绪活跃。他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吃的又少，真不知他是如何坚持这样繁重工作的。我文化水平低，李宗林对我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记得1939年纪念“九·一八”时，他给我找来一些有关东北抗日斗争的资料，让我写一篇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我写到半截就写不下去了。老编辑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青年人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写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还不断得到老编辑长的具体指导，从写特写、专栏文章到写社论，进步很快。

1939年8月，进步电影工作者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叶露茜等来到新疆，报社派我去采访。我深知盛世才对内地新来的人很敏感，不让他们与当地接触，同时我又不懂艺术，就向领导提出：“报社懂艺术的人很多，我这个‘土记者’怎么能去采访名演员呢？”李宗林对我说：“迪化人民都迫切希望了解他们的情况，你是本地记者，你去采访比较合适。”我意识到共产党员不便去采访，就硬着头皮去完成了采访任务。以后，领导多次调动我的工作，由外勤记者到地方版编辑、通讯科长、营业部主任、资料室主任等，我都一一服从了。在我的进步中，凝结着老编辑长的深深的情意。

共产党员不顾任何困难和艰险，英勇战斗的高尚品质，感染着

全社职工,特别是编辑部的同事们。报纸改版后,每个版可容纳1.2万多字,仍然是一名编辑和一名助理编辑负责。他们还要写专栏文章,有的还要写社论,任务相当艰巨。下班以后,大家都到拣字、校对室参与本版稿件的拼版、校对工作。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白大方气喘吁吁地跑到资料室来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要我帮他找些资料。第二天早晨我到他宿舍去,看到满地都是火柴头,可见他又苦战了一个通宵。1942年3月30日,我和白大方去南山白杨沟哈萨克牧区采访,写《迪化区一日》,遇上暴风雪天气。汽车没走多远,白大方的双腿被洒出来的汽油烧伤,我要送他回报社,他坚决不同意。到了南山,他行动十分困难,仍然坚持完成了采访任务。

1942年,德军进逼莫斯科,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进入紧要关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更加困难。盛世才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加紧投靠国民党。这年4月,盛世才暗杀了他的四弟盛世骐,借以制造所谓“阴谋暴动”案,大肆逮捕进步人士。8月29日,国民党要员宋美龄、朱绍良等来到新疆。7月31日,李宗林领导编辑部编发了最后一批稿件(其中有我写的纪念反帝军建军的文章和回忆新疆反帝军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时在南疆粉碎国民党暂编36师马仲英残部的文章),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新疆日报社。他临走时向我交代:争取把已经编好的《迪化区一日》和李何、李泰玉编辑的两本小册子印刷出版。后来这些书都被盛世才勒令销毁了,未能与读者见面。

8月1日,我们去南山野游,回来时,街上挂出了国民党的党旗。过去每年这一天,新疆人民都在红旗的海洋中庆祝三大节日:反帝军建军节,反帝会成立纪念,新疆和平统一纪念。今天人们面对蓝色的旗帜,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8月13日,最后一批中共党员李何、郭春则、白大方、王宪唐等离开了报社。报社的职工都惶恐不安,不知道那些延安来的同

事到哪里去了。后来传说他们都住在招待所,有的说他们被政府软禁了。直到1943年我们才听说,他们100多人都被盛世才投入了监狱。

1987年5月于包头

(摘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为了建设抗战的大后方

——忆新疆之行

萨空了

1938年9月,我跟随杜重远从香港到了新疆。那时我刚刚30岁,充满爱国激情,向往着为祖国的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上海沦陷后我流亡到香港,虽然在香港恢复了《立报》,但是由于粤汉铁路已断,香港和内地脱节,《立报》的影响远不能和在上海发行时相比,使我怀疑这工作对抗战能有多少裨益。加之抗战以来我一直寄居在租界和殖民地,抗战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因此,我产生了到内地去看一看的想法。恰巧这时杜重远从新疆回到香港,准备携家眷三度天山去新疆。他写了一本《盛世才与新新疆》的书,把盛世才描写得如诗似画。他对我说,新疆这个地方大有作为,劝我到新疆去。经过杜重远的一席长谈,我便决定跟他去新疆观光。杜重远给盛世才打了电报,说我是香港的一名新闻记者,想和他一同去新疆参加全疆代表大会。盛世才(当时还在莫斯科)回电说欢迎我去。

当时的新疆地处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邻近苏联。斯大林愿意援助蒋介石抗战,通过新疆给予蒋介石军事援助,需要建立一条从苏联经新疆、甘肃到达陕西的运输线。杜重远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条国际通道。蒋介石也很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便叫交通部派飞机送杜重远去新疆。于是我就同杜重远一道,乘飞机到了新疆。

我们途经武汉时,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胡愈之家里接见了我们。周恩来听了杜重远关于他三度天山的情况汇报后,同我们谈了新

疆的情况，告诉我们，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都在新疆。我们也向周副主席讲明了去新疆的理由。我们说，将来抗战的根据地很可能在新疆。新疆是个大后方，又靠近苏联，条件很好。我们要到那里去建设抗战的大后方。叶剑英对我们说，你们去新疆要同陈潭秋、毛泽民他们很好地合作。

我们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时，那里正在开全疆代表大会。盛世才在会上宣扬他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从表面看，盛世才是挺进步的。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马列主义万岁！”“六大政策万岁！”的大幅标语。盛世才热情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先参加全疆代表大会。大会开了10多天，临近结束时，盛世才找我们谈话，要我和杜重远留下帮助他工作，要任命杜重远当工业厅厅长，任命我当新疆日报社社长。盛世才还说，新疆是抗战的大后方，背靠苏联，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没有大后方不行。我当时相信他的话，但是我对杜重远说，我对盛世才这个人看不透，要慎重考虑。杜重远说，他和盛世才是同乡，小学、中学都是同学，到日本以后还是同学。他说，盛世才这个人可以合作，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那些天，盛世才每天都找杜重远去深谈。杜重远回来就劝我留下。他说，你原来就是办报的，留在这里可以继续办报纸，一定可以办好。又说，这里有你的一个熟人，叫周彬，你可以和他很好合作。我说，周彬这个人我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周彬就是毛泽民。此后，杜重远又引荐我同盛世才见面。我对盛世才说，我完全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作为一个报纸的负责人，对领导人的心情不了解，怎么能搞好工作呢？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盛世才还是一再说服我。他说，现在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天下嘛！你是知识分子，我也是知识分子，政权是大家的，是我们共同的天下嘛！他的言辞和态度的诚挚，感动了杜重远和我。我答应留下帮他的忙，但是不担任报社社长，因为报社社长有外事处处长和反帝会秘书长王宝乾兼任，让他继续兼任社长，我可以当副社

长。杜重远说,他不当工业厅长,愿意去办学校,为盛世才培养干部。于是,盛世才任命杜重远为新疆学院院长,任命我为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我们提出要回内地搬家,盛世才要我们就职以后再走,否则就不让走。我说,报社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没有见过,想先去报社看看。盛世才同意了。

新疆日报社印刷设备很差,铸字机、刨床等等,一概没有。铜模还是民国元年杨增新派人从上海购买来的,早已残缺不全。4号字、5号字排印在同一句话里,大小不同,报纸印得不像样子,很难看。报纸新闻很少,只靠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提供一些塔斯社的新闻稿,经过翻译以后,第三天才能见报。盛世才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情况,连蒋介石在干什么他也不知道,耳目闭塞。武汉撤退后,蒋介石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迪化只收到后半段。我对盛世才说,新疆日报太落后了,这样的报纸怎么能做你的耳目喉舌呢?新疆这样一个大省,你要统治这块地方,没有耳目喉舌是很困难的。他也承认报纸是落后,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首先要建立一套电讯设备,要改造印刷厂,要充实技术人才。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给我拨一笔钱,让我回内地去购买设备,招聘人才。盛世才同意了我的意见,立即拨了5万元。于是,我和杜重远就职以后一同回到了内地。

1938年底,我和杜重远回到重庆,见到了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他准许给我们兑换外汇,以便去香港购买印刷、电讯设备。当时蒋介石正急于想从新疆得到苏联来的军火,很快就批准了我们所需要兑换的外汇。

我们带着外汇回到香港。杜重远先携家眷飞去昆明候包机转飞迪化,我的家属也由沪到港,飞渝转蓉,会合杜重远、茅盾、张仲实诸兄及眷属西飞。只有我一人留港购办各物,并招聘技术人才。这时日军占领了广州,我派闫奉璋到上海来购设备,招聘人才。购买的设备有:两台汤姆森电动铸字机,各种大小字体的汉文铜模和

英文铜模各十几副，因为我想在新疆试办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乌孜别克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拉丁化报纸，所以买了英文字铜模。此外还买了一些铸铅条、花边，所需刨床、铡刀、凿子等器具。还在沪委托各书店搜购了“五四”以来的各种新书。至于招聘的技术人才，在画漫画、编画报方面聘了鲁少飞，他是上海《立报》的同事；新闻无线电收听方面招聘了王棣华，他是北平《世界日报》、香港《立报》的同事；铸字方面聘了张至炯，他是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多年的一位工友，宁波人，个性极好，过去并没跟我工作过，是闫奉璋在上海代聘的；此外就都是在《立报》工作过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计有闫奉璋（擅长报社管理工作），周公惠（擅拼版排字），舒谷青（擅刻字），成尊奇（擅铸字），赵英贤（擅译电）。所买的东西约有 10 余吨，还有这么多人，于是我在香港为新疆购买了 5 辆福特 1938 年式卡车，每辆价格为 780 余美金，大家都说便宜，因为当时在香港卡车缺货。这种卡车都需自装车身。我把它们交给了一个在香港最有名的装车身工厂装配车身，时间用去了三个星期。同时又收到盛世才的电报，囑会合新疆驻渝代表张元夫的夫人、女公子，代购一批绸衣料、自来水笔、男女用手表等，作为赠送苏联友人的礼品。这许多事足足用去三个多月的光阴。

1939 年 3 月 10 日，我带着人员和设备离开香港，经过安南（即越南）的海防、河内，辗转到达广西、贵州、重庆。这条运输线是宋子文搞的一个东南运输公司运输抗战物资的。我们在河内受到法帝国主义在业务上的刁难，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到达重庆后，又受到陈立夫 CC 特务的刁难，住了三个月。到达兰州后，朱绍良又把我们的汽车全部扣下，锁进山洞里，把车上的物资全部卸下来检查。直到 10 月份，我们才回到迪化，在路上走了 9 个月。

我们的车队共有 10 辆大卡车，5 辆是我在香港买的，5 辆是在重庆向西北公路局借的。因为我们到重庆后，接到杜重远的电报，叫我把他在重庆招收的一批新疆学院学生带去。杜重远为了吸收

外省人才,充实新疆干部,征得盛世才同意,在重庆为新疆学院招收了一批新生,原定文理科各招40名,后来只录取理科约20人。还有同杜重远约好去新疆的一批朋友,如小说家高滔(亦即齐同,《新生代》的作者)夫妇,医师项颐夫妇,工程师江浩,新闻记者张兆林,也都等着我一同赴新。盛世才又来电报,要给他购买中西文具,如毛笔、墨、铅笔、钢笔尖、复写纸之类。我在重庆又为新疆搜购了几箱书。这样,经过和迪化、兰州电商,向西北公路局借了5辆卡车。走到河西走廊时,因为人太多,有些人就买汽车票自己走了。

我在兰州时,遇到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等。周副主席因为骑马摔伤了胳膊,去苏联治伤,要路过新疆。有一天他叫我同他一道去看戏。我问他,你路过新疆,盛世才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我建议他给盛世才拍个电报。他叫我以他的名义拍了电报。据说周恩来到达和离开迪化时,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送。

我们回到迪化后,首先把机械设备运到报社去安装。在安装这些设备时,我们招聘来的技术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日报印刷厂一下子变了样子,成了当时西北地区第一流的印刷厂。报社有了电台以后,打破了耳目闭塞的局面,每天都可以收听到国内外的新闻。新华社的,中央社的,路透社的,美联社的,都可以收听到,大大开阔了眼界。报社新增加一批技术骨干,排字、拼版技工,铸字技工,裁纸技工,印刷技工,还有电讯技术员,一应俱全。整个报社出现了一种蓬勃发展的景象。

当时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很多。有从延安来的,也有从四方面军来的。毛泽民我是在上海认识的。1936年我在上海办报,西安事变后,毛泽民和章汉夫来报社参观,我们相识了。但是在迪化,我们不能在一起长谈,因为后面有特工人员盯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打小报告。毛泽民告诉我,讲话要小心。在新疆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有汪小川(副社长),李宗林(编辑长),还有李

何、王宪唐、王谟等。我从重庆带来的张兆林，后来他告诉我，他也是中共党员。

我回到迪化时，杜重远已被盛世才软禁，不能会见任何人。我问盛世才，我要去见杜重远，可以吧？盛世才说，你去吧！没有问题。我见了杜重远，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跟盛世才闹翻了，已经向政府辞职了，现在在家休息。我问他，因为什么事闹翻了？他说，他看到盛世才有些事做得不对，给他写了一封6000字的信，批评他不民主，独裁。盛世才拒绝批评。

杜重远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直率，有能力，在中国是很知名的。来到新疆后，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同中共党员林基路在一起，为培养各民族的学生，做出了贡献。他对打通国际交通线，对抗日战争，是有功劳的。他的主要问题是，1939年暑假期间，他仿照内地搞学生运动的办法，带领学生下乡搞宣传。盛世才对他这种做法很反感，因为盛世才不敢接近群众，害怕群众起来造反。而杜重远却下乡去搞调查研究，从迪化到伊犁，了解到群众的许多情况。他一回来就有人造谣，说杜重远的目的是当督办，取代盛世才，并说有人喊“杜重远万岁！”的口号。这就造成了盛世才和杜重远关系的恶化。我曾对盛世才作过解释工作。我说我是第三者，你们是同乡、同学，你请他到新疆来，海内外都知道。他来之前，辞去了国民党参议员的职务，现在什么官职也没有了，该怎么办呢？盛世才疑心太重，调解无效。杜重远对我说，他想到苏联去，和一辈子的朋友不能合作共事，但也不要吧关系搞坏。我把杜重远的这个想法告诉了盛世才，盛世才不同意让他走。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在新疆久留。我想，既然我把机械设备带来了，就得很快安装起来。我告诉我招聘来的技术人员，尽快把技术教给当地的工人，以便脱身东返。

1940年初，蒋介石给盛世才打电报，说要召开国民大会，请盛世才派人出席。盛世才不了解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的意图，便决

定派我先去摸一摸底。我同毛泽民商量去好还是不去好。毛泽民说,你要能走,就赶快走。走一个好一个。于是我于1940年春离开迪化回到了重庆。由我招聘去新疆的技术人员后来也陆续返回了内地。

我在离开迪化之前,还同毛泽民商量了如何营救杜重远的问题。我提出,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回国时,能否营救杜重远?我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请毛泽民代为转交。1940年春周恩来回到重庆后把我叫去,说我的信他收到了。他考虑再三,认为对杜重远这位好朋友还是应该帮助。在盛世才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曾向盛世才提出,让杜重远同他一道乘飞机回重庆。盛世才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样吧!等下一班飞机就让他走。我听了很高兴,说:你真是救了杜重远!给了杜重远最大的帮助!周恩来当即批评我说:你这个人现在还那么幼稚!盛世才如果想放杜重远走,马上就会同意让他跟我走。不让他跟我走,就是不放他走。我真佩服周恩来的分析。1943年盛世才下毒手把杜重远杀害了。

(选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

周东郊^①口述

我是1935年初应盛世才邀请到新疆的,曾任《天山日报》社(后改《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在军官学校授课;1936年转任阿山专区教育局长、《新疆日报》阿山分社社长兼行政公署外交科长;1938年初被捕,1945年夏出狱。在这十年中,我与盛世才和掌管处理新、苏关系的当事人多有接触,尤其是出狱后在警务处工作近一年,因任文书股长、副科长,直接掌管档案保管和整理,又阅到一些有关的重要资料。本文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和见闻写成的。

苏联红军对盛世才政权的支援

1933年冬,经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新编第八师师长张培元(兼伊犁屯垦使)率兵进攻迪化。苏联红军在张培元离伊宁不久,由霍尔果斯入境,攻据惠远等城。张本人闻讯自杀,一部分残部逃南疆。盛世才政府派黑龙江救国军将领刘斌等接收伊犁,红军退出。

1934年1月,经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围攻迪化,盛政权被困处迪化城内将及一月。在形势危殆时,得到苏联红军自塔城来援,马仲英解围南去。红军与盛政府部队跟踪进击。7月间,马仲英携少数幕僚去苏联,所部由马虎山率领割

* 题目为编者所加。

① 口述人曾任《新疆日报》社社长、阿山专区教育局长、《新疆日报》阿山分社社长,兼阿山行政公署外交科长。

据和田。红军于同年回国。

1936年,第三十六师根据马仲英从苏联发来的指示,与盛政权达成和平协定。1937年4月,驻喀什省军第六师师长麻木提(维吾尔族)举事不克出走。马虎山以助省军平乱为名,越过皮山,下疏附,围疏勒,主力迅抵库车,省军难于应付。9月,苏联红军入境,切断马虎山军后路,马虎山逃印度,红军进入喀什、和田,翌年回国。

1938年,苏联红军第八团开入新疆,驻哈密、镇西间,后于1943年回国。

(一)苏联红军第一次入新疆的经过

1. 1935年4月,盛世才同我谈论过新、苏关系。他说,苏联是尊重中国主权并真诚援助中国革命的,“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这个口号就是苏联提出的。他又说,1933年国民党政府派外交部长罗文干来新疆,拼凑马仲英、张培元反革命武装联合,企图扼杀革命政权。当形势紧迫时,他曾向苏联提出,如果马、张得逞,新疆必走上反人民、反苏道路,英帝国主义势力将席卷天山南北,对中国和世界革命都是不利的。就此,他还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材料。苏联重视了他的意见,以“阿尔泰归化军”的名义,于1933年12月派红军一团兵力自霍尔果斯入境,瓦解了张培元的武装;1934年又派两团红军自塔城入境,解了马仲英的迪化之围,并把马部驱逐到和阗。红军在完成任任务后,均先后回国,表现了苏联的无私作风。红军入新,新疆一般人是知道的,一些反动分子乃借此造谣,国民党更不放过这个可以用来诬蔑新疆现政权和苏联的机会。新疆是个落后省份,在地方建设上,主要要依靠苏联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援助,“我们必须让国内人士明了新疆的真相和六大政策实质”。他嘱我拟一通电报,说明这个问题。同时他还说,对新疆当地的反动分子的造谣生事行为,必须揭发、铲除。我按他

的意图拟了一通 700 余字的电报,他亲自修改后,交由当时的外交办事处长陈德立。陈将电报送给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看了,于 5 月发出。原电否认苏联出兵新疆,但说明新疆执行反帝亲苏政策的必要。盛世才当时还说,新疆是个封建社会,从内地来的进步朋友们要认清环境,不要把自己表现得让人家看成是共产党。

2. 1935 年秋,财政厅长陈德立对我谈,新疆的进步政权是由苏联扶植而巩固起来的。当马仲英占据达坂城后(1933 年夏),他便领受盛督办指示,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接触。他说,苏联了解盛督办是个革命者,愿意从各方面帮助他统一并建设新疆,并表示苏联在这方面不要求任何酬答,且将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苏联政府所关心的是中国这块领土不落在帝国主义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疆人民的自由、和平和趋向繁荣。

陈德立说,1934 年张培元率部进兵乌苏时,省军虽然在绥来(今玛纳斯)前方打了胜仗,但是如果没有苏联红军从伊犁方面断了张培元的后路,张培元同马仲英两股军事势力一合,迪化是保不住的。苏联红军入伊犁来迪化,都是由他代表盛督办与苏联总领事谈妥的,盛世才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也面谈过。苏总领事表示,在此后新疆的经济、国防建设上,将根据新疆政府的意见和要求,给与无私援助。陈德立还说,盛督办在对苏关系上,曾诚恳表示,走革命的道路;他表示脱离国民党政府来新疆,正是为了革命。

陈德立说,苏联红军来伊犁,只进入伊宁、惠远、绥定,对地方没有破坏。1934 年,他曾去伊犁了解过。关于红军解迪化之围一事,红军的作战和行动,他经常从总领事馆得到消息,然后转达盛世才。这支红军是以阿尔泰归化军为名并表面上任命赵得寿作指挥的。在解迪化之围时,飞机助战,马仲英部队最初还不识利害,挨炸后才慌乱起来。红军后来追马仲英到喀什。1934 年,这支红军队伍只留少数官佐编入真正的新疆归化军里,其余都回国了。

1933 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是兹拉肯,后来调阿布列索夫接

替。据陈说,后者是他任塔什干领事时的好友,在新、苏友好关系的建立上贡献很大。陈又说,1934年,盛世才派教育厅长张馨去苏联,就是接洽有关新疆聘请苏联专家、顾问的安排问题。

3. 1936年2月底,我在塔城见到当时的行政长官赵得寿。他同我谈所谓阿尔泰归化军与马仲英部作战的经过。他说,1934年1月,从开入塔城救援迪化的红军有三个团兵力,配有坦克、飞机。但是红军最初太骄傲,在迪化西的头屯河吃了败仗,牺牲了不少人,后来凭优良武器,主要是飞机,才把马部压倒。红军追击途中,除于托克逊打了一次大仗外,几乎只是跟马仲英部走。随同红军南下的,有真正的归化军。红军撤回国时,有部分官兵留在归化军里作中下级军官。红军的给养取自当地,纪律很好,对当地居民一般避免接触。留在归化军中的红军官兵,据阿克苏区教育局长赵曾省谈,有库图佐夫、瓦西连柯、安那宁,这些人在1936年还在驻阿克苏切尔聂夫团内作军官。当时的阿克苏县长维吾尔族人阿不都拉也是随红军过来而留下的。

(二)苏联红军第二次入新疆及在南疆的活动

1. 据和田区公安局职员刘某被捕后于1940年的亲笔供述:马虎山与省方言和后,曾聘二名苏联教官训练自己的部队,翻译姓名威克托罗夫。1937年,马虎山反盛,进兵到库车。9月,苏联柯尔克孜兵2个团、俄罗斯兵1个团,配有飞机40架、坦克20辆,突入阿图什,切断马虎山军,10月攻入皮山。马虎山见大势已去,率少数人逃往印度,其部下旅长马生贵通电投降。苏军柯、俄兵团入驻喀什、和田,设总指挥所于莎车,并在喀什、和田两城设指挥所。10月10日,马生贵、陈清裕(军需处长)等高级官佐由红军邀请乘飞机玩耍,一去不返。三十六师大部分官兵均被杀,只少数官兵逃入甘肃。苏军柯、俄兵团还在这些地区组织肃反机关,在喀什,由柯、俄兵团军法助理夏克尔上校主持;在和田由总指挥康士坦丁诺

夫主持,大批捕押官吏、居民,除和田行政长郑义钧、喀什代行政长万献廷、疏附县长宋小坡等少数人被捕后解送迪化外,余者均在当地处理。1937年10月到翌年三四月,两区被捕人数总计达3000名,绝大多数被处死,一部分由喀什警备司令部、和田区公安局执行,一部分由红军自己执行。刘某在亲笔供词中还说,俄兵团回国,柯兵团大部分留在新疆,一部分被编为省军,驻疏附及巴楚;另一部分被编为和田边卡队驻新、印(度)边境与和田附近。盛世才政府任随红军入境的乌孜别克斯坦人塔什帕拉提为喀什区公安局指导员,尧乐达士为策勒县公安局长,柯尔克孜斯坦人达图什为叶城县公安局长,塔吉克斯坦人阿力扎为和田区公安局副局长。和田边卡队长毛浪诺夫亦系红军军官,大约在1939年因过分跋扈,一度被和田警备司令捕押。

2. 据和田区公安局局长惠树德谈,1937至1938年间,红军指挥官经常交给他应捕人犯名单,入夜抓来,进行拷问。前后捕人近千名,大部分均被秘密处死,人犯财产全部没收。惠树德本人后来被盛世才政府捕押,以滥杀无辜被判处死刑,不知为何竟未执行。盛世才离新后,惠树德被释出,后大约在陕北老家中。

3. 据被盛世才政府判处死刑的前代喀什警备司令蒋有芬的亲笔供称:1937至1938年间在南疆进行大规模镇压,主要是肃清各形各色的反革命余孽。他说,苏军柯、俄兵团负责人与当地公安部门领导人说,南疆在1934年击溃反动武装后,未进行肃反,所以麻木提、马虎山举事后,立刻得到潜伏各地的反动分子响应,几乎陷全省于糜烂。这一次若不彻底肃清,还将遗患未来。当时捕人很多,自不能一一详审,他也无力干预,但是当时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六大政策政权。至于消灭马虎山部,那是出于友军(苏军)的主张。蒋有芬出身东北军,于1944年盛世才离新疆前被杀于狱中。

4. 据前述的宋小坡谈,他1937年10月在喀什被捕后,即由

苏联人审讯。只是因为他熬过各种肉刑,没有自证为帝国主义间谍,才被解往迪化,其他许多公务员都被杀掉了。如随东北军人新的喀什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王如心,新疆学院毕业生、喀什地方法院推事徐鸿猷等人都被处死了。

(三)苏联红军第八团撤离新疆时盛世才的戒备

1938年苏联红军第八团开驻哈密、镇西间。1942年冬,团长乌贤克率一部分回国,1943年春全部离新。据新疆督办公署战车大队大队长关世杰谈,红军撤离时,盛世才在哈迪、迪伊、迪塔公路上均作了军事布置,监视红军行动,随时电告他,并命令有关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盛世才的住宅地下室里有十几部直通各部队和警察机关的电话,他不时与部队长联系、指挥部队行动。1943年春红军经过迪化时,他每夜均由督署东门潜出,横越东箭道女子学院西便门,在那里过夜。女子学院的东院有给他特设的房间,装有七八台直线电话,房上房下都设有步哨,戒备森严。

关于红八团驻新时的动态,在警务处我未发现有关卷宗。唯据盛世才时期管理部分情报档案的张某说,在红八团中有派去的特工,大都是做杂役、厨工的。他们也只能反映一些表面情况,这些人有的后来被公安机关捕押了。

关于红军驻哈密的事,西方国家的报刊,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每日先驱报》、《每日邮报》在1939年九十月间均有报道。苏联塔斯社于同年10月曾就此辟谣。国民党中央社也在同月6日发表声明,谓此项报道纯属谣传。这些经过在当时报刊上均能找到,这里仅提出一个线索。

盛世才与苏联在情报、保安工作方面的暗斗

1934年,盛世才设置了督署侦探队,同年秋在苏联人员直接参加下成立了新疆全省政治监察管理局,后更名新疆全省保安总

局,1936年又更名为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1937年,盛世才派他的副官处长接任该处处长,赶走了由苏联派来的人员。这个机关一直是做情报、肃反工作的。

1936年,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成立了边务处,由苏联边务局派来中、苏人员主持,专做新疆境外情报工作。盛世才名义上任处长,但一切权力均操在苏方人员手里,盛本人对事务无权左右,遂千方百计地与苏方进行明争暗斗,直到挤走苏方派来的该处副处长,捕押杀害该处工作人员,盛世才便直接控制了边务处。盛世才公开反苏后,边务处撤销。

盛世才自1937年起,屡兴大狱,几乎每次都将新疆的苏联公民卷在里面。苏联对盛世才也从未放松侦查,彼此明争暗斗,一直到盛世才政权垮台。

(一)保安机关的各方面情况

1934年秋,新疆成立了新疆全省政治监察管理局。据陈德立说,这是由苏联建议而成立的肃反机关,名称也是苏方提出的。机关初建立时,局长由新疆军校一期毕业生王玉书担任,副局长和秘书长都是苏联派来的,即俄罗斯人巴图宁、中国人王立祥。王立祥原名曾又福,上海店员出身,大革命时期留苏,曾在外蒙做过肃反工作。机关后来更名为保安局,又更名公安管理处,工作内容并未改变。王玉书担任局长不久即他调,改由盛世才自兼,并增加一名副局长,即张义吾。张义吾后来代行局长职务。

综合我掌握的资料,这个机关成立的最初两年,在人事方面,其领导人员主要是从苏联派来的,除上述巴图宁(1934年底回国)、王立祥(1935年底返苏)二人外,1935年又派来中国人刘贤臣任副局长。局里的骨干是大革命时期留苏,1929年因莫斯科东方大学发生反对派案被流放,后来又潜入新疆的原中共党员。这些人大半任科级干部,如熊效远、胡鹏举、卞方明、钱绮天等,代局长

张义吾也是如此(他是莫斯科炮校出身)。该局初建时,盛世才的部分亲信也被吸收来作科长,如程东白、郎道衡、王延龄、王宜之。其中除王宜之因担任总务科长留局较久,王延龄 1935 年初调转伊犁后仍兼任伊犁保安局长外,担任情报工作的是程、郎二人,1935 年初即离局,以后再未任用与盛世才关系较近的人员。此外,1935 年初,王立祥从宪警学校抽调了一批学员(大部分是东北军出身的青年)入局任科员,并组织训练班,给他们以政治、业务教育。我当时曾任该班国际时事讲师,王立祥给他们上业务课。这部分青年,以及 1935 年宪警学校结束时的大部分学员都成了该局的基干。当时对干部所做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要他们明了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苏联和中国的进步力量当时还不能公开说出中国共产党),推广六大政策,仇恨并打击人民的敌人。但是教育并未生效,盛世才直接掌握公安部门后,这些人里的绝大部分是跟着盛世才走的,一直跟着他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工作方面,该机关成立之初,着重侦查在新疆的国民党派来的高级官吏、欧洲各国教会派来的传教士、邮政界以及白俄的活动,还侦审了马仲英等人的背景。1934 年秋,以盛世才邀来的曾留学美国的苏上达为追究对象,侦查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并逮捕了他。在苏上达的追究卷里,我看到了一些有关他与盛世才关系的密报。此外,对东北军将校军官的追究也是当时的一个重点。1945 年,我从浩瀚的 1937 年的旧卷中阅到不少与盛世才关系较密的人的追究卷,最突出的是盛世才的亲属彭吉元的专卷。彭吉元是朝阳大学毕业生,到新疆后在司法界工作,思想反动。他的每日言行都有人密报。原来这个机关对当时军、政、商、民中的较多人物都立有专卷,并制有人名代称,卷中所存文件多系密侦报告原件。另外还有事件专卷,如 1935 年邓文仪在新疆活动专卷、苏联出卖中东路事件专卷等,后者是各界对这一事件的言论报告,也都是密侦原件和几份综合报告。还看到它的分支机构寄来的旬报、月报以及

它直接派出的密侦的报告。据该局情报科科长胡鹏举 1940 年对我谈,上述材料定期分类整理,摘要呈报盛世才,而有些是不对盛世才交代的。每一时期的总的动态还译成俄文,由王立祥转给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甘宁,而甘宁就是负责情报工作的。1935 年以来,该机关在各地陆续设立分支机构后,即以各该地的军政首长、富商、宗教界及少数民族头目、外侨、白俄等为追究对象。有的区、县局,把所有的公教人员都列为追究对象,人人有专卷,如阿山区的承化、哈巴河、吉木乃等县。这是我当年亲眼看到的。在保安局时期,喀什、伊犁分局都有苏联人帮助进行这项工作。设有苏联领馆的地方,保安(公安)局长经常与苏联领事联系,遇有重要事件,大都征询领事意见。1936 年我在阿山时,区公安局长曹天寿便是如此。在处理重要事务的有关机关会议上,遇到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他往往公开说,这是苏联领事的意见,与会者也就没得说了。至于由追究而逮捕,除地位较高的公教人员须由上级批准外,对一般人保安(公安)机关是可以随意捕讯的,只是他们捕押的人大都是属于政治性的,一般司法案虽也经管,但初步侦查后就把人犯送交法院了。

在组织机构方面,政治监察管理局时期,设有秘书处、政治、国际、军事、司法、经济、总务等科。更名保安局后,先后在哈密、伊犁、塔城、喀什、吐鲁番、阿克苏、巴楚等要冲地方设立分局。1936 年更名为公安管理处后,陆续在全疆各区、县设立了区、县公安局,并在冲要地设立了派出所。在公安管理处时期,处的机构中增设了督察室、办公厅,把原来的保安武装更名为特务队、公安队。全处有 5 个科,以第二科为中心,下分 6 个股,进行情报侦审工作。1936 年,全处官 260 人,警 292 人;全疆公安机关官 992 人,警 2323 人。

(二)盛世才直接掌握保安机关的经过

1. 1937年初,盛世才派督署副官处长赵剑峰接收了公安管理处。

1948年,赵剑峰对我说,那一天,盛世才传见他,交给他准备好的命令,任命他作公安管理处处长,要他立即前往接事,并问:“你敢去么?有没有把握?你想用什么方式去接管?”随着指示他怎样接管。他立即带了一些人到公安管理处去,宣布了盛世才的命令,嘱咐工作人员照常执行业务,把公文、案卷加封,当天便接收了全局工作。赵剑峰说,从此时起,公安工作便由盛世才直接掌握了,都用了他认为单纯可靠的人,只少数民族中尚留有由苏联派来或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人。

2. 据胡鹏举1940年谈,盛世才一直讨厌这个机关。1935年,盛世才以王立祥与各机关首长关系不良及身份暴露,请准苏联把他调回去了^①。1936年起又把他们这批人(即曾留学苏联的原中共党员),以政治关系不明调离该机关,最后以迅速手段夺取了肃反机关的领导权。当时卞方明感到情况不对,拟逃往陕北,找中共关系汇报新疆情况,但一出迪化市就被捕了。

赵剑峰接任后,原处长张义吾、副处长刘贤臣去苏联,后来都被盛世才通过苏联给他们扣上了托派帽子。1943年据罗遗甫(曾任塔城区公安局长)谈,张义吾入苏联后即被捕押,不久他妻陈玉霜(盛世才妻邱毓芳的义女)回国,过塔城时曾住在区公安局内。当时管理处曾密令罗遗甫监视并汇报陈玉霜的言行。又据胡鹏举谈,陈玉霜在迪化后失踪,有人说她逃往外蒙,她可能还继续给苏

^① 王立祥在外蒙工作时姓张,许多中国商人都认识他,他在迪化出现,消息传到南京。1934年冬。南京政府就此事向新疆当局查讯,盛世才当时答以王立祥系黑龙江救国军将领刘斌推荐的,在新疆从事一般工作云云。

联做情报工作。

(三)边务处的对外工作组织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成立于1936年,是直接由莫斯科边务局派人来组织的。名义上由盛世才自兼处长,实际上由苏联教官和副处长陈培元主持。

边务处是专做新疆对外情报工作的。1945年我在警务处第四监狱档案库里发现一个境外工作机构人员表。现录出如下:

1. 兰州第一组

职 别	姓 名	驻 地	派遣年月
专 员	袁楚西	兰 州	1940年4月
副专员	秦毓麟	兰 州	不详
组 员	武志忠	宁 夏	1939年7月
组 员	张威仪	兰 州	1939年7月
电务员	王明刚	兰 州	不详
组 员	赵寿仁	武 威	1940年4月

2. 兰州第二组

职 别	姓 名	驻 地	派遣年月
副专员	高炳斗	兰 州	1939年6月
组 员	马经新	西 宁	1939年7月
组 员	李灼英	西 宁	1940年12月
会 计	朱升元	兰 州	1939年6月
庶 务	王福田	兰 州	1939年7月
司 机	博国行	兰 州	1939年7月

3. 肃州组

职 别	姓 名	驻 地	派遣年月
专 员	林 德	酒 泉	1938年12月
副 专 员	曾效鲁 ^①	酒 泉	1937年7月
电台台长	武守礼	酒 泉	1940年7月
电 务 员	高成兴	酒 泉	1940年7月
电台台长	李九麟	酒 泉	1941年4月

4. 独立组

职 别	姓 名	驻 地	派遣年月
组 员	王原承	酒 泉	1941年5月
组 员	茹风楼	兰 州	1941年5月
组 员	张耀年	西 宁	1941年5月
组 员	张秉武	宁 夏	1941年5月

5. 二里子河组

职 别	姓 名	驻 地	派遣年月
主 任	郎文楨	二里子河	1941年4月
秘 书	喀勒曾达士	二里子河	1941年4月
电台台长	王积成	二里子河	1940年3月
电 务 员	曾兰芳	二里子河	1941年4月

在这些人员中,少数是新疆军校第二期优秀学员,其余有的是由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聘用的,如袁楚西,有的不详。陈培生是东

① 曾效鲁是新疆军事深造班学员,被派酒泉工作六年,运输电信器材四次,与迪化边务处电台联络三十余次,1943年返新。

北人,1936年由苏联来新。另外武佐军、王兴典(均军校二期生)前后作过副处长。苏联教官有二人,少将级的一般称之为总教官。

(四)盛世才同边务处的暗斗

1. 盛世才对边务处的办法,首先是打击其首脑陈培生。我从警务处第四监狱档案库中发现孟宪章的案卷。孟宪章是陈的学生,1939年被捕,押在督署特别监狱。盛世才的公安人员秉承盛的旨意,用毒刑迫使孟宪章诬供:他被陈培生吸收作间谍,窃取新疆各种秘密,并发展其他密侦,而这个间谍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及托匪的指挥下,进行颠覆新疆的亲苏政权的。孟宪章还开了一个这个间谍组织成员的名单,牵涉面极广。当时陈培生还在副处长任上,对此毫无所知。1941年,盛世才认为时机业已成熟,于4月2日致函莫斯科边务局长(由边务处马总教官转)。函内说明陈培生、孟宪章、武佐军的活动与孟、武二人的口供,最后一段的原文如下:

查陈培生现在急于请假,要回重庆,探视父母。但是既有以上破坏政府的行动及矛盾事实,同时边务处又系对外秘密工作机关,以我的意见,可调回莫斯科考查。至所遗边务处副处长一缺,请由莫斯科另派员接替。

这封信是盛世才的亲笔稿,用兰墨水横写在大型蓝格洋纸上,是我在第四监狱档案库里发现的。1946年警务处结束时,这份材料连同其他重要材料一并移交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视察处了。

我还发现盛世才“御用”密侦从兰州寄给他的有关陈培生的报告,发出日期为1941年10月某日。报告内说,陈培生与其妻张露思于该年9月先后抵兰州。陈妻住西北实业社周甫之家,陈培生住真记旅馆,过三四个月,均移入阜记商行(边务处驻兰州第一组的掩护商店),曾邀副专员高炳斗秘谈,谓将组织另一特务机关,请高加入云云。我怀疑这个报告就是高炳斗写的。

2. 在第四监狱的档案库里,我还发现一些省外情报卷,其中一部分就是涉及边务处派出的人员,同时又给盛世才做报告的,但内容多系工作人员的行动、生活、彼此关系。从这里了解到盛世才对边务处掌握的情报员是十分注意的。卷里还存有部分情报人员的往来家信,如高炳斗、王德芳夫妇的往来家信,其中有的尚未剪开。因事隔多年,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

被派往甘、宁、青去的情报员,一般在被调回新疆时,一入哈密便被公安机关捕押,密解入省城,从此与外界完全隔离。据我所知,高炳斗、郎文楨、李灼英的遭遇都是如此。1942年,郎、李二人还被秘密杀害于第二监狱。

3. 从1937年起,边务处直辖的一营军队入驻哈密,营长杜家田。它的任务是严密守护新疆的东路交通关卡。杜家田也同时给盛世才做情报工作。那时边务处在哈密的负责人为王学典。中国共产党人员住哈密入新、出新或去苏联,其行动除公安部门有报告外,杜家田也有报告。杜家田后来也被盛世才捕杀了。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后,边务处即撤销。

盛世才在制造“阴谋暴动案”中对苏联公民的攻击 和苏方对盛世才及其左右的侦查

盛世才在历次所谓“阴谋暴动案”中,均把苏联在新疆的要员牵拉在里面,并向莫斯科呈控,同时还利用自己的情报机关,侦查逮捕与苏联关系较密的中国人,以削弱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具体情况,将于各个事件中交代。

(一)1937年大狱

1. 1937年9月起,盛世才把省政府中的委员及各地军政首长、巨商等几乎全部捕押起来,其中包括1935年由苏联派来的一部分汉族干部。盛世才为表示对苏联的信赖,请由苏联派人来新

疆参加审讯。当时我也是由苏联的审讯员提审的，他们会汉语，但审讯笔录都用俄文记录。每审录完，则用汉语口译，征询受审者的意见，受审者如同意，即在笔录上签名或画手押。他们不用刑，问的问题因人而异，我被审的主要内容是过去的履历和同盛世才的关系。审问我的人，人们称他作西先生，年约40岁。1944年我因参加整理案卷，阅到我的卷宗，其中已无俄文笔录。

1940年，胡鹏举对我说，他受过中、苏两国审讯员审讯。审讯员曾讯问他同苏联总领事馆人员的关系，牵涉到他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的关系。当年他在苏联从流放地归来，在莫斯科与拉底克有一次会晤，还追问拉底克交给了他什么使命，他又怎样携这个使命逃出苏联，潜入新疆的；在新疆怎样由熊效远介绍参加了保安工作，在工作中打击了哪些人。他受过刑，但没有什么自证口供。因为盛世才在宣布这个案子的情节时，曾说它带有国际背景。胡怀疑会把他们过去的反对派案与此案情联系上。另一个由苏联逃入新疆的当年在反对派案中被扣以国际间谍帽子的庞振东（原名方效元），在1938年也谈过类似的情况。这个人胆子小，只说出一个概况，并云案情复杂，没法搞清。据一些人传说，盛世才向苏联最高当局控告了阿布列索夫，说他是托派，在新疆进行阴谋活动。阿布列索夫的确于1938年被调回苏联。据传已被处死。

2. 当年被捕的由苏联派来的中国人有王寿成（俞秀松）、万献廷（张一凡）、郑义钧及其妻赵教蓉、吴德铭等。这些人1935年到新疆时，盛世才曾个别找我说这些人都是联共党员，来新疆帮助建设。其中万献廷已决定派到报社工作，嘱我同他们要搞好团结，在工作上尊重他们的意见。盛世才还促成自己的二妹世同与王寿成结婚。但1937年捕押了他们，送回苏联。又据传说，王寿成在苏联被杀害了。

(二)1940 年大狱

1. 1940 年案,据盛世才向外宣布这是以杜重远为首的受汉奸与托匪策动、组织的,带国际性的阴谋暴动案。其中牵涉了不少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人,公安管理处副处长、维吾尔族人库尔班·尼牙孜便是一个。这个人是第六师师长麻木提的部下,大约在 1934 年由政府派往苏联留学。1939 年,盛世才政府在吐鲁番逮捕了库尔班·尼牙孜过去的部下士兵阿白都拉,用各种毒刑使阿承认是奉库尔班指派到南疆各地收集曾参加 1931 至 1937 年历次暴动的人,建立阴谋组织,伺机推翻盛世才政权。1940 年,库尔班·尼牙孜被捕了,他受过重刑,写了一本亲笔供述,单是译成汉文的就有六七万字。1945 年,我曾读到过这个供述。库尔班·尼牙孜在亲笔供中说,他在塔什干留学时,被一个上将级苏联军官吸收作间谍。回国时,这个将军嘱他与苏联驻迪化总领馆职员阿布都·热合满密切联系。他回国后年余,在迪化遇见了 1937 年案的苏联人审讯员音果洛夫,经音介绍与阿布都·热合满会面。阿布都嘱他吸收青年,宣传教育他们亲苏,经常提供情报,使苏联不再援助盛世才政府,而帮助他们组织建立像乌孜别克斯坦那样的共和国。在迪化的苏联人,如驻迪化代理总领事欧杰阳克、顾问巴宁都曾参与这个活动。他本人会见过欧杰阳克、齐合云斯克。阿布都·热合满还指示过他,如果事泄,他被盛世才政府逮捕,不要说出同阿布都·热合满等人的关系,可以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走狗,苏方一定能救他出狱……库尔班在供述中,还说他与英帝国主义有关,他在南疆时就同驻喀什的英国领馆人员有往来,给他们提供过情报。

盛世才政府还逮捕了维吾尔族人库尔班·色衣多夫(时任财政厅副厅长)。他也供述与欧杰阳克见过面,并策划在新疆建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当然,这也是在毒刑拷问下供述的。上述这两个人,前者被毒死,后者被缢杀在第二监狱里。亲手给前者毒药喝

的第二监狱长王兆祥,后来也被盛政府加以贪污罪名枪杀了。

盛世才根据这些口供于1940年6月19日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一)审讯新疆阴谋暴动案件维吾尔阴谋组织各首要犯人的口供过程中,曾发现了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欧杰阳克是帮助英帝国主义领导新疆阴谋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及领导者。

(二)我是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者,我曾经把审讯出来的关于欧杰阳克代理总领事是新疆阴谋暴动案件的主要组织者及领导者的材料不只是已详加阅看,以为极确实、毫无虚伪的材料。而且在我亲自审讯维吾尔族各要犯的口供过程中,也认为是极确实的材料,决无冤屈欧杰阳克的地方。因为欧杰阳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信仰者,我也是马、列、斯主义的信仰者,如果在各方面不充分证明了欧杰阳克是新疆阴谋暴动案件的首要组织者及领导者的时候,我绝对不敢向你们报告。

(三)关于欧杰阳克及音果洛夫并阿布都·热合满、齐合云斯克等的重要材料,均在留莫斯科陆军大学学生盛世骥手中,请由伏罗希洛夫元帅或莫洛托夫委员长迅速面见盛世骥,即能由盛世骥将材料交付你们。谨此致祝

你们身体健康!

新疆边防督办兼主席盛世才

1940年6月19日

2. 在这以前,大约在1940年6月初,莫斯科方面为了弄清真相,曾派来葛内金、恰克雷金两人为助审员。

他们住在天主堂(已由盛政府没收,作为审讯机关),对部分有关人员(约29名)进行了复审。在复审中,人犯都反了供,因为除了人犯口供,没有其他佐证,葛内金等认为案情不能成立。他们做出了书面结论,说这是盛世才的保安干部(指公安管理处长李英奇

等)为了邀功,及与被诬人平素有磨擦,乃包围盛世才,致贤者陷狱,佞者自得。这个结论的中文译件,我也在上述档案库中阅到,是打印本。

盛世才命令李英奇、富宝廉等重审反供的人犯。这些人犯熬不了毒刑,有的写出了悔过书,说他们所以反供是由于葛内金的诱导。这样,盛世才邀请葛内金与他会审,大约费了几晚上的工夫,提审反供的人犯。前述的阿白都拉当时正同我住在第二分监里,同号的还有任兆泰等。阿白都拉一天傍晚被提出去,他深夜回来,悄悄地说他见到督办了。他说,先是一个中国法官向他交代了督办要亲自提问他,如果他认真诚恳,说不定问完就会释放他。至于他前次反供,政府会原谅他,并嘱他不要害怕。他原来在外国法官前也反了供,以后被中国法官提去毒打了一顿。

他说,那天夜里,他被送入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受审,上面坐着督办和两个外国法官、两个中国法官,他同中国法官的问答都由翻译译成俄语。他没有反供。大约在此后三个月,阿白都拉被提出去。过了许久,才由监狱员把他的行李取走,大概已被害了。

会审之后,盛世才又亲笔起草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电报。电文如下:

(一)我曾在六月十八日去电两封,十九日去电一封,二十日去电一封,想你们均已收到。

(二)在六月初由你们派来两个帮助新疆审判阴谋暴动案件的审判员,一个叫葛内金,一个叫恰克雷金,此外还有一个塔塔尔民族的译话人员。自从他们三人到迪化以来,我对于他们不只是极表欢迎,而且是用极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原来我很热烈的希望他们对于在英、日帝国主义及托洛茨基残余分子等策动指挥下的带国际性的新疆阴谋暴动案件,比前更加深刻的审讯,以便根本肃清英、日帝国主义走狗,及托洛茨基匪帮在新疆的阴谋以巩固中国抗战后方和新疆六大政策

政权。但是不料想他们所做的工作，与希望恰恰的相反了。现在根据葛内金及恰克雷金已续审讯过的二十个维吾尔族犯人的过程中的具体事实，不只确实发觉了他们不是希望加深审讯，而且确实证明了他们是有计划的故意用不正确的言词及恐吓犯人的言语，企图引诱犯人反供（即是引诱犯人否认已往的阴谋暴动事实）。

（三）关于葛内金及恰克雷金两审判员故意用不正确及恐吓的言语，企图引诱维吾尔族犯人否认自己参加阴谋暴动的事实材料，在一二日即行详细电告。因为以上事件关系重大，特先电告。谨此恭祝

你们身体健康！

新疆边防督办兼主席盛世才

1940年6月24日

不久莫斯科调回了它派来的审讯员，至于如何答复盛世才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欧杰阳克当然也被调走了。

盛世才借1940年大狱，捕押了数以千百计的他认为亲苏、亲共的人，并逐走苏联驻迪化的代理总领事。

（三）1942年大狱

盛世才在准备公开反苏反共前，于1942年3月19日谋杀了他的四弟盛世骥（时任机械化旅旅长），以此为借口又兴大狱，制造了以财政厅长臧谷峰为首的“阴谋暴动案”。被卷入这个案子里的土产公司副经理萧作鑫，在毒刑拷问下供认，他被督署军事总顾问苏联人拉托夫拉拢，加入了由拉托夫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古宁等组织策动的反苏反政府阴谋团体，并在拉托夫的指示下，利用盛世骥妻陈秀英与汽车司机朱某通奸的关系，诱奸了陈，并使陈与拉托夫发生了肉体关系。同时土产公司经理马郊也在拉托夫的指使下，诱奸了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之妾姚执中。他们借此关系刺探

政府机密,阴谋刺杀政府要员。这个组织吸收有各族各界 500 余人,以财政厅长臧谷峰为首,准备于 1942 年 4 月 12 日在迪化暴动。但因事机被政府探知,拉托夫即令萧作鑫恫吓陈秀英,使陈刺杀了盛世骥,并决定在办盛世骥的丧事中刺杀盛世才,夺取政权。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以下好多军官都参与了这个阴谋。陈秀英、姚执中等被捕后,在毒刑下也都依萧作鑫供述的轮廓写了亲笔供,详细地描述了她们与萧等通奸情况及政治阴谋事实,其中还牵连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党员。盛世才据此亲笔草拟报告,呈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这份资料我也是在第四监狱库中发现,我的抄件在 1948 年丢失了。除了主要内容,我还清楚地记得,盛世才在他的原稿中于“同拉托夫发生了肉体关系”的这句话中,用红笔在肉体后面加了“性交”两字。全案的笔录均译成了俄文,打印成 40 余册(每册厚薄不同),寄给苏联最高当局。

盛世才在这个报告里,阐述了拉托夫等是反苏维埃分子,在新疆拉拢并组织反革命分子,意图推翻亲苏的六大政策政权,建立依附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他吁请苏联当局派人来新彻底清查。也就在这一年,盛世才公开地走上了反革命道路。

(四)关于阿山事件

1. 从警务处的档案中发现有所谓“毛列夫案”。1938 年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照会盛世才政府,说有红军毛列夫逃入阿山境内,请协助缉捕。公安管理处即电令阿山区公安局查缉,阿山许多牧民因此被捕。影响所及,1940 年 2 月以哈萨克族人阿合特开为首掀起了暴动,同年秋才平息。盛世才政府从迪化狱中释出了贝子布哈代,委为阿山区行政长。盛世才担心布哈代受苏联驻承化领事摆弄,派了一个通晓维吾尔语的特务李鸿运作布哈代的机要秘书,交给李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布哈代与苏联领馆的关系。为了掩人耳目,盛世才政府在阿山开了一个商店,名永盛合,在迪化开

了一个商店，名公兴号。李鸿运同公安管理处便以这两个商店的名义，密电来往。1945年，警务处档案库中还保存着这部手卷，卷内各页，都是该处特定的抄电纸（白洋纸、红横格），上面的记载，大部分是布哈代的言行，他与各方往来关系和阿山当地的政治动态。布哈代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他每次见到苏联领事、副领事后，把他们的谈话内容都口述给李鸿运，李则据以电报盛世才。因事隔多年，其内容已记不起来了。

2. 1941年5月，由苏联专家组成的矿业地质考查团进入迪化。6月6日，该团团长沙年科(?)及工作人员在当地政府人员和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库孜明陪同下，一行五六十人，乘汽车二十余辆进入柯克托海。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东山哈萨克族人的惊惧。不久，以哈列里台吉及其子热海提为首组织了暴动，提出了反对侵占破损他们的牧地，反对盛世才政府不停止捕人的口号。7月初，盛世才政府组织了镇(西)、阿(山)军区总指挥部，派蒋有芬为总指挥进剿，苏联教官也参加了进军。但战火没有被扑灭，一直到该年初冬暴动者才投降。暴动首脑被送到迪化，说是受训，实际被投入监狱，后来都被杀害了。

3. 盛世才在阿山暴动中曾玩弄两面手法。当1941年阿山暴动时，盛世才从狱中释放出几个阿山哈萨克族人，派他们作代表去柯克托海劝说热海提等，并要他们在出发前到狱中见被押中的前阿山行政长沙里福汗。沙里福汗对这几个人讲，他同意热海提等人的行动，要他们转达热海提，好好地干，不能把阿山让给外国人，不能让哈萨克族子孙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当时与沙里福汗同号负监视之责的是黄作新(东北军出身，1937年被押)。沙里福汗回号，把此意告诉了黄，意思是暗示黄将此事密告监狱当局(沙知黄在监视他)。按沙里福汗的为人胆小怕事，而且从来表示亲苏，如果没有当局示意，他是不会对代表讲那类话的。黄作新后来同我在第二分监同号。他说，沙里福汗对他讲完那假情况后，自言自

语：“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是找死么？可是又不能不这样说呀！”

另外一件事，1948年，我在兰州曾找邱宗浚的儿子邱毓熊，请他提供一些有关柯克托海暴动的资料。后来又一次遇到邱毓熊，他说，当时他父亲被派往阿山与叛变者洽商和平。行前，盛世才曾面示他父亲：“我们不能因为外国人的事，弄得本省不安，叛乱分子的主要要求既然是取消矿业考查团进入阿山工作，我们可以接受。政府可以用弥平地方叛乱的理由，婉言辞退专家。这一点十分重要。”按邱宗浚当年确实答应了热海提，取消了矿业考查团。邱宗浚在阿山，气势凌人，概不听苏联人的意见。

由苏联专家组成的矿业地质考查团，是1944年盛世才政府与苏联约定聘入新疆的。据1935年7月17日伊犁屯垦使署呈盛世才电，聘自苏联的探矿等专家共75人，分别由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入境。7月14日，由霍尔果斯入境的有阿瓦见贝等11人，分组往特克斯、果子沟、三台工作。当时入阿山的专家，曾到东山一带旅行，因人数不多，且未作实地勘探，未引起牧民骚动。1940年后，此类专家入新者较多，据公安管理处档案内载，该年仅由伊犁入境的就有300余人。我在阿山时，只见到金矿总顾问和专家，在阿山金矿局里工作。总顾问直属农矿厅，每年在阿山工作一个时期，他与该局总办周万青在开采方式方法上矛盾颇大。周万青是吉林抗日军出身的军官，原来是民团中的头目。他几次说，督办指示他要按照“对当前有利”的原则办事，不可为人左右。周万青也就一意孤行，用土法开采。当时对开矿的一切物资供应(包括粮食)全部由苏联提供，金矿局以之贷给私人采矿者，到秋末按价折收金砂(加利息)，缴归政府。苏联供应的物资则算入苏联对盛世才政府的金卢布贷款里。总顾问与周万青意见愈来愈大，后来回国去了。周万青是盛世才的直线密侦，专伺阿山居民、干部与苏联的关系。

4. 阿山第二次暴动平息后,布哈代等人被投入迪化第二监狱,盛世才囑令审讯人员,以毒刑逼使布哈代等攀拉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说这次暴动是他组织的。盛世才为了取信于苏联,1941年曾指派1935年苏联派到新疆的王宝乾参与该案的审判。王宝乾那时任《新疆日报》社长兼外交办事处处长。王认为这是对苏联公民的诬蔑,拒绝在总结书上签字,并签呈盛世才,谓单凭刑讯所得口供,矛盾百出,他不能同意。这些文件,1945年我在前述的档案库里阅过。

盛世才早已对王宝乾下了工夫。他早些时逮捕了王任喀什行政长时的部下张世安。1941年冬,盛世才即据张世安及其他人的口供,致电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提摩申克。原电文如下:

查王宝乾自一九三五年自苏联来到新疆,因为他是联共党员的关系,所以新疆政府格外信任和重用他,曾委他充任新疆外交办事处处长、《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等要职。

在本年春,新疆审讯阴谋案犯卢毓麟的过程中,曾发现了与王宝乾有关的资料……根据以上事实材料,王宝乾不仅利用与张世安长官部属关系,将张介绍加入陈培生的反动组织,同时并与一些反动分子如卢毓麟等秘密活动,企图推翻现政府,树立反革命政权,以期达到他们破坏新疆的目的。因此我希望你们:一、希望你许我在新疆将他逮捕,因为他在新疆联系很大,审讯他一定能追出好多的反革命分子来;二、如果你们不许可在新疆逮捕的时候,可以将他调回苏联,按照以上材料,予以处理,不胜待命之至……

这个电报也是盛世才亲自草拟的。

至于盛世才诬蔑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一事的内容,我未阅得原材料。

(五)苏联方面对盛世才及其左右的侦查

1. 1936年初,盛世才逮捕了省银行行长宫振翰,罪状是不服从命令,而实际是因为宫振翰入新疆后便给苏联做情报工作。

宫振翰是山东人,俄语讲得蛮流利。他在黑龙江边卡上工作时,便给苏联远东军做情报。九一八事变后一年随东北军来新疆,仍继续为苏联工作。在张培元部被红军撵走后,他便由盛世才政府任为伊犁区行政长,入伊宁办理接收;马仲英被逐出南疆,他又被任为喀什区行政长。宫振翰为人聪明而好表现,当时他认为有苏联作靠山,目中便无盛世才了。1935年他被调任省银行行长后,盛世才已派人(财监会委员长李薄霖)侦查他,他仍未觉,不时出入苏联领馆,且以此自炫。1936年春节,宫振翰去给盛世才拜年,盛世才不在,他留了一个字条。刚好我去盛世才处,盛正拿着这个字条,口里说:“岂有此理。”不久,盛世才就把他押起来。1938年我住第二监狱时与他住隔号,我们用俄文字母在墙上打电报。他说,他的案情是日本帝国主义间谍,而实际上他多年来是给苏联做情报工作的。当时他还认为,他的被捕是出于误会,不过有时也说,也许是盛世才担心他在苏联人面前,说过对盛世才不利的话,他才被押。

2.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赵曾省,是中共党员,曾参加吉鸿昌领导的反国民党武装斗争,1934年冬去新疆,1935年开始给苏联领馆担任情报工作。当时赵曾省曾出具为共产主义誓死不二一类字样的志愿书。后来他被盛世才派往阿克苏,任区教育局长,1937年与其妻韩墨芬同时被调迪化,一入市即全家被押。这是赵本人对我讲的。

3. 当时苏联领馆吸收汉族情报工作人员大都通过保安局秘书长王立祥,凡经工作而认为合格可靠的,则由王立祥秘密把这个人带入领馆,与副总领事甘宁晤谈。领馆所需材料,由王立祥指示

给工作者，材料也由王立祥封转。这些事赵曾省、刘文选都对我谈过。另外，当年新疆派出留苏生中也有些人给苏联做情报工作。我在边务处档案库中看到的三期留苏生名单，凡名上用红笔圈画的，大概都是经盛世才的公安机关认为是被苏联拉过去的分子，因为在名单下面有说明，红圈是“敌探”，红点是“可疑分子”，而这个“敌”是公安机关打掩护，实际是指被苏联拉去的人。这些人里，就我所知，都是新疆土著，有的被捕后在狱中表现还是很进步的，如袁景云。

4. 盛世才还有一套专门侦查“脑筋复杂”分子的机构和人员。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李薄霖便专门为盛世才做这个工作，其侦查对象都是所谓积极分子、革命分子。这一套人马直接由盛世才领导，不通过公安部门。财监会委员富崇铨 1935 年便做过我的工作。1945 年我们出狱后，富崇铨对我公开讲出来，他的使命是侦查我同苏联人，尤其是同苏联派来的中国人的关系。此外，盛世才还利用官药房经理李佩珂侦查他的小同乡。这些人过去都是所谓革命者，而与李又是近友，无话不谈。盛世才便利用这种关系，要了解他的这些小同乡的活动以及与苏联人的关系。关于这类事还有一些，因大体相同，不赘述。

关于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如 500 万又 250 万金卢布借款，遣送留苏生及其他等等，因资料内容都不是十分重要的，这里不写了。

文中当事人王宝乾、陈培生，解放后均已回国，听说现在北京工作。王学典在北京外贸部工作；赵曾省在北京宣武区某夜大工作；高炳斗尚在，王学典可能知道他的下落。

（录自《我所知道的盛世才》，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

(摘录)

周东郊遗稿

盛世才的政权,苏联是曾参与的。

在经济方面:(1)新疆省的财政厅在一九三五年即有苏籍顾问米哈尔曼来参与财政工作。米哈尔曼过去曾服务于外蒙,来新后,对整理财政与税收上贡献多。在一九三五、六、七年,省库支出没有顾问的签署是不生效的。省银行也有苏籍顾问。(2)苏新贸易公司不但设于迪化,在其它各区均有分公司,它们享受了全树仁时期与苏联订立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中的一切权利,在边卡上增设临时市场,直接与商民或牧民交换货物。(3)一九三五年,新苏间五百万金卢布借款成立,这笔巨款完全变成货物,由塔城运入新疆,其中并包括军用品,如飞机等及一切建设机器器材等。(4)新疆的一切经济建设如独山子石油矿、阿山金矿、全省农牧、水利都聘用苏籍工程师与顾问,在省建设厅与农矿厅中,有金矿顾问、水利顾问……一切建设计划或由他们拟定,或经过他们审核,他们且自由地到各地视察,调查新疆的各种经济资料。(5)独山子石油矿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从事机器开凿并提炼,开采机器器材亦均由苏方供给,石油矿的开发可以说是完全在苏联援助下实现的。

在政治方面:(1)保安机构是由苏联所派人员协助而建立起来的,特工人员的训练,特工的布置是由包国宁与曾又福两人一手完成的。(2)一九三六年夏在新疆成立的边务处,其工作完全是对疆境外的侦察与刺探等,包括对印度、阿富汗及甘、宁、青等省,派遣

的人虽不太多,但所获的资料已很可观。处长最初由盛世才自兼,一九三六年冬苏方派来辽宁人陈培生代理,总教官马卡诺夫为一级富于间谍经验的俄罗斯人。(3)苏联派久滞苏联的中共党员来新,盛政府一一予以安排,其中王寿成为反帝会秘书长,万献廷(即张一克)为新疆日报社编辑长(一九三六年一月改任为该社社长兼外交署署长,一九三七年四月又改任喀什行政长),刘贤臣为保安总局副局长,栾宝廷为交通处处长,王宝乾为奇台县县长(后改任喀什行政长、一九三七年五月改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外交署署长),赵云容(女)、高秀影(女)为女子学校教员,满素尔(维族)为新疆日报社副社长,于成发为哈密区公安局长。(4)盛政府政治上重大决策和对政府高级官吏的任用,无论苏方要求与否盛世才于事前均向苏领馆报告或商酌。

在军事方面:(1)督办公署聘有苏籍人军事顾问(最初为马里克夫,后为弗定等),新省的军事训练,各部队中亦有苏籍教官。自一九三六年后,新疆的军事教育与军队训练均采用苏式。此外高级军事训练机构,如深造班,参谋班等亦由苏籍军事教官担任学术科的讲授。(2)一九三六年军事顾问视察全疆各地军队与武器配备,在此次视察中,各地所储存的火药完全被指令就地销毁。(3)一九三五年后新疆陆空军装备,均由苏联供给,这是由五百万金卢布借款下拨给的,经此准备,新疆的军事力量日见雄厚。

在文化方面:苏联在塔什干创设中亚大学,教育由盛政府派往的各族青年,每期二年结业,教授科目,除医学、兽医等专科外,以经济为主,灌输受教者以马列主义思想理论。

.....

马虎山在喀什发出反盛宣言,号召回教人民团结,于四月下旬挥兵陷巴楚,五月陷阿克苏,进围库车,一时南北疆为之震动。南疆维族过去对三十六师印象不佳,但他们无权无勇,在裹胁之下,

也只好听人摆弄,因之三十六师的声势,非常浩大。当时盛政府能调动的兵力有限,连军校学生都被动员到库车前线去。战事从四月到六月,毫无好转,驻在库车的督办行营屡被马部进逼,几乎连飞机场都摇摇欲陷。到了该年九月,忽自阿图什县边境开入柯尔克孜兵两团,俄罗斯兵一团,配有飞机四十架,坦克车二十辆,攻入巴楚,把三十六师人马截成两段。但马虎山的部队勇敢倔强,又支持了一月有余,一直到十月,柯尔克孜的一团潜入皮山,马虎山才率亲信逃往印度,围疏勒城的三十六师马生贵旅长见大势已去,通电投降,柯、俄兵团入驻喀、和两区,收拾残局。

三十六师的官兵结局非常凄惨,高级军官如前述的旅长马生贵及副师长马勋,军需处长陈清裕等人,于十月中旬经苏联飞机自和田载去,下落不明,排长以上的官佐与大部分士兵,于同月被柯、俄兵团用卡车载往鸽子塘,悉数屠杀,只有少数官兵,由嫒羌逃入敦煌,马仲英留在新疆的残部,自此消逝罄尽。南疆的战事告终。

但是南疆人民的浩劫却未因之结束。

在战乱时,库车一带的维族因“通匪”嫌疑被省军捕杀的已近千余名,迄柯、俄兵团攻占喀、和两区、于莎车设总指挥部,于喀什、和田设指挥所,自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他们除命令区公安局逮捕维民与各机关首长、公务人员外,并自行搜捕所谓反动分子。凡以前曾从夏满索尔、铁木尔、乌思满、萨比提大毛拉、麻木提、马虎山“作乱”及印度总商和平昔与英人稍有关系的各族人民,几无一幸免,尤其是维族乡长,知识分子遭遇更惨。他们被捕后,一体由柯、俄兵团禁押、审问,汉族公教人员与军人被捕押者也不在少数,如疏勒县长宋小波,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王如心,喀什地方法院推事徐鸿猷等人,此外代喀什行政长万献廷、和田行政长郑义均、副行政长于镇国,则被押解迪化(于镇国中途被处死)。在喀什主持审问的为柯、俄兵团军法顾问夏克尔团长,在和田的为总指

挥康斯坦丁诺夫。总计前后被捕押的达三、四千人，其中半数均被秘密处死，有的死于活埋，有的死于机枪，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喀、和途中的戈壁滩上尚可见这些无辜者的白骨，至于他们死前所受的酷刑，更非楮墨所能形容。

阿克苏与焉耆两区八民所遭遇的，和喀、和两区一样，只是被屠杀的数量略少而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俄罗斯兵团撤离南疆，总指挥康斯坦丁诺夫行前且从和田狱中提出“人犯”二十余名，载往洛浦，于道上处死。柯尔克孜两团，一团编为省军，驻疏附，另一团被编为和田边卡大队，驻新印边境与和田城郊。此外盛政府并委派随柯、俄兵团入新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塔什帕拉提为喀什区公安总指导员，尧乐达什为策勒县公安局长，柯尔克孜斯坦人达图克为叶城县公安局长，塔吉克斯坦人阿立扎为和田区公安局副局长，这些人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才被调离新。他们在任期间之骄纵跋扈与随意捕押人民，喀、和两区人民到今天记忆尚新，均能历历讲述。

南疆经过这一次的残暴肃清，人民已噤若寒蝉，同时英国的残余势力也再无法存在了。

盛世才在对马虎山作战的同时，开始了迪化的整肃工作。这个整肃不是偶然的，有其政治原因，也有其时间的根据。

自一九三五年后，新疆产生了几种新的势力，这些势力在盛世才看来，对他的政权都是危险的。其一是来自苏联的联共分子为中心的势力，这些联共党员在新疆的举动本来非常谨慎，他们不承认自己的身分与来路，不同人谈有关共党组织的话，甚至装扮作不懂俄语。但是一般公务人员与文化教育界人士却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不是新疆省政府，而是有雄厚背景的人物，有许多思想左倾人士和投机分子逐渐和他们接近。他们纵然未利用这个关系，作组织团体的秘密活动，可是当时在新疆他们已有左右部分人心的力量。盛世才最初以金钱、地位甚至姻戚等关系拉

拢他们。一九三六年他把自己的二妹世同许配给年近半百的王寿成,对其他联共党员的待遇也无微不至,可是他发觉这群有背景的人终不能为他效忠,于是他便着手打击其周围的知识分子,并加强对他们的侦查工作,一九三六年他把若干左倾公务人员分发外区,并向苏方提供有关联共分子生活腐化的情报,本来这些联共党员在苏联都受过政治惩罚,第三国际对他们并不十分信任,盛世才的计谋乃逐渐得逞。

第二是以地方民族人物为中心的势力,……再次地方派来的公安人员、文化工作人员如哈的尔阿吉、满索尔等,并未把盛世才放在眼里,他们一意孤行,毫无顾忌,吸收了许多工作人员,满索尔运用维吾尔文化促进会这个机构作宣传掩护,把民族革命思想重提到日程上。

讲到时间根据,其一是南疆军事好转,使新疆趋于和平;其二是抗日战争发生,东方情况大变,国民党对新疆将有所依赖,再不会和盛世才找政治上的麻烦;其三是一九三七年苏联曾捕杀了布哈林、杜哈切夫斯基等,并肃清了整个外交人员、驻外使节,翌年又于中亚捕杀了许多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乌孜别克民族主义者,这些帮助了盛世才获得有利的根据,来给在新的联共党员,外方间谍和外交人员戴上托派的帽子。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盛世才便着手制造他所谓的“大阴谋案”,……

其次,苏联的势力自从一九三八年后几乎已压得盛世才不能喘息。(一)一九三八年苏军红八团入驻哈密,这一团的实际人数约有国军的一旅,完全是机械化部队,分布于哈密、镇西、猩猩峡,扼住了新疆的咽喉。(二)边务处完全在苏方工作人员控制下进行境外工作,……边务处工作人员在外活动和所获的资料,盛世才直接无从知悉。兰州第一组专员袁楚西是陈培生直接介绍的,他掌握了各组的特工,并支配特工的开支。(三)自一九三五年以来,苏

联地质考察团、矿务考察团大批自伊犁入境,分往各地。(四)一九三七年盛世才接受了苏联的二百五十万金卢布贷款,使新疆的财政与金融失掉了独立性。(五)新疆驻苏联的中亚五领馆,于一九三七年经过肃清运动,人事上已完全更换。外人出入国境签证,有时不履行任何外交手续,亦可自由出入国境并在新疆境内旅行。(六)新疆若干区、县公安局,其局长或副局长,有的自动听命苏联领馆人员的指挥,有的是苏籍人,他们在地方任意作为,不听公安管理处的统制。(七)一九三八年,苏联于迪化西郊头屯河建筑铁工厂,根据公安管理处的档案所载,该厂已能生产飞机。(八)驻新苏领馆有接收新疆省民加入苏籍的自由,自一九三八年后,新疆的政治恐怖气氛日浓,有些人为了自身的保障而加入苏籍者,为数颇多。

.....

盛世才的这一次肃清运动虽未打击中共党员与苏方公开派来的工作人员,但却把他们的群众几乎扫光了。同时他又逼使被捕的“人犯”在口供中牵连到当时苏联驻迪化的代理总领事欧杰阳克,谓欧杰阳克系该案的主角,莫斯科方面立即派葛内斤,恰克雷斤来迪化参加审讯工作。新疆有名的审讯机关天主堂便是在此时专为外人时行审讯工作而设立的。葛、恰二人提审了维族“人犯”二十四名,这些人把以前的供词完全推翻了,他们以过去所受的酷刑之伤痕为证,证明他们的冤枉,而盛世才除了“人犯”的口供外又拿不出其它任何证据来,于是葛内斤等怀疑到盛世才所派的审讯人员如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观察处处长刘秉德等人别有企图来蒙蔽政府,他们举出许多理由,证明这个阴谋案完全是子虚乌有,并写成意见书提交盛世才。盛当时非常震怒,他立即亲提反供的“人犯”,或者刑讯,或者温慰,这些“人犯”在这种情势下,自然不敢再反,库尔班色衣托夫等人且亲撰悔过书,把以前的自证更扩大了,并声明他们的反供完全出于葛内斤等的诱导。盛即据此,把各

项审讯笔录译成俄文,共一六二册,八一九页,包括五十三名“人犯”的口供与总结,寄交在莫斯科留学的盛世骥,转呈苏联最高当局。同时还邀请葛内斤等与他会审。被审的“人犯”于事前均有公安管理处人员威胁,不许他们再行反供,葛内斤等不得已停止参加审讯,回国复命。在库尔班尼牙孜的供词中,其大体轮廓如下:他自认尚在塔什干留学时为一上将的军官吸收,担任间谍工作,回国前,该上将嘱其与迪化苏领馆职员阿布都热合满密取联系。他回国后年余,在迪化遇到了一九三七年案的苏方审讯员殷果洛夫,经殷介绍,与哈布都热合满会见,阿嘱他吸收青年倾苏,经常供给报告材料,俾苏方不助盛政府,而来帮助他们组织象乌兹别克斯坦一样的共和国。在迪化的苏方人员欧杰阳克,顾问巴宁都曾协助这个活动,以后他本人且与欧杰阳克、齐哈云斯克晤面,阿布都热合满常指示他,如果事机不密,被盛政府发觉而遭逮捕时,不要说出与阿等关系,所以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一定能救他们出狱……

在致苏联最高当局的报告总结中,盛世才推断欧杰阳克等人为托洛茨基匪徒,在新疆以社会主义者的外衣,作勾结地方民族的掩护,谋刺盛世才并颠覆亲苏的现政府,这个地方民族反动集团,又被汪精卫派来的杜重远所运用,秘密勾结阿山哈民,掀起暴动……盛世才的这些论断是依据“人犯”的口供,而证据是杜重远托茅盾带来内地的几封信,可是在这几封信中一点“反动”味也嗅不出来,盛世才也只有反复地强辩,来要求苏联相信。

……

盛世才没有满足一九四〇年的大肃清,一九四一年又把捕网撒出去。

……

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前后被盛政府逮捕而并入该案的约五百余人,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有若干师范

生、中学生也被捕入狱，许多人都未受审讯，但罪名已定。

此次盛世才也曾邀请苏方派人来迪化复审，但苏方似乎未理……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在盛世才的残酷肃清中，身陷监狱的各族人民不下万人，这些“人犯”大多数都是忠实于盛世才的，其中纵有若干亲苏或倾向中共的分子，但这并不是他们的罪过。盛世才在这五年中，言论与著作都充分说明他是马列主义的信徒，他表面上且曾予苏联以种种方便与权利，并自一九三八年起不断以物资接济陕北中共，谁能够猜到盛世才的葫芦中却别有药在。被捕的人捕后多不了解被捕的原因，并认为以前被捕的人均系有罪，等到自己站立或坐的法官的面前，经法官说出“阴谋案”的大体轮廓，要他们来承认，多数还是茫茫然不知所答，……

在肃清运动中，新疆的建设依然未停顿，反之，因恐怖气氛日浓，公教人员为了躲避监牢，无不埋头苦干，一般人民也战战兢兢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听从政府的支配。由于“叛逆”财产的大量没收，增加了政府的建设财力，尤其重要的是，肃清工作的不断执行，加强了政府政令执行的速率与贯彻，也扫除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与习惯。……

抗战军兴后，陈立夫曾到迪化，那时正是中苏关系好转的时期，一九三八年苏联以大量军火通过新疆运往内地，因而有中运会的组织，在此一机构内服务的曾有若干人，派自中央，到了三十九年中央在新筹组航教队，聘请苏联教官教练中国青年飞行技术，最初拟在哈密，后成立于伊宁的艾林巴克，航教队的队员均系自内地招来的青年，其主脑与办公人员亦均系中央派来的。当时中央在新疆的势圈只这一小块地方，而在这块小地方内，盛政府的密侦也布置得非常周密，航教队内每个人的言行，伊宁区公安局都曾侦取到。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新疆社会充溢着恐怖气氛,但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却在不断地被改善,这也是稳定他政治基础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人民是不会长期战栗于恐怖下的繁荣,他们已开始揭起反抗的旗帜。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27—55页)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摘自1938年9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摘自1938年9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八路军（1938年4月14日）H·利亚霍夫

中国人民喜爱的报纸（《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38年5月5日）·马克西莫夫

五台山的游击队员——来自中国的消息（1938年5月30日）B·罗戈夫

延安——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1938年8月2日）塔斯社

在中国游击队员中间（1938年8月7日）

中国的持久战口号意味着什么（1938年9月5日）陈林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1938年11月22日）M·季霍米罗夫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4日）郑林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关于给予中国满洲游击队运动援助的命令（1939年4月15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二、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支援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蒋廷黻电（1937年8月20日）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电（1937年8月21日，急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电（1937年8月22日，急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7年8月27日，特急电报）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7年8月28日，特急电报）

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击落击毁敌机总计一览表（1937年8月—1945年7月）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军方五次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1937年9月9日—10月4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石电（摘要）（1937年9月20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3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27日）

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关于援华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1937年11月11日）

蒋介石关于请求苏联派部队援助中国致斯大林的电报（1937年11月26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致蒋介石密函稿（1937年12月21日）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电（1938年1月3日）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1月22日）

在中国现在的首都（1938年1月25日）塔斯社驻中国记者 B. 罗戈夫

中国的军事行动（1938年2月5日） . 利亚霍夫

日本对华战争需要花多少钱（1938年2月7日） . 佩

罗夫

山东北部的游击队——中国来信（1938年2月13日）

B. 罗戈夫

日本军队和中国的战争（1938年2月13日） . 西尔

科夫

徐州保卫战的准备——与李宗仁将军的谈话（1938年2月14日）

中国军队的英雄——中国来信（1938年2月18日）B .

罗戈夫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转呈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建议电（1938年2月25日）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轰炸蚌埠安庆、台北及鲁南峰县等地之敌的“战斗要报”（1938年2月—10月）

河北省的游击队（1938年3月10日）B . 罗戈夫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3月15日）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呈蒋介石（1938年3月29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驳斥日本政府抗议苏联飞机助华（1938年4月4日）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8年4月7日）

立法院院长孙科致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密函（1938年4月16日）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电（1938年4月17日）

中国的军队（1938年4月25日）上校 . . . 波波夫
蒋介石关于尽快提供武器援助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8年5月5日）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10日）

杨杰转

中国战争的第二阶段（1938年5月10日）H·利亚霍夫
陇海铁路线上的战斗——在中国的军事活动评述（
1938年5月18日）H·利亚霍夫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
11日）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并转立法院长孙科电（1938年
5月28日）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29日）

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密电（1938年5月31日
）杨杰转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1938年6月2日）

在中国的前线——军事行动评述（1938年6月5日）H
·利亚霍夫

中国的飞行员——汉口来信（1938年6月6日）

中国人民的战士——外国报刊述评（1938年6月19日
）

占领徐州之后——中国军事战局评述（1938年7月1日
）H·利亚霍夫

一位中国飞行员的回忆录（1938年7月10日）少校林
新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摘要）（1938年7月
11日）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1938年7月25日）

蒋介石致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转航空委员会技术厅长黄
光锐电（1938年7月25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2日）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致蒋介石转呈黄
光锐来电（1938年8月1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

于实施五千万美元信用借款条约（1938年8月11日）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奉命参照苏联顾问班果夫之作战意见改进前线军事致何应钦等代电（1938年8月13日）

军委会抄送苏联顾问保葛达诺夫视察南浔铁路前线驻军建议致何应钦代电（1938年8月16日）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1938年8月17日）

蒋介石致伏罗希洛夫元帅并转斯大林电（1938年8月17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1938年8月22日）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致蒋介石鉴呈（1938年8月25日）

白崇禧转报炮兵监刘翰东与苏联顾问毕诺乌索夫视察长江南岸一带情形致何应钦呈文（1938年9月2日）

为汉口而战（1938年9月19日）H．利亚霍夫

为汉口而战（1938年10月12日）H．利亚霍夫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损失（1938年10月16日）M．季霍米罗夫

苏联顾问郭夫东视察武汉卫戍区阵地情形报告及建议（1938年10月）

美国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1938年11月2日）．佩岁夫

中国人民必胜（1938年11月7日）B．罗戈夫

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评述（1938年11月13日）H．利亚霍夫

日本的侵略和英国在中国的利益（1938年11月24日）E．茹科夫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1938年11月29日）A．别杰罗

夫

中国各条战线的局势（1938年12月4日）

苏联总顾问A. 切列潘诺夫对第十五军团所拟“
武汉城市防御战斗指导计划”的意见（1938年）

中国战局评述（1939年1月18日）H. 利亚霍夫

中国的新军队（1939年1月19日）

新中国在成长（1939年2月6日）M. 季霍米罗夫

日本军阀在中国的阴谋（1939年2月18日）

苏联炮兵顾问谢罗夫关于第三战区炮兵部队种种缺点
报告摘要（1939年2月）

苏联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帮助中国分析敌情并拟呈对付
方案（1939年2月11日）

中国战局述评（1939年4月3日）H. 利亚霍夫

行政院会议颁发苏联空军顾问特贺尔勋章决议案（
1939年4月25日）

在中国前线的一个村子里（中国来信）（1939年4月
26日）B. 罗果夫

在华中前线（记者短评）（1939年4月28日）B. 罗果
夫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4日）

立法院长孙科致行政院长孔祥熙电（1939年5月15日
）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6日）

中国人民的女英雄（1939年5月17日）冀玲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1939年5月19日）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1939年5月24日）

中国战局述评（1939年5月25日）H. 利亚霍夫

中国战局述评（1939年6月11日）H. 利亚霍夫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
于实施壹万万伍仟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1939年6

月13日)

日本侵华两周年(1939年6月20日)B·罗果夫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6月26日)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7月1日)

中国战局述评(1939年7月12日)H·利亚霍夫
蒋介石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电(杨杰转)
(1939年7月30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8月9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8月9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9年8月20日)

蒋介石感谢苏联援助致斯大林的信(1939年8月26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谈话
记录(1939年9月10日下午3时于克里姆林宫)

1939年中日战争述评(1939年12月29日)M·马利亚
尔

中国军队在广东的巨大胜利(1940年1月6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
帅晤谈记录(1940年1月8日下午2时)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9日)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40年1
月20日)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电(1940年1
月31日)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轰炸南宁、汉口、运城、岳阳等
地之敌的“战斗要报”(1940年1月—5月)

军委会为苏联总顾问福尔根报告第三战区作战不力饬
检讨纠正代电(1940年2月22日)

中国的军事行动(1940年3月1日)

中国战局述评（1940年3月16日）
苏联顾问阔扎柯夫关于改革三战区炮兵指挥部组织及炮兵的报告（1940年3月26日）
苏联炮兵顾问阔扎柯夫的报告（译件）（1940年3月26日）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4月3日）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4月12日）
空军第三路司令部战斗要报（1940年4月12日于成都西胜街本部）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4月27日）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5月2日于成都）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5月2日）
空军战斗要报（1941年5月21日于成都空军总指挥部）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蒋介石签呈（1940年4月28日）
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1940年5月4日）A．别杰罗夫军令部为修改苏联顾问福尔根对宜昌失陷检讨意见致蒋介石签呈（1940年7月25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谈话记录（节录）（1941年1月16日）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动用苏联贷款向苏购军火武器的账略（1941年3月4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呈蒋介石报告（1941年3月28日）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转报向苏联订购之汽油数千吨已运抵惠远、哈密致孔祥熙代电（1941年9月9日）
苏联代军事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关于“中国各战区防御工事概况报告书”（1942年8月）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致外交部交际科笺函（1943年5月）

24日)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查对中苏第三次信用借款
项下援华物资的签呈

(1944年10月2日)

汉口苏联空军烈士墓

在华使命(节录)[苏]崔可夫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张国焘叛变行径的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
日)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
月1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关于
张国焘问题的声明(1938年9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1938年9月)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王稼祥

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
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
全会的报告毛泽东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
10月1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洛甫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致各国共产党电(1938年11月5
日)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致日本共产党电(1938年11月5
日)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决议(1938年11月6日通过)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
同志书(1938年11月6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1938年11月6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五、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反投降反磨擦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1940年2月）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电报（1941年1月4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反磨擦斗争中争取友军工作给新四军的指示（1940年11月4日）

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6日）

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1940年11月6日）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1941年1月13日）

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指示（1940年12月26日）

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1940年12月31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谈话记录（节录）（1941年1月16日）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1941年1月18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紧急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20日）

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1941年1月24日）

毛泽东等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1941年1月28日）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1941年2月7日毛泽东致周恩来）

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指示（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1941年2月15日）

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等）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1941年5月9日）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941年5月25日）

在华使命（节录）崔可夫

六、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新苏临时通商协定（1931年10月1日）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致外交部驻新特派员陈继善（1933年3月21日）

外交部长罗文干致迪化宣慰使黄慕松电（1933年6月29日）

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抄送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及附件致行政院呈文（1933年9月14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签注新苏协定意见呈行政院文（1933年11月4日）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电（1934年7月16日）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4年8月15日）

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话记录（1934年8月29日上午11时30分）

关于苏联对新疆贷款密约之签订（1935年5月16日）

毛泽民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致洛甫、泽东同志的

信（1938年4月18日）
任命状（1938年4月）
盛世才委任周彬为逆产委员会委员长的手谕（1938年5月31日）
周彬、张宏与关于筹办官商合办银行给盛世才的报告（1938年7月）
财政厅呈报新疆省区财政局暂行条例
全省各机关请领经、临费办法及手续
新疆商业银行招收商股启事
周彬呈报成立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经过
盛世才委任周彬为新疆二期三年计划设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财政组组长
关于新疆的社会环境讲话提要（1939年1月19日）邓发
周彬关于稳定金价的报告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新疆省政府关于收换法币的指示（1939年5月）
财政厅呈请简化机关经费批发手续
呈请重新修订监察章程并将经常审计移归财政厅的报告
财政厅关于任用财税人员手续的通令
新疆财政厅关于禁烟禁赌的通令
关于盛世才的情况及新疆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节录）（1939年6月16日）毛泽民
关于颁发商业银行理监事聘书的批复
李溶关于周彬病愈回省仍代财政厅长的手谕
徐杰准备引退的请示
财政厅关于制定廿九年年度计划的通令
财政厅呈请重新修改取缔隐匿契税办法
周彬关于郝冰清等兼代办理金矿处主任的呈文

新疆省政府奖励新疆日报社编辑长李啸平等的训令（1940年6月25日）

租借条约（外交部译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与新疆省政府签订（1940年11月26日）

财政厅关于查禁募捐的通令

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关于粘贴印花税票的通令

督办公署为实施民国三十年度收支总预算标准案的通令

新疆省建设公债宣传大纲

毛泽民在民国三十年新疆财委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录）

盛世才致蒋介石书（1942年7月7日）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纪录（重庆，1942年7月9日地点——曾家岩官邸）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1942年7月13日）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纪录（1942年7月16日）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电（摘要）（1942年7月23日）

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与中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谈话备忘录（1942年9月28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代电（1942年9月28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电（1942年10月6日）

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致美驻华大使高思备忘录（1942年10月7日）

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彭吉元致外交部电（1942年10月18日）

外交部致蒋介石代电（1942年10月21日）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致盛世才电（1942年12月16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代电（1943年1月5日）
盛世才致蒋介石电（1943年1月7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函（1943年1月21日）
外交部致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署电（1943年2月22日）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报告（1943年4月17日）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函（1943年4月23日）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与盛世才谈话记录（1943年5月3日）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致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备忘录（1943年5月6日）
蒋介石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函（1943年5月7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部、次长代电（1943年6月11日）
盛世才致蒋介石代电（1943年6月11日）
蒋介石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电（1943年6月23日24日收）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电（1943年6月24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部、次长电（1943年6月24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电（1943年9月6日）

新疆督署秘书处报苏联驻新第八团撤退情形（1943年7月3日）
美国驻华临时代办艾切森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1943年7月7日）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致蒋介石代电（摘要）（1943年8月14日）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致蒋介石报告（1943年8月2日）
美驻华临时代办艾切森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1943年7月31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电（摘要）（1943年9月10日）
盛世才第二次致蒋介石书（1946年11月24日）
盛世才关于苏联与新疆省政府签订“租借条约”的叙述（1950年3月4日）
徐智《哈密见闻》（摘录）
苏军驻哈密的片断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统战工作高登榜
中共党人在新疆财经战线上（节录）方志纯
抗日战争初期在新疆日报社汪小川
回忆抗战时期中共党员主编《新疆日报》赵新亚
为了建设抗战的大后方——忆新疆之行萨空了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周东郊口述
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摘录）周东郊遗稿
封底